

Foreign Studies on Marxism and Socialism Series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顾问 徐崇温

主编 李慎明

Christian Fuchs & Vincent Mosco

M A R X I S B A C K

马克思归来 (上)

[瑞典]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加] 文森特·莫斯科 主编
“传播驿站”工作坊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ISBN 978-7-5675-5971-4



9 787567 559714 >

定价：158.00元（上、下）

Foreign Studies on Marxism and Socialism Series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顾问 徐崇温 主编 李慎明

马克思归来 (上)

[瑞典]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加] 文森特·莫斯科 主编
“传播驿站” 工作坊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归来 / (瑞典)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加) 文森特·莫斯科主编; “传播译站”工作坊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5675-5971-4

I. ①马… II. ①克… ②文… ③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政治经济学—文集 IV. ①G206-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2375号

Marx is Back

edited by Christian Fuchs and Vincent Mosco

Copyright © Christian Fuchs and Vincent Mosco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ristian Fuchs and Vincent Mosc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5-719号

马克思归来

MAKESI GUILAI

[瑞典]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加]文森特·莫斯科 主编
“传播译站”工作坊 译

责任编辑:倪为国 彭文曼 吴昊

责任校对:杨媚 朱彦彦

装帧设计:刘沂鑫 刘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
著名
商标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http://www.ecnupress.com.cn>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普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79.25 字数:1027千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75-5971-4

定价:158.00元(上、下)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顾问：徐崇温

编委会主任：李慎明

编委会副主任：邵文辉 张拥军 陈兴芜

编委(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陈学明 陈众议 程恩富 邓纯东 段忠桥 郝立新

侯惠勤 胡振良 黄平 姜辉 梁树发 刘同舫

鲁品越 王凤才 韦建桦 徐俊忠 颜鹏飞 张宇

张树华 张顺洪 张一兵 周弘

在学习借鉴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李慎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①这一要求，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宣部理论局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会同重庆出版集团选编了这套“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员的辛勤努力，终于开始奉献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2013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

*李慎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①《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8 日。

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他又强调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冲击至今仍未见底,这是生产社会化直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的总爆发,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经济全球化、新的高科技革命和世界多极化都在深入发展,各种政治理论思潮此起彼伏。马克思主义的“幽灵”重新徘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上空。全球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潮也开始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巍然屹立于当今世界之林。在强大的事实面前,即便是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对西方社会的重要影响力。西方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或信仰者说得更为深刻。日本著名作家内田树呼唤道:“读马克思吧!”“读过马克思之后,你会感觉到你自己思考的框子(或者说牢笼也可以)从外面被摇晃着,牢笼的墙壁上开始出现裂痕,铁栅栏也开始松动,于是你自己就会领悟到原来自己的思想是被关在一个牢笼当中啊。”^③这些都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决没有过时。对这些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我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第109页。

^②《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

^③[日]内田树、石川康宏:《青年们,读马克思吧!》,于永妍、王伟译,红旗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第26页。

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和思想成果,无疑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更好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中国是个大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模是世界第二;人口是世界人口的 1/5。而且,中国有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以及 5000 多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新中国成立至今,特别是冷战结束至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实践,都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十分丰厚的沃壤。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十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也面临着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①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决不能固守已有的现成结论和观点,必须结合当今的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姿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创新和发展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更加积极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益成果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译介、研究和借鉴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

^①《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8 日。

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西方各种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一并进入中国,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曾一度收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90年代后期又开始逐步扩大,到21世纪头10年又进入了新的高速发展时期。作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2005年12月,我国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二级学科。应该说,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为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说服力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也为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资源。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与它理应承担的使命、任务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虽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流派和代表人物不断被引介过来,一些比较新奇的观点也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但总体上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不尽如人意,一些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比如,在表面的繁荣之下,有的被研究对象牵着鼻子走,失去了曾经清晰的目标;有的陷入至今仍未摆脱的迷茫和瓶颈期。又比如,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有的缺乏辩证思维,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奉为圭臬,认为它富有“新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有的甚至把列宁、斯大林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走形变样”的政治话语,是“停滞、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内外也有一些人企图用黑格尔来否定马克思,用马克思来否定列宁,用否定列宁来否定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而企图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引入歧途。

虽然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翻译性学术著作和资料的数量有待进一步拓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总的看,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虽已有许多被译成中文出版,

但整体上并不系统,而且质量参差不齐。

从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益成果,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宗旨出发,在新的条件下继续翻译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必将有助于我国学界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这套丛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一次重新整理,必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益资源过程中,为繁荣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经过比较严格的遴选程序进入这套丛书的著作,主要聚焦和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既注重立场性、代表性、权威性和学术性的统一,又兼顾时代感和现实感。同时,我们还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分别为每本著作撰写简评并放在各本著作的前面,对该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作了简要介绍和评析,以尽可能帮助读者了解这些作品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和历史局限。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的能力、水平有限,这篇总序和每一本书的简评,或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敬请各位读者不吝指教。不妥之处,我们将及时修正。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既能够在理论界、学术界,同时又能够在广大党员干部中产生一定影响,以期不断加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把握和认同。

是为序。

2016 年 12 月 1 日

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

赵月枝*

如果说，正是资本主义的长寿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长寿，^①那么，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激活马克思主义、彰显其批判和解放潜力的最佳转机。^②

《马克思归来》英文版出版于2012年。它的出现，是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新一波“马克思归来”热在传播学界的重要成果之一，反映了国外学界在网络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最新努力。今天，全球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方面的危机日益深化，矛盾不断凸显。在这种背景下，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可谓正逢其时。当然，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全球学者超越语言、历史和地理障碍，共同探索。

本文包括三个主体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发展脉络，介绍本书不同于其他两部国外大型马克思主义传播

* 赵月枝，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现任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全球媒介检测与分析实验室主任。

① Michael Burawoy,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 *Politics & Society* 31: 2 (2003): 193。

② 赵月枝、石力月：《历史视野里的资本主义危机与批判传播学之转机》，载于《新闻大学》，2015年第5期，第2页。

学文集的特色；第二部分讨论“马克思归来”的不同学术路径，提供理解本书内容的学术脉络和理论背景；第三部分在如何发展网络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语境下，探讨本书的启示及其局限性。结论部分简要讨论发展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机遇、挑战与核心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与传播学：文集中的学术史

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马克思都是现代批判传播学的奠基者。马克思本人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关于社会交往形式、传播技术、知识和意识形态等问题的论述。从卢卡奇（Georg Lukács）到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蔚为大观。这些思想为现代传播学的创立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然而，颇具悖论色彩的是，作为一个建制的学科，在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中，现代传播学几乎有一个最为“去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冷战社会科学”起源。

实际上，就传播学而言，“整个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背景下，在批判与反批判的较量中发展的。”^① 1930 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随后的“二战”，催生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播思想，并成为传播学科“史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回应，美国主流传播学就此产生。在 1940 年代至 1960 年代的美国主流传播学科经典性文献中：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有关美国小镇选民是否受广播宣传影响的研究——

^①赵月枝、石力月：《历史视野里的资本主义危机与批判传播学之转机》，载于《新闻大学》，2015 年第 5 期，第 2 页。

《人民的选择》，从一个侧面批评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体大众宣传作用的担心，证明美国自由多元主义的存在，以此来消解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主义有可能在美国出现的担忧；传播与发展领域的奠基之作——丹尼尔·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是基于对处于冷战前沿的中东地区所做的关于“美国之音”的受众研究，其所倡导的传播与现代化框架是美国冷战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施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更是在美国官方与学界密切合作基础上推出的冷战新闻理论文本，用简单的自由与专制的二元对立来诋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媒体制度，在冷战时代影响深远。

然而，1960年代的到来，“尤其是1970年代初开始的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第三世界’的抗争，又催生了以激进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批判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等为主要内容的批判传播学”。^① 具体而言：在英国，在汲取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蓬勃发展；在北美，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冲破了麦卡锡主义的思想牢笼，在达拉斯·斯迈思与赫伯特·席勒等一代先驱的努力下，在传播学内部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非拉国家，不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产生了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而且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和研究案例。

正是在如上历史情境下，出现了这一时期国际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的杰出代表和集大成者之一——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他联合联合独立文化人和出版人塞思·塞格拉伯（Seth Seigelaub）在1979—1983年间编辑和出版了国外学界第一部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大型文集《传播与阶级斗争》（第

^①赵月枝、石力月：《历史视野里的资本主义危机与批判传播学之转机》，载于《新闻大学》，2015年第5期，第2页。

一卷与第二卷)。^①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马克思主义媒体与传播学编著。其中,共收集了128篇涉及“传播实践、传播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全球社会斗争的历史语境之间关系”^②的文章,涵盖已经出版、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的文章和原创文章三个种类。第一卷出版于1979年,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两个总揽性主题,聚焦马克思主义关于传播过程的基本理论和对资本主义传播机器、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分析,旨在批判资本主义现有传播秩序;所收集的64篇文章中,三分之一以上是第一次在英语世界出版,还有一些甚至是全球首次出版的文章。第二卷出版于1983年,以“解放”和“社会主义”为主题,分析不同历史条件下,民众和工人阶级在传播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实践及当代表达,旨在超越资本主义;第二卷同样收录了64篇,其中,38篇是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或原创文章。与本书相辅相成,法国传播学者伊夫·哈耶(Yves de la Haye)于1980年在同一个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传播方式》(*Marx & Engels on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一书,对马恩著作中有关传播问题的讨论按主题划分进行摘要和整理,以求为发展“唯物主义的媒体理论”和“反击主导的资产阶级传播理论”做出贡献。^③

《传播与阶级斗争》影响了英语学术界整整一代批判学者。今

^①Armand Mattelart and Seth Siegelaub (eds.),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An Anthology in 2 Volumes. 1. Capitalism, Imperialism*. New York; Bagnolet: International General, 1979; Armand Mattelart and Seth Siegelaub (eds.),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An Anthology in 2 Volumes. 2. Liberation, Socialism*. New York; Bagnolet: International General, 1983. 下文有关描述均见此书。

^②此句直接译自国际总出版社网站对本书的介绍语言,见 <http://igeneral.org/other.html>。

^③Yves de la Haye (ed.), *Marx & Engels On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e Movement of Commodities, People, Information & Capital). A Selection of Texts*, New York; Bagnolet: International General, 1980, 引文为来自封底描述。

天，翻阅这部国际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史上的巨著，它的国际性、它强烈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取向，它的批判和建设并重的追求，尤其是它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传播与文化建设息息相关的有机知识生产定位，不仅唤起了人们对 20 世纪世界革命的记忆，令人荡气回肠，而且真正体现了马克思这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的精髓。这里没有经院哲学，没有绕来绕去、不知所云的文献综述，更没有为了学术而学术的花拳绣腿。这里的许多文章甚至没有个人署名，而是革命的主体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思想、报告、工会罢工委员会文件、甚至上海工人关于如何在计算机发展中体现群众路线的圆桌讨论的报告。仅从 128 篇文章中的部分作者名单就可见其国际性，及其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有机知识品格：马克思、葛兰西、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阿连德、法农（F. Fanon）、布尔迪厄（P. Bourdieu）、列斐伏尔（H. Lefebvre）、古贝克（T. Gubeck）、英国电影委员会（the Film Council, UK）、《工人生活》（*Workers' Life*）、自由传播小组（Free Communications Group）、社区媒体发展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Media）。

如果说，马克思曾同时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导师在场于传播理论与实践，而且产生过巨大影响，那么《传播与阶级斗争》就是其最好的历史见证。当然，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传播与阶级斗争》问世的 1979—1983 年，正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运动进行猛烈的反扑，并在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取得关键性进展的年代：在英、美两国，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为代表的保守政治势力上台；在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随着媒体的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开始成为全球性主导意识形态。到了 1984 年，在国际传播领域，为了反击以不结盟国家为主体、达拉斯·斯迈思、赫伯特·席勒和阿芒·马特拉等一代马克思主义传

播学者积极参与的“全球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美国和英国先后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后，正如《马克思归来》的两位编者在《导论》中所描述的，在国外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可查到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文章明显缩减。

当然，即使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1990年代，马克思也并没有完全失踪；而对有些学者来说，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1980年代以来，在斯迈思、席勒、马特拉等学者的引领和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①，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并不友好的学术氛围和缺少学术资源的条件下，在与来自这一传统内部、外部以及处于内外交界的“灰色地带”的各种学术思潮进行持续的论辩，并不断在开拓中推进。所有这些争论作为积累，为2008年以后马克思在传播领域的“归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实际上，早在《马克思归来》出版前一年，英文批判传播学界就出版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这本代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最权威和最高水平的《手册》，聚集了自19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学术语境下一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媒体与传播研究的一批国际学术中坚的总结性、综述性和开拓性论文，是一部长达600多页、包括26篇特邀论文的大型文集。^②

因此，对《马克思归来》而言，如果说《传播与阶级斗争》提供了纵向的历史性比较、从而清楚地显现出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如何从一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国际性事业，到作为英文学术界的一个学术项目；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则提供了横向的比较。

^①Vincent Mosco,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2009.

^②Janet Wasko, 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Malden, MA: Wiley - Blackwell, 2011。此书中文版由“传播驿站”工作坊翻译，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它们的组织、生产和出版方式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和《马克思归来》又有明显的互补性:前者特邀资深学者,以工具书的形式在学术出版社出版,具有更高的组织性和权威性;后者以资源开放的网络学术刊物《资本主义·传播·批判》特刊的形式,通过征文活动组织文章,在作者层次方面更有代表性;在主题方面,后者因为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视角,也更有广泛性。

《马克思归来》的两位主编中,首位是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年轻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其次是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现已退休的加拿大知名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福克斯在本项目中的主导角色,以及本论文集的作者构成中在读博士生和年轻学者的显著地位,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在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后,出现了“后继有人”的新局面。实际上,19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加速了其把信息、知识生产、高等教育和学术出版当作资本积累新场域的过程,这让年轻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以,论文集中有不少文章研究的就是这些领域的问题,自然也毫不为奇。当然,就其出版和传播方式而言,本论文集以开源网络出版形式出现,摆脱了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和知识产权关系,也体现了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实践精神。

二、如何让马克思回到网络时代的传播研究?《马克思归来》的学术路径

《马克思归来》包含了马克思与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与媒介使用;马克思和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共四个部分。前两个部分占据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显示出“商品化”和“意识形态批判”这两个议题在马克思主

义传播研究中的核心位置。这两者中，前者关注传播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揭示信息或网络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化过程在文化和传播领域的深化、资本积累的新形式以及剥削和不平等产生的新形式；后者分析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意识形态层面被合法化的。正如两位编者所言，受众对媒体文本的解读研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因此，虽然第三部分以“马克思与媒介使用”为题，却只有两篇文章。最后的“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部分，不但只收录了7篇文章，而且其中只有两篇聚焦社会运动中的传播问题。这一点与《传播与阶级斗争》中批判与建设并重的内容设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反映了19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挫败。

如前文提及，传播学学科内部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研究是在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第三世界反帝反殖运动、以及西方内部以1968年“红五月”为标志的社会运动的启发和鼓舞下，通过挑战美国主流实证传播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本书所代表的后2008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在学术脉络和研究路径方面，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努力：1. 在解读马克思原著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理论框架的构建和对当下传播问题的分析；2.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对“占统治地位”的传播思想的批判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3. 在经历了198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这两个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原本“一体两面”的研究取向间的论争甚至“分道扬镳”以后，新世纪以来，面对传播和文化领域的新发展，一些学者重新走向了这两个面向的有机融合；4.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内部，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盲点辩论”（围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中的“盲点”的讨论）基础之上，自19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以来，受“自主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新一代传播学者，对传统政治经

济学者片面强调资本的主导性力量，忽视劳资关系中工人抗争的主体性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其结果是，围绕“知识劳工”、“一般智力”、“社会工厂”和“盲点辩论”的讨论中，出现了诸如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的2.0版本——网络和新媒体“生产—消费者”（prosumer）等概念，构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创新性思想。

总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的阐发和具体运用、对1980年代以来的资产阶级传播思想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新融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内部的创新，是“马克思归来”的基本途径。当然，不是所有文章都包含这四个面向；不同文章有不同的侧重点。

（一）从马克思的原著和基本概念再出发

作为对编辑意图的直接回应，学者们回到马克思的原著，围绕马克思思想的不同侧重面，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这些思想在后世学者中的发展，来确立马克思主义媒体和传播研究的基本概念，分析信息资本主义或网络资本主义时代的媒体与传播现象，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

本书第一部分的第一篇论文，加拿大约克大学博士生妮可·科恩的文章《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工作：自由撰稿人与剥削》就是这方面的典范。针对文化研究中的“马克思缺失”和广义上的媒体与文化工作，尤其是在劳动过程中游离于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在劳动内容上相对于物质生产富有更多自主性和创意性，在信息资本主义时代越来越普遍的自由撰稿人或更广义的文化自由职业者现象，作者以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和剥削理论为基础，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家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man）的劳动过程理论，提出了以下的研究问题：“如果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已经彻底渗透到文化产业，如果剥削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基础，那么这个动态在文

化工作如何体现？如果文化工人在创意阶段获得相对自主权，那么资本如何应对？”^① 作为论文的核心和实证部分，作者以自由撰稿人为案例，结合加拿大文化传播产业的最新发展动态，分析了在当代文化产业里自由撰稿人和资本的关系中，资本是如何通过剥削自由撰稿人的无偿劳动时间以及控制作品的版权，获取剩余价值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该论文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导向或动态历史导向，以及对工人自主性的重视。这方面最鲜明的表现就是，作者将文化工作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资对立的动态关系中考察，描绘了文化生产中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斗争。一方面，自由撰稿是在文化工作者希望自己摆脱资本控制的斗争中推动的，反映了他们寻求自主性、想要从事有创造性和灵活性工作的追求；另一方面，为了回应工人的反抗，资本调整了策略，重组了文化传播业，还通过对法律等国家机器的掌控和影响，强化了对知识产权的控制。就这样，自由撰稿“一方面代表了工人的终极自由，另一方面也是资本的理想安排。”^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21世纪“传播与阶级斗争”这个主题的最新演绎。

与妮可·科恩对价值创造领域的关注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位女性学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米歇尔·罗迪诺-科罗奇诺（Michelle Rodino-Colocino）则从意识形态领域切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作为意识形态的女权主义：萨拉·佩林的反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一文中，作者借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家乔治·莱尔因（Jorge

①[瑞典]福克斯、[加]莫斯科：《马克思归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2页。（本书正文第53页）

②[瑞典]福克斯、[加]莫斯科：《马克思归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3页。（本书正文第55页）

Larrian) 在总结马克思于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论述后得出的理论分析, 通过列表对比马克思博大精深的意识形态理论中的不同元素与佩林式“反女权主义的女性主义”的不同表现, 系统地解构了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女性竞争者萨拉·佩林对女性主义话语的挪用、转换及其意识形态工作, 指出她的政治实质, 是以女性主义之名, 行维护父权资本主义秩序之实, 进而对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反攻倒算。罗迪诺—科罗奇诺的研究展示了在妇女解放问题上, 美国政治生活和理论领域的复杂斗争, 以及妇女解放和女性主义理论“进一步, 退两步”的现状。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中, 往往缺乏女性主义的立场; 女性主义传播研究中, 则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这个问题在传播领域由来已久。虽然也有努力,^①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传播研究还是凤毛麟角。这项基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的研究, 对理解性别、种族等身份认同政治的局限性, 尤其是西方社会不断出现的右翼女政治家现象背后的阶级政治和性别政治等复杂交互关系有普遍意义。

与科恩和罗迪诺—科罗奇诺的深入质化研究形成对比, 土耳其资深学者艾尔番·埃尔多甘 (Irfan Erdogan) 在《失踪的马克思》长文中, 首先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主流学术中的地位进行了量化研究, 描述了资本主义语境下学术是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然后,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 作者系统地梳理了马克思关于传播与大众传媒的一系列思想和观点, 从而与前文提到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传播方式》一书形成了学术承接关系, 继续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的发展提供基础性研究。

作为本文集的第一主编, 福克斯本人在《迈向马克思主义的网

^①Eileen R. Meehan and Ellen Riordan (eds.), *Sex and Money: 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edi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络研究》中，分析了网络批判研究的路径，指出不同流派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斗争的基础，梳理了辩证法、资本主义、商品/商品化、剩余价值/剥削/异化/阶级、全球化、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判、阶级斗争、公共财（commons）、公共领域、共产主义、美学等 11 个（组）基本概念，进而提出了在此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网络研究的宏大学术构架。与福克斯无所不包的学术框架相反，莫斯科则在自己的文章中设问“到底是哪个马克思回来了？”，聚焦为《资本论》做铺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马克思的新闻实践，力图把当下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重心引向信息劳工问题和新闻实践问题。基于“自主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莫斯科指出，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把关注的重点明确放在了“信息对资本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上，而这一点也是使信息时代的传播研究回到以社会的“一般智力”的提高和人的解放为核心的关键。

（二）对“占统治地位”学术思想的批判

本书的第二种学术路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展开对 1980 年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传播理论的批判，并在此过程中发展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这些作为批判和分析对象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信息社会理论、网络社会理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以及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技术决定论。罗伯特·普雷（Robert Prey）的《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艾尔番·埃尔多甘（Irfan Erdogan）的《失踪的马克思》的前半部分、延斯·斯楚罗特（Jens Schröter）的《因特网和“无摩擦资本主义”》、克里斯蒂安·加兰（Christian Garland）和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的《谁在那里说新自由主义？》以及米丽娅姆·奥拉格（Miryam Arouagh）的《社交媒体、中介性与阿拉伯革命》，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

学术研究本身即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领域。对此，埃尔多甘的以下结论有一定代表性和批判力：

本研究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参与到有利可图的关系网中去，增加从不同资源中获取财政补贴的可能性、在大学院系中获得正式认同和成功的可能性、在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圈中赢得受人尊敬的地位的可能性、在主流学术期刊上出版的可能性、从基金组织、资助机构和专业协会获得资助的可能性，都需要如下的学术立场：1. 完全忽略马克思主义的取向；2. 表明公开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3. 采用一种基于文化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实证主义等理论的安全的、有利的取向，试图证明马克思主义无效；4. 给出最为错误和歪曲的解释，比如宣布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意识形态的终结、民主化、知识社会、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去殖民化、身份和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等。^①

当然，这段话也有以偏概全之嫌，存在诸如“文化主义”、“民主化”、“去殖民化”等概念缺乏准确定义的问题，而批判者也会毫不客气地指出，作者自己也直言其研究得到了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资助。的确，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项目有时也会得到国家资助机构的支持——这也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和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发挥双重作用的表现。

当然，学术光谱非常复杂，并不是所有“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一致的。用动态的眼光来看，由于阶级斗争态势的变化和争论

^①[瑞典]福克斯、[加]莫斯科：《马克思归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79页，此处译文稍有改动。（本书正文第549—552页）

焦点的变化，“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与“批判”的思想也具有相对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谁在那里说新自由主义?》一文，就展现了在“批判语言”上的这种变化：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它也同时成为学术批判的对象。面对新自由主义者对曾经作为福利资本主义制度一部分的公共广播电视的攻击，许多批判学者把捍卫公共广播电视及其所体现的自由多元主义民主当作规范性目标，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其结果是，资本主义成为了一个不被言说和指称的存在，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所嘲讽的那个“不喜欢被称呼名字的绅士”。这种以捍卫自由主义民主为目标的社会改良主义立场，排除了对资本主义及其媒体——包括商业媒体和公共广播电视——的结构性批判，从而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作者指出，“无论如何，以政治经济的标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在许多方面已经结束……也许现在是时候放弃新自由主义作为分析范畴了。”^①

当然，在学术历史上，也有原来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出于各种原因，偏离甚至走向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可能。在1980年代以来的传播学界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网络社会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偏离和修正。卡斯特曾是一位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社会学家。1990年代以来，他的“网络三部曲”在批判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敢于挑战学术权威卡斯特的恰恰是一位初生牛犊——当时笔者在西蒙·弗雷泽大学指导的博士生罗伯特·普雷。在《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这一文章中，普雷关注的是网络时代如何理解权力和分析权力关系的问题。众所周知，互联网本身可以溯源到上世纪最大的摩擦

^①〔瑞典〕福克斯、〔加〕莫斯科：《马克思归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50页。（本书正文第712页）

之一——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而产生的“冷战”。实际上，资本对信息技术的拥抱——也即资本主义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也是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需要所驱动的。^①但是，网络的出现，还是激发了诸如“历史终结”、“世界是平的”等种种意识形态幻想。网络乌托邦思想把网络当作能一劳永逸地克服资本主义矛盾的“终极解决方案”。作为网络时代最大的资本家之一，比尔·盖茨更是在自己的书中期待能进入“无摩擦资本主义”的佳境。当然，这个幻想很快就被2001年的网络经济危机所击破，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也对此做了深刻的分析，指出：网络的出现，反而深化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本书中，延斯·斯楚罗特（Jens Schröter）的《因特网和“无摩擦资本主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②

与斯楚罗特相比，普雷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更深入一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卡斯特。作为一位有深厚马克思主义根基的学者，卡斯特对网络社会的分析当然不会与“世界是平的”等浅薄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修辞同日而语。在从《网络社会的兴起》到《传播权力》（*Communication Power*）等一系列鸿篇巨著中，卡斯特对网络时代所产生的不平等有深刻的批判。然而，基于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佩罗（Ève Chiapello）的观点，普雷分析了卡斯特基于“包容/排斥”这一网络隐喻的权力观及其对不平等的批判，及其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根本区别，指出“排斥主题”实际上是否定了马克思社会批判中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理论。更为重要的是，普雷不是简单地在“意识形态批判”的层次上否定网络隐喻

^①见 Herbert Schiller, *Information and the Crisis Economy*, Norwood, NJ: Ablex, 1984; [美]丹·席勒著，杨立平译：《数字资本主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美]丹·席勒著，邢立军、方军祥、凌金良译：《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

^②见 Dan Schiller, *Digital Depression*,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4。中文版即将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

和“排斥主题”，呼吁阶级和剥削分析的回归，而是深入到本体论的层面，指出“排斥主题”实际上是基于世界是由一种“内/外二元体”（inside/outside binary）构成的本体论立场，而这与马克思在分析“生产”概念中所体现出来的“过程关系本体论”有根本的区别。这一看似复杂的讨论实际上可以被推到以下的极致来理解：如果用“包容/排斥”的隐喻，那么，奴隶之所以是奴隶是因为被排斥在奴隶主的行列之外，工人之所以是工人是因为被排斥在资本家的行列之外，而事实上，如果大家都被“包容”进去，就没有资本家和奴隶主了。普雷强调，需要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如下重要论述：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剥削就是在资本主义之下形容这种关系的术语。也正是在解释“过程关系本体论”是如何把剥削理解为一个内在关系的过程中，普雷回到了马克思的“矛盾”概念，指出这一概念描述的是在一个系统内两种同时彼此依赖和否定的结构性原则。他还指出，卡斯特错误地把网络社会中生产力的主要来源定位于知识本身，而不是知识工作者，从而在价值生产的源泉问题上偏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总之，《谁在那里说新自由主义？》呼唤对资本主义的指认，《因特网和“无摩擦资本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网络乌托邦的幻灭，《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则在更加深刻的层面上，让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论内核回归到了网络时代。

与网络和平等主题相对应的，是“网络带来自由和解放”这一“传播技术带来解放”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最新版本。虽然早在1983年，美国主流传播学者伊锡尔·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就在《自由的技术》^①一书中表达了这一立场，但是“网络带来自由和解放”

^①Ithiel de Sola Pool,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的主题被主流媒体和学者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则发生在 2011 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毕竟，连这场革命本身都被称为“推特革命”。在《社交媒体、中介性与阿拉伯革命》一文中，英国学者米丽娅姆·奥拉格（Miriya Arouagh）对阿拉伯革命中社交技术的角色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如果说普雷针对卡斯特捍卫了剥削的概念，那么可以说，奥拉格针对“推特革命”的话语，重申了网络时代帝国主义概念的相关性。在她看来，把阿拉伯人民自己的革命看成是西方技术带来的，这一假设本身遮蔽了革命过程的复杂性和线上/线下传播的多面性，是一种带有浓厚的东方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是“信息通信技术帝国主义”的表达。

（三）走向政治经济研究和文化分析的辩证融合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念的区分及其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辩论的核心问题。由于其同时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重性，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与传播领域，可以说是位于核心的核心。在这个时代，商品化在传播领域的深化使得传播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重性质更加明显，这也使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旷日持久的分化有了新的、辩证融合的契机。在《马克思归来》中，许多学者都在理论和实证层面探索了这种融合的路径。理论探讨方面，赫布尔怀特（William Hebblewhite）在《“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新论》中，对互联网同时作为传播和生产工具进行了分析，并创新了“生产—传播”（promunication）这一复合概念；乔治·佩雷斯（George Pleios）在《传播与符号资本主义：信息社会下的马克思传播理论再思考》一文中，以资本积累方式的演变历史为经，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角度讨论了符号资本主义是如何消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生产与传播之间界限的；布莱斯·尼克松（Brice Nixon）的《辩证法与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一文，则讨论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之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

重要意义，认为辩证法不但是使政治经济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相结合的方法，也是历史的、革命的和“唯一可以避免思想与现实脱离的方法”^①。

与以上这些偏重于理论阐释和文献综述的文章相比，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几位资深学者，则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扎实研究，展示了走政治经济分析与文化研究融合路径所能带来的深刻洞见。在《论今日资本主义之“酷”》一文中，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吉姆·麦圭根（Jim McGuigan）以明确的问题意识，首先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了原先作为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术“一体两面”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是如何产生分歧，并在1980年代分道扬镳。麦圭根把分离的迹象追溯到“英国文化研究”传统的主要奠基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那里，指出威廉斯早在1950年代就不满于当时对英国文化的一些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进而，麦圭根把霍尔（Stuart Hall）定位为导向分离的关键学者。^②当然，正如麦圭根所指出的那样，是“英国文化研究”到澳大利亚，尤其是美国的“理论旅行”，使这一研究取向最终走向碎片化，从而实际上已经没有一个“主流”可言。这其中的一些研究，不但完全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而且表现出了“文化民粹主义”的倾向，以其对消费的过度关注和对消费者能动性的过高估量而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合流。

需要指出的是，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英美学者对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有了深刻的认识，出现了以米勒（Toby Miller）、斯崔特（Tom Streeter），以及麦圭根

①〔瑞典〕福克斯、〔加〕莫斯科：《马克思归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06页。（本书正文第784页）

②〔瑞典〕福克斯、〔加〕莫斯科：《马克思归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59页。（本书正文第721页）

本人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他们努力恢复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并有意地吸收政治经济批判的精髓。随着从“英国文化研究”滑向美国式的“文化民粹主义”的标志性人物费斯克（John Fiske）在学界的销声匿迹，也随着媒体和传播产业大规模的政治经济转型给学界带来的“现实效果”的冲击愈加明显，麦圭根在文章中所倡导的结合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优势的“多维分析”取向，已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和努力方向。当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对文化研究的回应和对经济化约主义的警觉，也是促使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走向建设性的辩证融合，从而重新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有机的-体两面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就国际传播和文化研究层面而言，文化研究者对政治经济学者对其批判的反批判，并没有做出有力的回应。这方面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文化研究学者并没有对赫伯特·席勒 1991 年那篇著名的《“后帝国主义”时代尚未到来》^① 的反批评文章做出回应。正是在这篇文章中，席勒就非西方国家生产的媒体（如巴西电视剧）算不算挑战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逆向流动”；如何理解“活跃”受众对霸权话语的“抵抗”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回击了一些文化研究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在上文提及的奥拉格对“推特革命”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听到了《“后帝国主义”时代尚未到来》中的论点在网络时代的回音。在麦圭根对“酷的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和他对包括苹果产品在内的“酷”的多功能移动电子产品的全球生产和消费链的分析中，我们也能听到同样的回音。

与佩雷斯有关生产和消费领域在“符号资本主义”语境下如何融为一体的理论探索形成互文，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苏斯曼

^①Herbert Schiller, *Not Yet the Post - Imperialist Er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8), 1991.

(Gerald Sussman) 的《作为意识形态和生产交换的系统性宣传》一文，分析了意识形态宣传在当代美国资本主义“营销经济”中无所不在的存在，由此展示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高度融合，以及消费者和生产者角色的交织。在苏斯曼看来，无所不在的“营销经济”兜售的不只是普通的消费品和服务，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此过程中，狭义的营销扩张成“系统性宣传”，使整个社会成为“宣传社会”。令人回味的是，“宣传”这个源于上个世纪的战争宣传的词汇，开始并没有贬义。但是，在美国“冷战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宣传”最终与美国本国的传播现象脱钩，只用来描述社会主义国家的传播，成了贬义词。如今，这个已经被赋予贬义的词汇，又被美国批判学者用来描述美国自己的传播体系^①。总之，由于意识形态涉及人心背向，而“资本从来就是追求权力与控制能力的极大化，因此尚未完全掌控的意识形态领域遂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最后战场”。^②

毫无疑问，在这场维护和挑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战争中，国家的角色至关重要，而这也是在网络化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核心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思归来》有两篇颇有分量的文章。由于它们均关注拉美，而且一个是旨在通过传播政策和意识形态调节维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阿根廷，另一个是旨在通过传播政策和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转型的国家委内瑞拉，因此，这两篇文章形成了富有对话性的互文关系。

在分析阿根廷自 1970 年代以来媒体政策演变时，阿根廷学者帕

^①更早用这一概念批判美国传播制度的是 Edward S. Herman and Norm Chomsky，但是这两位作者在 *Manufacturing Consent* 一书中的“宣传模式”用法与苏斯曼的用法有区别。

^②[瑞典] 福克斯、[加] 莫斯科：《马克思归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645 页。（本书正文第 836 页）

巴罗·卡斯塔尼奥（Pablo Castango）把该国从法西斯主义控制到民主化转型，再到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媒体政策，置于阿根廷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政治策略变化，以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周期性变动脉络中考察，从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避免媒体中心主义的视角和超越了“国家对市场”、“民主对专制”等机械的、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与此同时，作者又把阿根廷国内的政治经济变革与阿根廷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放在一起考量，在分析中突出了阿根廷的统治精英是如何通过政策变动，以及用不同统治方式来调和阶级矛盾和克服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危机，从而在一个充满冲突和不稳定的过程中，推进阿根廷的政治经济作为跨国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的再生产。

与阿根廷案例研究中所展示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再生产中的结构性角色相反，在《21世纪社会主义：打造国家，推进革命》一文中，美国学者李·亚茨（Lee Arts）以极大的热情和详实的实地研究，分析了委内瑞拉在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传播领域惊心动魄的斗争，以及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的积极角色。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通过议会民主向社会主义转型的案例非常少见，亚茨的研究在世界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中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亚茨这篇文章基于他的专著，也是唯一通过观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尤其是国家决定性的积极政策，探讨在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如何建设民主的、参与的传播体系，以及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案例研究。从建立旨在挑战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区域性公共电视——南方电视，到培育社区媒体，让劳动阶级与原住民以主人的姿态参与社区和文化建设，把自己锻造成一定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主体，再到抵抗西方媒体指控其压制新闻自由的负面宣传，通过立法和规制管制那些资产阶级寡头垄断媒体——这些媒体曾在2002年的政变中不惜赤膊上阵、企图推翻查韦斯政府，可以说，查韦斯政权在资本主义体系内

建设社会主义传播体系的经验和教训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这项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比较性历史背景，那就是马特拉在《传播与阶级斗争》中有所涉及的智利案例。1970年代初，智利民选的社会主义阿连德政权被推翻，马特拉从文化方面分析了其原因。与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一样，阿连德领导下的智利，虽然政府是社会主义的，但是整个国家依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媒体更是在寡头垄断者控制之下。因此，正如赫伯特·席勒和达拉斯·斯迈思所观察的那样，阿连德建立另类传播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空间非常有限。^①在委内瑞拉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努力中，查韦斯多少汲取了阿连德政权的教训，在社会主义传播体系的建立和文化领导权建设上下了大力气。当然，随着查韦斯和卡斯特罗的相继去世，随着拉美“粉色革命”潮流的消退和右翼的反扑，整个拉美在传播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复杂。在这场持续的斗争中，国家在国内外和区域传播中的角色都非常重要。卡斯塔尼奥和亚茨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丰富的例证，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则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理论框架。

（四）传播政治经济学内部的承传与创新：“受众商品论2.0”和“自主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毫无疑问，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是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主力军。由马克思的《资本论》到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再到“自主马克思主义”的“非物质劳动”、“一般智力”、“社会工厂”概念是许多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学术创新路径。在《马克思回来》的许多文章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一脉络。

1978年至1980年代初，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分野在

^①Herbert Schiller and Dallas Smythe, *Chile: An end to cultural colonialism*, *Society*, March 1972.

传播政治经济学内部的一个折射，发生过著名的“盲点争论”。这一争论由达拉斯·斯迈思发起。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只关注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但是没有关注媒体尤其是广告资助的媒体，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所扮演的经济角色，也就是媒体资本家在把受众当商品卖给广告商，让受众成为消费者，从而让资本实现剩余价值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斯迈思看来，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及其唯心主义取向的表现，而他要发展的，是唯物主义的传播理论。也就是说，如果说以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者对现有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分析中的经济简约倾向早就颇有微词的话，那么，斯迈思则干脆把经济简约主义进行到底：在“受众商品论”中，被卖掉的主要不是媒介的产品和文本，而是受众，受众在看电视的时候，也在劳动，创造剩余价值。1986年，斯迈思在西蒙·弗雷泽大学的两位同事出版了一篇有关受众的意识是如何被价值化的重要文章。^①自那以后，这一争论就基本结束了^②。

与此同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出现了源于意大利、受其北部工人运动理念和组织形式（也即“自主”理念）影响的“自主马克思主义”（Autonomous Marxism）流派。针对资本主义从福特主义到弹性积累、从工业资本主义到信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后果——传统白人男性产业工人作为潜在革命主体的弱化和消解，“自主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资本论》，尤其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重新解读，以及对“社会工厂”、“一般智力”、“非物质劳动”等概念的阐述，强调在理解新的抗争主体的形成过程中，工

^①Sut Jhally and Bill Livant, *Watching as Working: The Valorization of Audience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6 (3), 1986, p. p. 124-143.

^②有关总结见 Eileen Meehan, *Commodity Audience, Actual Audience: The Blindspot Debate*, in Janet Wasko, Vincent Mosco, and Manjunath Pendakur (eds.), *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Essays Honoring Dallas S. Smythe*, Norwood, NJ: Ablex, 1993, p. p. 378-397.

人之于资本的自主性和抗争性以及广义的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性。在北美传播学界，最早系统阐述“自主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它来分析信息时代的社会斗争主体和新形式，从而希望激活马克思思想中的革命性和政治性的学者是尼克·戴尔—威瑟福特（Nick Dyer-Witherford），他的著作《赛博马克思：高技术资本主义中的斗争周期和线路》（*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s in High Technology Capitalism*）在《马克思归来》中被广泛引用。在“自主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看来，信息资本主义的发展、广义的知识商品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作用的扩大，以及消费和生产界限的模糊，使整个社会变成了工厂——社会工厂；同时，剥削和社会抗争的场域也随之延伸到了整个社会。沿着这些学者开拓的思路，莫斯科在他的《马克思回来了！但是到底是哪个马克思？知识劳工抑或媒体实践？》一文中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不但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信息之于资本的重要性问题上，而且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后果是“为思考、创造以及提高科学、技术和艺术的整体水平提供了可用的时间。”^①基于“固定资产最重要的体现并非是生产流水线，而是‘人自身’，”“价值之源是信息、创造性工人”这样的认识，莫斯科得出了结论：“根本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认为理解知识工人、文化工人和创造性工人的劳动是理解资本主义未来的核心所在”。^②总之，在分析中，知识工人或“非物质劳工”（immaterial labor）被优先化了。

在强调广义的知识工人作为信息时代社会抗争主体优先性的同时，“自主马克思主义者”又把“社会工厂”的概念与斯迈思在大

①〔瑞典〕福克斯、〔加〕莫斯科：《马克思归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19页。（本书正文第1059页）

②〔瑞典〕福克斯、〔加〕莫斯科：《马克思归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19—822页。（本书正文第1059—1062页）

众传媒时代提出的“受众商品论”结合起来，演绎为“受众商品论 2.0”版本。在这里，大众媒体时代的“受众商品”变成了新媒体时代既是消费者又是内容生产者的生产消费者（prosumer）。“受众商品论 2.0”版本与一系列“自主马克思主义”概念想结合，成了《马克思归来》中近一半作者理解网络时代的资本剥削和社会抗争的理论资源。其中，斯洛文尼亚学者詹纳吉·浦若迪尼克（Jernej Prodrik）的《关于还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笔记：从受众商品到社会工厂》、英国学者安德烈亚斯·维特尔（Andreas Wittel）的《数字马克思：面向分布式传媒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以色列学者伊安·费舍尔（Eran Fisher）的《如何以更少的异化创造更多的剥削》是突出的代表。

然而，从作为“自主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版的《帝国》一书出版以来，围绕这一理论框架及其核心概念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马克思归来》出版以后，“盲点争论”也有了新发展。止于 1980 年代中期的“盲点争论”留下一个如何计算作为商品的“受众”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在本论文集集中，许多作者依然接受了“盲点争论”中关于受众创造了剩余价值的假定。然而，罗伯特·普雷在 2015 年答辩的博士论文中就提出，“受众商品论”中，电视观众看电视的时候创造了剩余价值这一说法，违背了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①普雷认为，在以广告为基础的商业媒体模式中，媒体资本家分到的，其实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租金的一部分。基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有关资本积累的过程是不断创造空间的过程这一洞见，普雷认为，媒体/网络资本家创造了媒体/网络空间，通过把这一空间出租给广告商，

^①Robert Prey, *Now Playing. You: Big Data and the Production of Music Streaming Space*, Ph. D. Dissertatio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urnaby, B. C. Canada, 2015.

以租金的形式得到了雇佣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普雷对“盲点争论”的最新推进，对理解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从基于《资本论》的马克思，到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再到主要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自主马克思主义”这一学术发展路径中可能存在的“盲点”，有重要的意义。更确切地说，普雷的最新研究，对理解“自主马克思主义”学术所隐含的知识地缘政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正是本文最后一部分关于此书之于中国意义的关键点之一：如果认为在休闲时间上网和玩手机的时候，人们都在创造剩余价值，那么，考虑到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劳动分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的富士康工人的“生产”和北美的消费者看手机时的“生产”，难道是可以等同的吗？他们受的剥削也是可以等同的吗？质疑“受众商品论”中受众生产剩余价值的观点，目的是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来源学说，从而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看电视、上网时的“劳动”在分析层面依然分开。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面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不平衡分布，这一区分有重要地缘政治和阶级政治的意义。

三、谁的马克思？《马克思归来》的局限与中国

正是以上的问题，使我在美国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者布洛维关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马克思，通过阐发这一传统，来解决当时的问题”^①这一以时间为维度的观察上，不得不补充一个以空间为维度的问题：马克思归来，但是具体在哪里落脚？与此同时，我希望把莫斯可提出的“到底是哪个马克思归来了？”的问题，转化为更广泛意义上的“谁的马克思归来了？”的问题。事实上，正如每个时代都

^①Burawoy: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p. 193。

有自己的马克思，每个地方也有自己的马克思。就《马克思归来》而言，书中归来的马克思，究竟是谁的马克思，或者说，操什么语言的马克思思想和事业的继承者？

不言而喻，基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尤其是当下的金融/网络资本主义的全球性，今天归来的马克思应该比当年的马克思本人更有全球性。本书的问题意识和许多具体分析，不管是基于欧美网络资本主义现状的研究，还是为数不多的有关拉美和中东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普遍意义，值得中国有志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学者借鉴。同时，从中国读者的角度，我们也要看到这部书的局限，从而寻找 21 世纪中国新闻传播学马克思主义化的路径，防止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内部再生产西方中心主义，甚至学术殖民主义。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洒满了鲜血；今天，在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任何教条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也意味着沉重的代价。

首先，虽然本文集的作者来自全世界，而且征文的方式也很广泛和公平，但是他们全部是学院学者，而没有《传播与阶级斗争》中所囊括的革命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通实践者，如同时作为革命家和理论家的毛泽东，再如 1975 年参与上海某工厂关于如何在计算机发展中体现群众路线圆桌讨论的工人^①。总之，这个归来的马克思是学院派的马克思，而且正如书中不少文章所展现的，还是一个颇有经院哲学色彩的马克思——德国学者彼得·鲁德斯的《马克思的“可替代性”概念之更新》一文，可以说是这种经院哲学倾向的集中表现。

其次，这是一个经过了冷战意识形态过滤的、去历史化的、西

^①Contributions From a Roundtable on Computer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75), Mattelart and Siegelau (eds.),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Vol 2, p. p. 284 - 285.

方中心主义的马克思。在本书中，没有涉及任何列宁主义思想和整个 20 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理论与实践；不仅如此，这些思想、理论与实践还被隐形地看成是发展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负资产。虽然本书有一篇对委内瑞拉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传播学研究，但是它没有任何对 20 世纪社会主义传播与文化实践历史的研究。同样，虽然学者们也对在网络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并以此作为让马克思归来的重要学术路径之一，但是，西方传播学中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形态没有被批判和清算——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新闻和传播学界的边缘地位，恰恰与基于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概念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对苏联和中国新闻传播制度的诋毁相关，或者是建立在这一学术意识形态工作之上。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对《报刊的四种理论》进行过清算的马克思。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两位主编在《导论》中套用伊格尔顿的《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不但显得无力和流于口号，而且对伊格尔顿的观点没有任何从新闻传播角度的演绎和深化。仍以彼得·鲁德斯的《马克思的“可替代性”概念之更新》为例，文中一方面展示了宏大的构建普世理论学术雄心，另一方面不但教条化地直言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满足一个无产阶级社会所应具有的前提和特征”，而且在其有限的讨论中国现状的文献中，赫然包括充满反共色彩的张戎夫妇的书。^①在这里，也从作者在中国和印度的农民问题上还停留在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片言只语中，我们仿佛听到了西方学者傲慢的声音：你们不配有马克思，你们不配革命。

再次，虽然这是一次英语学术界全球性征文的结果，但是我们

^①[瑞典]福克斯、[加]莫斯可：《马克思归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06页。（本书正文第1044页）

可以看到，真正来自非欧美国家甚或这些国家内部少数族裔的学者都非常少。这不仅仅是地理和人口上的代表性问题，而且是在视角上的缺失问题。因此，虽然书中有罗迪诺-科罗奇诺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文章，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从反帝国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女性主义角度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文章，也显得毫不为奇了。英国学者米丽娅姆·奥拉格那篇有关中东革命的文章，也因其前半部分大量抽象的理论讨论，失去了对中东革命提出更明晰、更全面的反帝国主义立场的传播学分析的机会。

第四，与上一点密切相关，即使就西方学院马克思主义而言，本书呈现的也基本上是网络时代的西方白人学者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他们对“自主马克思主义”的青睐，激活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分析，使它更具有政治性，并找到了新的可能的抗争主体；另一方面，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体制，他们对“知识劳工”作为抗争主体的片面强调，也隐含了有关民族国家、主权、主体性等问题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知识遗产。^①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以西方白人（男性）学者为主体的“自主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有可能在有意无意中把自己所代表的阶层当作网络时代的“革命先锋”和处于“霸权地位”的潜在革命主体。他们因“生产消费者”的出现而强调消费领域中的剥削和抗争，或者取消生产与消费界限的倾向，也可能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欧美消费主义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达。与此同时，与罗迪诺-科罗奇诺、李·亚茨、帕巴罗·卡斯塔尼奥、苏斯曼等学者不同（他们有着葛兰西主义倾向，关注国家、意识形态运作的复杂性和文化领导权斗争问题），“自主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基于后结构主义认识论的激进个人主义倾向，

^①有关这方面的批判，见赵月枝：《全球传播研究的新范式：多维历史性分析及去殖民化知识建构》，载于胡正荣等主编：《国际传播蓝皮书：中国国际传播发展报告（2014）》，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30页。

他们在意识形态斗争问题上的盲点，以及他们在主体性问题上对民族国家认同、阶级、种族、性别、区域等复杂关系交互性的忽视，很可能导致他们对西方社会知识劳工作为抗争主体的乐观，显得是那么的一厢情愿。

苏斯曼在自己文章的结论部分以“回不去了：即将瓦解的国家合法性？”为小标题，写道：“既然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交织，将消费者卷入生产过程的社会工厂生产形态也广为采用，”那么，资本家因为拥有资本而独占所有生产知识与劳动成果的“理所当然”的所有权概念，“也就显得越发可议了。”^①由此，他提出了建立于私有制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合法性会不会瓦解的问题，并进而指出：

当社会一般智力成为生产体系的基础，最适当的所有权形态就理当采取集体所有制，也就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有可能实施吗？在营销经济时代，没有比此刻更加清晰的显示劳动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产生了整个国家的财富，也更有合法性据此要求拥有政治权力。^②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苏斯曼对消灭私有制这一马克思主义终极目标的信息时代合理性的阐述。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像苏斯曼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最有国际视野的学者，也无意识地因忽视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和“阶级”这两个层面的复杂交互关系而陷入了方法论民族主义，忘记了今天美国“国家

①〔瑞典〕福克斯、〔加〕莫斯科：《马克思归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57页。（本书正文第851页）

②〔瑞典〕福克斯、〔加〕莫斯科：《马克思归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57页。（本书正文第852页）

财富”生产的全球性——从在中国世界工厂里的农民工到在美国本土的墨西哥非法移民，他们都在为美国信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劳动。

正如 2016 年美国大选所展示的那样，特朗普之所以能入主美国白宫，并有可能把美国引向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交媒体和白人蓝领工人阶级的结合。也就是说，被特朗普激活的政治主体不是“自主马克思主义”学者们青睐的美国硅谷知识劳工，而主要是美国内陆和乡村的白人蓝领劳工阶层。当我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那句著名的结论化用到信息时代时，却发现，与“全世界信息劳工团结起来”这一愿景相反，特朗普的竞选机器和极端商业化的新老媒体组成的传播体系，正是利用信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极端不平衡的发展所造成的阶级和族群分化、文化失衡制造了社会撕裂。要理解这期间复杂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美国内部就区域政治和文化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需要马克思、列宁、葛兰西、毛泽东等同时归来，而“自主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武器则显得力不从心。显然，研究全世界的信息劳工能否团结起来的问题，离不开研究分裂的欧美社会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的问题——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就能少一些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内部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多一些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地缘政治和文化政治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

与此同时，本书以拉美为主题的两篇文章聚焦的国家问题，以及需要更多讨论的帝国主义和地缘政治问题，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包括网络战争问题，以及已经是网络大国的中国国家的性质与中国在当下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的角色问题等，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而这，正是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在当

下所面临的“中国的挑战”，^①也正是中国传播学者在创新 21 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结语：让马克思主义回到网络时代的中国传播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在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新闻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达拉斯·斯迈思在 1971—1972 年间对中国社会主义传播和文化实践的考察和《传播与阶级斗争》所收录的相关文献也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传播理论和实践与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发展有历史性的对话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新闻理论方向的博士，是在通读马恩列斯文献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新闻传播学是受冷战意识形态影响最深的领域。19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内部意识形态和学术政治发展态势的内因，以及西方反共意识形态影响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国内在引进国外传播学的过程中，出现了忽视甚至排斥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一边倒地接受美国冷战传播学术的现象。中国传学发展史的叙述中，达拉斯·斯迈思在 1970 年代对中国的两次访问被历史“虚无”。1982 年，作为冷战意识形态斗士的韦伯·施拉姆访问中国，不仅以美国传播学之父的身份受到中国新闻学界的膜拜，而且得到一位时任副总理的接见；相比之下，赫伯特·席勒这位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者直到 2000 年去世也无缘访问中国大陆。一方面，深受冷战意识形态和各种“去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传播学与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①赵月枝：《中国的挑战：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刍议》，载于《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 年，总第 28 卷，第 151—179 页。

产生了强大的张力，并且以前者在学术话语中实际上的主导地位，边缘化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内部的教条化、僵化、知识断层、“马工程”的形式主义化及其对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现实缺乏解释力和批判力的问题，也使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陷入尴尬的境地。

新世纪以来，虽然西方批判传播学术也陆续被引进国内，一位位西方批判学者到中国开会、讲学，颇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但是，在这些学者的学术中，中国即使被论及，也是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和一个与美国有可能进行资本主义间竞争的国家出现的。几乎很少有西方学者会认真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宣称和中国传播实践的社会主义性质。当然，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复杂多变的传播实践，也并非易事。更为吊诡的是，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有学生因为选择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而在学术论文开题和评审中，不得不面对在实际上“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学者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敌意。对于一些接受《报刊的四种理论》基本理论框架，并且希望传播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能带来中国民主化的学者来说，如果还有一个马克思对中国有意义，这就是那位挑战普鲁士新闻审查制度的马克思，一位自由主义框架中的新闻自由斗士。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成果的“走出去”，更由于中外学术话语权力的不平衡关系，而无从谈起。

然而，2008年以来，正如西方学界已然出现了马克思归来热，在美国冷战传播学阴影下发展起来的中国传播学界，也在不断反思40年发展过程中和在试图解释与指导中国内外传播的实践中，认识到了续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重要的是，中国学者有了在国际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界做出应有贡献的可能性。

实际上，正是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与以美国为主导的信息资本主义的深度整合，使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和传播在其中的角色问题成了讨论信息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的两个重要领域。总之，进入网络时代后，在人类重新面临“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严峻选择的关键历史当口，中国传播学界具有担当起发展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和特殊条件。

翻译和出版《马克思归来》过程使我相信，中国传播学界让马克思和毛泽东归来的各方面正能量，正在积聚。老一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者中，还有对自己学术信仰的坚持者。来自海内外华人学术圈的本书的年轻译校者们，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和对所翻译文章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尝试，展示了他们对发展 21 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初步思考。在这两者之间，一些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正以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和宏大的国际主义视野，力图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在网络时代的中国大地上重新结合起来。这其中，毛泽东思想中的新闻传播学遗产和中国传播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意识形态领导权、传播技术与社会主义政治、传播产业内外的劳工分化和阶级意识形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批判以及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乡土文化与三农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妇女解放、占有性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可能性、生态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环境正义与传播、“‘后帝国主义’时代尚未到来”语境下的中国民族问题和国家主权与统一、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作为中国对外传播理念和战略指导等，都是关键而又急迫的研究议题。它们更是中国传播业界和学界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

有理由相信，《马克思归来》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重庆出版社的出版，能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在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化发展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

目 录

丛书总序	1
中文版简评	1

导论:马克思归来——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与当代传播学批判研究	1
--	---

第一篇 马克思,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

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工作:自由撰稿人与剥削	33
理解资本积累:马克思之原始积累理论在媒体与传播研究中的相关性	83
如何以更少的异化创造更多的剥削?——社交网站中的受众劳动	118
反商品化——大学、认知资本主义与新兴技术	148
“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新论	190
资本的传播:数字媒体与加速逻辑	215
传播与符号资本主义:信息社会下的马克思传播理论再思考	252
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	307
关于还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笔记:从受众商品到社会工厂	366
因特网和“无摩擦的资本主义”	429
数字马克思:面向分布式传媒的政治经济学	452

第二篇 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

批判转型中的马克思理论:阿根廷传媒民主化,新自由主义之后	503
失踪的马克思:马克思在当前传播研究中的位置及传播在马克思著作 中的位置	541
迈向马克思主义的网络研究	645

谁在那里说新自由主义?——批判“新自由主义”对于媒体与传播研究的 用途及其限制	692
论今日资本主义之“酷”	719
辩证法与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	748
作为意识形态的女权主义——萨拉·佩林的反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意识 形态批判	791
作为意识形态和生产交换的系统性宣传	832

第三篇 马克思与媒介使用

“工人调查表 2.0”: 社交媒介语境下生产性使用研究的民族志方法 ...	861
技术的牧领权力: 反思数字文化中的异化	903

第四篇 马克思, 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

社交媒体、中介性与阿拉伯革命	927
21 世纪社会主义: 打造国家, 推进革命	975
马克思的“可替代性”概念之更新	1018
马克思回来了! 但是到底是哪个马克思? 知识劳工抑或媒体实践?	1053
学术出版的封闭与异化: 学术工作者的训诫	1073
资本主义隐私权问题与替代性社交网站 Diaspora	1125
马克思的记者生涯: 重温言论自由的辩论	1170

附录

对“马克思归来”的再思考——第一期“传播驿站”工作坊综述	1204
------------------------------------	------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Christian Fuchs)^①

文森特·莫斯科 (Vincent Mosco)^②

导论：马克思归来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与当代传播学批判研究

张韵 (译), 高明 (校)

[导读]^③ 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当下，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回归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而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内部，具体的概念和理论层面之外，“马克思回来了”之于从事传播学批判研究的学者们而言又意义何在？本文对作为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基础批判研究方法重要性的强调，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回应。

作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方法，是将人类存在视为物质现

^①瑞典乌普萨拉大学 (Uppsala University) 信息与媒介系担任媒介与传播学教授。Triple 杂志编辑，著有 *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2008),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2011), *Social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即将出版) 等著作。

^②加拿大皇后大学 (Queen's University) 社会学名誉教授，曾任加拿大传播与社会研究首席研究员 (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以及皇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近期著作包括：*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with Catherine McKercher, 200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econd edition (2009), 以及 *Getting the Message: Communication Worke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edited with Ursula Huws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2010)。

^③本书中，凡“导读”均为译者撰写，凡“摘要”则属原文翻译而来。——编者注

实中的历史过程，并通过人类理性去生产关于人类存在的知识的途径。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发展，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核心。运用辩证推理去批判地理解文化和意识，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之间的关键节点。而通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于“意识”问题的处理，将推动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持续发展。同时，当我们满足于对“盲点之争”和“受众商品论”的局限认识之时，作者重新回归斯迈思（Dallas Smythe）的理论资源，将人类活动置于理解社会过程的中心，从而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未来的可能性进行探寻的做法，也颇具启发性。

正如本书此刻正在进行的这项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仍依赖于西方理论译介。在西方传播学批判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之间，研究者如果缺少对研究方法的自我意识，或许我们就应该警醒可能出现的“拿来主义”的倾向。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深入到理论和方法的内在逻辑之中，从中国本土的经验与问题出发，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去探究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以第三世界的经验贡献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关键词]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媒介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学批判研究，媒介批判研究，批判理论。

* “马克思（Karl Marx）又再次流行了”，负责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德国柏林迪茨（Dietz）出版社负责人舒特朗夫（Jorn Schutrumpf）这样表示。自2005年以来，马克思著作的销量在以前低迷的水平上翻了三番，特别是在夏天出现了飙升。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斯（Rowan Williams）上个月作出了一个恰当的评价：“马克思很早以前

就观察到，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通过把现实、权力和能动者归于无生命来使自己神话化。”甚至连宗教领袖也开始赞扬这位资深的无神论者具有“卓越的分析能力”（*The Times*, Financial crisis gives added capital to Marx's writings, October 20, 2008）。

* 现在没有人会声称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但是我仍然认为这个老男孩值得颂扬。因为他注意到“这是经济，傻瓜！”，那些看上去无所不知的、占领了经济制高点的伟大人物们当然不愚蠢，他们被剥削的贪婪驱动着，威胁着我们所有人。马克思的作品也不是圣经，尽管他的一些信徒努力把他说成这样（*The Evening Standard*, Was Marx Right All Along? March 30, 2009）。

* 马克思回来了。至少德国的出版商们和书店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马克思的书正在飞离货架（*The Guardian*, Booklovers Turn to Karl Marx as Financial Crisis Bites in Germany, October 15, 2008）。

* 如果想要理解接二连三的金融恐慌、抗议浪潮和困扰世界的其他问题，政策制定者们应该好好去研究已故多年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的著作。他们必须尽早认识到我们正在面临一场百年一遇的资本主义危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装备起来去寻找出路（*Bloomberg Business Week*, Give Karl Marx a Chance to Save the World Economy. August 28, 2011）。

* 2009年2月2日的《时代》（*The Times*）杂志以马克思为封面，并且问道：关于现今的金融危机，“马克思会怎么想”？在封面故事里，马克思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救世主，他的思想也因而被肢解得面目全非：“我们需要反思马

克思。若想寻求资本主义的解救之道，那就要去研究这个体系最伟大的批评者。”（*Time Magazine Europe* 2009）

这些媒体评论无不表明，伴随着新一轮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我们似乎也进入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时代。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阶级冲突和危机的不断爆发，马克思的著作才会引起如此热烈的关注。与此同时，资产阶级（bourgeois）报刊企图通过将马克思诠释为资本主义新的救世主来限制和扼制他的理论。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资本主义分析者，同时也是在其所处的时代里对资本主义最强硬的批评者：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Marx and Engels 1848/2004, 94）^①

1977年，斯迈思（Smythe 1977）发表了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文章中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对传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给予足够重视。35年过去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兴起使学者们不再关注社会阶级与资本主义，相反，人们热衷于谈论全球化（globalization）、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随着共产主义的衰落，甚至断言了历

^①本书此种形式的标注为英文原著所有，以下同。——编者注

史的终结 (end of history)。^① 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成为了所有社会科学的盲点。马克思主义学者被边缘化，而采用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方法的青年学者们则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危及职业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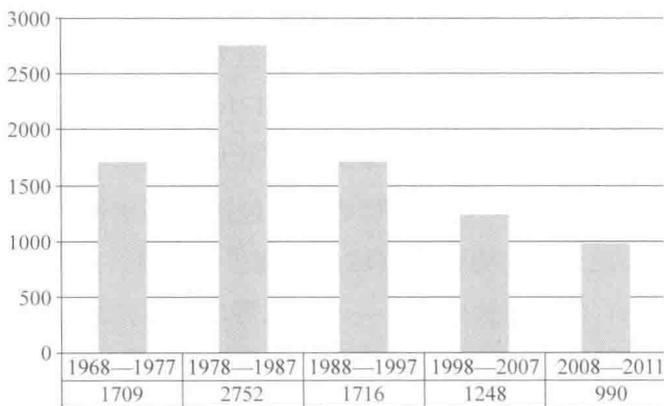


图1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SCI) 中收录的关于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图1展示了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里，标题中含有关键词“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者/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的数量，直观地展现了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兴趣的下降趋势。搜取的文章皆发表于以下五个时期：1968至1977年，1978至1987年，1988至1997年，1998至2007年，2008至2011年。这些时期的选择与划分，有助于判断自2008年资本主义危机发生以来是否有新的变化产生，正如1968年社会大动荡^②标志了

①“历史终结论”最早源于日裔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在1988年所作的一次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讲座。1989年夏，他在讲座的基础上写成论文《历史的终结》，刊发于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上。该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译者注

②此处指1968年欧洲出现经济危机并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从巴黎“五月风暴”到布拉格、华沙、伦敦等地，激进抗议浪潮席卷全球，欧洲从东到西都陷入动荡。——译者注

学术的转向。

图 1 显示，1978 至 1987 年关于马克思的学术产出相对较多，共有 2752 篇文章发表。鉴于文章发表的数量总是历史性地逐渐增多的，1988 至 1997 年有关马克思的文章数量也显示了对其较高的学术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学术产出在 1988 至 1997 年和 1998 至 2007 年两个阶段出现了明显的紧缩，分别只有 1716 篇和 1248 篇文章发表，鉴于前一个时期的增长，这一紧缩表现得尤为显著。而这一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强化的阶段，一切事物（包括许多国家的公共服务传播）都被商品化，社会科学领域则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和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强烈偏向。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在 2008 至 2011 年期间，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的年平均发表数为 247.5 篇，相对于 1998 至 2007 年的每年 125 篇和 1988 至 1997 年的每年 172 篇有所增加。这种状况可以作为一个经验性的指标，表明新资本主义危机的情境下社会科学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新的兴趣。问题在于这种兴趣是否以及如何能够持续，并体现在制度变革中。

由于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劳动的普遍不稳定，和全球新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新自由主义不再被视为共识（common sense）。全世界都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及其导致的不断升级的阶级冲突。尽管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指出，从未有一个思想家如同马克思一样被曲解，对于马克思的作品的偏见往往都背离了他的思想的核心。^①然而自 2008 年资本主义危机开始以来，情况发生了改观。一种对于马克思著作的浓厚学术兴趣正在扎根。齐泽克（Žižek 2010）也进一步指出，近期的世界经济危机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研究的新兴趣。

共产主义（communism）不是存在于遥远未来的境况，它存在

^①Terry Eagleton, *Why Marx Was Right*, London, 2011.

于对可替代选择（alternatives）的希冀中，体现在人们与资源、所有权、财富、知识、食物、住房、社会保障、自主决定、平等、参与、表达、健康、准入权（access）等各种贫困类型（poverty）的斗争之中。正是以多数人为代价换取少数人利益的全球分化体系造成了这些类型的贫困（system of global stratification）。因此，共产主义存在于人们抵制资本主义、争取自主空间的每一处。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Marx and Engels 1844, 57）。这是一场无产者的革命，它的发动者是那些没有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自然、自我、身体、意识、知识与科技的人们。共产主义需要空间来实现自己成为一种运动。这些空间不是指脸书（Facebook）、Youtube 或者推特（Twitter），而是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宪法广场（Syntagma Square）、太阳门广场（Puerta del Sol）、加泰罗尼亚广场（Plaça Catalunya）和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这些当代斗争所处的语境是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殖民化。一个新的世界的出现是必要的，但是能否创造出新世界仍不确定，只能取决于斗争的结果。

资本主义危机和由此产生的针对一切贫困的斗争正是本专题所立足的语境。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致力于探讨马克思对当代资本主义中的传播与知识的分析具有现实的相关性。

麦克切斯尼曾准确地指出，传播学者研究马克思的时候，“没有系统地研读马克思，没能在其对于传播的各种表述中厘清传播这一概念”（McChesney 2007, 235f, fn 35）。他也指出，鉴于传播的重要性，他可以想象马克思对此有话要说。本书的任务就是力图弥补一直以来对马克思的传播与媒介理论系统研读工作的欠缺。

本书中的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著作作为本，涉及多样的主题，明确地反驳了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观点。他曾声称，

对于文化和媒介“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已经几乎不能被拯救了，也不能被一般化了”。同样错误的还有他坚持认为“生产理论（与生产力发展相关的矛盾的辩证运动）与它的对象——物质生产——具有严格的同构性，不具有可转变性，成为了某些内容的前提或者理论框架，而这些内容从来没有被首先给出”（Baudrillard 1981, 214）。麦克卢汉^①（McLuhan 1964/2001, 41）也曾宣称的，马克思及其继承者们“不理解新传播媒介的活力”，这一观点同样也是错误的。TripleC's 杂志特刊《马克思归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与当代传播学批判研究》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代传播学批判研究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意图批判地进行传播学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运用到社会变革中，马克思为我们奠定了重要的基石。此外，这些文论坚信，批判地研究传播学离不开对资本主义、阶级和剥削的深入分析与批评，并最终需要在实际的斗争中去争取解放。

本书在征稿启事中曾提出以下问题：

（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媒介与传播学研究？它之于当代的意义何在？马克思主义媒介与传播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假设、经验与遗留问题、任务、方法和类别是什么，它们与马克思的理论又有何关联？有哪些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媒介/传播学研究，它们有何不同点，又有何相同点？

（2）在媒介与传播研究的不同领域、分支和路径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扮演了什么角色？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历史上具有什么作用、地位和重要性，特别是在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时期？

（3）除了作为一位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马克思还始终坚持着进行记者的工作。他的新闻实践在新闻理论、新闻教育和可替代媒

^①此类字体另体的情况在原著中为作者加重以示强调，以下同。——编者注

体 (alternative media) 等方面带来何种启示?

(4) 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 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媒介与传播研究并在大学中进行传授, 面临着哪些结构性条件、限制和问题? 新资本主义危机给这些条件带来哪些实际及潜在的影响?

(5) 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 马克思主义的思考, 同分析媒介与传播的社会角色之间, 存在什么关联?

(6) 如何才能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理论, 如阶级 (class)、阶级斗争 (class struggle)、剩余价值 (surplus value)、剥削、商品/商品化 (commodity/commodification)、异化 (alienation)、全球化、劳动力、资本主义 (capitalism)、军国主义与战争 (militarism and war)、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评 (ideology/ideology critique)、拜物教 (fetishism) 和共产主义, 对当代资本主义中的媒介角色、知识生产和传播进行分析、重构和批评?

(7) 马克思的著作是如何阐述媒介、传播与信息的?

(8) 现有的对于马克思是如何分析媒介、传播、知识、知识劳工和科技的诸多诠释路径, 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9) 辩证哲学和辩证分析作为认识论的 (epistemological) 和方法论的 (methodological) 工具, 在马克思主义媒介与传播研究中扮演什么角色?

(10) 马克思对媒介、传播、信息、知识生产和文化做出的核心假设是什么, 这些观点可以怎样运用于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之中?

(11) 马克思的著作与理解社会媒体有何相关性?

(12) 马克思的哪一部著作最适用于当今媒介与传播的理论创建? 原因与方法为何?

(13) 特里·伊格尔顿 (Eagleton 2011) 认为关于马克思的十个最普遍的偏见都是错误的。当代媒介与传播研究对马克思抱有

偏见？这些偏见造成了哪些后果？如何驳斥这些偏见？新资本主义危机影响下，对于马克思的偏见有哪些延续或者中断？

莫斯科（Vicnet Mosco）认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理论的任务在于：“阐明传播与文化如何成为物质实践，劳动与语言如何相互构建，以及传播与信息如何成为社会活动和社会意义建构的辩证实例。将这一任务放置于理解权力与反抗的大框架内，才能将传播直接融入至今仍具有活力和实质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Mosco 2009，44）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将传播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看待，“强调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包括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分析，对商品化与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分析，对社会阶级分化与抗争的分析和对矛盾与对反动运动的分析等”（Mosco 2009，94）。马克思主义媒介与传播研究不仅在当代具有现实的关联性，而是一直以来都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传播总是被嵌入在阶级社会的不平等结构中的。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也遭受了挫折：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被边缘化与歧视成了常事（详见本书第二篇中 Irfan Erdogan 撰文），马克思主义也常常被后现代主义所取代。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总是有现实性的，但是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又总是面临很大的困难，其中部分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缺乏稳固的制度基础。今天，我们能看到对于马克思著作的关注正在持续升温。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可能将它引导为制度变革，挑战当前支配性媒介机构的行政性质，以推进传播学批判研究的制度化进程。

我们可以从如下方面总结马克思著作中有关媒介生产、使用和效果的内容（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媒介传播的详细讨论和理论模型阐释，请参见 Fuchs 2010；2011）。

在商品生产（commodity production）中：

- 具体：媒介技术在媒介产业中的技术合理化
- 具体：媒介领域的资本积累（concentration）与集中（centralization）过程
- 具体：媒介资本的生产，知识工作者作为媒介公司雇佣劳动力
- 一般：传播技术在时间与空间上对生产进行协调，减少不变资本（constant capital）和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的份额（shares）
- 一般：传播技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空间扩张的实现途径

在商品流通（commodity circulation）中：

- 具体：传输（transmission）技术作为手段实现媒介基础设施建设（infrastructure）资本的积累
- 具体：媒介作为广告的载体
- 一般：传播技术作为手段减少资本流通（circulation）与周转（turnover）时间
- 一般：媒介作为世界贸易全球化的手段与结果
- 一般：媒介作为资本空间集中的手段

在观念的交流（circulation）与接收（reception）中：

- 媒体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和传布者（circulators）

在非主流媒介（alternative media）的生产、流通和接收中：

- 被另种方式（alternatively）生产、分配、解释的可替代媒介作为阶级斗争的方式和批判观点传播的方式

表 1 对媒介在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理论中作用的系统阐述

流通 (Circulation)	生产 (Production)	流通 (Circulation)	消费 (Consumption)
M-C (Mp, L)	……P……	C'-M'	
	媒介技术作为合理化手段: $s/v \uparrow$		
	媒介领域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过程		
知识工作者作为媒介公司雇佣劳动力			
媒介作为跨组织的公司传播与协调方式: $v \downarrow, c \downarrow$			
服务于空间分配 (spatial distribution) 和资本扩张的媒介			
		媒介作为广告的载体	
		作为资本形式的传输媒介	
		媒介与贸易全球化	
		媒介与资本的空间集中化	
		媒介作为意识形态载体与传输渠道 (diffusion channels)	
可替代媒体作为媒介生产、流通与消费中的否定力量 (negating forces)			

图 2^① 中的模型总结了媒介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 也即, 媒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四种角色:

- (1) 媒介的商品形式
- (2) 媒介的意识形态形式
- (3) 媒介接收
- (4) 可替代媒体

^①按照文本顺序, 此处应为图 2, 原文或误作为图 1, 以下同。——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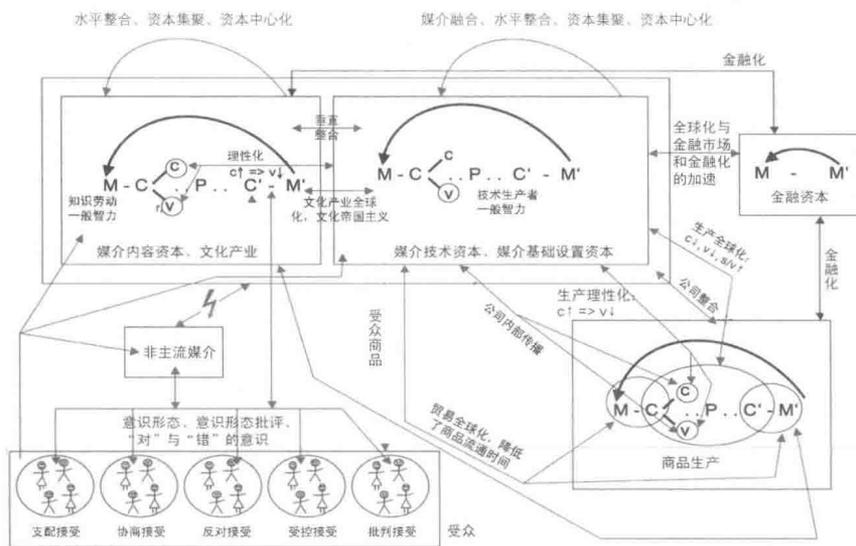


图2 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媒介生产、流通与消费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模型展示的是媒介在经济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的角色，不涉及媒介与政治体系，如国家、市民社会、法律等方面，以及与文化体制，如教育、家庭、宗教等层面的联系。媒介中的资本积累既发生在媒介的内容领域（content sphere），又发生在媒介的基础设施领域（infrastructure sphere），二者共同形成了媒介资本的范围。这两个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循环理论中有所显现，表明它们是面向资本积累的。

商品理论假说在图2中直观地表现为如下过程：垂直与水平整合（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gration），媒介集中化（media concentration），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媒介全球化，媒介资本与其他资本整合，生产的合理化，生产、流通与贸易的全球化，公司内部传播（intra-company communication），广告与市场营销。媒介内容生产和媒介技术生产显示为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同属于媒介产业，但创造的产品不同。垂直整合的过程使二者的界限模糊化；而媒介

集中化过程和水平整合过程，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在特征，分别塑造了这两个领域；媒介融合则是媒介基础设施资本的特有特征。这两个领域一起构成了影响文化工业全球化的因素。图2右下角展示的经济领域显示了非媒介产业与服务业中的资本积累，它在企业整合过程中部分地与媒介行业相整合。在整合过程中，媒介技术同时促进了非媒介领域和媒介内容产业的生产合理化过程，得以使它们进一步推动生产、流通和贸易的全球化；反向而言，全球化过程又促进了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新媒介技术也被使用于公司内部传播。合理化、全球化和公司内部传播的目的在于利润最大化，主要手段是减少投资的资本消耗，包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投入，和促进相关剩余价值生产，即以更少的时间获得更多的产出。图2还显示，媒介内容产业对于商品在流通过程中的广告推广与市场营销至关重要，这同时也是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资本实现过程。

意识形态理论假说在图2中在媒介内容资本及其与受众的关系中表现出来。产生虚假意识的媒介内容被视为意识形态的内容，媒介内容则依赖于受众。正如图2左下部分对于接受理论假说的展示，接收是意识形态实现再生产和面临潜在挑战的领域。

可替代媒介是一种对现有资本主义媒介产业提出挑战的领域。可替代媒介的组织与生产方式在图2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中示意出来，可替代媒介另辟途径，以别种方式组织并生产媒介，目的是创造批判性的内容来挑战资本主义。媒介内容是依赖于接收的。五种具体的接收形式可见于图2的左下部分。接收是意识形态实现再生产和面临潜在挑战的领域。斯迈思（Smythe 1977）在论述受众商品论的文章中指出，在媒介内容资本的部分类型中，资本积累是通过将受众作为商品贩卖给广告商来实现的，其定价取决于媒介内容受众的人口学特征（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因为广告收益并不是媒介资本的主要因素，受众商品在图2中用一条点状线来强调。

近来，接收者逐渐变为可生产内容和技术的积极受众，但这并不是媒介民主化的体现，而更多的是剥削受众与使用者的新的方式。

媒介与媒介技术的使用价值首要在于提供信息、促成传播（enable communication）和推进文化创新的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价值被产品的交换价值所支配（dominated），成为商品。当媒介采用商品形式，其使用价值只有通过消费者的交换实现，这便积累了资本家手里的资金。媒介与技术作为具体的产品，代表了信息与传播的使用价值，而媒介的货币价格代表了信息与传播的交换价值。商品理论假说强调媒介的交换价值。意识形态理论假说则展示了媒体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支配如何创造了媒体在合法化与再生产中的控制角色。这两个理论假说通过媒介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相互对立的双重角色相关联。作为商品的媒介与货币的使用价值有关，后者可以实现前者的交换价值，也即以价格的货币形式实现。货币是作为交换价值与媒介产生关联的。它在媒介商品中实现其交换价值，即一般等价物的交换。消费者对媒介和技术的使用价值感兴趣，而资本家对能帮助他们实现货币资本积累的交换价值感兴趣。只有当资本家把其掌控的商品通过复杂过程与货币进行交换时，消费者才能得到媒介与技术的使用价值。这意味着，媒介与技术的使用价值只有通过与货币有关系的交换价值才能实现。商品化过程构成媒介与技术 in 资本主义中的基础。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媒介与技术 in 资本主义社会“对立的两极”（MEW 13, 72）。^① 媒介与技术到达消费者时，它们是以商品形式呈现的并因此可能带有意识形态特征。可替代媒介领域挑战了媒介的商品特性，其目的在于一场逆转：通过扬弃交换价值使媒介与技术的使用价值成为主导特性。可替代的接收过程超越了媒介的意识形态特征，接收者获得了质疑其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

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商品化特征的权力。

显示在图2中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媒介的分析可以被总结为四个主要维度。特刊中的文章也是按照媒介在资本主义中的角色分类来组织的。

(1) 媒介与商品

资本积累，媒介技术产业，媒介内容产业/文化产业，数字媒介产业，媒介与金融化，媒介与全球化，受众商品化，媒介集中，媒介整合等。

(2) 媒介与意识形态

媒介操控，媒介宣传过滤，广告，公关，商品市场营销，文化帝国主义等。

(3) 媒介接收与使用

意识形态接收，批判接收，批判的媒介使用等。

(4) 可替代媒介

可替代媒介的生产空间，可替代的公共空间，媒介与社会反抗等。

此次发表与提交的论文关注的议题主要集中在媒介与商品化、媒介与意识形态和可替代媒介领域，媒介接收研究并没有较多地呈现。这意味着，对现在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媒介与传播学者来说，类似于受众对媒介内容的解读这类问题，例如电视真人秀（reality TV）、流行音乐、肥皂剧、体育、电影、问答节目或电脑游戏等，不具有太强的重要性；相比之下，这些议题更具重要性：对网络免费劳工的剥削、研究与教育的商品化、网络意识形态、发生于多国的关于媒体角色的社会抗争，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在媒介与传播研究中的边缘化与被歧视状态，资本主义危机与媒介，传播劳工，新闻批评，社会主义开放出版，或可替代社交网站。^① 这种现状说明了三：

(1) 在现有资本主义危机和不平等扩大的情况下，政治经济议

^①此处仅列举了专题所涉及的一部分议题。

题，阶级斗争事务，可替代媒介的角色等问题显然更为重要。相对而言，文化研究议题（比如粉丝文化）则很容易被资本主义利益所俘获，不讨论紧迫的现实问题，例如不安定的生活条件和世界不平等等问题等。

(2) 传统的受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被转变为中介劳动（mediated play labour）和媒介生产—销售（media prosumption）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这一领域，对生产、消费和广告的研究被融合起来。正如特刊所显现的，马克思主义媒介与传播研究欢迎这种融合，相关的议题也已成为该研究取向的重要主题。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指责马克思主义媒介与传播研究没有特别关注接收与媒介消费的那种传统批评站不住脚了，因为，随着消费的增长变得更具生产性，这一问题发展到了新的高度。随着网络生产消费的崛起，对始于广播领域的受众商品化研究而言，其相关分析也进入了新的维度。

(3) 对于马克思及其阶级与资本主义批判来说，当前最为紧迫的议程就是解读和改造现代社会和现代媒介。此次发表的论文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与深入，这些学者们显然没有追随那股或批评或忽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潮流，而是坚守在批判政治经济学和批判理论的学术阵地上。

本书的28篇论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现实意义，他帮助我们把握自己生活的世界，激励可以并且应该进行的斗争以及揭示媒介在资本主义中、在斗争中、在创造可替代范式中的作用。令人鼓舞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马克思的著作运用到媒介与传播研究中。事实上，马克思始终都具有其现实性，只是这种现实性在今天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并没有被充分重视。马克思总是被曲解与误解，部分原因也是出于对他著作的误读或是忽视。伊格尔顿（Eagleton 2011）曾经总结了十个针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常见偏见，并分析了马克思正确的原因以及这些偏见为什么有误。此次，

我们在每一种偏见中引入了媒介与传播研究的维度。本书中的论文论证了这些偏见的错误性，并且说明了当下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概念运用到媒介与传播研究中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作为研究成果的总结，我们针对每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做出了反驳，这些反驳以专题中的研究分析为基础，显示了马克思对批判地理解社会与媒介的重要意义。

1 马克思主义过时了！（Outdatedness）

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不适用于后工业社会。

反驳 马克思主义有时事性！（Topicality）

为了恰当地和批判地理解现代社会中的传播，我们需要马克思。

2 马克思主义有压迫性！（Repression）

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也许还有些道理，不过一旦将其付诸实践，结果往往是无法想象的恐怖、暴政和屠杀。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媒介的合理性都是虚无缥缈的。

反驳 资本主义才有压迫性！

鉴于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不平等、全球战争和环境破坏，资本主义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看上去都不太理想。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媒介的可行性从资本主义危机中诞生。

3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Determinism）

马克思相信历史的必然规律，认为资本主义的必然终结也会导致资本主义媒介的结束。

反驳 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和复杂的！（Dialectics and Complexity）

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辩证法让我们理解了社会与媒介的历史，让我们看到社会与媒介是如何被结构条件、持续开放的斗争，以及结构和能动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所塑造的。

4 马克思主义是不切实际的改良主义！（Do-Goodism）

马克思对人性的善良抱有天真的幻想，忽视了人天性的自私、贪婪、野心和好斗。因此媒介必然以利益和竞争为基础，否则无法维持。

反驳 资本主义是邪恶的！（Wickedness）

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利益最大化和竞争在新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得以运行，正是这种逻辑改造了媒介景观使其变得愈加不公平。

5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还原论！（Reductionism）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将所有文化与政治现象都归结于经济，他们不理解媒介与传播的非经济层面。

反驳 马克思主义具有复杂性！

现代的发展显示，经济在资本主义中并不具有决定性，但是经济系统导致了一个局面，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有现象，包括所有媒介现象都具有阶级的面向，与阶级辩证相关。在解释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之时，阶级虽然并不是一个充分的概念，但却是一个必要的概念。

6 马克思主义反人道主义！（Anti-Humanism）

马克思对于宗教和道德问题毫无兴趣也毫不在意，他为斯大林（Stalin）等人铺平了反人道主义的道路，马克思没有为媒介道德问题提供任何基础。

反驳 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

马克思是深刻的人道主义者。对他来说，共产主义正是人道主义实践，而阶级斗争则是他的道德实践。他的理论具有深刻的道德性和规范性，媒介传播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就必然包括了对媒介的道德批判。

7 阶级理论过时了！

马克思对于阶级问题的过分痴迷过时了。今天，知识的扩张正在消除所有阶级屏障。

反驳 阶级理论具有重要性！

存在于社会组织每一层面上的巨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表明，现代社会首先就是一个多级（multi-levelled）的阶级社会。知识工作不是同质性（homogenous）的，而是一个阶级架构的空间，具有内在的阶级关系和分层模式，所以管理者，临时雇佣的电话中心接线员或是数据录入员都属于知识工作者。

8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主！（Democracy）

马克思主义者崇尚暴力革命，反对和平改良和民主。他们否认媒介在民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反驳 社会主义是民主的！

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部写满了侵犯人权、结构性暴力和战争的历史。在媒介领域，也有媒介支持反民主目标的资本主义历史。马克思主义是对和平、民主和民主媒介的号召。马克思曾在自己的新闻稿件和实践中不断为言论自由、废除审查、新闻民主和媒介民主而斗争。

9 马克思主义支持独裁！（Dictatorship）

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就是政党的逻辑，并影响国家建立恐怖的（monstrous）独裁以控制、监视、操纵和审查媒介。

反驳 资本主义支持独裁！

资本主义通过经济和意识形态手段建立了恐怖的经济独裁来控制、监视、操纵和审查媒介。马克思的逻辑旨在培养全面的人文环境使人们都能够积极地追求，其中就包括人人皆可为记者的观点。

10 非阶级导向的新社会运动！（Non-class-oriented New Social Movements）

新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环境主义、同性权益、和平运动、青年运动等抛离了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争取可替代媒体的斗争与新社会运动相关，与阶级斗争无关。

反驳 阶级导向新社会运动！

肇始于现有的危机的新社会运动，比如一系列占领运动（the occupy movement），以及现在有关民主全球化的运动，都出自于对不平等和阶级的深切关注。现在的斗争是运用了大量可替代媒体的阶级斗争。

第一篇 马克思，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

科恩（Nicole Cohen）分析了文化产业对自由职业者（freelancer）的剥削。她不认同文化工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观点，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没有保障的文化劳工问题具有必要性。她坚持，对于文化工作的分析不应该脱离资本主义普遍结构的剥削和其他形式的工作。剥削和阶级是劳动过程理论（labour process theory）的核心，并且至今仍然具有实用价值。具体而言，她分析了新闻工作中的无偿和无保障劳工。

埃克曼（Mattias Ekman）探讨了媒介与传播在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中发挥的作用。作者列举了三个事例：（1）瑞典媒体在报道全球正义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①时侧重描述具有实际或潜在暴力因素的个体行为，从而遮蔽了运动的政治目标和斗争的缘由。（2）瑞典媒体和政治家们将瑞典电信公司特力（Telia）的私有化塑造为给公众提供购买“人民的股份”的机会。（3）在诸如脸书这样的社交网站中，用户及其劳动在被商品化的过程中，剥夺和暴力发挥的作用。

费舍尔（Eran Fisher）分析了脸书的受众在商品化过程中面临的异化和剥削。在杰哈利（Sut Jhally）和斯迈思的理论基础上，建

^①全球正义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也称反全球化或另类全球化运动，抗议全球贸易协定，认为会对贫穷及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主要诉求是改革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且建立一个国际社会正义的运动。——译者注

构了受众异化的观点，认为商业媒体的受众不仅被剥削，而且不能控制内容与内容生产。脸书既被视为生产途径也被视为传播手段，既被视为技术也被视为媒介。脸书带来的是剥削的加重和异化的缓解，而商业化大众媒体则是以低剥削和高异化为基础的。

霍尔（Richard Hall）和斯塔尔（Bernd Stahl）探讨了数字技术领域的创新是如何影响大学的。作者强调，在新自由主义的认知资本主义之下，大学普遍成为了剩余价值生产和斗争的场所。分析的语境是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初期以来的大学商品化的加剧。正在兴起的科技越来越具有嵌入性、互联性、隐形性、适应性、个人化和普及化，促进了大学里的商品化和拜物化。

赫布尔怀特（William Hebblewhite）分析了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论文《作为生产方式的传播方式》。作者认为，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base and superstructure）的关系，威廉斯建立的是一个还原论的文化主义的概念。为了克服威廉斯和马克思及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概念的缺陷，有必要引入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作者认为网络是生产与传播的一种方式，并且介绍了生产—传播（communication）的概念。

曼泽罗尔（Vincent Manzerolle）和乔森（Atle Mikkola Kjösen）分析了数字化带来的资本积累循环（cycle）的变化。作者认为，个人化（personalization）与普遍连接（ubiquitous connection）是社交（communicative）资本主义影响资本运作循环的两个重要方面。他们认为，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传播的批判分析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循环理论为基础，数字化传播加速了资本循环并促进了信贷发展。他们指出，资本循环是一个传播的过程。

佩雷斯（George Pleios）聚焦于在信息社会中，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概念化。他强调，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中的传播

具有商品属性和意识形态特征，传播是一种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传播被整合进了阶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中，并不单纯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作者结合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资本主义，垄断（monopoly）资本主义和符号（symbolic）资本主义观察这种现象，他认为休闲和工作的融合会进一步消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生产与传播之间的界限。

普雷（Robert Prey）分析了网络的概念在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架构中的角色。作者讨论了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关于网络社会中权力的分析，强调了卡斯特对于排他原则（exclusion）的重视。借助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佩罗（Ève Chiapello）的观点^①，他强调将社会批评根植于网络隐喻（network metaphor）所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会导致对于阶级和剥削问题的忽视。作者认识到网络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应当将这一研究取向同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相结合。

浦若迪尼克（Jernej Prodnik）探讨了商品在媒介与传播批判研究中的角色。他对马克思关于商品理论的分析进行了概述，并指出这是马克思所有著作中均有所涉及的一类概念。其他相关观念，例如商品拜物教和事物的普遍商品化在文章中也有所讨论。作者还特别分析了商品在斯迈思的理论和自主论马克思主义（Autonomous Marxism）中的角色，反驳了现在以卡拉韦（Brett Caraway）的观点为代表的对于斯迈思的批评。

斯楚罗特（Jens Schröter）分析了互联网将带来无摩擦资本主义（frictionless capitalism）^②的观点。互联网兴起于新自由主义盛行时

①[法] 吕克·博尔坦斯基，夏娃·夏佩罗著，高钰译：《资本主义的新精神》，译林出版社，2012年。——译者注

②[美] 比尔·盖茨著，辜正坤译：《未来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译者注

期，作为一项技术，成为了无危机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与意识形态的投射。而作者强调，本世纪初的互联网危机（dot. com crisis）早已击碎了这种意识形态，互联网反而陷入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之中。

维特尔（Andreas Wittel）认为数字化媒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是以劳动、价值、所有权（property）和斗争的概念为核心的。惠特将数字化媒介阐述为分布式媒介（distributed media）。他认为，信息生产的途径在数字化时代更易获取，而资产阶级掌控了重要的信息分配的手段。作者在文章中对网络免费劳工进行了分析，对知识与数字化媒介时代劳工的可测量性提出了争议，对始于文件共享的所有权提出挑战，并为数字公众（digital commons）而斗争。

第二篇 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

卡斯塔尼奥（Pablo Castagno）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去理解阿根廷的政治体系发展、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媒介的角色和媒介政策。作者解释了新自由主义如何被法西斯主义军政府（fascist military junta）所推行，并于1989至1999年^①梅内姆政府统治时期被深化。作者展示了多年来阿根廷的政治发展如何影响媒介角色，包括法西斯主义的媒介控制，梅内姆时期新自由主义的媒介私有化，基什内尔（Kirchnerismo）为建立国家文化产业所推动的国有商业关系网。

埃尔多甘（Irfan Erdogan）分析了传播在马克思著作中扮演的角色和马克思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地位。作者对传播学学术期刊中的马

^①此处应为1999年，原文误为2009年。——译者注

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角色进行了经验研究。作者发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被系统地歪曲和边缘化了。其后果之一便是，主流研究通常用不动声色的方式忽略马克思，而可替代的研究取向，例如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则往往倾向于攻击马克思并做出无知的断言（make uninformed claims）。埃尔多甘对马克思文本的细致研究表明，马克思将传播视作人类生活的重要方式，认为传播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阶级属性。

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对网络批判研究的路径进行了概述，并指出了该领域的核心概念。他认为，在网络文化批判研究（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和批判政治经济学（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网络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the Internet）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差异和斗争。他探讨了网络批判研究中的十一个马克思主义概念。网络批判研究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包括：辩证法，资本主义，商品化，剩余价值/剥削/异化/阶级，全球化，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公众（commons），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共产主义和美学。

加兰（Christian Garland）和哈珀（Stephen Harper）探析了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冲突已经转变为了自由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的绝对优势和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取代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适应自由多元主义盛行的现状。作者通过两个例证指出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局限性：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丑闻和关于经济危机发生原因的讨论。

麦圭根（Jim McGuigan）回顾了资本主义当代变迁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争论。作者强调，经过对经济主义（economism）的批评，文化研究往往摒弃了经济学批判。他分析了“酷（cool）”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里的作用。消费文化正是“酷”

资本主义的重要表现，传播技术“酷”的特性尤其突显。对当代文化与媒介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对于理解这种意识形态与经济的作用具有重要作用。

尼克松（Brice Nixon）讨论了辩证法思想之于媒介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意义。作者认为，意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的关键问题，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基础。他指出，辩证法的方法可以运用于媒介与传播的批判研究之中，这需要充分结合批判理论家们的理论，参考卢卡奇（Georg Lukács）、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萨特（Jean-Paul Sartre）和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的著作。

罗迪诺-科罗奇诺（Michelle Rodino-Colocino）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观点分析了佩林（Sarah Palin）的政治观与意识形态。她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复兴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复兴是必要的。当前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在媒介与传播研究中的参与是不充分的，今天的媒介与传播批判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中需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具体而言，作者分析了佩林如何挪用和转换女性主义的内容来为自己反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目的服务。

苏斯曼（Gerald Sussman）探讨了意识形态和宣传在当代资本主义媒介经济中的作用。作者认为，人们正生活在一个宣传社会，意识形态和宣传已经成为了核心生产力。文章描述了新自由主义制度下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及那部分经济所依赖的生产型消费者（prosumer）的无偿劳动。对生产型消费者的剥削和监管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在今天的重要性。数字化媒体环境也使抵制资本主义的集体性活动成为了可能。

第三篇 马克思与媒介使用

布朗 (Brian A. Brown) 和奎恩-哈斯 (Anabel Quan-Haase) 的贡献在于处理了研究数字化劳动和社会媒体生产型消费者的数字化劳动条件所需的方法论问题。“工人调查 2.0” (Workers' Inquiry 2.0) 的方法论建议是建立在马克思工人调查表和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合作调查方法的基础上的。作者以对 Flickr 的调查为例, 展示了“工人调查 2.0”的方法论是如何实行的, 他们还指出了工艺品、社区和生产者 (producers)^① 在其中的重要性。

虞格仁 (Katarina Giritli Nygren) 和基隆德 (Katarina L. Gidlund) 分析了数字化文化中异化的作用。他们运用了福柯 (Foucault) 的牧领权力 (pastoral power) 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作者借用福柯的观点去分析数字化技术中的牧领权力, 认为这种形式的权力使人们误以为, 数字化技术能给予个体性。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被用于数字化技术领域, 揭示出现在传统形式的异化都伴随着数字化异化, 这种异化与消费文化、在脸书等自我表达平台上的个性化以及商品化的互联网直接相关。

第四篇 马克思, 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

奥拉格 (Miriyaam Aouragh) 为观察和分析阿拉伯革命中的社会媒体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视角。作者将调节理论 (notion of mediation) 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联系, 并且认为这体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联。革命是根据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阶级架构的。

^①此处或应为 producers, 原文误为 produsers。——译者注

作者质疑西方自由主义将革命和社会媒介框定为东方主义的做法，并提出了一个辩证革命模型，将社会媒体置于“在线—离线（online-offline）”的辩证革命中。

亚茨（Lee Artz）分析了 21 世纪社会主义如何在委内瑞拉运行以及传播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委内瑞拉是一个拥有社会主义政府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里公众有机会通过公共辩论去商讨和影响所有的政府预案，社会服务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建立起来。他分析了委内瑞拉的媒介政治经济：超过 80% 的媒体是商业性质的，与之对立的是社区媒体和公共服务媒体。结论认为委内瑞拉及其媒体正在经历转变，并且具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潜能。

鲁德斯（Peter Ludes）讨论了马克思关于无阶级社会（classless society）的看法。在回顾了马克思的相关观点后，他得出了关于 20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文章认为，一种替代的制度的建立需要将规划形成网络，并且此时此刻就应该开始。卢德思建议参考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观点，升级马克思理论中的无阶级社会这一概念。在建立替代方式的过程中，应当特别考虑传播的作用以及文明化（civilizing）和去文明化（decivilizing）的进程。

莫斯科（Vincent Mosco）认为资本主义危机重新激发了人们对马克思的兴趣，因此，深入解读他的所有的著作是至关重要的，这可以帮助照亮媒介与传播批判研究中，诸如知识劳工、媒体实践等盲点。作者点明了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的信息与传播方式的重要性，以及将马克思的新闻实践作为一种政治的呼唤，对于当代传播学学生、学者、记者和知识工作者的重要启示。

皮考斯（Wilhelm Peekhaus）对学术期刊出版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他展示了对免费学术劳动力的剥削、垄断与资本集中趋势、图书馆预算减少而期刊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并分析了这些情况如何塑造了这个产业。他将资本主义学术出版阐释为一种原始积累的

形式，指出出版的开放获取可以成为一种可行的替代方式。当然，资源开放今天仍具有局限性，需要通过一场资源开放运动来反对资本主义、质疑学术出版的资本主义特性，进而克服局限。

塞维吉纳尼（Sebastian Seignani）在探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私（privacy）的语境中分析了可替代社交网站 Diaspora。作者强调它与免费软件运动的关联，描述了私的概念的起源及其与私有财产观念的关联。他考察了通常被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忽略的马克思对于私的概念的批判，勾画出了社会主义替代方式的基础，并把这种分析应用于了 Diaspora 这一案例上。

肖（Padmaja Shaw）分析了马克思的著作在印度当代政治新闻报道中的角色。作者分析了马克思著作在新闻报道中三个方面的相关性：言论自由与监管，作为自由贸易一部分的新闻，媒介在资产阶级民主中的角色。作者强调，一方面，在印度报刊中左翼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另一方面，主导着红色走廊（Red Corridor）起义地区的左翼思想和左翼新闻报道被监管和压制着。制度化的左翼只有仔细思考马克思的新闻政策才能更好地应对这种情况。

本辑特刊呈现了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于媒介与传播批判研究的重要意义。它很清楚地表明，媒介与传播研究不应该仅仅具有批判的特性，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不论是本次特刊所体现出的学术兴趣以及研究质量，还是其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活动（如“第四届信息通讯技术和社会大会：21世纪信息社会的批判、民主和哲学”，2012年5月2日至4日乌普萨拉大学的“迈向社会媒体的批判理论”会议，见 Fuchs 2012，另见：<http://www.icts-and-society.net/events/uppsala2012/>），尤其是在博士生和青年学者中所表现出的热度都说明：马克思回来了。对马克思著作的深刻兴趣体现了对当下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传播的担忧以及寻求其他出路的渴望。

参考文献：

Baudrillard, Jean. 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Telos Press.

Eagleton Terry. 2011. *Why Marx Was Right*.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uchs, Christian. 2012. New Marxian Times. Reflections on the 4th ICTs and Society Conference“Critique, Democracy and Philosophy in 21st Century Information Society. Towards Critical Theories of Social Media”. *tripleC-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10(1): 114 – 121.

Fuchs, Christian. 2011.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Fuchs, Christian. 2010. Grounding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 Inquiry into the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Karl Marx.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4(1): 15 – 41.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MEW) . *Werke*. Berlin: Dietz.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844. *The German Ideology*.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848/2004.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Peterborough: Broadview.

McChesney, Robert W. 2007.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Critical Junctures and the Future of Media*. New York: The New Press.

McLuhan, Marshall 1964/2001.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Routledge.

Mosco, Vincent.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2nd edition.

Smythe, Dallas W.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3): 1 – 27.

Zizek, Slavoj. 2010.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London: Verso.

第一篇

马克思，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



妮可·S. 科恩 (Nicole Cohen)^①

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工作： 自由撰稿人与剥削^②

殷鹏 (译)，吴畅畅 (校)

[导读] 本文主要是以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和剥削理论分析自由作者受到的剥削。作者在开篇提出，由于自由作者的工作方式看似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存在矛盾——比如自由作者离开了物理形式的工厂、对自己的工作掌握一定的自主权等——导致在分析文化工作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失了。然而，作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理解当代文化工作的一个有力框架，主要原因在于：(1) 在经验层面，文化工作者摆脱工作场所不代表脱离了剥削关系；(2) 在理论层面，唯物主义的方法可以将文化工作置于资本主义的动态关系中考察。

^①约克大学传播与文化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她的主要研究成果都收录于《民主传播》(*Democratic Communiqué*)、《劳动力：加拿大工作与社会学刊》(*Just Labour: A Canadian Journal of Work and Society*)、《女性主义媒介研究》(*Feminist Media Studies*)和《加拿大传播学期刊》(*The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约克大学，nscohen@yorku.ca。

^②感谢大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评论，感谢斯蒂芬妮·罗斯 (Stephanie Ross)、利亚·沃斯科 (Leah Vosko)、帕特里夏·马泽帕 (Patricia Mazepa)、基利·得·普特尔 (Greig de Peuter) 和马特·卡林顿 (Matt Carrington) 对本文不同版本的反馈意见。

接下来，作者结合马克思的基本概念和劳动过程理论，以自由作者为案例，经过分析后指出：有关文化工作自主性和控制劳动过程的争论忽略了劳资关系中的剥削，而这正是影响文化工作的关键。作者通过对文化公司榨取自由作者剩余价值的两种方式——剥削无偿劳动时间和以不合理的版权制度侵占知识产权——来展现这种剥削。

在剥削无偿劳动时间方面，自由作者与公司不存在雇佣关系，只是通过劳动获得计件工资。这样一来，（1）文化公司首先无需支付工人劳保、工资、培训等费用；（2）文化公司支付的计件工资中，只为产品本身支付费用，而没有为自由作者生产这件产品的过程，包括创意、自我提升等支付工资；（3）文化公司还通过雇佣实习生等方式加强竞争，进一步压低工资。

在版权剥削方面，由于通信技术的发达，复制变得十分简单。文化公司（1）采用买断文化产品所有权的方式，一次支付，多次使用；（2）通过与自由作者签订不平等或强制性的合同，将多次使用的过程合法化。

最后，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视角能够揭示文化产业转型和工人经验转型的动态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工作可以视为是一个斗争场所，而这些自由作者本身既是劳动的工具，也是斗争的工具。

[关键词] 文化工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自由作者，剥削，劳动过程，版权，不可预见性（或者不稳定性？）。

一、引言：马克思的缺失

文化工作 (cultural work) 是指媒介、文化和传播的生产^①, 它曾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盲点^②, 但现在已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学者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其开展研究。然而, 马克思的思想却在这些

①在针对传播和文化产业中的工作和劳动力研究中, 许多基本定义还未达成统一。本文中, 笔者用“文化工人”(cultural workers)一词指代那些在文化行业, 或是在生产并流通“影响我们理解世界”和“制造社会意义”产品行业工作的人 (David Hesmondhalgh.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nd ed. London: Sage. p. 3&12.)。班克斯 (Banks) 把“文化行业”(cultural industries) 定义为“生产‘艺术’或‘符号’产品和服务的行业, 这些产品的核心价值在于能够承载图像、符号、标识和声音” (Mark Banks. 2007.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Wor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 2.)。当人们把文化与创意和艺术联系在一起时, 产生了许多新议题, 我使用“文化”一词, 就是要同这些议题进行对话。到底哪些行业属于文化行业, 人们看法不尽相同, 比如加拿大统计局 (Statistics Canada) 就把从图书馆员和展览策划人到作家、艺术家, 以及电影和广播中的技术工人算作文化行业的工人 (参见 Statistics Canada. 2012. *Occupations in Art, Culture, Recreation and Sport. National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2011*. <http://www.statcan.gc.ca/cgi-bin/imdb/p3VD.pl?Function=getVDDetail&db=imdb&dis=2&adm=8&TVD=122372&CVD=122373&CPV=5&CST=01012011&MLV=4&CLV=1&CHVD=122374>)。这个范围虽然从某种程度来说过于宽泛, 但却很有用。因为它从行业特性, 从工作执行的方式而非工作内容本身来理解文化工作。文化产品及其消费中的一些特性也能够解释, 为什么文化生产是通过特定方式组织的 (参见 David Hesmondhalgh.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nd ed. London: Sage. p. 101, Bernard Miège. 1989. *The Capit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和 Nicholas Garnham. 1997. *Concepts of Culture-Public Policy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Studying Culture*, 2nd ed. edited by Ann Gray and Jim McGuigan, 54 - 61. London: Arnold)。这就能避免将文化工人的经验归因于他们的个人性格特质, 这也是笔者在文中的观点之一。“创造性劳动”(creative labor) 关注的是个人特质 (Chris Smith and Alan McKinlay. 2009.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Labour Process Analysis*.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 3), 但笔者认为文化生产组织对工人的经验有结构性影响, 自由作者的劳动经验直接来自于他们工作的行业。

②Vincent Mosco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2006) Editorial.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3):493.

研究中缺失了。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对 19 世纪工业生产的研究对于后福特时代的文化工作来说似乎已经过时。他在《资本论》中描述了当时工人在工厂劳动的情形：雇佣工人一无所有，只能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这种最特殊的商品，被卷入“自由”的剥削关系，被雇主安排工作。^① 在资本家的控制下，工人们每天长时间地辛苦劳动，却只能得到很少的工资。在挣得能够在生劳动力的工资之后，她就开始生产剩余价值，或者说是资本的利润。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工人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她的具体工作被抽象为标准化商品生产的一部分。马克思描述的是被动的、异化的工人，他们与其他工人都可以任意交换，在生产过程中出卖自己的劳动。

当劳动离开实体的工厂，进入创意经济领域的工作室、办公室和或者家中的时候，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认为过时了。在许多研究中，文化工人被视为是独特的一类工人，文化工作也与其他类型的工作截然不同，不存在劳资对抗（labour-capital antagonisms）。^② 还有更偏激的批评指出马克思的观点太简单（reductive），因为他没有关注工人的能动性或主体性^③对马克思理论最广泛的批评

^①Karl Marx. (1867/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

^②Richard E. Caves. (2000) *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acts between Art and Commer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 L. Florida. (2002)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Mark Deuze. (2007) *Media Work*. London: Polity.

Susan Christopherson. (2009)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Economy: Risk, Adapta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Exclusionary Networks.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72 – 9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③Mark Banks. (2007)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Wor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Bridget Conor. (2010) “Everybody’s a Writer” Theorizing Screenwriting as Creative Labour. *Journal of Screenwriting* 1 (1): 27 – 43.

是针对“异化”(alienation)概念^①。比如, 马克·班克斯(Mark Banks)就曾经对把文化工人视为“被异化劳动力”的观点提出批判, 这种观点认为他们“没有任何积极的主体性, 受到来自‘上级’主管和所有者的压迫”。^②对文化工作的描述更多的是与异化截然相反: 它是一种社会的、协同的工作, 在劳动过程中给予工人相对自主性, 激励他们表达自我, 并为他们参与全部人类活动提供机会。文化工人对自己创造的产品有强烈的附属感, 特别是当这些产品——比如小说或电影——带有他们名字的时候, 这种感觉更加强烈。马克思认为工作是异化的力量, 这种力量“不是自愿, 而是强迫的”^③, 而文化工作是充满渴望并富有魅力的, 这两种观点很难调和。^④

我在下文将详细地回顾这些批评理论家的观点, 他们认为文化产品的特性要求工人在劳动过程的创意阶段获得相对自主性^⑤, 这能够让文化工人与其他类型的工人相比获得更长时间、更多自主性和资源, 并减少被异化的感觉。^⑥虽然这种相对自主性是短暂的且协商的, 但是这种安排引出这样一个观点: 文化工作应该被视为潜在的

①Karl Marx. (1844/1978a)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594–617. New York: Norton.

②Mark Banks. (2007)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Wor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 11.

③Karl Marx. (1844/1978)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New York: Norton, p. 74.

④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不是从主观经验的角度解释异化, 而是从客观的角度, 将其描述成为围绕私有财产和雇佣劳力而组织的生产方式。对于马克思来说, 工人缺乏生产方式(means of production), 为了生存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并因此而被异化。

⑤Bill Ryan.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Mark Banks. (2010) Autonomy Guaranteed? Cultural Work and the “Art-Commerce Relation”. *Journal for Cultural Research* 14 (3): 251–269.

⑥David Hesmondhalgh.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nd ed. London: Sage, p. 70.

好工作，或者说文化工作即使在资本主义限制内也能够产生“‘激进的’自主批评”（“radical” autonomous critiques）。^①然而，当代文化生产正在削弱这种相对自主性：文化工人的物质条件不断下降，工作不确定性不断增长，具体表现在“间歇性就业和对未来的极度不确定性”，以及“缺乏财务及其他物质保障”。^②的确，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文化工作的核心特点。这个行业十分复杂，在充满不稳定性的同时，又能让工作者产生满足感；既有风险，也有收获，尽管多学科方法对于思考其复杂性很有必要，但是马克思对于工作内在逻辑的洞见，为我们理解塑造文化工作的结构力量提供了基础。

马克思的基本概念^③对于研究工作和工人生活转型提供了富有意义的视角。我认为，对于导致文化工作日益不稳定的过程、实践和结构，动态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能够做出解释，特别是剥削依然是推动文化产业转型的关键过程，也能够展现文化工人的相对自主性正在被削弱的方式。我将以对自由作者的研究为例对此进行探讨。

①David Hesmondhalgh and Sarah Baker. (2011) *Creative Labour: Media Work in Three Cultural Industries*. London: Routledge.

Mark Banks. (2010) "Autonomy Guaranteed? Cultural Work and the "Art-Commerce Relation". *Journal for Cultural Research* 14 (3): 252.

②Andrew Ross. (2009)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 Life and Labor in Precarious Ti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 4.

Enda Brophy and Greig de Peuter. (2007) "Immaterial Labor, Precarity and Recomposition." In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dited by Catherine McKercher and Vincent Mosco. Lanham, MD: Lexington. p. 180.

③马克思理论的其他方面对于理解文化劳动十分有用，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The Grundrisse*）。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者（autonomist Marxist）用这本书中的观点来审视当代资本是如何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把一般知识（general intellect），以及工人们的情感和个性纳入积累的过程。但我在本文中主要关注马克思的“老”概念（Ursula Huws. 2003.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 135），这些概念在传播学和文化研究中关注的人比较少。

自由作者是加拿大传媒劳动力中不断壮大的一支队伍。^① 他们越来越认识到, 摆脱雇佣关系 (或是被雇佣关系否定, 这正日益成为一种标准) 并不意味着能够脱离剥削或者劳资对抗。资本家以前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创造剩余价值^②, 而依靠自由劳动力的现代企业则通过其他方式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 包括延长劳动时间和野蛮获取版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过程导向的和历史的, 它关注工人的能动性, 追求自主性, 这都为研究文化工作的现状提供了洞见。有关文化工作的研究可以汲取唯物主义方法和把文化工作当作斗争场所的方法中的精髓, 其中唯物主义方法把文化工作置于与资本主义的动态关系中考察。包括产业、国家、培训机构、学者和工人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媒体工作者必须接受并适应这个产业的各种不确定因素。^③ 马克思主义方法则打破了这种思维模式, 解释了文化工作的本质, 分析了其演变的过程。接下来, 我将首先搭建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化工作的框架, 以劳动过程理论的视角讨论本研究面临的挑战与可能性; 然后通过自由作者的案例研究, 分析剥削工人无偿劳动时间和版权的动态过程; 最后讨论将文化工作作为斗争场所的观点如何揭示文化工作的转型。

①这项研究基于对加拿大 200 名自由作者的定性研究和自由作者组织代表的访谈。除特殊说明之外, 本文中的引用都是匿名研究对象提供的。

②Karl Marx. (1867/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 p. 645.

③参见 Angela McRobbie. (2002) From Holloway to Hollywood: Happiness at Work in the New Cultural Economy? In *Cultural Economy: Cultural Analysis and Commercial Life*, edited by Paul du Gay and Michael Pryke, 97 - 114. London: Sage; Mark Deuze. (2007) *Media Work*. London: Polity; 和 David Hesmondhalgh.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nd ed. London: Sage. p. 7.

二、回归马克思：文化工作的政治经济学

文化工作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劳资关系的动态，影响这一关系的张力与矛盾，对控制和剥削的斗争，以及权力与抵抗中的问题。这种方法来源于这样一种理解：实践与过程都处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一种特定历史情境中。在这一情境下，工人缺乏生产资料，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养家糊口，被卷入剥削剩余价值的自愿关系（consensual relationship）中。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还原论（reductive），他认为马克思是一位辩证的思想家，关注“过程、流动、变化和关系”，而不是分析结构与事物。^①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构成和维持并发展的过程^②，解释了“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同元素之间丰富的动态的关系”。^③ 他的概念抓住了推动变化和不稳定的动态关系和矛盾，而变化和不稳定性是资本积累的天生特点。^④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文化工作的分析同文化产业的历史发展进行对话。文化产业目前并没有完全形成，但却是文化如何生产和工作如何组织这两个问题长期争论的结果。文化工作具有变数多、项目制和不稳定的特点，而历史的、过程导向的视角揭示出，随着资本主义动态变化而转型的传媒和文化产业，是如何产生上述这些理所当然的特点。最近，资本主义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由福特主义式

①David Harvey.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Malden, MA: Blackwell. p. 49.

②David Harvey.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Malden, MA: Blackwell. p. 50.

③David Harvey. (2010)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London: Verso. p. 12.

④David Harvey.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Malden, MA: Blackwell. p. 54.

的大规模生产向灵活积累的 (flexible accumulation) 方式^①转变, 这种积累方式是围绕精细化生产、信息通信技术, 以及撤销管制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而展开的。^② 在这一背景下, 文化产业发生重大变革, 也影响了工人的经历。^③ 比如, 人们都以为文化行业的工人具有“无边界”和“组合式的职业生涯” (portfolio careers), 也就是说他们通常以项目的形式, 同时为多个雇主工作。^④ 然而, 这种组合的方式通常只是被描述为文化工人的内在特点之一, 而不是他们应对工作不稳定的一种策略。后者明显无法吸引读者, 但却是将工作安排

①哈维使用灵活积累这个词来描述从上世纪 70 年代福特主义开始的一种渐变的积累过程, 其特点是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劳动过程和消费方式, 还有信息署和财务服务的兴起 (参见 David Harvey.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Malden, MA: Blackwell. p. 147)。沃斯科 (Vosko) 认为, 这个词比“后福特主义”要好, 因为它强调了“变化中的延续” (参见 Leah F. Vosko. 2010. *Managing the Margins: Gender, Citizenship,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Precarious Employ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86), 或“大生产体系中某些方面的延续, 这些延续随着新生产技术和生产更专业化而产生, 与福特主义相关” (参见 Leah F. Vosko. 2000. *Temporary Work: The Gendered Rise of a Precarious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 27)。

②Kim Moody. (1997) *Workers in a Lean World*. London: Verso 和 Gregory Albo. (2010) The “New Economy” and Capitalism Today. In *Interrogating The New Economy: Restructuring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Norene J. Pupo and Mark p. Thomas, 3 – 2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③ILO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2000. *Symposium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ies: Their Impact on Employment, Working Conditions and Labour-management Relations*. Geneva: ILO.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dialogue/sector/techmeet/smei00/smeir.htm>.

Anna Gough-Yates. (2003) *Understanding Women's Magazines: Publishing, Markets and Readerships*. London: Routledge.

David Hesmondhalgh.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nd ed. London: Sage.

Mark Deuze and Leopoldina Fortunati. (2011) Atypical Newswork. Atypical Media Management. In *Managing Media Work*, edited by Mark Deuze, 111 – 120. London: Sage.

④Charles Leadbeater and Kate Oakley. (2005) Why Cultural Entrepreneurs Matter. In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John Hartley, 299 – 311. Malden, MA: Blackwell.

John Hartley. (2005) *Creative Industries*. In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John Hartley, 1 – 40. Malden, MA: Blackwell.

同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动态联系在一起。在多数对文化工作的解释中，资本主义在影响文化工作和权力关系中的作用都很模糊，而将文化工作直接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重新肯定了研究媒体、文化和传播的唯物主义方式。

马克思的观点在文化研究中常被忽略，因为他没有关注工人的主体性，而主体性又是文化工作的一个关键要素。文化工作“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传播意义，这也是一个关于认同和快乐”^①的行业。的确，主体性是所有工作的关键要素，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越来越把工人的主体性融入生产当中。^② 在思考资本包容工人抵抗的局限性，以及为什么文化工人选择以特别的方式集体组织起来、如何组织起来的时候，主体性的作用更加重要。^③ 然而，哈维指出，仅仅从工人的主观劳动经历很难理解当代文化工作。^④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理解这类劳动的客观条件，或者说“工人被迫应对和防御抵抗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才是在每次转变时影响他们的表现力（manifest forces）”。^⑤

这个方法源于马克思，他指出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非随心所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

①Jim McGuigan. (2010) Creative Labour, Cultural Work and Individua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16(3). p. 326.

②Nick Dyer-Witheford and Greig de Peuter. (2009) *Games of Empire: 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 4.

③Greig de Peuter. (2011) Creative Economy and Labor Precarity: A Contested Con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5(4): 417 - 425.

Nicole S. Cohen. (2011) Negotiating Writers' Rights: Freelance Cultural Labour and the Challenge of Organizing. *Just Labour: A Canadian Journal of Work and Society* 17 & 18: 119 - 138.

④David Harvey. (2006)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Verso. p. 113.

⑤David Harvey. (2006)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Verso. p. 113. 这里更加强调来源。

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当然，如果仅仅从文化工人的数量增多、教育和培训项目扩展，以及工作竞争愈加激烈的角度来看，文化工作似乎可以给人们带来成就感，也会给人一种创作自主性的感觉，但是这类工作通常是很不稳定，工资很低甚至没有工资。^②要理解为什么人们以特定方式理解这类工作，我们需要扩展视野，从个人经历走出来，将文化工人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在同把他们的劳动力商品化的条件作斗争。马克思主义方法将工人作为参与生产动态过程的积极主体，他们向权力关系提出挑战，而不是简单“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③

为了同更广泛的社会总体性（social totality）和资本主义劳动条件相联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把文化工人当作是完全独一无二的工种。比如，麦克·韦恩（Mike Wayne）将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对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工人之间的关系概念作出详细阐释。^④他认为，“创造性劳动和智力劳动的更广泛社会条件是一种集体关系（collective relationship），这种关系处于资本和‘传统’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位置”。^⑤在研究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

①参见 Karl Marx. (1852/1978b)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66 – 135. New York: Norton. p. 595.

②Kelly Hill and Kathleen Capriotti. (2009) *A Statistical Profile of Artists in Canada*. Hill Strategies Research Inc., February.

Ross Perlin. (2011) *Intern Nation: How to Earn Nothing and Learn Little in the Brave New Economy*. London: Verso.

Liam Lacey. (2011) *Screenwriting: It's a Terrible Job But Everybody Wants To Do It*. *The Globe and Mail*, July 7, R1.

③Bridget Conor. (2010) “Everybody's a Writer” *Theorizing Screenwriting as Creative Labour*. *Journal of Screenwriting* 1(1): 27 – 43.

④Mike Wayne. (2003) *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 Key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London: Pluto.

⑤Mike Wayne. (2003) *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 Key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London: Pluto. p. 7.

化工人时，他借用了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对知识分子阶级性质的理论化——“他们这类人的主要活动是阐释和传播思想”。^① 赖特认为，知识工人（intellectual workers）无法控制别人的劳动，也无法“真正控制自己的劳动过程”，“从经济层面看，这些工人处于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位置；从意识形态来看，他们处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位置”。^② 文化工人也处于这种矛盾的位置，因为他们被整合进资本主义，拥有“文化特权、相对独立的工作场所和（通常情况下）薪酬水平”，因此与工人阶级有区别，但他们不是资本家：他们“作为劳动力的地位，不断强调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与低于他们的工人阶级一样，受到类似剥削并被无产阶级化”。^③ 我将证明，文化工人作为劳动力的状态正在以快速的步伐不断强化。

虽然工人之间有显著差异，但这些差异不是绝对的。相反，我们可以把不同行业和职业的工人视为社会阶级和经济阶级中的不同部分，他们必须出售自己劳动力才能生存。^④ 而资本的目的，是要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建立等级结构，马克思强调，“资本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社会统一的劳动能力，其中的特定角色只是整体劳动的一个部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工作都是

①Erik Olin Wright. (1978) *Intellectuals and the Class Structure of Capitalist Society*. I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edited by Pat Walker.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p. 192.

②Erik Olin Wright. (1978) *Intellectuals and the Class Structure of Capitalist Society*. I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edited by Pat Walker.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p. 106, 204.

③Mike Wayne. (2003) *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 Key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London: Pluto. p. 23.

④Mike Wayne. (2003) *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 Key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London: Pluto.

Chris Smith and Alan McKinlay. (2009)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Labour Process Analysis*.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3 - 2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服从于更宽泛的剥削。^① 对文化工作的这种认识，保留了劳动与资本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概念，可以用来解释媒体形式、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变革。资本的“内在动力”^② 是要以降低劳动成本来追逐剩余价值，这与工人追求有意义的工作、获得体面的工资以及维持自己生活的愿望是相冲突的。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没有将文化工作当作一种特殊的工种。它拒绝将文化工人的行为视为是受他们的艺术气质、个性和无尽的“创造欲”驱动，而是将这些行为同他们工作的政治经济背景相联系^③，比如市场经济、监管机构、国家政策和雇佣政策、行业组织、工资、工会保护等，都影响着工人的行动和经验。要想充分认识文化工作，我们应该应把文化工作“恒久特点（enduring features）”，如风险和不稳定性，与对构建这些动态政治经济背景的历史分析结合起来。^④

这一分析的关键是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它是指一个群体（工人）

①Mike Wayne. (2003) *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 Key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London: Pluto, p. 15.

②Karl Marx. (1867/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 p. 437.

③Richard E. Caves. (2000) *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acts between Art and Commer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3.

Susan Christopherson. (2009)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Economy: Risk, Adapta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Exclusionary Networks.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72 – 9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 74.

④参见 Susan Christopherson. (2009)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Economy: Risk, Adapta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Exclusionary Networks.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72 – 9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David Hesmondhalgh.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nd ed. London: Sage.

Bernard Miège. (1989) *The Capit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生产的剩余价值被另一个群体（资本家）所控制。^①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产生于对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压榨。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源于将一天中的工作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工人出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赚取自己的工资，在第二部分中，工人用剩余劳动时间为资本家生产利润。^② 正是这种对工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剥削，推动资本积累，引起了阶级冲突。正如苏珊·希梅尔韦特（Susan Himmelwit）写道：“资本主义的生产史可以看作是一部斗争史，资本想要不断增加，工人阶级抵抗剩余价值率的提高”。^③

剥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把对立与抗争联系在一起：那些剥削工人的人同时依靠工人实现剩余价值，这就为工人赋予了权力，是“内在的抵抗力”。^④ 剥削过程包含工人组织、抵抗和对自主工作的追求。自主论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认为，资本总是要面对工人的抵抗，并做出应对，这就提供了一个研究框架。^⑤ 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文化生产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过程，而是要对工人组织和斗争做出应对的动态和结构性（constitutive）过程。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现的，“资本主义的特点是盲目崇拜（fetishism），它模糊了剥削中剩余价值的本质，这对于资本家和工人都一样”。^⑥ 文化工作中的劳资关系被掩盖的原因很多，包

①Susan Himmelwit. (1983) Exploitation. In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edited by Tom Bottomore, Laurence Harris, V. G. Kiernan and Ralph Milib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157.

②Susan Himmelwit. (1983) Surplus Value. In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edited by Tom Bottomore, Laurence Harris, V. G. Kiernan and Ralph Milib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474.

③Susan Himmelwit. (1983) Surplus Value. In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edited by Tom Bottomore, Laurence Harris, V. G. Kiernan and Ralph Milib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474.

④Erik Olin Wright. (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5.

⑤Harry Cleaver. (2000)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Leeds and Edinburgh: Anti/Theses and AK Press.

⑥David Harvey. (2006)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Verso. p. 113.

括在赋权风险情况下选择追求文化工作、企业越来越多地强调文化工作，以及基于个人关系的文化工作会掩盖经济关系。^① 剥削关系如此模糊，以至于人们似乎常常认为文化工作不是真正的工作，进而引发关于“爱的劳动 (labor of love)”的表述，抢占了对权力关系的讨论。^② 回归马克思可以揭示出弥漫在文化工作中对资本主义对立和社会关系的讨论。传统上，劳动过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下一节中，我将回顾劳动过程理论对文化工作的相关研究。

三、劳动过程理论和文化工作

劳动过程理论源于哈里·布雷弗曼 (Harry Braverman)^③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他批判了该制度下的工作组织，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损于工人的技能。布雷弗曼借鉴马克思的思想，试图理解现代工作中的矛盾。现代工作一方面需要增加对工人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更大的不满。布雷弗曼介绍了劳动过程是如何被纳入资本积累过程并被其塑造的：资本家为了从工人的

①Isabell Lorey. (2009) Governmentality and Self-Precarization: On The Norm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ers. In *Art and Con-temporary Critical Practice: Reinventing Institutional Critique*, edited by Gerald Raunig and Gene Ray, trans. Lisa Rosenblatt and Dagmar Fink, 187 – 202. London: MayFly Books.

Gina Neff, Elizabeth Wissinger, and Sharon Zukin. (2005) Entrepreneurial Labor among Cultural Producers: “Cool” Jobs in “Hot” Industries. *Social Semiotics* 15 (3): 307 – 334.

Carol Ekinsmyth. (2002) Project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and Risk in Magazine Publishing. *Regional Studies* 36 (3): 229 – 243.

②Andrew Beck. (2003) Introduction: Cultural Work, Cultural Workplace-Looking at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Cultural Work: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edited by Andrew Beck, 1 – 6. London: Routledge.

③Harry Braverman. (1974/1998)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劳动中榨取价值，不断控制着工作；这种劳动过程被不断合理化，首先在工厂，然后在办公室。在这一过程中，劳动从创造有用的东西转变为扩大资本的过程。竞争和积累的结构动力推动资本家不断改进生产，提高效率，降低劳动力成本。这帮助资本家控制劳动过程。正如马克思写道，“资本……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和不变的趋势，就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能够降价商品价格，通过降低商品价格来降低劳动者本人”。^① 这个过程是通过在劳动过程中应用新技术和科学管理原则来实现，这两方面把工作分成不同组成部分，降低工人技能，将思想与行动分离，使工作处于管理控制之下。^②

布雷弗曼认为，资本主义把广大工人简化为一个同质的群体，其中具体的工人可以互相替换，也无需专门培训。他关于退化工作（degraded work）的观点在某些情况被带入数字化时代。例如，数字化时代的计件工作越来越多，其中的脑力劳动，如研究、翻译和设计，都被分解成小任务，通过远程工作的形式，以极低的薪酬外包给为 Mechanical Turk 网站，oDesk 网站和 Microtask 网站工作的人。然而，劳动过程理论研究文化工作，特别是其中的创意环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原因之一在于劳动过程理论主要关注工作场所，关注雇佣关系中工人，而文化工人则处于这些结构之外。此外，文化工人看似不需要强迫自己完全投入工作，或者为了低工资长时间工作。^③ 最

^①Karl Marx. (1867/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 p. p. 436 - 437.

^②Harry Braverman. (1974/1998)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 49, 118.

^③Gillian Ursell. (2000) Television Production: Issues of Exploitation, Commodification and Subjectivity in UK Television Labour Market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2(6): 805 - 825.

Angela McRobbie. (2002) From Holloway to Hollywood: Happiness at Work in the New Cultural Economy? In *Cultural Economy: Cultural Analysis and Commercial Life*, edited by Paul du Gay and Michael Pryke, 97 - 114. London: Sage.

后,文化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获得了相对自主性,这一观点似乎对劳动过程理论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

迈克尔·迦南 (Michael Chanan)^① 和比尔·瑞恩 (Bill Ryan)^② 回顾了艺术和艺术实践 (artistic practice) 向文化产业商业化劳动的转变过程,二人借用马克思的观点提出了审美劳动 (aesthetic labor) 概念——这种劳动形式不同于其他商品生产,很难把作者同他们的作品完全分开。当艺术实践被纳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逻辑中,就会产生“艺术与资本的矛盾”,这是文化向资本转变过程中内在冲突的来源。^③ 从历史上看,文化商品有使用价值,这些商品必须保留原创者的痕迹,尤其是对于“特定的人”或个性化的劳动,原创者的名字与作品是联系在一起的。^④ 就像瑞恩说的,“每本书都有一位作者,每段音乐都有一个谱曲家,每部电影都有一位剧作者和导演……这与桃罐头和汽车不同……这些商品买家完全不知道它们的直接生产者是谁。艺术家必须参与实名的、具体的劳动”。^⑤ 即使是那些并不是“明星”的文化生产者也因为他们可被识别和表达的能

①Michael Chanan. (1976) *Labour Power in the British Film Industry*.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Michael Chanan. (1983) *Labour Power and Aesthetic Labour in Film and Television in Britain*. In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Liberation, Socialism*, edited by Armand Mattelart and Seth Siegelau, 317 - 33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②Bill Ryan.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③Bill Ryan.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p. 34.

④Chris Smith and Alan McKinlay. (2009)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Labour Process Analysis*.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3 - 2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 12.

Bill Ryan.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p. 136.

⑤Bill Ryan.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p. 45.

力而拥有价值，他们这些能力的可识别性和表达性是“互为因果，不可分割的”。^① 这样的文化工作者被看作是一个小圈子，在这里面借助自己的知名度就能获取高额报酬^②——他们也应该因为自己的“辨识能力和表达能力”而受到尊重，这些能力文化工作的创造过程可以分解为不同组成部分，对具体劳动的要求限制了这一观点的应用范围，因此文化工作往往能够在创意阶段（创意并生成符号）给予工人相对自主权，同时严格控制文化产品的复制、发行和流通。^③ 迦南写道，“文化形式的内容是最不可能被机械化的。”^④ 机器无法取代生产原创文本的工人，其他人如果不改变文本，也无法取代这些工人。^⑤ 这就使资本的生产过程变得复杂了。通常情况下，资本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要求把具体劳动——特定工人拥有的具体技能或任务——缩减到平均水平，这样一来，谁做这份工作就不重要了。理想情况下，个体劳动者被转化为抽象劳动：在生产中可以任意替

① Bill Ryan.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p. 44.

② David Hesmondhalgh.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nd ed. London: Sage. p. 199.

③ Michael Chanan. (1976) *Labour Power in the British Film Industry*.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Bernard Miège. (1989) *The Capit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Bill Ryan.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David Hesmondhalgh.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nd ed. London: Sage.

④ Michael Chanan. (1983) *Labour Power and Aesthetic Labour in Film and Television in Britain*. In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Liberation, Socialism*, edited by Armand Mattelart and Seth Siegel, 317 – 33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p. 318.

⑤ 表演艺术的形体本质 (embodied nature) 应该能够对这一观点做出最好的证明。正如威廉·鲍莫尔 (William Baumol) 和威廉·博文 (William Bowen) 写的，改变表演者的训练和具体情况“会影响他提供的服务”。表演者与制造业工人不同，他们“不是原材料和商品之间的中介，他们的活动本身就是消费者的商品”，因此，具体工人不能与他们的表演工作分开 (参见 William J. Baumol and William G. Bowen. 1966. *Performing Arts: The Economic Dilemma*.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p. 164)。

换，商品形式掩盖了工人的具体贡献。资本就是要区分管理和执行，把工人的专业知识和多样的技能简化为简单的劳动。^①

承认文化工人在生产中获得相对自主性的结构倾向，会使文化工作研究脱离劳动过程分析。^② 如果文化工人能够真正控制他们的劳动过程和产品，那么劳动过程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似乎不再适用。许多文化工人非常自觉，他们为了追求职业成长，“给自己安排”工作、在工资很低的情况下长时间劳动、接受工作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③ 从这个观点来看，管理者不需要激励文化工人或者提高生产力，这些工人通常会自我剥削（self-exploit）。识别出自我剥削是揭露权力运作多种方式的关键，但会掩盖真实的剥削关系，几乎让资本逃脱干系。

希拉·科恩（Sheila Cohen）指出，劳动过程理论不那么容易回避。她认为，布雷弗曼之后的劳动过程争辩过于关注对劳动过程的

① Harry Braverman. (1974/1998)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David Harvey. (2006)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Verso. p. 57.

② 以下四个研究属于例外，包括 David Murphy. (1991) Journalists and the Labour Process: White-Collar Production Workers. In *White-collar Work: The NonManual Labour Process*, edited by Chris Smith, David Knights, and Hugh Willmott, 139 – 161. London: Macmillan, Yung-Ho Im. (1997) Towards a Labour-Process History of Newswriters. *Javnost/The Public* 41(1): 31 – 48, Gillian Ursell. (2000) Television Production: Issues of Exploitation, Commodification and Subjectivity, in *UK Television Labour Market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2(6): 805 – 825 和 Chris Smith and Alan McKinlay. (2009)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Labour Process Analysis.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nlay and Chris Smith, 3 – 2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③ Angela McRobbie. (2002) From Holloway to Hollywood: Happiness at Work in the New Cultural Economy? In *Cultural Economy: Cultural Analysis and Commercial Life*, edited by Paul du Gay and Michael Pryke, London: Sage, p. 101.

Gillian Ursell. (2000) Television Production: Issues of Exploitation, Commodification and Subjectivity, in *UK Television Labour Market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2 (6): 805 – 825.

控制，而忽略了剥削的过程，这才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核心。^①“构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主要动力”不是控制，而是剥削、是生产资料所有者，还有阶级。^②她还强调，劳动过程理论关注的是稳定物价（valorization）和剥削，这是资本主义积累和生产的动力，紧密围绕在榨取工人剩余价值这一基础结构周围。说劳动过程是政治，不是因为这一过程是“不断争夺管理统治的权力斗争”，而是因为它是“剥削和获取剩余价值这一中心动态的场所”^③。这意味着，只要不妨碍剥削，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是可以放弃的。事实上，为了适应价值增殖这一资本主义的总体目标，工作不断受到调整^④，放弃对某些工人劳动过程的控制与资本积累的需求完全一致。这包括工厂车间中的赋权策略^⑤，新媒体公司营造“有趣”工作环境来捕捉工人的创造性和情感潜力，以及利用工人“自由的思想 and 冲动”提高生产力。^⑥从某种角度看，放松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是延长工作日这种古老策略的延续。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指出，面对新媒体公司有趣愉悦的办公室，“谁还愿意回家呢？”^⑦

把生产合理化还有更多、更明显的例子，文化工作就是一个典

①Sheila Cohen. (1987) A Labour Process To Nowhere? *New Left Review* 165(October): 34 - 50.

②Sheila Cohen. (1987) A Labour Process To Nowhere? *New Left Review* 165(October): 35, 66.

③Sheila Cohen. (1987) A Labour Process To Nowhere? *New Left Review* 165(October): 39.

④参见 Harry Braverman. (1974/1998)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⑤参见 Kim Moody. (1997) *Workers in a Lean World*. London: Verso.

⑥参见 Andrew Ross. (2003) *No Collar: The Human Workplace and its Hidden Cost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 19.

Nick Dyer-Witheford, and Greig de Peuter. (2009) *Games of Empire: 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⑦Andrew Ross. (2001) No-Collar Labor in America's "New Economy". *Socialist Register* 37: 78.

型。以前，人们通常认为文化工作不会把作者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合金娱乐公司（Alloy Entertainment）是为出版商提供图书项目的公司，每年针对青少年女性推出 30 本书。这个“图书工厂”^① 不寻常之处不是其为迎合大规模市场（mass-market）而采纳的公式化情节和普通修辞，而是生产每本书的劳动组织方式：会议中头脑风暴产生图书创意，一位编辑拟定故事情节，一个临时选择的作者撰写具体章节。作者与编辑密切合作，不断拓展情节、编写更多章节。合金娱乐公司向出版商出售这些章节、图书梗概和封面图片，并保留所有的知识产权。图书作者通常会用公司的笔名，而非原作者的真实姓名，有时候也会用代笔团队名称。^② 这可能是文学生产合理化的一个极端个案，但为我们展示了资本如何生产赚钱的产品，如何根据需要赋予创意工人相对自主权。根据合金娱乐公司的模式，谁来写这本特定的书并不重要。在以前，作者代表着作者名字出现的一种特权，而现在，作者是可以互相替换的，而且并不会因为他们的作品而受到尊崇往往与他们的作品脱离了。

劳动过程分析从马克思那里吸取了动态概念之后，仍然是研究文化工作的有效方法，也为研究文化工作的各种具体形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劳动过程理论关注资本积累的过程，它是一个研究的起点（critical line）：如果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已经彻底渗透到文化产业，如果剥削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基础，那么这个动态在文化工作如何体现？如果文化工人在创意阶段获得相对自主权，那么资本如何应对？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会加强对那些在生产中无需相对自主权工人的管制，这就在文化产业工人中制造出地位、工作质量

①Alana Semuels. (2008) Book Publisher Finds Teen Lit Adapts Well in Hollywood.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2.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8/aug/02/business/fi-alloy2>)

②Rebecca Mead. (2009) The Gossip Mill: Alloy, the Teen-Entertainment Factory. *The New Yorker*, October 19: 62 - 71.

和物质条件的分裂。随着技术变迁，文化工人的相对自主性进一步受到侵犯，对于自由作者来说尤其如此。他们追求享有自己作品的自主权。对自由作者的个案研究揭示了这种张力。

四、案例分析：自由作者

从表面上看，自由作者似乎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没有联系。他们在法律上被归类为独立承包商，为多个客户提供一次性的劳动成果，或者受聘参加短期项目。他们为杂志、报纸、书籍写文章，为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写材料。^① 自由作者在文化生产中的劳资关系常常被掩盖，因为自由作者并没有参与雇佣关系，也没有固定工资，看来他们只是出售一件完成的劳动成果，或者说是“已经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②，而非生产这件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但马克思认为，计件工资也是计时工资的一种形式，这种支付形式“没有改变其本质”，它就是“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一般关系”。^③ 自由作者的文化工作核心还是剥削关系。

从历史上看，计件工资是降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的一种方法。^④ 但对于文化工人来说，从事自由职业能够摆脱雇佣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自己掌握在哪里工作、何时工作、用什么工作、和谁工作，

①我研究的自由作者大多是自由记者（freelance journalists），他们为不同的报纸、杂志和在线新闻机构写文章。然而，因为单纯依靠自由记者这份工作难以维持生活，许多自由作者扩展了工作范围，为不同行业提供不同形式的服务。因此，我使用自由作者这个广义的称呼。

②Karl Marx. (1867/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 p. 692.

③Karl Marx. (1867/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 p. 693, 696.

④Karl Marx. (1867/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 p. 698.

以及如何工作。加拿大的自由作者主要在媒体行业工作，尽管这一行业能够不断盈利^①，但近三十年里他们的收入一直停滞不前，税前平均工资只有 2.4 万加元^②。我对加拿大各地 200 名自由作者的一项调查显示，2009 年 45% 的受访者通过自由写作挣得的收入不到 2 万加元（税前），这些受访者中 71% 表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自由写作。

自由撰稿一方面代表了工人的终极自由^③，另一方面也是资本的理想安排。企业由此可以不必承担雇佣员工的压力，省去了培训成本、运营费用和各种福利，也不用为非生产时间支付费用，只需要为短期项目雇佣工人或采购成品：一篇文章、一份研究或者一次设计。生产的风险和成本就落到工人身上，他们必须不停地找工作，并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因此不得不努力生产最好的作品。他们不断讨价，降低自己的劳动力成本，这样一来就为资本提供了充足的选择。这样的安排能够带来创意生产的相对自主性，但同时也推动企业探寻新的方法来追逐剩余价值。对出版商来说，媒体工作中的临时工使剥削变得更简单了，它提高了工作的竞争，降低了工人的安全感，同时也压低了工资。

马克思对计件工资的观察指出了自由职业中的矛盾：^④

①Dwayne Winseck. (2010)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Crisis of the Media": The Rise and Fall of (Some) Media Conglomerates in Canada.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5(3): 365 – 393.

②加拿大职业作家协会（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 PWAC）调查了 85 位自由撰稿人，他们大多是全职作家，这意味着写作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参见 PWAC [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 (2006) *Canadian Professional Writers Survey: A Profile of the Free-lance Writing Sector in Canada*. Toronto. <http://www.pwac.ca/files/PDF/PWACsurvey.pdf>。）

③Daniel H. Pink. (2001) *Free Agent Nation: How America's New Independent Workers are Transforming the Way We Live*. New York: Warner.

④Karl Marx. (1867/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 p. 697.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计件工资一方面给予个人以个性，以及伴随其中的自由、独立和自我控制的感觉，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因此，计件工资有一种倾向，在把个人工资提高至平均水平以上同时，降低了平均工资本身。

这体现了劳资关系的辩证性：工人不断抵制剥削，而资本不断调整来应对工人的抵抗。哈维（Harvey）写道，“如果一定程度上合理的工人自治能够更好确保工人的价值生产力（value productivity），那么就on这样吧。如何保持和加强劳动力的生产力对于资本来说很有可能是无所谓的。”^①越来越多的资本通过剥削自由作者的无偿劳动时间和他们作品的版权来提高劳动力的生产力价值。我将依次分析每一个案例。

五、临时用工和对无偿劳动时间的剥削

从传统来看，自由职业为记者提供了一种摆脱雇佣关系和常规新闻生产局限性的方法，他们能够追求更富创造性、实验性，或有趣的写作。以前，这种方法对于一小部分记者来说，是他们利用自身技能获得垄断地位，并建立自由职业生涯的一种策略。然而在今天，随着媒体工人被临时雇佣，这已经成为一种核心商业模式。公司将更多的商业风险和成本转嫁到工人身上，尽管他们的工资很低，却进一步削弱了他们享有的自主权。

目前已有许多关于就业形式不稳定的文献研究。^②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向新自由主义转型，及其引起的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工作和

^①David Harvey. (2006)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Verso. p. 116.

^②比如 Leah F. Vosko. (2010) *Managing the Margins: Gender, Citizenship,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Precarious Employ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和 Standing, Guy.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就业调整^①，文化产业的雇佣关系从全职、稳定的形式向多种不稳定的形式转变，包括兼职、短工、临时工、合同工和自由职业者。^②其特点是工资低、没有福利、缺乏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会保护受限，以及工作时间长。文化行业已经开始临时用工制了，从“内部的、规范的劳动力市场”转化到依靠个人网络提供专业化的按需服务。^③这些变化都与公司策略有关，包括集约（concentration）、分散（convergence）、外包、工会力量削弱，以及临时用工形式的接受和扩展。全球劳动分工的调整也促进了这一变化，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灵活积累的链条。这个链条始于将生产中部分工作外包给世界上工资较低的地区，现在这些外包工作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知识、有信息和文化工人的家庭联系在一起。^④虽

①参见 Leah F. Vosko. (2000) *Temporary Work: The Gendered Rise of a Precarious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和 Gregory Albo. (2010) The “New Economy” and Capitalism Today. In *Interrogating the New Economy: Restructuring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Norene J. Pupo and Mark P. Thoma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 p. 3 – 20.

②参见 Graham Murdock. (2003) Back To Work: Cultural Labor in Altered Times. In *Cultural Work: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edited by Andrew Beck. London: Routledge. p. p. 15 – 36.

Gerd Nies and Roberto Pedersini. (2003) Freelance Journalists in the European Media Industry. *European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http://www.ifj-europe.org/pdfs/FinalReport-Freelance.pdf>.

Emma Walters, Christopher Warren, and Mike Dobbie. (2006)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 A Global Survey and Case Study of Atypical Work in the Media Industry.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http://www.ifj.org/pdfs/ILOReport070606.pdf>.

Chris Smith and Alan McKinlay. (2009)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Labour Process Analysis.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 p. 3 – 28.

③参见 Chris Smith and Alan McKinlay. (2009) Creative Labour: Content, Contract and Control.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 29 和 Kelly Hill and Kathleen Capriotti. (2009) *A Statistical Profile of Artists in Canada*. Hill Strategies Research Inc., February.

④Ursula Huws. (2007) Defragmenting: Towards a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Global Division of Labour.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 1(2): 1 – 4.

然文化行业在历史上曾有过非标准化工作形式^①，但接受自由职业者、合同工或临时工已经不再是一种选择，因为企业缩减用工，使劳动力市场充满大量自由职业者。^②文化产业不会长期雇佣工人，而是与文化生产者保持松弛的关系，了解他们的想法，这样企业可以轻松地挑选。

这些文化工人“后备军”（reserve army）^③缓解了文化企业的金融风险，因为风险被转移到个人。因为生产的创意阶段无法完全理性化，公司通过合同和自由职业者的地位，以相对自主性换取更高的价值，降低资本风险，减少劳动力成本，强化工作竞争。^④这些项目制的工作、短期合同和灵活的工作安排显示出文化工作的一些根

①的确，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文化产业通常被认为是灵活的、以项目为基础的工作模式的典范。参见 Andrew Ross. (2009)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 Life and Labor in Precarious Ti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 p. 18 - 19 和 Angela McRobbie. (2004) “Everyone Is Creative”: Artists as Pioneers of the new Economy?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in Everyday Life*, edited by Tony Bennett and Elizabeth Silva. Durham, UK: Sociology-press. p. p. 186 - 202.

②参见 Gerd Nies and Roberto Pedersini. (2003) *Freelance Journalists in the European Media Industry*. *European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http://www.ifj-europe.org/pdfs/Final-ReportFreelance.pdf>.

PWAC [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 (2006) *Canadian Professional Writers Survey: A Profile of the Freelance Writing Sector in Canada*. Toronto. <http://www.pwac.ca/files/PDF/PWACsurvey.pdf>.

Emma Walters, Christopher Warren, and Mike Dobbie. (2006)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 A Global Survey and Case Study of Atypical Work in the Media Industry*.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http://www.ifj.org/pdfs/ILOReport070606.pdf>.

③Graham Murdock. (2003) *Back To Work: Cultural Labor in Altered Times*. In *Cultural Work: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edited by Andrew Beck. London: Routledge. p. 22.

④Bill Ryan.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p. 48.

David Hesmondhalgh.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nd ed. London: Sage.

Chris Smith and Alan McKinlay. (2009) *Creative Labour: Content, Contract and Control*.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 40.

本矛盾：这些关系给予工人生产创意作品所需的相对自主性和灵活性，而企业可以由此免去支付工资和劳动保障方面的福利。自主性的益处被这种不确定性破坏了。这种安排尽管源于政治经济动态，但却造成这样一种观念：要想成为文化工人，必须接受并适应间歇式的工作、低工资和不确定性，这样一来，“为艺术而煎熬”的浪漫想法不复存在，转而艺术成为工业化、高度资本化的文化产业。^①

计件工人和自由作者通常按文章或者按字数计算费用（或像那种不幸的玩笑说的，“也许”是这样）。^② 出版商向自由作者购买成品的故事，而对于开发和研究思路、设计故事情节和访谈所需的时间，以及编辑和改写的时间，他们都不支付费用。按字数任意付费的方式对于杂志和报纸很流行，但这种方式掩盖了撰写这些文字所需要的大量劳动。一位自由作者曾提到：“支付的费用往往并不等于你的工作。他们希望你出思想、做研究，却不给你钱。当你的故事被采纳，你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补偿。”除此之外，自由作者还要保护自己的作品、自我提升、培训和提高技能，开发票和追账，以及从事其他维护职业生涯的各种任务。正如我在下面讨论，只要写出一篇文章，公司再生产的成本是最小的，但这些作品以不同形式被多次使用后，作者往往无法获得支付，或者说“文章中依然隐含了劳动力”。^③

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无偿劳动是资本的剩余价值之来源，是

① Pierre-Michel Menger. (1999) Artistic Labor Markets and Career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 541 – 574.

Andrew Ross. (2000) The Mental Labor Problem. *Social Text* 18 (2): 1 – 31.

② 参见 Paul William Kingston and Jonathan R. Cole. (1986) *The Wages Of Writing: Per Word, Per Piece, or Perhap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对于企业和非新闻的合同，自由职业者通常是按时间支付薪酬。

③ Guiseppina D' Agostino. (2010) *Copyright, Contracts, Creators: New Media, New Rul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 238.

资本家对劳动力的剥削。^① 由于劳动力被临时工化，剥削蔓延到整个文化产业。这让越来越多的工人同时做多份工作来维持生计，他们挣得的工资就远远低于生产作品所需要的时间。这些过剩的自由职业者和失业者（un-employed）、未充分就业者（under-employed）对于公司来说有巨大价值，因为激烈的竞争压低了工资。另一方面，空间化进程，或者说扩展到新空间的价值剥削，带来了新的剥削形式。对于自由作者来说，他们的住所是这种新空间^②。媒体公司进一步把这种安排资本化，建立起依靠灵活、低廉或者免费劳动力的新商业模式，他们不必雇佣这些劳动力。例如，企业雇佣免费实习生代替付费工人（paid workers）；作者拿到的稿酬由其作品在《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这类盈利网站转载的概率决定；职业记者纷纷被解雇，因为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这样的主流新闻机构越来越依赖于自愿提交的内容；或者大量使用“众包”（crowdsourcing）^③

①女权主义者和政治经济学家曾长期争论，无偿劳动时间，特别是妇女在家庭中的无偿劳动，对资本主义非常重要。参见 Marilyn Waring. (1999) *Counting For Nothing: What Men Value and What Women Are Worth*, 2nd e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和 Dalla Costa, Mariarosa, and Selma James. (1972)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Bristol: The Falling Wall Press. 麦克彻（McKercher）在妇女的无偿家务劳动和自由写作不稳定的工作之间做出了重要联系，参见 Catherine McKercher. (2009) *Writing on the Margins: Precarity and the Freelance Journalist*. *Feminist Media Studies* 9 (3): 370–374。

②参见 Vincent Mosco.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2nd ed. London: Sage。

③“众包”是互联网带来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最早由在美国《连线》（*Wired*）杂志记者杰夫·豪（Jeff Howe）在2006年首次提出。它是指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众包的任务通常是由个人来承担，但如果涉及到需要多人协作完成的任务，也有可能以依靠开源的个体生产的形式出现。——译者注

形式的“公民”记者。^①对版权的剥削补充了这些战略。

六、对版权的剥削

在数字化时代，自由作者的生计建立在脆弱的版权保护之上，公司对知识产权的严格控制正在侵蚀版权保护。普通工人放弃其产品的所有权，换取工资^②，自由作者则与之不同。他们在加拿大的法律上被列为独立承包商，对自己写的文章享有著作权；出版社只能获得有限许可，只能在指定时间指定刊物上发表。^③传统上，这是自由职业的一个福利，他们能够重复出售自己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低工资。^④然而，这一传统做法现在受到了新技术和激进出版方式的冲击和破坏。

^①参见 Ross Perlin. (2011) *Intern Nation: How to Earn Nothing and Learn Little in the Brave New Economy*. London: Verso. triple-C 10(2): 141 – 155.

Marissa Guthrie. (2011) CNN Cuts 50 Staff Members. *The Hollywood Reporter*, November 11.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news/cnn-cuts-50-staff-members-260737>.

Farooq A. Kperogi. (2011) Cooperation with the Corporation? CNN and the Hegemonic Cooptation of Citizen Journalism Through iReport. *New Media & Society* 13 (2): 314 – 329.

^②Giuseppina D' Agostino. (2010) *Copyright, Contracts, Creators: New Media, New Rul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 4.

^③参见 Canada. (1985) *Copyright Act*. Department of Justice. S. 13. Accessed May 16, 2012.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C-42>.

Giuseppina D' Agostino. (2004) Should Freelancers Keep Their Copyrights in the Digital Era? *Copyright & New Media Law Newsletter* 8 (4). p. 6.

^④参见 John Lorinc. (2005) *Creators and Copyright in Canada.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Creators in Quebec and Canada*. Report prepared for Creators' Copyright Coalition and Droit d' auteur / Multimédia-Internet / Copyright. p. 37. Accessed May 16, 2012. www.creatorscopyright.ca/documents/lorinc-beaulieu.html.

PWAC [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 (2006) *Canadian Professional Writers Survey: A Profile of the Freelance Writing Sector in Canada*. p. 41. Toronto. <http://www.pwac.ca/files/PDF/PWACsurvey.pdf>.

过去几十年里，信息技术，尤其是数字通信和数字化技术的进步，促使媒体公司和娱乐公司不断壮大和联合，并为媒体内容提供了一种通用的语言，加速了不同媒体平台的融合，同时也加深了企业对劳动力的剥削。^① 数字化使信息能够快速传递，信息复制也变得更加简单，尤其是在网络上，这意味着出版商可以把信息重新包装后，以多种形式发布。

加拿大的大多数期刊和报纸都隶属于几个大型连锁传媒机构，这些机构控制了一批整合媒体资产（integrated media property），他们热衷于搜寻能够在不同平台多次包装利用的信息。数字化帮助企业实现了集约（concentration）和融合的愿望，获取版权助长了这一过程，反过来又加剧了企业对版权的获取。^② 媒体机构的这些快速变化，直接影响了自由作者的收入，挤压了他们能够重新销售文章的市场。^③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些做法越来越普遍。罗杰斯传媒公司（Rogers Media）是媒体巨头罗杰斯通信公司（Rogers Communication）的一个子公司，该公司2010年秋季开始，在不告知原作者的情况下，把自由作者为本公司杂志撰写的文章联合发布（syndicate）到其他网站，却没有向原作者支付费用。^④ 同样是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罗杰斯数字传媒公司（Rogers Digital Media）的高管们开始把联

①Vincent Mosco. (2003)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Canada*. In *Changing Canada: Political Economy as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Wallace Clement and Leah F. Vosko, 287–308.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②Guiseppeina D' Agostino. (2010) *Copyright, Contracts, Creators: New Media, New Rul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 20.

③PWAC [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 (2006) *Canadian Professional Writers Survey: A Profile of the Freelance Writing Sector in Canada*. p. 35. Toronto. <http://www.pwac.ca/files/PDF/PWACsurvey.pdf>.

④D. B. Scott. (2010) *Rogers Syndication Practices Called Into Question by Canadian Writers Group*. *Canadian Magazines*. October 2. <http://canadianmags.blogspot.com/2010/10/rogers-syndiction-practices-called-into.html>.

合发布作为公司的一项新措施，促进广告商阅读内容。公司表示，联合发布属于罗杰斯新合同的“推广”（promotions）条款范围内，所有作者都必须签署这一合同，它规定公司“有权在各种媒体形式推广自己的出版物和/或品牌时发布签约作者的任何作品和/或编辑过的版本”。^①然而，作家组织则称这种对合同解释太宽泛，比如自由作家代理人德雷克·芬克（Derek Finkle）说：“多数作者不会把‘推广’理解为他们的作品首次刊登在罗杰斯出版物数月后，还会（在网站）联合发布。”^②

该个案显示，出版商越来越想完全占有作者的版权，他们的作品“通过廉价的数字循环利用”能够带来新的利润。^③这种策略与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解释^④是一致的：工人挣得足够支付他们再生产的收入之后，资本家占有了她生产的价值的剩余部分，“对资本家来说，新创造出来的价值”。多数大型出版商现在都与作者签署“精简”（streamlined）合同，合同规定所有作品的版权都是一次性的。^⑤合同要求公司拥有作品的所有版权，也就是可以在未来以任何形式利用作品，这些任何形式包括他们还没有想出来的可能的媒介形式。

^①D. B. Scott. (2010) Rogers Syndication Practices Called Into Question by Canadian Writers Group. *Canadian Magazines*. October 2. <http://canadianmags.blogspot.com/2010/10/rogers-syndication-practices-called-into.html>. Story Board. (2010) Rogers Refuses to Remove Writer's Work from Yahoo. *Story Board*. November 30. <http://www.thestoryboard.ca/?p=142>.

^②D. B. Scott. (2010) Rogers Syndication Practices Called Into Question by Canadian Writers Group. *Canadian Magazines*. October 2. <http://canadianmags.blogspot.com/2010/10/rogers-syndication-practices-called-into.html>.

^③Guisepina D' Agostino. (2010) *Copyright, Contracts, Creators: New Media, New Rul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 239.

^④Karl Marx. (1867/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London: Penguin Books. p. 325.

^⑤Guisepina D' Agostino. (2005) Freelance Authors For Free: Globalisation of Publishing, Convergence of Copyright Contracts and Divergence of Judicial Reasoning. In *New Directions in Copyright Law*, edited by Fiona Macmillan, 1: 166-215.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 166.

这些合同通常是硬性的 (non-negotiable), 公司也不会为这些额外的权利支付费用。^① 根据公司及其传媒所拥有的不同股份 (media holdings), 这些权利可能包括翻译、数字化、改编和表演、重印、再次授权、促销, 以及存储在电子数据库中。

目前的合同体系能够无限扩大对剩余价值的剥削。^② 在经济学家看来, 版权是鼓励创作者生产智力和艺术作品最主要的经济激励形式。^③ 然而, 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来说, 版权的主要功能是确保其拥有者独自享有剥削工人作品、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权力, 他们在生产过程中获得了相对自主性。工人提供一次性的服务, 企业不关注他们如何创作, 因为真正的价值在于不断剥削已经完成的作品。一位自由作者说: “只要我完成工作, 没有人关心我在哪里。” 企业关心的不是完成一个项目所需的时间和步骤, 即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而是最终成品的所有权。这些最终成品可以重新发布、重新授权、重新利用, 产生剩余价值, 降低劳动成本。

资本主义通过生产榨取工人知识的技术而发展, 资本主义以此来控制生产, 提高效率, 扩大剥削^④, 并继续以这种方式占有工人生产的信息。^⑤ 文化工作和资本之间的这个联系十分关键, 但却很少有

①PWAC [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 (2006) *Canadian Professional Writers Survey: A Profile of the Freelance Writing Sector in Canada*. p. 35. Toronto. <http://www.pwac.ca/files/PDF/PWACsurvey.pdf>.

②Guiseppeina D' Agostino. (2010) *Copyright, Contracts, Creators: New Media, New Rul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 241.

③Ronald V. Bettig. (1996) *Copyrighting Cultu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p. 7.

Ruth Towse. (2003) Copyright Policy, Cultural Policy and Support for Artists. In *The Economics of Copyright*, edited by Wendy J. Gordon and Richar Watt, 66 - 80.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④Harry Braverman. (1974/1998)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⑤Christopher May. (200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xim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Global Division of Information Labour. *New Political Economy* 7(3) . p. 318.

人研究, 它被以下两点掩盖了: 一是单独关注文化工人的自主权, 二是没有看到被转化为私有财产的文本、图像、观念和符号是由劳动创造的。^①

版权在加拿大等国已经成为斗争的前沿阵地。在北美, 自由记者赢得了针对出版商的集团诉讼 (class action lawsuit), 这些出版商私自使用这些记者的作品, 却没有支付稿酬。^② 2007 至 2008 年间, 电影和电视剧作家罢工三个月, 以为了赢得在 DVD 的销售和下载收入中拥有更大份额的剩余收益 (residual money)。^③ 自由摄影师通过许可协议, 有效推迟了《人物》(People) 杂志 iPad 版的发布, 摄影师要求如果他们的照片在杂志以外的页面使用时需要支付费用。^④ 像合金娱乐公司和五呎深处公司 (Full Fathom Five)^⑤ 这样的出版商转换了作家和出版商之间的版权关系, 他们提前设计好故事情节, 再

①Ned Rossiter. (2006) *Organized Networks: Media Theory, Creative Labour, New Institutions*. Rotterdam: NAi Publishers. p. 145.

②Guiseppeina D' Agostino. (2010) *Copyright, Contracts, Creators: New Media, New Rul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③Kevin Klowden and Anusuya Chatterjee. (2009) *Writers' Strike of 2007 - 2008 The Economic Impact of Digital Distribution*. Santa Monica, CA: Milken Institute.

④Andrew Wallenstein. (2010) *People Magazine iPad App Delayed by Paparazzi*. *The Hollywood Reporter*. Accessed October 14, 2010.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news/exclusive-people-magazine-ipad-app-26788>.

⑤弗雷 (James Frey) 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作家, 他成立了五呎深处公司, 进军商业青年小说市场 (commercial young adult fiction market)。弗雷雇佣应届 (和负债的) 美术硕士 (MFA) 毕业生编写小说, 每部作品支付作者 250 美元 (一些作者完成后还能再多得 250 美元)。这些作者可以按一定比例从图书的所有收入中提成 (如果选题来自弗雷, 作者能够获得 30%; 如果来自作者本人, 他们能够获得 40%), 包括从电视、电影和商品特许经营中获得的收入。作者不享有这些图书的版权, 但需要对任何潜在的法律诉讼 (legal action) 负责。即使作者不再参与该项目, 五呎深处公司依然有权决定是使用作者的姓名还是化名。作者对于公开使用他的照片和简介没有发言权, 他们必须签署一份保密协议, 如果“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承认为五呎深处公司工作”, 将会受到 50000 美元的罚款。对弗雷来说, 设计这些项目版权的条款是不可谈判的。参见 Suzanne Mozes. (2010) *James Frey's Fiction Factory*. *New York*, November 12. <http://nymag.com/arts/books/features/69474>。

雇佣作者以公司名义编写，并保留作品的所有权，一方面可以通过协议将这些故事出售给电影和电视，另一方面又能通过合同防止作者对著作权的索取。^① 随着数字化时代进一步发展，这些斗争将变得更加紧张和激烈。

七、结论：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工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文化工作的研究能够理出工作条件的不稳定性和在文化产业正在进行的广泛变革二者之间的联系，同时把工人当作能够与自身劳动条件抵抗、斗争和谈判的有主体性的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建立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过程基本认识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它，我们就无法认清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新、旧表现形式，尤其是当传统的劳动被转换为临时雇佣，以及数字技术被用于变革生产方式之后。正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很善于把剥削隐藏于交换过程背后，在这方面它是独一无二的”^②。充分理解文化工作的关键是探寻剥削如何影响工作和工人的生活。

在上面讲到的自由作者这个案例中，剥削是理解临时用工和疯狂追求版权的核心。对自由作者来说，他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既换来了更灵活的雇佣形式，但同时也使得他们工作得更卖命，工作时间更长，工资更低，因为资本家要更大程度地榨取他们的剩余价

^①Suzanne Mozes. (2010) James Frey's Fiction Factory. *New York*, November 12. <http://nymag.com/arts/books/features/69474>.

^②Susan Himmelwit. (1983) Exploitation. In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edited by Tom Bottomore, Laurence Harris, V. G. Kiernan and Ralph Milib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158.

值。^① 虽然市场早就并长期影响作者们出售的产品^②, 但当出版商物色可以在多平台联合发布的“内容”时, 这种市场压力进一步加剧。这些出版新实践限制了作者生产某些作品的可能性, 包括那些需要研究、新闻调查, 以及创造性或挑战性等需要长时间投入的作品。加拿大自由作者的经历体现了这些限制。我调查的作者中, 一半以上最喜欢写长篇叙事特写、创作型纪实作品、散文和调查新闻报道。然而, 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撰写这类题材的作品, 这类作品也很少能够获得足够的报酬。另一份报告指出, 自由作者最想写的作品和写得最多的作品之间存在差异: 他们最想把稿子投向期刊、图书和杂志, 但写得最多却是为企业客户和杂志短文这些能够快速完成的作品。^③ 正如一位作者所说, “我的职业生涯建立在‘服务’新闻产业(‘service’ journalism industry)上。它为我买单, 帮助我建立声誉, 提升技能。但其实我更想写一些更有意义、同具体事件相关的文章。我写过一些, 但这些我真正引以为豪的作品只有三四个人愿意购买”。对于自由作者来说, 最早促使他们走上自由职业这条路的是新闻工作, 而今天, 这已经成为只有时间和金钱允许才能享用的奢侈品。这些问题对相对自主性的概念提出了挑战。

马克思剥削概念的核心是对抗, 资本主义生产在“本质上和结

^①PWAC(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 (2006) *Canadian Professional Writers Survey: A Profile of the Freelance Writing Sector in Canada*. Toronto. <http://www.pwac.ca/files/PDF/PWACsurvey.pdf>.

^②C. Wright Mills. (1956)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ul William Kingston and Jonathan R. Cole. (1986) *The Wages Of Writing: Per Word, Per Piece, or Perhap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③PWAC(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 (2006) *Canadian Professional Writers Survey: A Profile of the Freelance Writing Sector in Canada*. Toronto. <http://www.pwac.ca/files/PDF/PWACsurvey.pdf>.

构上是充满斗争的场所”^①，因此把文化工作当作斗争的场所非常有用^②，一些文化工作研究也认可这一概念。文化工作中的斗争表现为“创意自主性的艺术欲望”和以利润为导向的文化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③也有一些更宽泛的观点认为，这场斗争是以劳动为重点，是对劳动力商品化和剥削的论争。马克思理论中的自主论理论很有用，它的理论起点是工人积极抵制资本主义剥削和围攻，工人的抵抗通常让其有希望摆脱资本的控制，但是资本也会对工人的抵抗做出应对——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又能产生与资本生产斗争的新战略和战术，进一步威胁资本主义。^④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不断延伸，工人开始寻找有意义的和自主形式的工作。自主论认为，向灵活工作的转变部分是工人自己推动的。例如，格雷格·德·普特（Greig de Peuter）在他的“不稳定劳动角色”（precarious labor personas）模式中，发现了当代资本主义下不稳定性的空间，他认为，“自主工作者”，特别是自由职业的文化工人，一方面是迫于“自上的制度对灵

①Mike Wayne. (2003) *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 Key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London: Pluto.

②另外参见 Lee Artz. (2006) On The Material and The Dialectic: Toward a Class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In *Marx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edited by Lee Artz, Steve Macek, and Dana L. Cloud, 5 - 51. New York: Peter Lang.

③Mark Banks. (2007)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Wor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 6.
Bill Ryan.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④Harry Cleaver. (2000)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Leeds and Edinburgh: Anti/Theses and AK Press.

Enda Brophy and Greig de Peuter. (2007) Immaterial Labor, Precarity and Recomposition. In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dited by Catherine McKercher and Vincent Mosco, 191 - 207. Lanham, MD: Lexington.

活性的需求”,但同时也渴望这种类型的劳动安排。^①他写道,“从系谱学角度看,自治工人无处不在,在非物质生产(immaterial production)过程中,追求弹性工作既是出于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也是出于对标准化工作的有意排斥。”^②

从这个角度考量自由作者是很有意义的。新闻行业在19世纪末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化生产产业(mass industry),记者随之被无产阶级化,或者被纳入雇佣劳动制度,这一制度将新闻报道这一劳动(labor of reporting)标准化了。^③为应对大众读者需求而引入的公式化新闻写作,对记者的独立性提出挑战,也降低了写作的艺术性。^④记者通过工会组织获得专业地位,但他们却因为匿名、工资依赖性和乏味的工作条件而变得颓丧。^⑤自由职业帮助记者摆脱沦落为“无产阶级白领”(a white collar of proletariat)的局面^⑥或者在新闻编辑室消磨时光。虽然现在自由职业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再是一种选择,但很多自由职业者都保留了这种精神,他们寻求自主性,开展有趣

①同时参见 Andrew Ross. (2009)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 Life and Labor in Precarious Ti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Leah F. Vosko. (2010) *Managing the Margins: Gender, Citizenship,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Precarious Employ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avid Hesmondhalgh and Sarah Baker. (2011) *Creative Labour: Media Work in Three Cultural Industries*. London: Routledge.

②Greig de Peuter. (2011) Creative Economy and Labor Precarity: A Contested Con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5(4): 419 - 420.

③Smythe, Ted Curtis. (1980) The Reporter, 1880 - 1900: Working Condi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News. *Journalism History* 7(1): 1 - 10.

④James W. Carey. (1963)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 In *The Sociology of Mass Media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Paul Halmos, 23 - 38. Keele: University of Keele.

⑤Smythe, Ted Curtis. (1980) The Reporter, 1880 - 1900: Working Condi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News. *Journalism History* 7(1): 1 - 10.

⑥Arthur J. Kaul. (1986) The Proletarian Journalist: A Critique of Professionalism.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2): 47.

的和创造性的劳动，这些劳动具有灵活性以及对自己劳动力商品化的掌控。自由职业也代表了一种更加政治化的工作概念，同时也提出应该如何组织工作这个问题，暗示存在“拒绝工作”的激进概念和摆脱工资关系（wage relation）。正如安德鲁·贝克（Andrew Beck）^①指出，自由文化工作既是“边缘的劳动”也是能够抵抗资本主义的最后场所。^②

自由职业者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因为我们看到媒体行业不断把工作外包，国家憧憬在充满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的城市中满是个体工人，联合办公（co-working spaces）模式的扩张吸纳更多不需办公场所（office-less）工人，以及不会有工作不被完成的情况。^③然而，他们的工资普遍较低，收入也不稳定，并经历着日益加剧的不稳定性。这些情况表明，为了应对工人的抵抗，资本调整了策略，继续剥削这些看似摆脱工资关系的工人，这是劳资对抗的延续。

斗争进入了新层面，工人们开始集体组织起来，应对和抵抗工作中的不稳定性。除了在电影和电视行业建立工会，那些通常被认为是非劳动场所的行业，如模特行业、艺术行业和写作行业，也开始识别

^①Andrew Beck. (2003) Introduction: Cultural Work, Cultural Workplace-Looking at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Cultural Work: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edited by Andrew Beck, 1 - 6. London: Routledge.

^②《新探索》（*The New Inquiry*）主编在杂志中讨论不确定性的文章中指出，“我们许多人都在兼顾两个半工作，我们都知道一个单独的无望的职业生涯之唯一的不好事情。”参见 *The New Inquiry* 2012。

^③Sara Horowitz. (2011) The Freelance Surge I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Our Time. *The Atlantic*, September 13.

<http://www.fashionmagazine.com/blogs/society/2012/01/13/snps-word-of-the-day-precariat>.

Guy Standing.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de Peuter, Greig. (2011) Creative Economy and Labor Precarity: A Contested Con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5 (4): 417 - 425. <http://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1/09/the-freelance-surge-is-the-industrial-revolution-of-our-time/244229>.

和挑战针对他们的剥削。一系列行业中的文化工人, 接受了源于欧洲社会和抗议运动的“无产阶级”(precariat) 这个词语, 重申他们的工人地位。^① 加拿大的自由作者在历史上曾组织过专业协会, 现在再次回归工会, 共同要求提高工资, 并声讨带有剥削性的合同。^② 美国的全国作家联盟(National Writers Union) 组织“支付作者稿酬”活动, 对互联网免费劳动力提出抗议, 并为网络自由记者设定合理的工资范围。加拿大艺术家联盟(Canadian Artists' Representation/le Front des Artistes Canadiens, CARFAC) 代表加拿大的视觉艺术家(visual artists), 要求当他们的作品进行二次销售时, 需要支付费用, 因为他们的劳动力融在了作品中, 而作品为卖家带来了剩余价值。^③ 在加拿大艺术家联盟的基础上, 纽约市的艺术家组成了“更佳经济境遇下创作之艺术家”(Working Artists in the Greater Economy, W. A. G. E.) 组织, 要求当他们的作品在画廊展示时, 需要为其中的劳动支付费用。同样在纽约, 模特联盟(The Model Alliance) 组成, 他们要求把模特当作一种工作, 并向那些支持模特“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④ 的

①Prickett, Sarah Nicole. (2010) SNP's Word of the Day: Precariat. *Fashion*. January 13. <http://www.fashionmagazine.com/blogs/society/2012/01/13/snps-word-of-the-day-precariat>.

Guy Standing.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de Peuter, Greig. (2011) Creative Economy and Labor Precarity: A Contested Con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5 (4): 417 - 425.

②Nicole S Cohen. (2011) Negotiating Writers' Rights: Freelance Cultural Labour and the Challenge of Organizing. *Just Labour: A Canadian Journal of Work and Society* 17 & 18: 119 - 138.

③CBC News. (2011) Visual Artists Vie for a Cut of Resale Profits. *CBC News*. November 28, 2011. <http://www.cbc.ca/news/business/story/2011/11/28/art-resale-right-carfac-auction-gallery.html>.

④指以身体或虚拟形态进行的, 生产或者调整情感的劳动, 参见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293. ——译者注

剥削关系提出挑战。^① 这些运动的关键是文化工人要求署名，并应对针对他们的剥削。

文化工人开始集体组织起来的力量，对关心工人运动革新（labour movement renewal）的人具有重要意义。这些人试图通过实验组（experimental formation）的形式，把那些无组织的人组织起来。这些实验组可以作为在灵活的经济体系中组织不稳定工人的“测试案例”（test cases）。^② 通过与工会建立联盟或组织工会以外的力量，他们提高了劳工工人对行业中存在的劳工斗争和权力关系的警觉性。这些工作的核心并非要回归标准就业形式，而是对政策改变决和，以及可以在任何特定工作场所以外建立工人权力的诉求，对把非标准化工作重新列为自主、灵活的且安全的工作的诉求。^③ 但是，这些努力是否能够支持劳工运动，并将文化工人政治化，这些组织是否可以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加强文化工作的个人主义和企业家精神，还有待继续观察。^④ 但这些努力表明一切正在改变，这对于劳动力政治和文化生产的方式有重要意义。

越来越多的文化工人开始组织游行示威，理解削弱文化工作自

① Greig de Peuter. (2012) Modelling Workers' Rights. *Shameless*. <http://www.shamelessmag.com/stories/2012/04/modelling-workers-rights>.

② Greig de Peuter. (2010) Creative Economy Contested: Notes on Precarious Labour Politics in New York City. Paper presented at Are We All Cultural Workers Now? Getting By In *Precarious Times*, Centre for Cultur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November 25 – 26.

③ 参见 Greig de Peuter. (2011) Creative Economy and Labor Precarity: A Contested Con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5(4): 417 – 425.

Leah F. Vosko. (2010) *Managing the Margins: Gender, Citizenship,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Precarious Employ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④ 参见 Atossa Araxia Abrahamian. (2012) The “I” in Union. *Dissent*. Accessed May 16, 2012. <http://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article=4094>

Nicole S. Cohen. (2011) Negotiating Writers' Rights: Freelance Cultural Labour and the Challenge of Organizing. *Just Labour: A Canadian Journal of Work and Society* 17 & 18: 119 – 138.

主权, 进而破坏文化工作的剥削过程, 实践和社会关系因此变得重要起来。仍有不少文化工人对未来抱着必然性和自我负责的想法, 打破他们的这些观念是否必要和紧迫, 而这需要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这种研究视角把物质条件视为“始终活跃、始终不稳定, 总是改变”的。^① 简单讲, 就是马克思那句最著名的话, 重要的不只是解释世界, 而是改变世界。^②

参考文献:

Abrahamian, Atossa Araxia. 2012. The “I” in Union. *Dissent*. Accessed May 16, 2012.

<http://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article=4094>

Albo, Gregory. 2010. The “New Economy” and Capitalism Today. In *Interrogating The New Economy: Restructuring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Norene J. Pupo and Mark p. Thomas, 3 – 2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Artz, Lee. 2006. On The Material and The Dialectic: Toward a Class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In *Marx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edited by Lee Artz, Steve Macek, and Dana L. Cloud, 5 – 51. New York: Peter Lang.

Banks, Mark. 2007.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Wor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Banks, Mark. 2010. Autonomy Guaranteed? Cultural Work and the “Art-Commerce Relation”. *Journal for Cultural Research*, 14(3): 251 – 269.

Baumol, William J., and William G. Bowen. 1966. *Performing Arts: The Economic Dilemma*.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Beck, Andrew. 2003. Introduction: Cultural Work, Cultural Workplace-Looking at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Cultural Work: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edited

①Lee Artz. (2006) On The Material and The Dialectic: Toward a Class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In *Marx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edited by Lee Artz, Steve Macek, and Dana L. Cloud, 5 – 51. New York: Peter Lang.

②Karl Marx. (1888/1978) Theses on Feuerbach.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143 – 145. New York: Norton.

by Andrew Beck, 1 – 6. London: Routledge.

Bettig, Ronald V. 1996. *Copyrighting Cultu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Braverman, Harry. (1974) 1998.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rophy, Enda, and Greig de Peuter. 2007. Immaterial Labor, Precarity and Recomposition. In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dited by Catherine McKercher and Vincent Mosco, 191 – 207. Lanham, MD: Lexington.

Canada. 1985. Copyright Act. Department of Justice. Accessed May 16, 2012.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C-42>.

Carey, James W. 1963.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 In *The Sociology of Mass Media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Paul Halmos, 23 – 38. Keele: University of Keele.

Caves, Richard E. 2000. *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acts between Art and Commer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BC News. 2011. Visual Artists Vie for a Cut of Resale Profits. *CBC News*. November 28, 2011.

<http://www.cbc.ca/news/business/story/2011/11/28/art-resale-right-carfac-auction-gallery.html>

Chanan, Michael. 1976. *Labour Power in the British Film Industry*.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Chanan, Michael. 1983. Labour Power and Aesthetic Labour in Film and Television in Britain. In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Liberation, Socialism*, edited by Armand Mattelart and Seth Siegelaub, 317 – 33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Christopherson, Susan. 2009.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Economy: Risk, Adapta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Exclusionary Networks.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72 – 9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Cleaver, Harry. 2000.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Leeds and Edinburgh: Anti/The-

ses and AK Press.

Cohen, Nicole S. 2011. Negotiating Writers' Rights: Freelance Cultural Labour and the Challenge of Organizing. *Just Labour: A Canadian Journal of Work and Society* 17 & 18: 119 – 138.

Cohen, Sheila. 1987. A Labour Process To Nowhere? *New Left Review* 165 (October): 34 – 50.

Conor, Bridget. 2010. "Everybody's a Writer" Theorizing Screenwriting as Creative Labour. *Journal of Screenwriting* 1(1): 27 – 43.

D' Agostino, Giuseppina. 2004. Should Freelancers Keep Their Copyrights in the Digital Era? *Copyright & New Media Law Newsletter* 8(4): 6 – 8.

D' Agostino, Giuseppina. 2005. Freelance Authors For Free: Globalisation of Publishing, Convergence of Copyright Contracts and Divergence of Judicial Reasoning. In *New Directions in Copyright Law, edited by Fiona Macmillan*, 1: 166215.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D' Agostino, Giuseppina. 2010. *Copyright, Contracts, Creators: New Media, New Rul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Dalla Costa, Mariarosa, and Selma James. 1972.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Bristol: The Falling Wall Press.

de Peuter, Greig. 2010. Creative Economy Contested: Notes on Precarious Labour Politics in New York City. Paper presented at Are We All Cultural Workers Now? Getting By In *Precarious Times*, Centre for Cultur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November 25 – 26.

de Peuter, Greig. 2011. Creative Economy and Labor Precarity: A Contested Con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5(4): 417 – 425.

de Peuter, Greig. 2012. Modelling Workers' Rights. *Shameless*.

<http://www.shamelessmag.com/stories/2012/04/modelling-workers-rights>

Deuze, Mark. 2007. *Media Work*. London: Polity.

Deuze, Mark, and Leopoldina Fortunati. 2011. Atypical Newswork, Atypical Media Management. In *Managing Media Work*, edited by Mark Deuze, 111 – 120. London:

Sage.

Dyer-Witheford, Nick, and Greig de Peuter. 2009. *Games of Empire: 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kinsmyth, Carol. 2002. Project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and Risk in Magazine Publishing. *Regional Studies* 36(3): 229 – 243.

Florida, Richard L. 2002.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Garnham, Nicholas. 1997. Concepts of Culture-Public Policy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Studying Culture*, 2nd ed. edited by Ann Gray and Jim McGuigan, 54 – 61. London: Arnold.

Gough-Yates, Anna. 2003. *Understanding Women's Magazines: Publishing, Markets and Readerships*. London: Routledge.

Guthrie, Marissa. 2011. CNN Cuts 50 Staff Members. *The Hollywood Reporter*, November 11.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news/cnn-cuts-50-staff-members-260737>

Hartley, John. 2005. Creative Industries. In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John Hartley, 1 – 40. Malden, MA: Blackwell.

Harvey, David.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Malden, MA: Blackwell.

Harvey, David.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Malden, MA: Blackwell.

Harvey, David. 2006.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Verso.

Harvey, David. 2010.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London: Verso.

Hesmondhalgh, David.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nd ed. London: Sage.

Hesmondhalgh, David, and Sarah Baker. 2011. *Creative Labour: Media Work in Three Cultural Industries*. London: Routledge.

Hill, Kelly, and Kathleen Capriotti. 2009. *A Statistical Profile of Artists in Canada*. Hill Strategies Research Inc., February.

Himmelwit, Susan. 1983a. Exploitation. In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edited

by Tom Bottomore, Laurence Harris, V. G. Kiernan and Ralph Miliband, 157 – 15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immelwit, Susan. 1983b. Surplus Value. In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edited by Tom Bottomore, Laurence Harris, V. G. Kiernan and Ralph Miliband, 472 – 47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rowitz, Sara. The Freelance Surge I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Our Time. *The Atlantic*, September 13.

<http://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1/09/the-freelance-surge-is-the-industrial-revolution-of-our-time/244229>

Huws, Ursula. 2003.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Huws, Ursula. 2007. Defragmenting: Towards a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Global Division of Labour.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 1(2): 1 – 4.

ILO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2000. *Symposium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ies: Their Impact on Employment, Working Conditions and Labour-management Relations*. Geneva: ILO.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dialogue/sector/techmeet/smei00/smeir.htm>

Im, Yung-Ho. 1997. Towards a Labour-Process History of Newswriters. *Javnost/The Public* 41(1): 31 – 48.

Kaul, Arthur J. 1986. The Proletarian Journalist: A Critique of Professionalism.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2): 47 – 55.

Kingston, Paul William, and Jonathan R. Cole. 1986. *The Wages of Writing: Per Word, Per Piece, or Perhap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lowden, Kevin, and Anusuya Chatterjee. 2009. *Writers' Strike of 2007 – 2008 The Economic Impact of Digital Distribution*. Santa Monica, CA: Milken Institute.

Kperogi, Farooq A. 2011. Cooperation with the Corporation? CNN and the Hegemonic Cooptation of Citizen Journalism Through iReport. *New Media & Society* 13(2): 314 – 329.

Lacey, Liam. 2011. Screenwriting: It's a Terrible Job But Everybody Wants To Do

It. *The Globe and Mail*, July 7, R1.

Leadbeater, Charles, and Kate Oakley. 2005. Why Cultural Entrepreneurs Matter. In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John Hartley, 299 – 311. Malden, MA: Blackwell.

Lorey, Isabell. 2009. Governmentality and Self-Precarization: On The Norm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ers. In *Art and Contemporary Critical Practice: Reinventing Institutional Critique*, edited by Gerald Raunig and Gene Ray, trans. Lisa Rosenblatt and Dagmar Fink, 187 – 202. London: MayFly Books.

Lorinc, John. 2005. *Creators and Copyright in Canada.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Creators in Quebec and Canada*. Report prepared for Creators' Copyright Coalition and Droit d' auteur / Multimédia-Internet / Copyright. Accessed May 16, 2012. www.creatorscopyright.ca/documents/lorinc-beaulieu.html

Marx, Karl. (1844/1978a).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594 – 617. New York: Norton.

Marx, Karl. (1852/1978b).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66 – 135. New York: Norton.

Marx, Karl. (1888/1978c). Theses on Feuerbach.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143 – 145. New York: Norton.

Marx, Karl. (1867/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

May, Christopher. 200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xim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Global Division of Information Labour. *New Political Economy* 7(3): 317 – 342.

McGuigan, Jim. 2010. Creative Labour, Cultural Work and Individua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16(3): 323 – 335.

McKercher, Catherine. 2009. Writing On The Margins: Precarity and the Freelance Journalist. *Feminist Media Studies* 9(3): 370 – 374.

McRobbie, Angela. 2002. From Holloway to Hollywood: Happiness at Work in the New Cultural Economy? In *Cultural Economy: Cultural Analysis and Commercial Life*, edited by Paul du Gay and Michael Pryke, 97 – 114. London: Sage.

McRobbie, Angela. 2004. “Everyone Is Creative”: Artists as Pioneers of the new

Economy?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in Everyday Life*, edited by Tony Bennett and Elizabeth Silva, 186 – 202. Durham, UK: Sociologypress.

Mead, Rebecca. 2009. The Gossip Mill: Alloy, the Teen-Entertainment Factory. *The New Yorker*, October 19: 62 – 71.

Menger, Pierre-Michel. 1999. Artistic Labor Markets and Career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 541 – 574.

Miège, Bernard. 1989. *The Capit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Mills, C. Wright. 1956.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ody, Kim. 1997. *Workers in a Lean World*. London: Verso.

Mosco, Vincent. 2003.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Canada. In *Changing Canada: Political Economy as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Wallace Clement and Leah F. Vosko, 287 – 308.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Mosco, Vincent.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2nd ed. London: Sage.

Mosco, Vincent,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2006. Editorial.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3): 493 – 497.

Mozes, Suzanne. 2010. James Frey's Fiction Factory. *New York*, November 12.

<http://nymag.com/arts/books/features/69474>

Murdock, Graham. 2003. Back To Work: Cultural Labor in Altered Times. In *Cultural Work: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edited by Andrew Beck, 15 – 36. London: Routledge.

Murphy, David. 1991. Journalists and the Labour Process: White-Collar Production Workers. In *White-collar Work: The Non-Manual Labour Process*, edited by Chris Smith, David Knights, and Hugh Willmott, 139 – 161. London: Macmillan.

Neff, Gina, Elizabeth Wissinger, and Sharon Zukin. 2005. Entrepreneurial Labor among Cultural Producers: “Cool”Jobs in “Hot”Industries. *Social Semiotics* 15(3): 307 – 334.

Nies, Gerd, and Roberto Pedersini. 2003. *Freelance Journalists in the European Media Industry*. *European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http://www.ifj-europe.org/pdfs/FinalReportFreelance.pdf>

Perlin, Ross. 2011. *Intern Nation: How to Earn Nothing and Learn Little in the Brave New Economy*. London: Verso.

Pink, Daniel H. 2001. *Free Agent Nation: How America's New Independent Workers are Transforming the Way We Live*. New York: Warner.

Prickett, Sarah Nicole. 2010. SNP's Word of the Day: Precariat. *Fashion*, January 13.

<http://www.fashionmagazine.com/blogs/society/2012/01/13/snps-word-of-the-day-precariat>

PWAC [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 2006. *Canadian Professional Writers Survey: A Profile of the Freelance Writing Sector in Canada*. Toronto. <http://www.pwac.ca/files/PDF/PWACsurvey.pdf>

Ross, Andrew. 2000. The Mental Labor Problem. *Social Text* 18(2): 1 – 31.

Ross, Andrew. 2001. No-Collar Labor in America's "New Economy". *Socialist Register* 37: 76 – 87.

Ross, Andrew. 2003. *No Collar: The Human Workplace and its Hidden Cost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Ross, Andrew. 2009.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 Life and Labor in Precarious Ti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Rossiter, Ned. 2006. *Organized Networks: Media Theory, Creative Labour, New Institutions*. Rotterdam: NAi Publishers.

Ryan, Bill.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Scott, D. B. 2010. Rogers Syndication Practices Called Into Question by Canadian Writers Group. *Canadian Magazines*. October 2.

<http://canadianmags.blogspot.com/2010/10/rogers-syndiction-practices-called-into.html>

- Semuels, Alana. 2008. Book Publisher Finds Teen Lit Adapts Well in Hollywood.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2.
-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8/aug/02/business/fi-alloy2>
- Smith, Chris and Alan McKinlay. 2009a.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Labour Process Analysis.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3 – 2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Smith, Chris and Alan McKinlay. 2009b. Creative Labour: Content, Contract and Control.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29 – 5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Smythe, Ted Curtis. 1980. The Reporter, 1880 – 1900: Working Condi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News. *Journalism History* 7(1): 1 – 10.
- Standing, Guy.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 Statistics Canada. 2012. Occupations in Art, Culture, Recreation and Sport. *National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NOC)2011*.
- <http://www.statcan.gc.ca/cgi-bin/imdb/p3VD.pl?Function=getVDDetail&db = imdb&dis = 2&adm = 8&TVD = 122372&CVD = 122373&CPV = 5&CST = 101012011&MLV = 4&CLV = 1&CHVD = 122374>
- Story Board. 2010. Rogers Refuses to Remove Writer's Work From Yahoo. *Story Board*. November 30. <http://www.thestoryboard.ca/?p=142>
- The New Inquiry. 2012. *The New Inquiry*. 1, February.
- Towse, Ruth. 2003. Copyright Policy, Cultural Policy and Support for Artists. In *The Economics of Copyright*, edited by Wendy J. Gordon and Richard Watt, 66 – 80.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 Ursell, Gillian. 2000. Television Production: Issues of Exploitation, Commodification and Subjectivity in UK Television Labour Market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2(6): 805 – 825.
- Vosko, Leah F. 2000. *Temporary Work: The Gendered Rise of a Precarious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Vosko, Leah F. 2006. *Precarious Employment: Understanding Labour Market Insecurity in Canada*.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Vosko, Leah F. 2010. *Managing the Margins: Gender, Citizenship,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Precarious Employ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llenstein, Andrew. 2010. People Magazine iPad App Delayed by Paparazzi. *The Hollywood Reporter*. Accessed October 14, 2010.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news/exclusive-people-magazine-ipad-app-26788>

Walters, Emma, Christopher Warren, and Mike Dobbie. 2006.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 A Global Survey and Case Study of Atypical Work in the Media Industry*.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http://www.ifj.org/pdfs/ILORreport070606.pdf>

Waring, Marilyn. 1999. *Counting For Nothing: What Men Value and What Women Are Worth*, 2nd e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Wayne, Mike. 2003. *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 Key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London: Pluto.

Weeks, Kathi. 2005. The Refusal of Work as Demand and Perspective. In *The Philosophy of Antonio Negri: Resistance in Practice*, edited by T. S. Murphy and A-K. Mustafa, 109 – 135. London: Pluto Press.

Winseck, Dwayne. 2010.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Crisis of the Media”: The Rise and Fall of (Some) Media Conglomerates in Canada.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5(3): 365 – 393.

Wright, Erik Olin. 1978. Intellectuals and the Class Structure of Capitalist Society. I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edited by Pat Walker, 191 – 211.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Wright, Erik Olin. 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马蒂耶斯·埃克曼 (Mattias Ekman)^①

理解资本积累：马克思之原始积累理论 在媒体与传播研究中的相关性^②

熊琦 (译)，伍静 (校)

[导读] 当前，在各种公共服务已被或将被资本的剥夺性积累所蚕食时，新闻媒介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以及所为者何都是引人深思的问题。马蒂耶斯·埃克曼的《理解资本积累——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在媒介与传播研究中的相关性》关注的正是此题。这篇文章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是现实空间，一个是媒体空间，它主要是以大卫·哈维的剥夺性积累的概念为线索来结构全文。这篇文章整体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剥夺性积累和它裹挟的暴力，而它要解释的是新自由主义转向的这一议题；第二部分通过几个实例来论证新闻媒体在剥夺性积累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换言之，其实就是分析新闻媒体如何为资本积累为虎作伥。

首先，在分析剥夺性积累及其暴力过程中，作者论证了资本积累离不开资本循环，而剩余价值以及剩余价值产生所依赖的资本家

^①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媒体研究系讲师，曾参与撰写《Sage 百科全书之社会运动媒体》(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Social Movement Media) 一书。ekman@jmk.su.se.

^②我要表达我对安德烈亚斯·维德赫姆 (Andreas Widholm) 的谢意，他提出的意见对本文很有帮助。

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产生的，这样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必然会带来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卢森堡当年用消费不足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全面性危机，大卫·哈维很认同这一点，在他看来，今天，剩余资本和劳工都存在，但它们没办法结合在一起。因此，作者认为，剩余资本没有了进一步进入到资本循环里面去扩大再生产的这样一个先在的现实条件。而为了解决这个危机，资本会通过时间或空间的转换来扩大再生产，这也就是哈维所说的“时空修复”。而在作者看来，时空修复是依靠传播技术的进步和它整个体系完备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运输和传播的进步可以压缩时空关系。而在开辟新剥削领域的过程中，便必定会出现各种暴力。

文中埃克斯用到了原始积累的概念。其实是要说明，在今天资本要开拓出新的劳动形式和新资源，就必须像原始积累用暴力剥夺农民的土地一样来剥夺人民当下的公共服务以完成它的剥夺性积累。

接下来，作者以实例来呈现新闻媒体如何在剥夺性积累中所发挥的作用。作者指出剥夺性积累实现的四个途径也就是它的四个特征：私有化，金融化，危机控制与管理，以及国家再分配。

作者指出，这四个过程与暴力和社会运动是相伴相生的，其实也就是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齐泽克把暴力区分为客观暴力和主观暴力，而这样的客观暴力和主观暴力其实都为资本和权力所利用。而媒介恰好代表的是客观暴力这样一个面向的。

这个客观暴力施展过程，作者分别从传统媒体和网络空间两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第一个是传统媒体的层面，作者主要讲述了传统媒体作为客观暴力在资本积累中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这里作者用了两个案例，一个是讨论新闻在公共服务私有化当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新闻媒体是怎样与金融业的利益达成一致的。第二个案例是媒体如何再现在瑞

典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和全球抗议运动的。

第一个案例主要讲的是，瑞典公有的电信公司特里尔公司如何被私有化的过程。资本首先是通过新闻媒体做了大量的商业广告和政治活动来引诱瑞典人购买它的股票。比如它用“人民股份”这样具意识形态意味的名词来消除私有化带来的问题，并且通过金融业界人士鼓吹私有化和电信公司的股份能提供赚钱的机会，以此来推动特里尔公司私有化的过程。这里其实突显出今天新闻商业化与金融业之间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二个案例主要讲反全球化运动如何在媒体中呈现。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往往把这些抵抗运动描述为落伍的跟不上时代的行为。并且把焦点集中在社会运动发生的暴力上面，然后把它纳入治安为本位的法律和秩序话语里边，从而达到一种去政治化的效果。也就是说，一方面，新闻媒体搁置抗议部分，而抗议者又在遭受暴力。另一方面呢，新闻媒体通过传播法律和道德秩序意义上的这种治安话语，使体制性暴力得以合法化正义化。

接下来的这个部分，作者讨论的是网络公共空间的商业化。这里作者是用大家都熟悉的斯迈思的“媒体公司—观众—广告商”的框架来解释网络公共空间商业化的。也就是说上网其实也就是一个剩余劳动的过程。在上网的过程中，大部分用户都被监视，而这样的监视得来的用户资料又被提供给广告商。而从齐泽克的主观暴力和客观暴力区分来看，毫无疑问这种监视以及对网络用户隐私资料的占有就是一种客观暴力。这是整个文章的大致内容。

作者在最后的总结里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新闻媒体生产和传媒技术领域从来就不是单一而僵化的，因此它也需要被理论化也需要从浮现出来的另类角度来进行分析”。这篇文章无疑给分析新闻媒体与公共资源、公共服务资本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它引发我们对今天中国的媒介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在于：今天公共服务

也正面临私有化的趋势（如土地私有化、铁路私有化等），中国的媒体在这样的剥夺性积累的过程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媒体与国家三者之间是怎样的一种结构性关系？

[关键词] 马克思，资本主义，资本积累，剥夺性积累，政治经济学，新闻媒体，商品化，私有化，Web 2.0，脸书。

一、引言

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激发了大量社会理论家将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中的许多关键论点和路径予以振兴和重塑。如果没有从《资本论》派生出来的日益充实的文献作映衬，本文将不过是又一次试图与这部从前无数次被资本主义的护教学拒之门外的开山之作套近乎的尝试。

本文旨在探讨马克思（Marx 1867, 1990）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描述的原始积累理论以及该理论对于分析（大众）媒体、网络传播和传播体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相关性。为了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点重新焕发活力，原始积累理论已参照哈维（David Harvey）的“剥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理论得到修正。哈维借鉴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讨论旨在揭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自由主义转向。

遵照对原始积累和剥夺性积累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性解读，本文阐述了新闻媒体内容和媒体结构中 与剥夺性积累过程相关的两个关键的意识形态方面。本文考察了媒体对反资本积累的社会抗争的再现，以及新闻媒体内容和新闻媒体体制如何促进了金融业的资本积累。此外，本文还探究了互联网应用（特别是 Web 2.0）和传播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在这里，本文还就日常的网上冲浪何以被理解为剩余劳动以及互联网用户何以转变为商品等

问题贡献了思考。就日常在线活动的讨论而言，马克思原始积累的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通过对 Web 2.0 时代文化生产、分配和传播领域里的知识资产（intellectual assets）和创造力（creativity）的占有而产生的新的剥削形式。本文在这里还讨论了闲暇时间、自我和社会关系的商品化何以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文还用较短篇幅探讨了互联网监管以及个人信息的商业化收集、所有和处理是否可被理解为对主体的潜在威胁和齐泽克（Žižek）所定义的资本主义剥削之客观暴力的一部分。

本文既反映了新闻媒体的经验研究的成果，同时也运用案例分析了在一个系统性危机的时代社交媒体的日常运用与文化生产/分配领域内的知识资产、知识创造力如何透过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得到阐释。而哈维对马克思原始积累概念的更新版本对于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近况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二、资本积累的过程

资本主义内在驱动力便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为积累而积累。抑或正如马克思（Marx 1867/1990，595）所言“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马克思（Marx 1885/1992）在《资本论》第二卷里概述的最基本的资本积累公式勾勒出了资本如何通过七个关键阶段达成流通：

$$M—C (L_p/M_p) \cdots P (v/c) \cdots C'—M'$$

简言之，资本积累通过资本流通来完成，在此过程中货币（M）通过购买劳动力（ L_p ）和生产资料（ M_p ）被转换为商品（C）。为达到积累的目的，货币在这一过程结束之时需要比开始时更多，这意味着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要高于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商品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价值当与生产出来的商品

相联系时是以生产资本（P）的形式出现的。劳动力的价值（v）等于购买劳动力的成本（工资）；而生产资料（c）的价值等于所使用的资料（不变资本）的成本。所以，当商品出售的价格高于生产成本时，剩余价值便产生了，而剩余价值是通过剩余劳动（无偿劳动时间）来实现的。因此，剩余价值主要是由资本家未付酬的劳动时间创造的。当生产出来的商品（C'）被售卖时，资本再次以（新）货币（M'）的形式进入流通过程，而资本积累的过程由此得到持续（Marx 1867/1990；Harvey 1982/2006，156ff；Fuchs 2011，138）。

虽然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非常复杂而详尽（整个《资本论》第二卷主要是对资本积累过程的概述），但仍然有可能在大体保留其内在本质的前提下以此种方式对其进行简化。在通常情况下，资本积累通过扩大再生产而得以确保^①。在这一再生产的过程中，不仅商品和剩余价值被再生产出来，而且资本与劳动之间——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整体关系亦被生产出来（Marx 1967/1990，578）。而且由于剩余价值有赖于资本与劳动力（L_p）之间的剥削关系，因此资本流通归根结底就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的再生产。劳动力商品是附属于绝对剥削或相对剥削的过程的。绝对剥削指的是延长每个工人所需投入的劳动时间，相对剥削则指强化劳动过程（Mosco 2009，131）。

资本流通是个无休止的过程，而鉴于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资本终归要面临系统性危机。历史马克思主义者围绕资本主义正经历何种危机所展开的辩论往往会发生转向。卢森堡（Luxemburg 1913/2003）强调消费不足（under-consumption）的问题从而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作出解释，但消费不足很难充分解释当今资本主义

^①马克思（Marx 1867/1990，711ff）对“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Marx 1867/1990；1885/1992）作了区分。简单再生产主要是劳资关系的再生产，不发生任何资本积累。

的危机。哈维认为, 资本主义当前正面临过度积累 (over-accumulation) 的危机^①, 因为我们正经历着一种情境, 即“剩余资本与劳动并存, 但没有办法将它们结合起来” (Harvey 2006, 96)。当多余的商品、货币和生产力与剩余劳动力同时并存, 而资本缺乏“有利可图的机遇”进行扩张时, 过度积累的危机就会显现 (Harvey 2003, 88)。为了解决过度积累危机, 资本试图通过时间或空间的转换来扩大再生产。哈维 (Harvey 2003, 89) 称其为“时空修复” (spatio-temporal fixes)。例如, 将剩余资本和劳动投资到长期的 (大型公共) 项目中, 或将剩余资本和劳动转移到其他地理空间 (Harvey 2006, 96)。资本家们倾向于通过将劳动力或生产资料的购置转移至他处来从地理上扩大再生产, 从而为资本积累创造新的空间。由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体系, 因此扩大再生产通常会导致一种情形, 就是危机是按照地理的顺序移动的。“时空修复”有赖并兴盛于传播技术和体系的进步。交通和传播的进步压缩了时空关系, 因此它成为时空转换的核心。在寻求投资剩余资本新途径的过程中, 资本家力求将新的劳动形式和新资源挪用至资本流通中, 而这些新资源既有物质的 (如自然资源), 也有非物质的 (如知识)。这样一来, 从原本未被剥削的工作和资源中创造剩余价值就成为可能了。在当代过度积累的危机中, 理解劳动与资源挪用过程的方法之一就是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为了解释地理帝国主义 (geographical imperialism) 与全球资本 (global capital) 之间的关系, 哈维 (Harvey 2003; 2006; 2010a) 借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原始积累的讨论来揭示我们当代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转向 (the neo-liberal shift)。

^①过度积累的定义在这里被高度简化, 因为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往往承继了多方面的特征。(要更深入地了解对系统性危机的分析, 请见 Harvey 2003; 2006; 2010b。要综观当代危机的不同解释, 可参见福克斯 2011。)

（一）原始积累

在马克思（Marx 1867/1990，Ch. 26）《资本论》的讨论中，原始积累指的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转化的过程——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因此它也是生产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从而被转化为供市场售卖的雇佣劳动者的过程（即，劳动力变成了商品）。因此原始积累也构成了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本身：

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史前史。（Marx 1867/1990，874—875）

马克思在对旧的封建制度如何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描述中认为，主张资本的自然演化的自由式资本主义一般会遭遇赤裸得多的现实。封建制度的变革是一个以残酷的且通常是暴力的资本剥夺为标志的过程。公地的圈围、殖民制度、帝国主义、奴役劳动的使用，以及对被迫成为产业雇佣工人的农民的驱逐等等，通常都是暴力的。所以在马克思（Marx 1867/1990，875）关于原始积累的说法中，暴力发挥着主要作用。正如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的著名论述中所言，“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无疑，马克思对资本历史进程的描述只具部分真实性，事实上在这个进程中和平的或至少是不那么暴力的变革也是存在的（Harvey 2010a, 304f）。然而，马克思揭穿了自由主义神话，并勾勒出了一幅平稳变革的蓝图，而变革源自于成为雇主的具有专门劳动技能的勤劳人们的双肩——这种说法绝不是真的。

对于劳动者而言，原始积累的过程具有两面性，工人们从奴隶制等封建压迫制度中解放出来，却只不过陷入了新的剥削关系之中，即间接的强迫劳役——雇佣劳动的制度。一位前奴隶主愤怒于这样的事实，即奴隶从奴役中被解放出来，但并未在奴隶主所拥有的大农场中成为雇佣劳动者。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中针对他的愤慨作了评论：

他们已不再是奴隶，但并非为了变成雇佣劳动者之目的，他们反而是为了他们自身消费而工作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对他们而言，资本并非以资本的形式存在着，因为自发的财富本身之存在是建立在对劳工直接或间接压迫奴役的基础之上的。（Marx 1857/1993, 326）

我们将回到当代的一些实例中来，来看看自给自足的农民与集体所有并组织的农业生产 [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动员的，如巴西无地农民运动 MST（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和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 是如何与将其变为雇佣劳动人口的驱逐与强制行为作斗争的以及媒体在以经济发展之名合法化驱逐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关键的角色。

如此一来，如果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那么它对于我们理解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有着怎样的帮助？在卢森堡（Luxemburg 1913/2003）的启发之下，哈维（Harvey

2003; 2005; 2006; 2010a) 认为, 在当今的现代新自由资本主义中, 原始积累的许多具体特征都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在马克思看来, 积累的“正常”过程就是扩大再生产, 而卢森堡 (Luxemburg 1913/2003) 却认为连续的资本积累也承继了一种“原始”的特性。这构成了她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个关键论点: 资本总是创造剥削的新地理空间, 或者说“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渗透” (Callinicos 2009, 40)。卢森堡的理论也可用于理解资本流通之外的其他社会环境怎样沦为资本的殖民地 (Hartsock 2006)。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已把卢森堡的殖民主义思想用于分析女性在家庭中的再生产性工作。通过确保 (男性) 雇佣劳动者的再生产, 女性的再生产性工作实际构成了“一种内部殖民地和原始积累的环境” (Fuchs 2011, 282)。

哈维 (Harvey 2006) 认为当下的资本积累亦继承了原始过程中的特点。事实上, 通过扩大再生产达成的积累和通过剥夺达成的积累“是有机地联系的, 是辩证地交织的” (Harvey 2003, 176)。至少有两个关键论点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中找出了原始积累的具体特征。首先, 存在着大量人口驱逐和土地侵占的实例 (尤其是在拉美和亚洲), 同时还存在着对自然资源的暴力开采 (整个南半球); 而反抗这些遍布整个南半球的过程的人则会遭到系统的, 有时甚至是极端的暴力镇压。在有些例子中, 暴力程度不断升级 (Harvey 2010a, 308)。其次, 当前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似乎依然涉及原始积累的某些特征, 例如不断增长的国债以及马克思 (Marx 1867/1990, 777ff) 所称的不断成熟的信贷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主导的金融信贷的整个尝试与数百年前私有化过程中浮现出来的信贷体系及作为行动者的国家具有惊人的相似。哈维 (Harvey 2003; 2005; 2006; 2010a) 将这些原始积累的特征形容为“剥夺性积累”。它也可被描述为对全球增长持续下滑的 (徒劳的) 新自由主义解答 (Harvey 2003, 145; 2006, 42)。剥夺性积累的特征

由四个关键要素构成：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的控制与管理、国家再分配（Harvey 2006）。

1. 私有化

剥夺性积累体现在公共资产的私有化中，如公地的侵占。这样的私有化涵盖了自然资源（水、土地、空气）、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电信、能源供给）、社会再分配制度、社会服务、医疗、教育、公共机构、公共住房、战争等一切领域，基本囊括了所有尚未卷入资本流通的东西。同时存在的还有诸如知识、基因材料之类的非物质资产的私有化和再生产过程。所有这些领域之前因其被视为公共用地、公共服务、事关国家利益而与资本积累绝缘，但如今在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里则不同程度地被侵占。在加入到资本流通之后，他们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中，由此也改变了社会中各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学生、病人、戒酒者、公民等等被转化为以商品出现的物资和服务的客户、顾客和买主。剥夺性积累的过程因而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剥削的过程。当前的私有化进程已被印度作家、运动人士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 2001；Harvey 2006, 44—45）定义为“历史上绝无仅有大规模野蛮剥夺”。

私有化的进程可以是快速而利落的，无需作特别的斗争或使用武力，北半球尤其如此，在那里国家是私有化的主要推动者。但南半球的剥夺过程通常会伴随着残酷或暴力的对农业人口的驱逐和对日常自然资源的侵占（Harvey 2006, 45）。有时剥夺的后果是引发了公开的社会抗争，有时资本甚至成了失败的一方。1990年代末玻利维亚科恰班巴市发生的水资源战争便是一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起的私有化浪潮中，这座城市的公共饮用水被出售给了美国的贝泰公司（Bechtel），这直接导致了水价上涨、供给受限。对水的剥夺引发了一场为争夺水这一人类基本财产的使用权的艰苦抗争，最终迫使这座城市重新购回用水权（Olivera and Lewis 2004）。所以私有

化进程也能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激化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

私有化也裹挟着战争。战争事实上就是一种日渐被商品化的行为，其间私营公司在保卫与折磨中牟取暴利。战争只是一个政府资金大量转换为私人资本的过程。卢森堡（Luxemburg 1913/2003, 434）20世纪早期对“作为资本积累的一个领域的军国主义”的讨论基本可以说是今天晚期资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解释。其中，军工联合企业在促进资本扩大再生产和通过暴力和破坏“创造”新的剥削空间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Žižek 2009）。

通过剥夺实现的对公共资产的侵占制造了一种积累在不断增长表象，因为新的剥削领域和剩余价值过程被添加到了资本流通中。

2. 金融化

剥夺性积累的第二个特征便是金融化。金融资本的大幅扩张与市场的放松管制、信息与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私有化进程是交织在一起的。资本主义金融体系里的投机活动透过大型资本再分配拉动了明显的经济增长。而金融体系在“偷窃”诸如养老金之类的公共资产方面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Harvey 2006, 45）。借助对冲基金、庞氏骗局和资产倒卖等手段，辅之以对股票价值的倚重，当前的虚拟资本的累积创造了明显的经济增长。当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时，这些过程被描述为主要的推动因素。所谓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v cycles）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划分为盛衰不断交替的历史时期，而金融化和金融业不断提升的重要性也标志着周期中衰退期的到来（Arrighi 2010）。为了解资本的不断增长的跨越国界的权力和资本的迅速（空间上的）集中化，马克思（Marx 1867/1990, 920）强调了信贷体系的重要性。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通过建立“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机构以攫取‘金字塔底部的财富’，然后榨干这些财富以资助萎靡的国际金融机构……并用这些财富偿付资产和并购游戏……”（Harvey 2010a, 272）。媒体研究者

阿尔米龙（Almiron 2010）指出了金融资本与新闻媒体组织之间日益紧密的关系。新闻媒体越来越依赖银行等金融操作者，因此金融化对新闻实践和内容具有深远的影响（Almiron 2010）。

3. 危机的控制与管理

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已经导致了精心策划的经济危机。危机以结构性调整计划的形式放任资产的快速再分配和经济休克疗法。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期间，精心策划的危机多少已成为拉丁美洲的惯例。单一国家的债务危机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性调整计划作出快速应变，从而使这些国家的经济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跨国机构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发生了转变。这些蓄意挑起的危机导致了大规模的资本迁移，并创造了明显的资本积累。该危机导致了大量失业劳动力的产生，造就了“便于进一步积累的廉价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Harvey 2006, 47）。这些危机也揭开了为确保资本的利益而付诸使用的暴力行为。这些萌发于资本与国家的交会处的暴力主要体现在对遍布整个南半球的抗议、劳工结社和社会运动的残酷镇压上。

4. 国家再分配

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国家被转化为公共资产再分配（私有化）过程中的最核心的行动者。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或公共服务资金的剧减构成了剥夺性积累的第四大关键要素（Harvey 2006, 48）。虽然当权的政府具有政治性，但依然有大量实例能说明国家在私有化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举例来说，将养老金体系予以私有化的有法西斯独裁政府（1980年代，智利）、社会民主党政府（1990年代末期，瑞典）和阿根廷的庇隆政府（1990年代）；将公共住房予以私有化的有19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政府、过去15年中的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和中间偏右政府；而将农业用地予以私有化的有1990年代墨西哥的民族主义政府（革命制度党）。私有化的名单几乎是列

不完的。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国家再分配引发公共资产被大规模地转化为私人所有。公共资产向私营部门的转移不只牵涉到教育、医疗、社会工作、基础设施、养老金等社会服务的私有化，而且还包括以私营部门的银行纾困项目和政府投资形式出现的现钱向商界的转移。在美国，象征着新自由主义转向的“企业福利计划”已导致纳税人的钱被大量再分配，落入私营部门的手中（Harvey 2006，49）。

国家再分配的后果有时是暴力的。反对社会动员的直接冲突发生过多起，例如对墨西哥恰帕斯和瓦哈卡州的社会运动、对哥伦比亚的工会主义者、对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中被组织起来的无地农民工以及印度土著人的镇压等等。国家再分配也可能牵涉到更隐性的符号暴力，而暴力的受害者是因大量公共住房私有化（例如在伦敦）后出现的房产投机行为和自然资源的私人征用所导致的大量人口被驱逐（这种现象在南半球无处不在）而被迫走出家门的人。这些间接暴力的形成是晚期资本主义诸种进程的一个关键属性。接下来我们来探究原始积累的暴力与以剥夺性积累为标志的当前新帝国主义时期的暴力有何区别。

（二）暴力在资本积累中扮演的角色

为了理解资本主义积累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和标志全球资本扩张之过程，我们必须思考全球资本是如何以新帝国主义的方式与区域性地缘政治（territorial geo-politics）联系在一起的。原始积累或剥夺性积累基本上都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形式（Harvey 2003）。资本主义继承了全球资本扩张与区域权力逻辑（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行为）之间的矛盾（Harvey 2006，105）。哈维（Harvey 2003）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表明，地缘政治斗争和全球资本积累在发生时间上不谋而合，从而重塑了积累的基础。对由原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构成的资本积累和地缘政治发展的分析表明，暴力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中

发挥着核心作用。暴力简直就是积累内在逻辑的一部分，作为落实资本的“权利”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一旦有需要就会自动浮现。沃勒斯坦（Wallerstein 2001，29）认为，系统性危机时期的扩张问题将与可能更暴力的资本扩张相伴相生。相比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跨国机构而言，民族国家的地位日趋削弱，与由此带来的政治衰落相呼应的是，这一过程无疑将加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日常暴力的频度。暴力往往出现在全球资本积累（特别是剥夺性积累）与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的区域地缘政治的交汇点上。因此暴力难免成为孕育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制度的一部分，故它也可被理解为植根于系统内的必需品。

现在让我们回到暴力在剥夺性积累中发挥的具体作用中来。资本主义制度依赖于积极和潜藏的暴力，它们是保障资本积累和私人掌控生产资料的手段。齐泽克（Žižek 2008）对主观暴力和客观暴力进行了区分。人身攻击、犯罪、恐怖行为或镇压性的国家机器等属于主观暴力，是公开实施的，并在实施时带有某种具体意图（如病态的、政治的、父权的、宗教的等等）。相反，客观暴力则是内嵌于资本主义实践之中的，体现在公开歧视、结构性种族主义、经济贫困或其他更微妙的剥削形式中。这两种暴力形式是相互关联的。诸如巴黎和伦敦这类城市里发生的城郊骚乱这样的主观暴力会被认为与客观暴力——经济剥削、驱逐、种族主义和歧视造成的社会信任的覆灭——不无关系。主观暴力只是在两种形式里更显而易见（Žižek 2008）而已。正如客观暴力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剥削性社会关系的一个结果，它也同样表现为对挑战资本主义的那些人的潜在暴力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客观暴力就是葛兰西所定义的霸权认同（the consent of hegemony）的一部分，是将武力和认同这两种资本主义统治形式融合起来的一种暴力形态；或者用葛兰西（Gramsci 1929—1935/1971，263）的话说，是“高压政治的盔甲保护下的霸

权”。主观暴力和客观暴力乃是由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剥削构建起来的系统暴力的两种不同表现。全球资本主义的剥夺性积累往往带着公然的系统暴力的印记，而这些暴力主要表现为危机疗法、对传统生产资料的实体消灭和我们在伊拉克已见到过的通过战争和占领进行的物质上的侵占（Žižek 2009, 17），同时，这种剥夺性积累也是以南半球主体的日益暴力化和经济上的贫困为标志的（Ekman 2011）。于是，暴力变成了资本主义剥削过程的一个共同特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往往会使侵占过程中资产分配的极端不对称性趋重。客观暴力也包含符号暴力或者说加尔东（Galtung 1990）所定义的“文化暴力”。它涉及文化的诸多方面，“可以用于正当化或合法化直接的或结构性的暴力”（Galtung 1990, 291）。因此，按照齐泽克的模式，文化暴力可以涵盖新闻媒体的那些将镇压社会动员和抗议过程中的武力使用予以合法化或将战争正当化的方面。

总之，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之前的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视为一种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大规模人口驱逐以及大工业、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形成为特征的历史形态。但我们也可以将原始积累看成是内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那些特征的延续。透过时间与空间对劳动和资源的永无止境的侵占，被迫纳入到资本主义产权关系中，无疑带有马克思（Marx 1867/1990）描述过的众多特点。最终，原始积累的主要特征在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被迫分离。

三、资本积累中媒体与传播的总体作用

许多理论性与经验性的著作援引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以理解媒体与传播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Mosco 2009；McChesney 2007）。福克斯（Fuchs 2011, 141ff）将多个不同的层面作了区分，既有媒体

与传播（作为产业）的内部层面，也有（作为概述）外在于媒体与传播的层面，以阐明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具体作用。为了理解与原始积累或剥夺性积累相关联的媒体与传播，我只会触及可能发挥作用的一些方面。第一个层面是关于媒体内容以及新闻体制与金融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的意识形态维度的。意识形态元素在经济、政治、法律等多方面对资本主义再生产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例如，媒体通过规范和促进日常生活私有化从而在社会关系的具体化中占据强势地位。再如，媒体内容将受众转化为商品与服务的消费者。提及这一点目的倒不在于唤起太多意识形态批评的历史讨论，而是要分辨出与剥夺性积累相关的一些核心的意识形态元素。第二，对于个体的闲暇时间如何被占用并被转化为剩余劳动的讨论触及到了社交媒体如何充当推动资本积累的广告的基础设施的问题（参见 Fuchs 2011, 149）。社交媒体和现代信息技术对于压缩日常商品流通中的时间与空间具有决定性作用。当我们使用智能手机、上网时，时常被确定为目标消费者。事实上，互联网的大多数部分已被商业化，而商品化的过程仍在持续征服用户。互联网中的内容并没商业与非商业的明显区分（Hesmondhalgh 2007, 259）。

（一）新闻媒体与剥夺性积累的驯化

我想要谈论几个案例。这些案例突出显现了新闻媒体的结构性维度和意识形态维度与原始积累和剥夺性积累的过程的联系。第一个案例讨论了新闻在公共服务私有化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新闻媒体怎样与金融业的利益达成一致并促进金融业的实践（Almiron 2010; Hope 2010）。第二个案例探讨的是瑞典大众媒体对全球正义运动、全球抗议运动和世界社会论坛（又译，社会运动论坛世界峰会）的再现（Ekman 2011）。

1. 支持私有化，促进金融化

1980年代和1990年代，私有化浪潮席卷世界上的多数国家，这标志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在瑞典，公共部门以前发展良好而且在经济上得到优先发展权，放松管制和私有化过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瑞典的情况或多或少反映了西欧其他国家明显的发展趋势。随着1990年代私有化浪潮的迅猛来袭，“市场”这一名词成为有关经济事务的新闻中的最显眼的原动力之一（Martenson 2003；Viscovi 2006）。“市场”作为统一的行动者，对政治决策作出反应，宣布政治行动者的好坏，并决定如何看待整个经济状况，且改变了经济事务新闻报道的话语（Martenson 2003）。“市场”这一中间化的概念是作为新自由主义转向和资本主义经济大幅放松管制的意识形态要素而出现的。为应对“市场”的出现，新闻将目光转向了金融业，而股票市场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新闻专题。这也意味着金融业中的行动者在日常新闻流（news flow）中往往以专家姿态占据支配地位。对经济议题的再现出现了一个鲜明的从劳动力市场和工会等向金融市场的转向，并且将中间化的公民建构为私营经济的主体（相对于雇佣工人或金融投机领域外围的人而言）（Viscovi 2006）。2000年阿尔米龙对两份主要的西班牙报纸所作的研究呈现了同样的结果。金融业参与者和指标成为新闻的主宰，而阿尔米龙（Almiron 2010, 167）断定：“其中大部分的信息无疑是缺乏独立的新闻调查的。”马特森（Martenson 2003）和维斯科威（Viscovi 2006）所认定的新闻的范式转换与剥夺性积累中的金融化过程遥相呼应。

让我们首先来思考瑞典的一个具体案例，它可以说明新闻媒体通过促进普通人的存款流入金融市场以支持私有化时所发挥的作用。接着让我们来看看一个真正全球化的现象，它可以表明新闻流如何与金融流交织在一起以及金融新闻的利益如何与金融业者的利益不

谋而合。

2000年6月, 公营电信公司 Telia 被部分私有化 (30% 卖给了公众)。几乎有 100 万的瑞典人在新闻媒体辅助的大量商业广告 (出现在电视、报纸和公共空间里) 和一场政治宣传 (整个私有化过程得到了财政部长的亲自出马支持) 的怂恿下, 成为了该公司的股票持有者。在该公司私有化的过程中, 新闻以“人民股份”^① 的口号来为股票促销。使用这种意识形态名词是为了抚平这样一个事实, 即公众现在可以购买本就属于他们的某样东西, 并有机会赚钱获利^②。例如, 在私有化的几周前, 瑞典第二大小报《快报》(*Expressen*) 刊登了数篇文章支持读者购买股票。其中一篇文章用了这样具有诱惑性的标题: “八大理由支持 Telia, ……这就是拥有它的股份就会变为赢家的原因所在。” (Bolander 2000a) 小报和日报上的文章都利用金融业者鼓吹私有化和快速赚钱的机会: “股票市场专家认为能在股票市场大发一笔。” (Bolander 2000b) “Telia 被预测开庄大吉。专家都建议购买这一全新人民股份。” (Magnusson 2000) 一些文章干脆就写成了购股指南: “如何购买 Telia——这一全新人民股份” (Norlin 2000), “如何购买人民股份” (Wedel 2000)。声援私有化的文章就更加难以计数了。“人民股份”这一概念的整个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与金融业日益受重视密切相关的媒体现象。搜索瑞典最大的新闻资料库 Mediearkivet 可以发现, 在 Telia 私有化之前, “人民股份”这一术语总共在 186 篇文章中出现过。但是从 1999 年 Telia 私有化进程开始及以后, 这一术语出现了 1113 次, 而在 2000 年的顶

①“人民股份”这一名词响应了“人民之家”这一概念, 是用于解释二战之后盛行于瑞典的福利模式的一个语汇。“人民之家”的概念第一次被使用是在 1928 年瑞典首相佩尔·阿尔宾·汉森 (Per Albin Hansson) 的一次演讲中。

②然而,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一股份后来让人大失所望, 2010 年时其股票市值已降至 2000 年发行价的一半 (见《达拉纳报》, 2010 年)。

峰之年同时有 400 篇文章中出现过。仅在 2000 年，瑞典 7 大报纸发表了 220 篇含“人民股份”一词的文章。

电信等公共基础设施的私有化与新闻生产中发生的类似的市场化进程形成呼应（Almiron 2010）。由于新闻商业化程度日益加剧，而且财经新闻与金融业之间的共生关系日渐紧密，加之新闻生产中经济资源有限、截稿期限缩短，这一切导致新闻业完全丧失了批判锋芒（当然也有显著的例外情况）。不断加码的利润（从马克思所定义的相对剩余价值中获得，1867/1990，429ff）要求令新闻业的处境难上加难，与此相伴的还有销售额的下滑，而这种种因素使得财经新闻很容易成为经济形势良好的金融市场参与者俘获的目标。因此，除了信息与传播技术在促进金融市场资本流通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之外，传统新闻媒体所发挥的同等作用也不应被忽视（Hope 2010）。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一个更加全球化的现象，在这里，新闻媒体迎合了金融市场的利益，并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实践。接着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被马克思称作 M-M'（即钱生钱）的资本积累（Marx 1867/1990，248）。新闻媒体与金融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话题，相反，这种关系甚至可以追溯到欧洲出现的第一份报纸上，而这份报纸的所有者就是一个金融家族（Almiron 2010，68）。然而，由于 1990 年代金融业（银行业、信贷流等）大规模放松管制以及通过信息和传播技术进行金融投机的新手段开始涌现，新闻媒体流和金融流中的信息开始实时共通（Hope 2010，654）。比如在金融业像彭博（Bloomberg）和 CNBC 这样的广播公司已成为不断累积的资产转移流的引擎，从而造就了大规模的投机性金融经济。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大型电视台与金融交易界相融合，为遍布全世界的新闻记者提供大量金融信息（Hope 2010）。有人可能会争辩说，金融广播电视为全世界的新闻播出机构提供了原材料（体现为数据、指数、

比率、金融“专家”话语)等。接着,这些原材料被用来制作不同经济和地理环境下不同媒体平台上播出的新闻。全球金融体系中某处股票市场的一个急剧的变动会对金融业者和媒体业者都产生直接的影响。1990年代中期,这些媒体/金融信息流也被转移到了网上,成就了网上迅即的金融信息流。1980年代金融资本领域和一定程度上引人注目的新闻业之间的利益融合多少成为1990年代信息和传播技术快速发展之后的一个样板(Hope 2010)。21世纪初,“大多数顶尖新闻媒体集团与金融业的联系不断紧密,对金融业的依赖也不断加深”(Almiron 2010, 152)。因此,鉴于信息借助传播体系实现了快速的流动,金融业在过去10年中的头几年里经历了爆炸式的成长。网络金融业者数量的增加带动了计算机辅助的算法交易、秘密对冲基金、衍生交易、资产剥离的繁荣,造成了大量虚拟资本的累积。正因此,新闻业者与金融业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难以区分,而这一点在新闻从业者的隶属关系和个人利益上都有体现。例如,高产的新闻记者摇身一变成为金融博客里的顾问,而博客圈则“有助于构建财经印刷媒体和商业电视频道的信息环境”(Hope 2010, 660)。

新闻与金融业之间的利益互惠是2008年经济危机酝酿过程中新闻业彻底(几乎)失灵的一个重要因素(Almiron 2010)。新闻从业者和新闻生产者对之前2008年发生的金融崩溃的总体上熟视无睹的态度已招致了一些内部批评(Schecher 2009; Fraser 2009),但对财经新闻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讨论依然被边缘化,尚未被纳入批判媒体研究的范围。

所以考虑到财经新闻机构和经济记者的角色,新闻媒体通过推动金融化进程,无疑助长了金融体系内愈演愈烈的投机行为。金融信息的过剩通过传播体系被迅速转移,加之其与金融业者的依赖和所属关系与日俱增,便削弱了经济议题新闻流的批判精神。你甚至

可以认为很大部分的财经新闻简直就是金融资本利益的信息基础设施。随着马克思所发现的信贷体系（基本就是今天的金融体系）的兴起，银行、信贷机构和其他金融業者通过传播体系压缩时空的作用不可被低估。无可否认的是，信息与传播技术和金融新闻流在促进金融机构手中资本迅速集中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为这些金融机构奠定了与原始积累历史进程中银行和信贷体系平起平坐的关键行动者的地位（Marx 1867/1990）。

2. 全球正义运动：暴力和政治

全球正义运动处于反抗剥削性积累的最前沿。该运动属于那些处理资本与带有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积累特征的过程之间的具体关系的运动之一，是一个纷繁多样但在社会和政治上具有连贯性的运动。不同社会运动抗争的焦点是正处于进行中的农民驱逐过程、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土地及生产资料的窃取、对本地人民的镇压、金融债务体系以及结构调整计划，而这一切都是在残酷的国家权力所支持的国家与全球资本的胁迫下展开的。简言之，全球正义运动可以看作是对剥夺性资本积累的组成过程的一个社会和政治反应（Harvey 2010a, 313）。

1999年11月末在西雅图举行的WTO会议令上一个千年临近结束时所发生的一系列针对全球峰会展开的抗议运动变得世界瞩目。随着世界各地在类似场合的抗议运动的爆发，全球正义运动已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闻（Klein 2001）。对劳动、资源和土地的剥夺引发的形形色色的政治抵抗运动借助2001年世界社会论坛（WSF）的创办打造了一个共同的平台。世界社会论坛为产出多样的政治合作、平台、宣传及决议的讨论、会议、研讨班和社会联系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空间（Sen and Waterman 2009）。简言之，世界社会论坛和全球正义运动标志着，在一个具有鲜明后政治特征的时代里，全球反抗资本的运动已在组织化方面迈出了第一步（Mouffe 2008）。

那么，全球正义运动的社会动员何以在（瑞典）主流新闻中脱颖而出呢？一方面，与剥夺性积累的特点相联系的政治议题（如债务免除、金融投机和放松管制的后果等）越是温和，越容易进入新闻流中。债务免除、对金融投机征税以及主张对某些民生用品（特别是水）的使用权等要求得到了主流媒体的报道，有时甚至被全球正义运动之外的政治评论员和参与者所支持。另一方面，最终，越来越清楚的一个事实是，大部分的媒体对全球正义运动的再现都倾向于认为全球经济体系中要发生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并无可能。当要求彻底的债务免除这样的政治行动在新闻媒体中得到再现时，报道框架便忽略了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的社会运动中的长期斗争。事实上，西方政府的代表因将这样的议题带到全球峰会的议程中而受到赞赏（Ekman 2011）。美国新闻媒体的研究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正如兰斯·班内特（Lance Bennett）和其同事对美国新闻媒体所做的研究中总结到的：“新闻媒体对全球化论争的建构中最具讽刺意味的也许是，世界经济论坛（WEF）的精英们被过誉竟是因运动人士长期以来所界定的，并力图以自己的方式打入新闻的议题。”（Bennett 2004, 450）反对剥夺性积累的大型社会运动的抗争大多遭到忽略，而当他们在新闻中崭露头角时，他们的抗争被描述为落伍行为。在占据主导地位的有关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话语中，农民运动和抗争被架构成阻碍了南半球更广大地区的经济进步和繁荣的东西。至少在主流媒体报道世界社会论坛的政治议程时确实是这么回事。

更激进的政治议题对抗的是全球经济和政治结构的理论基础本身，但这些议题却湮没无闻；相反，许多新闻报道往往要么侧重于全球正义运动在政治和社会诉求上的混乱这一报道框架，要么将视线投向抗议过程中发生的暴力行为。举反对峰会的全球抗议活动这个例子来说，该新闻流中的政治维度完全让位于对暴力的报道，甚

至是对潜在暴力的报道。后者主要体现为，新闻报道将即将发生的抗议活动作为暴力威胁、作为无可避免的暴力对峙乃至不在场的暴力（通过对游行示威出奇的和平这一特点进行评论来实现）来呈现（Ekman 2011, 136）。当涉及政治事务时，全球正义运动受到了负面的刻画，与全球峰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制度实践和过程产生关联（Ekman 2011）。

如果仔细看看媒体对暴力的再现你会发现，暴力实际上构成了新闻报道的基本期待。在影响深远的对抗议活动的历史解读中，聚焦暴力俨然已成为一个要素，被移植到新闻业与国家/警察机构之间的话语实践中（Halloran, Elliot and Murdock 1970; Murdock 1981; Carter and Weaver 2003; Doyle 2003; Cottle 2006）。媒介化暴力倾向于再生产以治安为基础的法律和秩序话语，并充当了权力合理化的凭借，而在此过程中，新闻业将系统暴力再现为保护公民和维持总体秩序以对抗组织化的暴力抗议活动的必要手段（cf. Wahl-Jorgensen 2003）。因此，对全球正义运动的社会动员来说，媒介化暴力可以被看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新闻媒体将部分抗议和抗议者贬低为暴力。另一方面，新闻媒体通过传播法律和秩序意义上的治安话语，使系统暴力得以合法化和正当化（Galtung 1990）。例如，在对抗议 2003 年坎昆市举行的 WTO 会议的社会动员的新闻再现中，新闻媒体不着痕迹地将会议的军事化管理框架为“安保”议题（Ekman 2011）。许多新闻将现场大规模的军队和警察（超过了两万人）、军用直升机、军船以及警察筑起的重重关卡描绘为对 WTO 参会代表的保护（Ekman 2011, 157）。同时，游行示威被描述为对自由贸易的威胁（Ekman 2011, 156）。这种形式的客观暴力便在国家/资本军事化和新闻媒体之间的交集处浮现出来（Žižek 2008）。

总之，全球正义运动的新闻再现通常被全球化、经济学、社会抗议与政治这样的霸权性话语所支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

理论是以“全球主义”(globalism)这样的支配性话语出现的(Fairclough 2006)。在新自由主义争夺霸权的时期，它在解释社会变革何以在媒介化的公共政治辩论中发生的过程中占据了优先地位(1999—2007年之间，Ekman 2011)。对全球动员和抵抗的新闻报道因缺乏对未被内部系统化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大型讨论或解释而被最终具体化了。反倒是，现实遭到切割、简化和包装，并且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全球经济的支配性话语的背景中得到具体化(Ekman 2011)。正如媒体学者伯格列兹(Berglez)所认为的：新闻业“虽然掩盖了政治抗争的激进维度(削弱了它的左翼和阶级属性)，但仍然对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抗争‘表示了部分的拥护和理解’，从而为激进政治抗争转化为他种(正常的)日常生活实践铺平了道路”。因此，反对剥夺性积累的大规模全球社会动员并没有通过传统媒体的披露而赢得实质上的政治合法化。

(二) 对日常网络活动的剥夺

通过考察网络传播体系和平台的具体作用，第二部分将哈维的剥夺性积累理论用于媒体与传播的研究中。在这里，马克思(Marx 1867/1990, 668ff)对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的讨论可以解释社交媒体的用户进行的网络活动如何被资本占用并被转变为剩余劳动。所以在此我要深入探讨怎样理解Web 2.0上日常社交媒体用户的活动(通常指生产性使用者)及其与资本家利益的关系(Fuchs 2009; Jakobson and Stiermstedt 2010)。通过剥削脸书、Youtube等社交媒体网站的网络活动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之所以成为可能有赖于出售用户，更具体地说，出售他们的网络活动给广告商。媒体受众作为商品这一概念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已有过很好的讨论(参见Smythe 1982; Mosco 2009, 136ff)。斯迈思的主要观点在于受众是大众媒体的主要商品。斯迈思的概念突显了媒体生产者在构建受众与广告商

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受众商品化的概念亦将媒体机构作为资本流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置于“总体资本主义经济”（total capitalist economy）中（Mosco 2009，137）。然而受众进行如观看电视这样的活动是为媒体所有者工作这样的理念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引起过大量争议。媒体学者博林（Bolin 2011，37）认为，“观看电视可以被理解为工人劳动力再创造的一部分”。观看电视并非生产性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并且这一过程可以被定义为广告商和媒体公司所承担的生产过程中的“原料”。如此一来，看电视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作为统计数据的观众），但它不能被视为劳动（Bolin 2011，37）。在资本流通的第一阶段，资本家尚只是扮演商品购买者的角色，此阶段中媒体公司购得观众的人口统计数据（Mp）以用于制作广告（Marx 1867/1990）。然而，莫斯科（Mosco 2009，137）认为斯迈思的受众构成了劳动的想法是有用的或者说不容忽视。事实上，斯迈思这一唯物主义理论中的真知灼见在于提出了“媒体公司—观众—广告商”三者之间互惠互利的关系的构想（Mosco 2009，137）。媒体不仅是意识形态生产者或传播者，而且也完全融入到了资本流通中，这一看法在分析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时，无疑是非常有用的。

在 Web 2.0 用户的案例中，侵占过程事实上就是侵占劳动的过程。当用户通过形形色色的互联网商业平台和站点进行传播活动时，资本剥夺的是用户所做的一切。例如，在脸书等网络平台的案例中存在着一个将日常用户的上网活动的剩余劳动转移到资本流通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通过向广告商提供某些具体的用户而得以完善的，并且这一过程是基于网站流量中所获得用户信息以及互联网上的网站和其他地方的用户的使用偏好和上网活动。在这里，每当我们上网时，我们所做的一切便构成了被侵占的劳动。大部分的用户活动都被不同的网站、搜索引擎和电子邮件服务等所监控和圈占。实际上，你在这里可以谈及把生产资料（知识型的、传播型的和创造型

的)与劳动者(生产性使用者)相分离的过程(Marx 1867/1990, 875)。它虽不是直接的强制分离,但也是间接性的。间接的强迫因素主要是当你远离脸书这样的网络平台时将会体验到一些劣势,比如失去工作机会、人脉、社会关系及其他非物质资产等。不参与这些网络平台的代价可以与“出卖”你所有的信息和活动给从商者以获得参与机会相抵消。结果,日常上网活动就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潜在剩余劳动领域,随时可能被转化为剩余价值。这一过程随着监控系统的出现而获得改进,因为监控系统可以将你上传的东西、你“赞”(liked)(例如在脸书中)过的帖子、你的电子邮件中的内容(例如在Gmail中)、你固定访问的网站和你在互联网的商业领域里冲浪时所做的几乎所有事情予以分类,从而对用户行为实施跟踪、对上网活动予以监控(Fuchs 2011; Jakobsson and Stiernstedt 2010)。

然而,并非只有以文本、图片、视频形式出现的用户时间和工作以及其他层面的个人信息(以无偿劳动的形式出现)被资本剥夺。诸如脸书之类的网站也改变了用户与商业公司之间的社会关系。当用户把商业公司、品牌及其他商品整合进他们日常的社交网络中时,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就演变成另一种私人关系,与你的日常社交生活中所拥有的关系非常相似。例如,可口可乐在其脸书网页上拥有几乎4000万的粉丝^①。由于公司、品牌和产品在如脸书这样的网站里有他们自己的网页,那么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将可能是实时的和永无止境的。通过变革与产品和消费有关的人际传播,社交网站上的活动也推进了商品化的个人主义。大型跨国公司的营销策略旨在创造环境将私人 and 个体生活的持久部分予以殖民化从而俘获社会本身。这反映了或者说事实上推进了杰哈利(Jhally)所说的“对我们文化势不可挡的……商业殖民化”。这种具体化过程的最终

^①以“赞”的形式(Facebook 2012)。

面貌很可能是那种放任将个体建构为品牌或商业品牌的平台的意识形态和实践。这种现象在博客领域里非常显而易见。为抓住广告公司的眼球以便从商业部门获得利润，成千上万的博主通过在 Web 2.0 的沟通平台上纳入或曝光他们的消费，充当了大品牌和产品的广告海报。结果，沟通平台和基础设施构成了一个深具活力的劳动剥夺的舞台和雇佣劳动之余的“生活”。当日常生活的闲暇时间和社会条件整合进资本积累的生产—消费关系中时，用户作为图片、文本、视频、故事的无偿生产者而被具体化，而后者被转化成商品出售给广告商和公司。诸如脸书这样的商业平台上的用户原创内容的所有权归属、存储和处理，都以创造剩余价值为目的。当然，这是企业投资的整体理念。事实上，互联网充斥着资本的利益，因此你基本可以将其归为“企业所支配的……空间”（Fuchs 2011，337）。

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公共空间的商品化具有重大影响。例如，根据有关公共空间私有化的研究，现代手机技术具有新颖和能动的方式来引诱对象进入资本积累的生产—消费关系之中。对公共空间私有化过程的传统讨论聚焦于公共空间如何被转化为大型购物区、企业化区域、封闭社区等，产生了森尼特（Sennett）所说的“死去的公共空间”（dead public spaces）。这些经过消毒的、由企业掌控的商品化空间遍布全球，越来越引人注目。这些空间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他们如何通过将消费模式整合内化于日常生活的组织中来影响社会关系和行为。

然而，随着手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所有的公共空间都被潜在地商品化了。一个人很可能通过手机频繁登录他的脸书账户，仅仅这一事实就开启了公共空间商品化的全新维度。这意味着你至少有可能成为持续的企业监控的对象，会被整合进你的网络里的诸多行动者所监视，因此你所进行的是被资本侵占的无偿劳动。这不仅对隐私概念本身（Fuchs 2011，313）而且事实上对构成闲暇时间、工

作与公共空间的整个概念体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智能手机通过使用快速反应码（Quick response-codes）等使传统广告与网络活动达成互动，物理公共空间（physical public space）里的活动（无论是在去上班的地铁上还是在你住宅区墙上的广告牌上）就融合进了你虚拟空间里的活动中。这样的“应用程序”似乎促进了个体传播模式的发展，也使私人主体殖民化，并通过将他们转移到资本积累的生产—消费关系中从而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社会行为模式。这样的“应用程序”具有一种双重商品化的特征，它们既是用户要购买的商品，同时又吸引用户投身到更多的消费活动中。毋庸置疑，当网络传播发生时，手机的发展和空间的大规模错位也开启了更积极且具创造力的非商业传播行为。它也为反抗资本和支撑劳动剥削的政治结构的社会动员和抵制行动增添了力量（Fuchs 2011）。当然，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在于沟通型社会关系被资本殖民化。

与剥夺性积累的特征相关，诸如脸书、MySpace、Gmail 和 YouTube 之类的网络企业主对隐私的监控和侵入可以理解为社会关系及其自身具体化的扩展方式。但我也想强调在原始积累过程中另一种内在因素——暴力——存在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接受齐泽克（Žižek 2008）的系统暴力及其后来继承他的思想的主观维度（物理的）和客观维度（结构化的或符号化的）的暴力的思想，我们就可以认为，企业凭借先进技术监控我们上传的信息和我们参与的网络活动，而这种对私人主体的监控已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客观暴力。倘若对这些海量信息如何存储和使用缺乏透明度，如此占有大量的私人与群体的私密信息，就会被理解为对主体的潜在威胁。遍布广告的网络和平台出于满足广告商的利益会审查和禁止某些内容和活动，除此之外，私人主体的信息有可能被出售给任何人。这意味着，有关政治议题或其他社会敏感事务（用户可能认为隐私设置和亲身交

流非常隐私)的信息,会被收集起来,服务于商业广告以外的目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网络企业的监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潜在威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信息被用作何种目的,谁在购买这些信息,私密或个人信息流通到何种程度都没有安全保障。脸书之类的企业所拥有、搜集和加工的敏感信息,可以作为商品出售给军事—工业联合体的主事者或政治人物。因受监控的主体和从用户发出的持续信息流是市场里的商品,因此客观暴力成为了一种对那些个人或私密信息与主政的政治经济势力的当前利益相矛盾的那批人的潜在威胁。

四、结 论

为了识别新闻媒体与传播体系在当前资本积累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功能,我曾提出,马克思(Marx 1867/1990)的原始积累概念和哈维的剥夺性积累理论可以对批判媒体和传播研究产生贡献。原始积累作为资本扩大再生产中的一套持续显现的特征,该概念有助于理解当前新闻媒体的内容、新闻流和新闻媒体体制以及网络传播平台里的一些显著元素。在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时代,资本积累突显的过程与马克思所描述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如出一辙。当前的全球危机表明,资本扩大再生产正面临诸多限制,因此对确保资本积累的新途径的开拓表明,我们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方面正被并将继续被重新置入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中。在这些变革的过程中,商品化的新领域不断被发现,侵占无偿(闲暇时间)劳动的方法不断得到开发。在这些过程中,新闻媒体体制和网络传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本文触及了两个原始积累/剥夺性积累对媒体和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贡献的两个领域。

首先,我分析了新闻所特有的意识形态维度以及财经新闻流和

体制在资本积累中发挥的功能。第二，我探讨了剩余价值是如何在日常互联网应用和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不同方面。

第一个方面可以概括为新闻媒体怎样促进了公地的私有化、怎样支持了公共资产向私有产权关系的转移以及怎样将反抗资本的社会动员去政治化和去合法化。另外，本文呈现了新闻流及新闻媒体体制与金融流和金融业者之间如何达成利益的一致并相互勾结，由此建立了与金融新闻与金融业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一关系也依附于信息与传播技术的迅速变革和资本积累的时空压缩。

第二个方面则剖析了 Web 2.0 的政治经济学并特别关注了生产性使用者（producers）如何被商品化并被出卖给广告商，以及用户在如脸书这样的网络平台里所进行的网络活动如何被资本占有。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应用的商品化的影响有可能非常深远。资本所主导的对闲暇时间的殖民化，对消遣娱乐、人际关系乃至个体本身的整体商业化，因企业对社交网络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层面的控制而成为可能。对私人信息进行商业化收集、拥有和处理的互联网监控是资本流通中的一大资产，可被视为是对用户的潜在威胁，甚至是资本主义剥削形成的客观暴力的一部分。

无可否认，本文侧重于体现一些负面的方面，比如主流新闻媒体如何促进和再生产了资本剥削，比如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应用如何被资本殖民化，再比如商品化过程如何往往支配了全球媒体和传播体系的信息流。然而，媒体生产和传播技术的多个方面也指向了相反的方向，并且开启了全球背景下对抗霸权的新形态。另类和激进媒体的积极生产和流通和当前建设公共互联网的抗争是批判媒体和传播研究中有待突显的重要方面。新闻媒体生产和传播技术领域从来就不是单一而僵化的，因此它也需要从不断涌现的另类视角进行理论化和分析（Fuchs 2011）。毕竟，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开创性理论也指出了整体资本剥削的其他可能性。

参考文献:

- Almiron, Núria. 2010. *Journalism in Crisis. Corporate Media and Financialization*.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 Arrighi, Giovanni. 2010.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Verso.
- Bennett, W. L. Pickard, V. Iozzi, D. Schroeder, C. Lagos, T. and Caswell, E. 2004. Managing the public sphere: Journalistic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globalization debat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4: 437 – 455.
- Berglez, Peter. 2006. *The Materiality of Media Discourse-On Capitalism and Journalistic Modes of Writing*. Örebro: Örebro. Studies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4.
- Bolander, Hans. 2000a. Atta skäl som talar för Telia. Expressens Hans Bolander: Därför kan aktien bli en vinnare. *Expressen*, May 21. 6.
- Bolander, Hans. 2000b. Börsexperterna tror paklipp. *Expressen*, May 31. 6.
- Bolin, Göran. 2011. *Value and the Media*. Farnham and Burlington: Ashgate.
- Callinicos, Alex. 2009. *Imperialism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olity Press.
- Carter, Cynthia. and Weaver, C. K. 2003. *Violence and the Media*. Buckingham and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Cottle, Simon. 2006. *Mediatized conflict: developments in media and conflict studies*. New Yor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Dalarnas Tidningar. 2010. Samycket har Teliaaktien fallit. Dalarnas Tidningar 14 June 2010.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2. <http://www.dt.se/nyheter/dalarna/1.3086140-sa-mycket-har-teliaaktien-fallit>
- Doyle, Aaron. 2003. *Arresting Images: Crime and Policing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Camera*.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 Ekman, Mattias. 2011. *The Global Justice Movement in Swedish Media: Hegemonic formation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journalism and capitalism*. (English title) Stockholm: JMK.

Facebook. 2012. Facebook CocaCola. Accessed 20 February 2012. <http://www.Facebook.com/cocacola>

Fairclough, Norman. 2006.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Fraser, Matthew. 2009. Five reasons for crash blindness. *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 20(4): 78 – 83.

Fuchs, Christian. 2009. Some reflections on Manuel Castells' book *Communication Power*.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7(1): 94 – 108. Accessed 27 February 2012. <http://www.triple-c.at/index.php/tripleC/article/view/136/90>

Fuchs, Christian. 2011.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Galtung, Johan. 1990. Cultural Viol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7(3): 291 – 305.

Gramsci, Antonio. 1929 – 1935/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Halloran, James. D. Elliot, Philip. and Murdock, Graham. 1970. *Demonst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Hartsock, Nancy. 2006. Globalization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The Contributions of David Harvey's Dialectical Marxism. In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 Edited by Castree, N. and Gregory, D. Malden, MA: Blackwell.

Harvey, David. 1982/2006.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Verso.

Harvey, David. 1989.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 *Geografiska Annaler*. 71B: 3 – 17.

Harvey, David.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avid. 2006.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Harvey, David. 2010a.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London: Verso.

Harvey, David. 2010b.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London: Profile Books.

Hesmondhalgh, David.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London: Sage.

Hope, Wayne. 2010. Time Communication, and Financial Collap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 2010: 649 – 669.

Jakobsson, Peter. and Stiernstedt, Fredrik. 2010. Pirates of Silicon Valley: State of exception and dispossession in Web 2. 0. *First Monday* Volume 15, Number 7, Accessed February 25,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2799/2577>

Jhally, Sut. 2000. Advertising at the edge of the apocalypse. In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ercialism*. Edited by R. Andersen and L. Str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lein, Naomi. 2001. Reclaiming The Commons. *New Left Review* nr. 9.

Luxemburg, Rosa. 1913/2003.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Classics.

Magnusson, Karl. Erik. 2000. Telia spa's en bra start. Experterna ra'der till köp av den nya folkaktien. *Göteborgs-Posten*, May 22. 35.

Marx, Karl. 1857, 1993.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Marx, Karl. 1867, 1990. *Capital: Volume 1: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Marx, Karl. 1885, 1992. *Capital: Volume 2: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McChesney, Robert. W. 2007.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London: The New Press.

Mediearkivet. 2012. Accessed on February 25. <https://web.retriever-info.com/>

Meidner, Rudolf. 1993. Why did the Swedish Model Fail? *Socialist Register* Vol. 29: 211 – 228.

Mosco, Vincent.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econd Edi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Mouffe, Chantal. 2008. *Om det politiska*. Hågersten: Tankekraft.

Murdock, Graham. 1981. Political Deviance: the press presentation of a militant mass demonstration. In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social problems, deviance and the mass media*. Edited by Cohen, S. and Young, J. London: Constable.

Martenson, Bo. 2003. *Den televiserade ekonomin-Nyheter om statsbudgeten 1980 – 1995*. Stockholm: JMK.

Norlin, Arne. 2000. Sa" köper du Telia-Den nya folkaktien. *Aftonbladet*, April 15. 5.

Olivera, Oscar, and Lewis, Tom. 2004. *Cochabamba! Water Rebellion in Bolivia*. Boston: South End Press.

Schechter, Danny. 2009. Credit crisis: How did we miss it? *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 20(1): 19 – 26.

Sen, Jai, and Waterman, Peter. (eds.) 2009 *World Social Forum Challenging Empires*. Montreal/New York/London: Black Rose Books.

Sennett, Richard. 1992.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W. W. Norton.

Smythe, Dallas. W. 1982.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Edited by Durham, M. G and Kellner, D. M. 2006. Malden, MA: Blackwell.

Viscovi, Dino. 2006. *Marknaden som monster och monster. Ekonomiska experter och nyheter om ekonomi i Rapport 1978 – 1998*. Göteborg: JMG.

Wallerstein, Immanuel. 2001. *Liberalismens död*. Stockholm: Vertigo.

Wahl-Jorgensen, Karin. 2003. Speaking Out Against the Incitement to Silence: The British Press and the 2001 May Day Protests. In *Representing Resistance-Media,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Global Justice Movement*. Edited by Opel, A. and Pompper, D. Westport/CT: Praeger Publishers.

Wendel, Per. 2000. Sa" köper du folkaktien. *Expressen*. May 21. 6.

Žižek, Slavoj. 2008 *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 New York: Picador.

Žižek, Slavoj. 2009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

伊安·费舍尔 (Eran Fisher)^①

如何以更少的异化创造更多的剥削？

——社交网站中的受众劳动^②

俞平 (译), 吴畅畅 (校)

[导读] 受众劳动的概念已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传统政治经济学分析关注与媒体所有权，认为媒体也是一个由特定生产关系组成的生产场域，而受众劳动这一概念对此作了修正，突出了受众在媒体价值创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受众既是商品也是工人，因此将问题的焦点指向了受众剥削。近期，媒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转型——尤其是 Web 2.0 和社交网站的出现，使得人们对政治经济学分析又重新燃起了兴趣，并对受众剥削进行再思考。本文将脸书 (Facebook) 作为个案研究的范例，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两大主题——剥削与异化，来探讨社交网站中的受众劳动。本文认为，受众劳动中剥削与异化之间的历史转向是伴随着大众传播向社会化媒体过渡这一过程的。在大众传播时代，对受众劳动的剥削能力是很有限的，而异化后，这一能力便大大提高了。

^①以色列开放大学社会学、政治学及传播学系，eranfisher@gmail.com。

^②感谢尤里·兰姆 (Uri Ram) 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一并感谢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Christian Fuchs) 和文森特·莫斯科 (Vincent Mosco) 为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与此同时，社交网站中的受众劳动，因其涉及到传播和社会性，因此通过自我表达、真实性以及与他人关系能够缓解异化。此外，本文还提出，社交网站的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剥削和异化的辩证关系之上的：为了去异化，脸书的用户必须相互交流，进行社交，但这样却加重了自身的被剥削。反之亦然，脸书为了能够剥削其用户的劳动，就必须为他们去异化。

[关键词] 受众劳动，社会化媒体，社交网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剥削。

一、大众传播中的受众劳动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传播学研究的贡献极为深广（如，参见 Hardt 1993, Artz, Macek and Cloud 2006）。而媒体研究分为各具影响力的两大分析维度：文化分析和唯物主义分析。^①这两种方法在精确定义受众扮演何种角色时，持截然不同的观点。文化分析聚焦于超结构，并揭示出媒体内容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所扮演的意识形态角色。举例而言，此类文化研究分析（Holmes 2005, 23—24）包括对书籍（Radway 1984）、杂志（Lutz and Collins 1993, Stevenson Jackson and Brooks 2001）、广告（Du Gay *et al.* 1997, Section 1）、电影（Wasko 2001）、电视节目（Liebes and Katz 1994）、新闻（Said 1981）的意识形态内容进行分析（Akass and McCabe 2007）。分析媒体内容潜在的意识形态关涉到一些资本主义关注的问题，如阶级、消费主义和不平等，以及其他议题，如性别、民族主义和种族

^①我使用“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两个概念来区分两类观点（ideal types），指的是分析类型，而非指代实际的学派，或具体研究者，后者指代的意义通常更为微妙。例如，我不会研究为何法兰克福学派从不研究意识形态，但我会探讨文化研究的理想类型及其对意识形态的关注是如何集中体现在该学派的著作中的。

(Hooks 1996; Hall 1995)。

这一分析维度的发展核心围绕着两大思想遗产：法兰克福学派 (Adorno 2001, Horkheimer and Adorno 1976) 和伯明翰学派 (Hall 1980/1995)。这两大学派最大的分歧在于对意识形态研究的阐释和对受众扮演角色的论述的不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意识形态是被强加于被动的受众的。因此，他们研究的是意识形态如何被融入媒体信息之中。而伯明翰学派则赋予受众积极“解码”（摆脱强加于他们的意识形态）的能力；或是“解读”媒中的体意识形态信息的能力，并抵制这些信息 (Hall 1980; Mathijs 2002)。因此，他们展开的是，在媒体文本的多重意义建构中受众作为参与者的理论化研究 (Ang 1985; Morley 1992)。一般说来，无论是假设意识形态内容是自上而下地通过宣传途径传给受众的，还是假设受众积极参与到意义生产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这部分思想成为了媒体分析的一个意识形态场域。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传播学研究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聚焦于“基础” (base) 的唯物主义分析。这一政治经济学分析揭示了媒体机制中的生产关系。同时，人们也可以从中发现两大主要的研究方法。首先，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媒体的所有权。这一研究方法将媒体作为一种生产资料 (means of production) 进行剖析，探究媒体垄断、传媒公司并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媒体工作者的就业等问题 (Mosco 2009; Mosco and McKercher 2009; H. Schiller 1991; D. Schiller 2010; McChesney 2008; Herman and Chomsky 1988)。20 世纪 70 到 80 年代，人们常常将媒体作为一个天然的生产场域来分析，突出受众在创造媒体价值过程中所扮演的生产角色——既是商品又是劳动力，从而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修正。这一研究方法的开创者是达拉斯·斯迈思 (Dallas Smythe)，他关于受众商品的突破性研究 (Smythe 1981) 奠定了这一方法的基础。斯迈思认为，大众传播过

程中最首要的并非受众对媒体内容（由传媒公司创造）的消费，而是向广告商出售受众的注意力。这一假设使受众成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领域一个主动的参与者。斯迈思还提出，受众的劳动包括认知和情感两方面：学习渴望和学习购买某些特定品牌和特定商品。他批评上文所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存在“盲点”，因为这种分析法只关心媒体产品的内容。

斯迈思没有将媒体仅仅视作一种意识形态的、超结构的工具，即支持经济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的工具，类似于工厂里放置的机器一般；相反，斯迈思将媒体定义为资本积累链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媒体将受众商品贩卖给广告商。作为回报，受众离不开电视，于是也一直在观看着广告节目，这成为了最重要的消费助推器。斯迈思首次将大众传媒和受众置于发达资本主义的中心，提出“大众传播生产出了受众，并将之作为商品贩卖给了广告商”，同时广告商通过“使受众自己走向商品市场”实现了“受众力量”（audience-power）（Jhally and Livant 1986, 129）。从某些方面看，斯迈思将伯明翰学派的积极受众的概念从意义生产场域移植到了赚钱获利的市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理论路径进一步发展，将媒体作为一个天然的价值生产的场域进行分析。杰哈利和利凡特（Jhally and Livant 1986）认为，斯迈思过于关注受众劳动对于品牌生产者的贡献，这“已经偏离了传播学分析，发展成了对受众消费行为的分析”（Jhally and Livant 1986, 129）。他们说：“斯迈思最终关心的是，如何在更广泛的社会资本生产体系内将注意力吸引到传播领域。”（Jhally and Livant 1986, 129）杰哈利和利凡特批评斯迈思过分强调了信息（作为刺激消费）的使用价值，他们则探索了“更深深植根于传媒产业”的盲点（Jhally and Livant 1986, 129）。因此，他们将观察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因为观察能够影响人对价值创造的

“感知能力”（Jhally and Livant 1986, 126）。媒体剩余价值的创造是基于“额外收看”电视广告所得，即以超出实际需要地收看过多广告来支付电视节目制作。这一“剩余收看时间”（Jhally and Livant 1986, 127）意味着受众实际上是在为节目制作方劳动，而非广告商。

在这样的分析视野里，媒体被描述成一个受众（劳动力）和媒体提供商（资本）激烈争斗的场域，并且这场斗争随时间推移不断重复上演。杰哈利和利凡特（Jhally and Livant 1986）借用马克思对广泛剥削和集约剥削（extensive and intensive exploitation）的区分，进行了上述分析。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斗争永远是随时间推移不断重复进行的，因为剩余价值只能从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内产生。这部分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并非都用于交换等价物，而是被归入资本，并被纳入资本积累的过程（例如，通过投资新技术）。由于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紧随着一个阶级（工人）的价值创造过程，且被转入另一个阶级（资本家）时未对工人阶级进行补偿，马克思将此定义为剥削。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天然生成的问题便是，剩余价值会随时间流逝而消失，资本积累也就丧失了其来源（Marx 1993, Ch. 13）。资本努力拓展更多途径以扩大剥削的范围，以此提高或仅是维持其剩余价值率。实现这个目标有两种方式：广泛剥削和集约剥削。广泛剥削指的是通过技术和劳动统筹规划增加劳动时间，例如延长工作日，或者减少午休时间和假期。集约剥削则是通过提高劳动效率实现的。杰哈利和利凡特（Jhally and Livant 1986）提出，这两种剥削的过程中大众传播领域都早已发生。受众历来都被要求付出更多的劳动。广泛剥削的实现是通过带给受众更多广告，这样便能使之观看（即劳动）更多时间。集约剥削，或曰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则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重组观看人群和观看过程”（Jhally and Livant 1986, 133）。重组观看人群包括各种技术手段，从媒体市场调研到评估体系，所有这些手段都是为了帮助媒体公司能

够将特定广告投放到某一具体受众群中，如市场细分能使广告价值得到提升。正如杰哈利和利凡特所说：“将受众群体具体化、细分化地对待，能够使受众形成一种‘集中观看’，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存在无效观看。”（Jhally and Livant 1986，133）因为具有高度针对性的广告投放成本更高，“我们可以说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受众，观看得‘更为卖力’，更集中，也更有效率”。（Jhally and Livant 1986，133—134）相对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另一种方式则是，通过较短的广告分割时间段。

二、大众传播的异化

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就十分关注传播中的剥削问题，但却几乎不曾在这一框架中提及异化这一概念。这一点非常奇怪，因为马克思认为这剥削与异化之间存在着解不开的关联。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观念相当复杂，也是多层次的，涉及过程和结果。异化是指工人与重要的生活过程和事物相分离，以及与这些事物之间产生的陌生化状态。这正是工人与劳动过程、与其他工人、与劳动产品的疏离，以及最终与他们自身——这一物种——的疏离（Marx 1978）。资本主义劳动最终导致的是异化，它不是一种工人自主掌控的活动；也并非由劳动来具体化一个人的本质；也非一种自我实现和表达的途径；更不可能使人通过劳动与他者关联、交流、合作。

我使用异化一词，借其较为宽泛的含义，以突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人文主义特性，也是将其与结构主义批评和经济学批评区分开来。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中，异化和剥削是密不可分的，甚至被认为是互为补充的两条教义。异化既是剥削的前提，又是剥削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基础是私有财产和劳动商品化，而异化和剥

削是这二者的必然结果。如果不能解决其中一方，则另一方也无法解决。然而，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中它们却指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这两个不同方向分别来自于（受阿尔都塞影响）青年马克思和思想日趋成熟的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较为人文主义的批判，而成熟的马克思则更侧重于经济主义的批判。这一区分在实践中的准确性有待商榷（成熟的马克思还坚持认为异化与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因和结果有关）。尽管如此，它仍抓住了深入探讨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两大关键的切入点。

异化造成了“价值”和产品与其生产者分离的社会经济环境，并将价值和产品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此外，异化暗示着一种存在状态：不控制任何事物（劳动过程、产品等）；一种疏离（与个体的人性等）。深入探究这一概念，以及为何将之与剥削联系起来，是人文主义视角凸显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我使用“异化”一词来指代劳动、劳动过程、劳动产品以及人的本质产生或多或少的异化现象的条件。这样对纯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妥协，得到了史实的证实。诚如吕克·博尔坦斯基和夏娃·夏佩罗（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所述，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史和政治史一再用一个问题掩盖另一个问题，而非消除这两个问题本身。由此可见人文艺术批判与经济社会批判之间的区别。本文中，异化程度较轻意味着有更多自我表达的可能；更有可能控制生产过程、使本质客观化、与他人联系与沟通。例如，在某人的脸书主页上“劳动”与收看电视节目所作的劳动相比，前者的异化程度较轻。

在自由话语体系内，收看媒体节目只是意味着一种休闲活动。媒体消费被描述成异化的对立面，因为异化作用于生产领域；它是一种对工作日异化的逃离，是去异化的一个机会（正如使用与满足理论中所援引的例子，见 Blumler and Gurevitch 1973, 4）。因此，收看媒体节目是一种消费行为，体现了受众主动选择的能力。劳动过

程中，工人没有任何控制力，与之相反，收看电视时，人们一般认为控制权是在观众手里的（准确地说，是随着遥控器的诞生而来）。那么，收看大众传媒就在自由话语体系中被建构成一种消费主义的、非理性的、有趣的，并能满足需求的活动。

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忽视了异化问题，而文化主义分析却关注到了异化的一些核心问题，即便未触及其本质。在资本主义媒体环境中，如果收看是一种劳动形式，那么劳动过程和内容也是与受众本身相异化的。事实上，广告和节目（支持广告内容）都导致并加速了受众异化，这意味着自我满足和客观化应该，同时也将来自于消费和休闲活动，而非来自于劳动。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Adorno 2001, Ch. 6）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探讨。然而此类分析却没有明确地将受众剥削与受众异化直接联系起来。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异化和剥削是密不可分的，也是资本主义基石——私有财产和劳动力商品化的必然结果。一方不得解决，另一方也不可能解决。

三、社交网络中的受众劳动：以脸书为例

近期，随着媒体环境的变化，人们重新燃起了对受众劳动的兴趣，尤其是在 Web 2.0 和社交网络出现以后。新媒体环境的某些特征使对受众劳动的再思考显得尤为重要。与大众传媒相反，社交网络的特征体现为高度参与性；用户提供内容（UGC）；创造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包括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

马克思主义的新媒体环境研究几乎只聚焦于受众剥削。同时，主流研究（自由主义的）则倾向于重申共识，对社交网络进行意识形态建构——社交网络通过向用户提供自我表达的机会、真实性、沟通交流、与他人合作的可能，并且使之能够深刻地参与到文化、

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去，甚至能获得一定的控制权。

我认为，这两大趋势貌似互相对立，实则辩证地联系在一起。在解读社交网络时，剥削和去异化并非两个简单对立的角 度；相反，马克思主义理论鼓励我们兼容并蓄，将二者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中。社交网络通过向用户提供了更多自我表达的机会、真实性、沟通交流、与他人合作的可能，因此也赋予了受众更多对象化的机会。当用户沟通和社交能力被改写时，他们的劳动同样成为了剥削的对象。接下来，我将以脸书为例，详细考察社交网络剥削和异化的辩证关系。

（一）作为传播工具的脸书

社交网络用户都在做些什么？他们究竟生产了什么？他们是如何被剥削的？为了对脸书进行辩证地分析，我们应该既将其视为一种交流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生产的工具。它不仅是一种兼容多种新交流方式的新媒体（Napoli 2010），还是推动新生产方式的一种技术。这种分析能够克服早先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弊端，即将交流工具和生产工具两种功能割裂开作分析。当这种辩证的研究方法适用于任何形式的大众媒体研究时，这种方法在新媒体环境中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在新媒体环境中交流与生产的关系更为紧密。事实上，Web 2.0 的独特性激发着研究者对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进行更详细的探索。（Scholz 2010；Lee 2011）

脸书是当今世界最流行的社交网络，于 2004 年 2 月推出，至 2011 年 12 月底已经拥有 8.45 亿活跃用户（Facebook 2012b）。脸书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可以创建个人主页的平台，使其能够充分展现自己，并能就其行踪、想法、感受和 活动进行不同深度和广度的交流。用户可将其他用户加为好友，与之交流，关注他们的公共消息和行踪。用户也可以根据共同的兴趣爱好创建社区或次级网络。用户在

个人主页上能够根据不同类别来描述自己，例如性别、教育背景，也可以通过生活方式进行分类，如最喜欢的艺术家和兴趣。

用户通过各种私人或公共工具与朋友交流，如“状态”，它能告知好友用户当前的位置和正在进行的活动；“墙”是每位用户主页上的一块留言板，朋友们能够在“墙”上留言；“聊天”功能则能够与朋友进行即时的私人聊天。用户还可以创建或加入兴趣组和“喜欢”页，这些功能最初是由政府、商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发起和运作的，将之作为一种广告、销售和动员的手段。包括脸书在内的网络社区过剩的现象可能导致社会行动——通过通讯和各种组织形成的政治的、经济的、公民的、社会的行动。报道称，脸书在推动和组织社会运动及政治剧变方面起到了日益核心的作用，从反对全球化运动到阿拉伯之春都是极好的例证。

脸书在社交方面具有天然的“倾向性”，因此即便是个人主页上一些个人行为也会被自动转化成为一种社交形式。例如照片应用中的照片“标签”，这是脸书最热门的一个应用，利用它用户能够上传相册和照片。如果一张照片中圈出用户的朋友，那么系统就会自动向这位朋友发送通知，并附上该照片的链接。这样，发布照片就会变成一种社交行为。

这样的描述突出了脸书作为社交工具的特性，这一特性使用户能够去异化，这正是大众媒体所欠缺的。大众媒体时代是由电视、广播、报纸和电影所把持的，是集权化的，只运行信息由少及众、自上而下地单向传播。大众传媒在主动的生产者与被动的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了等级制的二元对立，媒体内容都是包装好之后再行销售的，因此缺乏多样性，它假设受众具有同质性，同时也导致受众需求的趋同。与之相反，社交媒体具有多种传播形式：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它是互动的，提高了用户的参与性，将大众媒体时代被动、同质的受众变为主动参与的受众。互联网上的传播使个人

能够讲述他们的生活（如博客）、公开发表他们的观点（评论）、展现他们的创造力（YouTube）。互联网用户还能够在参与性日益提高的文化环境中互相协作（Jenkins 2009；Burgess and Green 2009）。事实上，许多研究都是从人的物化角度来研究脸书的社交功能及其对个人的赋权能力的。

因此，互联网研究倾向于将多样性的、民主的、打破时空限制的传播作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而实现手段就是互联网。同时研究还关注脸书上的用户行为，尤其是个人有意通过该网站进行社交的用户行为。如《方法论的个人主义》（Popper 1971，Ch. 14）一文，将个人用户作为分析的起点；在此基础上，更多研究聚焦于用户满足度（Bonds-Raacke and Raacke 2010；Quan-Haase and Young 2010），或关注脸书用户使用时的主观性和心理状态（Gonzales and Hancock 2011，Ong *et al.* 2011）。最后，传统的虚拟民族志研究也强调了脸书作为社交工具的特性，将隐私和私人领域的消融作为研究的首要问题（West，Lewis and Currie 2009；Brandtzaeg，Luders and Skjetne 2010）。

借用脸书网的宗旨“赋予人们分享的权利，让世界更开放，让联系更紧密。每天都有数百万人在使用脸书与朋友联系、上传不限量的照片、分享链接和视频、更多了解所遇之人”（Facebook，2012），这些研究将其视为一个集传播、社交和社区于一身的虚拟空间。

（二）作为生产工具的脸书

公众和对脸书的研究都首先将其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并强调了它在去异化方面的贡献（或阻碍）。如上所述，本文的目的是要揭示出其中的物化是如何与剥削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回到现实，脸书首先是一家商业公司，其首要任务是资本积累，因此我们也应

该将其作为一种刺激社会关系发展的技术进行分析。此类将脸书作为产生并加剧剥削的资本主义技术的分析应该与将其作为去异化的传播媒介的分析结合起来。

脸书的积累战略从其跌跌撞撞的市值可见一斑。当脸书的市值极度不稳且投机成分过强时，其估值仍在 750 亿到 1000 亿美元之间。脸书的身价确值 1000 亿美元？其价值源于何处？从社会学层面上看，社交网络的生产关系又是怎样的？我们不仅将脸书作为一种传播工具，而且还视其为体现社会关系的技术，借此我们能够逐步勾勒出社交网络政治经济学的轮廓。

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涵盖如下方面：把脸书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同时也是生产工具；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媒介。事实上，媒介与技术、传播与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而脸书正是新生产关系的缩影，在这种新关系下，价值首先不是由工人创造的，而是由受众创造的。脸书用户生产出的最重要的是传播和社交性——这是脸书价值的首要来源。

脸书的价值来自于其史无前例的信息获取、存储、占有、处理和分析能力，并能将这些信息传递给用户。因此，脸书很可能被形象地误解为一个信息仓库，但是“仓库”这一比喻并不能真正体现脸书的创新性。为了更好地理解脸书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必须问，信息是由什么组成的？信息如何而来？又是由谁创造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将信息分为五大类，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之间是垂直层叠的关系，即人口学的、个人的、传播交流的、行动的和相关联的。此种分类说明，脸书绝非一座“仓库”，而是一家“工厂”，它通过传播和社交生产信息，而非简单的存储信息。脸书的创新性和独特性——也是对于政治经济学尤为重要的——是社交网络中的大部分信息来自于对它的使用，来自于其本身作为传播和社交媒体的特性。因此脸书是传播（媒体）手段和生产（技术）手段的

结合。

脸书用户之间的交流产生出大量的个人和社交信息，而对于消费品行业的企业来说，这些信息的价值日益提升。这些公司原本就需要通过广告、公关和市场专业人士急切地搜寻这些信息。在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是相当“简洁”的，可称之为人口信息。社交网络成为记录、聚合、组织地理信息的主要网站。社交网络的地理区位信息来自于用户自愿开放的信息（如年龄、性别、婚姻状态或学历）或服务器所在地（地理位置）。虽然此类信息是“先于”脸书的，但并不能完全脱离脸书独立存在，因为是社交网络鼓励其用户开放个人信息的。脸书的使用条款中就有正式说明，禁止用户“在脸书上提供任何虚假的个人信息”，并引导用户“保证个人联系信息的精确，并及时更新”（Facebook 2011a）。事实上，脸书不断地调整隐私设置，以使用户信息尽可能提高公共开放度（Fuchs 2011a, 2011b）。更为微妙和根本的是，社交网络的伦理和规范是要求个人公开真实信息。早期在线社交形式，如论坛、聊天室和多用户网络游戏（MUD）等提倡的是一种匿名文化，而如今的社交网络则显示出与之相背离的态度（Turkle 1997）。

这就引出了第二类“更厚”的信息层，即从属于用户的身份和真实性的信息。社交网络的伦理要求的是公开性，用以定义、辨识个人，并将个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这类网站鼓励用户展现真实的自己，通过个人主页表达个性。这就要求用户反省自我，必须去思考、定义、表现自我。这一自反性是镶嵌在网站设计内的，鼓励用户全面、系统地开放自我。正如伊娃·伊鲁兹（Illouz 2007, Ch. 3）所说，基于个人信息的网站（如相亲类网站）在其使用条款里鼓励用户思考“我是谁”，根据网站预先设定的类别对自身进行归类，这样就使得开放个人信息显得更为合理。例如，在脸书上填写个人信息时，在“个人哲学”一栏内，用户可选择的类别有“宗教信仰”、

“政治观点”、“启发你的人”、“座右铭”。即便这类个人信息是在使用脸书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因此不能将其视作只不过是脸书所获得的先在信息，而是在社交网络的特定语境中相互勾连起来的信息。

第三层信息进一步依赖于用户对脸书的使用：基于用户传播内容的信息，即用户间的聊天内容。从经济学角度看，最有价值的信息是否是由用户生产的，仍是有争议的。事实上，企业、专业人士的注意力以及那些希图定义社交网络的应用，都首先集中在传播的内容上。他们运用了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分析人际和社交传播的内容，以破解人们谈话的内容及方式。经过分析的趋势、关键词、主题和表述方式能够与人口信息（如性别、地域或年龄）或行为信息（如消费行为）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有价值的商业信息。这样的信息是高度个人化的，能够在特定内容与特定的人之间形成特定的关系。

商业利益不仅打探用户的聊天，还使用社交网络发起、参与聊天甚至引导聊天方式。他们能够转发消息、制造热点、引领时尚，从而参与聊天。例如，病毒信息（或 meme）通常是由专业的公关人员制造和传播的（Downes 1999；Green 2010, Ch. 11）。在此类情况下，用户本身就变成了媒体，而信息就是通过他们传播的。

虽然脸书上所传播的内容覆盖了人类交流的方方面面，但有两类信息需要引起特别的注意，即一般信息（mundane information）和情感序列（emotional queues）。社交网络尤为擅长组织这类信息，且在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的价值日益提升。一般信息是关于日常生活的一些表达，如旅途中的照片，或记录自己的所到之处（Beer and Burrows 2010）。迄今为止，人们仍认为这些关于日常生活的信息碎片过于零散、无关紧要，且个人化色彩浓重，因此在公共领域其价值不值一提。但社交网络特别适合这类信息，而这些信息反过来也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使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入了大众视线。情感序列是关于伴随着交流的主观情感的表达及情绪标准。情感序

列通常与用户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如读到一则新闻或在超市排队结账。通过移动设备，社交媒体的泛在性和即时性意味着情绪一旦产生，就立刻被记录并表达出来，而非在回顾中重现。社交网络是个人的、人际间的和社会性的；同时也与休闲活动及社交相关；并且还鼓励用户乐于表达自我、坦诚相待，最重要的是要求用户具有高度的沟通性。鉴于此，社交网络尤为适宜生产和提炼以上两类信息。

第四层信息是行动的信息，即关于用户在社交网络上的活动的量与质的特征，如好友数、活跃度、在脸书上的参与度、花在脸书上的时间，以及活动类型（发帖数、上传照片数、“爱好”的数量和类型）等。

第五层，也是最后一层信息，与上一层紧密相关，即关联信息。这指的是社交网络的次级网络构成：一名用户与其他用户、与商业和政治网站、与新事件新品牌等之间的链接。通过建立关联网络，用户生产出一个个具有意义的网络、象征性的世界和语义场。关联信息对于进一步辨识和区别个体意义非凡。在后现代文明中，身份是通过各种标签建构起来的，用户“爱好”编织起的网络可以看作是辨识其身份的指标。因此，关联信息有助于揭开各指标之间的关系。此外，因为据此建构起的次级网络具有可辨识的特征，因此也是非常重要的。从公共关系角度看，次级网络是被高度区隔的组群，因为加入这些次级网络都是用户根据它们所显示的标签特征自愿选择的。故此，公关专业人士能够通过关联信息辨识出（也可以建构起）特定的组群，即对某一产品、服务或文化产品持积极态度的组群，并跟踪他们所生产的不同层次的信息，最终直接参与到这些组群活动中去（例如制造热点）。

从最基本的人口信息开始到最复杂的信息，如今社交网络使信息搜集更为简便，且并非局限于那些先在的个人信息。更为戏剧性的是，这些信息的产生和存在大多依赖于对社交网络的应用；依赖

于人们在其中的参与，并且将大部分的生活投入在了社交网络上。这是通过每一次交流传播和社交活动所产生的信息。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五类在当代经济中价值日益提升的信息是由一种传播工具生产出来的。

四、社交网络中剥削与异化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媒介分析分为两个维度：一种是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方法；另一种是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更抽象地说，这两个维度分别代表着媒介完全不同的两个侧面：传播工具和生产工具。虽然马克思坚持对社会进行辩证分析，但马克思主义的媒介研究却普遍是在这二者中择其一作为切入点（Fenton 2007）。这并不是说这些研究就完全是非辩证的，而是说辩证法并未成为媒介分析的内在特性。例如，文化分析侧重研究媒介产品，如电视节目等，是如何从意识形态上维护了生产关系，而非单就媒介本身而言。

关于新媒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对受众劳动的研究也有相对一边倒的倾向，强调社交媒体是剥削“自由劳动”的场所（Terranova 2004, Ch. 3）。这一研究方法被批评为过于绝对化，落入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窠臼（Caraway 2011）。它低估了媒介作为劳动和资本斗争场所的潜力，对资本的研究有所偏颇。斯迈思的核心观点是，大众传播使得所有时间都变成了生产实践。这一论点随后伴随着社会工厂和非物质劳动这两个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卡拉韦认为，这一研究框架无法将休闲时间与劳动时间区分开来，也未能把劳动与自由劳动、劳动能力与劳动意愿区别开。由于缺乏区分性，这一研究方法模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劳动的分类。斯迈思认为，工厂劳动时间的下降由花在媒体广告上的劳动时间的增加所抵消，而卡拉韦质疑了斯迈思的这一历史叙事。卡拉韦提出了另一种阐释，

即赋予劳动以政治行动能力 (agency)。据此, 劳动时间的减少, 休闲时间的增加是工人阶级自 20 世纪初以来坚持不懈、浴血奋战的结果。卡拉韦 (Caraway 2011) 进而又提出更为理论化的观点, 即社会工厂和非物质劳动这两个概念的潜在批判性在当代语境是缺席的。特雷伯·肖尔茨也强调, 脸书作为游戏场所和作为工厂之间是存在辩证关系的 (Scholz 2010)。

在一连串的质疑之后, 本文试图在斯迈思 (Smythe 1981) 及杰哈利和利凡特 (Jhally and Livant 1986) 的研究基础之上, 探索当代媒介形式中的生产与传播之间的辩证关系, 并进一步更新这些观点。本文认为, 在大众传媒中, 剥削和受众劳动无论是在范围上的扩散, 还是程度上的恶化, 都没有遇到太多阻碍。剥削范围的扩大受制于观众收看广告的能力。观看电视广告通常并非受众愿意欣然接受的事。因此, 媒体不能播放过多的广告, 以免失去观众的注意力 (这是售卖给广告商的现实劳动力)。电视播放的新技术使得观众获得更多的自主选择权 (如 TIVO), 同时也为剥削进一步设限, 因为受众可以选择跳过广告收看节目。

剥削程度的恶化同样也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 大众传媒的监控、评级和细分系统代价高昂。^① 另外还存在一个悖论: 关于关注的信息越精确, 收看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上升得越多 (Jhally and Livant 1986)。然而, 价值的这一增长又被搜集精确信息的成本所削减。此外, 观众的收看情况是基于统计分析的, 因此不够精确和可靠。受众个体的需求、个性和行为则很难评估。第二个因素则限制了大众传媒中剥削在程度上的恶化, 即剥削程度的加深需要媒体公司制作出能够提供恰当“诱饵”的节目, 以吸引观众。如果未能吸

^①例如, 2011 年全球最大的媒体评级公司尼尔森的收入超过 55 亿美元 (Nielsen 2012)。

引到足够多的受众, 或未能吸引到预期的那部分受众, 就会输得一败涂地。

而社交网络却超越了这些限制, 使得在大众传媒中受限的剥削得以在范围和程度上进一步扩展。用户在社交网络上花费的时间更多, 这就使得剥削实现了范围上的扩大。脸书用户一直在不停歇地劳动。2010年1月, 脸书成为美国网络用户使用时间最长的网站 (Parr 2010)。网络用户平均花在脸书上的时间超过浏览谷歌、雅虎、YouTube、微软、维基百科和亚马逊时间的总和 (Parr 2010)。尼尔森公司当月统计显示, 美国用户平均每月用于浏览脸书的时间超过7小时, 平均每天超过14分钟。脸书的美国用户还并非是最为铁杆的。2011年9月, 行业检测与分析公司益百利发布的一份行业研究报告表明, 脸书使用最频繁的是新加坡, 平均访问量超过38分钟 (Emerson 2011)。

此外, 得益于移动设备 (从笔记本电脑到智能手机) 以及无线网络 (从Wi-Fi到3G) 的普及, 用户几乎可以随时随地登录脸书浏览。收看电视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相比之下脸书则提供了更为灵活的使用模式。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天, 人们都可以在脸书上花费更多时间用于社交。自我监察 (Self-surveillance) 技术, 如Foursquare或脸书的位置服务也使用户与朋友们只有一臂之遥, 并使他们的在线活动时间延长。

社交网络同样加深了剥削的程度。大众传媒企业是通过调配资源来区隔其受众的, 而社交网络则与之不同。在社交网络上, 用户自主地将自己归类, 这是电视时代无法想象的。这一过程成本低廉, 因为事实上它是“外包”给用户完成的, 用户此时就是生产者 (Bruns 2008)。此外, 社交网络所收集到的关于受众的信息也更为精确和“丰满”。因此, 大众传媒对其受众的了解只是统计意义上的, 是聚合在一起的抽象的碎片; 而脸书所了解的受众却是真实的个体。

社交网络的覆盖面能触及到更细微的方面，因此也加深了剥削的程度。同时这一生物政治学的神经系统是阻碍用户的非物质劳动的。

这便对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提出了质疑。非物质劳动和一般智力这两个概念意味着知识的去地域化，这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积累的首要生产方式。保罗·维尔诺（Virno）提到“知识是无法与主体以及他们的语言活动分离的”（Virno 1996，引自 Dyer-Witheford 1999，222）。这些知识难以确知来源、不宜本土化，也不宜整理收集，因为它们是在私人空间内、在休闲时间段、通过个人间的交流被“生产”出来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本文的分析结果认为，我们应该将社交网络作为一种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技术加以研究，通过这一技术生产知识的劳动——非物质劳动，以及被生产出的知识——一般智力，都得到了再地域化（Peterson 2008）。

所以，与大众传媒相比，社交媒体中剥削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依赖于积累阶段前所未有的新生产力的运用，尤其是通过传播和社交进行的信息生产。社交网络的受众凭借接受信息、使用媒体平台表达自我、交流、社交创造了价值。这种剥削受制于去异化的承诺。社交网络所提供的媒体环境使受众的劳动可能走向物化：用户对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虽然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并非拥有所有权）有了更多的掌控权；劳动带来的交流使用户之间相互联系更为紧密，并使人类存在的更多方面得以具体化地表现出来。人们可以在社交网络这个空间内自我表达；结交朋友；组建社群；组织政治、文化、社会或经济活动。

社交网络推动着两个过程的发展，即剥削的进一步恶化和异化的缓和，这二者不是简单地同时呈现，而是辩证地相互关联。社交网络在剥削与异化的辩证关系上建立起了新的生产关系：为了去异化，用户必须进行沟通和社交。他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分

享信息、与朋友交谈、浏览朋友的帖子、关注其他人，也被其他人关注。但这样做也加深了对他们自己的剥削。反之亦然，脸书为了剥削用户劳动，就必须为去异化作出贡献，传播一种理念，即去异化只有通过社交网络上进行沟通、社交才能实现。这是关于传播、网络作协、自我表达的理念（Dean 2010），它将网络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视作去异化的必由之路。据此，异化是与沟通不足和社交孤立有关，而通过交流传播和社交网络这一痼疾是能够被治愈的。因此，越多的用户参与到社交网络，上传更多的照片，关注更多的朋友，标记更多自己的“爱好”——简言之，他们发布更多的真实的自我表达，参与更多的人际交往，他们就将更为物化，也就更去异化。换个角度看，他们劳动得越多，创造越多的剩余价值，他们被剥削的程度也就越深。

五、传播与生产的封闭循环

脸书这一案例说明，社交媒体的新环境孕育出了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关系与大众传媒环境中固有的，也是被斯迈思（Smythe 1981）、杰哈利和利凡特（Jhally and Livant 1986）理论化了的生产关系有着显著不同。前者是基于剥削和异化之间新的平衡关系之上的。相较于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社交网络可被视作一种泛化且深化剥削的技术，但与此同时又缓解了异化。社交网络上的受众劳动更具剥削性，而去异化性也更强。事实上，社交网络剥削受众劳动的能力依赖于它去异化的能力。社交网络用户劳动得越多——生产更多的信息、参与更多的交流和社交，这一劳动对他们而言去异化的程度也越甚。

近期，人们对受众劳动和剥削的兴趣日盛。在两个互补的章节中，马克·安德烈耶维奇（Andrejevic 2011a; 2011b）检视了剥削和

异化的分类应用，以分析社交媒体政治经济学。他提出，只有在社交媒体用户不能掌握他们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时，我们才可以认为他们是与其媒体劳动相异化的（Andrejevic 2011b）。他将与社交媒体剥削相关的两类信息区分开来：有意信息（intentional information）和无意信息（unintentional information）。前者是从用户的有意行为（如上传照片或写一条微博）中提取的信息，后者则是用户在进行其他活动时无意中生产出的信息。安德烈耶维奇（Andrejevic 2011b, 85）认为，无意信息的产生可以被描述为“用户活动被异化或疏离”。而我提出的由用户生产的信息分类则说明，安德烈耶维奇所提出的这一区分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区别被异化的劳动和未异化的劳动的理论基础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用户生产的大部分数据具有双重性：既是有意的，如上传照片，同时也是他们也生产无意信息，如由照片中所涉及的其他用户或对照片进行评论的用户组成的用户网络。

本文的论点基于对异化的不同理解，即异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本文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工人或多或少会遭到异化。因此，我认为社交媒体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是建立在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之上的，即媒体企业有权修改用户生产的传播产品（也即，剥削他们）；同时，反过来又赋予用户控制传播生产过程的权利，并使他们拥有更多去异化的机会。

安德烈耶维奇（Andrejevic 2011a, 83）的确指出了社交媒体用户与社交媒体企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事实上，他明确定义了社交媒体语境下使用剥削这一概念所面临的挑战，即要解释“自愿参与与商业剥削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为了解释社交媒体中的剥削，我们还必须将受众劳动看作是用户乐趣的来源，是“在消费领域克服异化”的一种方式（Andrejevic 2011b, 80）。然而，他并未说明二者之间的直接关联。

在社交网络和 Web 2.0 上，媒体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和一种生产

方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对于这一问题最具成效的理论研究是通过非物质劳动的概念进行分析的（Virno and Michael Hardt 2006）。其实，更早时候斯迈思就提出了受众注意力的商品化，即通过利用其认知官能进行资本主义积累。非物质劳动 [以及在其他语境下：一般智力（Virno 2001）] 是一种由认知、情感和沟通能力综合而成的创造力，它内生于个人，而非来自工厂。这一分析范畴由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学派发展而来，其主要原则之一是人类生活和经验所蕴含的这一生产潜力是极难通过资本利用、保存或结构的。因此，资本主义对非物质劳动日益增长的依赖具有革命性的潜力。

然而，本文对媒体的辩证分析通过探索非物质劳动如何借由媒体实现，对该问题提出了另一种阐释。这一分析表明，社交网络能够精确地指出通过资本，人类的生产潜力及其内涵在哪一个空间和工厂得到了实现。正如拿波里所言：“对媒体企业而言，受众的创造性劳动是日益重要的经济价值来源。”（Napoli 2010, 511）反思 Web 2.0 上受众劳动这一概念，拿波里提出的理论是，新媒体就是大众传播。他认为，这一术语足够灵活，可以涵盖当代媒体环境中的受众。Web 2.0 的革命性并非来自于普通人也具备的创造内容的能力，而是来自于他们能够通过网络传播内容的新能力（Napoli 2010）。拿波里进而将视线带入传播领域，而非生产，这是当代媒体环境中受众劳动的关键所在。如我们所见，传播是社交网络资本积累的一部分。如拿波里所言，如果现在更多的个人能够获得广泛的受众，新媒体也成了大众传播，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新媒体让更多人能够自由生产出数量空前的信息（内容），并且激发出数量惊人的传播途径。

社交网络最为独特的特征是，它产生出一个专制的经济体系，一个传播和生产的封闭系统，这在大众传媒时代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李（Lee 2011）的研究表明，谷歌广告为创造交换价值创造出了一

个自我驱动机制。公司“垂直整合了搜索引擎、广告代理和评级体系”（Lee 2011, 434）。比如，谷歌将关键词卖给广告商，允许他们在网民搜索特定词汇时，突出其广告。李强调，这些关键词本身不具有使用价值，事实上它们只在谷歌的“谷歌广告关键词”（Google AdWords）内具有交换价值（Lee 2011, 440）。妮可·科恩（Cohen 2008）和福克斯（Fuchs 2011a, 2011b）也强调了社交网络资本流动中不同环节的整合。他们的研究都说明，在社交网络语境下，监管成为了修改用户生产的信息的手段。对于如何理解企业对社交网络用户进行监管，福克斯（Fuchs 2011a）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以此作为对自由“公民”视角的补充。此类监管的目的首先不是政府的政治控制，而是植根于资本主义欲望的信息商品化。福克斯（Fuchs 2011a）还强调了当代社会中监管和隐私的矛盾本质。当资本主义受到私有财产要求的约束（如银行账户和私有财产）从而导致财富不平等的合法化时，它同样也加剧了对工人的监督，以便更严格地控制他们，并提高资本积累的效率。

事实上，社交网络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之前分别独立的过程——生产、传播和消费整合在了一起。它们不仅是发生在同一场所，而且还相互促进。用户的信息生产被监督、整合、分析，最后被转化成信息商品，又称为用户的消费品，如此循环往复。

非物质劳动是推动社交网络价格企稳的生产力，它体现出双重特征：加剧剥削和实现去异化。一方面，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相比更具有休闲性；与人相关，包容异质成分；在休闲时间内完成或甚至是被认为本身就是一种休闲活动；具有娱乐性、情感性和交流性。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说，非物质劳动是在社交网络上完成的，它也是被商品化了的，伴随着剩余价值的产生。

诚如我们所见，脸书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能够使传播和社交商品化。举例而言，交换价值来自于用户所创造的用户之间的联系。

这些联系之所以成为信息商品，是因为企业能够从中获知消费者行为。但是它们同时也是商业信息的传播渠道（即媒体）。总之，社交网络上的受众就是商品（被販售给了广告商），是劳动力（进行传播生产），也是媒介（传播的工具），通过他们商业信息被广泛传播开来。

六、结 论

表 1 概括了以上论述。在大众传媒中，对受众劳动的剥削是相对有限的。媒体企业与劳动的受众之间的交换本质是节目（可视为“工资”），这是作为对收看广告（“劳动”）的报酬。剩余价值来自于额外收看（Jhally and Livant 1986），来自超过制作节目所需价值的那部分价值生产。相形之下，社交媒体的剥削程度更甚，范围也更广。媒体本身，即平台（“工资”）用来交换受众交流和社交的劳动（“劳动”）。剩余价值来自于额外的交流，来自于创造比个人用户所需的内涵更丰厚的信息。

表 1 不同媒体环境中剥削与异化的水平变化

	剥 削	异 化
大众传媒	低 交换方式：以节目交换广告收看	高 匿名 被动 结构层级
社交媒体	高 交换方式：交流平台 	低 参与 真实性 

大众传媒中劳动受众的异化相对要高。对媒体而言，电视观众仍是无从辨别的、匿名的对象。这样的受众从根本上看是被动的，

几乎不可能主动选择其需要的电视节目。大众传媒还在内容创造者和消费者之间构建了一个清晰的层级结构。社交媒体中受众异化的程度低。受众积极参与媒体内容的生产。受众深入参与到媒体中，打开了真实表达自我以及与人交流合作的机会。最后对受众劳动的高层次剥削使得社交媒体辩证地与低异化关联起来。高度的剥削依赖于高度的交流和社交，反过来，也依赖于社交网络去异化的能力。

参考文献：

Adorno, Theodor. 2001.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Adorno, T. W. 1976. Television and the Patterns of Mass Culture. In *The Critical View of Television*, edited by Horace Newcomb.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kass, Kim, and Janet McCabe. 2007. Analysing Fictional Television Genres. In *Media Studies: Key Issues and Debates*, edited by Eoin Devereux, 283 – 301. London: Sage.

Altucher, James. 2011. Why Facebook is Worth \$ 50 Billi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5. <http://blogs.wsj.com/financial-adviser/2011/01/05/why-facebook-is-worth-50-billion/>

Andrejevic, Mark. 2011a. Social Network Exploitation. In *A Networked Self: Identity, Community, and Culture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edited by Zizi Papacharissi, 82 – 101. New York: Routledge.

Andrejevic, Mark. 2011b. Exploitation in the Data Mine. In *Internet and Surveillance: The Challenges of Web 2.0 and Social Media*, edited by Christian Fuchs, Kees Boersma, Anders Albrechtslund, and Marisol Sandoval, 71 – 88. New York: Routledge.

Ang, Ien. 1985. *Watching Dallas: 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London: Methuen.

Artz, Lee, Steve Macek, and Dana Cloud, eds. 2006. *Marx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Beer, David, and Roger Burrows. 2010. Consumption, Prosumption and Participatory

Web Cultures,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10(1): 3 – 12.

Boltanski, Luc and Ève Chiapello. 2005.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Verso.

Bonds-Raacke, Jennifer, and John Raacke. 2010. MySpace and Facebook: Identifying Dimensions of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for Friend Networking Site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Research* 8(1): 27 – 33.

Brandtzaeg, Petter, Marika Luders, and Jan Haavard Skjetne. 2010. Too Many Facebook “Friends”? Content Sharing and Sociability Versus the Need for Privacy in Social Network Si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6(11 – 12): 1006 – 1030.

Bruns, Axel. 2008. *Blogs, Wikipedia, Second Life, and Beyond: From Production to Prodosage*. New York: Peter Lang.

Burgess, Jean and Joshua Green. 2009. *YouTube: Online Video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Oxford: Polity.

Caraway, Brett. 2011. Audience labour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 Marxian revisiting of the audience commodit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33(5): 693 – 708.

Cohen, Nicole. 2008. The Valorization of Surveillance: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Facebook. *Democratic Communiqué* 22(1): 5 – 22.

Dean, Jodi. 2010. *Blog Theory: Feedback and Capture in the Circuits of Drive*. Cambridge: Polity.

Downes, Stephen. 1999. Hacking Memes, *First Monday* 4(10), available at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694/604>

du Gay, Paul, Stuart Hall, Linda Janes, Hugh Mackay, and Keith Negus. 1997. *Doing Cultural Studies: The Story of the Sony Walkman*. London: Sage.

Dyer-Witheford, Nick. 1999.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 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The Economist. 2012. The Value of Friendship. February 4.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46020>

Emerson, Ramona. 2011. Facebook Use By Country: See Who Spends The Most

Time Social Networking. *The Huffington Post*. October 1.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1/09/30/Facebook-use-by-country_n_987722.html#s379259&title=1_Singapore

Facebook. 2012a. Information page. <http://www.Facebook.com/Facebook?v=info>

Facebook. 2012b. Newsroom. <http://newsroom.fb.com/content/default.aspx?NewsAreaId=22>

Fenton, Natalie. 2007. Bridging the Mythical Divide: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Studies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the Media. In *Media Studies: Key Issues and Debates*, edited by Eoin Devereux, 7 – 31. London: Sage.

Foreman, Tom. 2011. How Much is Facebook Really Worth? *CNN*, March 8. http://articles.cnn.com/2011-03-08/tech/Facebook.overvalued_1_mark-zuckerberg-Facebook-worldwide-users?s=PM:TECH

Fuchs, Christian. 2011a. An Alternative View of Privacy on Facebook. *Information* 2: 140 – 165.

Fuchs, Christian. 2011b. Web 2.0, Prosumption, and 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and Society* 8(3): 288 – 309.

Gonzales, Amy, and Jeffrey Hancock. 2011. Mirror, Mirror on my Facebook Wall: Effects of Exposure to Facebook on Self-Esteem.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 Social Networking* 14(1/2): 79 – 83.

Green, Andy. 2010. *Creativity in Public Relations* (4th ed.). London: Kogan.

Hall, Stuart.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 edited by Stuart Hall, A. Lowe, and p. Willis. London: Hutchinson.

Hall, Stuart. 1995. The Whites of their Eyes: Racist Ideologies and the Media. In *Gender, Race and Class in Media*, edited by Gail Dines and Jean Humez, 18 – 23. London: Sage.

Hardt, Hanno. 1992.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Essays on Communic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i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Herman, Edward, and Noam Chomsky.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 Holmes, David. 2005. *Communication Theory: Media, technology, Society*. London: Sage.
- Hooks, Bell. 1996. *Reel to Real: Race, Sex, and Class at the Movies*. New York: Routledge.
-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Adorno. 1976.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Continuum.
- Illouz, Eva. 2007. *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 Jenkins, Henry. 2009.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 Medi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MIT Press.
- Jhally, Sut, and Bill Livant. 1986. Watching as Working: The Valorization of Audience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6(3): 124 – 143.
- Katz, Elihu, Jay G. Blumler, and Michael Gurevitch. 1973 – 1974.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Research,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7(4): 509 – 523.
- Liebes, Tamar, and Elihu Katz. 1994. *The Export of Meaning: Cross-Cultural Readings of Dallas*. Cambridge: Polity.
- Lee, Micky. 2011. Google Ads and the Blindspot Debat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33(3): 433 – 447.
- Lutz, Catherine, and Jane Collins. 1993. *Reading National Geographic*.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rx, Karl. 1978.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ited by Robert Tucker, 70 – 91.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 Marx, Karl. 1990. *Capital*, Vol. 1.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Marx, Karl. 1993. *Capital*, Vol. 3.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Mathijs, Ernest. 2002. Big Brother and Critical Discourse: The Reception of Big Brother Belgium.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3(3): 311 – 322.
- McChesney, Robert. 200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a: Enduring Issues, Emerging Dilemma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Mosco, Vincent.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Thousand Oaks:

Sage.

Mosco, Vincent,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2009. *The Labou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Morley, David. 1992.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Napoli, Philip. 2010. Revisiting“Mass Communication”and the“Work”of the Audience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32(3) : 505 – 516.

Nielsen. 2012.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come Statement. <http://ir.nielsen.com/reports.aspx?keyreport=592&iid=4260029>

Ong, Eileen, Rebecca Ang, Jim Ho, Joyclynn Lim, Dion Goh, Chei Lee, and Alton Chua. 2011. Narcissism, Extraversion and Adolescents’ Self-Presentation on Facebook.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0(2) : 180 – 185.

Parr, Ben. 2010. Facebook is the Web’s Ultimate Timesink. *Mashable*, February 17. <http://mashable.com/2010/02/16/Facebook-nielsen-stats/>

Peterson, Soren Mork. 2008. Loser Generated Content: From Participation to Exploitation. *First Monday* 13(3) .

Popper, Karl. 1971.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 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Quan-Haase, Anabel, and Alyson Young. 2010.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of Social Media: A Comparison of Facebook and Instant Messaging.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30(5) : 350 – 361 .

Radway, Janice. 1984.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aid, Edward. 1981. *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Schiller, Dan. 2010.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chiller, Herbert. 1991. *Culture, Inc. :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olz, Trebor. 2010. Facebook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In *Facebook and Philosophy: What's on Your Mind?*, edited by D. E. Wittkower, 241 – 52. Chicago: Open Court.

Smythe, Dallas. 1981.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Ablex.

Spears, Lee, Brian Womack, and Ari Levi. 2012. Facebook's Epic Offering by the Numbers. *Bloomberg Businessweek*, February 2. 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Facebooks-epic-offering-by-the-numbers-02022012.html?campaign_id=search

Stevenson, Nick, Peter Jackson, and Kate Brooks. 2001. *Making Sense of Men's Magazin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Terranova, Tiziana. 2004.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Pluto Press.

Turkle, Sherry. 1997.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Virno, Paolo. 2001. General Intellect. In *Lessico Postfordista*, edited by Adelino Zanini and Ubaldo Fadini. Milano: Interzone [Italian, translated by Arianna Bove]. <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p/fpvirno10.htm>

Virno, Paolo, and Michael Hardt. 2006.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Wasko, Janet. 2001. *Understanding Disney: The Manufacture of Fantasy*. Cambridge: Polity.

Wasko, Janet, Vincent Mosco, and Manjunath Pendakur. 1993. *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Essays Honoring Dallas W. Smythe*. Norwood: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West, Anne, Jane Lewis, and Peter Currie. 2009. Students "Facebook" Friends':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12(6): 615 – 627.

理查德·霍尔 (Richard Hall)^①

贝恩德·斯塔尔 (Bernd Stahl)^②

反商品化

——大学、认知资本主义与新兴技术

王祎 (译), 姬德强 (校)

[导读] 14、15 世纪, 资本主义通过“圈地运动”, 将农民与土地强行分离, 获得了第一批“自由劳动力”, 使资本主义深入农村, 开辟了国内市场, 完成了资本的第一轮原始积累。伴随信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互联网的普及, 与数字终端的不断升级, “数字化生存”从预言成为现实, 每个人都被卷入“信息化”的大潮, 被告知所谓“信息时代”的来临。在这一过程中, 资本主义利用全球范围内的绝对统治权和压倒性资本优势, 将原本中立无偏的信息技

①英国德蒙福特大学图书馆与学习服务部门理事, 德蒙福特大学“以技术促学习”部门的负责人, 受聘于英国国家教席, 教育与科技高级讲师, 德蒙福特大学计算机与社会责任中心研究助理。研究兴趣包括: 大学理念及其激进替代; 技术与批判性社会理论; 弹性教育与克服高等教育瓦解的合作实践领域; 以及 21 世纪大学理念中的社会化媒体领域。rhall@dmu.ac.uk, <http://www.richard-hall.org>, rhall@dmu.ac.uk, <http://www.richard-hall.org>.

②英国莱斯特德蒙福特大学技术批判研究教授, 计算机与社会责任中心主任。研究兴趣涵盖商业、技术和信息交叉引发的哲学问题, 该领域包括信息通信技术和信息系统主要路径的伦理问题。bstahl@dmu.ac.uk, <http://www.cse.dmu.ac.uk/bstahl>, bstahl@dmu.ac.uk, <http://www.cse.dmu.ac.uk/bstahl/>

术“征用”，成为进行盘剥的最新、最有效的工具，并进一步生产出了无数的“免费数字劳工”，进一步突破了国界，扩大了市场，服务于其资本的再生产及其统治的全球扩张。这种最新一轮的“圈地运动”较之以往更为强有力，也更加隐蔽。在此背景下，关于技术反思、信息拜物教批判、知识劳工、数字劳工、学术的商品化等研究进入了学术视野。正如《反商品化：大学、认知资本主义与新兴技术》一文的核心论题。资本主义不仅在商业领域继续维持着绝对领导力，且已日益侵蚀到诸如大学等原本应保持独立性的领域。在有形劳动和无形劳动之间日益断裂的背景下，资本与技术形成合谋，合作征服着高等教育场域。在这一场域中，充满了商品化与反商品化、拜物崇拜与破除迷思的斗争。大学这一相对独立的范围被资本不断蚕食，原本的公共性日渐消弭，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弥漫着功利主义与铜臭，充满了权力斗争。技术研发与应用的目的不是服务于公共利益，而是谋求资本的再生产与市场的全面扩张。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学生本体的提升，而是服务于“社会工厂”中的资本再生产，为其“量身定制”其所需要的“劳工”，并冠之以“以学生就业为关切”的名号，使每个人深陷其中而不自知。其间师生，也不乏学术激进主义者奋起抵抗，以求唤醒独立之思考，摆脱信息资本主义的迷思，这篇文章就是基于这一立场书写。

在认知资本主义的框架下，本文通过对四种具体的新兴技术，即情感计算、虚拟现实、云系统和人机共生进行研究，从技术本身的研发背景、特性与应用领域出发，进行深入分析，点出了深深藏匿于貌似中立与先进的新兴技术背后，那些隐蔽的信息拜物教倾向和资本的侵蚀轨迹。并通过这些分析，提供一种新的想象，找寻学术斗争背后的权力结构罅隙，充分利用其间的矛盾与张力，以期解决文中所述的学术商品化问题，重新夺回高等教育的自主权，恢复公共性。诚然关于抵抗策略，文中方案尚待完善，且需结合具体语

境进行有意识的培养和具体设计。但全文对被全球歌功颂德并期待其恩赐福祉的新兴技术和高校教研进行的揭露与批判，剥开了其背后不为人知的经济政治图谋，这正是文章更重要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 大学，新兴技术，学术激进主义，商品化，认知资本主义。

一、引言

以情感计算、虚拟现实、云系统和人机共生四种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可以作为典型例证来说明大学里的技术创新是如何被商品化、被拜物迷信以及如何进一步促进了资本的自我再生产的。马克思（Marx 2004，493）在论及技术在历史总体中的位置时是这样理解和描述这一问题的：“技术揭示了人类之于自然之能动的关系，揭示了人类生活之直接的生产过程，进而也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生活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思想观念。”^①因此，新兴技术的产生，正是要改进人重塑、革新社会关系的模式局限性，这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批判视野，即资本是如何为了服务于价值的形成与积累而重构高等教育，“指派”大学内部的研究与发展的。

此处的论述将通过分析商品化与拜物化对技术研发的支撑来阐发上述“指派”的观点。对新兴技术的关注，有助于探索技术创新如何影响学术权力斗争以及学院内部的抵抗，尤其是在那些仍旧把学术权力斗争与抵抗植入到学术实践中的大学里。然而另一方面，这些技术展示了对教育的想象与实践方式进行重大而深刻改变的潜在可能，通过此种方式，教育机构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期

^①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59页。——译者注

重新书写资本主义劳动史 (Postone 1996)。因此，这一讨论的核心涉及到新兴技术对大学内部科层权力进行再生产的机制问题。通过分析商品拜物主义、新兴技术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罅隙，新兴技术、学术激进主义以及学术界内外学生/教职工抗议的可能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将得到解决。

对大学的统治作为认知/知识资本主义的一个场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认知资本主义模式下 (Dyer-Witheford 1999; Virno 2004; Williams 2012)，这些社会关系是在特殊的时空压缩包围下结构而成的 (Lebowitz 2003; Marx 2004; Postone 2009)，而这一时空是由经技术转化过的资本锤炼而出的。新兴技术的商品化及其随后的拜物化加速了大学的转型过程，大学被转塑为一个抵抗认知资本主义价值的活跃场域。这一过程强调了资本对学术领域内权力的调度方式，宣扬了一种学术实践中的工具主义取向 (Holloway 2002; Tiqqun 2001; Virno 2004)，这种工具主义取向通过无形劳动和阶级斗争等问题，与对学术激进主义和知识生产的自动化控制等相关批判联系在一起。

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是，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autonomous Marxism) 对权力关系的批判，有助于开展对新兴技术如何发展为异议表达空间这一问题的讨论。这里对权力的合作性征服可能作为消除权力关系的一个步骤而有所发展 (Holloway 2002; Dyer-Witheford 2004)，以重新书写关于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并批判我们技术使然的全球社会关系网络如何将人“去人性化”，在这一网络中，人们被当作生产/消费过程中的手段，而不是将人通往共同富裕本身当作终极目的。目前的问题在于，学生和教师是否能够夺回新兴技术的生产与分配权，以把大学的象征性权力消解于真实存在的抗议与否定的现实中。进一步说，从哈维 (Harvey 2010, 46) 的角度来看，对新兴技术的批判能否使那些在高等教育领域工作的人“从一种不同

的想象图景中，找到可供选择的另外一种基于社会再生产立场而生效的社会价值形态”？

二、关于技术的笔记

技术在资本主义内部的历史发展，一直是作为生命权力（biopower）再生产（Feenberg 1999；Foucault 1977；Noble 1998，Weber 1969）的实现手段，通过社会技术常规、程序与文化来系统化劳动控制（Postone 1996）。对于新兴信息通讯技术（ICT）应用（ETICA）项目的伦理问题，涉及到伦理与科技之间的相互影响，上述文化濡化过程是问题的关键点。下面详细论述到的观点正是基于这一项目的一些研究结果。该项目团队指出：

技术是一个影响人与世界互动方式的高级系统。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种技术能生产出许多人工制品，并适用于多种不同情况。它需要与一种大视野联系起来，这种视野要体现人类的具体观点，反映人在世界中的作用（Ikonen *et al.* 2010，3—4）。

技术在世界中的这一角色以一系列社会技术特征为基础。因此，在对环境技术（ambient technologies）的分析中，这些特征通过其行动主体体现为嵌入性、互联性、不可见性、自适应性、个性化、普遍性等具体形式。因此，ETICA 项目定义了一个社会技术视角下的世界，其中人类的进取心或劳动力，需要且渴望得到技术的无缝支持，这个世界通过诸如传感器、网络、计算程序和网格坐标等人工制品的系统整合而越来越适应人类需要。

自适应技术出现并变为日常现实，塑造并重新定义了人类与自

然或曰世界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能源开始作为机器与人类关系一个核心线索浮现。马克思指出，机器形式的技术“是人类工业的产物，自然资源转化成人类统治自然或其在自然中活动的工具……它们是知识的物化权力”（Marx 1993，594）。这种物化权力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那些使用技术去建构、重设、再生产社会者、革新具体技术者与劳动中技术的使用者三者之间。用费恩伯格（Feenberg 1999，87）的话来说这意味着，技术是一个社会斗争的场域，借此，霸权地位得以建立、合法化、再生产与被挑战；他还指出，“技术批判理论可以揭示技术的作用范围，揭穿有关技术必要性的幻象，揭露流行技术选择本身的相关性”（Feenberg 1999，87）。

把技术作为斗争的关键场域的这一观点，反映了社会工厂内部劳动异化的增强，这种增强是通过人机共生技术实现的（Negri 1989，Tronti 1973）。正因为人类是与技术的附属物相互交织并内嵌于其中的，使得自动化控制的可能性和主体的进一步异化变得更加明显（Tiqqun 2001）。哈维指出，这种物化是人类血肉之躯融入资本机器内部的功能体系，是新自由主义面对 1970 年代经济政治危机的反应。从这一观点出发，资本积极寻求一种“格外重视‘智能’与创新性企业主义”的新策略（Harvey 1990，157）。这种企业主义已经部分地在新兴技术中实现了，这些技术把人性融入到固定资本的现实当中。通过死劳动与活劳动的融合，新形式的价值被榨取，这种融合是减少资本流通成本的一种重要方式（Marx 2006）。哈特和奈格里（Hardt and Negri 2000，406）认为，这是深度的政治对抗，因为“机器和技术不是中立的、具有独立性的实体。它们是用于特定生产机制的生物政治工具，这种生产机制为某些特定实践提供便利，同时阻碍其他形式的实践”。

正是社会技术系统的生产力量和自动化系统的创造物，使得人

类与其生活世界变得越来越机械，以至于人类的日常生活方式都被归入资本再生产的手段之中了（Habermas 1987；Hardt and Negri 2000；Marx 2004；Tiqqun 2001）。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说，这进一步把社会关系物化为商品，价值在这一过程中被榨取，举例来说，个人数据的监测和采集，消费空间与消费方式的限定和控制，运用风投资本主义来支持特定社会网络，以及情感的技术扩增与捕获。这种对日常活动的真实吸纳确保了：

个体劳动的创造力将其自身构建成资本的权力，一种与其自身相对抗的异化力量……因此文明的一切进步，或曰社会生产力（劳动自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诸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与合作、交流手段的完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都不会使工人变得更加富有，而只会使资本致富；因此只是再次扩大了对劳动的统治力……这一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Marx 1993，307）。^①

因此，技术成了资本用来“摧毁所有限制生产力进步、需求扩张、限制生产多样化以及对自然和精神力量进行剥夺与交换的一切藩篱”的革命性力量（Marx 1993，409。）^② 这种全面开发不断试图克服物质条件限制的障碍，越来越依靠社会人与技术的融合，以期创造新的商品和拜物教形式。大学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技术领域，在其中，资本克服障碍的进程正在进行。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6—268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3页。——译者注

三、技术、无形性和大学的商品化

以 2008 年莱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为标志的全球政治紧缩（austerity politics）时代，见证了新自由主义对国家补贴公共资产的激烈反对，将反对补贴公共资产作为一种经济休克疗法（Klein 2007）。在英国，这一进程导致了高等教育被吸入资本主义市场逻辑之中，随之高等教育理念发生变化，高等教育由公共物品转变为基于北美模式的通过私人债务提供的个人物品（Collini 2012；Bailey and Freedman 2011；Williams 2012）。大学生活被吸入市场反映了资本的系统逻辑，其目标在于实现自身的一体化（Hardt and Negri 2000）。正如梅克斯因斯—伍德（Wood 1997，1）所述：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刻，资本主义第一次成为真正的普适/遍在（universal）体系……资本主义在其理念上是普适性/遍在性的，其逻辑——积累、商品化、利润最大化、竞争——渗透入人类生活和自然界自身的几乎方方面面。

这一进程中的一个分支是学者和学生学术工作的商品化，包括课程、技术、知识和文化资产等各方面（Ball 2012；Canaan and Shumar 2008；Newfield 2012；Williams 2012）。大学里的劳动越来越为效率所驱使；受诸如关键性信息集（information sets）及影响手段、公共/私人合作关系、知识转化与外部收益生产等事宜指挥；被“如果教育产品的生产者效率低下，那么其将在市场中付出代价”的逻辑约束（Cullerne-Browne 2012；McGettigan 2012）。因此，高等教育已然成为了一个市场化场域，在这里，通过社会及国家资产与私人企

业之间新的合作关系，学者个体的知识劳动正被引入与其他学者的直接竞争。

学者个体之间以及那些他们构成的新的团体之间的竞争，形成了一种从社会意义上建构相关学术劳动分配与学术劳动丰富性的方式（Marx 2004）。市场对学术劳动的吸纳，催化了可供交换的学术使用价值的创造，也催化了学术的可商品化。交换的天然属性、从被“指派”的学术过程中榨取剩余价值的尝试，意味着在大学内部发展起来的等级制权力关系，就像那些可被实际交换的物品关系一样被再生产。结果，学术劳动被直接吸纳进这一榨取剩余价值的动机之下（Clark 1994；Marx 2004）。

作为蕴含在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总和，大学里的知识劳动极有价值。马克思强调劳动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生产特定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Marx 2004，129）。^①在高等教育中，专业化分工和技术水平革新有助于提高剩余价值榨取率，特别是在技术研发能催化生产效率提高、减少特定资本流通时间的情况下。专业化分工的要求和对更高相对剩余价值榨取率的期待，将就业能力的问题提上了政府教育部门的议事日程，在他们看来，大学里培养的技能需要不断提高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应性（Bailey and Freedman 2011；Ball 2012），这一过程本身形塑了一个规制学术劳动的核心机制（Marx 2006）。

正因为技术在资本主义内部被用来提高系统效率以及进一步实现价值增殖，使得实证主义者关于强化技术技能可解放潜能的论断

^①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二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4页。——译者注

变得难以令人相信。技术革新与推广的逻辑，服务于提高生产率或方便外包，服务于工作场所监视及科层化劳动管理监督，或是服务于开辟新市场实现价值的生成（Lebowitz 2003；Marx 2004）。在短期内，技术革新给予资本高额边际生产率，这既靠着公私领域的高水平需求来支撑，同时又支撑着这些高水平需求。然而，随着的时间推移，“无形损耗”开始影响技术革新带来的收益：

除了物质性磨损，一台机器还有别的损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形损耗。或是由于同种机器的生产成本降低，或是由于更先进机器进入竞争，它的交换价值将有所损失。在这两种情况下，尽管机器依旧崭新并充满活力，它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中实际赋含的劳动，而是取决于再生产同样的或者更好机器的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它或多或少失去了价值。再生产其总价值的周期越短，无形损耗的风险越小；每天工作时间越长，则这一周期越短。当机器初被投入生产，对其更为廉价的再生产方式便接二连三地涌现了，对机器的改进也是如此，这不仅适用于个体零件和机器的细节部分，其整体制造亦是这个道理。因此，在机器寿命周期早期阶段，这一延长工作时间的特殊动机将自己最为突出地表现了出来。（Marx 2004，528）^①

于是，在跑步机式的竞争逻辑驱使下，整个社会技术系统的革新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以维持或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率，并跨越消费不足这一障碍。正如纽菲尔德（Newfield 2010，13）所强调

^①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二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83页。——译者注

的，这在学术劳动方面亦有体现，在三种类型的劳动中，学术工作持续无产阶级化。第一类劳动与“商品型技能”有关，即既“容易掌握”且不挑持有人的那类技能，如后勤部门或服务部门的工人。第二种类型包含那些拥有“筹码型技能”的人，掌握这类技能需要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一般是能够为大学提供清晰的附加值的人，而这类劳工在大学里有不少，如计算机程序员或网络管理员。第三种类型包括那些“专有技能”的持有者，他们被定义为“帮助一个组织建立事业的企业特殊人才”。大学管理部门只培养那些有能力推动专门性知识进步的劳动者，并使之商品化，以从中榨取租金和利润。

前两种类型的劳动较易无产阶级化或被外包出去，因为他们工作价值中包含较少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然而，专有技能由于被附上了市场化学术劳动的竞争性，这种工作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Bonefeld 2010；Neilson and Rossiter 2008）。这是由于具体商品的生产、创新及技术本身所耗费劳动力的社会必要性特征随着时间发展而日益减少，这相应降低了劳动的市场价值。结果，对技术创新的持续需求成了维持系统的关键。因此，问题围绕在那些可交换的专有或创造性技能的持有者及对其管理之上，这里，凝结在新兴技术形式下的学术劳动在其社会形态上以价值的形式越发呈拜物的趋势（Marx 1993）。

在商品生产社会，拜物化是指社会地存在于市场中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被呈现为“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Marx 2004，164）。^①也就是说，具体商品的交换价值（事实上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表现形式），呈现为商品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以价格的形式

^①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二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83页。——译者注

在市场上出现。这部分因为，由于商品是被独立的个人生产出来的，生产商品的劳动并没有显示出直接的社会化。因此，劳动只在交换过程中体现出社会性的必要，而不是在生产过程中，这是异化的现实基础。

生产过程和价值实现过程的结果，首先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这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把他本身作为劳动能力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资本，同样另一方面，资本家把他本身作为资本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活劳动能力。每一方都由于再生产对方，再生产自己的否定而再生产自己本身。资本家生产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劳动生产的产品是他人的产品。（Marx 1993, 458）^①

产品或商品已然摧毁了个体劳动者的一部分活劳动，并通过交换过程，将之异化为一种拜物化的价值形式。在大学里，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斗争，基于认知资本的创造与商品化，由于生产和流通过程是“无形的”，拜物教的概念需要被重构和重新分析（Žižek 2009）。用费恩伯格（Feenberg 1999, viii）的话来说，这是技术本质主义的现实，在其中“技术把一切东西简化为功能和原材料”，结果导致个人情绪和感情、文化风俗与习惯、人际关系的建立等东西“本身恰恰是我们每天遭受剥削的物质材料”（Žižek 2009, 139）。在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5—456页。——译者注

这一过程中，要理解知识工作、认知资本或信息社会是怎样被拜物化的，有两个因素十分重要。首先，资本发现机械或技术能够帮它将流动性日强、越来越被身份驱动的一整套社会关系封闭化、商品化，这奠定了进一步交换的基础（Virno 2001；Virno and Hardt 1996），这套社会关系经大学内部劳动的催化，以人的主体性变异为基础（Vercellone 2007）。其次，资本从日常经历与日常关系中榨取价值、实现价值商品化，以减少资本的非生产性流通时间，进而提高利润率和相对剩余价值（Dyer-Witheford 1999；Marx 2006）。

在这一拜物化过程中，社会关系越来越通过诸如大学等的技术调节下的组织得以建构，进而重新书写越来越具有技术性、压迫性和剥削性的社会政治等级制度（Foucault 1977）。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一过程通过劳动的排他性分工，使得社会中的独立个体被异化和分离（Lebowitz 2003；Marx 2004）。此外，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把全部人类生活吸纳进资本逻辑的技术，其发展强化了资本主义关系是自然的、纯粹技术的这一观念。然而，这一归化过程揭示了知识的建构通过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再生产而实现，或知识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力（Marx 1993）。一方面，资本利用这一过程进一步吸纳社会关系并将之异化为商品，特别是通过对传播的控制和赋予信息新的用途（Dyer-Witheford 1999；Negri 1989）。另一方面，将一般智力再生产为大众理性（mass intellectuality）则成了实践性颠覆活动的实际基础（Neary and Hagyard 2010；Virno 2001）。

部分看来，这些大众理性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被网络技术的极端社会化和新兴技术的社会化方式所放大了。因此，大学里新兴技术的研发是一个斗争的关键场域，透过它，社会技术与认知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可能得到发展，反对它，学术激进主义可能得以被揭露。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对社会技术创新和变革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凸显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机制。

借助机械、化学过程和其他各种方法, (资本) 不仅在不断改变着生产的技术基础, 而且也在改变着工人的技能与劳动过程的社会融合。同时, 它也借此彻底改革了社会中的劳动分工, 并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抛向另一个生产部门。(Marx 2004, 617)^①

四、新兴技术与认知资本主义

关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高等教育中的影响, 相关叙写与分析越来越多 (Ball 2012, Canaan and Shumar 2008, McGettigan 2012, Newfield 2012, Williams 2012)。有一种十分普遍的观点, 认为教育首要关注的应是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 在他们看来, 科技手段首先意味着促进经济的增长, 技术靠经济效益、商业效率和重新设计业务流程等话语支撑。这样的观点在许多高级政策文件中比比皆是, 例如《欧洲视野 2020》(European Vision 2020) [European Commission (EC) 2010]、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HEFCE) 2012] 对技术辅助学习的支持以及创新项目资助协议 (the funding protocols for innovation programmes) 等 (EC 2012; Hall 2012)。这些协议形塑并规定了作为独立实体的大学发展项目、制定使命宣言或发展战略的空间, 同时将教育创新同财政“现实”绑定在一起。

通过资金拨款政策, 便可以发现这种意识形态定位, 拨款更加侧重自然科学与技术, 而社会、人文科学得到的资助随之减少。技

^①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 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二卷, 上海三联书店, 2011年, 第345页。——译者注

术在教育中的运用强化了这一意识形态转向，并在对教育实践与教育机构进行限制的同时（Dyer-Witheford and de Peuter 2009；Feenberg 1999），进一步催化了其商品化与拜物化（Hall 2012）。这削弱了教育的道德合法性（Stahl 2006）。目前问题的焦点是，应抛开对大学里已建立、已植入的现存技术的讨论，以便进一步分析新兴技术是如何对高等教育的形式与内容产生冲击，进而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成为可能的。

这一过程的关键是对日益无形化的劳动力进行组织、规范和加以剥削，这是通过利用嵌入日常活动和人类生活世界中的各类新兴技术得以实现的（Dyer-Witheford 1999；Habermas 1987；Valtysson 2012），这些技术作为大学研究开发的中心得到发展。这是一个以资本主义对生产方式的不间断变革为中心的无情动态过程，其目的是使资本能够“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加强用于交换的物质条件的创造能力——传播及运输工具——用时间消灭空间——变得极其必要”（Marx 1993，524）。^①在减少生产与流通时间的过程中，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整体再生产紧密相关，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Postone 2009）。

然而，在这场针对时间与生产/流通成本的战争中，人与机器的融合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机器作为武器被用在了资本与劳动的斗争中。大学里的研究、开发与应用，是异化的场域，因而也就为否定与异议的萌芽提供了空间。为了阐明这一观点，针对四例相互联系的新兴技术的分析，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新发展。在接下来的小节里，通过更深入探讨选择这四种技术的理由，新兴技术的定义将逐渐清晰，同时它们在未来高等教育中扮演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译者注

的角色也将逐渐明了。这四种技术是：情感计算、虚拟现实、云系统和人机共生。

（一）新兴技术

这部分讨论旨在探索通过水平扫描（horizon-scanning）所界定的新兴技术，是如何有可能影响高等教育，并在拜物化、商品化和无形性等概念性问题中起作用的。对这些新兴技术进行讨论的基础，引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历史不确定性，和对那些技术性质和用途加以预测的根本不可能性等问题。尽管未来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人类确实已经建立了对未来加以预期的机制，通过这类机制做出决定、形塑未来。一个在学术界已经建立起来的机制是——对前瞻性研究的应用（Cuhls 2003），这类研究并不宣称可以预知未来，而是呈现多种未来可能性，以供决策者朝着满意的可能性进行努力。此处的观点正是利用这一逻辑，并借鉴了已有的关于未来和新兴信息通讯技术的研究成果，探索这类技术在高等教育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此处的论述借鉴了 ETICA 项目的研究结果（Ikonen *et al.* 2010），以阐明新兴技术在高等教育中可能起到的作用。ETICA 项目是一项欧洲资助的研究项目，自 2009 年 11 月开始运行，该项目可以被定性为前瞻性项目，它旨在通过分析新兴技术的伦理后果来界定何为新兴技术，并进而考虑其管理和政策影响（policy implications）。ETICA 将新兴技术定义为那些在不久的将来 10 到 15 年里可能深刻改变人与世界互动方式的技术。这些技术具有受深入性研发项目影响的特点，该特点使得其未来状况可被合理预测。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这些技术被称作新兴的，但这和它们当下的状态无关。其中一些新兴技术早已建立起来，如云计算，它们被称为新兴的，是因为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些重要研发活动旨在改变其形态和可能性

应用，以及其社会政治影响。

ETICA 项目并不关注于技术的应用，无论是在高等教育还是在其他领域，也并未采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此详述的观点在任何方面都不代表 ETICA 的观点，也不反映 ETICA 财团的立场。然而，对 ETICA 项目第一阶段成果的分析使得对与高等教育尤其相关的新兴技术网络的界定成为可能。四种相互关联技术的引入作为一个起始点，展示了产生于大学内部并支撑大众理性发展的社会关系与认同的商品化与拜物化。这四种技术是：情感计算、虚拟现实、云系统和人机共生。

从 ETICA 项目认定的十一种技术中选取这四种，是因为它们有助于解释高等教育内部的早期技术应用，且它们新兴技术的地位，意味着它们作为更受重视的高端技术将变得更具有影响力（Gartner 2011）。因此，它们适用于分析大学如何被新兴技术所影响。它们代表了涵盖此处讨论问题的一个技术系谱，展示了大学内社会科技系统的再生产，以及抵制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潜在可能。然而，其中的任何一种技术都与另外至少一种存在互动，这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技术的创新性融合或许会对高等教育内部资本和劳工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四种技术中的每一种都将在对其进行定义的独立小节中进行讨论，并进一步讨论其在高等教育中的预期用途，以及这些功用与意识形态、拜物化、商品化与非物质性等问题有何关联。继而我会提出，由这些技术所揭示出来的、通向反抗的道路。

（二）情感计算

技术：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有时也被称作情绪计算（emotional computing），旨在开发能够感知、表达和模拟人类情感的人工制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起始于 20 世纪最后十年的实验室研究中，其关注的是情感或情绪的数字计算，同一时期并行兴起的

是新自由主义对可被用作社会工厂创新点的企业技术的关注。该技术的一个关键性进展是电脑不断增强的情绪模拟能力（Cowie 2005），以及利用此技术将情感性嵌入社会技术系统，进而使资本能够利用认知或无形性来实现自我再生产。这类技术的定义被不断泛化，将情感处理或人类行为模拟也包含在内，这一定义的泛化过程见证了上述再生产过程。

因此，此类研究为人机互动中更为智能的应用程序的编制提供了基础，以便通过数据收集、分析、人脑成像工具和探测情绪传感器等手段，驾驭在决策过程中情感所起的作用。虽然罗宾逊和凯利欧拜（Robinson and Kaliouby 2009）的研究论述了许多与社会融入、模拟社会认知相关的应用领域，显然，情感计算促进了社会认知的商品化。例如，它可以用来制造模拟产品，供代理商或机器人进行社会情感情报的管理（Tao and Tan 2005）；用来开发能对玩家情绪状态做出反应的情感游戏，使游戏能够在最适当的时刻提供最适当的内容（Sykes and Brown 2003）；用来实现将游戏玩家的情感状态传达给第三方的功能（Hudlicka 2009）。

对资本来说，对此类活动的捕捉和挖掘是创新和榨取价值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数据显示，只有不到10%的人类生活是完全非情感化的。其余均涉及到某种情感”（Cowie 2005）。因此，通过技术来捕捉情绪或情感，致力于加强“人机交流的质量和提升电脑的智能程度”（Tao and Tan 2005, 981）。由于情感在人类互动中无处不在，对情感的敏锐洞察便成了交往行动的基础（Habermas 1987）。因此，情感计算影响着人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因为它介入到了感觉与伴随感觉的物理变化之间，并随之带来观念、判断和行动的转变。

教育应用：在设想中，理解用户情感状态并对其做出反应的功能，是通过游戏性学习和虚拟世界模拟等电子教学创新形式实现的，此类教学能够感知学习者的情绪，以便定制相应学习与呈现形

式 (Porto Interactive Center 2012; xDelia 2012)。在情感计算研发的驱动下, 认知和行为心理学在资本内部进一步商品化了, 部分是通过大学与商业的合作关系实现, 这是因为情感计算假定了人类情感可测量、可认知、可分类、可生产并且可定价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Media Lab 2012]。该新兴技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情感和诸如消费等外在行动之间具有直接的关联。

同样道理, 情感觉知有助于更好地从教师那里收集反馈情况, 教师可以监测自己和学生的情绪状态, 以便收集关于教学工作效果的双向反馈。因此,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 (MIT Media Lab 2012) 开始关注“情绪或其他情感现象, 以及由它引出的, 或故意影响它的现象与问题的计算”。对学习分析法 (learning analytics) 的关注持续升温, 这种分析法可以作为监测、监督学习成果的一种手段, 以帮助学习成果实现商品化, 这种关注同时将认知、情绪实践 (emotional practices) 与学习成果联结在了一起 (Educause 2012), 更要紧的是, 它们与“通过移动设备递送学习内容”这一正在进行的拜物化过程联结在了一起 (Blackboard 2012)。

在高等教育中, 特别是在工作和实习导向型学习中, 涉及到模拟真实环境的学习中, 情感计算潜在的积极效果, 可以与那些需要越来越多的操纵和控制而收效甚微的技术形成鲜明对比。通过奖励特定反应行为这类有效干预, 个人化的行为和特征可以更轻易地被纳入教学计划。这种情况因为如下事实而变得更加糟糕, 即在教育中运用的此类技术很可能是被私人企业设计出来谋取利润的, 私人企业或许还可以通过从基于应用程序的干预措施中收取租金获利。这些干预很可能被转化为市场化的解决方案, 进而更加有效地将学生导向就业能力培养, 而不是对大学所扮演的政治角色等问题进行批判性质疑。

抵制: 抵制情感计算的一个关键空间, 在于重新人格化 (rehu-

manisation)，在于对游戏、虚拟真实或工作导向型学习等相关问题解决方案的合作式探寻，以及对商品化的虚拟互动的彻底拒绝。事实上，由于用户能够觉察到其被操纵的可能性，情感计算为分析伦理上有问题的社会技术系统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空间。此外，有理由相信，学者们反对情感出现在教育机构，这部分因为这种情感看起来是虚假的，即它们根本不同于人类情感，这些学者有能力建立起一种道德的数字素养（ethical digital literacy）。具体来说，这依赖于学术批判共同网络的参与，以便把真实世界的情感性与问题的合作式解决联系起来。希望这将克服个人化的、虚假的或夸大的情感的威胁，这些威胁把技术的使用者与他人隔离开来，使认知资本主义得以维系其在大学内的权力关系，例如通过学生对教师、员工及管理者的反监视（Ganascia 2010）。

（三）虚拟现实

技术：虚拟现实与情感计算联系非常紧密，它从海利格（Heilig 1962）的传感体验模拟器（Sensorama Simulator）发展而来，该模拟器的设计用途是，通过模拟资本所要求的劳工受训环境，来降低危险性工作带来的风险。虚拟现实的发展历史将大学内部的创新与商业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样一来，诸如拉涅尔的 VPL 数据手套等技术应用证明了这类技术可以突破头戴式显示方式，实现手持和液晶显示器显示，可被延伸至用于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从而通过对内容加以限制及受限内容的订阅与租赁来加强日常体验的市场化。而后内容被进一步商品化，就像虚拟信息被投射于扩增的物体上，或是扩增信息被投射于真实环境之中（Zhou *et al.* 2008）。

先进的电脑软件能够使虚拟扩增现实的应用程序变得更加引人入胜，进而完全融入日常生活。这样，该技术可延伸应用于复杂机械的制造和维修，降低固定劳动维持成本，发挥其解释物体与环境

的潜能，并进一步把用户的生活经历及其真实身份拜物化。资本利用这些技术来影响行为、人际交流和劳动认知，同时增强虚拟空间的殖民地化及扩展其疆域范围，这意味着虚拟身份（如虚拟化身）超越了它们脱胎其中的社会关系被个人化和商品化了。这样，虚拟物体承载的信息通过呈现现实世界中的任务，将劳动真正吸纳其中。通过用虚拟物体或数据扩充日常现实，无形性劳动者能够比依靠自身感官更加全面地感知周遭环境。所以沉浸其中的过程有助于通过捕获并驾驭多重感知渠道，增强劳工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及与之互动（Cline 2005）。这就使资本能够以新的形式实现自我再生产，并通过生产新服务的方式突破消费不足的藩篱。

教育应用：虚拟现实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是非常先进的，其关注的领域包括训练、探索型学习、建模、游戏和扩展虚拟资源。它与国防军事训练、市场营销机遇扩展（Hamilton 2011）、移动学习 [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 (JISC) 2012] 等都存在历史性联系。例如，“第二人生”（Second Life）（Dyer-Witthoford and de Peuter 2009）作为一个平台，为学术社会内部提供了资料与互动，同时以一种近似游戏的形式提供模拟体验。大学已经利用这一平台来提供某些话题的专门训练，这类话题的训练往往仅依靠文本界面是不够的，例如精神分裂症的管理、需要观看身体或器官的健康科学，以及通过虚拟校园的建构来与远程学生进行互动。而“第二人生”或许是虚拟环境最突出的例子，高等教育中面向这类技术存在着更加广泛的转向 [Human Interface Technology Laboratory New Zealand (HIT Lab NZ) 2012]，在一定程度上，诸如毕博（Blackboard）等学习管理系统，正在不断尝试将扩增与沉浸等要素整合进其虚拟环境中。

抵制：扩增技术使得空间创造成为可能，通过虚拟世界或基于应用程序的创新，运行于教育内部的私人企业可以从空间创造中榨

取租金。这证明了新兴技术、资本主义劳动和高等教育之间存在的“指派”关系（Dyer-Witheford and de Peuter 2009）。虚拟化明显引发了大学内部的议论，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们开始考虑是否应该由外部供应商来兴办教育，并将其作为一种财富积累形式从中榨取租金。这一问题是由诸如外包环境中的知识资产和教学资源安全性等实践性考量所引出的。然而，学术性的抵制则侧重于技术和可用性问题，以及能否接受虚拟空间借助扩增技术而进一步封闭的问题（Wake and Stahl 2010）。关于教育领域的抵制，目前的问题是采用何种方式来积极鼓励学者们生产、共享公开课程与产品，这种方式要能体现人性关怀，不形成新的商品，却有助于在不同的团体之间维持专业知识的多样性。因此，在这些共有空间中，边际性发展（marginal developments）——诸如应用本位的（application-based）、表示方位的（locative）、增强现实等服务——之间的关联，可能受到舆论共识的质疑，并关系到社会需求和隐私与身份问题。

（四）云计算

技术：越来越多的以情感计算或虚拟现实为特征的创新服务，是通过云计算来实现其管理的，该技术保证了计算资源可以通过全球化流通网络被传递到不同地方。它起源于利克里德（Licklider）的阿帕网（ARPANET）（Ikonen *et al.* 2010）。伴随军事价值的产生，它的发展预示了其作为诸如水、电之类的公共事业的价值。随着1990年代带宽的不断增长，这变得越来越有可能。该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远程作业成为可能，脱离任何正式的、泰勒式的工作场所，都可从远距离对无产阶级化劳动进行分离与监视，并使资本能够通过外包在低薪社会中来分配可用的商品与筹码型技能（Newfield 2010）。云计算经过网栅（grid）与效用计算、应用程序服务供应和软件服务（Dikaiakos *et al.* 2009）等阶段的演进，使

认知劳动的原动力遍布于社会工厂之中，并借此在全球范围内扩大无形性（Hardt and Negri 2000；Virno 2004）。

具体来说，云计算借助对各种系统、网络和数据的公司控制，使得资本可以从社会网络和个人交往中榨取价值，借助可伸缩的弹性 IT 兼容能力（IT-enabled capabilities），来降低生产性资本的流通成本，这种 IT 兼容能力被解释为一种从低薪流通过程向能够榨取较高价值的空间进行转移的服务（Marx 2006）。由于企业寻求以最划算的方式来进行其信息技术服务消费，利润已经在勾勒一系列宽泛服务的过程中增长，例如从“云”而不是从本地设备获取计算能力、存储空间和商业应用程序等内容。这种外包的方式旨在降低商品和劳动的分配成本。

在云服务用于存储诸如照片和视频等相当个人化的数据时，数据挖掘和标识便与租赁成本和目标行销等资本主义积累行为纠缠到了一起。在某些情况下，这促进了智能化消费的实现，如通过 RFID 标签等硬件和智能手机之间的数据驱动连接而实现的本地化服务、消费者关系管理系统以及支付服务供应商等各种云基服务（The Think-Trust project 2010）。它也使得商家和保险方之间医疗记录等相关数据被商品化（Andriole and Khorasani 2010），从而支持了生命权力（bio-power）被进一步整合到医疗保健之中。通过强调迅捷、优化的人际联系等云服务的易用性，以及强制性的服务条款或协议，用户被迫放弃了其私人数据的所有权（Fuchs 2010）。这些网络中由共享数据而生成的相互联系十分活跃，使得这类服务的消费者们能够生产和消费一种游牧式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受空间限制较小，而受时间限制较大。事实上，这些服务的永久无形性形塑了资本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尝试。

教育应用：云计算是一种已经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的技术，特别是应用于如电子邮件和后台信息管理等共享服务，以及服务于研

究进程或数据存储（JISC 2011）。它尤其广泛地分布于社交网络和其他社会化媒体中，它们趋向于以利润定位为向导，进而使人际关系进一步物化。这在围绕“粉丝”、“好友”等词汇形成的话语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大学里，以绿色 IT 和可持续发展的名义来帮助云计算实现商品化并出售出去的努力也正在进行，尽管缺乏证据证明云“更绿色”，工业已经将这个概念裹挟其中，以便为下一步的服务导向型创新赢得空间（Hall and Winn 2011）。

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云计算如何能够影响高等教育的结构和组织方式，具体来说即大学如何重设其教学设计，围绕云进行授课与演讲（Das 2012），以及像图书馆馆藏那样提供服务（Sanchati and Kulkarni 2011）。英国有过一个关于使用技术来降低教育费用的争论，其中云计算被视为一种通过共享服务来降低成本的手段。这纯粹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来减少教育财务成本，并围绕商品化服务来重新设计劳动力市场（JISC 2011），而并不考虑教学实际需要和技术部署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抵制：云计算使得技术、组织化结构中的社会关系和政治之间的复杂纠葛更为明显。一方面，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即在业务流程的重新设计中设置云技术以便榨取租金和价值的做法遭遇了抵制。这是国家补贴私有化的一种形式，重点关注的是通过外包和共享为学生提供服务的持续性与供给情况等问题。这涉及到相关数据和隐私问题，以及开放教育数据以供跨国风险资本家挖掘。类似的跨国网络也使得政府可以依照保护国土安全的逻辑来监控数据（Walden 2011）。

然而，社会化媒体也允许对控制的规避，因此也为颠覆性合作提供了反抗和抵制管理议程（managerial agendas）的新路径。云计算的应用导致了边界的模糊，受经济利益驱动的高等教育机构，随之发现越来越难以找到大学的合理边界。这对资本来说是一个问题，

因为其架构无法控制网络之中、大学以外的雇员与学生的活动，并且他们能够被“指派”来打开缝隙，使知识产权和社会关系产品可以为他人和公益服务。封闭的动机推动了云技术的推广与应用，而云技术的推广应用也反过来种下了反抗封闭的种子。

（五）人机共生

技术：不断有人为降低交换过程与相对剩余价值榨取的成本及其相关成本而努力，资本渴望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努力与渴望的顶点就是人机共生和人体机能增强。这是一种揭示了情感和扩增技术二者联系的技术，扩增技术通过云基工具被用来生产社会赋予意义的、身份标示功能驱动的商品，以及这类商品的研发、监测与分配。已被证明的是对这样一种拜物化形式的崇拜，即把人类作为最佳劳动力，为了价值增殖把人类设计为机器，加以扩增和异化（Marx 1993）。

人机共生最初是由利克里德（Licklider 1960, 1）提出的设想，作为一种手段，通过人与机器之间一种“非常紧密的结合”来实现更高效的合作行动，从而提高“程式化思维”的效率，以及对“无预定程序可以简单依靠的复杂情形”加以控制。利克里德希望“这种共生的合作关系相比人单独操作能更高效地完成智能化操作”（Licklider 1960, 1）。前提是人类智力能够被增强，并因此使人类能够执行超出其身体常规限制的任务或劳动。

该想法导致了鼠标的发明，人机互动、交互计算、超媒体及视频会议等技术创新的出现，正如媒体提高了劳动效率和价值，减少了商品的流通时间（Ikonen *et al.* 2010）。用罗伊（Roy 2004）的话来说，这意味着人机共生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技术，它能提高人类的潜能，突破人类能力的限制。他把这种技术看作人类的延伸，认为这种共生技术能通过可穿戴技术、辅助技术或神经植入来实现

(Ikonen *et al.* 2010)。

与马克思的观点 (Marx 1993/2004) 不同，这是资本强化工业化劳动合作这一需求的逻辑结果之一。这种合作通过以下方式溶解于社会组织之中：个人控制台 (personal consoles) 的开发、集成于移动和个人技术之中情感需求、机械作为劳动力的扩展与劳工身体的一体化等。正如格里夫等人 (Greef *et al.* 2007, 1) 关于增强认知的论述，其目的是“创造适合的人机协作，不断优化人机系统的性能”。这点与马克思 (Marx 1993) 关于劳动被吸纳入资本主义再生产机器的观点有联系。

在机器中，物化劳动作为统治劳动过程的权力，在劳动过程中与活劳动相对抗；这是一种占有活劳动的权力，是资本的表现形式……劳动方式的机械化发展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将传统的、继承性的劳动方式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知识与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因此被作为劳动的对立面吸纳入资本，从而表现为资本的一种属性 (Marx 1993, 694—695)^①。

人机共生目前对社会的渗透已达到如此程度，技术被视为一种偶像或是一层神秘面纱，社会脑好比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力中涌出的一泓天然甘泉，通过新兴技术建构起来。这样，消费者已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个人化技术，因为这些技术扩展了他们在社会工厂中的角色和身份。这影响到了通过存取信息、开展业务和进行全球沟通来实现劳动的方式。然而，尽管这种共生技术使得劳动既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9—210页。——译者注

能完成更复杂的计算，又能降低信息或通讯等商品的流通成本，但无形损耗的影响意味着需要不断进行创新。

教育应用：可能的应用方式与提供直接的个性化的反馈相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机共生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的医疗工作（MIT Media Lab 2012），其正在设计、开发并测试新的人机界面，可以将之应用于依靠触感操作的触觉界面。该实验室旨在将精神物理学、生物力学和精神病学融入智能高效的触觉界面和设备的开发中。此外，麻省理工学院 10X 项目（MIT 2012）正在不断测试着包括记忆等内容在内的交叉应用领域，以期增强并扩展人类的认知能力。该项目的重点在于其将支撑大学内部知识劳动的实践活动，将通过知识交换进入社会工厂的实践活动进行彻底重构。这类共生技术展示了对超越人类生理限制的人类体验进行商品化和再生产的不懈努力，因为技术是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组织起来的。

这种认知处理能力的增强以脑机交互界面的创新为基础，这是一种新兴的神经技术，可以将人脑活动转换为外部设备的指令信号。关于这些界面的研究始于 1970 年代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从建立人脑与具体待控制设备之间的直接沟通路径开始。虽然这些技术的发展主要是出于医学原因（Berger 2007, Gasson and Warwick 2007），它们同样为大学里不同形式的无形劳动提供了想象空间，并直接导致日常体验被公司“指派”来榨取剩余价值。这种情况见诸于最优决策人机集成系统（Human-Systems Integration for Optimal Decision Making），它扩增了在诸如空中交通管制和护士培训等动态复杂环境下的劳动体验（Ikonen *et al.* 2010）。不仅大学里的研究催化了这类无形性创新，那些类似的大学环境也提供了工作导向的实践空间，借此可以将新技术在社会中加以试用并嵌入其中。

因此，高等教育环境范围内关注的是人机集成系统的强化，以

考虑将人员、培训、系统安全和健康隐患等社会技术问题，纳入到目标受众将使用的共生技术的设计中来。认知和组织系统工程项目 [The Cognitive and Organisational Systems Engineering project (COSE) 2012] 正在模拟人机集成系统来支持在一系列环境中的最优决策。这体现了大学里产生的研究是如何通过开发和测试的整体过程和工具，以使它们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工作，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能够在空间上超出高等教育的范围。因此，尽管这些工程最初是用来支持医疗卫生、空中交通管制等认知性工作导向型学习，其特殊意图是通过整合学习培训、人、技术和他们工作的环境，把这种无形工作扩展到其他领域。

抵制：人机共生是这样一种技术，它提供一种彻底抵制的可能性，抵制通过影响人类对真实自然的认知来将人性吸纳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方式。这种被夸大了的人类与技术之间的亲密关系被视为有问题的、不良的，特别是伴随劳动力通过技术升级被不断优化，去人性化的过程因而被揭示出来。这是对把人类像机器一样进行设计、增强和异化以维系价值的拒绝。这些信息通讯技术的用途因此可能会在高等教育领域受到非议，该领域的一个传统目标是自主个体的发展，而非使个性商品化，商品化的目标是与技术本身的再发展相矛盾的。

（六）总结：高等教育中的新兴技术

上述四种技术所代表的创新使认知性劳动者能够通过虚拟现实超越物理障碍，并用新的方式消费其教育生活世界。正如那些体验在全球和个人两个层面被生产和商品化，资本能够捕获并驱策日常体验，使之变得如商品一样可以赚取租金、榨取价值、获得利润 (Clark 1994; Marx 2004)，并且通过培育专有技能来实现其自身的进一步再生产。大学里的研究恰恰催化了资本将人体禁锢于机器剥

削中的这一事实。然而，它的实现亦是借助以下事实：对市场化和云基（cloud-based）学习环境在教育服务的部署；将虚拟化和扩增作为维持霸权的一种手段应用于教育；工作导向的学习和实习经历；以及通过将新型机器直接植入劳工的生活世界之中。这意味着，劳工的教育生活世界，恰恰是一个创造和榨取剩余价值，并通过商品化和租赁实现价值积累的场域。正如梅克斯因斯—伍德（Meiksins-Wood 1997）指出的，这一并无外部可言的全面异化系统。

然而，从波斯通（Postone 1996）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劳动的历史性作用包含了革命性的潜在可能，原因恰恰是资本主义日益增加的剥削、异化和去人性化的机械化在日常实践中被不断地揭露。由于教育成为霸权话语和权力关系再生产的核心场域，通过先于大学内部的自反性（reflexivity）与实践而存在的技术创新，强化了对商品化的揭露。仍然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劳工将意识到其教育实践正在不断地无产阶级化。因此，有可能勾画这样一种繁荣发展的异议并对其加以支持，这些异议得以产生的基础是，自主运用那些给人们带来悲惨境遇的新兴硬件、软件与网络（Coleman 2012；Dyer-Witheford 1999；Newfield 2010）。这里的问题是，大学内部新兴技术生产是如何以一种激进主义的形式来影响学术劳动的。

五、全面撤离（Exodus）与学术激进主义的勇气

霍洛威（Holloway 2002）指出，如果我们相信那些为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而存在的结构能够被用来改善其不断异化的工作组织，那么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尽管他的话作为破灭的革命希望的标志，是针对民主国家的结构而言的，但是他的观点可能也同样适用于大学。

事实上，国家（大学）的作为受到这样一件事实的限制与形塑，即它只是作为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单一节点而存在。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这一社会关系网以工作的组织方式为中心。工作被组织于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事实，意味着国家（大学）所做的和能做的，都受到维持资本主义组织系统这一需要的限制和形塑，它只是该组织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Holloway 2002, 6）

因此，任何机构的活动空间都受制于跨国性全球资本，尤其是受制于经技术转化的金融资本所带来的时间与空间的压缩与限制。若从这一观点出发，对机构进行控制的努力将镇压资本主义反抗者的变革意图，因为这种变革总是和权力的有限调度有关。用维尔诺（北达科他州）的话来说，这是基于“弱势思维”，或是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它“由‘70年代’末期以后，提供（新自由主义）挫败（劳工运动）意识形态的哲学家的理论发展出来”。因此，教育价值观在资本主义内部建立在自由主义民主的信条之上，与平等或自由等观念，或是与诸如尊重、开放等概念模糊的实践或品质联系在一起。甚至在大学内部也变得很难去想象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工作现实的不同形式的社会生活。

由此，新兴技术的拜物化面临着强化霸权的风险，使得它们的革命性看起来只体现在其生成个体、由用户生成的结果等方面，而并不体现在对价值新形式的描绘中。从这一观点出发，它们再生产了一套普适的、超历史的规范，在该规范中，主张超越那些被资本主义强加的其他价值或组织的形式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此外，表述资本主义内部教育精英的结构性统治，或是对教育的价值进行有限的、程序性的定义，以及资本主义内部的教育革新都变得不再可能。在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创新借以涌入/流出大学的机制，为新自由资

本主义有意设计、宣扬和操纵民主和治理的形式来辅助其现实目的提供了途径 (Harvey 2010)。这部分是通过在社会技术组织和公民文化内部实施意识形态控制实现的,但这也反过来使得逾越消费者权利的控制逻辑变得不再可能。

这并不是说以一种与大学相反的形式利用开放的新兴技术并不可能 (EduFactory 2012; Hall 2011; Open Democracy 2012;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2012; Occupy Wiki 2012)。反霸权实践活动正越来越被视为教育性的,并正在通过会员大会、由公众考察并加以实践的激进研究战略与活动,使得对社会技术系统和生活方式的重新想象成为可能。实际上,正是从这些激愤的全球运动中,可能形成一种对大学里新兴技术发展的批判,以期为不同意见、为对异化了的资本主义工作的华丽虚饰加以否定和反抗提供机会 (Holloway 2010)。这种批判的出现有两个来源:首先,源于对消费主义教学法的反对,该教学法通过日常事务与活动的商品化来为采用新兴技术正名;其次,源于对这样事实的重新认识——新兴技术有助于批判资本主义劳动的历史与现实。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激进的教育计划正在政治意义上重新定义权力问题,并尝试将高等教育重新书写成一种融入社会结构之中的高层次学习。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教育计划)认为学校机构或大学对社会转型具有象征意义上的关键作用。这些教育机构形成了一个重新想象的进程,这一进程可能带来激进教育被拜物化或世俗化的风险,但却提供了另一种不同进程的惊鸿一瞥,这一进程的闪光之处在于其将大学作为社会关系全球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这也聚焦于公众对学术在社会中作用的重新思考,新兴技术使得这种重新思考变得更加容易,而新兴技术在公共生产 (production-in-public) 中的作用则成了将问题组织起来的中心主题。其中一个关注点是,通过联合一致,通过对所涉及问题进行学术的、合作性的思考,进

而将相关资源植入目标社会，来克服个人化问题（Downes 2012）。

因此，对与（学院内外）高层次学习相关的日常学术活动的批判，依照资本的技术生产逻辑展开，形成了一个网络化空间，否定、异议与反叛就是在这个空间内得以生成（Holloway 2002）。这里，全球范围内联系在一起的人机共生技术可能对打破资本主义的集权逻辑尤为重要，该技术有助于以共同的、合作的方式征服权力，这是通往废除权力关系的步骤之一。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揭露在生产/消费过程中的去人性化手段，例如情感计算支持下的情感挖掘，或是教育生活的虚拟化，并不把人作为能够为共同利益作出贡献的个体。因此，云基新技术的使用，提供了通过社会技术系统把全球的政治反抗联系起来的可能性。这需要创造一个分离的、非统一的、非连续性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由于资本主义自身异化和去人性化的重复、不稳定性被揭露，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学术劳动将变得更具风险。

通过新技术将高等教育与社会联系起来十分重要，这将划定技术支持下意义与反抗的空间，因为大学依然是大众理性被消费、被生产、被（所有人）扩展的场域象征。因此，揭露社会工厂内共同的异化经历，应用能够突出受压迫感并允许将这种感觉进行分享的新兴技术，为新的反抗、批判场域的形成提供了可能。通过放大这一过程，大学里的学术实践针对圈定人们集会、联合、组织的方式、地点与原因这一不合理现象，提供了勇敢反抗的空间（Agamben 2005）。然而，考虑到意识形态、政治驱动力以契约化研究与债务（indentured study and debt）、国际化、私有化、外包为导向，一旦涉及到抵制封闭的竞争逻辑，主张高等教育的社会化角色等问题时，大学里的学术活动并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因此，大学的内部逻辑越来越受制于金钱规则，这排除了建立变革性社会关系——如反抗拜物化生产和增殖过程——的可能性。

“全面撤离”的观点在此作为一种异议、反叛和抵抗的形式是很重要的，其反对的目标是正如新兴技术所展现的资本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剥削。这种剥削通过游戏工业的玩工（playbor）见诸于情感技术之中（Dyer-Witheford and de Peuter 2009）；也见诸于云数据的攫取之中，通过攫取数据吸纳更多身份信息，以服务于社会网络的进一步积累（Winer 2011）；或是见诸于以营利性扩增程序来封闭开放网络的行为之中（Short 2011）。因此，个性化、自我品牌（self-branding）、人们借以相互联系新兴技术，这三者的拜物化过程，使我们在世界上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与所有行动，都面临商品化的风险。然而，这一增强了的、相互联结的社会关系语义网，也提供了一个罅隙，借此罅隙有可能反抗资本的统治。正如伊里奇（Illich 1975, 82）所述：“只有在欢乐的结构化工具之中，人们才能学会使用现代技术赋予他们的新层次的权力。”因此，正是资本为实现约束和控制劳工，而要求发展的自动化或人机增强与共生，使得全面撤离资本主义工作社会成为可能，这一全面撤离通过对作为自动化的结果而产生的空闲时间进行激进的重新处置而实现，随之而来的是不同群体在空闲时间里得以相互联系的新的生活方式（Virno 2004）。

这样，学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提高了全面撤离资本主义工作社会的可能性。这不仅仅是一系列反对资本控制论指令的原子化的最后一搏（Dyer-Witheford 1999）。这一作用始于对认知性劳动起点上的否定和拒绝。用诺布尔（Noble 1998）的话来说，这意味着反对在虚拟化推动下将智力活动转化为智力资本进而转化为私有财产，而虚拟化本身则又是受教学研究的商品化和具商业价值的专利产品的出现所驱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技能退化和自动化、商品拜物化、劳工的无产阶级化居于这一过程的核心。因此，通过把包含研发在内的大学生活世界与马克思的深层结构性技术批判重新联系起来，可以使新兴技术的公共发展合法化，并使得对它们作为生产的

拜物性力量的揭露成为可能, 成为学生、教师和公众之间活动的一种重新政治化的形式。此外, 可以利用这种合法性来培养异议空间, 或是进行以新工人主义反叛 (new workerist revolts) 为基础的抗议 (Coleman 2012; Mason 2012)。这些抗议的工人主义特性非常重要, 因为资本倾向于将无产阶级社会劳动置于次要位置并加以剥削, 进而供养并增强那些更有价值的、有着专有技能的认知性劳工 (Newfield 2010; Dyer-Witheford 2004)。

因此, 大规模的抗议形成了反抗紧缩的政治事件, 学者们应该考虑他们的参与传统及应处位置, 以及如何主动为消解自己专业知识商品性而贡献力量, 以便支持生产的别样社会结构形式。通过特定新兴技术的生产/消费, 揭示了对知识生产的批判, 在对其批判中, 大学能够获得超越自身象征性作用的发展。作为结果, 学生和教师可能会重新考虑他们参与新兴技术的方式, 以便有助于他们社会互动网络的重组。学生和教师如何在反对统治和排斥 (foreclosure) 的公共性异见中发挥作用? 从马克思的观点来说 (Marx 1992/2004), 技术是社会革命性转型的一条中心线索。这种转型通过建构一种替代性的价值结构推翻了资本主义的价值形式, 这一替代性的价值系统并没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性质。与马克思的认识不同, 学者们可能会考虑其借助新兴技术所进行的有关新兴技术的工作, 是如何有助于在实际的、现实存在的抗议中消解大学的象征性力量的, 以期参与到超越纯粹商品化的转型进程之中。

参考文献:

- Agamben, Giorgio. 2005. *State of Excep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ndriole, Katherine P., and Ramin Khorasani. 2010. Cloud Computing: What Is It and Could It Be Usefu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 7(4): 252 - 254.
- Azuma, Ronald T., Baillot, Yohan, Behringer, Reinhold, Feiner, Steven, Julier, Si-

mon and Blair MacIntyre. 2001. Recent Advances in Augmented Reality. *IEEE Computer Graphics and Application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cs.unc.edu/~azuma/cga2001.pdf>

Bailey, Michael, and Des Freedman. 2011. *The Assault on Universities: A Manifesto of Resistance*. London: Pluto Press.

Ball, Stephen J. 2012. *Global Education Inc. New Policy Networks and The Neo-Liberal Imaginary*. London: Routledge.

Berger, Theodore W. 2007.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Brain-Computer Interface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wtec.org/bci/BCI-finalreport-10Oct2007-lowres.pdf>

Blackboard Inc. 2012. Blackboard Mobile.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blackboard.com/Platforms/Mobile/Overview.aspx>

Bonefeld, Werner. 2010. What is the alternative? *Shift Magazine*, 11.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shiftmag.co.uk/?p=400>

Canaan, Joyce. E, and Wesley Shumar, eds. 2008.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the Neoliberal University*, London: Routledge.

Clarke, Simon. 1994. *Marx's Theory of crisis*.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Cline, Mychilo S. 2005. *Power, Madness, and immortality: The future of virtual reality*. University Village Press.

COSE. 2012. COSE Project.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nicta.com.au/research/projects/cose>

Collini, Stefan. 2012. *What Are Universities For?* London: Penguin.

Colman, Gabriella. 2012. Our Weirddness is Free. *Triple Canopy*, 15.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canopycanopycanopy.com/15/our_weirdness_is_free

Cowie, Roddy. 2005. What are people doing when they assign everyday emotion terms? *Psychological Inquiry* 16(1): 11 – 48.

Cuhls, Kerstin. 2003. From forecasting to foresight processes-new participative foresight activities in Germany. *Journal of Forecasting* 22(2 – 3): 93 – 111. Accessed April 1, 2012.

Cullerne-Brown, William. 2012. Research Blog.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exquisitelife.research.com/exquisite_life/williamcullernebown.html

Das, Gaurav. 2012. 6 universities to teach cloud computing, mobile tech.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2-08/guwahati/31037183_1_cloud-technology-manipur-university-curriculum

Dikaiakos, Marios D. , George Pallis, Dimitrios Katsaros, Penkaj Mehra, and Athena Vakali. 2009. Cloud Computing: Distributed Internet Computing for I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EEE Internet Computing* 13(5): 10 – 13.

Downes, Stephen. 2012. Welcome to Change: Education,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change.mooc.ca/about.htm>

Dyer-Witheford, Nick. 1999.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 Technology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Dyer-Witheford, Nick. 2004. *Autonomist Marxism an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anberra: Treason Pres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libcom.org/library/autonomist-marxism-information-society-nick-witheford>.

Dyer-Witheford, Nick, and Greg de Peuter. 2009. *Games of empire: 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duFactory. 2012.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edu-factory.org/wp/>

EC. 2010. *COM(2010)2020: Europe 2020-A strategy for smart,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ec.europa.eu/eu2020/>

EC. 2012.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Framework Programme 7*.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ec.europa.eu/research/fp7/>

Educause. 2012. Learning Analytics: 51 Resource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educause.edu/Resources/Browse/LearningAnalytics/39193>

Greef de Tjerk, E. , Arciszewski Henryk F. R. , and Mark A. Neerinx. 2010. Adaptive Automation Based on an Object-Oriented Task Model: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in a Realistic C2 Environment. *Journal of Cognitive Engineering and Decision Making* 4(2): 152 – 182.

Feenberg, Andrew. 1999. *Questioning Technology*. London: Routledge.

- Foucault, Michel.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New York: Pantheon.
- Friedewald, Michael. 2005. The Continuous Construction of the Computer User: Visions and User Models in the History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 *Total Intera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 New Paradigm*, edited by Gerhard M. Buurman, 26 – 41. Basel: Birkhäuser.
- Fuchs, Christian. 2010.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6(3): 179 – 196.
- Ganascia, Jean-Gabriel. 2010. The generalized sousveillance society.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49(3): 489 – 507.
- Gartner. 2011. Gartner's 2011 Hype Cycle Special Report Evaluates the Maturity of 1,900 Technologie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gartner.com/it/page.jsp?id=1763814>
- Gasson, Mark, and Kevin Warwick, K. 2007. D12. *Study On Emerging Aml Technologies*. FIDIS-Future of Identit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fidis.net/resources/deliverables/hightechid/d122-study-on-emerging-ami-technologies/doc/8/>
- Habermas, Jürgen. 1987.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volume 2 of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 Hall, Richard. 2011. Occupation: a place to deliberate the socio-history of re-production. In *Roundhouse Journal: Reimagining the University* 2: 54 – 63.
- Hall, Richard. 2012.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the War on Public Education.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richard-hall.org/2012/03/22/educational-technology-and-the-war-on-public-education/>
- Hall, Richard, and Joss Winn. 2011. Questioning Techn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Resilient Higher Education. *E-Learning and Digital Media* 8(4): 343 – 356.
- Hamilton, Karen E. 2011. Augmented Reality in Education. Accessed 14 March, 2012. http://wik.ed.uiuc.edu/index.php/Augmented_Reality_in_Education
- Harvey, David.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Blackwell.

- Harvey, David. 2010.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London: Verso.
- HEFCE. 2012. Enhanc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rough the Use of Technology.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hefce.ac.uk/learning/techlearn/>
- Heilig, Morton L. 1962. *Sensorama Simulator*. Accessed 14 March, 2012. <http://www.mortonheilig.com/SensoramaPatent.pdf>
- HIT Lab NZ. 2012. BuildAR. Accessed 14 March, 2012. <http://www.buildar.co.nz/>
- Holloway, John. 2002.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 Press.
- Hudlicka, Eva. 2009. Affective Game Engines: Motivation and Requirements. In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undations of Digital Games*, 299 – 306. Orlando, Florida: ACM. doi: 10.1145/1536513.1536565
- Human Machine Symbiosis Lab. 2012.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symbiosis.asu.edu/research_hms.html
- Ikonen, Veikko, Kanerva, Minni, Kouri, Panu, Stahl, Bernd Carsten & Wakunuma, Kutoma. 2010. ETICA Project Deliverable D. 1. 2: Emerging Technologies Report.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ethics.ccsr.cse.dmu.ac.uk/etica/deliverables/D12Emergingtechnologiesreportfinal.pdf>
- Illich, Ivan. 1975. *Tools for Conviviality*, London: Fontana.
- JISC. 2011. Cloud Computing Increasingly Attractive to Universitie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jisc.ac.uk/news/stories/2011/05/cloud.aspx>
- JISC. 2012. Mobile Learning Infokit.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s://mobilelearninginfokit.pbworks.com/w/page/41122430/Home>
- Klein, Naomi. 2007.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London: Penguin.
- Lebowitz, Michael A. 2003. *Beyond Capital: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king Clas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Lepratti, Raffaello. 2006. Advanced Human-Machine System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ome Issues for Employing Ontologies for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Journal*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17(6) : 653 – 66.

Licklider, Joseph C. R. 1960. Man-Computer Symbiosis. *IRE Transactions on Human Factors in Electronics*, HFE – 1: 4 – 11.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groups.csail.mit.edu/medg/people/psz/Licklider.html>

Mason, Paul. 2012. *Why It's Kicking Off Everywhere: The New Global Revolutions*. London: Verso.

Marx, Karl. 1992. *Capital*, Volume 3: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993.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2004. *Capital*, Volume 1: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2006. *Capital*, Volume 2: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McGettigan, Andrew M. 2012. Critical Education: All about the Arts, Humanities and Higher Education today.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andrewmcgettigan.org/>

Meiksins-Wood, Ellen. 1997. Back to Marx. *Monthly Review* 49(2) : 1 – 9.

MIT Media Lab. 2012. Affective Computing.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affect.media.mit.edu/>

MIT. 2012. 10x Human-Machine Superperformance.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10x.media.mit.edu/>

Neary, Mike, and Andy Hagyard. 2010. Pedagogy of Excess-an Altern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udent Life. In *The Market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Student as Consumer*, edited by Mike Molesworth, Richard Scullion and Elizabeth Nixon, 209 – 224. London: Routledge.

Negri, Antonio. 1989. *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Neilsson, Brett, and Ned Rossiter. 2008. Precarity as a Political Concept, or, Fordism as Except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5(7 – 8) : 51 – 72.

Newfield, Christopher. 2010. The Structure and Silence of Cognitariat. *EduFactory Webjournal* 0: 10 – 26.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edu-factory.org/edu15/webjournal/n0/Newfield.pdf>

Newfield, Christopher. 2012. Remaking the University.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utotherescue.blogspot.com/>

Noble, David F. 1998. Digital Diploma Mills: The Auto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irst Monday* 3 (1):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569/490>

Occupy Wiki. 2012. OccupyWiki. org.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occupywiki.org/>

OpenDemocracy. 2012. #occupy communique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opendemocracy.net/freeform-tags/occupy-communiques>

Postone, Moishe. 1996. *Time, Labou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stone, Moishe. 2009. Rethinking Marx's Critical Theory. In *History and Heteronomy: Critical Essays (UTCP Booklet 12)*, edited Moishe Postone, Viren Murthy and Yasuo Kobayashi, 31 – 47. Toky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Center for Philosophy.

Porto Interactive Center. 2012. Life is Game Project.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portointeractivecenter.org/lifeisgame/>

Really Open University. 2012. The Really Open University.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reallyopenuniversity.wordpress.com/>

Robinson, Peter, and Rana el Kaliouby. 2009. Computation of Emotions in Man and Machin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4 (1535): 3441 – 3447. doi: 10.1098/rstb.2009.0198.

Roy, Deb. 2004. 10x: Human-Machine Symbiosis. *BT Technology Journal* 22 (4).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10x.media.mit.edu/10x_draft.pdf

Sanchati, Rupesh, and Gaurav Kulkarni. 2011. Cloud Computing in Digit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Global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1 (12): 36 – 41.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globaljournals.org/GJCST_Volume11/6-Cloud-

Computing-in-Digital-and-University. pdf

Short, Adrian. 2011. It's the End of the Web As We Know It.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adrianshort.co.uk/2011/09/25/its-the-end-of-the-web-as-we-know-it/>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2012. Radical Education Project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sociologicalimagination.org/a-work-in-progress>

Stahl, Bernd Carsten. 2004. E-Teaching-The Economic Threat to the Ethical Legitimacy of Education? I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Education* 15(2): 155 – 166.

Sykes, Jonathan, and Simon Brown. 2003. Affective gaming: measuring emotion through the gamepad. In *CHI'03 extended abstracts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732 – 733. Ft. Lauderdale, FL: ACM. doi: 10.1145/765891.765957

Tao, Jianhua, and Tieniu Tan. 2005. Affective Computing: A Review.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3784: 981 – 995.

The Think Trust. 2010. Cloud Computing Scenario.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think-trust.eu/downloads/think-trust-documents/cloud-computing_v0-2/download.html

Tiqqun. 2001. The Cybernetic Hypothesi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archive.org/details/Tiqqun1>

Tronti, Mario. 1973. Social Capital. *Telos* 17: 98 – 121.

Valtysson, Bjarki. 2011. Facebook as a Digital Public Sphere: Processes of Colonization and Emancipation.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10(1): 77 – 91.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triple-c.at/index.php/tripleC/article/view/312>

Vercellone, Carlo. 2007. From Formal Subsumption to General Intelle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5(1): 13 – 36.

Virno, Paolo. 2001. General Intellect. *Generation Online*.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p/fpvirno10.htm>

Virno, Paolo. 2004.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Los Angeles: Semiotext.

Virno, Paolo. n. d. General Intellect, Exodus, Multitude: Interview with Paolo Virno.

Archipelago (54).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p/ipvirno2.htm>

Virno, Paolo, and Michael Hardt, eds. 1996.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Walden, Ian. 2011. Accessing Data in the Cloud: The Long Arm of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781067

Wake, Matthew, and Bernd Carsten Stahl. 2010. Ethical Issues of the Use of Second Life in Higher Education. In *Proceedings of ETHICOMP*, 13 to 16 April 2010, Tarragona, Spain.

Weber, Max. 1969.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Williams, Jeffrey, J. 2012. Deconstructing Academe: The birth of critical university studie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edu-factory.org/wp/deconstructing-academe-the-birth-of-critical-university-studies/>

Winer, Dave. 2011. Facebook is scaring me.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scripiting.com/stories/2011/09/24/facebookIsScaringMe.html>

xDelia. 2012. Xcellence in Decision-making through Enhanced Learning in Immersive Application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xdelia.org>

Zhou, Feng, Duh, Henry Been-Lirn, and Mark Billinghurst. 2008. Trends in Augmented Reality Tracking, Interaction and Display: A Review of Ten Years of ISMAR. In *ISMAR '08: Proceedings of the 7th IEEE/AC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ixed and Augmented Reality*.

Žižek, Slavoj. 2009.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

威廉·亨宁·詹姆斯·赫布尔怀特 (William Henning James Hebblewhite)^①

“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新论

罗锋 (译), 姬德强、吴畅畅 (校)

[摘要] 本篇论文希望考察雷蒙德·威廉斯提出的“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的论断。本篇论文在同意威廉斯的中心论断的同时, 认为他用来说明这个论点的模式没有得到充分实现。通过结合马克思与阿尔都塞与此相关的研究, 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概念工具来具体说明威廉斯的观点。

[关键词] 雷蒙德·威廉斯, 传播工具, 因特网, 生产工具, 马克思, 阿尔都塞。

一、导 言

在本文中, 通过批判性地考察威廉斯“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 我试图去探索他关于传播工具可以被看作生产工具的论断。我认为威廉斯的理论为传播理论带来了新的可能性。然而我也认为, 尽管

^①拉筹伯大学, whebblewhite@students.latrobe.edu.au.

可能开拓新空间，但是威廉斯的理论本身并不能将这些可能性转变为最终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在此引入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来促进这种可能性的发展。本文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我将厘清马克思对于生产工具的定义以及他如何将传播工具视为生产关系的形式之一。同时我也将讨论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以及将传播工具视作生产工具对我们理解社会又有怎样的影响。在第二部分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我将厘清雷蒙德·威廉斯关于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的阐述。我认为威廉斯一方面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设，一方面又因为这种观点是基于对“生产”这样一个称呼的定义之上的，也就降低了准确描述生产工具的含义的能力。我认为威廉斯希望能够说明生产不仅仅只是“商品生产”，传播也是一种将信息视作商品的生产。在最后一部分中，我希望考察，阿尔都塞的哲学思想是如何从理论上有助于对如下观点的检讨，即：因特网是生产工具，从而也生产信息产品。本文的目的有二：在马克思理论框架下，给对于诸如因特网这样的传播工具的持续性分析打好基础，同时希望借此克服雷蒙德·威廉斯研究中对于结构主义的批评。

二、马克思与生产工具

1857年，马克思写就他流传最久的作品之一。在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arx 1859/1994）绝对是里程碑式的作品，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所做的所有工作都可以从中找到根源。下面是这一文稿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被非常多的人解读。马克思这样写道：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

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

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①

这个章节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生产工具的概念。从“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这句话中，可以看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结构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并且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而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如何建构生产方式的。《序言》中的这两部分对我们在本文的讨论，必然是十分重要的。如果雷蒙德·威廉斯假设传播工具也是一种生产工具，那么这就是对于社会结构的反思，或者说这种假设成立么？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组成这个论点的各个要素。正如我们在威廉斯的文章标题中所看到的，最主要的要素是：传播工具和生产工具。我们可以认为这样一个标题说明了生产工具相较于传播工具是一个更为宽泛的类别，而传播工具只是生产工具的一种。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那么接下来自然而然需要了解的就是生产工具是什么。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工具的两个要素在劳动过程当中成为了统一的力量。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到，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劳动力与原始资料是生产力与相对生产的矛盾的表现的一个方面。它们以这样的形式定义社会结构。接下来需要我们对这些概念做更深入的研究。按照马克思的话“劳动工具是一神物，或是物的合成体，劳动工具使工人可以在其自身与劳动对象之间进行干预，并担任了指挥的角色，指导工人在对象上展开行动”（Marx 1990, 285）。尽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83页。——译者注

管关于生产工具以及哪些可以或者不可以借由这个概念来进行理解还存在着争论，G. A. 柯亨（Gerald Allan Cohen，2000）认为像力量、技能、知识以及智力这些东西虽然并不是原始材料也非劳动力要素，但却是实际劳动过程中的工具。而像生产工具、劳动工具这些所谓的模糊性允许不同的人在描述生产过程中的这些组成部分时有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表述。那么依照概念来看，劳动工具是诸如一把锤子或者一个工厂这样关注于劳动目的的活动。这个概念本身已经足够宽泛，但是在我们引入马克思“在劳动工具中，我们需要包含劳动过程发生的一切客观条件”这样的说法之后，概念的含义变得更加宽泛了。

我认为我们接下来可以推断原始材料和劳动对象也包含在劳动工具的概念里面。但是我们同样必须注意到原始材料与劳动对象的并存。所有的原始材料都是劳动对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劳动对象都是原始材料。在马克思的观念里，原始材料在经过了劳动过程之后就不仅仅只是劳动材料了（Marx 1990）。我们可以说一块木板是原始材料，而森林中的一棵树是自然资源。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一块木板已经经过劳动力的改造，成为了产品。根据我之前所述，劳动力要素可以全盘被看作是生产工具。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不管形式如何，只要能够提供劳动的客观情况，就可以被看作是劳动力要素。正如劳动对象就是劳动发生的场所，我们可以推知劳动对象是一种劳动力要素，与其他劳动力要素一起被制作成可供消费的产品。我们也可以这么说，生产工具不外乎就是劳动条件。考虑到生产力是劳动过程与生产工具的结合，也可以说是劳动力要素将它们联结起来成为了生产力。

马克思与“传播工具就是生产工具”

这与我们关于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的讨论有什么关系呢？如果

我们将生产工具看作是劳动过程要发生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我们就必须证明传播工具是劳动资料的一种，而传播工具作为一种生产工具需要为劳动过程提供必要的条件。

在《资本论》第一卷，机器与大规模生产这一部分中，马克思讨论了生产工具与传播工具的关系。他简明地写道“工业与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又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有发生革命的必要”^①，这些“生产的社会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认为的“传播工具”与“运输工具”（Marx 1990，506）。在马克思写作的时代，生产的社会过程的形式通过电报与铁路系统实现了。马克思并不经常使用“传播工具”这一词，只是偶尔提及运输工具。实际上在资本论一书当中，很难去区分马克思所说的传播工具与运输工具。这一点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当中宣称传播工业的非商业化的一面在于“搭载客货和传递信息”（Marx 1992，134）^②得到了证明。如果我们顺着马克思的思路，那么我们能不能够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当中得出马克思认同传播工具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的结论呢？通过生产关系我们可以理解促进生产与复制生产工具的社会关系整体。在序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这样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Marx 1994，211）。^③

在我们说传播工具是生产关系的时候，我们指的是生产的社会关系，也就是组成社会结构的社会—经济关系。从中我们看到物质

①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67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二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2页。——译者注

③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83页。——译者注

生产力（劳动力要素与劳动力）与社会生产关系（传播与交通工具）中的必要基础。而正是基于马克思的框架，我们很容易将传播工具视作生产关系。我们在《资本论》第二卷当中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疏离（distancing），传播工业与运输工业一起，被看作是工业体系里重要的分支，“其生产过程的生产物，不是一种新的对象的生产物”（Marx 1992, 134）。^①对于马克思来说，运输产业与传播产业都没有生产新的商品，而是“替换人或者物品”（Marx 1992, 135）。这在《资本论》中多有记载，正如之前所述，对于马克思来说，相较于生产方式而言，传播工具在结构和过程上与运输方式更接近，甚至在变革中也以同样的方式发展（Marx 1990, 506）。需要注意并且进一步讨论的是运输工具和传播工具的进步最终将限制大型工业制造（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生产力）。根据马克思的说法，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生产关系将会阻碍（或者说束缚）它的进一步发展。到这个时候，社会革命将会发生，演进出能够使得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生产关系。当然如果马克思认为传播工具是一种生产关系，那么在某些阶段我们会发现马克思所说的传播工具与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传播工具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在下一章当中我将把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看作是一种可以用来反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而威廉斯的研究相较于经济更多地侧重于文化使得他可以视传播工具为生产工具。

我们必须认清商品中有形商品与无形的“传播”之间的差别。在不同的层面，传播既存在于生产者与供应者之间，也发生于工人与经理之间，同样也存在于消费者与制造者之间。我们必须认识到大众传播与本土化传播之间的区别。而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著作当中

^①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二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2页。——译者注

看不到；马克思的著作中所提到的传播类型最终都是与大众传播有关的。这是一种大规模生产的传播。我们可以认为本土化传播从属于大众传播。没有了局部传播的效果，或者说经理告诉工人如何去做，那么也就不会存在有效的大众传播，或者是信息也不能从作为具体商品生产者的工人那里传播到包括供应者与消费者等不同人群那里去。

三、威廉斯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研究

在威廉斯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阐述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着眼点在于一些由特定的关键词所组成的论述。他在著作中对于生产、决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威廉斯认为，马克思所制定的（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前一直被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误解。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他们对马克思所使用的独特语言形式的误解。威廉斯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学习特定某个思想家的语言，而不是他们提出的抽象概念（Eldridge and Eldridge 1994）。正如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所说：

在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之中，以及在具有解释性的和说教性的构想的发展过程中，在其最原始的论点之中的词语是设计出的……就好像它们是一些明确的概念……就好像他们是一些为社会生活中可观察到的领域而制定的术语。（Williams 1977, 77）

对威廉斯而言，马克思提出的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讨论，不过是一种类比（Williams 1993），是一种关于社会结构的语言表述。而这种表述并未能恰当地将整个社会的图景展现出来。它仅仅

提供了一个简化了的真实社会的变种。威廉斯认为，恩格斯 1890 年写给布洛赫（J. Bloch）的信，提供了一种基础，它减弱了马克思所使用的基础 - 上层建筑公式的有用性（Williams 1993）。对于马克思的这种准则，威廉斯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的一段文章为证，来展现马克思所宣称的有关上层建筑的理性。而据威廉斯称，这理性使得公式变得复杂。对此，他写道“通过任何有效的手段意识到其复杂性，是为了提高马克思理论修养首先要掌握的。其次要掌控的……是懂得（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构成”（Williams 1993）。在写给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写道，任何关于经济基础对社会结构有决定性作用的归纳性陈述都是对马克思和他本人意思的曲解，而这些陈述是“毫无意义，抽象以及荒谬的……”（Engels 1890）。恩格斯进一步写道，“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元素……也对历史的斗争有影响。而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甚至决定了历史斗争的形式。”（Engels 1890, 475）基于此，威廉斯认为，恩格斯展现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发展所需要的。它说明马克思的公式只是一种比喻，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结构并非如此绝对和清晰。威廉斯并未紧随恩格斯的脚步，他批评恩格斯在层次上并未跳脱公式化的方法。威廉斯认为，恩格斯的模式和马克思的模式一样，犯了相同的错误。他写道，“恩格斯并没有对其中的种类做过多的修订……而只是复述了一些类别，同时举例指出一些特例，间接性和一些可能使一般的规律状况变得模糊不清的不规律性的存在。”（Williams 1977, 80）由此可以看出，威廉斯决定从重经济基础、轻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走出来。对于威廉斯而言，“马克思……强调文化和经济的关联性是正确的，但是他误解了这种关系的本质。文化和传播曾经被看作是主要的而不是次要的社会内容，在社会秩序的保持和发展过程中具有构成性的而不是反应性的作用”（Higgins 1994, 110）。

威廉斯反对马克思理论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类比，这一观点总结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的一篇文章里。他写道：

正如创造了它的社会斗争，为了维持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物质生产是必然需要的。从城堡、宫殿和教堂，到监狱、救济院和学校；从战争武器到凸轮压机；任何统治阶级，经常通过物质的各种方法，来制定社会和政治秩序。这其中从未有上层建筑活动。他们是以一种明显的自立模式进行的必要的物质生产，可以独立运行。（Williams 1977，93）

当然，不管城堡、宫殿、教堂和监狱的“上层建筑活动”性质，而将他们设想为物质生产，尽管这是合理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立刻察觉出威廉斯论述中的缺陷。也许的确是这样，上层建筑在过去一直仅仅被当作一种意识的非物质形式。这一论断在当代马克思理论中是被反对和不被接受的。正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指出的：“威廉斯的著作中有一种强烈的暗示，给某些现象贴上‘上层建筑’的标签，在某种程度上是承认这种现象现实的有效性程度少于其作为物质生产的存在因素。”（Eagleton 1989，168）也许正像阿尔都塞那样，威廉斯考虑到了黑格尔式的因果关系模式。这种模式表达了一种观点，即所有有关社会整体性的现象也许都简化成一种特别的精华模式。但是，并不像阿尔都塞那样，认为马克思已经超越了黑格尔曾经的影响，威廉斯主张，马克思晚年所提出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对于实际的因果关系模式方面仍做了很大的投入。伊格尔顿认为，威廉斯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是在重新创造体系。他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过时模式的批评，与其说从某种理论意义上是有用的，不如说是一种例行公事（Eagleton 1989）。如阿尔都塞

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可以看作“马克思对于‘整个社会历程’的‘不能分解的统一体’的原始洞察的复杂整体的回归”（Higgins 1999, 114）。它“克服了‘社会’和‘自然’的二分法”（Williams 1977, 19）。威廉斯并未将经济看作是社会核心概念，而是将文化放在“现代思想和实践”的中心位置（Williams 1977, 11）。文化这个术语因此成为威廉斯关注的核心，这可从他尝试着去建构一个文化唯物论（Williams 1977/1993）和一个文化社会学（参见 Williams 1977, 11）中看出来。于威廉斯而言，“马克思……正确地强调了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关联，但是他严重地混淆了联系的性质”（Higgins 1999, 110）。文化并不是如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标榜的那样是与其他上层建筑元素一样的（社会的）次要属性。相反，“文化和传播应当被视作社会整体性的主要组成部分”（Higgins 1999, 110）。文化唯物论认为，文化应被同时看作社会的和物质的生产过程，并将“艺术”视为一种对物质生产手段进行社会使用的实践（Williams 1980）。他跟随赫尔德（Herder）和柯勒律治（Coleridge）的浪漫主义的脚步，将文化“同政治和经济分离，并将其置于比政治和经济更高的位置”。然而，文化主义是否单单只是一种将文化置于经济之上的决定论呢？它是否只是一个对威廉斯所批判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构想的一种反转？不一定。尽管看起来如此，但威廉斯的决定论与他所力图批判的决定论相比，具有不同的很特别的意义。决定论的概念在威廉斯的著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解决马克思文化理论方面的问题，要比解决‘决定论’方面的难得多”。对于“决定论”这个关键词，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专门有一章对其进行了阐述。他力图对决定论进行定义。他认为决定论不是“被预计了的、被预示了的、被控制了的合集”，而更像是一种设定限制和施加压力的合集（Williams 2005, 34）。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表述中有

很深的技术决定论思想，对此他也深感厌恶。我们也必须再次指出威廉斯有着与阿尔都塞很相似的观点。两位思想家，都不愿将决定论看作为一种控制的过程，而认为其是一种限制の設定。二者都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恩格斯对于决定论的描述。这描述出现于之前所说的那封恩格斯写给布洛赫的信中。威廉斯批判他所称作“抽象的客观性的东西”，在这种抽象的客观性中决定过程独立于人的意志，同时人类无法掌控。这便是在第二国际时期被广泛传播的经济主义建立地位的基础。威廉斯进一步认为，对于哲学和政治的学说而言，这地位毫无意义（Williams 1977）。威廉斯反对经济主义，然而尽管他反对，决定论仍旧在他的著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他认为在社会结构中，文化具有卓越的地位。文化不再是上层建筑，而是和其他像经济和政治这些决定性元素一样，是一个基本过程。而为了从文化决定论中逃脱出来，威廉斯将自己的著作，同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学说，具体来说是其关于霸权概念的学说联系在了一起。霸权，在这层意义上来说，是指统治与屈从。这就是说，正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言，社会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要素尽管不是“统治”着其他要素，但是它使得对其他要素的需求成为必需的。因为它们可以从其他的元素的需求当中找到自身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于威廉斯而言，作为社会结构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元素协同工作，构建社会。

在威廉斯模式下，由于他自己对于“物质”被用作描述“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忽视，传播方式并不能被恰当地看作是一种生产方式。如果我们接受威廉斯的模式，那么对生产的定义将会变得宽泛，马克思主义这一对生产的笼统称呼，将会变成一种通俗的可以用来定义任何生产种类的词语。没有一个决定性的社会基础，甚至连一个“最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没有被说明。社会变成了一个开放式的分类，经常为人们所重新定义。在之后的章节，我将要

对传播手段进行讨论。根据马克思结构主义者的论述，传播手段完全可以定义为一种生产方式。

四、阿尔都塞和作为生产方式的传播手段

和威廉斯不同，阿尔都塞强烈推荐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学〉序言》中提出的模式。然而，阿尔都塞将恩格斯对此的反应也考虑在内。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明确指出，经济是社会结构的主要决定因素。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研究克服了决定论和经济主义，而这些也是威廉斯尝试着克服的。但阿尔都塞的研究没有像威廉斯那样陷入依赖文化的决定论模式中。像威廉斯一样，阿尔都塞的逻辑起点也是恩格斯给布洛赫的信中所提及的“复杂性”的重要性。对于阿尔都塞而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公式依然重要。但同恩格斯一样，阿尔都塞偏向于同意上层建筑元素的相对自治，经济只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现在看看这个最后一种可能的决定性因素，则像是对马克思决定论的一种推测。然而对于阿尔都塞而言，决定论包括设定限制。这就是说，经济是最少决定支配社会构成的社会整体的元素。但这并不是绝对的。正如威廉斯主张的那样，支配元素“根据多重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的矛盾和其未能被看到的发展而改变”（Althusser and Balibar 2009, 357）。我们对因此产生的两点很感兴趣。第一，“最终决定因素”（determination in the last instance）和“具有支配作用的结构”（structures in dominance）之间的不同。第二，多重决定论所扮演的角色。威廉斯批评多种决定因素的概念，认为其是在重复“‘经济主义’中的一个基本错误，它依旧依赖着作为社会结构的首要决定因素的经济”（Williams 1977）。然而，在深入讨论多重决定论之前，我们必须对“最终决定因素”和支配者之间的不同进行讨论。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

“最少的决定者”的范畴第一次为人们所知道，是在恩格斯和布洛赫的通信中。恩格斯写道：

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至于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①（Engels 1890）

这就是说，有因果联系存在的社会结构元素，即是经济基础。它主张自己具有决定性的力量。阿尔都塞采用了恩格斯的定义并对其进行扩展，是对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结构化的研究。阿尔都塞对此扩展的成果之一，便是认为这种“最终决定因素”从未能真正实现（Althusser 2005）。阿尔都塞试图用一种可适用的因果关系的模式替代曾经的那两种因果关系模式（即是机械的和有效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两种模式都有缺陷。阿尔都塞认为结构性的力量对社会构成起作用。而这些相互关联的社会结构元素包含社会构成，并对社会构成产生影响。社会结构的影响并不是由社会结构之外的事物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结构自身的元素所决定（Althusser 2009）。威廉斯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即是他们认为基础结构（不管它可能包含了什么）具有同上层建筑分离的实体结构。阿尔都塞对此进行了补充：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在同一（社会）结构中的元素，这些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解释了社会结构。

阿尔都塞的结构理论是如何在威廉斯的理论失败之处取得成功，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0页。——译者注

从而确定传播手段是一种生产方式呢？正如上文所说，威廉斯的问题在于，他设想到了上层建筑包含非物质的内容，但却是为了论述上层建筑的物质内容。他试图去说明的，是上层建筑的元素作为物质生产的一部分和其作为经济生产的一部分没有区别。但是也没有人会否认，上层建筑元素是物质的，且自身可以生产东西，在阿尔都塞的著名文章《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他对意识形态的物质性进行了讨论。对于阿尔都塞，“一种意识形态经常以一种机器的形态而存在”（Althusser 1990, 112），并且他还声称，意识形态是一种物质存在。在阿尔都塞看来，物质的概念存在于不同的、以物质存在理论为基础的形态之中。所以尽管意识形态也许并不是“物质的”，就威廉斯的理论而言却仍是物质的，它们仍旧存在于一种特殊的物质形式中。因此当我们主张意识形态对于现实而言是一种虚构的关系时，它们并不拥有物质的存在形式。阿尔都塞想说的是，这些信仰的实现在行动上和实践上巩固了他们的物质性。现实生活中的关系，要求我们参加某些在物质思想机构之中的实践。之后，这些实践就应验成为我们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在这一情况下，法律和政的意识形态将会被看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如果按威廉斯所言，他认为根据“物质”这个词的用法，传播手段可以理解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言，如果我们仅仅是运用一个结构主义者的观点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必要去改变“物质”这个关键词。

五、E. P. 汤普森对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对阿尔都塞的论点概述完毕，我现在来说说汤普森对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批判。汤普森的批判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论战：“先是冷嘲，然后热讽，最后批得一文不值。”（Thompson 1978，

130) 他将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归类于新斯大林主义，很有见解，并且颇具影响。虽然艾略特 (Elliot 2009) 认为汤普森的批判对阿尔都塞着墨很少，而是更多地涉及到了巴里·辛德斯以及保罗·赫斯特的观点。但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对汤普森的批判做出概述。对汤普森而言，阿尔都塞和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根本无法回答关于文化（传播）的问题，因为阿尔都塞赞同结构主义应脱离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论。他写道，“阿尔都塞发现自己的学说只能极为笼统抽象地回答有关价值、文化以及政治理论方面的问题，而无法具体解决问题。”这一部分是因为它是“单一的结构主义”，脱离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方法论 (Thompson 1978, 197)。他又进一步说阿尔都塞的概念体系没有为阐释变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工具。按汤普森研究来看，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既不允许历史转型，也不允许社会转型。“结构，就像一头鲸鱼，它张开了利齿，吞下了过程。而这个过程在结构的胃里待得很不舒服。” (Thompson 1978, 283) 这就是说，虽然过程可能是在社会结构里发生，如同阿尔都塞所描述的那样，但是过程并没有改变结构，结构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然而他的结构主义并不像汤普森说的那样是一个静态的庞然大物。阿尔都塞阐释的结构主义并非处在静止的状态。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可还原性决定了二者关系不会出现汤普森所认为的静止状态。那些在阿尔都塞定义的结构中发生的过程，它们的作用被过分高估了。而通过引进“最少决定论和主导结构”等概念，他免于让结构陷入相对主义。安德森 (Anderson 1980) 表明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解读没有涉及后者提出的对“历史客体”的定义，而这个定义会揭开动态结构的面纱：“阿尔都塞确有尝试更详细地定义历史客体：所谓史实，就是会引起现存结构关系变化的事物。”汤普森忽视了他批判的定义中的关键点，也就是“改变”一词。阿尔都塞的理论架构极为强调“改变”，远不是汤普森想象中的“静止”那么简单 (Anderson

1980, 14)。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是建立在“多重决定论”、“最少决定论”以及“主导结构”这些概念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些概念为阿尔都塞的体系增添了动态改变，而这恰与汤普森的观点相左。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对阿尔都塞而言，他提到决定即某一元素施加压力于特定元素之上，从而建立限制，进而使主导结构发生作用。汤普森误读了这一点，否则会同阿尔都塞产生极大的共鸣。比如他自己曾说“我和威廉已经在定义‘决定’一词就‘设定限制’和‘施加压力’这两个层面上各执己见数年”（Thompson 1978, 351）。主导结构不会永远不变，而是跟着不同的多重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的矛盾的改变而改变（Althusser 2009）。如果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确如我们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动态主义，不同于汤普森所言的静止，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阿尔都塞的概念体系确实为人类提供了评价和分析改变的理论工具，而且还进一步让我们得以回答跟文化相关的问题。

阿尔都塞和汤普森之间的争论属于有关结构和人类能动性的激烈争论的一部分。其争论点在于，在人类行为的发展过程中，是结构处于首要地位还是能动性处于首要地位。马克思告诉我们“不是人类的社会意识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类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Simon 1994, 211）。在马克思看来，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结构决定了人类行为的社会意识。阿尔都塞将这种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即认为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质询中，个人才得以作为主体而呈现出来（Althusser 1990）。与之相反，汤普森认为，“社会结构或许会作用于人类行为，但是这种作用是极其‘微弱’的，在任何‘现在’不足以作用到‘任何活着的一代’，他们驾驭经验的方法跟预测完全不同，并且不同于任何对决定的狭隘定义。”（Thompson 1978, 363）

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争论很多，不足以在本篇论文中逐一概括。但是让我们试着想想我们针对主论点都说了些什么。不能否认网络已是西方社会的一个主要的文化改变。为了应对这种改变，人类的行为也在以同样的方式发生自我变化。个人现在已经无法脱离于网络而存在了。每天查看邮箱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社会的结构确实决定着我们的行为，这和汤普森的观点是相左的。但是在结构并非是决定人类行为的唯一因素这一点上，我是认同汤普森的。即便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论是一个动态的结构，我也并不认为这意味着结构就决定了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从很多方面来说，争论结构和能动性哪个更重要好比是争论天赋和后天培养哪个更重要。

六、互联网——一种传播和生产工具

自雷蒙德·威廉斯的论文发表以来，媒介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令人震惊。在本文的最后一节中，我想提出的是，互联网提供给我们的传播手段，如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事实上是生产工具的一种。威廉斯不一定会认同。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是劳动者进行生产时需要使用的生产工具和物质资料的统一。生产工具，也许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劳动者加工生产资料用以满足某种特定需要的事物。在经济领域，这种特定的需求即为商品，它会在市场中因为其具有的价值而被出售。然而，我们所描述的上述类型的生产方式并非只发生在经济领域。就以您正在阅读的本文的生产为例：提供给作者的有以下两样东西：（1）生产工具，在我们这个例子中，比如诸如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之类的概念工具，和我们用来写论文的电脑，以及为了明确了解每个思想家的基本观点和理论构成所需要阅读的相关书籍等等。（2）生产资料，或者说是雷蒙德·威廉斯的研究成果。作者使用这些物质的和概念的工具

来将生产资料发展成一种产品，也就是摊在你面前的这篇论文。本质上，驱动作者进行此项生产活动的，并不是雷蒙德·威廉斯所定义的对社会起主导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当然也许会有人认为作品的出版是为了巩固作者学术地位，但是这仅是对学术出版文化的一个分作用力。这种生产不仅仅限于在学术界的知识生产，以及在经济领域中进行的商品生产，还适用于互联网所提供的思想的通信工具和交流方式。例如这种类型的传播工具是如何被描述成上述所提及的生产工具的。用户可以使用电脑、手机等等可以访问互联网的各种电子设备来使用脸书（Facebook）这个互联网论坛。因此，我们可以确认两种形式的生产工具：（1）与互联网相连的电子设备，以及（2）网络本身。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确认资料被用于生产。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上述两种形式的生产工具所提供的所需资料往往会主动传递某些信息，无论是关于你的个人信息如爱好、个人喜好，还是你的姓名和邮箱地址，而这些零碎的、不成形的材料将被用于制作一个成品，即属于你的网络剖面图。我必须承认“生产”这一术语是一个泛指，但我并不赞成将脸书这样的网络论坛诋毁成为某种生产工具。

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手段、一种生产工具，如今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借鉴阿尔文·托夫勒（Toffler 1980）以及克里斯蒂安·福克斯（Fuchs 2012）的观点，我萌生了想用“产销者”（Producer）这样一个概念来进一步阐述并深化我的观点。产销者，是一个新词，顾名思义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体。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和生产工具已经见证了产销合一者的成长过程。福克斯（Fuchs 2012, 43）认为，虽然互联网用户所看到的是基于用户活动的商品市场的增长，但同时必须承认他们也是内容的供应商，“这里由用户生成内容，并且也由用户频繁地参与这种创造性活动、沟通、社区建设以及内容生产”。作为生产工具，互联网或者是

基于互联网的谷歌、脸书以及 Youtube，它们能通过原料来提取信息，将信息再次提供给用户，并且能利用该信息来创造新的产品，无论这种新的产品是一种为诱导用户投资时间和金钱的新在线游戏，还是简单的为帮助公司吸引更多用户而新增的积分制度。我们已经简单地讨论了互联网既是一种传播手段也是一种生产工具这个问题，但是作为一种生产工具的互联网真的能同时成为传播手段吗？

我们还应区分社会型生产工具和经济型生产工具。Jacob Torfing 提到：

大众媒介日益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它们组织我们的业余时间，塑造我们的社会行为，提供我们的阶层、种族、国籍、性别等身份认同赖以构建和用来区分“自我”和“他者”的物质基础。(Torfing 1999, 210)

从社会型生产工具的角度来说，对脸书这样的网站和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Eli Pariser 制定出一种算法规则：“筛选—泡沫”规则。即你所查看某一特定页面会通过对你兴趣的了解，对外界直接获取的信息进行筛选，将与你自身相左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过滤掉。我之所以会称其为社会型的生产工具，是因为这种对于你个人信息的计算衍生的产品会形成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同样，我们也可以将传播工具理解成为一种经济型的生产工具，即你的个人信息会被某些产品的广告商所利用，并反过来取悦于你。即便是简单地瞥一眼你脸书中的头版头条，该网站所提供的“你可能会感兴趣”的广告也会对你进行狂轰滥炸。福克斯 (Fuchs 2012) 以网络跟踪器 DoubleClick 广告为例进行了有关的讨论。网络跟踪器 DoubleClick 是谷歌公司在 2007 年购买的，用于搜集人们上网时留下的各种数据痕迹，并将这类数据售卖 (Fuchs 2012, 46)。购买的公司会根据这些

数据针对个人兴趣、需求的不同来投递广告邮件。

七、斯迈思：盲点、受众商品和生产工具

斯迈思（Dallas Smythe）关于广告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作用有详尽的论述分析。斯迈思认为，在大众传播领域，对于表达“大众传播系统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的无能为力暴露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欧洲和大西洋流域文化”传播的盲点。如我们上文所述，谷歌为了使广告投放能够与受众需求相一致，采用了数据挖掘的策略。在斯迈思看来，这种类型的广告是资本的经济功能的一个体现。为了回答什么形式的商品适合大规模生产的问题，广告赞助商试图直接与受众进行沟通。斯迈思认为，报纸、广播以及我们本例中提到的互联网中的广告实际上从传播产业链中买来以试图制造出生产贴合某种特定产品的受众群。传统观念认为，广告商通过从媒体购买版面空间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产品。这种“空间”即被理解成某种商品（Smythe 1977，1）。如果广告商的商品是通过媒体中的“空间”进行宣传，那么不管广告商在空间内放置什么商品，它都具有同等的价值。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某些广告中特定空间的价值（如广告牌、电视广告、电台广告、互联网广告）比商品实际占用的空间价值更高。就拿互联网来说，高流量的网站能够比低流量的网站获取更多的广告费用。这就告诫我们，购买空间只是广告商宣传商品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斯迈思认为，广告商购买的其实是可预测的特定的受众服务，这些受众会在特定的时间给予特定数量的关注度（Smythe 1977，4）。这可以在电视及互联网广告中看到。例如，当我们正在观看某一档电视节目，与这档电视节目特色相吻合的产品会迫切地想要占据其特定的广告空间（如一档卡通节目中出现的大多是关于出现过的卡通人物的玩具广

告)。在斯迈思看来，受众如今正成为大众传播产业链中的特定商品，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购买、生产、销售。

我们该如何进一步理解作为生产工具的传播手段？我已经在上一节中阐明，生产性消费在互联网中已经得到增长。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作为互联网用户使用其产品，但是我们也具有生产互联网产品的能力。简单举例，当我们参与、创建自己的脸书主页时，这就显示了我们具有生产互联网产品的能力。那为什么是这种产品？在创建你自己的脸书主页时，不管页面中有什么，你都会使用生产工具（即信息、计算机、互联网访问）生产出其他人会使用的东西。正是这样的页面为脸书创造出很多利益并帮助维系这个最大的社交网站的生存。在介绍达拉斯·斯迈思观点的同时，我们也同时引进了一个全新等级的传播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传播方式（电视、广播、互联网）是通过广告来生产受众的。之后我们也许会力图在结构层面理解作为生产工具的传播手段，而这一层面，正是斯迈思一直详细描述的有关于产销者的情境。

八、总 结

互联网挑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工业生产的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可以被用来更好地理解电视、电信和报纸的生产过程。而互联网不只是这三个过程的简单组合，还在认知、沟通、合作、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层面扩展延伸至新的方向。互联网作为一个“虚拟世界”，其参与唯物主义理论生产的能力仍需要讨论和理论化。在整个需要将马克思理论用于研究互联网的研究项目中，类似于产销者概念的引进可能只占很小的位置。与产销者这个概念类似，另一个概念“生产传播”（promunication）也值得关注。

要想发展出可以恰当解释由互联网引出的一系列问题的理论，我们需要遵循结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阐释。虽然经济问题是影响互联网发展的一个元素，因为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其作用不仅仅是生产力，更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但我认为经济因素还不足以成为决定性因素。

我讨论了从未出现过的“最终决定因素”和支配因素之间的不同。这种关系在互联网上每天、每时、每分都在发生。而鉴于威廉斯的观点，我们可以说在互联网中占有主导性地位的力量是文化。绝大多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种社会互动，无论人们是通过在线游戏、交友网站，或只是为了使用各种类型的免费软件与朋友的通信。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是影响互联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传统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互联网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在互联网发生的每一个互动，都会被不同的因素主导，不管是政治和法律因素还是经济和文化因素。但这并不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总结性论断，也不可能是。我只试图在本文中为以后的讨论——作为一种传播方式的互联网可以被视为生产工具——打下点基础。

参考文献：

Althusser, Louis. 1990.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Althusser, Louis. 2005. *For Marx*. London: Verso.

Althusser, Louis and Etienne Balibar. 2009. *Reading Capital*. London: Verso.

Anderson, Perry. 1980. *Arguments with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Aune, James A. 1994. *Rhetoric and Marxism*. San Francisco, CA: Westview Press.

Cohen, Gerald A. 2000.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ix, Hywel. 2008. *After Raymond Williams: 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 Eagleton, Terry, ed. 1994. *Raymond Williams: Crit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Polity Press.
- Eldridge, John and Lizzie Eldridge. 1994. *Raymond Williams: Making Connections*. London: Routledge.
- Elliot, Gregory. 2009. *Althusser: The Detour of Theory*. London: Haymarket Press.
- Engels, Friedrich. 1890. *Engels to J. Bloch in Königsberg*. Retrieved January 6, 2012, from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0/letters/90_09_21.htm
- Fuchs, Christian. 2012. Google Capitalism.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10(1): 42 – 48.
- Higgins, John. 1999. *Raymond Williams: Literature, Marx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Johnson, Lesley. 1979. *The Cultural Critics: From Matthew Arnold to Raymond Williams*. London: Routledge.
- Marx, Karl. 1990.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 Marx, Karl. 1992. *Capital: Vol 2*. London: Penguin.
- Marx, Karl. 1994. *Capital: Vol 1*. London: Penguin.
- Meehan, Eileen. 1993. Commodity Audience, Actual Audience: The Blindspot Debate. In *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edited by Janet Wasko, Vincent Mosco and Majunath Pendakur, 378 – 397. Norwood, NJ: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O' Connor, Alan. 1989. *Raymond Williams: Writing, Culture, Politics*. London: Blackwell.
- Pariser, Eli. 2011.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London: Penguin.
- Prendergast, Christopher, ed. 1995. *Cultural Materialism: On Raymond William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imon, Lawrence S. , ed. 1994. *Karl Marx: Selected Works*.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Smythe, Dallas W.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3): 1 - 27.

Smythe, Dallas W. 1981.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Snedeker, George. 2004. *The Politics of Critical Theory: Language, Discourse, Societ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Thompson, Edward p. 1978.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Press.

Torfing, Jacob. 1994. *New Theories of Discourse: Laclau, Mouffe and Žižek*. Oxford: Blackwell.

Williams, Raymond.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aymond. 1981.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liams, Raymond. 1993.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Hogarth Press.

Williams, Raymond. 2005. *Culture and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文森特·R. 曼泽罗尔 (Vincent R. Manzerolle)^①

阿特尔·M. 乔森 (Atle Mikkola Kjösen)^②

资本的传播： 数字媒体与加速逻辑^③

唐旻 (译)，高明 (校)

[导读] 技术革新一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铁律”之一——革新交通和通信技术，缩短流通时间，降低流通成本，提升利润。这篇《资本的传播：数字媒体与加速逻辑》正是将传播技术的发展放置在马克思关于资本再生产、资本流通和循环的角度来考察。

文章分析了几个最新技术，如近场通信技术、泛大西洋光纤电缆、盗版现象的产生和数字编码等的发展与应用，从而提出研究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些技术的发展以及这些新技术背后的寓意是什么？作者认为，从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流通角度去理解，这些技术的产生

①文森特·R. 曼泽罗尔 (Vincent R. Manzerolle)，西安大略大学，伦敦，加拿大，vmanzero@uwo.com。

②阿特尔·M. 乔森 (Atle Mikkola Kjösen)，西安大略大学，伦敦，加拿大，akkjosen@uwo.ca。

③特别感谢戴尔-威瑟福特 (Nick Dyer-Witheford)、科莫尔 (Edward Comor) 和弗罗曼 (Bernd Frohmann) 对这篇文章作出的诸多贡献。同时感谢韦罗妮卡·曼泽罗尔 (Vernoica Manzerolle) 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以及对本文编辑作出的贡献，以及麦圭根 (McGuigan) 对本文的初稿提出的各种宝贵意见。

是资本流通的要求，是由资本流通的过程和方式所决定的。从物质到资本的循环发生在特定空间和时间中。循环的速度越快，越多的剩余价值就会被创造和生效，资本一直试图消灭循环的时间和空间以期将资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耗费的时间缩减到最短，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这就解释了上述新技术的发展，这些新技术都是通过把空间时间化，把空间的距离缩减成时间的距离，继而再尽可能地减少时间的距离。

这篇文章从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出发，探寻传播技术革新的本源动力，对我们理解技术和资本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译者也需要指出本文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全文以资本（capital）作为主体，但是作者并没有进一步探究“资本是谁的资本？由谁掌控资本？”这些问题。如果仅仅关注技术发展中资本的逻辑，而忽略了推动这些技术研究和发展的作为人的主体，将会有陷入资本决定论或者技术决定论的危险。其次，基于第一个问题，本文同样忽略了推动技术的研究发展的主体。譬如，作者列举出了不少新的技术发展如近场通信、云计算、物联网等等，但作者并没有说明是谁在研发和推动这些技术，是作为公领域的研究机构或者政府，还是作为私领域的企业？政府和企业、公领域和私领域之间，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关联和博弈？更进一层，这篇文章着眼于北美西欧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忽略了技术发展在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可能有的不同逻辑，以及技术从发达国家传播到发展中国家过程中可能有的帝国主义话语和权力分配。

由此我认为，以这篇文章的理论框架为逻辑起点，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西方语境下，不同身份的个体、群体和机构（individuals, players, entities and institutions），比如企业、政府、IT研发者、消费者等，在传播技术发展中扮演怎样不同的角色？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怎样的？译者建议，未来研

究可以着重考察一些全球企业技术研发的过程和实践，以及政府关于相关技术的政策导向。第二，在微观和中观层面，考察资本加速和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影响（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比如，如何理解资本流通过程中的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和新技术所展现出的个性化（personalization）所呈现出的矛盾？又如，如果我们将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理解为这种资本加速流通的结果，它对传播结构和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第三，考察技术发展和资本流通关系在欠发达、发展中国家的逻辑和实践。呼应上述第一点建议，在明晰相应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逻辑过程时，应该着重考察国家、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成员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同时在此基础上，考量世界传播和信息体系下，新技术和资本的流向，以及技术发展和传播过程中的资本间博弈、政府间制衡。

[关键词] 《资本论（第二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数字媒体，移动支付系统，融合，加速，图表论，控制论和速度经济学。

在讨论资本流通和其加速的逻辑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数字媒体中一个正在兴起的领域。这个领域将为我们的讨论奠定更加广阔的理论基础，那就是移动付费技术。近距离无线通信（NFC）规定了一系列近距离数据传输的技术要求，类似一些借记卡和信用卡所具有的点击支付特征。由于在其芯条和软件设置里面对读写能力进行了限制，近距离无线通信能够保证个人数据的安全传输。这种技术建立在遥控标准基础上，其目的是在全球系统和设备中建立协同工作的能力。它“让无线设备在不超过4厘米的距离内以最大424kbps

的速度共享信息”。^① 根据近距离无线通信论坛（www.nfc-forum.org）上的一个游说和标准化团体：

近距离无线通信是基于感应耦合，其中松式耦合感应电路可以共享几厘米以内的电源和数据。NFC 设备与类（13.56 MHz）RFID 标签和遥控智能卡共享基本的技术，但其具有一些重要的新功能。一个具有 NFC 功能的设备可以在读/写操作、点对点模式，以及卡仿真模式中运行。一个 NFC 标签通常是一个存储数据的无源（被动）器件（比如它可以被融合在智能海报中），同时它存储的数据可以被具有 NFC 功能的设备读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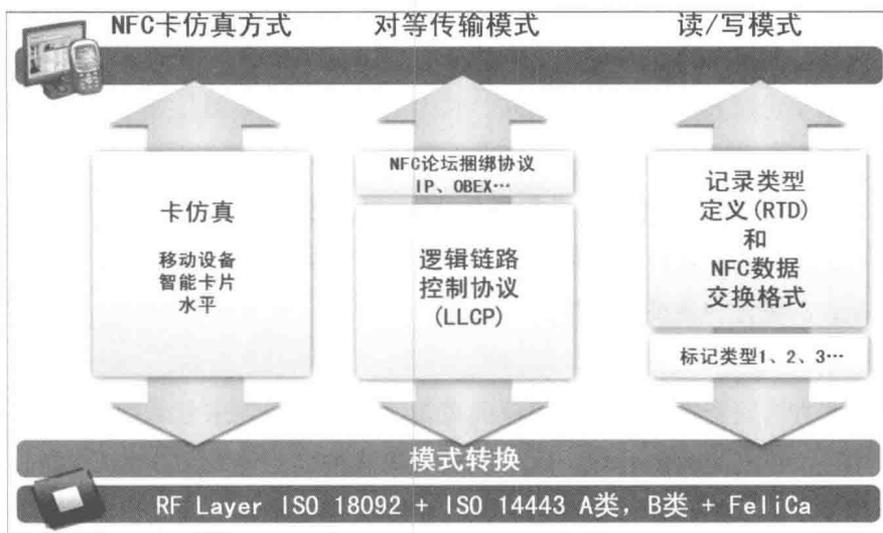


图 1 NFC 运行模式图（www.nfc-forum.org, 2012）

虽然以 NFC 为基础的技术已经有一定的使用范围，比如医疗卫

^①“用户可共享名片，进行交易，从智能海报获取信息，或者为进入控制系统提供凭证”（http://www.nfcforum.org/aboutnfc/nfc_and_contactless/）。“从结构上来说，近距离无线通信论坛的具体条例都是建立在已有的和被广为认可的标准系统上的，比如 ISO/IEC 18092，ISO/IEC 14443-2，3，4，以及 JIS X6319-4 等”（<http://www.nfc-forum.org/aboutnfc/interop/>）。

生、交通、一般信息的采集与交换等等，但是不少商家已经盯上了它所能带来的商业利益，如使用此技术制造移动支付系统，这样可以有效地消除对信用卡、借记卡及其他各种个人身份识别证件的需要。^①

现在，移动产业里有很多商家都支持使用 NFC 标准，比如软件开发商（谷歌、微软），手机设计商（三星、黑莓^②），半导体研发公司（高通、博通、恩智浦半导体），信用卡公司（Visa 和万事达卡）。例如 ISIS^③，一个已经在美国全面推出的支付网，就是建立在 NFC 标准上，它现在已经汇集了全美最主要的电信公司（Verizon 公司、AT&T、T-Mobile）和信用卡公司（Visa 卡、万事达卡、美国运通）。对于媒介研究者来说，最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技术所带来的电信

①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移动支付系统，这反映出市场上需求的多样性；比如，PayPal 公司的云基础移动支付就被看作是 NFC 的一个潜在竞争者（参见 Alistair Barr, 《Paypal 用定价和数据追逐大型零售商》，路透社，2012 年 2 月 10 日，<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2/10/paypal-kingsborough-idUSL2E8D8AE720120210>）。新兴公司 Square 也提出了同样的用插入移动设备的读卡转化器来提供移动支付服务（<https://squareup.com/>）。尽管没有做出明确承诺，但 Visa 公司已经在 Square 上投入了很多（参见 Chris Barth, 《Visa 和 Square：为什么戈里亚斯要投资大卫？》，《福布斯》，2011 年 4 月 27 日，<http://www.forbes.com/sites/chrisbarth/2011/04/27/visa-and-square-why-goliath-is-investing-in-david/>）。苹果公司也加入到移动支付的竞赛中，他们开发了移动 iTunes 应用软件，苹果手机的用户可以通过一个特殊的手机软件让实体店里的东西直接转移到他们的账户上（参见 Michael Boland, 《苹果移动支付计划受到关注》，*Huffington Post*, 2011 年 11 月 16 日，<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ichael-boland/apples-mobile-payment-plans-b-1090003.html>）。与此同时，苹果公司还在积极开发移动支付专利的投资组合产品（参见 Chantal Tode, 《苹果公司移动支付灵感受到专利奖的关注》，*Mobile Commerce Daily*, 2012 年 3 月 8 日，<http://www.mobilecommercedaily.com/2012/03/08/apple%E2%80%99s-mobilepayments-aspirations-come-into-focus-with-patent-award>）。尽管如此，NFC 的优势在于来自于移动产业很多大公司的支持。

②黑莓公司曾用名 Research in Motion。——译者注

③<http://www.paywithisis.com/>

业、金融业和基础设施^①之间的广泛融合。加拿大的罗杰斯通信公司就证明了这种兼做银行和债权人的融合的可能性。^②

NFC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在媒体和金融领域出现的新的政治经济重组，同时在更微观的层面，NFC 指引我们去关注两个当代数字媒体的最具决定性的特征：个人化和普遍连接性，无处不在的可接入性。这些特质不单纯是技术变革的自主性表达。我们认为，它们反映了一种数字媒介自身的技术——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流通领域的一些既有障碍所塑造的。事实上，我们希望把这些新现象放在马克思关于资本流通的理论中去理解，并提出新的理论分析模型以期揭示出新的张力和潜在的矛盾。

我们认为，NFC 只是资本的加速逻辑下数字媒介变化的一个小例子。而我们正是要在整体的资本循环中考察传播媒介，来理解这种资本加速的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想从资本的角度提出媒介研究的新框架。也即，我们想将资本作为传播研究的主题与目的，这一研究主题的传播能力被其自身的流通过程所构建。媒介使资本得以反复移动，因此成为资本流通关键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资本正是通过媒介来实现资本与资本之间在社会中的交流的。

本文认为流通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当代和未来媒介研究的核心问题，更具体地说，就是对于资本主义媒介的批判性分析。本文

^①最近，零售商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信用卡公司和银行的压力，要求他们升级支付终端系统以接受智能卡的使用，这会使 NFC 的兼容性更强。“商家面临升级支付终端的巨大压力。过去几个月，维萨卡、发现卡和万事达卡公司警告不能接受智能卡的商家必须自己承担诈骗可能带来的风险……惠尔丰电子公司在为智能卡升级系统的同时，还计划为智能手机钱包升级系统，以便可以使用 NFC 技术，因为这项技术被最大的两家有智能手机钱包的公司——谷歌和 ISIS——所使用。”（参见 Joshua Brustein,《许多公司在竞争手机钱包业务》，《纽约时报》，2012 年 5 月 7 日，<http://www.nytimes.com/2012/05/07/technology/many-competing-paths-on-the-road-to-a-phone-wallet.html>）。

^②“罗杰斯银行想要主营信用和移动支付业务，以此走与传统银行储蓄和借贷业务不同的道路。”参见 Peter Evans,《罗杰斯想要开始新的银行业务》，CBC 新闻，2011 年 9 月 6 日，<http://www.cbc.ca/news/business/story/2011/09/06/rogers-bank.html>。

还认为，这些问题也是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再生产相对于价值实现和减少流通时间的分析里面的核心问题。同时，这些问题还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关注的问题有一致性。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和资本流通的概念也暗含了一种传播理论的可能。因此本文的目的是梳理出构成马克思媒介传播理论的逻辑机制，这种机制突出了新媒体在减少流通时间上发挥的作用。

很少有学者从资本循环和流通的角度去研究媒体，当然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Garnham 1990；Martin 1991；Fuchs 2009）。尼古拉斯·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提出要避免用马克思理论里面纵向的基础——上层建筑的方法研究媒介，而是应该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横向的、连贯的、循环以及贯穿时间线的过程（Garnham 1990，45）。根据加汉姆所说，作为马克思价值理论里面最核心的部分，资本的流通“是任何关于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出发点”，因为它重新关注传播里面资本的物理、空间和时间的自我实现（Garnham 1990，45）。他提出从资本流通的角度对媒介现象进行全面的分析是很有好处的（Garnham 1990，45—53）。虽然加汉姆约20年前就提出了这个想法，马克思主义媒介研究还是主要以生产为中心，或是采用基础—上层建筑的分析。福克斯（Fuchs 2009）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他认为：“要系统地把媒介置于资本主义框架中研究，我们可以以马克思理论关于商品循环变型和资本的积累为起点，就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卷二里面所写的。”（Fuchs 2009，377）福克斯使用资本循环的好处是，这让他可以把资本看作是一个商品和意识形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体系。

我们认为从资本循环和流通的角度来理论化传播研究的必要性来自于一系列新出现的技术，这些新技术有时强化、有时又弱化了资本加速流通的逻辑。这里举两个较近的例子来帮助说明这种必要性。一方面，通过移动支付系统和 NFC 技术所体现出来的电信和金融的融合影射了一个关于传播媒介的更广泛的概念化，那就是流通和交换的过

程被重新商品化然后卖给消费者。移动支付系统使得营销信息的传播和商品价值的实现都变得更加有效率（通过个人化），因为这两者都被结合在一个无处不在的连接技术里。而另一方面，数字盗版的增加让我们看到了商品形式的瓦解，因为资本流通的速度已经几乎达到光速（或者一眨眼的工夫），随着更多的带宽发展和消费者对3D打印机的使用，这种速度还将继续增长达到新的水平（Kjøsen 2010）。

我们如何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去理解这些往往是矛盾的或者与自身成反效果的技术系统？为了理解这些用于加速资本流通的技术，或者说用于减少流通速度的技术，我们需要关注《资本论》第二卷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简称《大纲》）中的关键部分（Marx 1973, 401—423, 516—549, 618—690, 717—735）。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在资本循环中价值传播的加速逻辑和未来数字媒体的变化和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将不断发展演进的当代媒体置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和《大纲》中所指出的那种逻辑之中。在马克思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将焦点放在数字媒介的形式和物质特质上。为此，我们应用了传统媒介理论中的一些理论家的观点（如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弗里德里希·基特勒以及其他人的）。这样我们把资本加速循环的逻辑放在当代数字媒介的物质性中来考量，同时可以发掘出新的张力和矛盾^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特点就在于数字媒体的成熟的复杂性、繁复性和盈利能力，以及电信和媒介产业的发展融合。通过这种融合，数字形式的传播使得信息交换变得无处不在和非常及时。事实上，我们在开头介绍的 NFC 的

^①本文不考虑与流通相关的反抗和阶级斗争问题。但是，揭示资本如何缩短循环是我们研究流通重要性的最终目的。研究表明最近的物流革命削弱了劳工的力量（参见 Bonachich and Wilson 2008, 239—243）。但是，供应链的精简化和理性化给在分配领域有优势地位的工人更多的阶级权力（Silver 2003, 100—103; Bonachich and Wilson 2008, 244—249）。类似地，电信业里面，无论是加入了工会还是没加入工会的工人都不断证明资本的流通设施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场所（参见 Mosco and McKercher 2008）。

例子正是这种现象最好的写照。

数字媒体不仅带来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流通加速, 而且通过个性化服务, 还提供了资本的新动量, 在生产和交换、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寻找最短路径。因此, 除了具有加速循环的特性, 资本流通经过个性化之后变得图表化了。^① 然而, 当这种加速达到极限之后将会面临资本循环的停滞, 而它的再生产又是基于资本。我们认为,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是, 由于数字媒介带来的无处不在和即时性, 资本加速的逻辑来到了一个逻辑终点。在我们对传播媒介的分析中, 资本被假定为一个反人类的对象^②, 它处于一个不断被强化的重复过

①D. N. Rodowick 将“图表化”描述为“权利策略的制图学”, 所以图表可以帮助勾画“一幅权力策略如何通过监视、记录和表达来复制自己的历史图景, 而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看到集体生活的空间组织”(引自 Elmer 2004, 41—42)。Elmer 写道: “当代信息学里面, 图表让我们可以追踪日常经济数据, 为了控制这些经济数据, 它们的习性、惯例、节奏和流动都被数字化、编码、诊断。”(Elmer 2004, 47)

②在这里, 我们认为资本既是一个结构也是一个在自我传播(从而自我再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对象。这个修辞学策略经常被马克思使用, 在他的《资本论》中资本是一个主体、能动, 而资本家仅仅是资本自身的主体性的人格化。例如, 马克思写道, “在 G-W-G 流通中, 商品和货币这二者仅仅是价值本身的不同存在方式: 货币是它的一般存在方式, 商品是它的特殊的也可以说只是化了妆的存在方式。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 从而变成一个自动的主体。如果把增殖中的价值在其生活的循环中交替采取的各种特殊表现形式固定下来, 就得出这样的说明: 资本是货币, 资本是商品。但是实际上, 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 在这个过程中, 它不断地交替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 改变着自己的量, 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离出来, 自行增殖着。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 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 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 或者说, 它至少会生金蛋。价值时而采取时而抛弃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 同时又在这种变换中一直保存自己和扩大自己; 价值作为这一过程的扩张着的主体, 首先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形式, 把自身的同一性确定下来。”(Marx 1976, 255, 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 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一卷, 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 第 175—176 页)在后面“工作日”这一章中, 马克思又写道: “作为资本家, 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有恒产者有恒心。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 这就是增殖自身, 获取剩余价值, 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Marx 1976, 342, 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 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一卷, 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 第 260 页)

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价值被表达为自我扩张、“运动中的价值”。

一、资本的循环

加汉姆（Garnham 1990）和福克斯（Fuchs 2009）认为，媒体和传播必须被系统地置于资本循环中。基于此我们更进一步认为资本传播的是价值，资本的循环（货币—商品……生产……商品’—货币）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价值传播的方程式，因此资本的流通也就是一种传播理论了^①。

资本的流通采用了商品流通（商品—货币—商品）作为它自己进程中的一部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商品的流通比单个的资本循环要广；商品—货币—商品也可以指更广泛的一般性流通，在这个框架下各种不同的单个的资本循环进行互动。“资本流通与大的一般流通相关，前者形成自己的过程，而后者是被资本假想出来的。”（Marx 1973，619—620）流通领域指的不仅仅是市场交换。尼古拉斯·加汉姆认为，在流通领域，“我们需要关注被马克思称为地点的和时间的时刻，这既是指实际市场空间的延伸（货物的实际位移和传输），也包括在商业交易中的时间扩展（这个时间不仅指商业交易中花费的劳动时间，还包括在商品和货币互相转换过程中耗费的时间）”（Garnham 1990，46）。

^①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资本是一个循环，或者说是一个闭合的环线，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资本既是主体对象又是价值传播的目的。在《大纲》中，马克思说当商品的流通并进入资本的循环过程中，它就给了这个过程价值的内容（Marx 1973，626）。马克思写到，资本“以流通的主体而存在”并且它是价值形变的主导对象（Marx 1973，620；1976，255）。我们认为，资本是一个反人类的主体对象，它试图在循环中传播价值内容，而这只能通过迫使内容获取然后舍弃三种形式的资本来完成。其他行为体比如工人和资本家就只是这整个传播过程中的一环（传播者和接受者），或者像活劳动，他们就是数据源。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说的，因为资本使得某一数量的价值在三种互相关联的蜕变过程中经过，所以资本是一种循环。在它经过这些阶段的过程中，价值不仅保持而且还增加了自身的大小。经过每一个阶段之后，资本就完成周转并可以在下一次重复这个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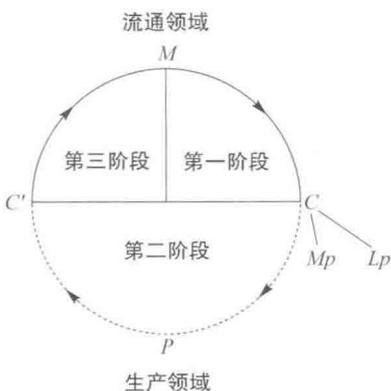


图2 资本的循环（改编自 Lebowitz 2006, 61）

图2 描述了这个循环过程中的三个阶段：生产领域（第二阶段），流通领域（第一和第三阶段）和资本的三种特别形态（货币 [M]，商品 [C] 和生产资本 [P]）。当资本满足其某一形态中的特定功能之后，它便完成了一个阶段，并呈现为下一个形态。第一阶段是通过资本家用货币作为支付或购买的方式以获取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来完成的。当这些商品成为生产资本，并被有效地使用，第二个阶段就完成了。生产阶段的结果是比其初始阶段具备更多价值量的大众化商品（C'）。商品被出售和购买之后，第三阶段就完成了，实现了生产过程中制造出的剩余价值，使得第一轮资本积累成为可能（Marx 1978, 132—133）。

这种循环就是马克思对资本的定义。各种特定形态的资本在这一通用的形式下都相互关联。因此资本的身份既存在于它的统一体中，又存在于它自身和这种统一体的不同之中。这种负面的一体性在资本的任何一个阶段或任何一种形态中都存在（Arthur 1998, 102—116）。资本存在于以下两者中：“一是在过程的一体性里面，二是在不同阶段的独特形式中。因此它既是自己，又与那个统一的自己所区分。”（Marx 1973, 622）资本在它的普遍形式到特殊形式的运动过程中统一。虽然不同的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

资本都是资本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不同的形态下它们并不一定是为了资本或作为资本存在。在资本的循环外，它们的作用只是货币、商品和劳动过程。只有在循环当中，它们才具有社会功能和资本形式（Arthur 1998，107）。这三种形式只有当它们内在相关、共同构成循环的整体性时才是资本，并具有资本流通的功能（Arthur 1998，102；Marx 1978，133）。换句话说，它们是资本的形态是因为它们都有进入、完成并通过到下一阶段的可能，也因为它们在整个循环中有自己特定的功能（Marx 1978，112）。所以当资本处在负面的一体性的时候，当且仅当它们可以舍弃目前的形态并变化成下一个形态的时候，且完成相应的功能之后，才有可能成为资本。货币资本是潜在的生产性资本，而生产性资本又使商品资本有可能变成货币资本。

马克思将资本概念化为一个循环，这和黑格尔的概念^①几乎一致。因为形式上，资本就是一个从普遍变成特殊形式的过程，资本要想成为资本必须经历每一种形式并完成每一个相关的阶段（Arthur 1998）。然而，马克思不认为资本可以自动完成循环，他也不认为这个概念具有流动性和思考的速度。马克思认为，资本不能保证任何一个个体的资本家都能够完成一次循环积累。

这三个让资本成为一体的过程都互相独立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因此，它们从一个到另一个转变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它们让资本从个体变成统一体的过程是偶然的。尽管它们内部具有共同性，它们是彼此并排存在于对方外部的，每一个预设对方的存在。而当被看作一个广泛的整体的时候，它们又必须维持这种内部的整体性，因为整个生

^①原文为“CONCEPT”，特指概念与时间的关系。——译者注

产依赖于资本，因此它必须经历和实现自我行程的每一个必要时刻，并且包含每一个决定要素，这样才能使那些时刻成为真实。(Marx 1973, 403)

换句话说，资本在形式上的流通（内部整体性）和其实际上的流通过程（外部一体）是矛盾的，在后一过程中资本承担某种物质形式以及其特定的经济形式。资本流通的第一个障碍是资金必须把自己投资在物质的东西上，而这些东西有可能是抵触资本的（Arthur 1998, 117）。这就是为什么资本有被束缚于某些间隔时间的风险，因为它从来不能保证资本会蜕变到另一种形式（Arthur 1998, 133）。因此，流通必须从其形式和实质两方面来考量。

实际的流通是指物质的实际循环，即在一个给定的速度下商品和金钱在空间和时间里进行的运动。因此实际的流通包括了运输、基础设施、交通工具、包装、仓库、银行等等。因此实际的流通本质上是一个需要特定组织或空间和时间结合的物流工作。^①此外，这个工作一直在加速资本的运动速度。这种加速通过积极地重组时间和空间，采用更新更快的媒介，如喷气运输、集装箱运输和数字化、电信等来实现。

资本加速其形变的过程有很多好处。因为在一段时间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总和与规模与资本的速度成负增长。^②资本的速度越快，剩余价值的创造和生效也就越多。当速度使流通成本降低时，剩余价值的比率和利润就会增加（Marx 1973, 518; 1978, 124, 389）。在给定的时间内，周转速度代替了资本量（Marx 1973, 518—519, 630）。相较于社会平均水平来说，这有利于个体的资本家减少他们

^①物品流通直到当今才成为资本管理者关注的核心问题（Bonachich and Wilson 2008, 3—4）。

^②原文中的 *negatively*（负增长）似乎意思反了，应该是正相关才对。——译者注

的周转时间（Harvey 1989，229）。

为了实现积累，资本必须不断地在生产和流通这两个领域中移动，尽管剩余价值是在生产领域里被生产出来的，它必须在流通领域里进行实现和积累。剩余价值在流通领域里的实现是整个资本移动中的必要条件：资本是生产和流通过程的统一（Marx 1973，405—406，535，620；1978，205）。实际上，资本要想保有资本的特性，必须始终处在运动中。当资本不再运动，而是停留在一个特定的形式和阶段上的话，它必将被否定和贬值（Marx 1973，621）。因为这种否定和贬值的存在，资本必须增加它的速度，同时减少花费在流通上的时间。然而，为了加速，资本必须开发或采用媒体，因为这样它们可以把时间和空间捆绑在一起，从而积极有效地克服资本给其本身的运作设置的障碍。

二、关于阻碍：空间和时间

在《大纲》中，马克思认为资本设置的障碍与其本身想要自由运作和无限扩张的倾向是相矛盾的。因为这种障碍延迟了资本从一种形式和阶段到另一种形式和阶段的变化，并限制了在特定时间内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数量（Marx 1973，421，538）。马克思指出生产领域的障碍是必要的劳动力，而在流通领域的障碍是需要/使用价值、等同物（货币）的可获得性、空间和流通时间（Marx 1973，404—405，542—543）。

为了“释放自己的效能”，资本不断地试图克服其障碍（Negri 1984，115）。我们假定，资本依赖于各种媒介技术来克服这些障碍。在生产领域的机械操作是为了掌控时间，即减少工人的必要劳动。媒介也有类似的操作时间的功能，但媒介操控的是流通时间，而不是劳动时间。人们在流通领域运用媒介手段以减少流通时间，这样

可以增加在一段时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量，或者减少与流通相关的时间成本（如存储）。更重要的是，媒体可以通过使资本克服在需要、资金、空间和时间等方面的障碍来减少循环时间，比如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更大、更快的交通工具可以扩展市场空间，消除空间隔阂，或者减少资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所耗费的时间成本。信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使资本克服货币的障碍。但是我们下面将要解释，信用其实也增加了资本流通的速度和动量方向。下面我们将要讨论的是移动设备，它们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让我们可以同时应对诸多障碍。

资本的循环在空间和时间中完成。随着资本不断扩张其空间以期将整个世界都变成资本市场，资本试图与时间一起“将这个空间消灭，也就是说将资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耗费的时间缩减到最短”（Marx 1973, 539）。空间被时间消灭的意思是说空间的距离被缩减成时间的距离；空间扩张折换成流通时间。因此空间被时间消灭和缩短资本流通时间变成了一回事。而流通时间也是资本的障碍之一，因为耗费在流通上的时间可以被用来稳定价值。使用价值和等价交换中的障碍也是很显著的，但是这点我们将在本文后半部分讨论。

换句话说，流通时间是从生产时间中扣除的，更具体一点说是从剩余劳动时间中扣除（Marx 1973, 538—539）。当流通时间达到其绝对值也就是为零的时候，可重复数量达到了最大。在这种情况下，流通过程将不再对生产产生影响，而总体的周转周期将和生产周期一致（Marx 1973, 544—545, 627）。“因为是资本本身规定了流通时间是生产时间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尽可能地使流通时间为零——暂停流通——则成为了资本的必然趋势。”（Marx 1973, 629）流通时间越接近于零，“资本运作能力越强，生产力和自身的稳定性也越强”（Marx 1978, 203）。正是在这种趋势下，资本主义要以越

来越快的速度寻求新的传播方法。正如我们在快速发展的电信行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所看到的，资本对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的重视正是源自这种加速的逻辑，这种逻辑和减少流通时间是一致的。

我们来看一个这种力量驱使的典型例子——近来在泛大西洋光纤电缆的投资，这项工程声称可以节省 6 毫秒的传输时间。海伯尼亚大西洋电缆公司目前正在建设 10 年以来第一个新的跨大西洋电缆。通过缩短电缆长度约 310 英里，4 对光纤光缆系统可以将伦敦和纽约之间的传输时间从现在的 65 毫秒减少至 59 毫秒。在一个高频率运转的世界里，交易时间不再是以人的体感来测量，而是以非人类的软件算法如毫秒级的单位来测量。对于人类的行动和感知来说，节省多少毫秒的时间毫无意义，但是对于依赖算法进行买卖交易的高频金融交易所来说，节省哪怕 1 毫秒就意味着年终红利里面多了 1 亿美元（Hecht 2011；Williams 2011）。然而，伦敦和纽约之间 59 毫秒的距离对于全世界的金融资本来说还是不够快。

当电磁介质以 60% 至 90% 的光速运行时，对于所谓的人类来说，我们的世界已经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了。但是对于那些以微秒计算时间的非人类物体比如媒介来说，这个地球依旧是巨大的。从新泽西到芝加哥的最快光缆大概是 16 毫秒。而正如唐纳德·麦肯齐（MacKenzie 2011）所说，在这个算法交易主宰的世界，这 16 毫秒是“很严重的延迟，这 16 毫秒的时间你有可能就能到达月球”。的确是这样的，纽约泛欧交易所的网络服务主管安德鲁·巴赫说：“光速的限制变得越来越烦人”（Hecht 2011）。最近，有些研究人员在探索通过将中微子穿射地球的方式缩短金融中心之间的时间距离。在金融交易中使用中微子的意义重大，因为“中微子以光速运行”，所以“使用这种技术的交易员在伦敦和悉尼之间进行代理业务交易只需要 44 毫秒，这比其他人平均节省了 30 毫秒”（Dorminey, 2012）。

随着资本主义媒介不断延伸它的终极目标，流通时间几乎被减少到不存在，或者至少是一个极小的对人类基本没有任何意义的数量。然而，资本的加速也是受到限制的。马克思在《大纲》里面说：

循环时间必须是从生产时间中扣除的。资本的本质前提是它在流通的不同阶段里面移动，而不是只作为一个意念在人脑里移动。它的流通是必须在时间上分离的情景中发生的，而不是像在人的思维里不需要时间而发生。它必须经历在蚕茧中的过程才能羽化成蝶。（Marx 1973，548—549）

尽管资本正在努力消除流通时间，倾向于使之归零（Marx 1973，629；1978，203），但如果真的达到了这种状态，资本会自我否定。流通时间为零的绝对速度意味着流通领域的中止。没有交换的时刻，剩余价值将无法实现，因而资本被自我否定。所以，如果流通时间被中止，那么伴随而来的是“交换、货币和劳动分工的必要性都将悬置了，而最终依赖于以上这些的资本也就不存在了”（Marx 1973，629）。

数字盗版的现象可以理解为资本达到绝对速度（Kjøsen 2010）。数字化使商品摆脱它的形式而起飞，创造出被尼克·戴尔·威瑟福特诗意戏称的“即时蝴蝶”（Dyer-Witheford 1999，202）。鉴于互联网和电脑是在电磁场基本法则下，以电子脉冲的速度进行运转，资本循环中的三个阶段在同时发生。资本要达到不同阶段和形式的变化必须有潜伏时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没有时间经历所有的变形过程。因此数字盗版应该被理解为资本打破了其自身的速度限制，从而无法正确地实现形变，导致其很重要的部分不能承担商品形式。换句话说，商品形式被电磁波的速度瓦解了，因而资本循环过程中

有价值漏了出来（Kjølseth 2010，87—102）。

三、关于通用等价品的融合：货币和数字代码

“这样的钱已经成为了一个伪事件——只有信息。”

（McLuhan and Nevitt 1972，78）

资本必须“将其自己投资于实际的东西上，一些可能会抗拒资本的东西”（Arthur 1998，117）。资本是否有能力被运输或传输取决于它自身的经济和物质形式，其中物质形式也包括数码数据和电磁波的编码。比如，商品资本的流动性取决于传播方式和商品的自然属性，如重量、大小、易碎性和易逝性。这种媒介化的资本需要特定的组织和空间时间的生产（Harvey 1989）。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依赖于媒介去绑定空间和时间，以和其加速的逻辑相匹配。而数字形式则自然地承接了这种逻辑。

在此我们将数字编码看作是资本选择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在现代社会里非常独特的形式。数字编码的形式品质和让其能够存储传输的物质基础既是“信息资本主义”的前兆又是其表现（Fuchs 2010）。为了将具体的资本主义媒介发展置于更广的媒介变化历史中来研究（这样子我们可以突出不同媒介的形式、物质和技术区别），我们转向去看传统的媒介技术理论（伊尼斯、麦克卢汉、基特勒），以观察这种逻辑如何体现于媒介的物质和技术组成之中。具体来说，我们找到了一种可以连接现象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看媒体如何对空间和时间的结构组织产生重要作用。哈罗德·伊尼斯（Innis 1964/1995）认为，媒体将空间和时间组织起来，从而再生产（或者解构）社会/权力结构。但是这种学术传统对媒体的理解很广泛，包括了机构、组织和技术（Comor 2001，276）。

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媒介强调不同的空间/时间比率，这也反映出任何一种媒体都存在偏向。与强调其在时间里的恒久性的媒介（建筑、石刻、宗教仪式和机构）相比，强调对空间掌控的媒介被认为有对空间的偏向。对于伊尼斯，空间偏向是指如价格体系和市场体系，它们使时间变成“不连续的、统一的、可衡量的板块，可用货币进行计算”（Babe 2000, 73; Innis 1995, 66—87）。例如，伊尼斯指出在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中价格体系的空间偏向促成了信用的使用、交换的兴起和为预知未来降低风险的保险业的发展（Babe 2000, 72; Innis 1964, 33—34）。进一步说，偏向这个概念也反映出媒体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框架下结合时间和空间的能力。偏向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运用来自于伊尼斯对“能力”这个概念的应用。对于伊尼斯来说，“能力是一个潜能的指数”（Comor 1994, 122—123）。因此，“能力”这个概念让伊尼斯分析日常生活中人们面对的限制和机遇，以及可能会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影响他们的因素……因此，历史涉及并包含了传播媒介。从较广的角度定义，传播媒介既是方法也是工具，通过这种方式生产过程可以实现，运用这种工具人们可以以能力运用信息（Comor 1994, 123）。

在和资本有关的讨论中，能力和潜能应该被理解为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和潜能。在生产领域，总是有未使用的能力，这也是马克思所指的相对剩余价值概念的一部分。减少流通时间或者克服其他方面障碍的媒介有效地释放了资本的生产潜能。在流通领域被解放的时间可以被转换成剩余劳动时间。

为了努力克服在流通中出现的物理的、空间的和时间上的障碍，数字编码成为现在资本着重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因为数字化就是一个加速的过程。通过数字的形式，资本的实际循环正在越来越接近资本的形式和理想化循环。事实上，数字数据是稳定价值的理想载体。一旦东西被数字化，它们就只在概念和符号意义上存在，这

使得图像和符号的意义超过了实际的物体。任何被数字化的物体都是一个数字的再现（Manovich 2001，52）。

数字编码将所有质上的差别都抽象为纯粹量上的差别。在电脑里面“一切都成为一个数字：没有图像、声音，只有数字”（Kittler 1999，1）。这非常有效地将所有使用价值转换成非人类的二进制代码价值。任何数字物品间的差别都只是定量而非定性的（Manovich 2001，27—30，174；Kittler 1999，1—2）。人类可以感受到的它们在质上的差别变得只是表面的效果或是表面上不同的形式（Kittler 1999，1；Betancourt 2006）。就像金钱一样，数字代码成为普遍的等价交换物，它将质上的差别变成量上的差别。

类似于货币，二进制码或数字数据就是能够以数量上的不同代表物品间质的不同的一般等价物。《资本论》第一卷中说，一般等价物的功能是让所有商品都和其他商品相关联，并让它们以交换价值呈现，即以数量呈现，而不涉及它们的质。货币代表商品世界，也可以被转化为任何商品。在数字形式下，价值和钱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等价于它的质量的纯数量。

数字数据的传输是多余的：其直接结果是增加信息，而不是形式上的变化。这种物质上的多余对于资本有巨大的潜在效益：数字商品只需要很小的存储空间，几乎不用保养，因为没有任何副本的存在，除非数字商品存到用户的数字设备上的时候。于是数字数据的生产就好像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几乎不需要支付任何活着或死去的劳动力。

然而，最重要的是，相比以原子方式存在的资本，以比特^①形式存在的资本对流通不那么抵触。在数字形式下，资本可以以电磁波的速度循环。也就不再需要不同物质形式间的变化了，在资本循环

^①即 bits，是计算机的最小信息量单位。——译者注

中商品的流通仅仅是不同的电压和一个数字的增殖上。地球的广袤被电磁波的速度减少到不存在了。不必遍历真正的空间，资本花费在商品运输上的时间被消灭了。与大量的物质化的商品相比，数字形式的资本几乎不耗费时间，这样商品的形式既不会被否定也不会贬值。

在马歇尔·麦克卢汉诸多的预言中，他敏锐地观察到“我们正稳步地向信息交换代替商业交换的方向发展”（McLuhan 1964, 149）。我们应该不抱任何幻想，因为这是金融交换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货币—货币’（M-M’）是典型的作为信息移动的商业交换。随着诸如 NFC 这样的技术的发展，这个过程也伴随传统的商品形变发生。

四、消费能力和资本的传播

马克思在专门讨论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的著作中蕴含了资本主义的目的论，其中，资本是传播的主体。在《资本论》里面，马克思经常把资本（或其在资产阶级中的人格化）描写成能动者、主角。我们从这种逻辑出发来理解传播和资本加速循环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资本来说，传播的范围涉及物流和文化生产（包括意识形态）。正是在传播的这种范围内，我们可以从当代数字媒体的演变中揭示资本加速的逻辑。但是正如我们早就指出的，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量的增加，个人化和可连接性提升了资本流通的动量。资本的流通覆盖到无处不在的个人化数据传播中，加速因此变得图表化。

我们认为，个人化和连接性的无处不在让我们看到它正在试图克服的两个至关重要同时互相关联的障碍——因流通需要，将空间和时间绑定时——外在于资本内部一体性的障碍。在《大纲》中，马克思清晰地阐释了资本传播图谱中的两种障碍，我们可以称之为

“传播的碎片化”（Marx 1973, 398—423）。第一个障碍是由需求、使用价值和欲望的扩张带来的文化障碍；第二个则涉及支付手段。马克思说，“第一个障碍是消费本身，也即对消费的需求；那么第二个障碍必须是和其对等的”（Marx 1973, 404—405）。这两者一起折射出特定的消费能力或者说消费幅度。第一个障碍追踪整个广告和市场营销的机制（以及它们向数字化平台的演进），而后一个障碍因为信用和信用体系的创建而被消灭（信用和信用体系的扩张直接与数字和基础设施相关，见 Manzerolle 2010）。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在数字媒体和新媒体中，消费能力的表述融合了资本传播图谱。文化和物流的障碍在不断兴起的个人化和网络化设备中找到表达和解药。同时，我们还可以对消费能力如何联结起特定的空间和时间的组织（和生产）进行评估。

有关社会中自由时间的创造的那段话先于那段有关传播的话，这一点，意义是重大的：

创造剩余劳动力和可支配时间是资本的法则……就像它也有将必要劳动减到最小的趋势一样……以及和它要让人力劳动成为（相对）多余的从而使它趋于无穷大一样。（Marx 1973, 399）

随着人们有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社会个体的生产能力也越来越高。很重要的一点是，空闲时间让社会个体和社会的文化都得到更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其实是一种文化适应的过程，由此带来更加多元的社会需求。文化变得越来越复杂，个人也是一样。

社会人的各种品质的养成，越丰富越好的物质需求的生产，这种越完整越普遍的社会产物，为了能够从很多方

面获得满足，他必须能够享受快乐，从而在文化上上升到更高一层，就像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条件。（Marx 1973, 409）

由于剩余价值依赖空闲时间的生产，以此来加大必要和剩余劳动力之间的比例，资本也会尽量创造自由时间以使得文化活动可以扩张。这样做的结果是，资本可以更自由地流通，因为剩余价值在文化产业生产的各种需求扩张中实现了。

因此，与这种需求扩张相关联的消费再生产了“作为一种特殊形式存在的消费者自己，这不仅是对他活着的直接证明，更重要的是他活在一些特定的社会关系中”（Marx 1973, 717）。社会化的个人和资本的流通被不断变化的消费关系所绑定。正是因为如此，空闲时间可以通过信息传播技术（ICTs）被用于资本的流通需求（Webster and Robins 1999; Manzerolle 2011）。消费（使用价值）的文化领域和 ICTs 的政治经济发展对社会人进行了再生产，这种社会人的能力与资本流通的需求相吻合。

发展空闲时间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它创造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新的时刻，这些时刻既归入到流通中，又是流通的一种扩展。关于这一点，斯迈思发现了生产力值得注意的形式，使受众关注一系列新的使用价值（Smythe 1981, 40; McGuigan 2012）。日常生活日趋被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设备所占领，这挖掘出了日常生活中更多可能被用于资本加速的传播工具。如莱奥波尔迪娜·伏特娜蒂所说的，无处不在的移动媒体帮助填补了每天工作的空余时间，同时将这些时间用于新的“传播用途”（Fortunati 2002, 517）。数字媒体日趋强化人类生活的技术媒介化，为剥削（非常热情的）使用者的免费劳动力提供了途径（Zwick *et al.* 2009）。

网络 2.0 时代（和它的各种衍生品）的兴起证明了资本流通中

不断增长的必要的免费劳动力的投入。无薪酬的劳动力和免费时间付出正是资本的加速逻辑在不断寻求的。资本主义要求将文化的外在性看作未来商品化的来源。马克思很含蓄地指出，资本创造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以便将这些时间用来流通（Marx 1973，401）。借用马克思描述工作流通的必要性的比喻，这种创造性和沟通性的工作就像是“点燃用来发热的材料的导体”（Marx 1978，208）。ICTs带来的空闲时间使人力资源能力（创意、认知能力、注意力和情感）就像燃料一样不断加速资本的流通（Stiegler 2010）。在这个过程中，特别重要的是大规模个人数据的制造，无论这种创造是可见的还是隐形的（Manzerolle and Smeltzer 2011）。

所以，为了克服流通中的各种障碍，资本的具体组织形式和对空间和时间管理至关重要，但指的是这种管理与不断增长的需求和相关的物品购买力一致的时候。这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和 ICTs（包括一系列无处不在的个人化的可移动媒体）的普及如此重要的地方。它们不仅是对整体的资本流通很重要，这些技术对将商品资本转化成货币也很重要。同样，个人化的数字媒体的普及性和即时性为准确协调生产和消费提供了可能性，这种精准的协调取代了以往偶然的和匿名的信息流通，通常这种流通下过于强调对空间和时间中消费者的识别和辨认。正是这个过程使资本可以提高流通的矢量，使循环图表化。

现在人们常用一眨眼的工夫来比喻全方位环绕着文化和经济信息的电子脉冲。我们认为现在正在上演的移动支付系统变革，和更广泛意义上来说的传播媒介和信用体系的融合，是这个过程的标志。消费能力不断在数字媒体中表达出来。我们可以从提高消费能力的角度来理解像 NFC 这样的移动支付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商家通过在数字领域的电信和金融的结合，将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数码设备让我们能够作为交流和表达的主体，但同时也在将我

们的行为吸收并转化为可用的数据流。最近有很多评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数据”时代，这种环境下数据生产不再是资本的阻碍（Hardy 2012；Lohr 2012）；现在是一个存储、处理和挖掘巨大的个人化的和可扩展的数据的时代。因此，就像在生产领域工业机械吸收了工人的生理和心理上的能力；在流通领域，我们所处的网络环境吸收了个人化和流通性所带来的信息流。正因为如此，这个过程被融入到智能手机的设计、技术构成和功能中。看看智能手机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中的迅速崛起便知道了（ITU 2011）。事实上，这种监控在至少三个层面展开：操作系统、电信运营商和第三方应用程序。这种监控就像建了一个种子一样，密切关注个人信息在这些无处不在的相互关联的移动设备中流入和流出。当数字网络技术在不断地媒介化我们的生活时，这种数字监控已经嵌入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关系中。像 Facebook 这样的社交网络利用使用者的社会协作来把他们纳入到网络中，使他们成为了把社会关系变成资本循环的一种工具（和无偿的文化劳动力）。

人们关注到这样一些现象：个人信息的经济效应不断提升，移动数字媒体带来了各种形式的有偿和无偿数字劳动力。在 36 氪^①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蒂姆·奥莱利（Web 2.0 的大师）和 LinkedIn 创始人雷德·霍夫曼就被问到，如何把这些现象理论化，如何从理论的角度去想象网络 3.0 时代。尽管他们都承认网络 3.0 背后可能的问题，但是他们认为数字和网络媒介所生产出的爆炸式的个人化信息将使万维网具有从未有过的能量。霍夫曼解释到网络 3.0 构成了一个“由所有这些个人数据释放出的洪流”（TechCrunch 2011）。此外，他们都注意到 Web 3.0 如何从根本上摒弃了网络最基本的特征——匿名性，因为从此以后，线上和线下的身份融合在一起了。

^①TechCrunch 中文网站名称。——译者注

这可能是这个现代数字媒介时代最重要但我们理解最少的一个变革。不像以前，个人数据被各个机构放在不同的数据库里。现在这个个人化和普遍连接的时代不仅带来了个人数据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成指数倍数的增长，还让这些数据可以被用户和位置（主要是通过流动服务）自动索引。

这将带我们走向何方？数字媒体帮助我们社会人转变成在循环的过程中和矢量化中的无数节点。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存在的整体效果就是把个人转换成独立的交换中心，而这个过程让人们越来越受制于不断强化的加速循环过程的节奏。

消费在交换的每一个环节都被操纵……对每一个资本家来说，除去他自己的工人，所有其他工人的总量并不是工人而是消费者，是交换价值（工资）和货币的持有者，因为他们用钱来换取商品。他们就像是很多个流通中心，通过与他们的交流交换行为得以发生，同时资本的交换价值得以保持。（Marx 1978，419）

事实上，随着无孔不入的媒介的兴起，媒介介质本身和稳定的数据信息流变得不可分割。数据的个人化和无处不在共同促使日益扩大的信息循环成为资本矢量扩张和强化的来源。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描述的，数字媒体的前提是将所有信息都以电子脉冲的形式被同质化为数字编码。这对所有信息都是一样的，不管内容如何，在形式上它们都一样。随着金融资本主义或者说经济金融化的发展，尤其是 ICTs 网络的全球化应用，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是用传播手段来缩短金融流通中商品—商品'的转变。当资本不需要经过物质形式的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转换时，周转周期就变短了。但是正如我们在新的跨大西洋电缆系统中看到的，缩短循环

时间的压力一直都存在。

然而，即使在数字化和极端的金融化时代之前，马克思就已经暗示了这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如何在越来越复杂的抽象化中表现自己。“通过簿记以及确定和推算商品价格（价格计算），资本的流动被注册和控制。生产和稳定物价表明了商品仅是一个价值的载体，因为物品的理想价值是以货币的形式确定的，所以它们的名称其实是在人们想象世界中的象征性体现。”（Marx 1978，211）^①事实上，这种流通的扩张和加速要求资本创造不同形式的抽象化概念以帮助绑定空间和时间，通常以此来代替资本为了加速的需要在流通时必经的形变。价格体系，各种形式的商业信息，股票市场，和日趋变异的金融工具、衍生产品和债权品都是循环抽象物，它们被斯迈思称作“受众商品”。

事实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不仅是货币体系作为交换媒介和存储价值，而且还是一个抽象品变成真实存在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流通速度不断加快是因为资本必须将抽象品兑换成真实存在来完成产品变革。循环为了反映出信息流而不断加速，这些抽象概念越来越被认为是凭他们本身的实力存在（而不是物流效果）的真实的商品（并且看上去似乎保有真实的剩余价值）。在这些抽象概念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信用，这个概念本身不仅创造新的流通产品，还努力减少流通时间，努力“赋予流通以时间价值，这是一种生产时间价值，它存在于在各个生产过程中协调的环节；同时不断把这些时间定义为钱，或者更广泛地说是资本”（Marx 1973，659—660）。

马克思经常提出信用的问题，但常常因这个问题推迟他的分析（Marx 1973，519，535，542，549；1978，192，330，420—421，

^①尽管“想象中的符号性反思”是自主的、规范的甚至是机械生活的常态。

433)。这个问题反映了数字数据遇到的类似问题——它名义上的存在可以与其他所有类型的信息互换。通过抽象的过程，数字代码创造出丰富的信息。信贷和信用机制增殖以确保资本流通的加速。

信贷克服了在资本扩张剩余价值生产的时候，用来购买等价物的经常性匮乏，所以它使得抽象概念在流通中的运用成倍增加。“用来实现额外的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的额外的钱从哪里来呢？”（Marx 1978，419）“存储钱是一方面，但是有时根本不需要存储钱，因为直接通过堆积信贷票据就可以了。”（Marx 1978，422）纵观马克思关于流通流域的论述，尤其是在《大纲》中的论述，马克思不断地指向整个系统，即信贷。在不同的地方，他提出了信贷的凶兆，指出它如何克服障碍，或人为地绕过流通，在制造虚拟货币资本时给循环带来危机。“整个信用体系，和与之相关联的过度交易、过度投机等等，倚仗于跨越流通障碍和扩大交换领域的必要性上。”（Marx 1978，416）所有信息都变得同质化并且可以互换。对于资本主义的积累法则来说，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的逻辑建立在转变价值和一步一步被合理化的形变过程中。数字化之后，只有机器能够识别金融交易和文本信息之间的差异。这让价值、资本和数字代码可以通过机械和计算的形式被虚拟地成倍增加，而完全不管实际人类生活和自然世界中的物质限制。

马克思并没有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展开论述，他认为信贷经济只是货币经济的延伸，只是这两者分别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证明其与自然经济的不同……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的区分中，比较明显的特征并不是经济合理性，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与这两种经济模式性对应的生产者之间的商业模式”（Marx 1978，195—196）。正是在信用经济中媒介的个人化从质上改变了生产者之间的商业模式。通过数字数据、代码带来的个人化，信贷机制与媒介相互交织融合。

信用不仅是一种加快资本循环和周转时间的介质（Marx 1981, 567），同时也是一个个性化的抽象系统，它可以前瞻性地商品化上述各个抽象生产时刻的交换。通过以债权人身份和性格作为制约未来支付的杠杆（例如，信用报告和评级机构，Manzerolle and Smeltzer 2011），信用克服了时空的界限。信用卡不仅在借钱的过程中节约时间，还通过技术机制来授予信贷，从而减少流通时间。数字化使信贷机制扩张，有时甚至是有害的或掠夺性的目的（Manzerolle 2010）。因此，数字媒体系统制造出越来越多的金融概念，即金融化——而这些通过对材料和劳动力的消费成为真正的抽象品。

这种通过抽象化和信用机制的加速不能独自发生，而是需要基础设施来实际传输速度，扩大金融和个人数据的范围，从而促进更加复杂的抽象概念的产生。虽然创造和提供信用是很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提供可以借贷个人化数据的信用机制，以加快交易（无论是信贷或实际货币）。NFC 技术只是各种信贷机制中的一个小例子。我们的数字媒体作为促进信贷或使信贷更有效的手段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信用等级、信用卡、虚拟物品、手机支付）。这些数据流被越来越多地看作是一种仿真货币，或者至少因为它们的市场重要性给予它们一些面值。生产抽象概念的功能是价值的中介让循环时间趋近于零，例如那些新兴的信用体系。在这方面，有其他类似的想法，比如，认为个人数据本身可以转化为货币（Brustein 2012a; Zax 2011）。

五、结语：资本主义的控制论想象

个人化和普遍性的结合使日益扩大的信息流通成为资本流通中加速、扩张和加强的资源。信用和信用体系的生长以及越来越快的光纤电缆都是媒介，它们在减少资本流通时间中起作用。正如马克

思在《大纲》里面关注到的，资本流通的大趋势之一是把个人、工人变成独立的交换中心，使其更受控于不断加强的流通节奏（Marx 1973, 419）。这个过程在数字的、个人化的交互媒体的信息流中越来越多地发生，但是为了克服其自身的障碍也要同时强调消费能力。在和这些信息流的互动中，我们在现象层面感受到日常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这就是汤姆林森（Tomlinson 2007）所说的“瞬时性的到来”——文化生产和资本循环动力融合的结果。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移动支付系统和光纤电缆最近的发展证明了资本的加速逻辑。这些媒介反映出在资本主义下数字媒体的演变，这种演变是资本为了克服使用价值、等价品、空间和时间的障碍所进行的探索。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将资本看作是传播的主体。马克思关于流通的描述将资本传播勾画为一个为了克服不同障碍的场域。一方面，我们发现了资本的物流流通（商品、劳动力和货币）；而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被文化习俗和机制所塑造的需要、欲求和使用价值的问题。

媒介的个人化有点类似自由市场的理想模型，即找到消费者和商品的完全匹配。已集成了 NFC 功能的移动设备的发展将会把这些设备变成提供或自动产生一系列个人化服务的设备。这种演进对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后工业化经济具有深远影响。这种个性化服务会导致很多服务行业的工作过时，因为这些工作要么变成自动化的，要么被不需要酬劳的网络使用者所替代。这个过程将与流通相关的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同时电信运营商和其他第三方（例如，移动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可以扩大数据的范围用于商业。

我们可以把在这个普遍连接的时代的个人化发展看作是在我们个人媒介里面流动的一种反馈机制。同时，这种机制又是更广泛的不断加速和计算扩张的数字洪流（不论是金融的、物流的、个人的，或者是所有这些的总和）的一部分。

马克思将资本看作一种循环，这一概念中所具有的算法特质既不让人惊讶，也绝非偶然。马克思使用循环回路的概念来构建他的资本运动模式是他有意而为之的，可能是为了隐射他想要批评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显见的偏见。奥托·迈尔（Mayr 1971a）写过自由市场理论的起源和反馈技术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部关于控制论的先锋历史。这种算法特质的根源既存在于知识机器（apparatus）中，也存在于算法特质的历史发生之中。也许早期的关于全球贸易的模式以回路图反映出来只是个巧合（Mayr 1971a, 4）；亚当·斯密也碰巧和詹姆斯·瓦特是朋友并可能有着相同的社会控制论的想象力；又可能查尔斯·巴贝奇只是碰巧既策划设计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机器，又写下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章程；又或者，第一个电磁频谱理论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参见 Mayr 1971b）也只是碰巧为工业资本设计了第一批的商业自我规范管理调节器，然后正好被控制论的祖师爷诺伯特·维纳引用了（Wiener 1948）。

据迈尔（Mayr 1971a）所说，自我更正/自我规范系统的概念是对自由市场的重要比喻之一。在这里，货物、货币和价值的流动会创造出一个自我更正的系统以便最大限度地为最多数人扩大社会福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个人化正是符合典型的自由市场理论的理念和价值的，个人化和普遍连接性被用来有效即时地将客户需要的服务和产品匹配起来。我们的媒介系统在“资本主义的控制论想象”中大大地发展（Webster and Robins 1999, 111）。虽然我们被淹没在人际交往中的定量增加，在管理资本传播和其加速逻辑上，还有一个具备广阔的无线扩张可能的。其早期形式展示了香农关于传播的数学理论，而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反馈系统（Shannon and Weaver 1949）。这两个理论都认为，对完美信息的追求和对噪音的消除构成了数学意义上完美的传播系统。从这点来看，我们的通信手段和交

换方式（包括网络中的货币和信息）的融合就不足为奇了。在技术媒介化的社会网络中，个人化带来了近乎完美的关于用户和他们的位置的信息；然而同时，噪音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不符合我们所形成的算法的声音、意见和信息，这些噪音在我们所中意的架构以外。在资本主义的控制论想象中，数字媒体为资本提供了加速逻辑的动量，通过这种动量，加速的逻辑以图表化的方式得以表达。的确，我们的媒体在经历着转型，但是在什么样的结构偏向和政治经济命令下转型呢？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通过市场力量实现的云计算、物联网，以及3D打印机的发展呢？我们已经做出了论述，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媒介中心的角度来考量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的分析。

参考文献：

Arthur, Christopher. J. 1998. The Fluidity of Capital and the Logic of the Concept. In *The Circulation of Capital: Essays on Volume Two of Marx's Capital*, edited by Christopher J. Arthur and Geert Reuten, 95 – 128. London: MacMillan.

Babe, Robert E. 2000. *Canadian Communication Thought: Ten Foundational Writer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Barr, Alistair. 2012. Paypal execs woos big retailers with pricing, data, Reuters, February 10. Accessed February 27, 201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2/10/paypal-kingsborough-idUSL2E8D8AE720120210>

Barth, Chris. 2011. Visa and Square: Why Goliath is investing in David, Forbes, April 27. Accessed May 3, 2012. <http://www.forbes.com/sites/chrisbarth/2011/04/27/visa-and-square-why-goliath-is-investing-in-david/>

Betancourt, Michele. 2006. The Aura of the Digital. CTHEORY. Accessed February 10, 2012. <http://www.ctheory.net/articles.aspx?id=519>

Betancourt, Michele. 2010. Immaterial Value and Scarcity in Digital Capitalism. CTHEORY. Accessed February 10, 2012. <http://www.ctheory.net/articles.aspx?id=652>

Boland, Michael. 2011. Apple's Mobile Payment Plans Come into Focus, Huffington Post, November 16. Accessed May 3, 2012.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ichael-boland/apples-mobile-payment-plans_b_1090003.html

Bonachich, Edna, and Jake B. Wilson. 2008. *Getting the Goods: Ports, Labor and the Logistics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rustein, Joshua. 2012a. Start-ups Seek to Help Users Put a Price on Their Personal Data,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2/13/technology/start-ups-aim-to-help-users-put-a-price-on-their-personal-data.html>

Brustein, Joshua. 2012b. Many Competing Paths on the Road to the Phone Wallet, The New York Times, May 6. <http://www.nytimes.com/2012/05/07/technology/many-competing-paths-on-the-road-to-a-phone-wallet.html>

Comor, Edward. 1994. Harold Innis's Dialectical Triad.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 29(2): 111 – 127.

Comor, Edward. 2001. Harold Innis and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2): 274 – 294.

Dorminey, Bruce. 2012. Neutrinos to Give High-frequency Traders the Millisecond Edge, Forbes, April 30. Accessed May 3, 2012. <http://www.forbes.com/sites/bruce-dorminey/2012/04/30/neutrinos-to-give-high-frequency-traders-the-millisecond-edge/>

Dyer-Witheford, Nick. 1999.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Elmer, Greg. 2004. *Profiling Machines: Mapping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Econom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Evans, Peter. 2011. Rogers Wants to Start Bank, CBC News, September 6. Accessed February 8, 2012. <http://www.cbc.ca/news/business/story/2011/09/06/rogers-bank.html>

Fortunati, Leopoldina. 2002. The Mobile Phone: Towards New Categorie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5(4): 513 – 528.

Fuchs, Christian. 2009. Som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Studies: Reflections on Karl Marx and the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 369

-402.

Fuchs, Christian. 2010.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6: 179 – 196.

Garnham, Nicholas. 1990.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Sage.

Hardy, Quentin. 2012. I. B. M. : Big Data, Bigger Pattern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5. Accessed February 11, 2012.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2/02/15/i-b-m-big-data-bigger-patterns/>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New York: Blackwell.

Hecht, Jeff. 2011. Light is Not Fast Enough For High-speed Trading. *New Scientist*, October 1. Accessed March 10. <http://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1128324.700-light-is-not-fast-enough-for-highspeed-stock-trading.html>

Innis, Harold Adams, and Daniel Drache. 1995. *Staples, Markets, and Cultural Change: Selected essays [of] Harold A. Innis*.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Innis, Harold Adams. 1964.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TU. 2011. *The World in 2011: ICT Facts and Figures*.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Kittler, Friedrich A. 1999.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jøsen, Atle. 2010. *An Accident of Value: A Marxist-Virilian Analysis of Digital Piracy*.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London, Canada. Available from http://uwo.academia.edu/kjosen/Papers/387636/An_Accident_of_Value_A_Marxist-Virilian_Analysis_of_Digital_Piracy.

Lebowitz, Michael. 2006. *Beyond Capital: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king Class*. New York, NY: St. Martins.

Lohr, Steve. 2012. The Age of Big Dat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Accessed February 13,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2/12/sunday-review/big-datas->

impact-in-the-world.html?_r=1&pagewanted=1&ref=technology

MacKenzie, Donald. 2011. How to Make Money in Microsecond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3(10): 16 – 18.

Manovich, Lev. 2001.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Manzerolle, Vincent. 2010. The Virtual Debt Factory: Towards an Analysis of Debt and Abstraction in the American Credit Crisis.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8(2): 221 – 236.

Manzerolle, Vincent. 2011. Mobilizing the Audience Commodity: Digital Labour in a Wireless World. *Ephemera* 10(3/4): 455 – 469.

Manzerolle, Vincent, and Sandra Smeltzer. 2011. Consumer Databases and the Commercial Mediation of Identity: A Medium Theory Analysis. *Surveillance and Society* 8(3).

Martin, Michele. 1991.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Form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lephone, 1876 – 1920. *Antipode* 23(3): 307 – 333.

Marx, Karl. 1973.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Martin Nicolaus, Trans.).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976.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Ben Fowkes, Trans.).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978.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2*(David Fernbach, Trans.).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981.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3*(David Fernbach, Trans.). London: Penguin.

Mayr, Otto. 1971a. Adam Smith and The Concept of the Feedback System: Economic thought and technology in 18th-century Britai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12(1): 1 – 22.

Mayr, Otto. 1971b. Maxwell and the Origins of Cybernetics. *Isis* 62: 425 – 444.

McGuigan, Lee. 2012. Consumers: The Commodity Product of Interactive Commercial Media, Or, Is Dallas Smythe's Thesis More Salient Than Eve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cLuhan, Marshall.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Graw-Hill.

McLuhan, Marshall & Nevitt, Barrington. 1972. *Take Today: The Executive As Dropout*. Don Mills, Ont. : Longman Canada.

Mosco, Vincent, and Katherine McKercher. 2008. *The Labou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Negri, Antonio. 1984. *Marx Beyond Marx*. South Hadley, MA: Bergin & Garvey Publishers Inc.

Silver, Beverly. 2003.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annon, Claude Elwood, and Warren Weaver. 1949.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mythe, Dallas Walker. 1981. *Dependency Road :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 Pub.

Stiegler, Bernard. 2010. *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UK : Malden, MA: Polity.

TechCrunch(Producer) . 2011. So is Web 3. 0 already here?(tctv) . [Video] Accessed March 1, 2012. <http://techcrunch.com/2011/04/18/so-is-web-3-0-already-here-tctv/>

Tode, Chantal. 2012. Apple's Mobile Payments Aspirations Come into Focus with Patent Award, *Mobile Commerce Daily*, March 8. Accessed May 3, 2012. <http://www.mobilecommercedaily.com/2012/03/08/apple%E2%80%99s-mobile-payments-aspirations-come-into-focus-with-patent-award>

Tomlinson, John. 2007. *The Culture of Speed : The Coming of Immediacy*. Los Angeles: SAGE.

Webster, Frank, and Kevin Robins. 1999. *Times of the Techno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Wiener, Norbert. 1948.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New York Paris: John Wiley & sons.

Williams, Christopher. 2011. The 300m Cable That Will Save Traders Milliseconds, *Telegraph*, September 11. Accessed March 2, 2012. <http://www.telegraph.co.uk/technology/news/8753784/The-300m-cable-that-will-save-traders-milliseconds.html>

Zax, David. 2011. Is Personal Data the New Currency. *Technology Review*, November 30. Accessed March 1, 2012. <http://www.technologyreview.com/blog/helloworld/27377/>

Zwick, Detlev, Samuel Bonsu, and Aaron Darmodt. 2009. Putting Consumers to Work.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8(2): 163 – 196.

乔治·佩雷斯 (George Pleios)^①

传播与符号资本主义： 信息社会下的马克思传播理论再思考

张时健 (译)，张时健、吴畅畅 (校)

[导读] 佩雷斯以“传播形式”(forms of communication)作关键词，追索它在马克思理论百年流变中如何翻转定位。长期以来，传播或符号文化是僵硬的物质构造基础的映射物，作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辩证发展主旋律形之于外的表征，又或是巩固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手段，在意识形态上用功。但后期对这个阶级关系优先的“物质决定论”的反省，蔚为风潮，主要认为除却经济基础的文化活动，有其不必依附物质的独立性(或作：自主性)；文化推进社会变迁的影响力不下于经济的作用。两种争议的焦点，在于谁能更好地解释社会变迁过程。

这个回顾是佩雷斯能够提出理论洞见的前提，他隐然反对这个把文化与经济对立起来的认识框架。特别是近代消费社会文化的兴起，好比符号横流的现象，在鲍德里亚那里造成了真实意义(meaning of truth)的混淆，但在佩雷斯的计划中，是晚期资本主义为了突破生产力障碍而动用的道具。但这里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指认普罗

^①希腊雅典大学副教授，gplios@media.uoa.gr，<https://sites.google.com/site/georgepleioswebsite/>

阶级目眩于文化工业产品而白痴化的驯化观，而是说通过操弄符号包装商品，鼓动全部人类那不可抑遏消费欲，有助于解决资本主义的扩张难题。

就在这里，佩雷斯接上法国调节学派的积累体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说，试图解开沉溺于文化/经济优先性的纠结。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mode of production）在20世纪初期由外扩式向紧迫式转型，目的在超克以暴力手段压榨劳动剩余的极限，使无产者能志愿投入生产活动，关键的转机在于扩大消费。消费与更多的消费，不但使无产者的阶级自觉混乱（政治问题），也使无产者主动提高生产效率，即生产力（经济问题）。这个提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者听来可能有些刺耳，却是佩雷斯创见的支点：“是扩大的消费推进了生产力，‘而非相反’。”（Pleios 2011, 239）这正是：

消费规模的扩大，不只有助于商品消费，也重新构造了劳动力，使其能更多产，也就提高生产力。换句话说，减少了劳动力自身再生产所需的工作时间，从而增加对剩余价值的贡献（Pleios 1993, 56—58；转引自 Pleios 2012, 234）。

消费社会兴起这个转机，因为大众传媒的相助而深化了，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大众传媒不只是让无产者的脑袋变得单纯，更重要的是把消费主义变成普遍意识而促成扩大的消费（从而促成生产力进一步的发达）；而商品必须与符号结合或得到符号的代表（好比：广告）才能广泛流通。所以“大众文化与商业化的传播，不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成为‘基础的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它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基础’”。资本主义按此便定性为：“符号资本主义。”（Pleios 2012, 240）

所以说符号资本主义的特性是大量消费，其积累模式到了60年代出现了障碍，必须转型。佩雷斯认为那是生产力的增长减速，而

扩大消费的成本持续上升（应为工资上升之意）造成的利润挤压。为了克服资本积累障碍、刺激生产力增长恢复，传播模式再次扮演关键角色：深化劳工的志愿性投入，不只是为了工作，更是为了“自我实现”。信息社会里的新信息技术允许工作者以更个人化的方式劳动，淡化了论资排辈的工作伦理，同时使工作与娱乐的界限消弭，职业的定义变得更流动且多样。这就是当今后现代特色的“深度符号资本主义”。

如果传播方式与实践具有转动社会发展的关键性位置，那么推动社会转型也就不必然要以阶级对垒之姿夺取治经济权力中心，异议分子通过在新兴社群媒体上的串联，发挥聚沙成塔的新力量也能扳动铁板一般的独裁势力。佩雷斯以 21 世纪以降东欧、北非等国家的人民运动为例，为本篇论文做总结。

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来解释历史变迁以及为社会阶段定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说到底剩余价值的创造与分配问题，因此文化因素难免居于次位作补充性质。佩雷斯重振传播决定性作用的办法仍未跳脱这个框架，只是用绕弯的方式将传播与生产力发展挂钩：生产力若由传播因素所影响，则历史变迁便可由传播因素来解释。在这篇论文中，传播借由鼓动大量消费、促成工人的志愿性投入，从而使生产力增长了。这确实是有意义的启发，让我们重新思考构筑物质基底的文化动因。如马克思所言，即使是价值，也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

进一步而言，佩雷斯的做法可以说是提取近代信息社会理论的精髓，即认为新的通讯传播科技根本地改变了现代人的时间感与空间感，从而重构人类社会的组织模式与制度设计。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说法是：“信息化经济独特的地方，是由于它转变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技术范型，使成熟工业经济所潜藏的生产力得以彻底发挥。”（夏铸九等译，1998，97）

然而这样的论说可能造成两个值得再思考的部分：首先是技术的非中立性。按佩雷斯引用的网络社会论说，无产者因为流动的技术、变形虫组织、弹性的生产关系（劳雇关系、劳劳关系）等取得自由的形象，或可作阶层（strata）解体的征象，但如赖特（Erik Olin Wright）所言，这并不足以否定阶级（class）关系的存续，以及更为根本的剩余争夺的问题。佩雷斯既然主张新传媒技术促成生产力跃升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那么没有进一步阶级立场的分析架构就有些可惜。席勒（Schiller 1999, 2007）的近作为我们整理了新技术为大型企业所用，以及政策与之共谋的过程，我们得以窥知这个社会重构的目的可能是反民主的，即使它造成了非意图的民主结果。又或较保守地说，民主行动作为一种可买卖的商品而得到发展，但其发展的极限可能无法（长期）超过商品与市场的范畴。

放弃阶级的分析视野，即牵涉到第二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或许动摇佩雷斯的论说合法性：以生产力增长迟滞来断定资本主义的障碍与发展，是合适或充分的吗？在佩雷斯文中以利润挤压（profit-squeezing）论解释 70 年代初的总体经济危机。暂不论利润挤压本身的争议，如前面摘要所提，这牵涉到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增长不足，二是工资增长过速。佩雷斯侧重前者，主张新传媒科技促成的深度符号消费社会，再次刺激生产力增长解决积累障碍，这不能说有误，特别在强调第三部门（服务与信息部门）兴起的转型论中见得；然而针对后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常在当代政治经济研究中看到，即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在本文中是缺位的。新自由主义落实在里根与撒切尔政权的种种私有化、市场化，以及反工会的政治手段中，有效打击无产者团结争议的能力，压抑工资以及劳动条件，为弹性生产关系背书，以及襄助私营企业扩权。并且作为后见之明，80 年代后期的经验数据显示，先进国的生产力增长其实有限，新自由主义时期整体成长的动力可能来自金融自由化，而当时的自由化

政策为今日深重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

这个意思是，资本主义的危机生成、超克与长期发展之复杂，难以单用生产力增长迟滞来解释，那么我们思及佩雷斯的解释进路之有效，就得稍作保留。再说生产力增长，在劳动过程的研究领域讲究的是组织的经营管理手段如何尽可能地榨取劳动力，鼓动无产者的志愿性投入是一端，但非全部。对使用相近管理手段的个别资本而言，面对相同质素的劳动供给，竞争胜出的关键是技术更新，也就是资本技术构成（technical composition of capital）的问题，在熊彼得而言是创新如何可能。说到底，劳动者的志愿性投入有其生理极限，在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样的生产力提升幅度很快会被资本开发殆尽，要说能长期支撑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太稳当。

以上列举佩雷斯在解释工具上的选择，可能映照了他采取的研究方法。其论述基盘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生产力、消费量、就业、工资、成长、积累迟滞等文中铺排的关键概念，还缺乏经验材料支持。他的核心命题如大众传播的兴起与促成消费社会的发达，而后消费社会促成工人的志愿性投入，工人的志愿性投入促成生产力增长，都可按经验材料检证，检证而否证的历程会促使研究者反省想当然的原始主张，提出更谨慎的结论。这令人想到佩雷斯动用的理论框架：调节学派，在另一篇回顾性批评中亦指出同样毛病，即概念推论与经验材料不见得相符（Brenner and Glick 1991）。

然而在这个推论与经验的落差之处，或许藏有开启新观点的契机。在此试举一例：调节学派在理解福特主义生产体制上，因为有将大量生产与消费同一的倾向，因此暗藏消费不足论对70年代总体经济危机作解释：碎裂化的消费习惯，使得福特主义下量产的商品难以消化，整个量产制也就无以为继而崩溃。继之的新阶段以后福特主义名之，标志是可弹性调变的生产体制。然而所谓“碎裂的消费”的由来，耐人寻味。调节学派开山祖阿格列塔（Michael Aglietta

1998) 在一篇文章中, 提到了个体主义 (individualism) 是内生于人类社会的, 然而这不同于理性选择论的“理性人”假说, 而是说天生是彼此不同的、独特的人的行动、意识与价值, 必然镶嵌于社会制度 (regulation) 中运转, 而在崇尚规格化量产、爱论资排辈的巨型科层组织等社会制度下, 人的个体差异被抹灭不彰, 其中蕴含的巨大能量直到后福特主义时代才得释放。

这样把个体主义自然化的办法, 局限了理论解释的效力。我们或可借由佩雷斯的论说进一步发展。按佩雷斯的说法, 60年代后个体主义的兴起是传播模式 (继续) 作用的结果, 那么传播模式如何配合体制转型需要策动集体主义的崩溃, 就是有趣的论题。或许个体主义只是媒体打造的符号表象 (其实不然)? 或许个体主义是媒体宣传的理想生活形式 (其实不然)? 这都可以在佩雷斯的社会转型框架中再细究。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 符号资本主义, 沟通理论, 大众文化, 大量生产, 弹性专殊化, 后福特主义, 扩大的消费, 文化工业, 消费资本主义, 信息社会, 劳工组织, 新科技, 后现代, 社会变革。

一、方法论论题

本文的主要目的不在将马克思派的传播理论当成特定领域加以检视, 而是将传播置于马克思总体的社会理论中, 使之作为一个变量加以理解。换句话说, 本文企图将传播的结构角色, 置于基础—上层建筑的社会构造框架中理解, 同时考虑传播在马克思社会理论中定位的历史转型, 以及采取不同的理解路径。因此, 本文将详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取径以及之后各路学派的想法, 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受马克思影响的思想家; 并且尝试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视

为传播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结果，也对这个过程进行评估工作。

我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传播之间的关系，前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传播与生产关系是同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arx and Engels 1978a, 67）的主要论点就是把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按“交往形式”（forms of communication）定性。^① 马克思与恩格斯使用这个词汇，意在解释意识形态（按他们的理解这等同于唯心主义）与生产方式以及阶级关系之间的关系。分工的程度或形式的不同，导致劳动者产品分配的质与量也随之不同。换句话说，分配的结构与生产过程中的分工有关。一定的生产与分配的社会关系，皆源自于分工（Marx and Engels 1978a, 78）。马克思与恩格斯明白，生产关系一方面是阶级/所有权关系，另一方面就是交往形式。

如同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指出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到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Marx and Engels 1978a, 67—68）。^②

^①原作 forms of communication，在此按《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里的译法，译为“交往形式”。但在非马恩原典处，forms of communication 则取常用汉译译法，作“沟通形式”。两者实为同一。——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页。——译者注

所以马恩把生产关系置于更大脉络下的社会关系中理解。在其中, 社会互动即符号使用, 自其中长成的或用于指涉互动的种种观念, 被以整体视之。按此说, “交往形式” 就成为建立、维持与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的手段, 反之亦然, 并且要与分工联系理解。从这个观点出发, 沟通与符号结构就不是被动的手段, 而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成分, 特别对前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是如此。好比马克思指摩西偏好的善行、公正与美德的法规所以取得成就, 都是建立在让尽可能多的公民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 (Marx 1983, 100)。^① 换句话说, 交往形式对于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为何, 得视分工与总体生产方式而定。

第二步 (第二阶段), 马克思认为传播, 特别是它的观念内容, 相对与生产关系分立且应置于上层建筑中理解, 而生产关系即阶级与所有权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Marx and Engels 2001, 39)^②

在此处, 传播受制于且反映了经济基础, 也就是阶级与所有权关系。根据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说法: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 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 因此, 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 一般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Marx and En-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第477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第8页。——译者注

gels 1978a, 94)^① 这个观点可以按两种方法解释：

(1) 较为机械的说法，会认为传播工具从属于生产资料所有者，他们会“刻意”操作传播手段为己喉舌，目的是为他们的事业赚取利润，或者/以及是要使社会的不平等看似正当且运转不息。传播的产物（或者是符号学所谓的文本）作为可买卖的东西，比如商品生产的产物，是为卖（交换货币）而买，以满足别种需要。马克思这么说：“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Marx and Engels 2001, 39—42；Marx 1979, 45）^② 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断言谁拥有生产资料，谁就拥有传播工具，可用于维系他们对社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控制，保卫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和阶级关系。“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Marx and Engels 1978a, 94）^③

(2) 以上的主张也可以用更具结构观的方式理解。言必称拥有并控制生产资料的人，通常也认为他们的观点会反映在传播产品上。这个理解进路主要着重于传播内容的意识形态面向。“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页。
——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译者注

③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页。
——译者注

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 and 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Marx and Engels 1978a, 94）^①。按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说法，正好是实证主义者会认为（观念的）传播反映了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寓居于基础的社会结构里（Williams 2001, 153）。传播产品要按其内容的整个观念来探讨。在这个脉络下，传播以及传播产品/商品便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传播的定位在马克思主义里发展到第二阶段，多少成为具有自主性的社会领域。马克思自己不只把上层建筑与基础分开理解，也把艺术与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独立处理（Marx and Engels 1975）。这样的观点长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主导地位。

第三阶段，对于上述的传播—生产关系的框架，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出不同的、更讲究系统性的理解方式，并与之泾渭分明。同时，他们的贡献促成了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按本文的分析，不可忘记这些说法先后的顺序关系，以及它们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特定历史与时空背景。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将传播视为是文化领域，是更大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反映，表现为观念与论述的种种形式。因此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页。
——译者注

马克思主义首先注意传播内容与实务上的意识形态面向（主要考虑内容的虚构成分）。马克思主义结构论者正是这个路数（Althusser 1990, 69—95）；同样的还有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但方法上稍有不同。马克思主义结构论者并不在乎文化产品服务的生产过程，对生产过程与传播内容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少有着墨；结构论者关心的是传播内容展现了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视之为统治阶级对现实的看法（view of reality）。文化生产的两个面向（经济与传播的）被当成在结构上是平行的，基本上是欠缺互动的。文化生产的意识形态功能（即使它的商品性质被提及）保有自主性，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文化规则与所属的特定文化领域。或者说，文化产品的商品功能被意识形态所吞没。不论是哪一种状况，传播的意识形态功能都和它的经济角色没有构造上的联系，就只是完全的符号性过程。这一种马克思主义方法，和本文视传播为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而发展的分析无关。

除了以上所提（主要是文化进路），还有另一种（新）马克思主义方法。它的分析采用不同的进路与层次，把符号以及非符号产品的商品生产过程，与传播以及传播内容结合理解。批判理论，特别是阿多诺（Theodor Adorno），便采用更具结构观的社会哲学进路，探讨传播作为一个领域如何渗透到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结构）里，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标志（Horkheimer and Adorno 1986；Adorno and Horkheimer 1987, 219—243）。工业生产与商品化过程携手进入传播领域，但问题并不在技术本身，因为技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化结果（materilization）。这一方面导致了传播产品的极端商品化，使其广告宣传的性质淡化；另一方面却又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置入于内容之中。传播产品因为量产，留给另类观念的余地也就有限。阿多诺与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强调：“电影与收音机再不必使自己表现为艺术的样子。真相是，它们不过

是一门生意，作为意识形态使他们刻意生产出来的垃圾合法化。他们以工业为名自诩，而电影导演公开他们吓人的收入叫所有批评者闭嘴，再不能质疑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有无社会必要性。”（Adorno and Horkheimer 2001, 72）

此外，传播的商品化（比如广告）有助于现代工业的非文化商品流通，是很有力的工具，主宰了现代人的每日生活。传播产品与其他非文化产品一样，它的消费可满足劳动力例常再生产之所需。“晚期资本主义下，娱乐就是工作的延伸。工人想要自机械化的劳动过程中挣脱，所以寻求娱乐放松，才有力气再上工。然而，在他们享受娱乐的同时，机械化的过程仍然有力地作用在休闲与愉悦上，彻底地主导了娱乐商品的构造，让工人下班后也只能经历上班时劳动过程的残像。”（Adorno and Horkheimer 2001, 72）因为工人的消费被置入了观念、被商品化，劳动阶级也就整合进整个体系里。

因此，传播是为了维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服务。按此说，批判理论不只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用在自主的上层建筑的效果，如同其他马克思主义结构论。而且，它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传播的渗透，及其带来的意识形态与结构后果，最终使上层建筑的自主性崩毁，所以说经济基础就此征服了上层并使之同化。按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对这个推论的定性，这是文化与传播研究的“经济决定论”（Garnham 1979），这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结构论的唯心主义而主张的。但是批判理论并没有探讨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中，传播自身的生产扮演了何种角色（比如在劳动现场被消费的符号财物的角色）。它仅检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如何通过传播再生产，以此为争议拍板定案。

另外，宣传模式以更工具性的观点采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更准确地说，这个说法认为资本家在文化生产上的代理人会置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到内容中（主要是事实性的内容），以促成他们经济

或政治目的实现。所以宣传模式更注意传播商品的生产过程及其意识形态内容、政治效果，以及如何维系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关系，这些都与掌握了文化生产工具的阶级的活动与目的紧密配合（Herman and Chomsky 2001）。按此说，为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播的运作不是直接作用的，而是通过在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制造共识。

而“编码/译码”模式则把传播的文化以及经济分析，与传播过程中的生产以及消费（阅读）面向作有机结合（Hall 1980）。从这里开始，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结合批判/理论分析以及实证/经验分析，研究经济、文化与政治变因如何决定了传播产品，以及传播领域如何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成分（Schiller 1973；Mosco, 2009；Curran 1979；Golding and Murdock 2001）。工业—资本主义制造出来的传播产品并非位居核心，而是更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利益结构的一部分（Golding and Murdock 2001，26—28）。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以更复杂且讲究历史的方法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传播的作用。如同加汉姆所指出的：“……上层建筑/文化是从属性的、第二性的没错，但一方面其间的物质性剩余的抽取与分配方式为何（比如阶级关系），以及另一方面物质性剩余在上层建筑里的配置为何（比如公共支出分配比例的问题），两者间的关系至为重要。”（Garnham 1979）然而，尽管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对于晚期资本主义中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机制所扮演的复杂角色为我们提供重要且有益视野，但是传播对（非传播）商品生产过程以及“分工”的作用为何，还有待厘清。

一般而言，在这个理论的第三阶段，传播被视为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也是被不断延展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所渗透的领域。概括地说，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传播领域以及传播方式起的作用，长久以来一直是探索的焦点，但是

传播（方式）之重要，如何在商品生产上（而非在流通上、政治上）起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分析。

正是后者，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在第四阶段要发展的重点，而这里不可与前述第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二分理解，也就是要把传播与生产过程联系起来。按我看，批判理论采取的是新马克思主义取径，把视野放得更远，看到传播在维护与再生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作用。但是，如同我已经指出了的，这是把研究视野简单局限在劳动力再生产，甚至在进入田野观察工作现场前，就作此主张。威廉斯有意把“经济基础”当作是上层建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劳动力的层次（Williams 2001, 154—155）。威廉斯认为：“如果我们用更宽泛的方式审视生产力的概念，我们看待经济基础问题的方式会完全不同，如此才不会轻看上层建筑；如此一来上层建筑虽为次要，但仍是必需的生产性社会力（productive social forces），这就是用更宽泛的概念、从经济基础出发的取径。”（Williams 2001, 155）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zensberger）探讨生产领域中传播扮演的有机角色，主张传播方式即生产方式（means of communication are means of production）（Ezensberger 1981）。最终若要回到历史脉络中来谈，我们无可避免地会以马克思的术语重新梳理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思想，即生产方式是传播方式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相反（Baudrillard 1990, 112；Pleios 1993, 50—64）。按此说，我们必须重拾德波（Guy Debord）的理论，也就是主张景观是商品生产、交换与消费的高阶形式（Debord 1986）。

传播与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的联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可用两种方式来理解。首先，传播被视为一个过程，主要作用于商品流通领域，也就是促进产品的销售（比如用于广告、或促成生活的消费化）（Marx and Horkeimer 2001；Fuchs 2010a）。

其次，有人主张，传播所扮演的经济角色不只局限在交易与消

费的领域。在我看来，传播可作为从核心地带（即“分工”）促进、强化或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过程，其作用远不止于文化工业与文化消费的领域。我们或许可以用此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何以调变，以及传播与文化工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扮演的深层角色为何。

我的分析法正是定锚于这个理论的第四阶段，我并不把传播视为反映或再生产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或是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透了的场域，又或是促成财货流通的手段来加以检视。我探讨的是传播作为社会性的组织，包括文化工业在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核心中扮演什么角色。这里所谓的生产方式，也就是指（非文化工业的）商品生产过程，以及生产关系构造。换句话说，我把传播视为能从工作现场的社会性生产关系下手，即从其核心地带维护或改变生产方式的一种力量，而就此检视。与其说这用来给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形式定性，不如说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结果。因此，我承认传播不只有助于实现生产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也有助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我分析的起点是，通过消费，某种质素（价值观或是规范）在工人之中形成，提升他们的生产力；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工作组织安排下，生产过程可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第二个说法在消费者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可以成立。

消费规模的扩大，不只有助于商品消费，也重新构造了劳动力，使其能更多产，也就提高了生产力。换句话说，减少了劳动力自身再生产所需的工作时间，从而增加对剩余价值的贡献（Pleios 1993, 56—58）。这个取径并不稀奇，但一直以来是用别的概念术语被提出的。好比人力资本理论作为功能论的一支便采取类似的取径（Schultz 1961）。在本文，采取前述分析光谱的第二部分去关注社会—符号的建构，而不是劳动力在生物—身体方面如何通过消费与传播进行制造与再生产。

二、马克思主义取径及其争议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框架，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出的公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展开被认为是构造整个社会系统〔或按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社会—经济构造（social-economic formation）〕的根本力量（Marx 1978，115）。为理解与评估这个辩证过程以进一步作经济分析，特别是按马克思主义，往往分为两个进路，其一主张生产力（生产资料、生产对象、劳动力）优先，其二主张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阶级关系，等等）优先甚或是政治与意识形态冲突优先（Plamenatz 1963，282—283；Blackledge and Hunt 1995，160）。这个分裂长久以来存在于马克思主义阵营里，不只是理论上，在政治、文化与其他层面上皆然。

就这点上，我们必须强调两个重点。首先，如同前面提过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方面将生产关系定义为“交往形式”（forms of communication）（Marx and Engels 1978a，67）。另一方面（Marx 1978），生产关系被视为经济基础，其上竖立着的一切事物，也可以用别的术语称为“沟通形式”（forms of communication）（法律、政策、艺术，等等）以及其他社会制度。很明显的，往后生产关系主要指的是经济—社会范畴即阶级关系（或财产关系），而“沟通形式”则不再属于经济基础。

为理解这个冲突，我们必须问：阶级/财产关系能否与沟通形式分而治之？而阶级关系又是在何处决定且形塑了沟通形式。（1）生产关系如何可以不靠沟通形式而存在？（2）如果我们把沟通自“沟通形式”中拿掉，剩下的会是什么？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明白的：在一个没有意义沟通交换的世界，你无法想象或理解阶级关系或任何社会关系。按格伯纳（George Gerbner）的说法，沟通是“通过讯

息发生的社会互动”或符号建构物（Gerbner 1970，72）。因此各种阶级关系（包括其政治形式）只有通过沟通以及各种沟通形式才有存在可能。事实上，阶级关系需要借由沟通形式才能得到牢固的基础，也才得以转型（在各个社会里取得其特殊的历史形式）。

根据前述的分析，第二个问题（即若我们抽掉了一切沟通可能性，则“沟通形式”还剩下什么？）的答案是：思想。就结果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或时期，“上层建筑”被当成是思想的总和，如果按马克思自己的文字所述（Marx and Engels 1975，68），思想是由社会的物质基础所构造，其中包括了生产思想的制度性机制。

这个路径一直以来主要以两种方式理解。首先，马克思主义的路径，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被认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或至少是以偏概全。在实证主义、功能论与韦伯派（Weberian）社会学里这样的看法很普遍（Alexander 1987）。而马克思强调生产方式之重要，却被认为是以偏概全之最。他们主张：要对社会作进一步的认真分析，经济因素显然不够充分。当然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曾指出就社会组成（societal organization）的分析要尽其功，还必须结合传播/文化面向，按恩格斯的说法就是结合“内容”的“形式”，但这也要和经济过程依次互相作用。按恩格斯的设想，这要靠下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Marx and Engels 1978b，469）^①。

第二，传统马克思主义取径（主要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特色，在于以历史事实刻画理论（a theoretical imprinting of a historical reality）。马克思详实地描写了19世纪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如何运作（Russel 2006，26—29），并非以资本主义一般或笼统的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6页。原文为“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能够对周围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译者注

阶级社会作泛泛之论。这个假设在我看，正好切中威廉斯指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是布尔乔亚公式的核心要义（Williams 1978, 75—82）。也就是说，对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分析，必须把传播/文化扮演的角色纳入考虑。

所以，不论你如何从早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内部或外部去检视生产关系或阶级关系在社会组成中的角色，你都可以观察到趋同的结果。也就是要如何从上层建筑的活动，重构“经济基础”或更大的生产方式所扮演的完整角色。这结论如同社会理论的发展进程，需要投入大量的理论活动。然而单靠理论是推导不出结果的，我们必须同时运用本体论知识（Horkheimer 1976, 213）。除了极端的唯我论（solipsism），理论都是社会建构物，而社会建构物必然不能是任意武断的（Demertzis 2002, 144—175）。社会建构物是把独立于人的主观意志之外的诸事件构成论述，再将论述组织而成。换言之，社会建构物包括的诸事件是客观的，如同自然事件经济事件一样（Demertzis 2002, 149—152）。

晚年马克思所描绘的特定社会经济构造，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中认识到的。它之所以看起来合理可信，有两个理由。其一，这个特定时期的特定论述与马克思著作中的一般路线相合（corresponds to the more general course），也就是从抽象与一般下降到具体与特殊，或者说把哲学与一般社会学分析结合经济与政治事件。第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资本、工作、商品的描述，是对资本主义的“概念典型”进行分析。但是这确实可以在历史上被观察到，即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在英国。

当我们尝试运用这个分析技巧研究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一种资本主义形式，都必须对理论架构做或大或小的调整，如同恩格斯在写给恩

斯特 (Paul Ernst) 的信中强调的 (Engels 1978a, 426—428)。^① 这些“调整”可以视为要配合不同历史情境以及/或是不同历史阶段，有如配合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新阶段的“概念典型”。

三、符号资本主义的诞生

当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定性与转型的本体论基础确实有所不足，我们就应该开始注意是什么事实造成了这个限制。根据波兰尼 (Karl Polanyi) 提出的知识论 (Polanyi 2001)，巨变即资本主义本质的变迁发生在 19 世纪末叶。这个变迁的结果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 (或有人称为组织资本主义) (Lash and Urry 1987; Sennet 2008, 27)，以及竞争减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主义国家衰微。但从另一观点来看，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方面与生产过程的剧烈变动有关，特别是工作的社会组成形式 (Burawoy 1979)；另一方面则是大规模公共部门的兴起 (Hobsbawm 1978)。

这个重要的变动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传播研究影响甚剧。好比鲍德里亚就以这个变动为本，颇能说服人地把媒体发展与传播方式的统治地位解释成凌驾在生产方式之上 (Baudrillard 1990, 112)。尽管鲍德里亚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型，但我想他对这个变动的理解有误。鲍德里亚指认这个变动发生在商品的市场流通范畴里，特别发生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之间，以及商品与消费的关系中。确实，商品流通与金融资本对生产过程的影响至巨，这是恩格斯在写给康·施米特 (Conrad Schmidt) 的信中也承认的。但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3—99页。——译者注

“决定性时刻”仍是生产无误 (Engels 1978b, 436)^①。

资本主义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商品的流通或生产 (这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前就存在了), 而是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随之更进一步的商品生产一般化。“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 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Marx 1979, 520)^② 流通是剩余价值实现的时间点, 而不是剩余价值创造的时间点。生产剩余价值最重要的条件是劳资关系, 也就是劳动力自身成为商品之所在 (Jessop 2002, 12—13)。剩余价值的生产, 特别是指剩余价值率 (s/v), 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形式与本质。也就是说, 垄断现象作为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及其变迁, 都无法用生产组成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作解释, 或至少说无法放入生产组成的框架里被理解。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任何资本主义演进过程中发生的变迁, 最重要的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或方法出现了差异, 而不是剩余价值实现 (商品流通) 的方法有所不同。价值实现方法对商品生产的重要性如何是无关紧要的。

根据调节学派的说法 (Aglieta 1979; Lipietz 1990), 我们可以说 1870 年代的危机乃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中剩余价值生产系统的危机, 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特点为剩余价值的外扩式 (extensive model) 生产及经济发展 (不论是个别公司或全国总体经济皆然)。为了解决危机难题, 体系必须扭转成密集式 (intensive model) 的组织资本主

^①原文为: “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 单独的劳动过程就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 产品贸易一旦离开生产本身而独立起来, 它就会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 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 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 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 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 并且也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起作用。”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第 485 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第 556 页。——译者注

义，表现为垄断结构。这个过程包含了不同的剩余价值生产系统，从而生成了不同的价值实现方法。

在外扩模式里（作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标志），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增量（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的增量来实现的。首先，这借由压低工人工资直到逼近生存底线，并配合延长工作时间等等的方式来达成。这个阶段的劳动力内容主要是无技术性且非自愿的纯体力劳动。工人能够有效地参与生产过程，是因为被经济暴力所迫（生活资料被剥夺）。资本主义企业的职能如此，使得政治或道德关怀很难介入劳资关系，特别是工人被夺取了一切经济手段。19世纪末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出现了这样的劳资关系，还有与之相应的资本内部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与不同企业间的关系。其次，作为这个发展阶段的结果，外扩模式（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绝对剩余价值的增量，以及经济的发展成长，主要借由个别企业家不断地借营利再投资（按清教徒的新教精神）繁殖原本的事业体，不断生成新的生产单位。

从这个时候开始，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乃可视为工业资本主义如脱缰野马般不断扩张的时期，不只重塑经济结构，也根本地改变社会关系以及人口的分配与组成，此即托夫勒（Alvin Toffler）所描述第二波社会的样子（Toffler 1982）。最后，在前述诸面向打造的外扩模式里，按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的说法，是劳动的技术组成推进了剩余价值增长（Rueschemeyer 1986），换句话说即借由机械的部署以尽其功。技术持续变革的结果是缩减了必要劳动时间，延长了剩余劳动时间。简言之，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在总体层次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在我看来，在这个资本主义经济形式里，社会传播与工作分离的程度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反之亦然，尽管那仍从属于相同的劳动规定。劳动过程与社会组成的传播（socially organized communica-

tion) 无涉，它以自身为目的，为劳动主体的需要与期望服务。此外，社会组成的传播主要仍从属于普遍交换的必要条件，方式有二：一方面，传播的社会生产与消费尽皆商业化，其特性与一般物质商品生产的做法、生产者间的关系以及行规，都无二致。

论及与雇主的关系，符号商品的生产者和工厂工人是很像的 (Pleios 1993, 49—50; Mosco 2009, 133)。马克思的商品概念为前述这个模式提供了理论说法，他认为商品 [的需要] “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并无紧要” (Marx 1979, 45)^①，正因为两者的生产方式与条件相同，并且生产都是为了消费者的需要而非生产者自己。另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交换关系能得到适当的表现，是拜占主导地位的自然语言所赐（特别是社会传播中的书写文字与印刷术）。

作为符号系统的自然语言变成了符号世界的等价物 (symbolic equivalent of value)。它变成了符号的“货币”，能够“公开的” (on the show) 兑换任何其他的意义表述。这就是为什么平面媒体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媒体，而在信息—文学交错的轴心上，内容的诸类目则在平面媒体里外占有主导地位 (Pleios 1993, 51)。换句话说，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里，社会传播在相对意义上与劳动分离，但两者皆一方面从属于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定，另一方面从属于商品生产的规定。这绝不是说所有文化生产与传播都已商业化。只就社会组成（比如：商品化的）的文化生产而论，这个说法才为真。

然而，外扩模式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延续有其瓶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垄断资本主义（组织资本主义）兴起的解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页。原文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译者注

释，主要认为是资本内部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结果，而劳资关系则视为稳定不变。这意思是，垄断结构可以简单理解为个别小企业为了追求大型企业的垄断利润而进行整并的结果。然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操作劳动的技术组成所促成，这是马克思考察长期状况加以主张的（Marx 1979，627—644）。它同时也是劳动强度提高的过程，可能伴随着利润率下降趋势。换句话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同时也是“活劳动与物质化劳动^①生产的总量”（Richta 1976，47）生产力的提高。也就是说，垄断资本主义（组织资本主义）的兴起，必须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量以及生产力提升的现象合并解释，或理解为是向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即紧迫性的发展模式。

这个结果并非由技术变革所致，而是生产过程中劳动社会组成（特别是科层制）的转型造成的（Rueschmeyer 1986；Sennett 2008，28；Braverman 1974）。“企业组织方式的变革在这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Sennett 2008，28）因此，所谓的泰勒化生产、福特主义、“人际关系理论”、甘特系统（Gantt system）、Halsey、Rowan等等该时期劳动组成形式（在个体层次）的理论标志，与经济上的垄断组织同时发生绝非巧合（Parker 2000；Pleios 1993，54）。事实上，密集模式把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组成面向提高到一个相当重要的程度。相反地，在外扩模式里，劳动的社会组成并不作为一个需要在乎的问题。外扩模式里劳动的社会组成仅仅是技术延伸的作用，即通过机械将工作组织起来，相反则不然。

垄断资本主义里的劳动者，最终仍按纪律被组织起来，一般称此为“军队化”。“被市场搞砸了的利润要靠科层组织来拯救”（Sennett 2008，28）。这对泰勒化与福特主义而言正是如此。森尼特

^①即前述的死劳动。——译者注

(Richard Sennett) 指出把军队的组织纪律应用到产业上并推而广之到社会其他领域的过程，正是在韦伯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命题，即劳动组成的形式。森尼特就说：“我们能分析军队化社会……都要谢谢马克斯·韦伯。”(Sennett 2008, 28) 因为这是韦伯在自己的国家观察到的现象，并对之分析。德国被认为是这类资本主义的工业或社会组成的诞生地，或按拉希与厄里 (Lash and Urry) 的说法，是其“理念型” (Lash & Urry 1987, 17—28)。然而，一方面 (军队式) 组织资本与社会的标志是垂直式与科层制的组织，讲究严明的纪律；但另一方面它能有效运转靠的是个人的志愿性投入。

该模式的基础是安排某些工作给主动参与者执行 (Sennett 2008, 30—39)，也就是需要工人的同意以及自愿与组织整合。在这样的劳动组织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依据的经济暴力已不足以让工人有足够的动机发挥工作效率。相反地，生产过程要有效能，就必以共识为基础打造劳资关系 (Burawoy 1979, xii)。为了在新环境中展现工作效率，工人面临生产流程设定的目标，需要自我调适并转化使之成为自己的目标，试图应用之、实现之。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马克思关心的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但相对于韦伯对组织资本主义的念兹在兹而言，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但他们两个都把各自所关注的资本主义形式概推而一般化了。

因此，如果要达成可控的控制水平并鼓动工人的志愿性投入，使之成为密集模式的核心内容，通过绝对剩余价值抽取遂行的经济暴力 (饥饿) 以及劳动剥削虽然曾经举足轻重，但就此而言已不足够。所以把非经济要素 (比如政治与文化) 等等与经济文化以及生产过程整合就有必要。这样的目的可能在一开始就作为政治愿景被编排好了 (比如：民主、国家，或未来的社会主义，等等) (Pleios 1996)。

事实上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早期 (也是财产权以集合形式遮饰其

私有性质之时），密集模式的发展主要是令资本与商业活动的不同形式再组织化。或更准确地说，重整国家与垄断资本之间的关系。到了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这个态势就非常明白了。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就此提出了正确的看法（Burawoy 1979, xi），但是他只看到了组织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特别是那些本来就缺少自由主义传统，而有相对丰富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国家。这些国家把劳工与整个社会当成军队整编，可能为的是各样的理由，也相对容易达成，好比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俄罗斯、希腊等等。然而，深受自由主义传统影响的国家，会把增进与维护人民的个人所得当成是国家存有的目的（Hobsbawm 2008, 51—52），又或有的国家已经出现了密集式生产方式，则前述的发展长期来看就未必成立或可行。

为了确保工人对军队化劳动组织的志愿性参与以及纪律，使有助相对剩余价值的产出（Jessop 2002, 56, 58），就必须把超经济的机制整合入生产过程，而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扩大消费来解决。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便注意到：“很明显地，文化工业体系是在自由放任的工业国里降生的；而媒体作为其标志，好比电影、广播电台、爵士乐、杂志等等，在那儿繁衍茁壮。”（Adorno & Horkheimer 2001, 79）。

密集生产所动员的更多生产力，当然可通过扩大消费消耗掉。但有些学者认为扩大（大量）消费主要用来促使生产力提升，而不是相反（Jessop 2002, 7; Matsuyama 2002）。如果工人消费量提高的同时不能增加他们的生产力，则资本家就没有理由因为他们的高生产力而提高工资。生产力并非只能是“经济规模”的结果（Jessop 2002, 56）。生产力提升是扩大消费的必要条件，但只有在扩大消费是生产力提升的必要条件成立的前提下才会成立。但按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只有利润才是最终目的，工人用什么方式过活是无关紧要的。所以从资本家的角度思考，扩大消费只有在作为生产力要素之一时，才有存在的必要。

然而，扩大消费到某种程度时，便可作为密集模式的前提：（1）不必为了防止新进竞争者的吞并而把多余的（维持公司运作所需下限之外的）钱储存起来，钱被用来消费花掉了；（2）钱被用在商品购买上，而且可以用来鼓动工人的自愿性参与与纪律心。这不仅可行，而且确实发展到新的高度，按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说法，是使工人不再是无名的、被剥夺基本权利的劳苦大众，反而地位上升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分子，甚至是得享过去只有精英阶级独享的权利（Arendt 1991）。

换句话说，问题被商品消费解决了。也就是，商品取得了超越使用价值（用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的符号价值（symbolic value）（Baudrillard 1990；Arendt 1959，72—83，108—110），这和符号商品（比如传播产品）是一样的。这里所说的消费是个人的消费。

扩大的商品消费（符号与符号商品）让工人得以成为主体。罗莎琳德·威廉斯（Rosalind Williams）在她的作品中已经指出了大众消费与上层阶级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Williams 1991，13）。因此这类商品的消费便用于阐明精英与普罗劳动者的共同目标、共同意义。又或者，如马格林与巴度里（Marglin & Bhaduri）以总体经济学语言所表示的：“如果需求够多，产能利用率便能高到足以同时满足工人与资本家的需求。”（Marglin & Bhaduri 1990，153）按此要领，工人便与精英阶层有志一同了。也就是说，扩大消费的主要目的（不必然是明显可辨的）是让劳动者接受并支持历史所安排的新分工模式，而不是鲍德里亚以为的，扩大消费是超经济力量造成的历史断裂（Baudrillard 2003）。

事实上，扩大消费的作用并非如人力资本论（Schultz 1961）或其他研究（Lash and Urry 1987，67—8）所假设的，把劳动力打造为用之不竭的自然力量使可用于生产。与其这么说，不如说它是在劳动者的意向与意识上做功而使劳动力可用，在符号上它表现成激励、

动机、目标等等名目。要保证这样的操作有效，必须在消费主义已成普遍意识形态的脉络下落实消费活动（Bocock 1997）。按此观点，消费主义就不只是个人追求商品使用价值的活动，而是要追求商品的符号价值，以彰显为社会普遍认可的美德与生活方式（Pleios 2001, Ch. 3）。就此来说，符号价值因为它在生产上担负的关键功能与作用，是不同于商品拜物教的。

在政治上，推动凯恩斯政策有助解决前述难题。换句话说，是借由保证大量消费的制度安排，支撑了大量生产体制的运转不辍（Aglieta 1987；Lipietz 1990）。凯恩斯主义不只是使商品—符号生产爆量的元凶，也是大众文化的符号商品生产爆量的推手。然而，这不是剩余价值生产、外扩发展模式以及渐向密集生产方式转型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广泛消费的经济成本看起来好像是用掉了，其实不然；这是投资（“表现为”劳动力价格），而欠缺这种投资则密集式生产与更高的营业利润都无以为继。

所以说，密集式生产的结果与前提，就是商品—符号（以及符号商品）的消费，反之亦然。是扩大（大量）消费推进了生产力，而松山公纪（Kiminori Matsuyama）主张生产力提升才使消费扩张（Matsuyama 2002）是正好颠倒的看法。大量消费的目的在打造劳动力的某些“质素”，从而是打造量产制不可少的某些要素。按此说，扩大消费摇身一变作为生产力。它的角色再不只局限于符号商品（直接地）或者/以及商品—符号（间接地）的流通领域。除此之外，在许多国家扩大消费的物品（objects）是以天然的、非商品的形式供应，好比电视、教育或其他媒体与文化产品（Allen 1992；Mosco 2009, 134）。

这个变迁不只是一般意义下的大众传播得以发展的基石，视觉传播同样受惠。这些视觉媒体以具象的方式供输商品的符号价值，以及环绕其上的生活方式。它们提供商品的影像，以之作为商品流

通的基本前提，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也不例外。换句话说，商品影像的流通对商品自身的流通而言变得非常重要（Adorno and Horkheimer 2001；Pleios 1993，Ch. 2；2001：Ch. 3），反则不然（Debord 1986）。所以文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扮演的角色才得突显，而反之亦然。但是更丰富多样的而耗费更多的流通（与消费）要能实现，除非它能促成更高的生产力使能摊平流通（以及消费）的成本，进一步提升剩余价值以及经济成长。也就是说，消费与流通扩大的实际范畴与结果，是使剩余价值在量上的增长（Pleios 2001，Ch. 3；1996），但不是在比例上增长。

然而，按此说，大众传播动态地卷入其中，作为一种机制鼓动大众文化消费的实现，以促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及密集式生产方式的条件。因而，大众文化与商业化的传播，不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成为“基础的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它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基础”。或换句话说，“物变成了媒体，而媒体成为物”（Lash and Lury 2007，4）。

按此观点，资本主义发生重大改变，成为“符号资本主义”。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并消费商品—符号（实存的劳动力再不只是商品，而是成为更大的符号—文化认同）。因此，在符号资本主义里，符号—信息过程是有机地体现在商品的生产（以及剩余价值生产）与消费之中，即作为经济过程整体不可或缺的要害（Webster 1995；Castells 1996，Ch. 4；Fuchs 2010b）。按此说，传播再次整合进劳动过程，但这次是按更工具性的逻辑整合；而劳动过程亦以有机的方式与传播结合，深入到文化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即文化工业）。但是整合能竟其功，必须让这些过程互相联系，使其有助整个体系的运作。在总体层次，“经济与超经济的制度与实作”的整合，即作为符号资本主义结构的关键特点（Jessop and Sum 2006，1）。

按此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演进的历史产物就更是文化政治经济

学 (Jessop 1990) 所关注的对象。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符号资本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因为传播与文化不只是附属现象或单纯的上层建筑。正好相反, 它们成为整个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结构要素之一。然而, 与符号资本主义“理念型”对照, 这些符号资本主义所展现的不同形式并不构成各国或各文化的例外状况, 而是符号资本主义一般现象的具体形式。符号资本主义一般与符号资本主义在各国表现的具体样态 (比如在西欧或美国, 或地中海式资本主义) 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般与具体的关系。这个问题对符号资本主义的理论化工作非常重要, 但其分析不是本文意旨所能触及的范畴。符号资本主义是两条变迁轴线交叉作用的结果: 其一, 在生产关系, 向相对剩余价值的抽取转向或使其成建制 (即密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其二, 导入扩大消费的规定, 使其支撑紧迫模式运作。

除此之外, 符号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主要视以下三个要素而定。

第一, 福利国家的类型, 即用什么方式扩大消费。Esping Anderson 对福利体制的研究归纳出三种福利国家的类型 (后来增为四种): 自由式 (比如美国)、统合主义—国家集权式 (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式 (比如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诸国), 以及地中海式 (比如希腊) (Esping-Anderson 1990/1999)。

按此分类, 我们还可再分出四种扩大消费的类型:

(1) 扩大消费的基础, 一方面是有限的国家干预, 另一方面讲究个人分配。在这个社会中, 扩大消费的手段是把社会工资^①压到最低, 工资以货币形式支付给个别工人, 让工人用购买的方式取得教育、医疗服务、大众传播产品等等 (比如美国)。

^①所谓的社会工资指的是不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劳动者所得, 由国家设立的公共机构、社福单位、宗教团体, 或劳动者身处社会网络里的其他行动者, 以非市场手段、非营利目的提供, 比如教育、医疗、住房、托育等等的基本生活所需。——译者注

(2) 扩大消费的基础, 一方面虽然仍是市场关系, 另一方面讲究集体分配, 比如通过家庭、专业团体等等 (像是德国)。在此模式下, 各地方的、宗教的或其他组织提供非商品服务 (托婴) 给弱势团体。

(3) 以国家干预与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福利国家。扩大的消费手段不只以商品形式 (工资) 支付给每一个工人, 也采取非商品形式或天然形式——直接取用教育与医疗服务、大众媒体产品等等 (比如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诸国)。

(4) 以国家干预为基础的福利国家, 但扩大的消费手段同时采用商品与非商品形式, 主要用于家庭与专业或社会组织等 (比如希腊)。

第二, 符号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根据传统文化在该社会盛行的广度与形式而定。更准确地说, 它根据的是传统在现代社会还能发挥的功能而定。汤普森 (Thompson 1995) 主张传统文化负有以下若干功能: 解释、合法化、规范与认同。根据汤普森的说法,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仅余有两项功能尚在运作: 解释与认同。在我看来, 在典型的西方民主体制里也是如此。相对地, 在威权体制里, 传统的功能或多或少保有规范性及合法性功能, 由国家权力支持。

这就是希腊长期以来的状况。扩大消费用传统的、文化的民族主义, 甚至是宗教活动与论述来包装 (Tsoukalas 1983)。在我看来, 传统愈是在文化体系里普遍存在 (特别是按规范性与合法性功能), 扩大消费愈是为超经济因素 (比如政治) 范畴服务, 这也意味着在紧迫性生产方式与扩大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无效与非理性的 (Charalambis 1983)。这让扩大消费与紧迫生产方式的距离拉开, 取得更高的自主性。

第三, 符号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取决于一个社会既有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然而, 如我在前面所提, 这还需要更多系统性的申论。

四、符号资本主义的两个时期

虽然我们在前文一提再提从 1870 年危机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的这一个资本主义时期，符号资本主义的跨期却有别的区分法，我们可以再细分出两个子时期。第一个时期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及福特主义有很强的关联，概括地说这是符号资本主义的第一时期，或起始时期。这个时期的符号资本主义与两个方面之间存在有机联结：一方面是重工业机械，另一方面是科层化的、单面向的旧媒体。1960 年代、1970 年代间经济与文化危机，以及以多样化生产与消费为标志的全球化新阶段，则触发了第二时期的符号资本主义，无可避免地关联到信息科技和“新媒体”（Davis 1988; Castells 1991; Mosco 2009, 15）。

（一）早期符号（或组织）资本主义

符号资本主义的第一时期，用别的观点看是成熟（与早期相对而言）现代性的社会经济内核，实际上是由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现代性向后工业资本主义的晚期现代性转型的过渡阶段。如同早先所提，这个时期是由大量生产与大量消费所形塑。更具体地说，这是由作为一种工作组织形态的福特主义所形塑，导致了大量（紧迫式）生产以及扩张消费（劳动关系以垄断结构规定）（Lipietz 1990）。

量产制并非福特主义的产物，而是早就出现，存在于工业资本主义早期（Chandler 1994, 1—14）。按贝尔（Daniel Bell）的说法：“几乎我们所有的重要产业：钢铁、电力、电报、电话、汽车、航空业，都是 19 世纪就有的产业。”（Bell 1990, 112）福特主义真正的贡献，在于打造紧迫生产的发展方向，并推而广之至极致。真正前所未有的要素不是量产制，而是扩张消费（Baudrillard 1990, 112），

而量产的商品为这个新现象的铭记。如法兰克福派的学者所说，这个发展让工业量产制转型为符号商品（文化工业）模式（Horkheimer and Adorno, 1986）。但是，如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商品—符号甚或是符号商品的扩张消费，是导致成熟或先前各个时期的资本主义衰退的主因。

扩大消费作为挪用一切符号价值的过程，在没有营销体制（比如广告）与大众文化的社会里是无从想象的（Wernick 1991；Ewen, 2001；Lash and Urry, 2007）。营销机制与大众文化打造了劳动阶级在社会中流动的假象，使之产生自以为是上层阶级的认同。换句话说，扩大消费成为森尼特（Sennet）所谓“社会资本主义”的基础（Sennett 2008, 35—44）。结果是，事实上促成了社会凝聚、和平与政治稳定（Breed 1958），形同以国家层级实现了系统性的社会组织计划，强化了民族国家作为社会组织整体的信念，巩固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因此，新阶段的发展正是以传播作为社会性组织，以工业化方式大量生产（Horkheimer and Adorno 1986）。这是紧迫生产方式的关键要因。我想布洛维（Burawoy 1979）把工作现场中滋生的共识，与媒体以及扩大消费促成的共识两分的做法并不正确。在我看，两者是互相牵动的。文化工业以工业化量产制生产许多不同的商品，或是符号商品，包括以不同的符号系统组织而成的商品。然而，因为一些原因我无法在本文就此详述，最重要的原因是消费主义的出现与再生必须倚赖动态影像（moving image）的繁盛才行（Pleios 2001, Ch. 4）。

组织资本主义的出现，不只伴随着扩大消费的畅旺以及播放设备的发达，也有电影与之后的电视作为社会传播主要角色的出现与蔚为主流，这两个现象同时发生绝非巧合。我们可以把动态影像定义为视觉影像组的连续变化〔按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的说

法，影像把物的更抽象层次表现出来]（Arnheim 1969, 135—152）。即，将符号重点抽象再现，作具象的表演。

换句话说，这些新现象发生在传播层次，特别是在文本层次发生的。这一方面在生产层次上，另一方面在扩大消费的层次上，与简单的工人组织资本主义有关。它为后者提供了典型与意义（Debord 1986; Ewen 1999; Pleios 2001, Ch. 3）。按此说，不只是电视，甚至是一切记号媒介物都作为消费者资本主义下生活形态之所依。因此，一般文化消费，甚至是动态影像的消费，以及扩大消费，都与福特主义的量产制互生共存（Benjamin 1968）。如果组织资本主义的标志是密集式生产方式，则其公开传播的标志便是动态影像主宰一切。商品—符号的消费构成了社会文化领域的内核。

这里要强调一下，所谓动态影像并不必然指特定的视听媒体形式，比如电影或电视，而是指各种不同再现系统的共同构型，但特别以视听媒体为显例。事实上，电影、电视、影带影碟与当代的数字媒体（比如计算机或网络），都是动态影像承先启后的不同形式，与不同形式的符号资本主义并进（Pleios 1993）。因此，从社会学或文化观点，这些传播形式不应该只内向地相互比较，而应该与各自所产生与从属的社会经济条件作联系加以理解，这些条件支撑着传播形式，反之亦然。按此说，（商品—符号的）扩大消费以及文化工业就与紧迫的组织资本主义紧紧相依，或换个方式说，与符号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紧紧相依。扩大消费与文化工业是为了密集生产方式及其动力而存在，让国家与企业的获利能力与财务状况都能得到长足发展。

如果我们换个方式看，扩大消费与文化工业（特别是视觉媒体一类的文化重工业）的成本可由高生产力模式支应（Matsuyama 2002）。以全国规模作严密的系统性组织的条件下，这样的关系特别易于出现。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深究，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论：“传播

形式”再不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是确保生产过程与剩余价值生产运转不息的条件，也就是作为生产要素之一。换句话说，虽然资本主义在移去超经济因素后，经济上巨大的不平等使其四海皆同（Wood 1997），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超经济的关系有机地镶嵌入经济关系中，特别是在生产关系以及剩余价值生产中。

前瞻资本主义的未来，最有趣的问题是这个体系的限制为何，以及它会因为什么原因而崩坏成为历史遗迹。顺着这个问题再思考，大量生产与密集式组织资本主义能欣欣向荣的三个条件便是：（1）大量消费，以保证大量生产制的存续。所以扩大消费的功能在于作为密集式发展的引擎。（2）为了摊平扩大消费的成本，便要使扩大消费对生产力提升以及剩余价值的增量有积极贡献，从而巩固阶级序位。（3）把社会作全国规模的系统性组织，并以此为基础。

这三个条件一旦松动，即导致密集式组织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体制的崩坏（Lash and Urry 1987；Lipietz 1990）。差异化的消费者需求以及弹性生产制成为 1960 年代晚期出现的重要产业发展趋势，并且持续在进行（Jameson 1984；Harvey 1989；Castells 1991；Mosco 2009，15）。1968 年的社会骚动似乎是对大量消费的反扑，商品—符号以及符号商品的消费—转变成多样化的、碎裂化的以及/或者是个人化的（Perniola 1991，30—40）。调节学派指出了扩大消费的增速为经济发展与利润增长作出巨大贡献，但最终反而使这关系翻转，利润率降低使得阶级差异性也不那么明显了，统治阶级的因应之道是削减福利政策，以及将资本移至海外寻找更便宜的要素投入（Lipietz 1990；Vergopoulos 1999）。因此，国家规模的组织资本主义便因为当前的全球化新阶段而发生改变（Sassen 2009）。

虽然这三个条件彼此重要性相当，但论者经常指出其中有一或二在推翻量产体系上是主要的催化剂，在全球化脉络下更是特别强调扩大（文化）消费之重要（Sassen 2009；Sennet 2008）。然而，我

们必须集中心力关注体系在个体层次上的核心问题。如同早先所提，借由符号功能巩固受雇者、组织与生产逻辑的纪律，同时提升生产力或获利率，正是消费的能力所在。因此，探问体系的解组，必须指认在符号—传播层次上及其社会经济功能的变迁为何。

商品—符号与符号商品的扩大消费，可以有两种意义，后者已经由霍尔（Hall 1980）阐明，但是总的来说它应是一种符号传播过程，以社会作用论，符号价值的占有最是重要。符号商品的生产、交换与消费作为经济过程，若不首先理解其中的符号传播面向，便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Hall 1980）。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解释符号商品的功能，视之为社会诸条件框架下的文本。这功能的作用在提供给个体一种幻想，让他自以为在社会中流动，享有不受规制、彰显自身个性的自由。除此之外，特别是霍尔（Hall 1980）所说的视觉生产，根本的解释机制即隐含义（connotation）、个人经验与期望。因此，按此说再延伸：大量生产已经无法满足它所曾经建立的整个体制。这个事实对体系的基础（比如，量产制）造成直接的问题。另一方面，持续成长的扩大消费，在社会需求之助下作为体系的核心要因并且为体系运转贡献良多，现已经无助于增长，甚至造成获利能力与发展的衰退（Lipietz 1990）。

（二）深度符号（或解体）资本主义

紧迫式（以及符号）组织资本主义危机的生成，在于生产体系的效率与成本之间出现失衡。换句话说，扩大消费有助于经济体系生产力的发达（成长）。当扩大消费的成本不变或（大量）增长，生产力水平也不变或增长。

这样的发展表现为利润的下降（“利润挤压”）（Marglin and Bhaduri 1990）。为了要抓紧阶级规律，此处有必要多着墨。如前述调节学派的分析所示，该危机实际上是 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

“生产力不足”或生产力增长放缓的危机（Lipietz 1990; Cook 1990, 79—84）。虽然劳动阶级享受到扩大消费的益处，但并没有按其所打造的资本主义目标发展（增进紧迫式生产的生产力或获利能力）。它在既有的阶级结构下，竟成为脱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文化过程。

一开始危机的因应手段有两种，然而并未对症下药：（1）将事业向海外移动，资本得以找到更便宜的劳工（Elam 2000, 64—65），以及/或者（2）缩小先前扩张消费的规模（Lipietz 1990; Pond 1989）。然而，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法是要鼓动受雇者的“工作兴致”，让工作能有助生产力或获利能力增长，此即先前扩大消费的建制。也就是，符号资本主义的逻辑要延续，但促成经济目的的手段要调整。换句话说，生产体系该按消费逻辑（商品—符号与符号商品）的改变方向进行重组，社会行动也要整个翻转。这个改变的关键要因在差异化个性化，公众主动的互动以及单向行动的科层制解体，以及公众的符号与文化资本活化等等（Lash and Urry 1994）。

生产体系面临“生产力不足”的危机势必要调整，并且得靠两个同时发生且互相牵引的体系转型来促成：其一是劳动者的技术组成（Robins and Webster 1988; Toffler 1982; Webster 1995, Ch. 1），其二是劳动者的社会组成（Lipietz 1994; Mouriki 1994）。以传播与信息科技为基础的自动化数字技术的导入（Richta 1976; Castells 1991; Mosco 2009, 15），促成生产多样化以满足不同消费需求（Davis 2001）。在扩大消费的领域内操作传播“竞赛”创造了这一切，并且作为维持与扩张消费的关键要因（Bauman 2005, 16—33; Pleios 2001, Ch. 3）。

必须强调的是“新媒体”的出现，比如因特网，已经溢出生产的领域，并且不单是技术发展的结果，它更是这样一个大环境的结果：为了民主化的需要以实现传播过程的个人化，技术发展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然而这样的需要在“旧媒体”时代已有发展。早在“新媒体”出现以前，“旧媒体”就一直因为其中心化与单向度的本

质而作为理论的、社会的、政治的批判对象（Baudrillard 1986; Manovich 2001）。

相较于“旧媒体”的发展方向，符号商品与商品—符号的消费逻辑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展开，也是很合乎逻辑的。文化消费的逻辑在：个性化的选择，参与的能力，以及个人对意义的主动涉入与协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文化消费领域里出现完全一样的民主参与逻辑（Brown 1992），并且民主化是扩大消费中的一种恒久内在的过程（McCracken 1988）。

至于本文关注的劳动组成体制之所以转型，正是为了鼓舞工人的“兴致”而导入所谓的后福特主义工作组织形式（Lipietz 1994; Mouriki 1991）。相对于福特主义的“单一逻辑”，后福特主义并不坚持单一的组织模式，而是包括许多不同且互补的设计（Hirst and Zeitlin 1991）。如同阿明（Amin）强调的：其实很多人质疑福特主义的理想型是否真的为主流模式。批评者认为国与国之间表现出来的多样性使福特主义主流的单一逻辑站不住脚（Amin 1994, 11）。柯瑞亚特（Benjamin Coriat）也认为全球规模的福特主义是单一福特主义模式（即美式量产制）扩张的结果（Coriat 1997, 242）。如果我们体会到后福特主义的目的在鼓励工人主动参与工作，并且以全球、各国各自的不同层级的不同思维与不同生活方式为特征，那么后福特主义的复数逻辑就有其意义。其变形为何，在总体层次要看“资本、劳工或国家何者对结构重整的影响力最大”而定（Lash and Bagueleg 1988）。

尽管后福特主义具有多样性，它的根底仍是要打造新形态的劳动干劲，相对于福特主义劳动组成采用的是“生产纪律”，后福特主义则是“生产积极性”（production initiative）（Pleios 1996）。“生产纪律”需要受雇工人就生产逻辑与目的展现志愿配合的纪律，以满足工人与雇主、个别事业与总体经济、经济与国家的共同利益。若

待满足的是人人不同的特定目标与个性化的生活形态，则需要更多空闲时间与扩大消费来支撑，而这要视生产过程的效率而定。

相对的，“生产积极性”要把工人的生产参与度与他追求个人目标的兴致相结合，使公司的成功、事业的整个流程都成为员工个人关心的事。“生产积极性”的标志就是“更高的公司忠诚度”以及“更愿承担责任的员工”（Hickox and Moore 1992, 109）。就这一点来说，不只是设定物质的经济目标，还有操控权与威信的行使、特定观点与品味的投射，总之是要完全彰显个人特质，尽在其中。也就是说，后福特主义的特性即在创造一个水平科层，把行政监管责任丢给工人自己，同时还有个人的志愿投入、水平协作以及参与，有效地运用教育、符号与文化资本，让工人不只自诩为生产者，同时也是公民与消费者（Lipietz 1997; Mouriki 1994; Sennett 2008）。

水平科层的导入，加上其他要因比如责任制等等，配合新技术的使用，造成生产过程中的阶级与其他社会差异好似消失了的假象。这样一来，一度为扩大消费所担负的职能，如今改由生产过程挑起，运用后福特主义的制度设计推进。按总体观点来看，这是首要的变迁，尽管隐微不显。相较之下较为人所注意的变迁，是（全球）生产体系的中央单位掌握了更强大的力量与职能。森尼特（Sennett）观察到：“信息革命的结果之一，是指挥权的调整与解释权由新形态的中央集权取代。”（Sennett 2008, 39）莎逊（Saskia Sassen）也指出，当前（全球）体系中中央单位的功能，特别在金融与新经济领域，愈益强化（Sassen 2009, 99—100）。这样一来，新形态劳动组成的这两个面向合流，不是朝军队化前进，而是变成“黑帮”或“游击队”式的结构，这可以在广告业看到显例（Avidsson 2007）。这和组织资本主义的军队结构类似，但缺少公民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或其他类型的承诺，也没有相当的价值体系或限制，并且超越了有效性与成功的考虑。森尼特形容这劳动社会组成的新形式为

“MP3 组织”，与组织符号资本主义的金字塔式科层形态不同（Sennett 2008, 65—88）。这样的劳动形式可因应新科技组织（数字自动化技术），以及多样、弹性与持续变动的生产的需要，相反也是（Amin 1994, 14—15; Davis 2001）。

因此，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以及初期符号（或组织）资本主义相较，高度发展（或深度）符号资本主义的主要不同，在于劳动的技术组成与社会组成同步变迁。这不像 19 世纪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下劳动的技术组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初期符号资本主义以劳动的社会组成至为关键。但到了深度符号资本主义（或解组织资本主义），劳动的技术与社会（再）组成同样重要。技术变迁与新形态的劳动社会组成并进，反之亦然，两者的根据都是“生产积极性”。要把（生产）技术内含的技术层次与传播社会层次分离是不可能的，反之也无法。这正是技术与传播的结合体。因此，劳动工作组成的重要面向，即生产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构成，可用来抹平遮饰财产关系造成的不平等。这个遮饰的功夫是由扩大消费通过符号手段进行，确保工人的纪律与主动投入，维系紧迫生产的目标与理性。

待分析的切入点有若干，其中有二在本文中最重要。首先，从时间、空间与社会的观点观之，劳动与生产领域发生的变迁（至少在结构与生成原因），是源自商品—符号与符号商品的扩大消费领域，其发展特别拜各类传播模式的“竞争”（game）所赐。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生成了后福特主义，而非相反。或至少在加尔特曼（David Gartman）看来，后现代主义“辩证地影响了这经济发展”（Gartman 1998, 119）。也就是，生产方式的变迁从扩大消费的领域出发，与生产活动融入整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按马克思主义观点，在“新资本主义”内，传播不只是角色（以及整个上层建筑）维持不变，它还以生产活动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之姿，在新的社会形态/结构中蹿起。传播形式的变迁指引且补充了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变

迁。所以说，传播不仅没有式微，反而愈益有机，终使新的资本主义以符号资本主义的形态作为标志。

甚且，扩大消费与社会组织中中介的传播推动生产规律变迁的事实，多少意味着一部分的扩大消费过剩了。生产变迁，特别是劳动的社会组成变迁，担起了扩大消费的职能，至少按经济观点看是变得更“理性”了（包括私有化与消费的个性化）（Hamnet 1989）。这不只是降低了消费的成本，提升了生产的获利，也促成劳资之间更坚定的共识与目标认同，从而有效地维持稳定和谐。这特别在个体层次为真，甚至不需要福利国家惯常操作的长期公共政策（以垄断规模规制劳动）加以安排（Jessop 1994; Loader and Burows 1994）。其次，自动化生产动用的（数字）科技在结构与功能上，与消费中采用科技的近似（Sennett 2008; Barrett and Davidson 2008; Fuchs 2010b）。这和符号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差别，符号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完全不同于扩大符号商品与商品符号消费活动所使用的技术（Burawoy 1979）。而这导致许多副作用。

首先，在文化消费领域内养成运用新科技的能力以及新科技的文化，正好在工作领域（劳动或在职训练）中派上用场并作为必备技能，反之亦然（Green, Reid and Bigum 1998, 22; Gualerzi 2010, 147）。其次，这造成一种结果：和劳动市场所要求许多个人条件（或工作资历）相比，正式资格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了；而新的平等主义的兴起，各科层层级要求的不同知识与资历原本有的等差也被消除了。有如图斯费尔得（Thursfield）所指出的：“举例来说，技术创新也许促成工作内容去技术化，但并不见得工人也去技术化了，虽然工人的技术确实可能在此过程中贬值。而且，尽管工人没有取得正式资格，仍可具备特定职类工作要求的专业技术。”（Thursfield 2003, 47）在后福特主义的工作组织中，为了让工人有效率地工作，正式教育训练提供给工人不只是工作技能与知识，更是工作品性

(ethos) 与公民意识 (Hickox and More 1992, 108, 110)。这意味着广义地看, 职场所需的整套技能, 就是社会化过程 (Pleios 2004)。这在“新媒体”、文化消费与公众传播中特别清楚, 在因特网上尤然。如同普列特 (Poulet) 以新闻业与因特网的互动为个案所指出的, 网络上的知识相当于就不同议题发表的业余评论, 一般而言具有扩大平等主义的作用, 推翻了建制化的正式科层知识 (Poulet 2009, 175—178)。所谓的成功, 已不限于在特定领域表现出色, 而是要能受到公众欢迎。这也发生在生产流程中, 但通过后福特主义商业活动一连串复杂的互动而实现 (Sennett 2009; Terranova 2004, 20—27)。

再次, 在以上复杂的互动影响后, 导入新科技到生产中, 特别是在体系中央单位的功能强化的年代, 都使个别部门的主动性以及在直接决策上扮演的角色分量愈来愈低 (Sennett 2008; Sassen 2009)。这在传播领域中亦可见得, 意味着 MP3 结构成为更普遍的社会行动结构。各功能单位的独立性被压倒了, 特别“新媒体”的文本具有这个特点。不同的内容类持续整合, 同化程度前所未见 (Hill 2007)。几乎所有形态的内容都被卷入新典范中, 如信息社会理论家所说, 信息已不单是信息, 而是“愉悦信息” (Pleasant Information)。内容经过数量—技术面向的编排, 即成信息 (Webster 2005)。从质的观点看, 不同的文本可以共存并且分享流通, 正因为它们有相同的质量作基础。在供给新知的同时, 也娱乐使用者。换句话说, 新媒体文本是按“娱乐信息”的逻辑构成 (Thussu 2007), 而这趋势会使不同类型的内容以及不同文本彼此间的差异性降低 (Pleios 2011, Ch. 2)。而内容类型间的差异主要是数量与技术层面的, 而不再是文本内容的。

最后, 生产领域的这个演变主要是在符号与功能层面展开的, 而较少在经济与结构层面上作用, 在符号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也是如此。社会阶级与经济等级的差异, 以及文本层级的“论述次序”

(Fairclough 1995, 78) 的差异，作为事实如今大大缩小了。这样一来，MP3 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得各层面的聚合程度提升了，生产与消费、工作与传播、经济与文化间的动态互换持续不停 (Toffler 1982; Fuchs 2010a)。不同之处在于，托夫勒关注的是现象的功能层面，而非根据社会不公与续存于生产过程中的阶级关系的事实层面。传播与生产的聚合与交换可以有多种形式。

福克斯 (Fuchs 2010a) 指出，网络用户为了娱乐目的而免费的劳动被产品营销所利用，比如使用者的娱乐活动变成为利润而工作。尽管这个聚合仍有其他重要面向，其主要问题仍是剩余价值生产。好比 (数字) 传播强化了劳动力的生产力，也就减少再生产所需的时间，这不只发生在剩余价值实现 (比如交易) 的领域。除此之外，“新媒体”，特别是因特网，是根据电话模式 (mode of telephone) 所创造出来的，他们先后脱胎自企业运作的需要，也反映了其组织与关系 (Garnham 2003)。

然而，按此进路，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分别真的消失了，甚且，工作与传播间的分别也消失了，这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现象的功能层面上。因此，同时作为生产数据与传播手段的“新媒体”，在使用时无可避免地让劳动逻辑与娱乐逻辑联系在一起，让生产逻辑与消费逻辑联系在一起 (Toffler 1982; Fuchs 2010a)。在下班与上班、休闲与工作、休闲空间与工作场所中习得的技术性与制度性能力，则扮演了辅助性角色。结果是，工作被视作追求个人目标的过程，而个人娱乐与自我实现作为职业、作为一种活动，为主体提供有用的动机。在我看，这已经与马克思经济学字面上的意义分道扬镳了，但另一方面，则可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哲学的再出发。

五、结 论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要通过对社会过程的分析把握实践的重要意义，即检讨并参与社会变迁的过程，这是马克思在他著名的《费尔巴哈论纲》第十一条所指出的。社会科学不可能遗世独存（而又能对世界进行解释），必然是为了改变与推进社会而存在。按此理路，在百工各有职司的社会里，社会分析的社会效用与存在的功能才得完满。

所以问题是，深度符号资本主义的社会变迁是否为真？根据前述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生产关系的发展翻新了生产关系、权力关系，以及生产过程管理，甚至使之生成假民主的样态（或最少是褊狭的民主）。水平式科层、劳动力参与、行政机关职能移转给劳动力等等都是变迁的症候。最重要的是，甚至这个变迁有机地与某种传播形式结合，即和所谓的“信息社会”切合（Webster 1995; Castells 1996; Poster 1990）。在深度符号资本主义里，变迁的核心方向是指向权力关系与生产管理，而这个深度符号资本主义的侧面确实是在后福特主义的提问取径中被忽略了（Vallas 1999; Keneett 2003）。与之不同，在初期符号资本主义时期，这个变迁首先是消费关系的，其次才是权力关系，这反映了初期符号资本主义与前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之间的稳固关系。然而，深度符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迁则是初期符号资本主义变迁的延续。

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权力关系与管理手段，也许就是最根本的、最稳固的阶级关系与社会不公义（Mann 1986），它不只由经济手段锻造，同时也是（主要是）符号构造的结果（Mouzelis 2008, 10）。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与初期符号资本主义相较，权力关系变迁似乎对深度符号资本主义更重要。这在整体上与权力关系有关，其他形式

的生产关系则作为手段。似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发展，因为它们的符号化使得权力关系多少与其他生产关系形式一样重要，或更重要，尽管事实上这个过程的目的在遮饰后者。这样的势态或许支持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批评（以及后结构主义取径），他们认为生产（与消费）关系是为权力关系服务的，反则不然（Baudrillard 1990）。按此说，我们应把后现代社会理论视为深度符号资本主义事实的一种扭曲反映，而不是对历史真相的断言。

也就是说，（深度符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有机地与信息社会的“传播形式”结合。这个变化，如同早先在扩大消费发生的一样，用来隐瞒阶级不平等、资本积累/更多剩余价值的生产。但最重要的是，“传播形式”再不被视为次于生产关系的被动因素。

换句话说，深度符号资本主义中的传播成为保存或扰动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的指标。当然在过去消费民主化的阶段，某些类似的部分已经发生过了。然而，这次景况大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互动再不是受制于总体或中层层级，比如全国经济体制，而大部分是发生在个别企业或区域经济的个体层次，并且作为结果来看，让个别企业层级的标准与一国层级的标准相配合是没有必要的。事实上，国家层级的标准大量地被取消了。

这结论让我们回到一个基本问题。总体层次的发展不见得主导了社会变迁的过程。换句话说，若传播部门发生了恰当的变化，可能导致“生产关系”也出现改变。在全国或全球社会〔或全球规模的阶级构成（formation）〕的层级提出总体的规定再没有必要了。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社会变迁（包括阶级关系变化）可以借由深度符号资本主义下发展的各种传播方式来促成；其次，这可以在个体的经济结构或个别企业操作。这样的变化可以解释当代相对主义的历史基础。换句话说，再不需要预先掌握权力才能改造世界，正如霍洛威（John Holloway）所主张的

(Holloway 2006, 340)，而是可以由下而上、部分点滴地改造世界。霍洛威注意到今日社会关系可用于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他犯了一个错误，按我看来，他忽略了技术力量，特别是传播力量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性。

社会变迁可以从经济系统的个别部分下手来达成，特别是如果我们不把所谓的经济系统放大到全国或全球（比如以全球化的脉络来思考）。这不是说总体层次的规范已无必要。若没有在社会政治领域发生相当的变迁，职场的社会变迁断无可能，而反之亦然。而联系这两个领域的是草根民主的发展趋势。如果深度符号资本主义以及信息科技与职场水平科层体制的发展同步并进，则经济领域的民主化也一样要有政治领域的草根民主配合才有实现可能，反之亦然。在我看来，运用“新媒体”（比如部落格、社会媒体等等）抗议以及操作符号政治，对草根民主的目标是必要的，特别因为“军队化”组织经济与科层式政党政治都已宣告失败。这可以部分解释不同国家发生的“愤怒”（indignados）运动（都植基于“新媒体”），比如埃及、阿尔及利亚、西班牙、希腊与美国。

希腊的国家中心制经济体系已然失败（Sakellariopoulos 1992; Kazakos 2001），同时它的中心化政党民主制也破产（Lyrintzis, Nikolakopoulos and Sotiropoulos 1996）。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解释为何过去两年（2010—2012）“新媒体”在扳倒当前政治体系合法性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对各种草根政治组织与动员的出现同样意义重大。如果欠缺“新媒体”与新形态的内容，这些运动都是无从想象的（Labrakou 2011）。希腊的运动已被称为“脸书版本的1968年5月”。但社会变迁的问题仍未解决，除非我们在政治领域与生产关系上落实草根的规定。

政治与经济的草根民主都无法单靠“新媒体”实现。我想“新媒体”不论用在政治过程或生产过程中，在今日它的根据都还是

“奇观”。影像/奇观虽然运作的方法不同, 仍在“新媒体”中扮演关键性的结构角色, 一如在“旧媒体”与“扩大消费”时期那样。然而,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 社会科学家已不再是变迁的促成者, 而是其工程师。在信息科技横流的时代, 社会科学家的职能与革命情怀聚合成为新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参考文献:

Adorno, Theodor and Horkheimer, Max. 1987. *Sociology. Essays*. Athens: Kritiki (in Greek).

Adorno, Theodor and Horkheimer, Max. 2001. The Culture Industry: 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edited by Meenakshi Durham and Douglas Kellner, 71 – 101. Oxford: Blackwell.

Aglietta Michael. 1979.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London: Verso.

Alexander, Jeffrey. 1987.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llen, Robert. 1992. Audience-Oriented Criticism and Television. In *Channels of Discourse, Reassembled: Television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 edited by Robert Allen, 101 – 137. London: Routledge.

Althusser, Louis. 1990. *Positions*. Athens: Themelio (in Greek).

Amin, Ash. 1994. Post-Fordism. Models, Fantasies and Models of Transition. In *Post-Fordism: A Reader*, edited by Ash Amin, 1 – 39.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Arendt, Hannah. 1959. *The Human Condition: A Study of the Central Dilemmas Facing Modern Man*.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Books.

Arendt, Hannah. 1991.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Media Culture*, edited by Kostas Livieratos and Takis Fragoulis, 121 – 126. Athens: Alexandria (in Greek).

Arvidsson, Adam. 2007. Creative Class or Administrative Class? *ephemera. theory &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 7(1): 8 – 23.

Barrett, Michael and Elizabeth Davidson. 2008. Exploring the Diversity of Service

Worlds in the Service Economy.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Service Economy: Challeng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Michael Barrett, Elizabeth Davidson, Catherine Middleton and Janice DeGross, 1 – 12. 2nd edition. New York: Springer.

Baudrillard, Jean. 1986. *Requiem for the Mass Media*. Athens: Eleftheros Typos (in Greek).

Baudrillard, Jean. 1990.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Athens: Alexandria (in Greek).

Baudrillard, Jean. 2003.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London: Sage.

Bauman, Zygmunt. 2005.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Poor*. Berkshire: McGraw Hill.

Bell, Daniel. 1999.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Benjamin, Walter. 1968.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Illuminations*, edited by Walter Benjamin and Hannah Arendt, 219 – 253.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Blackledge, David and Hunt Barry. 1995.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thens: Metechmio (in Greek).

Bocock, Robert. 1997. *Consumption: Key Ideas*. London: Routledge.

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reed, Warren. 1958.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o-Cultural Integration. *Social Forces* 37(2): 109 – 116.

Brown, Doug. 1992. Doing Social Economics in a Postmodern World.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50(4): 383 – 403.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u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Castells, Manuel. 1991.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Oxford: Blackwell.

Castells, Manuel.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ed Society*. Oxford, UK: Blackwell.

Chadler, James Jr. 1994.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ralambis, Dimitris. 1983. *Clientelism and Populism*. Athens: Exandas (in Greek).

Cook, Phillip. 1990. *Back to the Future.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Locality*. Winchester, MA: Unwin Hyman.

Coriat, Benjamin. 1997. Globalization. Variety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 Embeddedness of Institutions*, edited by Roger Hollingsworth and Robert Boyer, 240 – 264.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Curran, James. 1979. Capitalism and Control of the Press, 1800 – 1975. I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edited by James Curran, Michael Gurevitch, and Janet Woollacott, 7 – 11. Beverly Hills: Sage.

Davis, Stanley. 2001. *Management: Managing the Future Now*. London: Simon and Schuster.

Debord, Guy. 1986. *The Society of Spectacle*. Athens: Eleftheros Typos(in Greek).

Demertzis, Nikos. 2002.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isk, Publicity, Internet*. Athens: Papazisis(in Greek).

Elam, Mark. 2000. Puzzling out the Post-Fordist Debate: Technology,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In *Post-Fordism. A Reader*, edited by Ash Amin, 43 – 70. Oxford: Blackwell.

Engels, Friedrich. 1978a. Letter to Paul Ernst. In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Engels Friedrich*, Vol. 10, 426 – 428. Sofia: Partizdat(In Bulgarian).

Engels, Friedrich. 1978b. Letter to Conrad Schmidt. In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Engels Friedrich*, Vol. 10, 435 – 442. Sofia: Partizdat(In Bulgarian).

Ewen, Stuart. 1999. *All Consuming Images*. New York: Basic Books.

Esping-Andersen. Gøsta(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sping-Andersen. Gøsta. (1999).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wen, Stuart. 2001.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Advertising and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1981. *Toward a Theory of Mass Media*. Athens: Epikouros (in Greek).

Fairclough, Norman. 1995. *Media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

Fuchs, Christian. 2010a. Grounding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 Inquiry into The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Karl Marx.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4(15): 15 – 41.

Fuchs, Christian. 2010b.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6(3): 179 – 196.

Garnham, Nicholas. 1979. Contribution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Communica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2): 123 – 146.

Garnham, Nicholas. 2003. *Emancipati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thens: Kastaniotis (in Greek).

Gartman, David. 1998.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st-fordism?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9(1): 119 – 137.

Gerbner, George. 1967. Mass media and 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 edited by Frank Dance, 40 – 57.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Golding, Peter and Graham Murdock. 2001.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Mass Media and Society*, edited by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25 – 52. Athens: Patakis (in Greek).

Green, Bill, Joe-Ann Reid, and Chris Bigum. 1998. Teaching the Nintendo Generation? Children, Computer Culture and Popular Technologies. In *Wired Up: Young People and the Electronic Media*, edited by Sue Howard, 19 – 41. London: UCL Press.

Gualerzi, Davide. 2010. *The Coming of A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Path of Transformational Growth. A Long-Run Perspective in the Late 2000s Recession*. New York: Routledge.

Hall, Stewart.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 edited by Stew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we and Paul Willis, 507 – 517. London: Hutchinson, 1980.

Hamnet, Chris. 1989. Consumption and Class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In *The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edited by Chris Hamnet, Linda McDowell and Phillippe Sarre, 199 – 213. London: Sage.

Harris, Jess and Catherine McDonald. 2000. Post-Fordism,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Personal Social Services: A Comparison of Australia and Britai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0(1): 51 – 70.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Blackwell.

Herman, Edward and Noam Chomsky. 2001. A Propaganda Model.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edited by Meenakshi Durham and Douglas Kellner, 180 – 217. Oxford: Blackwell.

Hickox, Mike and Moore, Robert. 1992. Education and post-Fordism: A New Correspondance? In *Education for Economic Survival: From Fordism to Post-Fordism*, edited by Phillip Brown and Hugh Laude, 95 – 116. London: Routledge.

Hill, Annette. 2007. *Restyling Factual TV*. London: Routledge.

Hirst, Paul and Jonathan Zeitlin. 1991.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versus Post-Fordism: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 1 – 156.

Hobsbawm, Eric. 1978.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Marxism Today*, September: 279 – 286.

Hobsbawm, Eric. 2008. *The Age of Revolutions 1789 – 1848*. Athens: Cultural Institute of National Bank (in Greek).

Holloway, John. 2006.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The Meaning of Revolution Today*. Athens: Savalas (in Greek).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Adorno. 1986. *The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Athens: Ypsilon/books (in Greek).

Horkheimer, Max. 1976.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In *Critical Sociology: Selected Readings*, edited by Paul Connert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Jameson, Fredric. 1984.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 59 – 92.

Jessop, Bob. 1990. *State Theory. Putting Capitalist Economies in their Place*. Cambridge: Polity.

Jessop, Bob and Ngai-Ling Sum. 2006. *Beyond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Putting Capitalist Economies in their Plac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Jessop, Bob. 1994. The Transition to Post-Fordism and the Schumpeterian Workfare State. In *Towards a Post-Fordist Welfare State?* edited by Brian Loader and Roger Burrows, 13 – 17. London: Routledge.

Jessop, Bob. 2002.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Kazakos, Panos. 2001. *Between State and the Market. Economic Policy after War in Greece 1944 – 2000*. Athens: Patakis (in Greek).

Kennett, Patricia. 2003. Exclusion, Post-Fordism and the “New Europe”. In *A New Europ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Social Exclusion*, edited by Phillip Brown and Rosemary Crompton, 14 – 32. London: Routledge.

Lash, Scott and Paul Bagguley. 1988. Labour Relations in Disorganized Capitalism: A Five-Nation Comparis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6(3): 321 – 338.

Lambrakou, Zoi. 2011.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The Case of Collective Action with the Use of New Media in Greece 2007 – 2011*. Unpublished MA thesis. Athens: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 (in Greek).

Lash, Scott and Celia Lury. 2007.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The Mediation of Things*. Malden MA: Polity.

Lash, Scott and John Urry. 1987.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Madison, WI: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Lash, Scott and John Urry. 1994.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Sage.

Lipietz, Alain. 1990. *Mirages and Miracles*. Athens: Exandas (in Greek).

Lipietz, Alain. 1994. Post-Fordism and Democracy. In *Post-Fordism: a Reader*, edited by Ash Amin, 251 – 279.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Lipietz, Alain. 1997. The Post-Fordist World: Labour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 and Global Ecolog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4(1): 1 – 41.

Loader, Brian and Roger Burrows. 1994. Towards a Post-Fordist Welfare State? The Restructuring of Britain, Social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Welfare. In *Towards a Post-Fordist welfare state?* edited by Brian Loader and Roger Burrows, 1 – 13.

London: Routledge. Lyrintzis, Christos, Ilias Nikolakopoulos, and Dimitiris Sotiropoulos, 1996. Introduction. In *Society and Politics: Aspects of the Third Greek Republic 1974 – 1994*, edited by Christos Lyrintzis, Ilias Nikolakopouloa and Dimitiris Sotiropoulos, 19 – 42. Athens: Greek Socie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melio Publishing (in Greek) .

Mann, Michael.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 D. 1760*.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novich, Lev. 2001.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arion. Marglin, Stephen and Amit Bha-duri. 1990. Profit Squeeze and Keynesian Theory. In *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Reinterpreting the Postwar Experience*, edited by Stephen Marglin and Huliet Schor, 153 – 186. Oxford: Chalderon Press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1975. *For the Art*. Athens: Exandas(in Greek) .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1978. *The German Ideology*, Vol. 1. Athens: Gutenberg(in Greek) .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2001. The Ruling Class and the Ruling Idea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edited by Meenakshi Durham and Douglas Kellner, 39 – 42. Oxford: Blackwell.

Marx, Karl. 1978a. Towards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Vol. 7, 113 – 291. Sofia: Partizdat(In Bulgarian) .

Marx, Karl. 1978b. Letter to Franz Mering. In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Engels Friedrich*, Vol. 10, 477 – 472. Sofia: Partizdat(In Bulgarian) .

Marx, Karl. 1979. *Capital*. Sofia: Partizdat(in Bulgarian) .

Marx, Karl. 1983.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Athens: Kalvos(In Greek) .

Matsuyama, Kiminori. 2002. The Rise of Mass Consumption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0(5) : 1035 – 1070.

McCracken, Grant. 1988. *Culture and Consumption: New Approaches to the Symbolic*

Character of the Consumer Goods and Activitie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osco, Vincent.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2nd ed.

Mouriki, Alik. 1994. Politics of Reform and New Forms of Organization of the Labour. *Contemporary Issues*, Vol. 54(in Greek).

Mouzelis, Nicos. 2008. *Modern, Postmodern Social Theorizing. Bridging the Div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rker, Martin. 2000.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olog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Making of a Division of Labour.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 124 – 146.

Perniola, Mario. 1991. *The Society of Simulacra*. Athens: Alexandria(in Greek).

Plamenatz Petrov, John. 1963. *Man and Society*. London: Longman.

Pleios George. 2004. Labour and Meaning in Late Modernity: The Significance of Educ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Image. *Review of Social Research*, B2004(114) : 61 – 87(in Greek).

Pleios, George. 1993. *Moving Image and Artistic Communication*. Athens: Delphini (in Greek).

Pleios, George. 1996. The Crisis of Education in Mature Capitalism. *The 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 19: 143 – 185(in Greek).

Pleios, George. 2001. *The Discourse of Image. Ideology and Politics*. Athens: Papazisis(in Greek).

Pleios, George. 2011. *The Society of Pleasant Information. Modernity and the News*. Athens: Kastaniotis(in Greek).

Polanyi, Karl. 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Pond, Chris. 1989. The Changing Distribution of Income, Wealth and Poverty. In *The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edited by Chris Hamnet, Linda McDowell and Phillippe Sarre, 43 – 77. London: Sage.

Poster, Mark. 1990.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Poulet, Bernard. 2009. *The End of Newspapers and the Future of Information*. Athens: Polis (in Greek).

Richta, Radovan. 1976. *Civilization at Crossroads*. Athens: Rappas (in Greek).

Robins, Kevin and Frank Webster. 1988. Cybernetic Capitalis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veryday Lif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edited by Vincent Mosco and Janet Wasko, 44 – 75.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Rueschemeyer, Dietrich. 1986. *Power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Polity Press.

Russell, James. 2006. *Double Standard*.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Sakellaropoulos, Theodoros. 1992. *State and Social Interests during the 80s*. Athens: Kritiki (in Greek).

Sassen, Saskia. 2009. *A 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 Athens: Metechmio (in Greek).

Schiller, Herbert. 1973. *The Mind Managers*. Boston: Beacon Press.

Schultz, Theodore. 1961.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1): 1 – 17.

Sennett, Richard. 2008.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Athens: Savalas (in Greek).

Terranova, Tiziana 2004.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Pluto Press.

Thompson, John.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Thursfield, Denise. 2003. *Post-Fordism and Skill: Theories and Perceptions*. Burlington: Ashgate.

Thussu, Daya Kissan. 2007. *News as Entertainment. The Rise of Global Infotainment*. London: Sage.

Toffler, Alvin. 1982. *The Third Wave*. Athens: Cactos (in Greek).

Tsoukalas, Konstantinos. 1983.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Some General Issues. In *Hellenism and Greekness*, edited by Demetrios Tsatsos, 37 – 48. Athens: Estia.

Vallas, Steven. 1999. Rethinking Post-Fordism: The Meaning of Workplace Flexibil-

ity. *Sociological Theory* 17(1): 68 – 101.

Vergopoulos, Kostas. 1999. *Globalization. The Great Mirage*. Athens: Nea Synora (in Greek).

Webster, Frank. 1995.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Wernick, Andrew. 1991. *Promotional Culture: Advertising, Ideology and Symbolic Express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Williams, Raymond. 1978.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aymond. 2001.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ks, edited by Meenakshi Durham and Douglas Kellner, 152 – 165. Oxford: Blackwell.

Williams, Rosalind. 1991. *Dream Worlds: Mass Consumption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ood, Ellen M. 1997.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or Capit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4(3): 539 – 560.

罗伯特·普雷 (Robert Prey)^①

网络的盲点： 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

王满满 (译), 吴畅畅 (校)

[导读] 随着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和快速发展, 网络已不仅仅作为一种新近的技术形式而存在。作者文中的“网络隐喻”正是这样被大规模、弥漫性地转移至几乎全部的当代生活, 成为当代社会的模型。从“9·11事件”的恐怖主义网络到引发信贷恐慌的金融网络, 网络隐喻无时无刻不在, 同时也在积极建构人们试图理解的世界。在这样一个联系不断增强却仍然坚定地执着于追逐剩余价值剥削的世界里, 权力的批判该往何处去? 作者正是从这样一个疑问开始其论述的, 即网络隐喻是如何塑造我们对权力的理解的?

作者在本文中主要关注的是以卡斯特等为代表的网络理论家, 就网络理论家的网络本体论与马克思的过程关系本体论进行了清晰的比较及批判, 并重建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文章主要就网络理论家如何在“排斥主题”下组织批判进行了阐释与驳斥, 作者认为网

^①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国际传播、非物质与流动劳动力。他从2006至2008年工作于南非的移民世界电视(MWTV), 2007至2008年是韩国首尔圣公会大学社会学系的访问研究员。robp@sfu.ca.

络隐喻与排斥具有同源性，它转变了人们对社会和政治批判的认知，尤其是极大地削弱了对权力的理解和批判，特别导致了一种对权力的单向度理解，容纳/排斥的二元逻辑几乎无视剥削关系。排斥主题的局限呼唤重新将剥削主题引入当代社会批判。作者进一步阐释了马克思如何通过“生产”范畴来物化过程，及其对内在关系和矛盾的独特理解来发展其剥削理论，使其不仅不是历史遗迹，反而非常适合于理解和批判信息资本主义背景下剥削的强化与扩大。

最后，作者总结了本文的两个主要论点：1. 网络隐喻会导致社会批判聚焦于排斥而忽视剥削。排斥的确存在，但作为社会批判中心议题的是剥削。2. 说明在现代信息资本主义中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为何仍然与批判权力有关。

网络隐喻是一种当代迷思，超越政治、去历史化，试图创造一个新的时代和空间，一个不同于先前所有时代的信息时代，通过消除复杂性和矛盾性来创造一种“欢快的明晰”。正如文中所说，在信息资本主义中，排斥变得更加明显和易于辨认，剥削却愈发难以通过现代全球生产链来追踪测量。网络隐喻和排斥同样具有水平的、空间的特征，这让排斥主题占据了批判主流。罗伯特·普雷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没有采用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或者为所谓“联系主义者”世界建立一个剥削理论，而是创造性地选择了指引网络理论家和马克思思考的共同的过程本体论框架，清晰地阐释了马克思剥削理论与信息资本主义权力批判的衔接。普雷这篇文章的最大亮点是他的分析角度和思路，基于共享本体论视角的分析与批判，使得本文的分析逻辑性强又有说服力，并让卡斯特等网络理论家的网络思维与排斥主题批判在不断发展的，或者是“回来的”马克思剥削理论面前疑点重重。作者没有否定排斥的存在和重要性，而是强调了走出网络隐喻的迷思，重返社会现实，重新理解和思考网络、排斥与剥削的内在关系，寻找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解途径才是最重

要的。

当然，我认为本文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1）在作者的分析中，网络只是水平的，但网络真的只是像蜘蛛网一般的水平形态吗，其本身是否也存在垂直关系？（2）作者对网络隐喻的强有力批判也可能引发这样的担忧——只要使用网络社会分析就不免陷入了伪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泥沼？

对此我的理解是，作者不赞成使用网络隐喻，因为这会导致对权力关系的错误理解、导致批判焦点的转移，但这并不代表他否定或不承认当代社会新的发展组织形式，其重点是旨在纠正或扭转信息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批判倾向。

我们现在的确存在于一个网络社会，对网络隐喻的使用却常常那么漫不经心和自然而然，仿佛是活在当下的人类不可逃脱的宿命，但由此导致的扁平化网络思维营造的却可能是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等级结构的假象，所有人都变成了联系的节点，成功与否只在于使用网络的能力、在于对网络的价值，这种去政治化的迷思仿佛创造了一个迷人的民主图景，看起来的机会平等却不是事实上的平等，正如只有在消灭阶级和阶级剥削的共同体建立的基础上，才能有个人的全部自由与发展。而卡斯特等人的网络思维恰恰是遮蔽了这个民主和平等的基础。

反观中国，作为一个日益被卷入全球信息资本主义浪潮的国家，面临市场改革的深化和社会转型，传播研究也深受美国实证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影响，但就如赵月枝老师所说的，中国传播研究几十年来都是在“试图发现抽象的发展规律和去政治化的努力中”，似乎偏离了社会权力关系这个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国内不少研究也深受网络理论的影响，比如有很多针对农民工、女性群体等的社会排斥研究，关注的是定义为有缺陷、缺乏资格的阶层在资本网络中的风雨飘摇，而不是网络技术背景下新的剥削关系中的阶级

状态，比如对于很多网络行动中的行动者更多的是关注他们凭借新媒体技术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而忽略考察他们的阶级构成和复杂动力，可以说对于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解在整体意识上还缺乏反思与创新能力。因此，我们需要得到更多类似本文作者所带来的启发和反思，拒绝膜拜普世化的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立足于中国紧迫的社会现实和传播议题，时刻警惕水平化和空间化的思维逻辑，以剥削理论等角度重新认识思考网络社会中的不平等与压迫、重新关注社会权力分配，跳脱发展表象所遮蔽的殖民逻辑。这些都是中国传播学界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关键词] 网络，马克思，卡斯特，哈特，奈格里，过程关系本体论，剥削，排斥，内在关系，生产，矛盾，信息资本主义。

一、引言

正如哈特（Hardt）与奈格里（Negri）所描述的，今天，从袭击双子座大楼的恐怖主义网络到引发信贷恐慌的金融网络，“所及之处皆有网络”（Hardt and Negri 2004, 142）。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同构（isomorphism）和中心隐喻（metaphor），网络概念已经变成我们如何理解当代社会互动关系的新“组织架构”（Cavanagh 2007, 24）。

这自然引发了关于社会批判的几个重要问题。我们用来所指的隐喻、叙事和框架无论在权力的形式上还是在我们设想权力批判的能力上都发挥着作用。因此，本文即以探寻这样一个应当显而易见的问题为开始：网络隐喻是如何塑造我们对权力的理解的？

在下文论述中，我认为网络隐喻引致了一种单维的（one-dimensional）权力理解，它将视线固定在容纳/排斥的二元体（binary）中，而几乎无视剥削关系。我将会讨论网络思维与排外主义批判之

间同源性 (homology) 的原因，同样要讨论的还有单就以这样的术语来思考权力的不足。

考虑到这个特殊问题的主题，我会转向这样一个考察，即在一个联系虽不断增强却仍然坚定地执着于剩余价值剥削的世界里，马克思如何能够提供给我们一种不断发展完善的 (better-rounded) 对权力的批判。然而，不同于从意识形态批判高度对网络隐喻展开密集轰炸，本文采取了重建的方法，即首先承认一个为网络理论家和马克思所共用的共同的本体论基础——我称其为“过程关系本体论”。从这个共有的立场出发，就有可能通过物化 (materializing) “过程” 和内化 (internalizing) “关系” 来重建这条马克思所采用的独特路径。我认为这些关键的差异解释了马克思著作中剥削的重要性，以及大多数网络理论家工作中对剥削的忽略。我们的最终指向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来自于马克思过程本体论的剥削理论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等级世界的遗迹，而是一个独一无二地适合于批判当代“信息资本主义”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内部权力的社会关系理论。

但是，在网络思想家和马克思可以被放在一起对话前，让我们先将注意力转向网络隐喻；它的普遍存在和由它引发的批判模式。

(一) 网络隐喻

媒介中对“网络”或“网络化”术语的持续使用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些只不过是肤浅的流行用语。然而，在一些学术圈子里，“网络”研究被视为是新型超级科学 (super-science) (Barabasi 2003; Watts 2004)，而且是“一个当仁不让的理论基础” (Cavanagh 2007, 25)。对于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一位“网络社会”的先驱理论家而言：

网络理论能通过基本的共享的生物网络、神经网络、数字网络以及人类沟通网络这诸多网络，提供一种理解自然与社会的共同语言、一条共同途径（Castells 2011b, 795）。^①

正如瓦茨（Duncan Watts）指出的，不管我们如何评判这种观点的合理性，但有一点毋庸置疑：

作为研究议程的网络中相互介入的情形已联合了物理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并且带动了数学家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与生物学家加入其中。（Cavanagh 2007, 25）^②

媒介和传播学者普遍认为网络形式是“新媒体”的关键特征之一（Gane and Beer 2008）。实际上，就如卡瓦纳（Cavanagh 2007, 9）所表述的那样，“网络”是信息革命的“欢呼”声之一。尤其因特网作为近年来涌现出的“世界上最辛勤工作的隐喻”（Cavanagh

^①本文讨论的网络理论中，我主要关注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概念，以及他的“网络社会”论题。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的观点可以说是传播和媒介研究领域中最著名和最为人熟知的网络理论版本。虽然卡斯特提出了一种原创性网络理论，但我的大多数分析和批判可以被看作适用于一般而言的网络理论。

^②某种程度上，这与网络定义的宽泛程度有关。正如瓦茨评述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什么比网络更简单的了。网络本质上只不过是某种方式彼此相连接的客体集合体。另一方面，网络这个术语的绝对普遍性使其本身难以被精确地加以诠释。（Watts 2004, 27）

“网络隐喻”应用在社会理论中所产生的多种理解已经导致这样一种情形：

甚至在学科内部，如果两位理论家同时在讨论同样的概念，它也是机缘凑巧而不是计划行事的产物。（Cavanagh 2007, 9）

2007, 23), 被视为衡量网络为何物的首要标准 (gold standard) (Cavanagh 2007, 48)。

这自然是一个非常狭隘的视角, 它将“网络”的概念降低为一种新近的技术形式。网络无疑不是一项当代发明。^① 它们出现在贯穿历史的各个社会中。但是, 卡斯特和其他当代学者认为:

当代社会环境为这种遍及整个社会结构的渗透性 (网络) 扩张首次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基础。(Hepp, Krotz, Moores and Winter 2008, 4)

技术、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独特组合已然合并, 于是网络从以前主导性的组织等级形式阴影下浮出水面, 这种基本论点说明了“网络隐喻的兴起”之因 (Cavanagh 2007)。

然而,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观点, 即隐喻并不只是描述, 而且规定——隐喻积极构建我们试图理解的世界——那么, 我们必须乐于接受在选择如何描述我们的世界时会有直接的政治影响在里面。这不是反对使用隐喻的争辩。事实上, 如同厄里 (John Urry) 写道的: “社会科学工作依赖隐喻, 并且不同隐喻间的大多数理论讨论是由论争组成的。” (Urry 2003, 42) 无论如何, 我们都应当认真思考所使用的隐喻类型, 以及它们对塑造我们关于社会现实看法产生的

^①通过因特网研究来理解社会也并非新尝试 (Quandt 2008)。在传播与媒介研究中, 马特拉夫妇 (A. Mattelart and M. Mattelart 1998) 描述了先驱传播学者罗杰斯 (Everett Rogers) 是如何从贝特森 (Gregory Bateson)、齐美尔 (Georg Simmel) 和莫雷诺 (Jacob L. Moreno) 的工作中汲取养分, 通过强调传播网络分析来修正他的创新理论的。无论如何, 尽管网络分析绝不再只是一种边缘努力, 卡斯特与其他当代“网络社会”论题的支持者还是认为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适用于理解社会。

影响。^①

下面的部分将对于网络隐喻如何恰好转变我们对社会和政治批判的认知加以考察。我会提出网络隐喻将批判导向到一个关注容纳和排斥的二元论中。在此情况下，它同时使批判偏离了剥削问题。在下文中，我将会关注网络思想家们最常见的倾向：在“排斥的主题”下组织所有批判（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347）。

（二）网络隐喻与“排斥”：同源性（Homology）

当代社会和政治理论家有这样一种差不多约定俗成的观点，即当今权力与不平等的关系更多是通过排斥而非剥削导致。例如，社会学家拉希（Scott Lash）就主张剥削已不再是权力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排斥，其中包括了“相对抽离的”（relatively disembodied）精英的自我排斥（Lash 2002，4）。与此相似的还有卡斯特最近的一本书《传播权力》（*Communication Power*），他认为：

有一种所有网络中都很常见的运用权力的基本形式：网络排斥……有一种排斥形式——因而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在网络世界普遍存在：容纳全球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同时也排斥了贬值的地方化的东西。（Castells 2009，50）

我们可以从这段引述看出，卡斯特不仅仅将排斥看作是“运用权力的一种基本形式”，而且“排斥”与“权力”似乎竟变身

^①卡斯特无疑意识到这个问题；事实上，它是其“传播权力”理论的中心议题。在他近期的大部分著作中，他用神经科学和认知语言学去证明我们由通过使用隐喻、叙事和框架来产生意义的神经网络组成，并与外部网络世界相连接。卡斯特（Castells 2009，145）这样表述：“权力产生于意志的风车”，因此“权力的基本形式存在于塑造人们意志的能力中”。

为同一个概念。根据卡斯特和其他社会理论家的观点，如果网络和连通性是主导逻辑或生命形态，那么压迫就可以由这些网络的断裂来定义。就如英国地理学家和理论家思里夫特（Nigel Thrift）客观陈述的那样，“新的连接形式产生了新的断裂形式”（Thrift 2002, 41）。

对卡斯特而言，以网络社会为特征的新的空间逻辑得以出现，是通过在一种变化的超链接地理中物理空间产生分裂及结构上引发的“黑洞”（black holes）——他所指的“第四世界”（the Fourth World）。这种“社会排斥的新地理”包括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美国市中心的贫民区、法国郊区和亚洲特大城市的棚户区（Castells 2000c, 168）。排斥也因此成为了当代“信息资本主义”的主要副作用。一位评论家这样评价卡斯特：

……与其说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数被压制——还不如说他们被财富和权力的全球流动……所遗弃、宣布失去价值，以及绕过不管……极权主义政权对其国民强烈的，即使专制的关注也已经被信息资本主义的广泛忽视所取代，这也宣布了全体民众被排除在富人区域之外，是“多余的”、被忽略的或被作为不受欢迎的移民来对待。（Stalder 2006, 131）

“网络社会”中的权力运用是通过社会行动者的网络把关（Barzilai-Nahon 2008）来实现的，社会行动者确立他们在权力中的地位：

凭借构建一个积累有价值资源的网络，之后运用他们的把关策略去对那些没有为网络增加价值或损害网络项目

中最具主导意义的利益的人设置障碍（Castells 2011，774）。

如果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停止发挥其有效机能，它就会被逐步淘汰出网络，并且网络会重新自我安排——就像细胞在生物进程中所做的那样（Castells 2000b，15）。

所有对网络的继续生存有用和必需的才被允许进入，所有被认为无用或有害的都会被消除。网络“以一种二元逻辑运转：容纳/排斥”。

从这样一种权力概念中被抽离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它是由网络制定的协议而不是个性化决策来规定。协议是一种将看似有自主权的代理人结合在一起以能够互动并形成网络的机制。^①“没有一个共享的协议，就没有网络。”（Galloway 2004，75）^② 协议允许权力从个体代理人的行为中脱离出来，相反将权力嵌入组成系统的规章制

^①在数字计算的世界，“协议”这个术语是指控制具体技术执行的标准，以及其间的沟通。然而协议并不是一个新词。一项协议在性质上可以是技术的、法律的、金融的或是文化的。正如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特别指出的：

在应用于计算机之前，协议指在一个公约的具体制度中任何正确的类型或适当的行为。它在社交礼仪领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也同样重要（Galloway 2004，7）。

^②例如，公路系统像任何由各种协议共同控制的系统一样，允许“在独立基础之上的相互依赖”（Stalder 2006，134）。被拒入境，或被排除在系统之外——比如被拒发司机驾照——代表了最严重的威胁。因此，不同于传统的监控了互动内容的命令—控制型等级制度，权力通过制定“契约规则”的协议在网络中运作。如同斯塔尔德（Felix Stalder）强调指出的，

这恰恰就是要点所在，我们可以确定借由压制的权力运作到借由排斥的权力运作的转变（Stalder 2006，135）。

度中。

排斥机制被完全置于如此有利的位置, 它在一个似乎处处以网络黏合的社会中承担着政治批判的主流职责; 在这个社会, 被不断变化的相似联系所连接变成了终极目标, 在这个社会中权力也从未被表明是存在于一个固定的“阶级”、个人或组织。^① 正如贝兰德 (Daniel Béland) 所阐释的:

……社会排斥建立在一个水平的、空间的隐喻之上, 而不是建立在一个主要关注收入不均的不平等的垂直模式之上。从社会排斥模式的角度来看, 人们更多地是在主流社会的“里面”或“外面”, 而不是阶级或收入分配结构的“上面”或“下面”。(Béland 2007, 127)

网络隐喻也是一个水平的、空间的隐喻。“世界是平的”(world is flat) 是因为它日益被连接成网络。这是网络隐喻与“排斥主题”之间同源性的根源所在 (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 347)。在法国学者博尔坦斯基 (Luc Boltanski) 与夏佩罗 (Ève Chiapello) 开创性的《新资本主义精神》(*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一书中, 他们有说服力地表明了“排斥主题”“清晰地建立在围绕网络隐喻构建的一种社会再现机制基础之上” (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 348):

^①对于权力发源于一种可辨中心观点的后马克思主义批判几乎成为了一种新的学术正统。当卡斯特将权力描述成在“流的空间”中运作时, 他正依赖和加强一种包括了福柯 (Foucault)、拉克劳 (Laclau)、墨菲 (Mouffe) 及其他有影响力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不同传统。从另一方面看, 我将会详细地讨论哈特与奈格里 (Hardt and Negri 2000, 2004, 2009) 的近期工作也依赖于这种传统。卡斯特、哈特与奈格里的贡献在于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分散的、去中心化的世界提供了这个完美隐喻, 因为“根据定义, 网络没有中心” (Castells 2000b, 15)。

在我们看来，随着联系主义者（connexionist）世界建立，依照网络而定义的社交世界（social world）概念快速扩散，这就有可能了解，最初与边缘群体命运相联系的排斥和容纳的动态是如何能够通过社会不幸再现和补救手段取代之前的指定社会阶级。（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 349）

因此，按照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的说法，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期间对网络不断增加的关注有利于将社会和政治辩论从阶级不平等和收入重新分配上转移开来。相反，个人或群体的相对成功变得取决于他们利用网络的能力：被判定对网络的“价值”。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导致排斥。如果简单性和一致性决定了一个论点的成功，那么这种容纳/排斥的二元模式无疑会在当下取胜。

关于“排斥”问题

尽管在我们这个“联系主义者”的世界里，排斥是一个有价值的批判目标，但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还是对大多数当代社会理论中对排斥主导性的、几乎是一门心思的关注提出了异议。^①因为他们认为“排斥”作为批判的中心点有很多不足。

首先，“排斥”以缺少某些东西、或者具有负面特征来给那些被排斥者下定义。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描述了关于排斥的论述是怎样作为一种讨论身体或精神残疾的边缘群体的方向，最初出现在 20 世

^①同样地，在本文中我并没有试图否定排斥的存在，只不过它已变得太过霸权（hegemonic）。因此，与墨菲（Raymond Murphy, 1985）所描述的他设法诉诸韦伯的（Weber's）社会排斥的闭合理论（social closure theory of exclusion）来克服后来成为批判主流声音的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局限相比，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理智时刻。

纪70年代的，但是此后却把那些被认为有社交障碍的“危险”人口也包括进来。^①对特定人口排斥的最常用解释是缺乏资格。

这恰好是贫穷与缺陷（fault）的关联——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贫穷与私人财产的关联。

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 354）指出，“这很容易转变为个人责任因素”。指责受害者是明显的退步，不管它以怎样的面目出现，“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概念被成功破坏了”。

社会阶级模式中对“无产阶级”贫穷的解释是以确认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为其“剥削”负责为基础的，排斥模式与社会阶级模式不同，它允许没有进行等级指控的某种消极认同。被排斥者不是某人的受害者，即使他们具有共同人性（或“共同公民资格”）的成员身份，应慎重考虑他们的苦难并给予援助。（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 347）

因此，“排斥”对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而言不是一个“谴责主题”，而是一个“情感主题”。将责任推卸给被压迫者的确削弱了批

^①在一篇名为《社会排斥探讨》（*The Social Exclusion Discourse*）的文章中，贝兰德记载了这个概念的法国起源。他写道：

早在1965年，社会评论家克兰佛（Jean Klanfer）就出版过一本书——《社会排斥：西方社会的边缘研究》（*Social exclusion: The study of marginality in western societies*）。在这本强调个人责任的道德书中，“社会排斥”一词指的是由于不负责任的行为而无法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成果的人（Béland 2007, 126）。

判的政治力量；批评者除了呼吁慷慨与同情之外，没有什么可以使用的武器进行斗争。^① 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排斥以“某人的不幸（需要抗争），而非一些人从对其他人的损害中获益的社会不对称结果”形式体现，因为“排斥不同于剥削，没有任何人获益”（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 354）。

最后，这个世界里的不公平被认为与系统排斥有关，再整合成为唯一救赎途径。如果说这是解决之道，那么我们如何评判透过将主体收编进剥削性网络或制度这一方式而产生的压迫？如同从马克思到福柯这些批判性思想者已经认识到的，权力的现代制度事实上是通过合并的方式来实现运作的。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的研究中得出了现代权力是生产性的（productive）结论，因为：

它的目的是加强社会力量——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传播教育和提高公共道德水准；使社会力量得到增强。^②
(Foucault 1991, 207)

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或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都将政治与经济融为一体——通过权力的组织而创造价值。当代任何试图修正权力理论的尝试都不应当忘记，价值的创造、抽取和

^①贝兰德写道：

社会排斥的主流政治讨论只不过是合法化了适度社会方案，该方案没有对寻求限制社会支出，同时鼓励公民变得日益依赖于市场收入（即“重新商品化”）的自由主义逻辑提出挑战（Béland 2007, 134）。

^②中文摘自〔法〕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39页。——译者注

循环在根本上是权力的一种运用和表现；它不仅为了出现而要求权力的不对称，也在此过程中生产新的权力关系。这在卡斯特的作品中并没有得到清楚论述，例如“排斥”在网络社会是如何作为运作权力的基本形式来增加经济生产力的。相反，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像马尔库塞（Marcuse）所说的：

被排斥者是否真的被排斥在系统之外，或者是否他们实际上对系统有用却简单地被排除在系统利益之外。（Marcuse 2002, 139）

“排斥主题”的所有缺陷都共有一个隐含的假设：世界是由一种内/外二元体（inside/outside binary）所组成。在这样的世界中，如果——

一边我们有非常繁荣富强的人民，而另一边是处在悲惨境地的平民百姓，但是他们之间却没有关联并彻底走向不同世界。（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 360）

传统的剥削批判就变得毫无意义。这能够真实描绘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网络思考者一心关注的排斥问题变得耐人寻味；“网络”不是共享的、普遍的理解世界的最卓越（par excellence）形式吗？“网络科学”不是一门“连接时代”（the connected age）的超级科学吗（Watts 2003）？这里我们得出一个看似矛盾的说法：网络隐喻假定了一个连接的、相关的世界，而同时却设想权力主要通过排斥和断裂来运作。

世所公认的局限召唤将“剥削主题”再次引入当代社会批判。

这绝不是开创性的认识。但是当它被认可的时候，我们常常面临以下两个选项其中之一。马克思主义学者所采取的最常见反应当属“意识形态批判”（ideologiekritik）：所有关于网络的话题都被视为是意识形态的，呼吁阶级和剥削分析的回归（Garnham 2004；卡利尼科斯 Callinicos 2006）。或者是，唯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马首是瞻，即我们总体上接受网络讨论并试图产生一个更加适合于我们这个“联系主义者”世界的剥削理论。

在下文中，我试图提供第三条途径，抛开脱离主题的、被隐匿在网络隐喻和叙事中的社会自我再现，而转向一个我认为指引网络理论家与马克思思考的共同的本体论框架。马克思显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下的“网络”理论家。但他关于资本作为一种联系和流动价值（value-in-motion）的论述与网络思考有密切联系。^①这不仅仅是巧合。在本文中我认为这种密切关系起源于一个共享的过程关系（process-relational）本体论。它有可能通过指出一个共同立场的起点重建马克思独特道路，这条道路吸收了概念化的“过程”和“关系”，相应地，就会理解这条道路不是引导我们走向容纳/排斥的死

^①基尔希（Scott Kirsch）与米切尔（Don Mitchell）进一步详细展开了马克思和网络理论之间的密切联系——尤其是网络行动者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当然，马克思并没有以网络语言写作。但他确在用网路（circuits）的语言写作，他极其详尽地表现了资本——作为流动价值——是如何在一套网路中行进的，比如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作场所的机器与楼房，再进一步转变为生产的商品。他表明了资本如何恰恰因为（because）是一种关系，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商品而变得或多或少地凝结延续其中，结果当商品在市场上被交换时，资本又重新回到资本家手中。商品通过技术及“物本身”（things as such）来“稳定”社会关系，商品循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网络。（Kirsch and Mitchell 2004, 696）

胡同，而是扩大的（writ large）剥削批判。^①

二、网络本体论

现在让我们先将网络隐喻抛在脑后，按照我们的思路来到本体论这个层面。一旦这么做了，我们就会很快意识到这个隐喻只不过是一种更加古老的哲学立场的当代代表性策略，这种哲学立场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之前（pre-Socratic）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这个我将称之为“过程关系本体论”的理论已经在网络分析中焕发新的生机。我将从阐释“过程”的含义开始论述。

^①尽管本文中我主要关注的是经济领域的剥削和排斥，但需要指明的重要一点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并不局限在这个领域。布坎南（Buchanan 1979, 122）认为马克思的著作包含了：

三种区别又相关的剥削概念：（a）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剥削概念，（b）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而且适用于所有阶级社会劳动过程的超越历史的剥削概念，以及（c）并不局限在劳动过程本身的一般性剥削概念。

马克思最全面的剥削概念出现在其早期著作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一书中，他描述了资产阶级人际关系观，即总体上（in general）将所有的人类关系都视作是剥削性的：

……所有……人们相互交往中的个体行为，例如演讲、爱情等，都（被资产阶级）描绘成效用与利用（utility and utilization）的关系。在这里效用关系有非常不寻常的含义，也就是说我通过损害他人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人剥削人 exploitation de l'homme par l'homme）……这些实际上都与资产阶级有关。出于其自身原因，对资产阶级而言只有一种关系是正当的——剥削关系；所有其他关系只有在资产阶级将其纳入剥削关系这一范畴内才拥有正当性，甚至遇到的关系并不能被直接纳入剥削关系，资产阶级也至少将它们纳入到想象中。这种使用的物质表现是金钱，金钱是所有事物、人与社会关系的价值体现。（Marx 1974, 110）

（一）过程

网络思想家强调过程。社会现实不仅由静态事物组成，还充满了行动、变化和流动。过程先于物质已经成为从赫拉克利特到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这些过程哲学家们的主要观点。

它是怎样与网络相关联的呢？网络是过程的动态（dynamic）模式。物理学家卡普拉（Fritjof Capra）是卡斯特在伯克利时的同事，他是一位对复杂性与自生论（complexity and autopoiesis）这门新科学孜孜不倦的普及者，这门新科学将网络置于过程的中心。卡普拉借鉴了智利生物学家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与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开创性的工作，他认为新生与重建的特征使生活成为一个动态过程而非静态系统。

活着的网络通过转变或更换要素，持续不断地创造，或重建自己。如此一来，它们在保存了其网状（web-like）组织模式的同时，也经受不断的结构变化。（Capra 2004，10）

因此，网络不是由个体要素（例如相反的基因蓝图观点）来决定的，网络也不具有静态和稳定的组织关系特征。相反，它是整体的互动过程（process），通过与周围环境变化互动持续不断产生一种具有突现属性（emergent properties）的存在，这可以阻止网络走向衰败。

一次性互动也不是网络的特点，相反，其特点是——随着时间推移，持久的、循环往复的以及重建的互动模式。于是对过程的关注必然引发我们对时间性（temporality）重要性的关注。从过程的角度来看：

我们如何使自己作为存在, 正是在于我们如何让自己存在于时间中, 在于我们如何成为时间, 以及时间如何成为我们。(Pomeroy 2004, 108)

存在即 (is) 时间是因为存在总在变化形成。

事实上, 许多网络理论家常常滑回到实体论 (substantialism)。似乎伴随每一次网络讨论的无所不在的网络图表, 往往将空间性凌驾于时间性和叙事实现之上。然而, 就像埃米尔贝尔 (Mustafa Emirbayer 1997) 所指出的, 这归咎于日常想法模式中的实体论霸权主义, 西方语言完全的嵌入性迫使我们将过程降低为静态条件。^① 但是需要记住, 网络思想 (若非总是其再现) 将网络设想为始终在形成的过程中, 这一点很重要。

(二) 关系

荷兰网络理论家范戴克 (Jan van Dijk) 写道, 关系是“网络视角关注的主要焦点” (van Dijk 2006, 25)。^② 关系被认为是任何网络

^①我们只能通过为一样事物加上动词来表示其变化。埃米尔贝尔援引了埃利亚斯 (Norbert Elias) 的话来举例说明:

我们说“风在吹”, 似乎风就是一样静止不动的东西, 而在一个给定的时间点上才开始移动和吹动。(Emirbayer 1997, 283 引用自 Elias 1978, 111f.)

^②然而众所周知卡斯特没有为他使用的概念提供清晰定义——反而宁愿通过其使用让定义自然浮现——冉·范戴克在其书《网络社会》(The Network Society) 中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网络定义。

网络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单位组成要素间的联系集合体 (a collection of links between elements of a unit)。这些要素被称为节点。单位通常被称为系统。最少需要三个要素, 最少要有两个联系。两个要素的单一联系被称为一种关系。(van Dijk 2006, 24)

所固有的最基础形式，每当两种或更多连接的关系出现时，一个网络才可以说是存在的。

网络思想家认为我们可以透过嵌入的关系更多了解某人或某物，这与通过审视行动者生活在怎样制度与结构之下，或通过行动者所拥有的个人品质和特征试图来理解他们不同。这个观点是以一种将世界视作由形式而非内容构成的本体论为基础的。关系本体论假设实体之间（between）的关系在本质上比实体本身更加重要（Wildman 2010）。费利克斯·斯塔尔德指出，在任何网络中：

认为节点先出现、然后它们开始创造联系的观点是说不通的。反而是节点通过联系互相创造和规定。联系创造了节点，同时没有节点也不可能有联系。（Stalder 2006, 177）

根据网络思想家对关系之于节点相对重要性的不同构想，可以划分出不同研究途径。范戴克采用了一种他称之为“适度网络途径（moderate network approach）”，不仅强调关系，也“关注网络（人、团体、组织、社会）中相关联的单位（节点）特征”（van Dijk 2006）。其他网络理论家将关系本体论这种逻辑方式推向极端，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本质（单位或节点）。网络行动者理论家拉图尔（Bruno Latour）和罗（John Law）称他们的途径为“激进关系论”（radical relationality）。其原则是：

任何进入关系的东西本身都没有固定意义或属性。相反地，系统中任何特定要素的属性、网络中的任何特定节点，都完全由系统中其他有关要素、网络中的其他节点来

规定。(Law 2003, 4)^①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接纳被所有网络理论家共同认定的中心论点而走向极端；该论点即“所有实体……都通过与其他实体的联系而获得意义”(Law 2003, 4)。

最后，过程与关系应当被看作是唇齿相依的，因为：

被过程的运行所驱动的世界必定是一个相关联的世界。事实上，行进的运动本身就是关系性的自生 (self-generation)。(Pomeroy 2004, 143)

如同我将在下面部分所阐释的，过程关系角度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其剥削理论的关键。

三、马克思的过程关系本体论

马克思如何也是一位过程关系思想家？马克思的过程关系本体论怎样不同于例如曼纽尔·卡斯特这些网络理论家的观点？在下文论述中，我将通过阐释马克思如何通过他的“生产”范畴来物化过程哲学以及马克思如何不仅强调关系，而且强调内在 (internal) 关系来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最后，我会详细说明“矛盾”在引发马克思本体论动态性质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以及源自这样一个本体论的剥削理论如何对当代信息资本主义中的批判力量有重大意义。

^①正如首先由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提出的观点，所有单词只有在与其他单词并置时才能获得意义——例如父亲与儿子、白天与夜晚等——激进关系论超越了语言，将这种观点延伸至所有事物和存在。

（一）物化过程

就像奥尔曼（Bertell Ollman）所认为的，马克思在他的作品中一贯将运动的位置置于稳定之上：

由于稳定一向限制变化而不是相反，马克思——不同于大多数现代社会科学家——没有也无法研究事物变化之因（隐含之意是变化只是外在于事物本身，是某种碰巧发生在它们身上的某物）。考虑到变化总是事物本身的一个部分，他的研究题目就可能只是如何（how）、何时（when）、会变成什么样（into what）以及为什么有时候它们看上去并非事情本身（意识形态的）。（Ollman 2003，66）

但是，尽管马克思与网络理论家有着同样的偏爱，过程却仍然在其作品中呈现出了一种完全崭新的意义。就像哲学家波默罗伊（Anne Fairchild Pomeroy）所说的，这是因为马克思通过他的“生产”基本范畴将过程物化了。^①波默罗伊将马克思与过程关系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相比较，阐释了在马克思那里的“生产”范畴如何与怀特海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中的“过程”

^①过程是一个时间性概念，因此它有助于对马克思的时间理论做一简单概述。马克思不同意康德（Kant）的观点，马克思认为时间不是一个先于观念的形式，也不是纯粹被置于集体主体性（collective subjectivity）之外的客观序列（牛顿的观点。——译者注）。相反，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时间意识（time-consciousness）正是产生于对象化世界的劳动行为。这是因为真正新奇的产生只能通过劳动行为（生产）。海德格尔（Heidegger）假定“存在”（Being）的活动是时间性的来源，马克思却将这种活动（劳动）看作是和时间引入物（客体、制度等）。相应地，劳动的“对象化”（objectified）形式引入了客观的时间（更多详细解释参见 Gould 1978，56—68）。

范畴“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t）的（Pomeroy 2004，44）。^①对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含义的简略回顾有助于说明“生产”是怎样预示了他的过程关系本体论的。

对马克思而言，“生产”作为必要的抽象概念，是个极度复杂的术语。就像对怀特海来说，“过程”作用于分析的多个层面，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也在从最抽象、最概括到最具体和最明确的很多层面上产生作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生产”这样起作用：

（1）在所有生产的一般条件层面上作为人类生活与自然之间的交换（interchange），实际上两者具有同一性（identity）；（2）在许多生产的历史形式层面上：公社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3）在每个历史形式中生产的不同分支层面上，以及（4）在“积极参与更大的或更分散的生产分支整体”的社会主体行为层面上。（Pomeroy 2004，46 引用自 Marx 1973，86）

首先确定生产的最一般特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没有一般特征，生产的具体方式就将不可想象”（Marx 1973，85）。

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将生产看作为一个时间的过程。生产包含了三种分析上既区别又统一的阶段：挪用（appropriation）（对社会—自然世界的），生产活动（productive activity）（通过主体及主体

^①可以总结几点波默罗伊关于“生产”与“过程”等同性的观点如下。首先，“马克思与怀特海都用他们各自的术语既指涉所有生产过程活动的总体抽象特征，又指涉这些活动任何特定的具体实例或时刻。”其次，“生产和过程不仅指涉而且也有助于解释时间世界或历史世界是不断发生的运动……”。最后，“过程与生产都受到社会性相关个体的影响……”（Pomeroy 2004，60）。

本身创造性的再创造)以及对象化(objectification)(对一个新奇的相关存在或对象)。不论一个人是否在建造房屋或在看杂志,这个人始终在进行这种生产过程。重要的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主体也通过这种活动、被这种活动改变了。

生产活动不仅在自然界中生产“物”(things)或客体,也使主体行为形式本身对象化了。它是一种特定的个体生产。(Pomeroy 2004, 54)

就如马克思在《资本论》(*Capital*)中所描述的,“他作用于外部自然并改变它,他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改变其自身的本质”(Marx 1990, 283)。因此,“过程性或生产性的个体就是其所为(is what it does)”(Pomeroy 2004, 70)。这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清楚阐释,生产方式:

……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①(Marx and Engels 1974, 42)

虽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区分了生产、分配与消费,但马克思认为所有这些只是生产过程中的具体阶段而已。尽管显然并不相同,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译者注

他们却在一个统一体中区别于彼此。他们都有助于推动生产过程前进。当我“消费”一餐饭的时候，我也在“生产”我这个存在。

作为一个环节的消费、作为一个环节的生产都是为了运动本身和过程本身才发生。(Pomeroy 2004, 53)

作为过程的生产也必定是作为关系的生产。就像波默罗伊表述的，“过程运动本身是关系性的自生” (Pomeroy 2004, 143)。因此，站在生产过程中心的不是独立的、隔离的生产者——像资产阶级思想家在《鲁滨逊漂流记》(*the Robinson Crusoe*) 中塑造的角色——而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个体，或是如古尔德 (Carol Gould 1978) 表述的，“关系中的个体” (individuals-in-relations)。

社会 (social) 特征是整个运动的总体特征：正如 (just as) 社会本身生产人成其为人 (man as man)，于是社会也被人生产 (produced) 出来。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存在方式 (mode of existence) 上，活动和消费都是社会的 (social)：社会 (social) 活动和社会 (social) 消费。(Marx 1988, 104)

因此，对马克思而言，每个人都是他或她所为，并且他或她所为不断成为产品。当我们生产某样新东西的时候，也在连续不断地再生产我们自己。

之前我描述过网络思想家是如何将新生与重建 (renewal and recreation) 的过程看作为网络能够维持它们自身至关重要的因素。除了“关系中的个体”与被生产为存在的客观世界，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发挥了几乎一样的功用。在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

中，生产的核心从关系中的个体转变为网络知识（knowledge-in-networks）。因为对卡斯特来说，网络社会中生产力的主要来源不是知识工作者，而是知识本身。这种被网络理论家自然化（naturalize）知识的倾向是一种赋予生产要素以固有价值素质的经济思想长期趋势的延续。马克思在他的那个时代猛烈批评了此谬论，他无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知识或信息——

并不天然存在价值，但需要一次意义深远的社会整合使它成为某种有价值的物（Jessop 2003, 2 引自 Schiller 1988, 32）。

网络途径并不一定排斥过程的物质观。哈特与奈格里（Hardt and Negri 2000, 2004, 2009）和卡斯特一样，设想网络是当代社会权力使用的主导形式。不同于卡斯特和其他多数网络理论家，哈特与奈格里认为权力通过容纳（inclusion）的过程来运作。他们称之为“帝国（Empire）”的资本逻辑被认为：

是一个普遍的共和国（universal republic），是构建于无边界、容纳性建筑中的由权力和反制权力（counterpowers）组成的网络（Hardt and Negri 2000, 166）。^①

哈特与奈格里认为此逻辑使持续运动和向外扩张成为必要。作为对马克思的回应，哈特与奈格里写道：

^①中文摘自〔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著，杨建国、范一亭译：《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8页。——译者注

资本主义市场是一部反对建立内外之分的机器。当它遇到壁垒和排斥时，它的发展就受到阻挠；相反，当它纳入越来越广大的空间时，它就兴旺发达。^① (Hardt and Negri 2000, 190)

哈特与奈格里通过对纳入的关注，得以更好地将权力想象成是生产性的。

谁是这种“帝国”力求纳入的生产之源？在哈特与奈格里的斯宾诺莎影响下的语言 (Spinoza-influenced language) 中，这个根源就是“大众” (multitude)。大众是一个包括了所有那些为生产“公共体” (the common) 而劳动、超越了雇佣劳动者 (wage-labourer) 的阶级概念。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哈特与奈格里重新评估了剥削，认为剥削与公共体的征用 (expropriation) 有关。我们可以将此视为“网络剥削” (network exploitation)，通过网络剥削，由大众网络活动生产的公共体同时被帝国剥削了。因此资本取决于大众的生产。

哈特与奈格里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将人力 (human agency) 理解为过剩生产力：作为生产过程的生活。这代表了超越网络理论的一种前进，网络理论仅仅将权力看作是通过排斥而起作用。正如本文前面所讨论的，排斥主题趋向于关注有缺陷的人或残疾人，这是一种宽泛解释。例如被排斥者是那些缺乏适当教育条件的人。因此缺乏 (lack) 引发了排斥。另一方面剥削是一个过量的 (excess) 问题。“剥削” 将被剥削者规定为那些拥有 (have) 某些东西的人，那么为何他们会被其他人剥削？按照哈特与奈格里 (2004, 333) 在《大众》 (*Multitude*) 中所写到的：

^①中文摘自〔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著，杨建国、范一亭译：《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译者注

“被压迫者”（或被排斥者）可以由边缘的和无权力的民众命名，但是“被剥削者”必定是一个中心的、生产性的和强大的主体。

通过从排斥到容纳这个批判焦点的转换，哈特与奈格里能够更好地处理包括当代剥削过程在内的更加复杂的权力方式。与此同时他们对网络隐喻的坚持仍然会引发一些问题，对此我随后会更详细地表述。首先，让我们进入这样一个讨论，即马克思的过程关系本体论是怎样以其内在关系的理解为特征的。

（二）内在关系（Internal Relations）

在埃米尔贝尔（Emirbayer 1997, 290）被广泛引用的“关系社会学宣言”（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中，他将马克思形容为一位“深刻的关系思想家”，马克思的关系本体论通过他的——

异化（alienation）分析……他的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论述，他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中内在关系的敏锐洞察，以及确切来说他对资本/雇佣劳动者关系本身的理解——

展示出来。有人说“也许没有哪个单词比关系（Verhältnis/relation）一词更频繁地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了”（Ollman 2003, 73）。^①

^①但是奥尔曼（Ollman 2003, 73）也承认，非德语（non-German-language）读者对被关系者（Verhältnis）在马克思思想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是有些缺少了解的，这是由于翻译经常用“条件”、“系统”和“结构”替代“关系”。

但是仅仅告诉我们马克思是一位关系思想家还不够。这个问题应换一个问法，马克思是哪一种关系思想家？

马克思的关系性产生自一种内在关系哲学——奥尔曼认为是“他的整个辩证法（dialectical method）中备受忽视的基础”（Ollman 2003, 116）。当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灵感的时候，作为斯宾诺莎思想核心原则重现于现代的内在关系哲学则可追根溯源至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

所有关系都是内在的说法暗示了每样事物都与其他事物有某种尽管遥远的关系，并且这些关系都是必要的（necessary）。说其必要是指它们对被关系者（relata）的特征是必不可少的。

内在关系是那样一些关系，即个体在其中被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改变，就是说，这些个体间的关系都会被关系互相影响。（Gould 1978, 37）

反之，外部关系有助于连接被关系者，但是：

每个被关系者（relatum）都被看作是一个单独的自我存在实体，它脱离关系存在，并在其本质或构成上显得完全没有变化。（Gould 1978, 38）

当我们审视卡斯特的网络社会命题时，区分由内在（internal）关系构成的关系性和外部（external）关系组成的关系性是重要的，这一点日益明确。卡斯特区分了“生产方式”（modes of production）与“发展方式”（modes of development），这使他得以设想一个新奇

社会形式的出现——一个“网络社会”。^①据卡斯特所言，现在的生产方式依然是资本主义的，但伴随出现了一种新的激发其生产力的发展方式：“信息主义”（informationalism）。^②但是，卡斯特并不足以将这种发展方式固定在生产方式内。“信息主义”看起来只是起到了一种外部因果力量（external causal force）的作用。就像前面已经提到的，作为一个隐藏了被生产条件的生产因素，知识或信息被自然化了（像是土地、资本或劳动）。因此价值被错误地归因于进入（brought into）生产过程的物天生具有的素质，而不是归因于产生于（out of）特定社会关系的过程。

这个问题就像韦恩（Wayne）意识到的那样：

我们怎样在（within）一种以不断变化的技术力量和社会关系为取向的生产方式里评估连续性和差异性？（Wayne 2004, 141）

如同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中所写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法理解驱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联系。相反，这种发展被归因于“外部的和似乎偶然发生的情况”（Wayne 2004, 139 引用自 Marx 1972, 106）。这恰好是卡斯特的分析所存在的问题。

^①据卡斯特所说，生产方式的特征表现为“占用与控制剩余的结构原则”（Castells, 2000a, 16）。“网络社会”仍然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上，不管怎样，给予网络社会界定性征的因果力量是其具体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以激发其生产力的主要来源或“要素”为特征。

^②工业发展方式是以新能源的引进及使用为基础的，现今“信息发展模式（informational mode of development）”将其生产力来源锁定在“产生知识、信息处理与象征沟通的技术”上。卡斯特承认知识与信息对历史上所有发展方式都很关键，然而他认为，信息发展方式的特殊之处在于“针对知识本身的知识行动就是生产力的主要来源”。

对卡斯特而言, 网络关系是外部的。网络社会是新社会形态的出现, 它由先于被关系者 (relata) 存在的新 (技术) 关系发展引起。^① 卡斯特谨慎承认了技术并没有导致 (cause) 向网络社会的转变, 但他坚持认为它是“不可或缺的中间物 (medium)” (Castells 2000b, 14)。换句话说, 卡斯特认为 (技术上的) 网络提供了个体被带入关系的手段。

很多关于卡斯特这个方面理论的评论都围绕着技术决定论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的指责 (Webster 1995; van Dijk 1999)。但是, 我宁愿认为任何这样的决定论是一种对本体论的外部 (external) 而非内在 (internal) 关系的集中关注所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说, 就这一点而言, 技术决定论或者任何形式的决定论不过是一种围绕外部关系构造的哲学症状。

哈特与奈格里对网络隐喻的使用不同于卡斯特, 它也提供了一种产生于外部关系的决定论形式。作为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 (autonomist Marxists), 哈特与奈格里认为资本依赖于大众生产力。实际上, 劳工是资本试图驯化的积极主体代表了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最具创新性的一个观点。它颠覆了旧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 即资本按照某种自动的、独立的 (self-contained) 逻辑来呈现。但这仅仅是单方面的。

问题是当哈特与奈格里将生产作为资本赖以生存的网络过程来强调时, “大众” 和 “帝国” ——并没有内在地 (internally) 相关联。大众被认为是脱离于帝国而自治的 (autonomous)。哈特与奈格里 (Hardt and Negri 2004, 225) 坚持认为大众不应当被看作帝国的“辩证支持” (dialectical support)。

^①这一点在丹·范戴克的著作中甚至更加明显, 他提出在网络社会中“基础单位包括了日益被社会和媒介网络所联结 (increasingly linked by social and media networks) 的个体、家庭、群体和组织” (van Dijk 2006, 28)。

帝国与大众不是对称的。然而帝国不断依赖于大众和其社会生产力，大众则潜在地自治并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创造社会（Castells 2000b, 14）。

因此，可以说网络技术对应了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网络斗争对应了哈特与奈格里的“共同体”（commonwealth）。就他们孤立了一种单一外部因果力量的角度而言，卡斯特与哈特和奈格里的理论都被认为是本质主义（essentialist）。

这并不是说网络技术的影响或斗争的网络形式是错误的解释。与其说本质主义解释是错误的，不如说是片面的。就像雷斯尼克（Resnick）与沃尔夫（Wolff）所表述的：

……每个本质主义环节（essentialist moment）都被认为是真实的——它说明了一种联系——错误的是——它遮蔽了其他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倘若考虑到这些被遮蔽的联系，所有先前复杂联系的真假就会显现出来。（Resnick and Wolff 2006, 83）

换句话说，技术决定论与所谓的“阶级斗争决定论”（class struggle determinism）都是片面的解释，或者用马克思的术语，是“抽象概念”（abstractions）。按照古尔德所说：

从马克思的角度出发，外部关系仅仅是一种现象，它是内在关系产生于单方面或抽象观点的方式。（Gould 1978, 38）

内在关系理论对马克思意味着“确切地说，互动是内在行动（inneraction）（它是他在研究中声称的‘内部的联系’）”（Ollman 2003, 27）。对马克思而言，这意味着关系性已始终在那儿。它不需要网络技术来使它存在。对这种技术来说，关系性是一种优先存在的可能性条件（condition of possibility）。虽然网络技术的蔓延有助于增强和突出这种固有的关系性，却不会发明它。例如，脸书（Facebook）是一种俘获内在于人类关系性中连接渴望与实践的巧妙方式。然而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没有发明社交网络；他仅仅在一个领域中组织了社交活动（sociability）。

这种陈述当然不是说网络技术和新的网络组织形式对社会发展毫无影响。它们当然有影响。但是这些技术和组织形式并不是来自外部空间。它们从内部产生，从内在社会关系中具体化和抽象化。细想一下金钱，它是最强大和无处不在的网络“技术”。乍看起来它好像是一种影响和扭曲几乎全部生活领域的外部关系。然而马克思将金钱看作为是一种的内在关系抽象。这在《资本论》卷一最后一章中得到非常有力（与幽默）的说明：“现代殖民理论”（The Modern Theory of Colonization）。马克思讲述了英国政治家韦克菲尔德（E. G. Wakefield）在殖民地发现资本主义关系事实的故事——如果没有工资劳动者购买，金钱就没有意义：

一位皮尔先生抱怨说，他带了总计5万英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到澳大利亚西部斯旺河地区（Swan River）。此外这位皮尔先生甚至很有远见地带来了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旦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就被工人们遗弃了，连一个替他整理床铺到河里边打水的仆人都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什么都预见到了，除了将英国生产关系出口到斯旺河！（Marx 1990, 932f.）

在这里马克思用事实证明了其鼎鼎大名的观点“资本不是一个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Marx 1990, 932f.）。剥削就是在资本主义之下形容这种关系的术语。

剥削对马克思而言是一个必要的（necessarily）关系概念。它只能产生于内在关系的哲学中。在剥削者需要被剥削者来生产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的同时，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被剥削者为了出卖他们的劳动力（labour power）也需要剥削者——为了生存。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不仅仅是这样一种观察，即特定个体或群体的成功与对于其他人的剥夺具有因果关系。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从社会中一个特定阶级的存在（existence）取决于另一个阶级的存在（existence）这种观察开始的。事实上，就像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辩证法（master/slave dialectic）中有两种理想范畴一样，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为了保持其身份（identity）而彼此需要。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剥削理论预先假定了由内在关系组成、必须共享的世界存在。

当诸如卡斯特一类的网络理论家承认剥削存在时，他们就将剥削理解为了外部（external）关系——一个事件而非一个过程——这种预示的实体或被关系者互相作用。这种事件在特定的时空里比其他时空中更频繁发生，但剥削不被认为对被关系者的存在是必要的。

无论如何，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论述是不够的。不讨论“矛盾”（contradiction）的重要性，马克思的过程关系本体论与产生于此的剥削理论就无法被理解。我们将转向“矛盾”这个概念。

（三）矛盾

矛盾使人们得以理解变化如何（how）发生、为何（why）发生。当然，矛盾在一个系统内描述了两种同时彼此依赖和否定的结构性原则的存在。人们普遍公认资本主义是由矛盾及其应对矛盾的

相对成功与失败来阐明的。^① 矛盾也是统一马克思过程和内在关系理解的原则，就像过程是通过内在的矛盾（contradictory）关系激发的。

矛盾对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及其剥削理论的重要性或许通过与卡斯特路径的对比来解释最合适。卡斯特提出的权力模式极度轻视（minimize）矛盾的价值。就像韦恩（Mike Wayne）指出的，卡斯特的展方式有时甚至“听起来让人怀疑像是一种超越了资本主义对抗性矛盾的新的生产方式”（Wayne 2004, 142）。通过引入一种展方式/生产方式二元性（duality），卡斯特淡化了所有在特定阶级关系内部的知识起源。相应地这也扁平化了存在于马克思生产方式论点中的辩证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要知道权力对卡斯特而言，是通过定义中不包含中心的“流的空间”来循环的。相反，它通过容纳和排斥来运作；吸收有价值的并抛弃掉所有其他的。卡斯特并没有回避批判产生于这种权力解释的非正义，比如上述的“黑洞”。但是这种批判不论怎样吸引人，也仅仅提供了描述（description）而不是解释（explanation）。安吉利斯（Massimo de Angelis）很好地抓住了这个问题：

当我们把权力理解为一个流的时候，不管这个隐喻可能如何有见地，在我们按照社会关系的流动及其运作方式（mode）提出这种“流”之前，权力仍然为一种物（一种

^①杰索普（Bob Jessop 2001, 4）描述了资本主义中一些主要的矛盾：

例如，商品同时具有交换价值（exchange-value）和使用价值（use-value）；工人既是一个抽象劳动力个体，可被其他这种个体（或者，实际上是其他生产要素）替代，又是一个有特定技能、知识和创造力的具体个体；工资既是生产成本，又是需求来源；金钱同时作为国际货币和国内货币起作用；生产成本既是运动中的抽象价值（尤其在可用作再次投资的已实现的利润形式中），也是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的储存，被定价过程中的特定资产，等等。

流动的物，但仍是一种物），因为作为一种关系（relation）的权力运用是怎样使其运动变化并没有被解释。因此，就跨国利率差别（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s）而言，我可以将资本流理解为一种物，但是在我将这种运动与两个国家的生活如何凭借（by virtue）这种资本运动或这种运动的威胁系统地相互竞争这个广泛问题相关联之前，在我理解并问题化这个基本原理（rationale）之前，我的权力概念从极端替代方案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无用的。（de Angelis 2007, 172）

不论卡斯特围绕网络建构的社会变迁理论如何高度精妙与细致，其核心仍然建立在一种传统的因果链描述之上。这种社会变化的解释就是黑格尔所指的“坏无限”（bad infinity）：无穷尽的连续原因产生于由先前结果导致的结果，永远不会得出一个怎样（how）或为何（why）的解释（Rees 1998, 7）。

就像早前讨论到的，这是将“原因”理解为系统的某种外部（external）关系而非内部（internal）关系倾向的结果。如奥尔曼（Ollman 2003, 18）写道：

然而非辩证思想家……被卷入了对“外部鼓动者”（outside agitator）、对来自所审查问题以外某物或某人的无休止寻找，它是无论发生任何变化的原因，辩证思想家则将所有变化的主要责任归于系统内部矛盾或产生矛盾的系统。

黑格尔的辩证哲学遗产清楚地将马克思的过程关系本体论与那些诸如卡斯特的网络理论家的理论区别开来。因为马克思通过剥削

关系能够物化黑格尔矛盾的唯心概念。在资本主义中，剥削同时是矛盾的中心来源和表现，就像——

劳动者既是一个劳动力的抽象单位……又是一个具有特定技能、知识和创造力的具体个体。(Jessop 2003, 4)

但是矛盾不应当被理解为能以一个可预见的目的论方式 (teleological fashion) 自行解决。矛盾必定暗示了“多元决定 (overdetermination)”，意思是：

一个个体、一个事件、一场社会运动等等——由它们所产生于的社会和自然整体的所有其他方面所构成。(Resnick and Wolff 2006, 80)

每个实体、历史的每个方面都是矛盾的，因为它不断被其所有多元决定因素往多个不同方向推或拉。事实上历史可以被视为“一个多元决定的密集网络”，或者用阿尔都塞的名言说，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 (Resnick and Wolff 2006, 80)。

雷斯尼克和沃尔夫 (Resnick and Wolff 2006) 发展了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概念来突出矛盾在马克思过程本体论中的作用。

任何存在的矛盾性 (contradictoriness) 都会推动它发生变化 (例如使每个存在成为一个过程)，从而这改变了矛盾性是怎样多元决定了所有存在的 (Resnick and Wolff 2006, 80)。

因此马克思概念化的过程通过内在关系之中和之间的固有矛盾

获得了活力。我们只有将“原因”和“结果”这类用语抛在脑后，才能进入“多元决定组成的逻辑”（Resnick and Wolff 2006, 80）。

哈特与奈格里通过他们调用网络隐喻来描述了“大众”和“帝国”的构成，他们尤其确认了“信息网络加剧了集体生产和个体商品挪用之间的资本主义矛盾”（Fuchs and Zimmerman 2009, 107）。实际上这种矛盾形成了“大众”与“帝国”间对抗关系的核心。但是尽管这可能是信息资本主义核心的一个中心矛盾，它还是可以被看作为一个“欠定的”（underdetermined）矛盾。这是因为哈特与奈格里在资本被理解为“帝国”，且劳动被理解为“大众”的范围内，未能拷问复杂的阶级动力和矛盾。当批评家指出哈特与奈格里作品中有主观主义和过分乐观的色彩时，他们确实指出了多元决定存在缺失。

当然，就像我在整篇文章中一直重复的，资本是一种经由剥削来“预先假定和再现资本与雇佣劳动相互依存”的关系（Callinicos 2006, 200f.）。但是，正如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所指出的：

资本关系也必定包括了“许多资本”（many capitals），因为通过竞争公司的竞争性斗争，资本主义方式的独特趋势变得有效。（Callinicos 2006, 201）

跟随布伦纳（Robert Brenner）的观点，卡利尼科斯认为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为由两种矛盾关系构成：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垂直关系”（vertical relationship）以及“许多资本”间的“水平关系”（horizontal relationship）。

指出这一点有助于将矛盾再次引入“帝国”的扁平范畴。对于“大众”也必须这么做。例如，如同福克斯和齐默尔曼（Fuchs and Zimmerman 2009, 93）提醒我们的那样，被剥削的大众“是由剥削

阶级和被剥削阶级, 以及阶级碎片 (class fractions) 对抗性地构成”。对生产的多种跨国网络与组成“大众”的“矛盾的阶级位置” (contradictory class positions) (Wright 1985) 作出说明是必需的。^① 通过忽视在 (within) 大众内部运作的剥削关系, 网络隐喻的扁平化骗局会再一次施展魔法。

透过哈维 (David Harvey) 用来解释马克思辩证法的图表, 可以看到一个更好的、更加“多元决定的”路径 (见图 1)。哈维图中的每个“中心” (hubs) 都作为社会变化中的决定性力量可以单独存在, 但是为了全面了解情况, 所有都必须在一个“生态整体” (ecological totality) 内被作为动态环节 (dynamic moments) 来考虑——关系地、辩证地 (Harvey 2010, 196)。这个解释的过程是持续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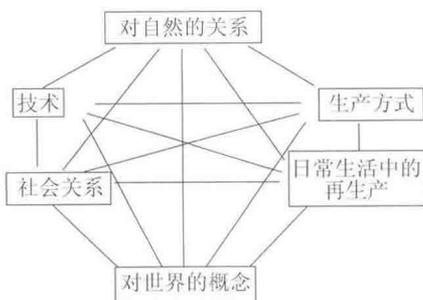


图 1 (Harvey 2010, 195)

^①当然, 地位不同的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不一定会引起分裂和对抗。然而统一体也不是自动形成的。它必须付出努力。例如, 在麦克彻与莫斯科 (Catherine McKercher and Vincent Mosco)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会运动 (trade union movement) 趋势的研究中, 他们这样描述:

小规模的和关注点狭隘的 (narrowly-focused) 工会的联合会导致更大、更加多样化的组织, 不仅在一个特定行业, 甚至在一个单一的产业内代表工人, 而且在一个广泛的经济领域中, 诸如融合传播、文化及信息领域代表工人。(McKercher and Mosco 2010, 3)

的；没有完结、终止或最终目的地。

认识了所有内在关系是矛盾的、相应也是多元决定的，最后我们来看看马克思的过程关系本体论是如何取得其动态形式的。反过来，这样一种过程关系路径赋予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以生机，使我们得以理解它的当代意义。

四、全球信息资本主义与剥削

到这里我们的讨论已经关注了对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的阐释，以及为何它引导我们走向一条剥削批判的道路，而不是走向容纳/排斥死胡同的问题。我们得以理解此问题是因为我们把马克思本体论中的矛盾角色、内在关系和生产看作是过程的物化。

在本文余下的有限空间中，我会简要论及（我称之为）信息资本主义下剥削的强化（intensification）与扩大（extensification）。我这么做是希望清楚说明来自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的剥削理论非常适合于处理关于现代传播与媒介研究的议题。

（一）强化

马克思剥削概念的“官方”版本——来源于《资本论》卷1——是指劳动力的不等交换。剥削包含工人对加诸于他的/她的创造力之上控制的屈服，资本家为了攫取被生产出的剩余价值而购买得到特定时段的权利。^① 马克思的著名论断“环节（moment）是利

^①生命活动的任何假定延伸既包括再生产时间，也包括生产时间，“模式再现（reenactment）时间与超越了仅仅是物理繁殖的创造性时间”（Pomeroy 2004, 112）。在工人出卖其劳动力给资本家期间，“再生产的”与“生产的”时间通过马克思的必要劳动时间（工人需要生产出与他或她得到工资同等价值的工作时间），以及剩余劳动时间（超出了这种工作时间的部分）范畴来表现。就像波默罗依简要表述的那样，“资本家为再生产付钱，及获得生产利润”（Pomeroy 2004, 100）。

润要素”对于理解和批判所有有偿劳动（包括传播和媒介领域的劳动）的剥削依然重要。近期传播工业中关于劳动的学术批评详尽地证明了这一点（Mosco and McKercher 2008；Ross 2009；McKercher, Mosco and Huws 2010）。尤其是媒介工业中许多工作的感知魅力（perceived glamour）和吸引力（desirability）常容许雇主采取 19 世纪水平的“绝对剥削”（absolute exploitation）。例如，戴尔-威瑟福特（Dyer-Witheford）与普特尔（de Peuter 2006）开展的电子游戏工业调查揭露了存在的过度工作的程度；每周工作 85 小时，一周工作 7 天，没有加班费或休假形式的补偿，这些都被视为惯例。

然而，假设马克思意义上的剥削只限制在工厂内发生，这种想法并不正确。以前面讨论的马克思的生产范畴为基础，不难想象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个更加一般的概念，一个超越了特殊生产过程的概念（Buchanan 1979）。要记得马克思认为我们全体（all）每时每刻（all the time）都在生产。因此生产是生活的基本过程。^① 生产“不仅为主体创造一个客体，而且也为客体创造了一个主体”（Marx 1973, 92）。在资本主义中，这种循环的、连续的生产过程与转变使用价值为交换价值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过程相交。通常这发生于雇佣劳动关系下，就像常常发生于马克思所称的“实际吸纳（real subsumption）”之外。考虑到在现代资本主义，尤其是因特网背景下对知识和信息的日益依赖、商品化以及控制，这似乎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这种趋势加剧了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矛盾：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之间的

^①马克思关于生产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在论证上并不自洽，因为“生产”这个术语意味着终结，无法代表网络世界中不间断的创造过程，因此应当被诸如“造用”（produsage）这样的术语取代（Bruns 2008）。

矛盾。^① 就像福克斯与齐默尔曼所解释的：

……知识不仅在企业中以知识商品的形式被生产，而且在日常生活中由例如教育孩子的父母、参与日常政治的公民、生产社会意义的媒介消费者来生产，他们由此成为产消者（prosumers），Myspace、YouTube 和 Facebook 等的使用者生产被资本挪用的信息内容，广播听众和电视观众为了与演播室嘉宾讨论及传达观点在直播中打进现场电话，这些谈话和观点在实时（real-time）经济中被瞬间商品化，等等。因此，知识生产是一个社会的、普遍的过程，但是知识被资本挪用，通过这种挪用，知识生产者变得就好像是传统工业劳动的一个被剥削阶级。（Fuchs and Zimmerman 2009, 95）

遵循这一论点需要废除在工作与休闲之间、在生产与再生产之间作任何有意图的区分。事实上，就如亨宁格（Max Henninger）所说的“生活时间和生产时间完全重合”（Henninger 2007, 170）。虽然这是一个激进的论断，但它对于记得斯迈思（Dallas Smythe）的“受众商品”（audience commodity）论题的媒介研究学者们来说并不是完全崭新的。斯迈思的论点为说明马克思的剥削过程关系本体论如何可以被延伸至现代传播领域提供了一个好例子。如同文森特·莫斯可阐释的，对斯迈思而言，媒介商品化过程：

……这个过程形成三位一体，它把媒介、受众和广告

^①当越过因特网固有的“渗漏的”（leaky）知识和信息商品，试图声称和保护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时，这个矛盾就日益展开。

商联结在一种有约束力的互惠关系（reciprocal relationships）中。大众媒介的节目安排用来建构受众，广告商为取得受众而付钱给媒介公司，受众于是被转交给广告商。这种观点扩展了媒介商品化的空间，使商品化不仅包括媒介公司出版报纸、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电影等直接过程，而且把广告商或资本一般也包括进来。商品化的过程使媒介产业彻底纳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这主要不是因为媒介产业制造了充满意识形态的产品，而是因为它为广告商生产受众，并且（en masse）是符合广告商需要的特定的人口学特征的受众。（Mosco 2009，137）^①

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的贡献在于它是一个生产性的、动态的隐喻，因为它——

提供了思考前面所说的“三位一体”的方法，同时又不至于陷入这种结构论述经常带来的机械论的思考之中。（Mosco 2009，137）^②

它反而提供了一种剥削的过程关系的理解，文森特·莫斯可呼吁媒介和传播研究要将“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放在最显著的位置”（Mosco 2009，129）就是一个例子。这就必须选择不同的切入点，以便来强调——比如说凝结在由私人实体挖掘流行故事的商品化过程，而不是仅仅由媒介机构开始和结束研究。

①中文摘自〔加〕文森特·莫斯可著，胡正荣等译：《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加〕文森特·莫斯可著，胡正荣等译：《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译者注

事实上，随着 Web 2.0 及被称作“产消者商品”（Manzerolle 2010）的兴起，斯迈思的观点在今天看来甚至更加有启发性。Web 2.0 已经为自治论者所称的“社会工厂”——“社会的总体包容”提供了整体的新批次工人（Negri 1996, 150）。就像费舍尔（Erin Fisher）在其近期书中写道的：

新经济日益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实际上是以没有得到补偿或……包括了新的、更加不稳定和部分的补偿方式……的劳动为条件的，自从引入了网络技术，这些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新关系……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公司在攫取利润时越来越有经验，它们只返回极少量金钱或不付钱给工人。（Fisher 2010, 118）

因此，可以说 Web 2.0 与网络技术总体上促成了新的生产关系，目的是开拓剥削的新途径。“众包”（crowdsourcing）实践的持续完善及其他从“免费时间”（free time）剥削价值的手段能够最清楚地显示这种剥削的“强化”。费舍尔指出了某期《连线》（Wired）杂志的封面——“众包：上亿的外行想要你的工作”。就如费舍尔指出的：

威胁是清晰的：某人在劳动队伍中的位置更多地不是来自其他工人的威胁，而是一个新的工人阶级：一个新的……外行预备部队。（Fisher 2010, 117）

但是，自治论者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社会工厂”不仅指延伸至工厂与正常工作时间之外的价值攫取的数量上的扩大，而且指通过工人在生产循环中被动员起来的特有“精神”所实现的资本主义

强化的质态 (Berardi 2009)。这是个非常激进的论断：人类不仅在其整个生命中被导致是生产性的，而且资本主义被认为通过同时生产“主观性与经济价值” (Lazzarato 1996) “侵入我们的生活”。该观点不仅激进，而且是对马克思的生产“不只为主体创造客体，也为客体创造主体” (Marx 1973, 92) 论断的修复与重新解释。

所以，只有理解对马克思而言的生产既是 (both) 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 (Marx 1990) 特定的活动，也是一种人类“类存在物 (species-being)” (Marx 1973/1988) 普遍进行的活动，马克思剥削理论才会对现代传播和媒介学术具有延续不断的活力。在马克思的一般生产概念中，我们可以找到潜藏其中的传播研究的灵感，即批判所谓的“产用者” (producers) 或“产消者” (Fuchs 2010; 2011) 剥削、“双重剥削” (double exploitation)^① (Murdock 2011)，以及社交剥削 (exploitation of sociability) ——安德烈耶维奇 (Mark Andrejevic 2009) 所指的“剥削 2.0” (exploitation 2.0) ——所有现代信息资本主义下剥削强化的例子。这种批判学术有助于讨论这样一种观点，即剥削存在于工业资本主义的锅炉房中，并不存在于我们的网络化信息资本主义闪亮新世界。

(二) 扩大

剥削“强化”通过试图使日常生活更加有生产力价值而与剥削“扩大”同时存在——扩大是指剥削关系的空间扩张。事实上，这两者之间有一种辩证关系。因为剥削程度总是反抗剥削斗争状态的结果，对剥削强化的抵抗越剧烈，扩大对于维持价值积累就越重要，反之亦然。

^①默多克 (Murdock 2011, 33) 认为当那些付出免费劳动的“产消者”之后不得不作为消费者支付“价格溢价 (price premium)”给“他们的劳动果实”时，双重剥削就会发生，因为联合创造的产品常常比那些由传统生产制度制造的产品成本更高。

资本主义为了——常常至多是部分地和临时地——解决它的矛盾，始终不可避免地走向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的创造。而在这点上，传播长期以来都是重要的，并且日益重要，因为计算机已从一个计算设备转变为一种穿越空间的“协调技术”（coordination technology）（Malone and Rockart 1991）。

诸如像卡斯特等网络理论家已深入研究全球网络是如何出现及如何转变生产过程。卡斯特所说的“网络企业”（the network enterprise）（Castells 2000a, 163—215）是一种应对网络逻辑与技术更加广泛的联合而产生的新的组织形式。卡斯特的全球生产系统依赖于：

公司之间、每个主要公司的分散化单位之间，以及彼此连接且与大公司或公司网络连接的中小型企业网络，彼此的策略性联盟和特别（ad hoc）合作计划。（Castells 2000a, 123）^①

然而，卡斯特的全球生产网络并没有与所有那些被卷入生产过程整体的人和物协同扩展（co-extensive）。在这里网络隐喻似乎妨碍了对那些直接存在于生产链条之外的部分进行分析。这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卡斯特的关注点在：

生意如何被组织（发展方式）（mode of development），而不是这种组织的社会特征（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Stadler 2006, 56）

^①中文摘自〔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译者注

但是，存在于这些生产链条“内部”与“外部”的内容是相互构建的，或是内在（internally）相关。就像上文所讨论的剥削“强化”，再生产时间与它所产生的价值在剥削的“扩大”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换句话说，再生产成本与生产成本超越了全球经济的不同空间，它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马西莫·安吉利斯写道：

在现代全球资本主义中……最令人厌恶的人类实践不仅仅“仍然”存在于某个遥远的大陆，是古老时代的遗产，而是反而变成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构成环节（constituent moments）。因此，比如说现代奴隶制度……在全球生产链条向上逆流（trickle up），通过提供给劳动力更廉价的食物和更廉价的一般再生产条件，因而降低了劳动力价值来实现这种逆流，这里的劳动力可以用通过即时通信与其美国客户联系的技术熟练的印度程序员来说明。（de Angelis 2007, 72f.）

“逆流”的概念允许我们将马克思最普遍的生产范畴——作为生活的生产——吸收进等式中。正因如此，这对按照过程关系方式来理解剥削是一条有益途径，因为它迫使我们把生产看作为一个内在地与其整体关联的过程。

甚至当我们离开“超经济”（extra-economic）过程的分析，走进标准雇佣劳动生产方式时，我们也无法不考虑内在关系。这样做实在太容易了。对“高技术”、知识密集型公司“非物质”工作的关注经常转移我们对现实的注意力，这些工作实际上由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工作来认购的。正如卡芬特齐斯（George Caffentzis）阐释的：

为了获得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平均利润率，雇佣极少劳动力，但大量使用机器的工业部门必须能有权要求得到高劳动、低技术部门创造的价值池（the pool of value）。如果没有这种部门或没有这种权力，那么平均利润率就会在高技术、低劳动工业中变低，以至于所有投资都会停止，制度也会终结……计算机需要血汗工厂，电子人存在的前提是奴隶。（Caffentzis 2005b, 34）

或者如同卡芬特齐斯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所表述的，“一如资本主义既往历史，技术上的飞跃来自于对最有技术的挨饿工人金钱的骗取”（Henninger 2007, 163）。这意味着，“实际吸纳”和“形式吸纳”在马克思的术语中不仅同时共存，而且共同关涉（co-implicated）。因为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所以实际吸纳永远不能完全取代形式吸纳。就像卡芬特齐斯解释的：

如果高有机组成部门无限增长，利润率就会降到零……除非有抵消力量来将重担交还给形式吸纳队列。（Caffentzis 2005a, 107）

“全球工人”是一种容易引起共鸣的说法，即马克思所指的“那些劳动对生产成品必不可少的所有人”（Mandell 1990, 945）；它们的个体工作已变成“合作整体”（co-operative totality）的一部分（Mandell 1990, 946）。因此，如果不将在中国组装电脑的女性外来打工者包括在内，我们就无法谈论“知识工作”（参见 McKercher, Mosco and Huws 2010）。也就是说，我们对“知识工人”的定义必须足够开阔，以容纳光谱另一端的那些（经常被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工人，他们的劳动对于给西方所谓的“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

及其产品/服务以特权的“网络”和价值链是必要的。

卡斯特的二元（生产方式/发展方式）路径包含了这样一种意思，即网络社会被认为优先考虑这些能为网络增加知识，并能紧跟快速技术发展的高级技术工人。当然，其必然结果就是低级技术工人面临被排斥的危险，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知识去交换，因而带给网络较少价值。当排斥变成唯一的关注，剥削也因此成为一个盲点。这就是发展方式中的转变被理解为是内在（internally）如此关键的原因，在全部的生产方式中——运行逻辑仍然是对“全球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进行剥削。

很明显，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下的权力运作，我们就不应听从卡斯特、拉希和其他网络理论家的召唤来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剥削转移到排斥上。卡斯特（Castells 2009, 33）认为：

对大多数世界人口的首要关注要避免枝节问题，而是要从事一种有意义的关系，例如我们所说的剥削——因为剥削确实对被剥削者有意义。

我们势必要抛弃这种肤浅和宿命论的观点。如果没有剥削理论，现代资本主义、它的矛盾和危机甚至就无法被理解。当我们开始意识到“网络”技术、“网络”生产与剥削的“强化”和“扩大”之间的关系时，这一点愈发明显。

就像马克思所认为的，与诸如奴隶制或农奴制这些从前的剥削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是通过一系列复杂弯路来掩饰其剥削的能力。剥削无疑愈发难以通过现代全球生产链来追踪和测量。与此相反，排斥变得更加明显和易于辨认。内罗毕（Nairobi）的清洁工是——不论追踪和测量会多么困难——剥削链条中的第 n 个节点；作为被价值生产排斥在外的不重要网络“被排斥者”。这是一个某些行动

者转移到价值链中不太理想位置的过程，而不是完全将他们从链条中移走。简言之，比“排斥”更大的问题是“边缘化（marginalization）”。

当然，任何人都应该在批判剥削或批判排斥之间做选择。排斥和剥削有一种亲密关系，这是其自身过程关系。对劳动力的剥削正是，并始终依赖于一种结构性失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这一点非常明显。与此同时，就如博尔坦斯基与夏佩罗所说，“企业之外的排斥往往始于内部剥削，尤其是不合格工人或非正规工人”（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 404）。而且，企业排斥有时候是由其内部的剥削程度直接导致的。比如戴尔-威瑟福特与德·普特尔在他们所做的电子游戏工业研究中发现：

……超长的工作时间……被这种男性主导的文化活动所榨取，车间转而成了妇女参与的屏障，她们常常背负着“第二班”（second shift）重担……在家等着她们的孩子照看和家务劳动。（Dyer-Witheford and de Peuter 2006, 607）

“社会工厂”的概念警醒我们有一个问题将会日益引人关注——劳动力市场的排斥将会紧随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其外部剥削的能力增长。虽然这也许是建立在一种旧实践基础上的新趋势，这种旧实践的最著名描述是马克思关于“所谓的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的论述。因为对公有物的剥削总是首先要求驱逐（剥夺）那些合理地认为公有物属于自己的人口。只有排斥屏障被定为法律后，租金才能被抽取。因此排斥既是这种剥削形式的症状，也是（and）最典型行为。^① 换句话说，排斥与剥削就是内在相关的它们自己。

^①大卫·哈维（Harvey 2005）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这种过程的辩证认识，即他称为“剥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一种连续的“原始积累”演变。

五、结论：网络与剥削

本文试图完成两个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说明网络隐喻势不可挡的流行，像所有隐喻一样，作为一种启发性设计是有用的，但对权力影响不是没有责任的。我们选择怎样描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直接的政治意义。我认为尽管网络隐喻可以说明遍及当代社会的新的组织形式，但它同样有助于将社会批判聚焦于排斥问题而忽视剥削过程。^①虽然排斥是一种重要而明显的非正义（unjustice），但如同卡斯特（Castells 2009, 33）及其他网络理论家（例如：Lash 2002, 4）所认为的，排斥不是“网络社会”中最显著的非正义方式，剥削也不是排斥的衍生物（Murphy 1985）。与此同时，本文的目的在于强调剥削——网络的“盲点”——这并不应当将“排斥”看作是一种幻象。相反，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排斥过程与剥削过程之间的内在关系。

像我所认为的那样，然而“排斥”作为社会批判的中心议题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事实上，“剥削”似乎更能胜任这个角色，它提醒了我们共享的和动态的社会现实基础。但是，不同于遵循博尔坦斯基与夏佩罗的引导和创造一个更加适合于一个“联系主义者”世界的新剥削理论，本文认为我们已经拥有一个可以提供给这个世界的剥削理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

本文的第二个主要任务是说明在现代“信息资本主义”中马克

^①在我批判网络隐喻的“盲点”时，我非常同意费利克斯·斯塔尔德的评价，他认为网络社会论题预示了“在对可能性，或者甚至是愿望这样一个研究项目的多年后现代悲观主义（postmodern pessimism）之后，社会学宏大理论的回归”（Stalder 2006, 1）。这通常是受到欢迎的，但是我将其主要归因于过程关系本体论对这个论题的引导，过程关系本体论把我们的注意力带回到结构形式和规定这些形式的相关过程。

思的剥削理论为何仍然与批判权力有关。首先我展示了网络理论如何植根于一个与马克思的本体论有很多共同点的过程关系本体论。马克思对过程（process）和关系（relation）的独特理解、对矛盾（contradiction）的认识都与现代网络理论家的理解和认识截然相反，尤其是卡斯特，还有哈特与奈格里。这种共同的过程关系（process-relational）视角使我们得以理解马克思的当代意义，但是这些主要的区别——产生重要影响的差异——必将恢复批判的活力。

彼得·马尔库塞（Peter Marcuse）批评卡斯特呈现了“没有排斥者（the excluders）的被排斥者”（Stalder 2006, 140）。但是我认为这个批评不能仅限于对卡斯特。相反，似乎所有围绕网络隐喻形成的社会批判都天然地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网络理论家将权力看作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流”，通过制定网络“操作规则”（rules of engagement）的协议来运作。福柯式（Foucaultian）的权力概念——根据这种概念，权力被视作通过互相连接的网络不断变形构成来渗透社会——这种将权力视作为一种“资源”（resource）、产生于一个固定的外部位置的观点常与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不管怎样，我希望本文对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与其伴随的剥削理论的说明使这个事实更明确，即这种解释是错误的。我认为马克思的内在（internal）关系哲学思想、他的通过“生产”范畴实现的过程的物化，以及矛盾所产生的统摄作用，使得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得以发展扩大（writ large）。相应地，我初步尝试说明——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过程关系解读对于那些旨趣在当代信息资本主义中批判剥削的当代传播和媒介学者，如何显示了其持续的相关性和潜力。

综上所述，伯特尔·奥尔曼简要总结了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所隐藏的意义：

马克思的探索……从不以研究事物开始变化（好像它还没准备好变化）的原因为目的，而是要研究这种变化具有的各种形式以及变化为何似乎（appear）已经停止。而且，他的探索从不以一种关系是怎样建立（好像那儿之前不存在关系）为终点，而再次要研究关系所采用的不同形式，以及一种已经存在的关系的某些方面为何看起来（appear）是独立的。（Ollman 2003，14）

当我们望向窗外，所处的世界似乎日益变化不断、日益相互连接，我们要面对的任务就是不要被这些表象迷惑而得意忘形。相反，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些表象怎样取得了特定形式，以及它们为什么以特定方式向我们展现其自身。这么做可以使我们自己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即意识到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与流行看法完全不同，它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等级世界的遗迹，而是一种非常适合于在当代信息资本主义中批判权力的社会关系理论。

参考文献：

- Andrejevic, Mark. 2009. Critical Media Studies 2. 0: An Interactive Upgrade. *Interactio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1(1): 35 – 51.
- Barabási, Albert-László. 2003. Linked: The New Science of Network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71(4): 409 – 410.
- Barney, Darin. 2004.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arzilai-Nahon, Karine. 2008. Towards a Theory of Network Gatekeeping: A Framework for Exploring Information Contro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9(9): 1493 – 1512.
- Béland, Daniel. 2007. *The Social Exclusion Discourse: Ideas and Policy Change*. *Policy & Politics* 35(1): 123 – 139.
- Berardi, Franco (Bifo). 2009. *The Soul at Work: From Alienation to Autonomy*. Los

Angeles: Semiotext(e) .

Boltanski, Luc and Ève Chiapello. 2006.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Bruns, Axel. 2008. *Blogs, Wikipedia, Second Life, and Beyond: From Production to Prodosage*. New York: Peter Lang.

Buchanan, Allen. 1979. Exploitation, Alienation, and Injustice.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9(1): 121 – 139.

Caffentzis, George. 2005a. Immeasurable Value: An Essay on Marx's legacy. *The Commoner* 10: 88 – 114.

Caffentzis, George. 2005b. The End of Work or the Renaissance of Slavery? A Critique of Rifkin and Negri. *Common Sense*, no. 24. Accessed March 15, 2007.

<http://commonsensejournal.org.uk/files/2010/08/CommonSense24.pdf#page=22>

Callinicos, Alex. 2006. *The Resources of Critique*. Cambridge: Polity.

Capra, Fritjof. 2004. *The Hidden Connections: A Science for Sustainable Living*. New York: Anchor Books.

Castells, Manuel. 2000a.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I.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MA; Oxford, UK: Blackwell.

Castells, Manuel. 2000b. Materials for an Exploratory Theory of the Network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1): 5 – 24.

Castells, Manuel. 2000c. *End of Millennium,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III.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MA; Oxford, UK: Blackwell.

Castells, Manuel. 2009.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Castells, Manuel. 2011a. A Network Theory of Pow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 773 – 787.

Castells, Manuel. 2011b.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shop: The Promise of Network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 794 – 795.

Cavanagh, Allison. 2007. *Sociolog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Berkshire: McGraw-

Hill International.

de Angelis, Massimo. 2007.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Value Struggles and Global Capital*. London: Pluto Press.

Dyer-Witheford Nick and Greig de Peuter. 2006. “EA Spouse” and the Crisis of Video Game Labour: Enjoyment, Exclusion, Exploitation, and Exodus,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 599 – 617.

Emirbayer, Mustafa. 1997.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2): 281 – 317.

Fisher, Eran. 2010. *Media and New Capitalism in the Digital Age: The Spirit of Networks*.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Foucault, Michel. 1991.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Penguin Books.

Fuchs, Christian. 2007. Transnational Space and the “Network Society”. *21st Century Society* 2(1): 49 – 78.

Fuchs, Christian. 2009. Some Reflections on Manuel Castells’ Book Communication Power. *TripleC — 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7(1): 94 – 108. Accessed November 3, 2011. <http://www.triple-c.at/index.php/tripleC/article/viewFile/136/90>

Fuchs, Christian. 2010.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6(3): 179 – 196.

Fuchs, Christian. 2011.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ide Web: Social Medium or New Space of Accumulatio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es of Media.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Media Industries*, edited by Dwayne Winseck and Dal Yong Jin, 201 – 220. London: Bloomsbury.

Galloway, Alexander. 2004. *Protocol, or,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Gane, Nicholas and David Beer. 2008. *New Media: The Key Concepts*. Oxford: Berg.

Garnham, Nicholas. 2004. Information Society Theory as Ideology. In *The Informa-*

tion Society Reader, edited by Frank Webster, 165 – 184. London: Routledge.

Gould, Carol C. 1978. *Marx's Social Ontology: Individuality and Community in Marx's Theory of Social Reali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4.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9. *Commonwealth*.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arn, Alison. 2010. Reality Television, The Hills, and the Limits of the Immaterial Labour Thesis.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8(1): 60 – 76.

Henninger, Max. 2007. Doing the Math: Reflections on the Alleged Obsolescence of the Law of Value under Post-Fordism. *Ephemera: Theory &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 7 (1): 158 – 177.

Hepp, Andreas, Friedrich Krotz, Shaun Moores and Carsten Winter, eds. 2008. *Connectivity, Networks and Flows: Conceptualizing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Cresskill,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Inc.

Jessop, Bob. 2001. *The State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Knowledge-Driven Economy*. Pub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Lancaster University, Lancaster LA1 4YN. Accessed March 25, 2012.

<http://www.comp.lancs.ac.uk/sociology/papers/Jessop-State-and-Contradictions.pdf>

Lash, Scott. 2002.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London: Sage.

Law, John. 2003. *Networks, Relations, Cyborg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Technology*. Published by the Centre for Science Studies, Lancaster University: Lancaster. Accessed December 30, 2011.

<http://www.comp.lancs.ac.uk/sociology/papers/Law-Networks-Relations-Cyborgs.pdf>

Lazzarato, Maurizio. 1996. Immaterial Labor. In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edited by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133 – 147.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lone, T. and Rockart, J. 1991. Computers, Networks and the Corpor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65, No. 3. 128 – 136.

Mandel, Ernest. 1990. Introduction to “Appendi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Manzerolle, Vincent. 2010. “Mobilizing the Audience Commodity: Digital Labour in a Wireless World.” *Ephemera* 10(3/4): 455 – 469.

Marcuse, Peter. 2002. Depoliticizing Globalization: The Information Age and the Network Society of Manuel Castells. In *Investigating the City: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edited by John Eade and Christopher Mele, 131 – 158. Oxford: Blackwell.

Marx, Karl. 1972.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1973.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ated by Martin Nicolaus. London an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Marx, Karl. 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74. *The German Ideology*, edited by Chris J. Arthur.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ttelart, Armand and Michèle Mattelart. 1998.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An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McKercher, Catherine and Vincent Mosco. 2010. Getting the Message: Communications Worke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 4 (2): 1 – 9.

Mosco, Vincent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2008.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Murphy, Raymond. 1985. Exploitation or Exclusion? *Sociology* 19(2): 225 – 243.

Murdock, Graham. 2011. Political Economies as Moral Economies: Commodities, Gifts, and Public Goods. In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Janet Wasko, 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11 – 40. Oxford: Wiley-Blackwell.

Negri, Antonio. 1996. Twenty Theses on Marx,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 Situation Today. In *Marxism beyond Marxism*, edited by Saree Makdisi, 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E. Karl, 149 – 180. New York: Routledge.

Ollman, Bertell. 2003. *Dance of the Dialectic: Steps in Marx's Metho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omeroy, Anne Fairchild. 2004. *Marx and Whitehead: Process, Dialectics, and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Quandt, Thorsten. 2008. Network Theory and Human Action: Theoretical Concepts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 In *Connectivity, Networks and Flows: Conceptualizing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Andreas Hepp, Friedrich Krotz, Shaun Moores, and Carsten Winter, 111 – 133. Cresskill,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Inc.

Ross, Andrew. 2009.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 Life and Labor in Precarious Ti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Stalder, Felix. 2006. *Manuel Castells and the Theory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Polity Press.

Thrift, Nigel. 2002. A Hyperactive World. In *Geographies of Global Change: Remapping the World*, edited by R. J. Johnston, Peter J. Taylor, and Michael J. Watts, 29 – 42.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Urry, John. 2003. *Global Complex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Van Dijk, Jan A. G. M. 2006. *The Network Society: Social Aspects of New Media*. 2nd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Watts, D. J. 2003. Six Degrees: *The Science of a Connected Age*. New York: Norton.

Watts, D. J. 2004. The New Science of Network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0: 243 – 270.

Webster, Frank. 1995.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Wayne, Mike. 2004. Mode of Production: New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Napster File. *Rethinking Marxism: A Journal of Econom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6 (2): 137 – 154.

Wildman, Wesley J. 2010. An Introduction to Relational Ontology. In *The Trinity and an Entangled World: Relationality in Physical Science and Theology*, edited by John Polkinghorne and John Zizioulas, 55 – 73. Grand Rapids: Eerdmans.

詹纳吉·浦若迪尼克 (Jernej Prodnik)^①

关于还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笔记： 从受众商品到社会工厂

王华（译），张韵、吴畅畅（校）

[导读] 《关于还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笔记：从受众商品到社会工厂》(A Note on the Ongoing Process of Commodification: From the Audience Commodity to the Social Factory) 是斯洛文尼亚学者詹纳吉·浦若迪尼克写的一篇文章。文章从马克思到安东尼奥·奈格里，从生产到消费，从物质生产到非物质生产，从报纸到谷歌、脸书网，从商品形态、商品化到批判政治经济学，从批判传播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系统地引领读者进行了一次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旅行。

所有资本主义研究都不应该忽略商品形态和商品化过程。在流通交换过程中，不加夸张地把一切事物转换成私人商品的过程，它对于资本主义增殖和再生产来说至关重要。这在马克思著作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著述中都有所体现。从这一点出发，浦若迪尼克论证了商品形态和商品化过程在上述批判理论核心著述中是如何被分

^①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科学系社会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和媒介研究系教学助理。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迁、政治经济批判（尤其关注传播）以及技术变迁的广泛社会语境与新技术带来的民主可能（包括电子民主和电子参与），jernej.prodnik@fdv.uni-lj.si。

析的，以及根据这些作者所言，作为社会与社会关系的商品形态的全球化后果是什么。继而，他讨论了商品化在商品拜物教兴起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相应的交换如何促成了人的个体化。文章认为，“当下是一个一切事物持续商品化的全球化过程，包括文化、创造力、信息和多样传播形式，这些类别逐渐成为信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文章关注了这些话题如何与商品批判研究尤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发生关联，应该说，它主要通过斯迈思的“盲点辩论”和“受众商品”讨论而实现。

浦若迪尼克最后讨论了商品化在数字时代如何渗入整个传播过程并生产了新产品。他将上述结论发现与最近一些新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论相联系，特别是主张自治主义/后工人主义作者的研究发现，试图说明对这一知识链的审视如何能够借助交际资本主义、语言资本主义和社会工厂等概念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提供一种理解。这些商品化过程有必要被再次提出并加以强调，它既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注入理论力量，又是对推动这一过程的社会语境和社会变迁的现实考察。

值得强调的是，在后福特资本主义时代和新媒体语境下，传播特别是大众传播越来越富有意义，渗入社会各个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它成了学者们将资本主义与传播、信息、语言联系在一起的现实前提。浦若迪尼克在认同这一点的基础上，特别引入了自治主义/后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后者提出了消费工人、非物质劳动、社会工厂等概念，认为传播甚或诸如语言才能之类在现代社会获得了霸权地位，并构成了资本主义积累一个新来源，正所谓“资本主义结构性趋势，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世界综合经济体系，它不仅商品化和定价化了所有物质和社会生活，而且将人类生活本身（即物种存在）纳入进了它的积累周期：言语以及说话〔逻辑〕能力、我们的感受和情感以及我们进行活动的人类一般能力。这一趋

势决定着没有第二个人类生命将会通过脱离工具理性和详细算计的经济循环而被浪费掉。每个人类行为都被覆盖，社会生活每一方面都被仔细测量”。商品化已经侵蚀和改变人类接触与社会关系。它不仅在大众传媒领域工具化了传播，也可能侵犯人际传播，将人类变成机器人。当商品开始统治社会，使用价值的任何独立可能性都是被根除的。任何缺乏交换价值、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变得一文不值、可有可无和无关紧要。除了社会沟通向度外，信息传播不能只被看成是诸多商品类型的一种，它们是我们认为的建立在不受压迫和表达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和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论文既可以看作是商品化的一次传播政治经济学历史考察，同时也是对多种理论交锋的呈现与讨论。论文对于全面梳理西方传播理论史、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理论同源关系、深入理解传播与公共性问题、全面认识信息的解放与压抑力量、受众研究转向以及新媒体政治经济学内涵都具有较高的启示意义，同时，它也为当下深入阅读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和多元传播思想提供了契机，对深入、全面地总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播思想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实践及其特性，提供了一种参考。

[关键词] 商品形态，商品化，抽象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批判，社会工厂，受众商品，网络，传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批判传播研究。

一、引言

尽管经常被忽略，商品形态和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研究中却已经扮演了重要角色。阿多诺（Adorno 2001/1991）、德波（Debord 1970, Ch. 2）、卢卡奇（Lukács 1971）、佐恩-雷特（Sohn-Rethel 1972/1978）、克利弗（Cleaver 2000/1979）、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1983, Ch. 1)、胡斯 (Huws 2003) 和波斯通 (Postone 2003/1993) 这些研究者，已经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这一所谓的“资本主义细胞形态”上，如同商品成了马克思著述的特征与标志一样。商品形态^①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它在马克思的全部作品中起到关键作用。从马克思早期的政治经济学著述到他的后期观念，其中都包含着商品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再生产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发展演进 (Marx and Engels 1976/1987; Marx 1993; 1858; 1990/1867; 同时参见 Murdock 2006; Barbalet 1983, 90f.)。即使在后现代性语境下，商品化过程也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普遍维系和资本持续扩张的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历史地看，在流通交换过程中，不加夸张地把一切事物转换成一个 (虚拟的) 私人化商品形态的过程，对于资本主义增长和再生产来说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只有通过为交换而进行的各种商品生产，资本家才能从劳工身上榨取剩余价值 (Huws 2003, 61)。

本文主要目的在于论证商品形态和商品化角色在非正统批判理论核心著述中是如何被分析的 (这些理论既体现在马克思著作中，也体现在其继承者的著述中)，以及根据这些作者所言，作为社会与社会关系的商品形态的全球化的主要后果是什么。文章接下来三个部分将对此进行阐明，其中我将密切关注商品形态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是如何被分析的 (第二部分)，及其是如何关系到广泛的历史变迁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第三部分是对追随马克思的不同批判学者如何分析上述进程所做的一次密切观察，它将有助于澄清商品

^①佐恩-雷特尔 (Sohn-Rethel) 仔细考察了“形态” (form) 术语，他将其定义为受时间限制的：“它与时间一起产生、死亡和变化。” (Sohn-Rethel 1978, 17) 这应该能够区分马克思及其辩证思考与所有其他思想学派。詹姆逊 (Jameson 2011, 35) 认为，“形态”这一单词防止了具体化或物化金钱、交换关系等，它们是首要的社会关系。

化在商品拜物教兴起中所发挥的作用和相应的交换是如何促成人类个体化的（第三部分）。在第四部分，争论将被进一步扩大，具体通过论证当下全球性的商品化是如何裹挟了一切事物，包括文化、创造力、信息和多形式的传播，而这些类别正在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信息社会的基础。此外，我还比较关注，这些话题如何与商品批判研究发生关联，特别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Mosco 2009, Ch. 7）。后者首先并最重要的是通过对“盲点辩论”（与同时出现的“受众商品”论）的重新评估而得以实现，这些论点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① 第五部分将有助于阐明商品化如何借助数字化能够渗入整个传播过程并创建新商品。在最后一部分，即第六部分，这些结论发现被关联到最近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论上，特别是那些主张自治主义/后工人主义的作者的研究发现。我将试图表明的是，对这一知识链的审视如何能够借助交际性（Communicative）、语言资本主义和社会工厂等概念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提供一个理解，以及它如何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提供几种融合性论点。

论文的主要前提是，在后福特资本主义时代，传播将越来越富有意义。传播渗入并源自社会结构的各个角落；无论如何，这一观念在当前历史时期显得特别重要，各阶层人们和社会生活在这一时期似乎完全被传播所渗透（比如认同社会媒介化的各种观念）。然而，传播同时也变得几乎完全商业化。后工人主义理论称，传播或甚诸如语言才能之类在现代社会获得了霸权地位，同时也构成了资本主义积累一个新的来源。由马克思、马克思早期追随者和对“盲点辩论”有贡献的作者提出的一些说法，因而需要被再次提起与强

^①斯迈思于1977年在他的文章《传播》中发起了这场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它引起了一些回应和修正，最著名的是默多克（Murdock 1978）一年后的回应以及同年斯迈思（Smythe 1978）对默多克的答辩。

调，因为这种显著（但不是根本的）变化的社会语境和技术变迁正在进一步推动商品化的扩大。

二、商品形态在马克思著作中的角色与作用

在卢卡奇看来，当马克思决定展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开始在其重要作品中进行商品分析，这绝非巧合。按照卢卡奇的说法，商品化问题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方方面面的中心的、结构性问题”（Lukács 1971, 83）。它不应该被看作是孤立的或仅仅是经济的中心问题，因此也就意味着在对真实存在的社会关系进行批判的时候，这个问题很难被忽视。马克思（Marx 1990/1976, 90）认为，商品形态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同样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相连的历史范畴）的成果，它是目前历史时期的经济细胞形式之一。这些范畴促使马克思在最抽象的形态中，同时也是在最基础的层面上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他将抽象化看作是对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一种主要（或许只是可能）手段，它连同辩证法一起促使探究者超越了对事物仅仅是表面的分析。^①

^①自然科学的实验设计被社会科学的抽象能力所取代。例如，理论总是对经验现实的抽象，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必须建立在同样的现实之上，马克思同时指出“如果事物的表面形态直接等同于它们的本质，那么所有科学都将是多余的”（Marx 1991/1981, 956）。他说，正是在这里，“庸俗经济学完全感觉精通此道，这些关系越是不言自明地出现，它们的内在联系越是难以发现”。（Marx 1991/1981, 956）伊格尔顿（Eagleton 1996, 6）认为，在事物实际上是什么和看起来是什么之间，总有一个差距；所以说，本质和表象之间存在差别，因为后者需要被穿越或避开从而能够认识现实（Barbalet 1983, 23f.；Postone 2003/1993）。因此可以声称，辩证法和抽象化两者的核心目标之一即是超越事物单一表象进行分析，（在几种机制同时运行下）仅仅分析具体现实是不可能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事物不是仅仅晦涩难懂或者如其表面似的。Barbalet（1983, 24）指出，正是商品拜物教（本文后面有所讨论）的社会作用整体性地揭示了这一点。对表象和现实矛盾更详细的分析（和关注超表象和反表象的问题）同样可见于 Collier（1994, 6f.）关于批判现实主义后理论状态的阐释。

从马克思早期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到其后来的思想中都可以看到商品的关键作用，同时许多著作家也坚信这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所有分析的杰出起点（比如 Lukács 1971; Sohn-Rethel 1978; Postone 2003/1993）。在马克思的早期著述，例如 1847 年法语版《哲学的贫困》中（Marx and Engels 1976, 105—212），他讨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特别是交换价值，以及在生产者进行各自商品交换的社会中，后者成了商品生产不可改变的必然部分。在这个时候，他界定了商品的价值法则取决于凝聚在商品身上的劳动时间（他还写道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这也是他后期著述中出现的一个更加精确的思想）。于是，劳动时间成了价值的测量标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Marx and Engels 1976, 130），劳动本身是商品：劳动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买卖。如果有两件产品（商品）进行交换，其中所进行的是等量的劳动交换，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劳动时间交换（Marx and Engels 1976, 126）。正如马克思的经典陈述：“时间是一切，人什么也不是；他最多是时间的架子。质量不再重要。数量独自决定一切；一小时就是一小时（hour for hour），一天就是一天（day for day）。”（Marx and Engels 1976, 127）当然，它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历史特性，而不像蒲鲁东（Proudhon）当时所认为的什么永恒正义。

根据默多克（Murdock）的看法，马克思在写作《哲学的贫困》时候，就已经确认了“商品化是推动资本主义扩张的中心动力”（Murdock 2006, 3）。在所有事物面前，它因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从身体到精神，这些在人类历史中原本从来不会被兜售或购买的东西，被拿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换（Murdock 2006, 3，同时参见 Marx and Engels 1976, 113）。可能因此在马克思的早期著述中，商品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中的作用几乎没有被夸大。商品形态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资本积累循环系统中的血液，

而这种积累循环系统是资本主义持续再生产必不可少的。^①这也显示了商品形态是资本主义严肃批判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思路得到了传播学批判研究，尤其是那些遵循斯迈思路径的学者们的极大继承和发展。比如莫斯可认为，商品化过程即为“将使用价值转换成交换价值的过程”（Mosco 2009, 129, Ch. 7），它是构筑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起点的核心进程之一。

尽管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述中已经分析了商品形态，但他的后期著作才格外地对商品形态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进行详细考察。最为详细的记述是《政治经济学批判》（Marx and Engels 1987, 257—417），该文写成于1858到1859年间，被认为是《资本论》第一卷中他进行商品论述的基础（Marx 1990/1867）。在这些著作中，这一称作“资本主义细胞形式”的所有部分得到了全面展开，其中包括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间的区别：前者是交换价值的来源，后者可以生产使用价值各异的无数样式，是现实物质财富的来源。交换价值或者是简单价值，和抽象劳动都可以被视为这些历史性“细胞形式”，也都是商品形态不可或缺的部分。^②在最抽象的意义上，所有这些类别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据马克思所言，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关键区别在于“交换价值定位的劳动是抽象普遍的和统一的劳动”，而“使用价值定位的劳动是具体和独特的劳动，根据它的形式和适于的材料而构成无数不同种类的劳动”（Marx and

①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积累循环的血液细胞，它不仅仅是个类比或者隐喻。在原始积累分析中，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今天在美国没有任何出身证明的大量资本，昨天是在英格兰流淌着资本家血液的孩子”（Marx 1990/1976, 920）。这至少含蓄地触及了其商品分析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即商品拜物教。该问题稍后本文会有讨论（尤其在3、4节）。

②事实上，这种特殊类型的劳动特别地仅仅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同时是资本主义功能发挥的基础，导致了马尔库塞（Marcuse 1955, 287—295）和波斯通（Postone 2003/1993）呼吁（如我们所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废除劳动。

Engels 1987, 27)。因此可以说，抽象劳动是对社会有用的劳动，但是对个体是没有特别使用价值的。马克思认为，“普遍的劳动因此不是一个现成的先决条件，而是一个新兴的结果”（Marx and Engels 1987, 286）；它以一种潜在的状态存在于商品身上，并仅在交换过程结果下变得普遍。政治经济学关涉的主题只是抽象劳动和（交换）价值，而所有被视为是交换价值的商品都“只不过是—定数量的凝结的劳动时间”（Marx and Engels 1987, 272）。它后来引发了马克思的著名陈述“时间是利润的要素”（moments are the elements of profit）（Marx 1990/1867, 352），泰勒制管理法则将其在生产过程中发展到了极致。

重要的是，尽管“交换价值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然而需要补充的是，它是一种隐藏在物质面纱下的关系”（Marx and Engels 1987, 276）。这种持久的神秘化可以被视为马克思提出的非常重要的前提之一，并于后来通过拜物教概念而得到充分发展。许多早期思想都来源于这一重要假设的核心观念：

这是劳动的一个独特特征，它假设交换价值导致不同个体间各种社会关系以一种不同事物间社会关系的扭曲形态出现。[……] 只有日常生活规范才让它显得普通且平常，社会生产关系应该呈现事物形态，因此这些进入人们工作过程的关系表现为不同事物以及不同人的关系。在单一商品上，这种神秘化仍然是非常简单的。人们或多或少清晰地了解到，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间关系实际上是生产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朴素的表象消失在更加先进的生产关系中。货币制度的所有幻象出现在一种失败的认知上，这种认知是，尽管货币是一种具有清晰产权的物质对象，其代表的却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Marx and Engels 1987, 275f.）

这些结论发现产生了一些重要结果，也许其中最有名的是：虽然马克思的方法假设需要对资本主义工作认识抽象化（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但在由商品交换主导的现存历史时代也存在着一个一直在运行的、真实的抽象化。马克思强调，“抽象化在社会生产进程中每天都在进行。”（Marx and Engels 1987, 272）这是在事实上不平等事物之间建构对等的一个前提。例如，将不同种类的有用劳动压缩为同质的抽象劳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使得内在于商品身上的不同使用价值之间的货币交换变得可能。其次，这些研究结果对认识社会生活在现有社会下如何构成影响巨大。最显著的是，商品形态在商品拜物教概念层面上更为广泛的社会作用是什么，以及商品交换在人类的个体化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什么样的工具合理化原则被发展了？这些问题将在下一节中得到彻底分析。

三、商品化与个体化：历史变迁与商品拜物教

作为抽象劳动和世界范围内不同分工的结果，商品存在明确的社会特征并借助市场在不同个体及其私人劳动之间发挥影响。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进行商品交换的时候，它关系到的不是商品的物质属性，而是它的社会特征：核心是它与其他可用来交换的商品的关系（如不同种类有用劳动的产品）。通过市场，各种商品之间关系以及由此带来不同劳动的等价性得以形成。不仅所有的商品都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而且某一个商品只有借助一系列等式在与其他商品的关联中才得以存在。“商品的交换过程是商品之间的真正关系。这是由彼此独立的不同个体所支撑起来的一个社会过程。”（Marx and Engels 1987, 282）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著名陈述那样，它将创建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通过以商品拜物教为依据的事物和形态而建立的：

这只不过是人们各自之间明确的社会关系，在此假设，为了他们，不同事物之间关系的美妙形式。[……] 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Marx 1990/1867, 165f.)

因此，不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由人来中介的，结果产生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关键的神秘性。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由其他事情所取代，在这一状况下，转换成了商品之间关系，同时创造了一个物质面纱（这直接将我们引向下文的个体化问题）。这种置换和商品拜物教背后的一般观念整体上来说相对简单的，但与此同时，它的难解也是出了名的（Balibar 2007, 57）。之所以特别这样，是因为这一概念在我们如何生活在我们所生活的（后）现代社会产生了巨大深远影响。

（一）历史变迁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关系

马克思提出的这些主要的抽象历史观念，对于社会后果分析至关重要，霍布斯鲍姆曾对此作过简要介绍（Hobsbawm 2011, 130—132）。他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理论是建立在他的“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分析基础之上的。^① 这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有关人类本性的基本存在论立场。正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描述的那样，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形态特定阶段相当抽象的记述是从人类开始的，人类劳动改变自然并来自于自然。这是创造和再造人类存

^①参见 Barbalet (1983)。

在的基础和自然条件。处理和改变一部分自然或许被视为第一种占有。这种占有仅仅是人类劳动的一个方面，人类和自然之间的一种物质交换，它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占有也在财富观念中被表现，但它非常不同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私人财产，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色所在（Hobsbawm 2011, 130; May 2010）。作为社会性动物，人类发明了劳动合作和社会分工，后者只不过是功能的专业化，促使人们生产超出维持生存所需的过剩与再生产个体与群体。此外，“剩余和劳动分工的存在一起促成了交换。但生产和交换最初只是将使用作为其目标”（Hobsbawm 2011, 131）。当人类从自然中解放自己并开始“控制”（同时也改变了生产关系）自然，社会关系领域的重大变化随即发生。这些变化已经被部分指明了，后文将会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然而在历史意义上，这些变化既是上述劳动专业化的结果，也是货币形态发明以及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结果。这提供了“一个以前无法想象的程序基础，其中包括资本积累过程”（Hobsbawm 2011, 131）。在资本主义制度最新阶段，工人因此被简化成仅仅是一种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积累之间的彻底分离是这个时代非常明显的特征。再生产实际上脱离了——甚至是反对——（商品）生产，但二者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是相结合的（Fortunati 1989, 8）。人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目的与先前的生产模式是根本不同的，后者专注于关涉人类生活再生产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对弗图纳提（Fortunati）来说，这意味着商品生产可以被定位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点和如同描述资本主义本身法则一样的进行自我管辖的法则”（Fortunati 1989, 8）。主要目标变成了无休止的资本积累，为了积累而积累——这种实现最大化积累的理性意图是辖制资本主义所有经济活动的一大“法则”（Wallerstein 1983）。

可以说，有一整个由不同范畴组成的复杂过程，它需要被开发（产生出质上的社会变迁），从而打造出资本主义社会：从假定了生产的唯一目的在于交换（因而被交换价值所支配）的抽象劳动、商

品形态和商品化 (Marx 1990/1867, 733), 到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发现、劳动的社会 (最后是全球) 分工、以积累为目的进行的积累, 以及无休止积累的一种历史的新的可能性。对于后者的可能性, 资本积累的先决条件是物价稳定措施, 通过生产过程实现购入商品价值的不断增加 (Marx 1990/1867, 711)。这种复杂性需要一种特定的资本关系及其生产, 即资本家是一方面, 付费劳工是另外一方面 (Marx 1990/1867, 724)。

我将在下一章节对这些变迁进行详细关注。为了对如马克思所界定的资本主义时代特定时期进行详细分析, 我们首先应该转向《资本论》第一卷 (Marx 1990/1867)。从表面上来看资本主义, 人们会迅速发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裂痕明显, 后者被定义为那些不拥有生产资料或者是被限制直接接触 (因此脱离) 生产资料的人。这一关键分离是通过所谓的原始 (或主要) 积累而特别建构起来的, 原始积累可以被视为一种固有的、额外的经济过程, 并由此对经济如何理所当然地“正常”地再造自身毫无影响。^①正是原始积累历史地、顷刻之间促使了公地圈占、平民征用、将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将不同活动与领域纳入商品交换关系, 最后也将这些领域纳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用佐恩-雷特尔的话, 私人占有的社会相比以往生产的社会)。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这一过程非常有助于劳动力商品生产。它有效地阻止了人们获得生产资料,

^①原始积累 (在大多数情况下) 也是一个极端的暴力过程。近年来原始积累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兴趣, 表明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仍然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它还表明, 这一话题在当前社会十分重要。对这一概念重新解释的关键争论之一是, 原始积累不是一个历史性的有限过程, 它在资本积累起始阶段意义重大。实际上, 它不断地再生产并成为资本主义永恒不变的一部分, 既建立又扩大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关于这一话题可以参考 Perelman (2000), Bonefeld (2001), de Angelis (2007, Ch. 10), Prodnik (2011), 或 Mezzadra (2011) 的著述。Harvey (2003, 144—152) 用“剥夺”来表达“积累”这一术语的另外一面, 明确表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进程的永久性。有关公共产品私有化, 它关系到了这些同样话题, 参见 Bollier (2002) 和 Boyle (2008)。

以及他们自己的生存财富，因此将他们推向了工资—劳动（同时创造了一个富于变化的社会结构）。默多克（Murdock 2011, 18—20）是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者之一，一直强调圈地和积累过程的历史作用，这种积累是商品化发展中的一种剥夺，同时也迫使人们开始为工资而出卖他们的劳动力。

这一无法获得生产资料的事实是无产阶级的主要特征，它的发展最后促使了劳动力在资本主义这一历史体系中更大的无产阶级化（Wallerstein 1983, Ch. 1）。当人们被拒绝（通常是强制的）获得生产资料的时候，他们需要在劳动市场上出卖劳动以图生存，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次历史革新（经过一个时期的真正发展，最后将许多人推到了极端贫困）（Polanyi 2001/1944）。人们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在买者（资本家）和卖者（劳动者）之间进行一种自由和表面公平的商品交换。在大多数情况下，自身的身体及其所固有的能力是无产者所拥有的唯一商品，它们现在可以（或也必须）被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交换。资本家作为劳动力商品的购买者，只可以在一个特定时期“租用”劳动者，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① 后者被看作是政治经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一个原则，体现为人类社会自由。它促使达成共识的双方在市场中进行表面上自由的交换，并促进劳动市场本身的发展。但马尔库塞指出，某一个体自由出售劳动力的事实，实际上是劳动力更加成为一种商品的前提。劳动合同因此在自由资本主义语境下“体现这种自由、平等和正义”（Marcuse 1955, 308）（当然也体现剥削的必要性）。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劳动力能够也只是作为一种商品出现在市场

^①它经常未被足够地强调，但是如是个体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如何没有和不能拥有（交换）价值。包含着个体的商品潜在地持有价值：他们的生产能力——劳动力。资本主义因此没有占有劳动者，但占有的是他的劳动，这种交换在具体现实中借助任何方式都不可能发生，但是却发生于具有生产能力的个体和资本之间（参见 Fortunati 1989）。

上，到目前为止，它的所有者，劳动力的归属个体，将其拿出来作为一种商品进行出售。为了让拥有者将其作为一种商品进行出售，他必须能够自我处理它，他必须是他自己劳动能力以及他自己的人的自由所有者。”（Marx 1990/1867，271）随着资本家暂时地购买了劳动者的劳动力，他（或她）在生产过程中可以雇佣他（或她），其中前者可以直接控制后者，确保工作的完成。最后，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生产了（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后者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源泉。^①

^①这可以被视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在抽象层面成功证明的一个最关键的发现（Marx 1990/1867，293—306）：劳动力商品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但这不是在市场上，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表面。这一不平等在生产过程中发生，其中规则是劳动者用他的劳动力创造了更多价值而付费相对较少：“劳动力价值，以及劳动力在劳动过程成定价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量；这一区别是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需要记住的”（Marx 1990/1867，300）这被称作剩余价值，首先，它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技术的而非道德术语（因为它经常被阐释和使用）。劳动力也是唯一能够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而在市场上付费相对较少的商品形态。Negri（1991/1984，79）认为，在交换表象背后，一种价值的窃取因而发生。另外，由于劳动者在进入生产过程之前暂时性地向资本家出售了他的劳动力，他所生产的产品在工作日最后被资本家转离他们（异化是马克思主义中有巨大影响力的一个概念，但其概念化经历了剧烈变化，甚至在马克思的著述中随着他的思想发展而变化）。劳动过程的最终产品因此成为资本家的财产，而不属于作为其直接生产者的劳工。劳工在他暂时地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的时候，放弃了对产品的权利。没有保留这些产品，他因为他的劳动而获取工资，这些工资的价值远远比实际生产低得多（因此，有了剥削）。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因此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等价交换关系。正如 Fortunati（1989，9）所指出，它实际上是不对等物之间的非等量交换。马克思作出的抽象论证也假设了劳工获取的薪资没有高于生活费用。他在1847年就发现了这一点，“劳动力，本身作为商品，是由生产这种劳动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测量的。那么，生产这种劳动力商品需要什么呢？正是用来生产维持劳动力可持续生存的不可或缺对象的足够劳动时间，也就是，确保工人生活和繁衍种族的条件”（Marx and Engels 1976，125）。一些学者声称这是说明马克思如何在历史上完全错误的有力例证，但是他们（或许是故意地）忘记了这是一个抽象论证，它建立在资本主义将如何运作的理性趋势之上。当然，还有其他几种趋势和机制在一个具体且复杂的社会现实下以及国家进行的其他政治干预中（劳动时间、最低工资规定）产生作用，这种干预经常是一个特定社会中阶级对立和权力关系的产物。

（二）商品交换与社会总体

这一简短总结对于那些已经充分认识马克思的人似乎显得多余，但是对于理解他所讨论的交换、等价和商品所扮演的角色却至关重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下的产品必然是商品。同时，它们也必然被置放在与其他商品的交换关系中，这也只有通过市场来实现。毕竟是以下因素使产品成为了商品：它们的社会特征，它们因为社会需要而具有可交换性的能力，以及市场作为对比这些商品的唯一途径。如果不是这样，它们只是其实际生产者的一些有用的产品，而生产过程的焦点将不过聚集在实际生产者产品的使用价值上。^①但是资本家出售这些产品的所有重要性实际上是基于交换价值的生产，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在市场上表现为价格形式（即通过货币形式，这是一般等价物和交换价值的量度）。为一般等价物而进行物品交换的努力，这也使得剩余价值的提取相当简单，是资本家雇佣劳动者进行商品生产的唯一原因。如果某一事物对社会非常有用，但同时（直接或间接地）缺乏交换价值，它在原则上将对资本家来说没有任何特别重要意义。^②在理想化情况下，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如福利国家）将是是否关照于此的不同支撑体系。

此外，由于资产阶级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商品），劳动者偶尔也

①再者，正是这种社会特性是商品的主要特征。商品必须在市场上交换。自相矛盾的是，如果它对拥有者来说仅仅具有使用价值，这种特定的商品实际上不是一种商品。“对它的主人来说，它反而毫无使用价值。”马克思（Marx and Engels 1987, 283）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写道。商品“只不过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或仅仅是一种交换手段。[……]商品对它的主人来说只有具有交换价值才有使用价值。因而，商品必须还有使用价值，首先对别人具有使用价值”。（Marx and Engels 1987, 283）

②这并非因为资本家某种程度上的道德败坏（尽管可能是），而是因为竞争激烈的市场体系中，他受迫于强制性的竞争法则。如果每个资本家没有遵循其自我利益，他很快就会破产。资本家因此在激烈竞争体系下要为他们活动扫除障碍。例如，在进行生态问题讨论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需要购买这些产品作为生活财富（或资料）。如此，他无意间帮助了资本主义积累循环的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系统一体化；劳动者无意间助长了自身剥削（Marcuse 1955, 309; Hobsbawm 2011）。因而，劳动者无意中维护了现有的阶级关系，因为他重申了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因此是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Postone 2003/1993, 参见 Marx 1990/1867, 716, 724），它立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权关系。至关重要的是，尽管现代社会历史和资本自是社会性建构的，但它仍“拥有一个准自治发展逻辑”（Postone 2003/1993, 31）。因此，资本主义体系实际上如何工作或多或少是独立与自动化的，它生成了一个超越任何个体控制的动力来建构自身（但不是超越个体的联合、多数人或整个社会阶级的控制能力的，集体性能够抵抗上述动力的宰制，但这都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这在马克思讨论（交换）价值中变得特别清晰，交换价值“无形”地依附于商品。尽管它是无形的，却不是主观的：它既是（社会性）实体，同时在时空上也是不断变化的，因为商品是社会有用（也是社会必要）劳动的结果，它在社会的不同具体类型间变换（比如与科技发展相关的生产力的上升与下降、自然环境等）。^① 马克思指出，“交换价值似乎是偶然和完全相对的，因此是一种内在价值，也就是，交换价值与商品密不可分地联系起来并依附其上，看上去是一种矛盾说法。”（Marx 1990/1867, 126）但当

^①在此大量地引用马克思是合理的，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和经常被误解的假设：“劳动时间用以表达的和交换价值是某一个体劳动时间，并且个体劳动时间并非不同 [……] 于其他个体，只要它们进行平等劳动；因而，一个人进行给定商品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任何人进行商品生产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这是某一个体劳动时间，他的劳动时间但只是作为对所有人都一般的普通劳动时间；因此，它是谁的劳动时间则是非常不重要的。这种普通劳动时间表现在普通产品上，一般等价物 [……] 只是作为这样一种一般的量确实代表了一种社会的量。[……] 个体劳动时间因此实际上是社会生产特定使用价值需要的劳动时间，它满足了特定需求。”（Marx and Engels 1987, 272）

他进一步论证后，人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庸俗经济学的独特论证。商品价格是波动的，但不论它的价值还是市场表现（通过价格和货币）都不可以被视为任意。它们的共同特性是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语境下显现大量的物化（抽象）劳动，劳动时间“具体化了商品使用价值，既是物质将它们转换成交换价值并变成商品，也是价值得以精确测量程度的标准”（Marx and Engels 1987, 272）。然而，关于生产一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多少，劳动者本身很少有实际影响——在商品世界是市场动力支配了这些社会关系——它们当然也不需要直接进入市场和其他劳动者建立直接的人际关系。所有这些关系表现为不同商品之间的定量关系（通常通过货币形式），只有通过从这一物质面纱背后观看，才有可能看到它们实际上是对立的生产关系，冲突随时可能出现。

马克思在这里的论证十分复杂，可以说，一种连贯的辩证方法需要被拿来在整体上对其充分覆盖。这将使人们可能不会忽略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秩序的每一个方面。我认为需要观察社会整体以实现充分的理解，包括诸如商品、价值或者抽象劳动这样的最抽象的范畴。它们都是构成系统的细胞部件，系统影响并制约了它们，这意味着一旦它们被与他者或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孤立看待的话，它们是无法被充分理解的。对整体性的需要是辩证法的需求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观点可以被看作是全局性的和包罗万象的（Lefebvre 1968; Harvey 1996, 48—57; Jameson 2009, Ch. 1; Harvey 2010, 195f.）。在这一点上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仅从商品形态自身进行观察确实会丢失它实际上所代表的东西：它事实上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这具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方面，商品进入与其他商品的交换关系之中，并成为整个商品世界的一部分，这一点是以充分发展的社会劳动分工为前提的；^①另一方面，积累过程中的其他

^①“尽管说私人交换意味着劳动分工是正确的，但认为劳动分工意味着私人交换，却是错误的。”（Marx and Engels 1987, 299）

部分也需要被纳入考虑，在流通领域中商品的交换价值得以实现和“测量”（它不能被“直接”地测量，因为它需要被置放在与其他商品的关系之下；在进入这种关系前，没有办法能够弄清楚生产一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什么），而生产领域则是工资劳工生产这些商品的地方。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需要为一个完全的商业社会准备就绪与运作，其中商品交换以一个非常自动的方式发生。借用巴里巴尔（Balibar）的话，“生产和流通结构赋予劳动产品（即商品）一种交换价值，形成一个整体，以及货币的存在，商品一般等价物的‘发达’形式，它是这一结构的必要功能之一。”（Balibar 2007，61）所有这些范畴和关系必须被发展和功能性地准备就绪。

（三）等价和真正的抽象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形态外观基本上是松散的。卢卡奇（Lukács 1971，84）指出，当交换价值还没有自己的形态时，它直接绑定到使用价值上。这一语境下的生产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它们只有在供给超过需求的时候才成为交换资料。只有在商品成功地渗入社会到一定程度并占据主导地位时，质变才会发生，无休止的（资本主义）积累才成为可能。卢卡奇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商品只能在其没有失真的真正状态下才能被理解，那时它成了全社会的普遍范畴”（Lukács 1971，86）。这种发展在资本主义来临之前不会发生，当人们的生活和劳动逐渐客观化、完全独立于他们所需时，它“凭借与人类自动分离，控制了人类”（Lukács 1971，87）。人类劳动不可避免地抽象化在这一点上嵌入了商品，经济领域的抽象化进程得以完成。传统生产模式意在进行使用价值制造，它在特定的公共关系中服务于个体再生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唯一目的变成了“交换价值生产，即追求价值的价值创造”（Fortunati

1989, 7)。根据弗图纳提的说法，这将直接导致“商品，即使用价值，优先于个体使用价值，尽管个体实际上依然是价值创造的源泉”（Fortunati 1989, 7）。这种发展需要一种特定的合理化，如同卢卡奇所言（Lukács 1971, 88），它基于“是什么”和可计算，即是说工具化的合理测量，它是对实际上不对等事物（使用价值）等价化（交换价值）的唯一途径。佐恩-雷特尔（Sohn-Rethel 1972, 54）称之为一种数学推理，它也可被追溯到交换抽象化（同时他也将其与客观知识及“精确”科学相联系）。这个发现的结果是，如果交换进程在一个社会中可以有效地工作和自我生产，很明显的是等价原则充分地普遍化及需要被执行。一个充分发展的等价原则实际上必须在不对等事物间建立起来，以使它们一旦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能够被衡量以及借助一些基本特征而具有可比性（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的抽象劳动和劳动时间）。这也把我们带回到了资本主义细胞形态上，带回到了马克思分析中最根本、最抽象的概念范畴，即商品、抽象劳动和价值，它们全部是资本的固有部分。在最抽象的意义上，上述三大范畴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组成部分。非常清楚的是，抽象化不仅是社会分析的思想进程，而且也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抽象化，“抽象化依赖的不是思想而是行动，在具体时空下运行”（Sohn-Rethel 1972, 51）。抽象化发展借助几个基本概念：交换抽象化、商品抽象化、劳动抽象化、时间抽象化等（Sohn-Rethel 1972; 1978）。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同种类劳动力全部意义上的平等只有通过它们实际上不平等的抽象才能实现，如果我们概括它们的共同特征，那就是人类劳动力消耗，以及人类抽象劳动。”（Marx 1990/1867, 166）这种说法当然可以延伸到其他范畴上去，而不仅仅是抽象劳动。马尔库塞指出：

[抽象化] 借助它关涉资本主义社会主题的结构，对

辩证法施加了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抽象化是资本主义的本身事务，马克思方法只是遵循这一路径。马克思的分析已经表明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的不断凝聚而建立并延续。这种经济一步一步地避开了具体的人类活动和需求，并只是通过复杂的抽象劳动实现了个体劳动和需求的一体化，其中个体劳动到目前为止一直只是计算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商品的物与物之间关系。商品世界是一个“歪曲”和“迷惑人”的世界，批判性分析首先必须遵循构建世界的这个抽象化原则，然后离开这些抽象关系以获得它们的真正内容。因此第二步是对抽象化的抽象，或者是对虚假具体性的放弃，这样那种真正的具体性就可能恢复。（Marcuse 1955, 313）

这一观念在前面提及的一些著作者那里被进一步发展，比如佐恩-雷特尔，他指出抽象化在不同的社会机制下得以成形，其中主要是货币形态。佐恩-雷特尔还强调，“抽象化在它发生的时空中变化，但未被注意”（Sohn-Rethel 1972, 51—52），不仅仅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交易涉及物质对象，而且商品交换的真实性不输于任何事物；而且由于抽象化依然具有一种思想形态，尽管它不是来自思想，而是来自于客观实际活动（例如考察一下抽象化在交换进程中的发展：商品真正的物质改变没有发生，物质事件处于绝对的最低限度，交换商品的定量差异未予认可，等等；变化的是商品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唯一的事实是，抽象化没有引起注意，这或许是日常生活活动最重要的实践结果。

(四) 商品拜物教

马克思拜物教^①观念是前文提及的发展进程的一个高潮。他的设想在《资本论》第一卷有关商品拜物教的章节里面得到了全面铺展 (Marx 1990/1867, 163—177)。哈维认为, 拜物教是一个“揭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奥秘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Harvey 2010, 38)。关于这一思想概念非常重要的一些基本论证在本文前面已经被暗示性指出, 人们可以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此, 马克思指出拜物教与商品生产不可分开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商品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它一出现就超越感觉; 它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或社会的物。(Marx 1990/1867, 163, 165)

正如杰哈利 (Jhally) 所强调的, 拜物教如何以及为什么兴起, 存在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 出于商品交换; 第二, 出于资本与劳动关系 (或更精确地说, 作为社会阶级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 它以工资劳动为中心, 构建了广泛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两大原因都已经被透彻分析过。

一些批判传播学学者已经在他们的著作中讨论了商品拜物教 (比如 Jhally 1987; Maxwell 1991; Murdock 2006; 2011; Fuchs 2011, 152—154)。杰哈利如是写道拜物教:

^①Balibar (2007, 63) 指出, 马克思如何认识到货币 (作为商品间相互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或万能商品) 崇拜实际上只不过是商品崇拜。这只有对商品形态及依附其上的交换价值作用进行仔细的分析才有可能, 这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没有出现。在这些早期著作中, 这一特殊社会作用后来被归因于商品, 它实际上直接认为是货币具有的: “疏离事物对人的完全支配, 在货币方面很明显, 它是完全冷漠的, 不论是对物质本性, 即私人财产的特定本性, 还是对财产所有者个性。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支配不是一般的物对人的支配, 以及产品对生产者的支配。正如等价物概念一样, 价值已经暗示了私人财产的分离, 所以货币是感性的, 甚至这种分离客观存在。” (Marx and Engels 1975, 221)

总之，拜物教在于将物的意义视为有形存在的一个固有部分，而实际上这些意义是它们与某一意义系统结合成连贯一体而创造的。[……] 对于马克思来说，商品拜物教认为事物本身看上去天然具备固有价值，而实际上价值是人创造的：它归入一个社会过程。因此，事物看上去具备固有价值。然而本质仍是人类创造了价值。[……] 在马克思那里非常清楚的是，商品拜物教和商品神秘性关注商品的虚假表象，这种表象认为它本身拥有价值而不是劳动的结果。商品拜物教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神秘化理论。（Jhally 1987, 29, 39）

随着商品形态在社会上的普遍化，商品生产由不同个体或群体完成，劳动因为社会性分工而相互独立。这意味着内在于产品上的社会关系只有在交换中才表现出来（Jhally 1987, 29, 39）；但如已经强调的那样，这些关系实际上隐藏在物质面纱背后，在商品本身背后。这些物质面纱不仅隐藏了社会关系，还有抽象劳动，后者在生产过程中生产了商品，这是所有者和被剥夺所有权的劳工之间敌对关系的发生地。默多克（Murdock 2011, 19）认为，拜物教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人们（被理解为商品消费者）忘记了商品从哪里来，相反不去思考这些问题而是分享这些商品所带来的便利和愉悦。最后的影响是任何有关剥削性工作条件、劳动过程或环境恶化讨论的废除与取消。购买和消费商品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仅仅是将商品作为一种愉悦的对象。

商品拜物教因此是一个通常被定义为意识形态的东西的一个主要例证（Fuchs, 2011, 152—154），但它是真实存在而不能被简单忽略或不予思考的意识形态，不是一种幻象。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的客观现实，因为它在生产的瞬间就将自己固定到了商

品上 (Marx 1990/1867, 165)。在目前世界性分工和全球市场语境下，这种情况尤其突出。这种物质拜物教创建的面纱实际上出现在市场背后：明确的劳动剥削社会关系。上述有关表象（商品世界）和本质（社会生产关系）的差别在此全部显现。因此特别是通过商品的拜物教特征，马克思对抽象化和辩证法之能力的断言才能够显示它的力量：他声称它们的关键特征是一种超越事物简单表象的能力。

商品拜物教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商品因此独立于生产了它们的人类之外而存在，并取得了它们自己的生命。但是商品不仅实现了独立于人类之外，它们还成了压迫人类积极和客观的动力 (Marx 1990/1867, 175; Barbalet 1983; Postone 2003/1993)。正如哈维所强调的，“市场力量，这种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无法掌控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控制了我们。” (Harvey 2010, 42)

商品拜物教问题实际上是通向持续性的意识形态问题的一种“另类”路径。至少意识形态批判分析的两大分化（深入地说是冲突）的面向在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已经发展起来。一个方面是将商品拜物教作为一个起点，认为商品形态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在物质层面上得以发展的物质面纱（借助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这一社会图式），其中包括的理论家如卢卡奇、阿多诺、佐恩-雷特尔以及波斯通（其中一些著作者依据的是这一思想的分支概念，如物化或异化）。在批判传播研究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已经被采纳，特别是被斯迈思 (Smythe 1977; Meehan 1993) 等学者们运用在受众商品化的讨论中。另一方面，以阿尔都塞和齐泽克等学者为代表，焦点几乎集中在意识形态层面和意识形态生产机器上。它通过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来进行管理和发展，而不是借助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观念（即在上层建筑层面，拥有权力的阶级能够确立意识形态。）让我们记住，马克思 (Marx and En-

gels 1987, 263) 的上层建筑包括“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简言之，意识形态的生活形状”。尽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相互关联方法，后者与前者却差异明显，并衍生出对商品拜物教关注问题。后者仅仅是一个上层建筑的问题，而前者将意识形态看作为由商品交换生产出的物质面纱；因此，它是物质基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从物质基础中产生（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内在方法）。

本文目的不是对这两种方法进行详细描述，但是前一方法更加接近于威廉斯（Williams 1973）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的重新解释或是葛兰西（Gramsci 1971）的霸权观念，它为意识形态观念提供了一种替代的可能 [两者都接近福克斯(Fuchs 2011, 48—53) 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再思考]。在葛兰西思想方面，可以说商品拜物教是通过人类日常活动而再生产出来的，不论人们是否愿意，但是它也显示了经济基础是如何远非静止和没有冲突的。^① 这种方法主要包括物质基础，可以说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冲突与对抗出现于这一社会层面。之所以如此，因为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的先决条件，并且比上层建筑更加根本（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基础也限制了上层建筑功能如何发挥，但是并不决定它）。这种物质水平在重大意义层面形成和影响了上层建筑层面的意识，后者产生于这一“现实基础”，即物质基础；至少与阿尔都塞的关注之处相比，这似乎更接近于马克思自己所称的社会中的真实发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提供的著名界定中，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模式影响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般过程”，而且“不是人类意识决定存在，而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Marx and Engels

^①这被威廉斯（Williams 1973）在他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通常是矛盾的）的机械论解释的批判中最有力地指了出来。

1987, 263)。

值得注意的是，佐恩-雷特尔旨在准确地研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搭建起一座楼梯，“二者共同形成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的物质基础，[……]这个楼梯在地下室中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停泊处，在为商品而生产的社会，它只能在商品自身的正式分析中才可以发现。”（Sohn-Rethel 1978, xi）对于前一方法来说，物质面纱对理解社会神秘化至关重要，物质面纱实际上是存在的（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不存在，不仅仅因为社会关系从来都不能是直接的、无中介的）（Postone 2003/1993, 167）。很明显，人们会在意识形态层面生成阶级对立意识，通过推翻上层建筑机构而以斗争方式解决冲突，但是如果物质层面的经济基础范畴保持不变的话，它也不大会有什么变化（例如商品形态控制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这在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语境下也是有意义的。

（五）作为个体化关键动因的交换

尽管马克思存在论的基本立场是，人是社会动物^①，但他不是天真幼稚的。在他的时代，成熟的个体化已经发生，他认识到这是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个体脱离了自然束缚并从自然中解放了出来，换言之，“那些将工人束缚在土地和土壤及其领主上的束缚关系的解除”，（Marx 1993/1858, 502）。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体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独立，至少与早先历史时期相比，那时他们是一个清晰的、

^①马克思（Marx 1973/1993, 84）实际上谈的是一种政治动物。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98/1958）是正确的，她指出马克思实际上将社会和政治领域混为一谈，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观念简单化为社会动物（对阿伦特来说，在现代社会，社会对政治领域和公共行为实现了全面胜利）。尽管两大概念区别很重要，但它们不是本文中心。

有限的人类团体的一部分（Marx 1993/1858, 83—85; Barbalet 1983, Ch. 3）。

然而，根据马克思的说法，个体化不是源于人类本性的一个自然条件，虽然这似乎是17世纪以来一个主流的哲学立场。它是一定历史过程的产物。矛盾的是，人类是“一种只能在社会中才能够进行自身个体化的动物。孤立个体脱离社会的生产[……]如同没有生活在一起和相互交谈的个体而发展语言一样荒谬”（Marx 1993/1858, 83—85; Barbalet 1983, 84）。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人从他原来自然生产条件中的解放过程”，因此可以被视为“一种人类个体化”，交换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动因（Hobsbawm 2010, 132）。人类只有在历史进程中才可以个体化他们自身，这是一个自我强化过程。

正如巴巴利特（Barbalet 1983, 69f., 89f.）论证的那样，马克思在他早期著作中断言，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类关系实际上是非社会的；他声称，在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关系成了独立和非社会存在的外部关系（这是接近自由个人主义的一个预设）。^①随着马克思思想的深入发展，他改变了观点，说明这些关系“只不过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内容上有别于封建社会关系”（Barbalet 1983, 89）。资本主义历史时期，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仍然具有最高度发达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因为交换本质和商品在社会中的作用（如早先提过）。然而，它生产一种空间，而不是直接的关系，同时也超越行动者自身的意愿与控制而完整地运作（Barbalet 1983, 90f.）。

商品交易当然没有特定的社会或相互义务，如同在政治经济学

^①马克思（Marx 1975, 220）在他的《论詹姆斯·密尔》中宣称，“社会权力在私人财产关系下表现得越大和越发达，人们越会变得更加自私自利、不合群和疏远自我本性。正是因为人类活动产品相互交换表现为物物交换、贸易，因此这些活动本身相互竞争和交换表现为劳动分工，它尽可能地把人变成了一种抽象存在、一种机器工具等等，以及将他改造成了—种精神和肉体怪物。”

崛起前居于主导的不同种类的道德经济学所述一样（Thompson 1991, Ch. 4, Ch. 5; Murdock 2011）。最重要的是，商品形态“不仅是个体化社会的基础，也是认为个体不处于社会关系中的观念产生的根源”（Barbalet 1983, 92），是一个尤其在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及其他个人主义者的世界观中占支配地位的本体论假设。

四、所有事物的全球商品化：漫长的历史

资本主义体系运行只有一个目标，即资本积累（甚至更多资金），这是由资本持有者完成的。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带有某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殊类型的社会需要被建立起来。即使资本主义已经普遍化，以及人们通常发现很难再想到替代品，尤其是这一系统已经完全嵌入其中这么久了，但是它的发展依然艰难，且充满荆棘。^①沃勒斯坦在试图解释资本主义何以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出现时写道，回答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资本主义不仅不像它所辩称的那是一个自然系统，而且事实上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系统：“积累资本是为了积累更多的资本。资本家就像跑步机上的白鼠一样，一直在更快速地奔跑，目的是跑得更快。”（Wallerstein 1983, 40）正如他所强调（Wallerstein 1983, 15），资本主义的整个循环在现代社会以前只是被很少地完成；一些环节消失，意味着一些进程尚未通过市场交易，这意味着它们还没有被商品化。在沃勒斯坦看来（Wallerstein 1983, Ch. 1），历史资本主义因此首要和关键地将自己表现为不同社会进程下的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商品化过程，它在其中形成了复杂的商品链（它不久就全球化了）。它不仅是一个交换过程问题，而且是生产、

^①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83, 18）写道，一种无尽的资本主义积累如何成为经济活动占据上风的唯一目的，但当这些过程渗透进了社会组织，这些过程中的反对声音更大、更响亮。

分配和投资过程的商品化问题。^①

詹姆逊（Jameson 2011）最近指出，商品不仅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先决条件，它实际上构成了资本的“前史”，因而严格地说“还未关涉资本”。尽管詹姆逊的贡献十分重要，但这些陈述似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问题的。商品形态不仅是资本积累的一个持久性前提，而且它的存在与构成部分（类似于原始积累）在最根本层面上促成了剩余价值攫取。从詹姆逊强烈支持的辩证法观点来看，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把商品与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分开是不可能的（历史地说，它们应当同时发展）。在资本主义积累周期的每一个领域，商品形态是一个关键的细胞形式（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周期的准确概述，可以参见 Fuchs 2011, 137—141），尽管生产过程可能是首要的，但资本主义不通过商品化或作为一个整体的商品形态来再生产自身，则是无法存在的，其中商品化促使了它的进一步扩大。

不论人们是否赞同他所提及的问题，詹姆逊都承认，在商品化主导的某一社会时期，这一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的持续批判中发挥着关键性政治作用。然而，默多克（2006）写道，关于几乎所有一切的商品化，沃勒斯坦和詹姆逊都走得很远，认为实际上所有一切都是可以商品化的。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Wallerstein 2011, 16, 26），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化倾向于普遍化，人们可以说商品形态具有

^①它可能适于区分商业化、商品化和对象化，莫斯科（Mosco 2009, 132f）指出的这三种进程通常是相关的。商业化还可以被称做市场化，它是三个进程中最狭义。它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表层发生了什么，换言之，在透明可见的市场上；在交换进程中，积累领域。拿传播研究中的商业化/市场化来说，将关系到受众和广告商之间创造的关系（Mosco 2009, 132f）。资本主义市场必须包括一些更多的这类交换关系；正如已经指出的，例如它假设劳动商品化生产了商品，因此也应该包括生产过程。在这一意义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商品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最后，对象化特别是指去人性化的特殊进程。拿卢卡奇（Lukács 1971）来说，他使用物化来表示人类和人际关系变得如物一样（thing-like）（Mosco 2009, 132f）。不是所有的客观化必然是一个商品进程。

倾向性主导。同样，沃勒斯坦指出，“全球积累过程是通过所有事物的商品化而发展的。”（Wallerstein 2001/1991, 24f.）

默多克解释了如何“只有在一个完全发展的资本主义体系下，商品生产和市场化才成了增长和利润的核心驱动力”（Murdock 2011, 18）。世界市场因此对资本主义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Hobsbawm 2011, 145），可以说，在过去 20 年，它最终在整体上获得发展，构建了一个普遍化整体，其中一切都被纳入到资本原则之下（Hardt and Negri, 2001）。商品化过程对于资本主义扩张以及原始积累（或是作为剥削的积累）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不断扩张也具有无法避免的必要性，因为没有不断扩张，资本主义体系就会发生危机。因此公平地说，商品化用自身形象塑造了世界。胡斯据此认为这一过程可以被视为理解社会变迁的核心。在她的观点中，基于商品化，“资本主义经济倾向于生产新的和不断标准化的产品，以求在市场上销售，它们的销售产生了利润，这种利润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扩大”（Huws 2003, 17）。

然而，博兰尼（Polanyi 2001/1944, Ch. 6）强调，存在着一种对于商品虚构的持续需要，以便使不同类型的商品在市场上的销售合法化，这不断提醒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极端虚假性。当某些领域市场关系仍在建立过程中以及事先还没有从属于商品交换的时候，它特别明显。正如博兰尼所讲的，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转变，需要新的虚拟商品来确保新经济关系的成功运作，其中最明显的是劳动力、资金和土地。在向后现代性转换的过程中，人们在另外一方面能够创建一个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时代，其中越来越缺乏未商品化的产品、过程，或活动，这些都无奈地被归入和抑制在经济主义合理性之下。^① 在文化工业有关章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①博兰尼所没有注意到的是，不仅土地、劳动和货币是虚构商品。所有商品都是虚构的。没有所谓“自然”商品这样的东西。简单的区别是，某些商品非常明显需要某种意识形态支撑（或一种潜在的虚构）来社会性地将其合法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同时其他商品地位很少受到质疑，特别是在它们在一个特定社会语境成功地被合法化成了商品。

(Horkheimer and Adorno 2002/1947, Ch. 4) 预言了这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指出它在商品化过程中生成。但尽管他们的分析很难被归因于推测资本主义能够将社会所有领域殖民化，却意味着人类生活几乎所有方面都可以被作为一种投资可能或一种市场机会去理解。因此，资本主义还不是仅将文化生产、公共空间和创造力，或更广泛地说社会符号，纳入到它的积累周期里面。首先，它确实使得文化和人类艺术创造力成为一种工业 (Adorno 2001/1991; Horkheimer and Adorno 2002/1947, Ch. 4)。另外，不仅是符号、公共表达和观念 (在今天) 不断被商品化，而且知识和信息也被商品化，而所有范畴在后现代社会正在成为资本主义一个组成部分 (Schiller 1989; Parker 1994; Fleissner 2009; May 2010)。马拉奇 (Marazzi 2008) 指出，信息和传播不仅是原材料，而且是一种劳动工具 (Williams 2005/1980, Ch. 2)。信息和知识变成了商品，如同其他商品一样被收购与兜售，在文化和信息领域生产各种资源。赫伯特·席勒称之为“意识工业” (consciousness industry)，同时表示，“由于各种原因，利润动机对各个领域的进入历史地脱离了当下这一普遍力量 (this now pervasive force)” (Schiller 1989, 91)。全新的私营工业得到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相似工业对我们如何思考和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行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see also Jhally 1987; Hardt 2004)。这些私有化和商品化过程在另外一面也构成了新的知识垄断，它在人类所有社会历史上都是独特的 (Innis, 2008/1951)。

德波 (Debord 1978, Ch. 2) 关于商品形式在后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完全浸入了景观之中的陈述，至今仍是对我们生活与书写的世界的最有力的阐释。德波触及了商品对整个人类生存的统治，提出景观作为一场永久性的鸦片战争，将自己沉迷到并贯穿这个商品世界。万事万物都被纳入了世界市场，随着它满足经济的资本主义类型及其工具理性厘定的规则方式而改变。由于商品是独立的，它可以自

主地统治整个经济和社会；社会生活因此被彻底殖民。在德波看来，景观实际上是“商品对社会生活整个占领的时刻。商品关系不仅是可见的，而且是唯一可以被看见的：人们看到的世界即是它的世界”（Debord 1978, Ch. 2, par. 42）。一切都淹没在景观之中，商品世界的完全统治通过景观满足了自身。德波的关注至少间接地指向了大众媒介和充满图像的社会，而且仅在十年后，大多数理论家承认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中介化了的社会。套用德波的话，在这些症候中，我们必须再次认识“我们的老对手：商品”（Debord 1978, Ch. 2, par. 35）。

德波的现代生活批判，在 50 年前写作完成的时候很可能被视为（或者甚至就是）一种夸张。但是，德波的许多观察在充分发展的后现代社会越来越明显，在这一社会中，诸如人类社交、体验和传播转变成了商品，并被交换。传播商品化的扩大因此也意味着这些讨论肯定会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它同时也需要尽可能地扩大它的研究视野和对如此侵占过程提供一种批判。

五、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受众商品论

资本对以往非商品领域的全球扩张表明，传播政治经济学通过许多方式开始覆盖各种探究，这些探究由源自社会批判理论的其他领域所促成。政治经济学批判（例如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更为普遍的社会批判理论）路径显然在媒介与传播研究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斯迈思（Smythe 1960）通常被认为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然而对媒介和传播批判研究路径更深远的起源甚至更早，至少要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Hockheimer 2002/1947; Adorno 2001/1991），或是英尼斯（Innis 2008/1951）。实际上，从这些著作者身上可以发现，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有着共同的起源，同

时在资本主义批判分析和文化进程中意见基本一致（Babe 2009, Ch. 1; Wasko 2005, 42f）。传播在后现代社会的日益重要性，促使了批判理论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之间出现了几个新的趋同观点（Fuchs 2010）。

针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如何思考商品化的过程，可以发现这种关系在至少两个基本方面的重要性。一方面，传播和技术一起支持了经济和整个社会中的商品化过程。工具理性中的技术作用对于商品化是必要的，它伴随着数字化变得特别明显。另一方面，不管怎样，商品化还渗透进了相关传播组织，开始侵入以传播为它们基础的日常生活实践。两者也被福克斯所强调，他对马克思的传播和媒介思想进行了一个细致阅读（Fuchs 2011, Ch. 4）。按照福克斯的说法，马克思认为传播媒介从最基本层面上来说，在跨空间协调生产、加快信息传递和协调不同企业间商品运输上是重要的。它们同时在一个更为根本的意义上也是关键的，帮助拓宽了资本对商品化领域的扩张，积累和消费在其中得以发展（但目前还没有）。这一过程因此支持了整个资本流通过程。莫斯可（Mosco 2009, Ch. 8）用“空间化”来形容这一过程，它指的是对空间限制的克服。我们可以看到，空间化过程是直接与商品化相连的。针对更狭义的媒介设施和媒介内容，福克斯还指出，对马克思来说，传输技术是由公司经营的。这意味着媒介不仅本身是商品（或基础设施），而且也因此传输商品。媒介可以被看作是“促进商品销售的广告信息载体”（Mosco 2009, 149），从而加速了商品流通。另外两个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批判传播研究至关重要的范畴是劳动和受众。正如前文所述，在劳动市场上兜售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经济诸多重要先决条件之一。一个重要的新颖之处在于，知识和信息变得完全商品化，它创造了一种新型劳动需求，从而能够满足这一“社会”需求。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劳动因此在它不同的传播形式上（如知识劳动、信息劳动、

记者劳动等)已被专门分析,大量工作是由莫斯可与麦克彻(Mosco and McKercher 2008)完成的。然而,本文焦点将特别集中在第二个范畴“受众”上。它们的商品化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相对创新,而作为商品的受众的概念化,提出了若干涉及社会领域内商品化普及的重要问题。

(一) 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下的受众

关于受众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方法是一种非传统和非寻常方法,它在大多数情况被主流以及关注这一话题的欢庆式传播研究(celebratory communication studies)所忽视。^①不管怎样,“盲点辩论”实际上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历史发展中最为激烈的辩论之一,它提供了一些对于理解受众如何被资本工具化至关重要的有益见解。这场旷

^①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样的事实,“代表性”著作在涉及受众时忽视了政治经济学批判。Sage在2009年发行了一部四卷的受众研究的论文集,题为《媒介受众》,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收集了许多文本,有1320页,但是它没有从政治经济学观点角度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见解(参见:www.uk.sagepub.com/books/Book233064)。同样例如适用于期刊《参与:国际受众研究杂志》,如今更名为《参与:受众与效果研究杂志》,“欢迎来自不用领域的贡献”,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文化与媒介研究”(参见:www.participations.org)可见,杂志基本陈述了所有可能方法、视角和规则,一个罕见的例外则是政治经济学。同样事情可以在由Virginia Nightingale(2011)编辑,近来出版的《媒介受众手册》中观察到,其中几乎完全回避了政治经济学(也许是Napoli的一个例外贡献)和仅仅纯属巧合(就算真有的话)地触及了权力关系、私人所有权、剥削或者阶级关系这些问题。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批判,在谈到受众时经常被忽略和遮蔽;他们往往被视为主动和赋权的“消费者—市民”。少到几乎对生产资料所有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没有作出反应。这意味着关于更广泛的结构性问题和社会整体性问题很可能完全被忽视或认为是理所当然。不同的是在这些方法中,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无关紧要的或预先假定因素待在幕后,它的影响不值得作任何深入分析:当进行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它们经常被看作是过时的和还原论主义的,甚至是故意曲解的(我感谢本论文评论员关于这一话题的评论,参见Biltreyest和Meers 2011的批判)。比如,这在费斯克有影响力的著作《传播研究导论》(1990)中非常明显,其描述马克思理论是“经济主义”。它还把它弱化成意识形态话题,对复杂的马克思主义论证给予非常简单的描述。

日持久的辩论，至少间接地在当今社会非常不同的技术和社会语境下持续（Bermejo 2009; Napoli 2010; Fuchs 2010; Caraway 2011; Biltereyst and Meers 2011; Kang and McAllister 2011），它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批判传播研究相关实践和理论的一个宝贵来源。更重要的是，它还对商品化如何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扩散，以及我们在弥漫着传播的后现代社会下如何分析这些进程提供了一些见解。传播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提供的见解，因此在当前历史时期提供一个广泛思考，超越了狭隘的肯定方法。

在“盲点辩论”下，媒介和传播的商品化话题已经超越了内容和媒介劳动，进入到了受众。受众成了关键的媒介“商品”，这一点能够并应该是学术关注的目标。在这一辩论之前，媒介内容被普遍认为是媒介向它的读者兜售的重要商品。有关“大众媒介是生产和分销商品的第一且最重要的工商业组织”的认知（Murdoch and Golding 1973, 205f），在批判理论家中间已经被广泛接受。批判传播研究作用的重要反思由斯迈思发起（Smythe 1977）。莫斯科（Mosco 2009）和米汉（Meehan 1993）都曾指出斯迈思首次提出受众商品论的论文，带来了批判传播研究的重大转向。批判传播研究的考察对象现在包括所有依存于广告的传播公司，而不仅仅是媒体。这实际上可以被解释为由传播政治经济学带来的可能分析领域的一次早期和根本性的扩大，这一领域范围被斯迈思的观念进一步拓宽，他认为在宽泛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可以被定义为“社会生活的控制与生存研究”（Mosco 2009, 3）。根据这一解释，政治经济学可以被视为最为整体的和包罗万象的方法，同时有许多类似于社会分析的方面，它实际上应当提供批判角色。

在许多方面，斯迈思的结论几乎预测性地证实了一些议题，这些议题后来在关涉物质工作和后福特生产的组织变迁中变得十分重要，这一点已被高兹（Gorz 2010）很好地证明。因此，评估斯迈思

一些关键的、挑衅性的陈述及其在新媒体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兴起下的持续有效性，显得至关重要。

（二）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和技术变迁

现在有必要从斯迈思（Smythe 1977）引发了关于受众商品辩论的原著中提取一些关键论点，这些论点不仅仍具有现实相关性，而且实际上自被提出以来，它们已经被技术与社会变迁所强化。^①

首先，受众是重要商品，它们在市场上被制造和兜售。不仅如此，受众还是劳动。这些是“受众作为商品”讨论的主要起点。斯迈思声称，媒介工业生产的最重要商品是受众本身，它被创造和兜售给广告主。这一论点不仅经受住了时间考验，而且在提出后，其重要性得以提升，它被其他一些讨论类似议题的批判方法所论证。这显得特别有趣，因为当斯迈思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关于受众商品化的理论经常被驳斥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他本人也被批评者指控为经济还原论者（Meehan 1993）。媒介作为一种商业受制于利润逻辑思想的恢复，在文化研究主导时期甚至显得过时。在1990年代早期，米汉（Meehan 1993）认为，斯迈思的分析和随后的断言实际上本可以更加激进。根据她的说法，斯迈思这些论点的有效性已经被历史和现实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②事实上，根据最近对这一辩论采用新观察角度的比尔特伊斯特和米尔斯（Biltreyst and Meers

^①斯迈思（Smythe 1977）早期主张之一的批判理论（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传播（因此是“盲点”）。40年前可以被断言，但是今天很难。它甚至当时还是一个有问题的论题（无论是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那里，还是在SFR Yugoslavia工作的一些研究者那里），默多克（Murdock 1978）在对斯迈思的回应中充分地将其指了出来。如今，我们拥有一个发达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同时还有一些激进的新马克思主义立场，例如自治主义，提出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的主要范畴从根本上说是传播。

^②正是受众（那些再次被降为商品的生命存在）、媒介内容和广告主（代表资本）之间相互矛盾（几乎是敌对的）的三层关系，在这里至关重要。

2011) 的说法, 媒介内容是次要的, “免费午餐”是最好的。媒介实际上首要和重要的是生产受众, 而不是节目或者内容! 这意味着媒介趋势是成为单纯的受众狩猎采集者 (hunter-gatherers), 而休闲时间成了资本主义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能够扩大和商品化此前未知领域。休闲时间或非工作时间被纳入到资本之下货币化和被定价 (valorised)。

有趣的是, 阿多诺 (Adorno 2001/1991, Ch. 8) 指出, 这些进程早在 1969 年他发表论文《闲暇》(Free time) 时就已经发生了。他指出, 闲暇成了自己的反面, 是对自身的反讽, 因为它只是唯利是图生活的一个连续; 它屈服于生产过程中的类似规范和非自由特性。他借用爱好观念揭示了这一点。现在每个人都要有一个爱好, 它可能由“娱乐业”和“休闲工业”来提供 (两个词都失去了它们的所有讽刺意味)。自由时间因此受到许多社会控制。在所有生命时间整体性地商品化之前, 它因此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与阿多诺一样, 威廉斯 (Williams 2005/1980) 指出, 10 年后传播方式必须被视为一种生产方式, 这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 其中传播显著发展, 成了一个重要的 (直接和间接) 生产力。

其次, 在这些初步发现基础上, 更重要和激进的一个论题被斯迈思提了出来。仿佛仅仅是继承了阿多诺和威廉斯思想路线, 他声称, 今天“大多数人工作时间是一天 24 小时” (Smythe 1981a, 121)。这些发现的结果是激进的和广泛的, 而更重要的是, 斯迈思的意见一天一天被证实。即使有人不赞成斯迈思关于如何界定劳动的意见, 他的论点却从根本意义上表明了商品化在整个社会新领域内的激进扩张。

斯迈思的两个论题表明, 劳动时间已经大大地延伸进了非工作时间, 劳动力经常被再生产。杰哈利和利文特 (Jhally and Livant 1987, 83—90) 深化了这一观念, 而且坚定地将他们的观点建立在

马克思概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他们指出，观看（作为一种劳动形式）实际上恰恰是工厂时间的一种延伸，这不应该被视为一种隐喻或象征。它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形式，在整个媒介经济过程中至关重要；如同劳动者如何向资本家出售劳动力一样，受众向媒介拥有者出售它们的观看力。闲暇因而在当代资本主义运作中成了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被纳入到资本之下货币化和被定价（valourised），受众被工具性地看待，唯一的目的是（剩余）价值榨取。受众活动（听、看、浏览、“点击”）创造了价值，这一价值被资本家据为己有，进行交换的是提供了一个表面上免费的午餐（各种类型的内容）。

以上所述的斯迈思观点还表明，不论人们是否需要或者知道，社会和个体的所有方面都可以被完全商品化和卷入资本主义积累周期。应该说，基本上没有人类劳动被遗留，其中一定数量的交换价值很难被榨取或据为己有。这种可能的原因也源于数字技术的兴起，它开始在这些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提供前所未有的细节和测量、量化和控制的进一步合理化（Napoli 2010; 2011）。拿破里（Napoli 2011, 10）甚至更深刻地声称，对今天媒介公司能够使用数据收集的广泛选择让互联网变得非常重要。这些技术使得记录用户（或者是营销者话语：个人消费者）的空前细节成为可能。在这一意义上，卡斯特（Castells）关于互联网是我们生活组织物的观念，在涉及侵犯人们隐私时候，应该被严肃对待。

新数字技术带来的关键变化是，提供了控制和测量受众新方法：（1）分化；（2）正式地提升受众自主权、参与和契约；（3）消费的空前控制；（4）用户和受众测量的空前细节（Napoli 2011）。媒介环境的分化及其带来的受众创造了一种日益突出的“长尾”情景，它将受众碎化得越来越小。从早期大众媒介特有的广播（broadcasting），到由卫星电视和基础设施私有化与放松管制促使的“窄播”

(narrowcasting)，最后再到大概由数字化和互联网促成的“点播” (pointcasting)，这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后者借助几种不同技术和方法，促使了一个激进的“测量合理化”和可能货币化的所有活动的充分量化 (Gandy 2012; Andrejevic 2012; Fuchs *et al.* 2012; Prodnik 2012)。毋庸置疑的是，网络用户 (也被称为“网迷”) 在如何使用新媒介方面，较之以往能够更多地参与并有更多的影响，但从互联网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促使平台的拥有者使用一个更加详细的测量方法来测量他们的活动和喜好，或许还有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个人信息。盲目地推测互联网已经开启了革命的可能性的观点显然过于理想化了。一个更加唯物主义的方法应该考虑广泛的社会背景，认识到这样一种事实，不对称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一直在增长，而互联网不幸地对减轻这一点却毫无作为。反之，甚至可以这么说，一定程度的数字化扩大了差距，强化了集中和有权者与被剥夺权力的大多数者之间的差异 (Hindman 2009; Bellamy Foster and McChesney 2011)。

谷歌毫无疑问是这些特征的经典案例 (Kang and McAllister 2011)。该公司获取的主要利润来自于广告 (特别是它的主要广告产品谷歌广告)，借助对其用户的广泛商品化，将他们分化成小众市场受众，再将他们出售给可能的广告主，这些广告主则提供了关系到这些受众的特定类型的商品。一个由马拉齐 (Marazzi 2008) 提出的关于后福特主义经济的论断，详细地指出了公司的这一关键职责：产品差异化成了获取消费者注意的方式之一。在这一观点下，生产一定程度上变成了背景，而以前很少值得关注的注意力经济升到了重要位置。实际上，谷歌的年收入相当于一些较小国家 (如拥有 200 万人口的斯洛文尼亚) 一年的预算，并 (正式地) 雇佣了 3 万人。这只有通过严重侵犯了用户隐私才有可能实现，而这一过程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经济监测 (Fuchs *et al.* 2012; Prodnik 2012)。如

帕斯昆内里 (Pasquinelli 2009) 和福克斯 (Fuchs 2012) 这些研究者指出，谷歌公司资本积累过程一个最重要的来源是它的平台使用者的无偿劳动，而全球网络内容生产者是一来源。两者之所以是被剥削的，因为谷歌公司能够从他们的活动中提取剩余价值。这使我们直接面对社会工厂的界定和来自自治主义 (后工人主义) 运动的“一般智力”，这将在第六部分讨论。

(三) 卡拉韦对斯迈思的批判与政治经济学主题

最近对斯迈思论点最有力的一个批判来自卡拉韦 (Caraway 2011)，他大力反对了斯迈思在其有巨大影响的研究中提出的若干基本假设。然而，他的批评并不能代表一系列不同的反驳，这些异议主要来自于文化研究领域，总体上往往是针对政治经济学的 (综述参见 Biltereyst and Meers 2011, 417—424)，这也为本文的语境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在这里特别如此，因为卡拉韦声称他给予这一话题一次马克思主义重温。他的文本因而需要一个简短的补充说明，如此可以更好地融入这些早先提出的问题和话题。

人们可以完全同意卡拉韦对主张受众商品论的学者提出的几点反对意见。首先，他称这一方法夸大了受众联盟作为一种价值来源的程度和免费劳动的实际达成，因为受众活动不是直接受控于资本家 (受众商品交易)。他的第二个观点是与第一个相关联的，即这一方法特别是斯迈思自身，完全缺乏关注主体性及其能动力量 (受众权力和媒介内容作为免费午餐论题)。第三，缺乏对使用价值的关注。无论如何，追问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方法，以及什么学科领域影响了这些作者工作，这一点至关重要。对此作出回答可能会澄清一些难题。让我们从最后一个开始，更仔细地看看他的论点。

卡拉韦认为，“对受众从媒体产品中获得使用价值的考察，将会表明资本家对生产领域统治的局限性。” (Caraway 2011, 700) 正如

本文早先指出一样，在《资本论》第一卷几乎没有使用价值观察资料。相反，马克思关注的几乎全是交换价值。他发现使用价值简直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附庸，甚至将交换价值等同为价值。这不是因为他个人觉得使用价值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因为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怎样运作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甚至深入地陈述，“使用价值，存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主要因为它是“商品的一个必要前提”（Marx and Engels 1987, 270）。“由于商品使用价值是假定的，具体实用性和依附其上的劳动的一定效用也是假定的；但这是劳动作为有用劳动的唯一一面，它与商品研究相关。”（Marx and Engels 1987, 277）商品必须经常具有一些社会有益价值，但其实际内容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Jameson 2011, 35—37）。^① 恰恰是某一特定商品使用价值的社会（或者社会性地相关）特征让其成为一种交换商品，同时，这一特征也使其实际内容特别不重要，只要它还拥有消费者；基本上，任何事物都能够商品化，只要它具备一定的使用价值以及其他人需要它。使用价值为商品注入了商业内容，这使得它们成了“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但“显然，商品交换关系的准确特征就是对使用价值的抽象。在交换关系中，一种使用价值等同于另外一种使用价值，只是表现为量的不同”（Marx 1990/1867, 126f.）。交换价值是基于关系或比例的一种量的关系，就我们在此关心的议题而言，对 Lady Gaga 新近夸张造型的闲聊，也能够是交换价值，只要社会认为这些使用价值有足够关联去消费它们。

其他著述者，其中最著名的是杰哈利（Jhally 1987），关注了关于商品拜物教和符码（即是大宗商品所制造的意义）社会建构的

^①或转用 Sohn-Rethel 的话：“作为它可能性的一种条件，商品交换要求，当它们受制于交换业务时商品使用被暂停。”（Sohn-Rethel 1972, 51）

使用价值的作用，尽管保留着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范式。正是因为斯迈思自己没有关注到这一方面（马克思也没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方法是不正确的（他只是选择了一个特定角度）或甚至是认为其他角度没有价值，比如杰哈利的角度。针对马克思有相当多的攻击，认为他自然化了使用价值和制造了交换崇拜。这些批判并不新鲜，但几乎都不太公平。政治经济学自身没有关注使用价值，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在社会上是无关紧要的（恰恰相反）。

现在让我们转向卡拉韦的另外两个批评点：受众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对资本实际臣服的，以及能动性发挥了什么作用。他声称，不论是在斯迈思还是杰哈利和利文特的分析中都发现不到任何证据“表明所述的劳动过程（受众—劳动）是在资本控制之下的；也没有任何尝试去说明使用价值是脱离受众的”（Caraway 2011, 697）。然后，他提出了新技术监视，但强调有必要“继续地再评估资本能够将这些活动带进积累逻辑的程度。……这些努力的效用应该受到高度质疑”（Caraway 2011, 698）。他接着说，“对受众确切和公正的测量，如同幻想。”（Caraway 2011, 699）

在我看来，卡拉韦的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是错误的。他不无正确地认为，在媒介关系上资本家没有直接控制劳动。这当然是真的，但在传统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也没有完全控制劳动者；媒介所有者可以通过内容来“购买”受众兴趣，而在这两种状况下，劳动者如果想去消费都没有过多的选择（当然还有关掉电视的选择，但这种莫名其妙地、奇迹般地增加的受众权力，不过是一个理想化假设）。相比劳动过程，这里的关系明显不是那么不同。劳动者，就非常像受众，可以形式上地选择为谁工作；然而在现实中，他们的选择在两种情况下都是非常有限的。媒介工业老板像传统资本家一样，十分清楚他们能够出售什么以及能够花销多少以确保利润。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关门。计算是非常简单的，如果它无法算出来，业务

就无法生存。这里不需要神秘化；一个资本家将适应他必须面对的任何执行环境。它也将读者引入歧途，借助斯迈思的表述是“受众并不显示为商品卖方”（Caraway 2011, 697）。他们的商品是抽象时间，这些抽象时间被“卖”给媒介所有者而换来内容，所以说是他们的“自由时间”，或休闲时间。涉入交易的使用价值实际上是不重要的，但进入具体细节层面，数字时代的使用价值是媒介所有者能够将其卖给广告商（或非常简单地，他卖了他们的注意力，只要这些受众分化极低）的受众个人特征（社会地位、兴趣等）以及非常引人注目的由受众在数字环境下所生产的内容。这里没有契合马克思主义分析并非是什么不寻常的，“受众和广告主之间没有正式的合同、协商或讨论条款”，也不是完全正确的（Caraway 2011, 697），卡拉韦似乎觉得这是劳动作为商品出现的关键方面（这并非如此；唯一的前提是，劳动者将劳动力投至市场时有能力自由地选择剥削者）。卡拉韦所提及的一切实际上大部分非正式地确实发生，但在互联网上经常是正式的，例如通过使用条款和隐私声明（Sandoval 2012），而协商在鼠标点击或远程控制下正在进行。媒介内容消费者能够改变“雇主”，在互联网上，一个人通过建立个人网站很容易进行自我雇佣，但它在现实生活情况下会面临诸如谷歌或脸书网（Facebook）一样的巨头，当然将有巨大的生存困难（就像发生在现实世界经济一样）。

卡拉韦在整个文本中的主要问题是，他在两个非常不同的论证层面上作出区分：抽象层面和具体层面。两个层面当然非常重要，关注趋势发展的抽象论证，建立的唯一目的是解释具体现实活动。抽象论证抽象化了详细情形和实际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几种操作机制，然而它永远无法完全解释具体现实和详细情形，因为它的洞察力是有限的（故意如此）。马克思使用抽象化的原因在本文前面已经陈述，但一个可能最明显的原因是，深入到具体现实层面，没有办法

分析一切事物，因为具体层面分析唯一关注的是详细情形（这些分析可以带来大量新知识，但话说回来也非常少）。如同科利尔（Collier 1994, 255—259）所指出的，完全理解具体物是不可能的，难以认识到这一点经常让我们忽略了关键机制和决定因素（或我们最好用很少的解释力来建构普遍化）。^①

卡拉韦无力解释政治经济学需要抽象化（以及关注趋势发展），这在他的陈述可以看出，“广告主购买的不是受众力而是受众的编造形象，正是这种加工编造需要受到批判性学术质疑”。难道他真的相信广告主不知道吗？他们购买一个粗略的、抽象的、统计学构建的受众而不是“真正”受众：这里有一个相对趋势，（由于他们拥有所有数据，）他们所购买的加工编造的受众在很大程度上按照他们计划的方式产生举止规矩。在抽象论证上，他们必须这样做，否则广告主会破产；按照抽象推理，这一粗略性必须足够接近现实，从长期角度使其成为一种合理购买（真实地风险投资购买这些加工编造物，这不是批判性学术；如果这不是一个提高资本收益的经济实践的话，他们会完全放弃它）。它非常类似于资本家，从来无法提前知道他能否从所购的劳动力身上获取足够多的剩余价值，因此他能够用计划生产的大宗产品来占领市场（资本家需要预测到他将足智多谋得足以控制劳动者和榨取足够剩余价值）。来看具体例子，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从来没有完全控制他所雇佣的劳动者；在最糟糕情况下（对他来说），工人将会罢工。或在媒介所有者最糟糕情况下，受众将停止观看他所生产的内容（这意味着他要么实况转播其他内容、降低花费以符合购买广告带来的金钱，或者关门）。抽象方法当然是去主观化的，但这正是资本主义实际上所做的：合理化、对象化和

^①然而事实是，理论从具体到抽象的深远迈进更容易出错，应该指出的是，“为了解释具体危机，我们不得不通过分析（思想）来阐明那些导致它之所以如此的多种机制和趋势”（Collier 1994, 255）。

抽象化。

值得我们反问自己的是，除了目前大多数已故的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者，是否有人真正相信马克思在他的后期著述中对主观性和工人阶级权力缺乏明显兴趣，这些主题直接指向他对世界进步变化的不关心？这违背了他整个生命中的大多数实际行为。相反，正是因为他缺乏对主体性关注，他才能够抽象地分析资本主义体系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再者，只是在抽象而不是必然的具体层面上，其他几个趋势才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人类能动力量能够抵制这种征服）。如果某人接受古典政治经济学构建的资本主义市场理想类型，他不得不从对于抗击资本主义最为重要的具体现实其他方面进行抽象，来揭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如何剥削工人的。^① 抽象化为马克思和斯迈思提供了一个观察资本主义如何以一种抽象形式进行运作的特殊视角，很明显这一视角是不完整的；它忽略了广阔的社会生活部分。这是一种抽象，非常重要但在范围上依然有限，这是任何抽象化的一大特点。不过，如福克斯所指出，斯迈思实际上没有忽视主观能动力量，尽管他发现没有自发抵抗。^② 正如斯迈思在《依附之路》中所指出的：

确实，人们受到了意识产业无情的压力；他们被纷至沓来的商品和服务包围；他们把自身制造成了（受众）商

^①让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亚当·斯密和他《国富论》中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他的论点大多是抽象的，让我们无法用具体实例去反驳（即当它们应用于具体现实时，他的理论被认为是失败的）；哪怕迄今为止，我们期待看到这样一个完美的竞争市场，这是他理论的根基（可以说，从未有这样一个例子，特别是在上个世纪）。（Harvey 2010）

^②这一论题在他题为《社会媒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全讨论中被提出，论文是2012年5月3日在（瑞典）乌普萨拉举行的21世纪信息社会会议“批判、民主与哲学”论坛上宣读的。他还指出，私下里说，斯迈思在所有范畴中关注的是劳动——劳动是一种活动，它本质上是积极的人类主体进入的一个场所。

品；他们再生产了他们自己生活和被损坏的能量，并采用商品形态。但是人们绝不是被动或无力的。人们尽最大努力去抵制资本强大和多样的压迫。这里有一定量的个体和群体抵抗，每天被再生产出来，激起了人们的天生能力和对爱、尊重、群体关系和创造力的需要。核心区域（如在整个世界）的主要矛盾在于人与资本之间。目前，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①（Smythe 1981b, 270f）

卡拉韦关于斯迈思据称对能动力量无知的观念因此似乎并不奏效。即便如此，批判一位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因此采用一种特定的认识论立场）推动研究的学者没有关注主体性，似乎类似于批判一位一线医生说他不是一位化学家（或一位木工，因为他不是一位水暖工）。人们可以给予更多的视角，但如果他不是（这一行业），为什么因此而责备他呢？虽然社会科学需要包括几种不同视角，特别是它们是批判的，但同时必须知道从不同学科进行分别分析，在不同的方法及其主题之间进行区分依然是重要的；在我看来，简单地将一种方法与另外一种方法混为一谈将是一个错误，即使它们对于社会分析具有不同的贡献。

许多作者——马克思或许是其中之一，特别是如果他接受詹姆逊（Jameson 2011, 37f）关于《资本论》实际上不是一本政治行动著作的核心评论——将可能会认同关注能动力量（例如，不同主体性的抵抗和社会运动制造的（反）权力可能性）不是一个简单的政

^①斯迈思对机构的这一引用被 Fuchs 在乌普萨拉会议上的演讲所介绍，来自于他的陈述，参见：<http://www.scribd.com/doc/92818866/Christian-Fuchs-Critique-of-the-Political-Economy-of-Social-Mediaand-Informational-Capitalism>。另见 Fuchs 即将在“三C”（Triple C）刊出的长稿（题目：重组达拉斯·斯迈思：受众商品、数字劳动辩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当今批判理论）。

治经济学（或批判）主题。在任何情况下，政治经济学可以甚至必须被视为成功的政治行动的核心前提，它触及了财富再分配的需要，并为看清财富来源（人类劳动）提供了基础。^①只要人们愿意（不用寻求稻草人论点或抽象化带来的简单不足），没有理由不去用激进的政治理论来补充这一政治经济学视角。这是奈格里和哈特（Hardt 2001; 2005; 2009）的一个方法以及所有自治论者的思路。但是能动力量和主体性实际上从来都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卓越主题。它们是（激进）政治理论主题。就个人而言，我发现当人们声称奈格里和哈特采取了一个关注大众而忽视无产阶级（好像它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这样一种简单路径时，它更为混乱不清。情况不是这样的。类似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著述，在奈格里和哈特的著作中，无产阶级可以被视为一个技术性概念（就像马克思著作中的其他几个概念，如商品拜物教或剥削，参见 Harvey 2010）。正是这些解读类型将它们转化成了政治概念。例如，自治主义提供了对这些概念的政治性解读，这些概念是技术性的和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构建的（Negri 1991/1984; Cleaver 2000/1979）。大众（Virno 2004; Hardt and Negri 2005）在另外一方面可以被视为激进政治理论派生的一个概念，这种理论没有可能去否定或反对无产阶级，而只是用另外一个概念来表扬这个概念（派生于一些特定领域）。同时它也不排斥他者。我在这里的目标当然不是盲目地捍卫政治经济学是唯一正确的。相反，我觉得很多情况下，如果只是通过关注趋势发展和机制提供了一种“客观论”阐述，它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然而，它的基本前提应该被认为是值得的，荣誉应该被赋予应该拥有荣誉的地方：如果马克思没有率先给我们提供一个严格的技术性、抽象性、非主

^①Barbalet (1983, 29—30) 强调，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形态（比如商品拜物教）废除需要社会和政治行动，而不是科学调研。批判科学无论如何是更广泛的革命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观和非政治性解读的话, 这些政治经济学核心概念的政治解读将是不可能的。

六、交际性 (Communicative) 资本主义和社会工厂

传播政治经济学所展现的观点和后工人主义 / 自治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关键差异是, 后者将其范围延伸到了媒介和传播之外 (尽管在一些情况下它从互联网上选取例子用于个案研究)。它也投入更多精力关注主观能动力量; 生产价值的是个体对象, 因为价值生产已经蔓延到了更广泛的社会 (如“社会工厂”), 这提供了政治可能性的激情扩张和人类对这一过程的抵抗。

一些关于受众作为商品的发现和观点, 可以直接与这一思路联系起来, 我们能够看到在批判理论方法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之间具有若干融合点。创作者根据这一新马克思主义“学派”, 认为传播甚至诸如语言能力在当代社会占据了支配性的首要位置, 因此提供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几种可能中的唯一一种。“社会工厂”概念披露了工作如何超越场所 (即工厂), 通常试图做主将生产过程组织进更广泛的社会中 (Negri 1984/1991; Negri 1992; Terranova 2004 etc.), 也间接地指向了一个成熟的商品化社会, 这一认识非常类似于斯迈思及其他参与受众商品争论的学者们的观点。

诸如阿甘本 (Agamben 2000, 109—120)、维尔诺 (Virno 2004)、泰拉诺瓦 (Terranova 2004)、马拉齐 (Marazzi 2008)、奈格里 (Negri 1991; 1984; 1992; 1999)、奈格里与哈特 (Negri and Hardt 2001; 2004; 2009)、迪恩 (Dean 2008)、帕斯昆内里 (Pasquinelli 2009)、高兹 (Gorz 2010)、弗马加利和梅扎德拉 (Fumagalli and Mezzadra 2010)、莫里埃·布当 (Moulier Boutang 2011) 以及其他一些作者, 最近正在撰述有关交际、认知甚至是符号和生物语言学资本主义的

变迁，其中传播和语言占据重要地位。它们甚至被视为有关人类这一特殊存在的更为深刻的本体论主张（Dyer-Witheford 2004）。类似研究发现此前被拉扎拉托（Lazzarato 1996）运用，他关注的是非物质劳动。后来，高兹（Gorz 2010）对这一类型劳动进行了最仔细的分析。高兹揭示了非物质劳动如何转变成当代社会工作支配形式和价值创造源泉。由于这一转变，人们完全被纳入资本之下，进入个体企业，他们必须到他们该到的企业，必须持有尽可能多的人力资本，“基于自我创业关系，所有人和整个生活最后都被推去工作和被剥削。生命变成了‘最宝贵的资本’。工作与非工作之间界限消失，不是因为工作和非工作活动采用同样技能，而是因为生活时间减少，整体地落入价值控制之中”（Gorz 2010, 22）。

这是非常奇特的。重要的是要注意这样一种劳动和非劳动时间之间的密切关联，远非资本主义社会常见。恰恰相反，伴随资本主义兴起，被视为生产的（借助资本）和非生产的之间发生了一次彻底分裂，其中非生产的仅适用于人类生活再生产。如同汤普森（Thompson 1967, 59f. ; 1991, Ch. 6）所论证的，任务导向的工作和“工作”及“生活”之间的模糊界限，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其间社会交往和劳动混在一起——根据任务确定工作日时长或合同——而且在劳动和‘打发时间’（passing the time of day）之间，冲突意识不再强烈”（Thompson 1967, 60）。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在历史上一直被时钟严格测量和定时（有着深远意义）。汤普森不仅论证了时间感知是社会性建构的，而且时间的线性测量对资本主义至关重要。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由资本家和劳动剥削构成的，它的一个先决条件因而是能够测量劳动者劳动。这即是抽象时间意味着一切，尽管资本家已经开发了一些新测量技术，并促使一些学者论述了新泰勒主义或数字泰勒主义（Brown *et al.* 2011, Ch. 5）。然而，它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如果我们知道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岗

位，而其间的劳动却无法轻易被测量出来（Gorz 1989）。这通常意味着新泰勒主义实践接近于一个纯粹的表象，因为它们无法测量任何具备独特意义的事物。然而与以往一样，它们是监视和劳动力控制的有效手段。当然，这一困难随着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之间不断地模糊而越发突出。正如波斯通（Postpone 2003/1993, 26f.）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发展过程中，价值作为‘真实财富’生产测量方式变得越来越多余。[……] 价值在促进价值提升的潜在的生产体系中变得过时了；这种潜在的实现必须废除价值。”这意味着“价值废除预示着劳动时间不再被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财富生产不再根本上是由生产过程中的人类直接劳动所产生”。波斯通因而清晰指出，“依据马克思说法，克服资本主义需要实现生产资料形式和人们工作方式的根本转变。”

大量劳动在生产过程或者传统上作为生产场所的场所（如工厂）之外开展，历史上这不是一个新奇的事情。然而，这类劳动被认为是非生产性资本，也经常被指示为“进步的”社会主义运动，后者由基本为白人男性组成的所谓“真正的无产阶级”构成的（Huws 2003）。然而，这些场所对劳动者生活的再生产至关重要。这里有一个显著情况，即妇女在家庭中所进行的非生产性劳动，其中的差异与分化是基于性别的（关于更广泛积累过程中的这种劳动作用，参见 Wallerstein 1983, 22—28; Fortunati 1989; Huws 2003）。按照弗图纳提（Fortunati 1989, 9）的说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双重特征，分为生产和再生产。后者被视为无价值（它经常是没工资的，在家里进行的），前者被认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了价值。然而，弗图纳提扭转了这一逻辑，阐明了再生产是生产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际上，“它显然对作为资本主义周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创造作出了贡献”（Fortunati 1989, 8）。它是从事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间接性工资劳动，同时实现了一份工资剥削了两个工人。这种观念在

今天得到了深入发展。比如，胡斯（Huws 2003，27；45f.；68f.）使用了“无偿消费劳动”和“消费工人”术语来指代许多无赢利工作，这些工作促使回到消费者那里，强调了普通人为了再生产他们的劳动力（因而是他们生活）而必须做的不付费劳动。这种工作经常由妇女完成，她们受到了这些要求的不平等作用，再生产了性别关系。最新奇的是，资本已经能够将（所谓的）“经济外部性”这一类型纳入了它的积累周期。

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里没有对劳动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劳动在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进行太多思考。这些确实可以被视为今天政治经济学需要面对的主要困难。我们也都不想要在这个或许是全新的资本主义阶段关注资本主义结构变化。我们在此需要考虑的似乎是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即商品化得以侵入人类生活的程度，哪里和什么可能被殖民，需要什么条件。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分析目前历史时期商品化作用，还是资本在什么地方能够榨取剩余价值，斯迈思的早期研究发现和几种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言论之间具有显著的融合点。根据双方结论，商品化过程没有限制，同时许多批判传播学学者在他们的理论工具方面形成了一体化的自治主义者（自治论者）视角，这不是一个巧合。两者似乎充分展现了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1983年声明的真正价值，即“如果马克思今天还活着，他的主要工作将是传播而不是资本”（Nordstrem 2004，13）。

正如自治主义者（自治论者）作者声称的，现代社会当下新颖之处在于，在资本主义积累循环中，资本试图囊括仅有的人类能力来生产知识、传播、迅速适应多变环境（灵活性）、参与或合作。这些能力是人类特有的，他们有能力创建社会和政治机构。这些特征被当代资本借助不同技术和设备直接“雇佣”，发挥了从活劳动身上榨取价值的作用。这种说法甚至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趋势，

它在殖民化能够榨取价值的各种领域时，不能为自己设置任何障碍。

这直接适用于对维尔诺（Virno 1996/2004）“一般智识”概念的重新解释，这一概念源自马克思《经济学批判要纲》中的“机器碎片”。维尔诺认为，后福特资本主义调动了描述我们人类的所有官能（如语言、抽象思考、可塑性），这个论点产生于他的社会本体论。在维尔诺看来，这些能力在一般人类那里都有，“后福特主义调动了描述我们物种的所有官能：语言、抽象能力、学习倾向、可塑性、没有坚习惯的习惯”（Virno 2005, 29f.）。正是这些特点，可能被所有专业和职业所使用（在确定的传播意义上是人类语言能力的必要的社会表现）。相反，帕斯昆内里（Pasquinelli 2009）使用术语“共有智识”（common intellect），表明了资本实际上是如何利用所有人共有的人类能力，同时占有我们共有的社会生产而不付费的（Hardt and Negri 2009）。

正如 Chicchi（2010）、Marazzi（2010）和 Vercellone（2010）所指出的，金融资本已经传遍了整个经济积累周期。这在根本上意味着金融目前出现于经济循环所有阶段，从开始（生产）到结束（消费）。这是金融资本能够在传统生产价值区域（即工厂边界后面的交换价值生产）之外榨取价值的主要原因。这同时意味着商品化得以在生活各个领域蔓延。

七、结 论

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一直贯穿全文，更多问题被提了出来而不是给出答案。其中一个肯定是劳动这一范畴：它在当前历史语境下包含什么？对许多人来说，思考这样的观念或许是不容易的，即普遍所称的“休闲时间”可以被界定为一种特殊劳动类型。我在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一个必然的历史现象寻求永恒的、人类学的或本质论

(essentialist) 的定义，即资本主义社会语境下的劳动。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什么被资本认为是劳动，不论这一特定类型劳动如何令人难以置信或者它的产品在我们看来是私人的（甚或有人会觉得这些生产的使用价值是多么多余，因为没有任何真正需要去证实其中任何一个，我们只需要观看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政治经济学及其批判首要和关键的是需要技术定义，而不是道德定义，后者将促成对资本主义政府的激进式政治抵抗。是否可以往前一步认为，任何为商品拥有者生产额外交换价值的活动都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劳动（不论这一额外价值有多大）？这和源自马克思著述的马尔库塞的定义很接近。马尔库塞界定劳动是，“在最后的分析中借助它资本主义才真正地被理解，意指在商品生产中制造剩余价值或者‘制造资本’的活动”（Marcuse 1955, 293）。这种意义上的生产力总是由资本单独界定的。

现在要期待的是更为详细的答案，但重要的是承认社会和经济层面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及我们对它们当中的许多地方缺乏可以接受的答案和深入分析。通过本文提出的问题和困境，这些转变的指标已经明确。我们可能因此会对包罗万象的商品化提供一个工作论文。这个论文需要进一步论证，但可以给一些基于这个话题的已经提出的想法奠定一个坚实基础：

资本主义结构性趋势，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世界综合经济体系，它不仅商品化和定价化（valorise）了所有物质和社会生活，而且将人类生活本身（即类存在）纳入进了它的积累周期：言语以及说话〔逻辑〕能力，我们的感受和情感以及我们进行活动的人类一般能力。这一趋势决定着人类生命中没有哪一秒将会通过脱离工具理性和详细算计的经济循环而被浪费掉。每个人类行为都被覆盖，社会生

活每一方面都被仔细测量。

马克思已经能够表明商品形式和交换对于我们社会生活和个体化的重要作用。但是目前阶段的商品化远远超过于此；它开始侵蚀和改变几乎整个人类交往和关系。它不仅在传媒领域工具化（instrumentalises）传播，也可能侵犯人际传播，将人类变成机器人。当商品开始统治社会，使用价值的任何独立可能性都是被根除的。任何缺乏交换价值、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变得一文不值、可有可无和无关紧要（整个欧盟领域严厉紧缩措施的真正意义还有什么呢？）。让我们担忧的不仅是社会沟通，这可能多少是一个抽象概念，还有民主生活的基本范畴。信息和传播不能只被看成是诸多商品类型的一种。它们是我们认为的建立在不受压迫和表达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和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哈特（Hardt 2004，74）所强调，传播在多数具有说服性的民主定义中处于中心位置。但是如果整个传播过程变成一个巨大的、相互联系的世界性商品链并必须在“强制竞争法则”（Marx 1990/1867，433）下运作：从生产（知识劳动）到内容、设备以及受众——人类，那我们真的可以说存在言论自由吗？当“创新、知识工作变成了大规模生产，而个人思想遭受符合市场需求的思想审查，预测和重复是商业成功的关键”（Hardt 2004，34）时刻，是否还有自由？当关键的传播渠道和表达自由实际上被垄断（或最多是寡头垄断）和被最少数的精英阶层拥有（McChesney 2008）^①，是否还有自由？

^① 麦克切斯尼（McChesney）进一步强调，“媒介在美国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反民主力量。媒体企业巨头变得越富有，权力越强大，参与民主的前景越贫穷。”（McChesney 2008，426）哈特同样认为，“媒介已经成了美国社会企业势力范围一部分，它将经济主导转化成了政治霸权。因此，媒介形构了意识，帮助强化了主导企业意识形态，后者成了统治性的政治意识形态。”（Hardt 2004，48）

可以说，从一开始，批判理论已经驳斥了工具理性和那种没有反思或批判地将人类及其关系工具化的实证主义世界观（Fuchs 2011, 11—26）。作为批判理论家，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对这些过程进行有力批判。之所以如此，特别是因为持久的工具主义与经济理性，它们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总体的、看上去前所未有的商业化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相信沃勒斯坦，不管怎样这些进程都至少有一个积极结果：“全面商品化最终揭开了市场面纱”（Wallerstein 2001/1991, 25）。

参考文献：

Adorno, Theodor W. 2001/1991.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Agamben, Giorgio. 2000. *Means Without Ends: Notes on Politics*. Minneapoli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ndrejevic, Mark. 2012. Exploitation in the Data Mine. In *Internet and Surveillance: The Challenges of Web 2.0 and Social Media*, edited by Christian Fuchs, Kees Boersma, Anders Albrechtslund, and Marisol Sandoval, 71 – 88. New York: Routledge.

Arendt, Hannah. 1998/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2nd ed.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abe, Robert E. 2009. *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tical Economy: Toward a New Integration*.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Balibar, Étienne. 2007. *The Philosophy of Marx*. London, New York: Verso.

Barbalet, Jack M. 1983. *Marx's Construction of Social Theory*. London, Boston [...]: Routledge and Keegan Paul.

Bellamy Foster, John and Robert McChesney. 2011. The Internet's Unholy Marriage to Capitalism. *MRZine* 62(10). Available via: <http://monthlyreview.org/2011/03/01/the-internets-unholy-marriage-to-capitalism/> (March 17, 2012)

Bermejo, Fernando. 2009. Audience Manufactur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rom

Broadcasting to Google. *New Media and Society* 11(1-2): 133-154.

Bilteyst, Daniel and Philippe Meers. 201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diences. In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Janet Wasko, 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415-435. Malden, Oxford: Wiley-Blackwell.

Bollier, David. 2002. *Silent Theft: The Private Plunder of Our Common Wealth*. New York, London: Pluto Press.

Bonefeld, Werner. 2001. The Permanence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Commodity Fetishism and Social Constitution. *The Commoner* 2: 1-15.

Boyle, James. 2008. *The Public Domain: Enclosing the Commons of the Mind*.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rophy, Enda and Greig de Peuter. 2007. Immaterial Labour, Precarity, and Recomposition. In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dited by Catherine McKercher and Vincent Mosco, 177-192. Lanham: Lexington Books.

Brown, Phillip, Hugh Lauder, and David Ashton. 2011. *The Global Auction: The Broken Promises of Education, Jobs and Income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raway, Brett. 2011. Audience Labor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 Marxian Revisiting of the Audience Commodit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3(5): 693-708.

Chicchi, Federico. 2010. On the Threshold of Capital, At the Thresholds of the Common. In *Crisis in the Global Economy*, edited by Andrea Fumagalli Sandro Mezzadra, 139-152. New York: Autonomedia.

Cleaver, Harry. 2000/1979.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Leeds: Anti/Theses.

Collier, Andrew. 1994. *Critical Re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de Angelis, Massimo. 2007.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Value Struggles and Global Capital*. London: Pluto Press.

Dean, Jodi. 2008.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Circulation and the Foreclosure of Politics. In *Digital Media and Democracy: Tactics in Hard Times*, edited by Megan Boler, 101-121. Cambridge, London: MIT Press.

Debord, Guy. 1970. *Society of Spectacle*. Detroit: Black and Red Press.

Dyer-Witheford, Nick. 2004. 1844/2004/2044: The Return of Species-Be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2(4): 3 – 26.

Eagleton, Terry. 1996. *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 Malden, Oxford: Blackwell.

Fiske, John. 1990.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2nd edi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Fleissner, Peter. 2009. The“Commodification”of Knowledge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7(2): 228 – 238.

Fortunati, Leopoldina. 1989. *The Arcane of Reproduction: Housework, Prostitution, Labour and Capital*. New York: Autono-media.

Fuchs, Christian. 2010.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6(3): 179 – 196.

Fuchs, Christian. 2011.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Fuchs, Christian. 2012. Google Capitalism.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10(1): 42 – 48.

Fuchs, Christian, Kees Boersma, Anders Albrechtslund, and Marisol Sandoval, eds. 2012. *Internet and Surveillance: The Challenges of Web 2.0 and Social 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Fumagalli, Andrea and Sandro Mezzadra, eds. 2010. *Crisis in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Autonomedia.

Gandy, Oscar H. Jr. 2012. Matrix Multiplication and the Digital Divide. In *Race After the Internet*, edited by Lisa Nakamura and Peter A. Chow-White, 128 – 145.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Gorz, André. 1989.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London, New York: Verso.

Gorz, André. 2010. *The Immaterial*. London: Seagull Books.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Hardt, Hanno. 2004. *Myths for the Masses: An Essay on Mass Communication*. Malden, Oxford, Victoria: Blackwell Publishing.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1.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4.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9. *Commonweal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avid.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Cambridge: Blackwell.

Harvey, David.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avid. 2010.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London, New York: Verso.

Hindman, Matthew. 2009. *The Myth of Digital Democracy*. Princeton in Oxford: Princeton Press.

Hobsbawm, Eric. 2011.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Reflections of Marx and Marxism*.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2002/1947.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uws, Ursula. 2003.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R Press.

Innis, Harold Adams. 2008/1951.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2nd ed. Toronto: Univ. of Toronto Press.

Jameson, Fredric. 2009. *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London, New York: Verso.

Jameson, Fredric. 2011. *Representing Capital: A Reading of Volume One*. London, New York: Verso.

Jhally, Sut. 1987. *The Codes of Advertising: Fetish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aning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Kang, Hyunjin and Matthew p. McAllister. 2011. Selling You and Your Clicks: Examining the Audience Commodification of Google.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9(2): 141 – 153.

Lazzarato, Maurizio. 1996. Immaterial Labour. In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edited by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133 – 147. Minneapolis and London: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Lefebvre, Henri. 1968. *The Sociology of Marx*.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Lukács, Georg. 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Marazzi, Christian. 2008. *Capital and Language: From the New Economy to the War Economy*. Los Angeles: Semiotext(e).

Marazzi, Christian. 2010. *The Violenc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Los Angeles: Semiotext(e).

Marcuse, Herbert. 1955.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 Keegan Paul Ltd.

Marx, Karl. 1993/1858.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gh Draft)*. London: Penguin Books.

Marx, Karl. 1990/1867.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

Marx, Karl. 1991/1894.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3. London: Penguin Books.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75. *Collected Works*, Volume 3 (1843 – 1844).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76. *Collected Works*, Volume 6 (1845 – 1848).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87. *Collected Works*, Volume 29 (1857 – 186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xwell, Rick. 1991. The Image is Gold: Value,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Fetishism. *Journal of Film and Video* 43(1 – 2): 29 – 45.

May, Christopher. 2010.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New Enclosures*.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McChesney, Robert W. 200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Meehan, Eileen. 1993. Commodity Audience, Actual Audience: The Blindspot Debate. In *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Essays*.

Honoring Dallas W. Smythe, edited by Janet Wasko, Vincent Mosco, and Manjunath Pendakur, 378 – 400. New Jersey: Ablex.

Mezzadra, Sandro. 2011. The Topicality of Prehistory: A New Reading of Marx's Analysis of "So-Calle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Rethinking Marxism* 22(3): 302 – 321.

Mosco, Vincent.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2nd edition. Los Angeles, London: Sage.

Mosco, Vincent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2008.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Moulier Boutang, Yann. 2011.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Malden: Polity Press.

Murdock, Graham. 1978. Blindspots about Western Marxism: A Reply to Dallas Sm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2): 109 – 119.

Murdock, Graham. 2006. Marx on Commodities, Contradictions and Globalisations Resources for a Critique of Marketised Culture. *E-Compós* 7: 1 – 23.

Murdock, Graham. 2011. Political Economies as Moral Economies: Commodities, Gifts, and Public Goods. In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Janet Wasko, 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13 – 40. Malden, Oxford: Wiley-Blackwell.

Murdock, Graham and Peter Golding. 1973. 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0: 205 – 234.

Napoli, Philip M. 2010. Revisiting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Work" of Audience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32(3): 505 – 516.

Napoli, Philip M. 2011. *Audience Evolution: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Transforma-*

tion of Media Audienc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gri, Antonio. 1991/1984.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London: Pluto Press.

Negri, Antonio. 1992.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 Situation Today: Methodological Aspects. In *Open Marxism, Volume 2: Theory and Practice*, edited by Werner Bonefeld, Richard Gunn, and Kosmas Psychopedis, 69 – 105. London: Pluto Press.

Negri, Antonio. 1999. Value and Affect. *Boundary 2* 26(2) : 77 – 88.

Nightingale, Virginia, ed. 2011. *The Handbook of Media Audiences*. Malden, Oxford: Wiley-Blackwell.

Nordenstreng, Kaarle. 2004. Ferment in the Field: Notes on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its Disciplinary Nature. *The Public-Javnost* 11(3) : 5 – 18.

Parker, Ian. 1994. Commodities as Sign-Systems.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Economics*, edited by Robert E. Babe, 69 – 91. Boston Dordrecht,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asquinelli, Matteo. 2009. Google's PageRank Algorithm: A Diagram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and the Rentier of the Common Intellect. In *Deep Search: The Politics of Search Beyond Google*, edited by Konrad Becker and Felix Stalder.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Available via: http://matteopasquinelli.com/docs/Pasquinelli_PageRank.pdf (April 1, 2012)

Perelman, Michael. 2000. *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Durha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Polanyi, Karl. 2001/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 Boston: Beacon Press.

Postone, Moishe. 2003/1993.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odnik, Jernej. 2011. Permanentnost primitivne akumulacije, ali: o privatni lastnini, komodifikaciji in povratku rente [eng. : The Permanence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r: On the Private Property, Commodification and Return of the Rent]. *Casopis za kritiko*

znanosti 244: 89 – 109.

Prodnik, Jernej. 2012. Toward a Critique of Surveillance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A Reflection on the “Internet and Surveillance” Volume Edited by Fuchs, Boersma, Albrechtslund, and Sandoval.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10(1): 92 – 99.

Sandoval, Marisol. 2012. A Critical Empirical Case Study of Consumer Surveillance on Web 2.0. In *Internet and Surveillance: The Challenges of Web 2.0 and Social Media*, edited by Christian Fuchs, Kees Boersma, Anders Albrechtslund, and Marisol Sandoval, 147 – 169. New York: Routledge.

Schiller, Herbert I. 1989. *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mythe, Dallas W. 1960.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Journalism Quarterly*(Fall), 563 – 572.

Smythe, Dallas W.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In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Thomas Guback, 266 – 291.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Smythe, Dallas W. 1978. Rejoinder to Graham Murdock. In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Thomas Guback, 292 – 301.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Smythe, Dallas W. 1981a.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Economics. In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Dependency: The Tradition of H. A. Innis*, edited by William H. Melody, Liora Salter and Paul Heyer, 111 – 126. New Jersey: Ablex.

Smythe, Dallas W. 1981b.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entiousness, and Canada*. New Jersey: Ablex Publishing.

Sohn-Rethel, Alfred. 1972. Mental and Manual Labour in Marxism. In *Situating Marx*, edited by Paul Walton and Stuart Hall, 44 – 71. London: Human Context Books.

Sohn-Rethel, Alfred. 1978.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London,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Terranova, Tiziana. 2004.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Pluto Press.

Thompson, Edward Palmer.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56 – 97.

Thompson, Edward Palmer. 1991. *Customs in Common*. London: Merlin Press.

Huws, Ursula. 2003.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TripleC* 10(2): 274 – 301, 2012.

Vercellone, Carlo. 2010. The Crisis of the Law of Value and the Becoming-Rent of Profit. In *Crisis in the Global Economy*, edited by Andrea Fumagalli Sandro Mezzadra, 85 – 118. New York: Autonomedia.

Virno, Paolo. 1996. Notes on the “General Intellect”. In *Marxism beyond Marxism*, edited by Saree Makdisi, 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E. Karl, 265 – 272.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Virno, Paolo. 2004.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Semiotext(e), Los Angeles and New York.

Virno, Paolo. 2005. *Interview with Paolo Virno (by Branden W. Joseph)*. Grey Room 21: 26 – 37.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3.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Wallerstein, Immanuel. 2001/1991.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 2nd e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Wasko, Janet. 2005. Study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a and Information. *Comunicação e Sociedade* 7: 25 – 48.

Wasko, Janet, 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eds. 2011.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Malden, Oxford: Wiley-Blackwell.

Williams, Raymond. 1973.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New Left Review 82: 3 – 16.

Williams, Raymond. 2005/1980. *Culture and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延斯·斯楚罗特 (Jens Schröter)^①

因特网和“无摩擦的资本主义”

邓惟佳 (译), 朱晔、吴畅畅 (校)

[导读] 自1994年第一批浏览器问世以来, 因特网成为了最卓越的新媒体。正如所有新媒体的境遇一样, 新技术也面临着关于其未来用途和影响的激烈讨论。这场讨论的焦点之一是新媒体能否解决资本主义的所有问题——比尔·盖茨 (Bill Gates) 称之为“无摩擦的资本主义”。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其中一些论点, 这些经常由保守派和自由派政治家公开表达的论点, 旨在通过将因特网构造成商业媒体来解决后资本主义问题。但2001年网站倾覆暗示了这一构建的问题。本文的第二部分则是对马克思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一种特殊阐释的讨论。有人主张 [可追溯到诺伯特·维纳 (Norbert Wiener)] 因特网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部分, 它可能导致非常深层次的, 甚至是终极的资本主义危机。因特网不仅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 反而可能会加剧这些问题。自从2008年以来, 我们目睹了一次深层危机的一系列日益加剧的症状。通过采取马克思的方法, 新媒体的一些重要影响可以被描述得远比比尔·盖茨等人未经反思的

^①德国锡根大学, schroeter@medienwissenschaft.uni-siegen.de, <http://www.multipediale-systeme.de>。

欢愉表述更为精确。

虽然本文最大的贡献在于，作者认为“因特网不仅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反而可能会加剧这些问题”，以及作者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阐释和论证这一观点，但译者认为本文第二部分有关“由保守派和自由派政治家公开表达的论点：通过将因特网构造成商业媒体来解决后资本主义问题”的阐述、分析、质疑和批判堪比一篇严谨、缜密并且内容丰富的文献述评，也让研读者受益匪浅。

[关键词] 商业化，危机，因特网，马克思，盖茨，生产力，生产关系。

一、引言

1989至1990年前后，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新媒体”的价值能与因特网相媲美——这点可以同时从两个平行的层次来论述：第一，因特网已成为并依旧是跨国经济的核心载体；第二，这项新技术成为了各类神话的焦点，“还没等资本主义媒体开始在非社会的技术乌托邦中狂欢，社会乌托邦就已经被放逐了”（Haug 2003, 68；Mosco 2004；Schröter 2004a；Flichy 2007）。在东方斯大林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间的冷战以后，好像历史的下一个阶段会解决所有问题，即由因特网导致的“无摩擦的”（比尔·盖茨）资本主义——因为显然到那一时刻为止的资本主义还是充满了摩擦，尽管所有的断言都是相反的。

早在1981年，利奥塔（Lyotard）就已经注意到“甚至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或新自由主义的论点，在当代情景下几乎没有任何可信度”，因为“它不再知道如何使其合法化”。然而，资本主义能开发“信息技术”以达到“全社会的计算机化……这就是今天的资本主义视野，显然这将把资本主义带出危机”。（Lyotard 1986，

210)。利奥塔完全想当然地认为信息技术能解决经过诊断的危机，而不是使之恶化。

然而，就目前来看，这样的“因特网”（the internet）并不存在，现存的仅是它鲜被企业运用的网络前身。阿帕网（The Arpanet），因特网的前身，源于军事（一旦热核战争爆发，沟通仍起作用）和学术（共享计算机资源，当时仍十分缺乏）话语实践的重叠。很长时间以来，它都一直被强调是非商业、非经济的媒体（Abbate 1999；Schröter 2004a，20—148）。直到20世纪90年代该网络才被更广泛地运用，尤其是随着1991年对商业活动解除禁令和1994年开放万维网（WWW）之后。而在2011年的今天，它似乎已成为“世界市场之网”（Marx 1991，929）。

因特网最好地验证了技术是如何不会自动导致社会变革的，而是通过霸权散漫的实践被重新指定^①——一种自1973年起由“新自由主义”支配的资本主义，特别是从1989至1990年起尤其如此。因此，生产条件和生产力都不能被视作单一的原因；恰恰相反，该原因总能在它们复杂的互动中被发现。因此“跨国商业”——日益增长的外包公司整个部分的趋势——由于网络而得以加速或真正成为可能，跨国商业本身日益纳入霸权资本主义话语：迄今在“商业”这个术语覆盖下，地域、组织、制度和法制的联合现在已经被瓦解、拆除、分散了。如今商业只是一个虚拟实体（Kurz 2005，88）。准确地说，这种商业单元的“分子化”（molecularisation）只有因为“实时的信息的即时全球流动”才能起作用（Kurz 2005，89）。可以从许多进一步的层面来列举，在这些层面上因特网已经进入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结构，从而自一开始即造就了它的全球位错（dislocation）：例如，通过电子邮件开展的交流如何使个人做到永远能收

^①霸权的概念，参阅 Laclau and Mouffe（1985）。

到信息，各种新形式的远程工作和表面上的自主创业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新的分销渠道是如何打开的，最重要的是，庞大的、去实体化的金融领域是如何由于数据网络发展到如今的规模的（Kurz 2005，220—298）。这个复杂的过程当然并非毫无矛盾，但它的各个方面无法在此详加考虑（Dyer-Witheford 1999；Haug 2003，67—96）。

相反，问题是网络是否没有自相矛盾地成为了“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好例子（Engels and Marx 2009，10）。换句话说，因特网能够成为霸权资本主义论点是如何试图将一个全新的、最初欠定的技术转化成一种由霸权操纵的技术的一个例子，却发现它恰恰受到这一尝试的限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主义本身”（Marx 2006，358）。再换句话说，对网络潜力的最初兴奋感——至今仍存在于因特网还在扩展的资本主义边缘地带，正如阿尔祖玛（Alzouma 2011）举的尼日尔的例子——其间有关的（试图的）的霸权结构的沉淀也同样受挫于网络。这并非由于网络上存在“抵抗的”亚文化，如后面将显示的那样，而恰恰是因为网络的“成功”。有新媒体的霸权“适应”（“Zurechtmachungen”，按照尼采的德国原文），但没有人可以保证它们会如起初预期的那样发展。

以下将概述关于发展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因特网的部分论点。我们尤其关注那些论点：“用户友好”的万维网平台几乎并未流行开来，试图将因特网转换为一种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媒体。

二、无摩擦的资本主义

1991 年，因特网用于商务活动才变得明朗起来，随即因 1994 年之后万维网和浏览器的传播而开始快速扩张。政界反应迅速。早在 1994 年，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做了名为“建构信息高

速公路” (*Building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的演讲，其中他首创了信息高速公路的隐喻。戈尔引用随着因特网的早期形式发展起来的“通用存档”这一乌托邦模型：“关于任何现存的可以想象的问题，如今我们都拥有大量的信息” (Gore 1994)。正如这位副总统十分清晰地表述，这类信息主要供“商务人士”使用，以使他们能够成功完成任务。然而，问题在于如何在如此海量的信息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我们面对如此大量的信息，我们看到的是能够对信息进行快速分类、组织和应用的这些新设备的外观。”这些“新设备”当然不是别的，正是自90年代初开始迅速散布开来的个人电脑。它们在解决经济问题时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正如他们在政治领域中做的一样：“在我位于白宫西翼的办公室里做的工作中，大概有90%都是在电脑终端上进行的。”但为了能获得所有信息，这些机器需要被连在一起。戈尔强调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的发展主要是私营企业的任务——尽管数据网络的发展主要靠军方和大学支撑，因此至少部分是靠公共资金支持的。

自然，欧洲不想落在美国后头。欧盟很仓促地拟定了以“欧洲和全球信息社会” (*Europe and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为题的“本格曼报告” (*Bangemann Report*)，虽然只是顺便重新提及了戈尔的与交通相关的隐喻，但听起来更加乐观：“信息社会拥有改善欧洲公民的生活质量，提高我们的社会与经济组织的效率，以及增强凝聚力的潜力。” (*Bangemann et al.* 1998, 7) 在西方世界一直联合起来反对的东欧集团 (the Eastern Bloc) 瓦解五年后，网络不仅被看作为创造社会凝聚力的一种新手段，而且是提高生产力的一种方法。然而，“有一种危险，就是个人会排斥这种新的信息文化及其装备” (*Bangemann et al.* 1998, 7)。尽管反复提及“多元化” (*Bangemann et al.* 1998, 19)，该报告看起来认为倾向于“刻板、迟钝和区分”的反对者是不可接受的——“必须花大力气来实现公众对于新技术

的普遍接受和实际使用”（Bangemann *et al.* 1998, 7）。“市场驱动的革命”——与阿尔·戈尔相似，由大学和军方开发的数据网络具有高度资助的特性，这一市场化意识的抑制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要求并鼓励“充分竞争”，从这里同义反复的推理继续道：“由于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信息基础设施是无边界的，信息社会在本质上有着全球维度。”（Bangemann *et al.* 1998, 12, 16）一个先验的假设就是一个全球市场，新媒体就要去接近并提供服务。因此这些纲领性的论述继续着——因此，实际上对于诸如联网电脑之类的可编程机器也是如此。^①

《知识时代的大宪章》（*Magna Charta for the Knowledge Age*）于1994年出版发行。这份保守的思想家发表的声明主要围绕着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反复要求的“普遍接入”网络空间，“实际上是普遍的生物电环境”（Dyson *et al.* 1994, 27）。虽然——对地球的大部分地区带着公然的漠视——它宣称“实际上，今天我们普遍接入（universal access）个人计算机”（Dyson *et al.* 1994, 33—34），另一方面，它又提到：“为普遍接入交互式多媒体创造条件将要求一个对政府政策的根本性的再思考。”（Dyson *et al.* 1994, 34）显然，从以上每个人都已经网络化的陈述和每个人都应该网络化的要求间的矛盾，可以看出《宪章》对于信息社会没有清晰的概念或政策。相反，这份宣言——与在转向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角色变化一致（Kurz 1999, 642—667）——仅仅披着新外衣的古典自由主义。这种咒语般的需求是为了一个网络空间市场（Dyson *et al.* 1994,

^①讨论霸权散漫的实践是否且如何嵌入在技术中并因此设法实施这些技术这个问题，就电脑而言是特别相关的，因为该技术很明显是开放的和可编程的，像海绵一样等着以程序的形式吸收散漫的实践；参阅 Schröter（2004a, 7—17, 279—292；2005），这一编程的过程同由凯尔纳（Kellner）（2004）提出的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的简单、不可持续的工具主义论断毫无相同之处。

31)，免于（社会的）国家限制，每个人都能使用：由于他们对政府的怀疑，作者反对信息高速公路的隐喻——高速公路的建设往往是国家的事。《大宪章》中暗示的普遍接入绝非指信息本身，而是指适合市场的信息。

该声明称：“自由的意义、自治的结构、财产的定义、竞争的性质、合作的条件、社群的意识以及进步的性质都将因知识时代而重新定义。”（Dyson *et al.* 1994, 26—27）由于数字媒体的压力，这些术语需要重新定义：诸如（前）音乐文件共享服务纳普斯特（Napster），甚至简单的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光盘刻录机来复制音乐 CD 的现象表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或版权的概念（“产权的界定”）正处于被数字代码及其潜在的复制能力暗中破坏的危险之中。正如作者们写的：“信息 [……] 几乎可以零成本复制——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理论上）消费社会的所有产出。”（Dyson *et al.* 1994, 28）然而，为了防止这种理论成为现实，《大宪章》的作者们回归到对财产更为传统的定义上来，并且要求在对新自由主义话语有诸多诋毁的地区果断采取行动。“明晰且具有执行力的产权使市场运作十分必要。定义这些权利则是政府的核心功能。”（Dyson *et al.* 1994, 29）在诸如纳普斯特这样的文件共享网站上使用数字因特网技术从那以后已经因监控而削减了，以确保兼顾音乐产业的需求（“明晰且具有执行力的产权”）。^① 这个特定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人们至少一直在努力塑造他们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使用的新媒体和新方法——必要的话还会诉诸警力。^② 从这一层面上说，坚持谈论“数字革命”是荒谬且愤世嫉俗的——因为“革命”一词，无论好坏，从历史的

①门户网站依然存在（www.napster.com），但免费共享音乐文件已不再可能。

②或者带有大规模的威胁与恐吓——正如海报、电影院和电视运动一样明显。这些有着如安装工艺说明书一样的功能，明白地说明如何保守地使用数字网络，即一种符合资本主义的使用方式。

角度来看是一直与改变现有社会结构的观念相关的。^①

无论如何，宣扬关于知识时代的新观点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激增的据推测即将到来的“知识社会”仅仅重复了人们熟知的新式自由主义的诉求：国家的消退，一个以“包括易进入和低进入壁垒的动态竞争为特征”的市场扩张（Dyson *et al.* 1994, 30）。结果是——正如不断坚持的“普遍接入”指出的那样——强制性的市场参与。然而要点是网络空间（虽然只向商业交易开放了四年）被视为“典型的竞争市场”（Dyson *et al.* 1994, 34），最终允诺了一件事：“美国的商业和技术领导地位的复兴”（Dyson *et al.* 1994, 30）。这种网络自由主义及其并发的反国家的冲动也在“加利福尼亚意识形态”的口号之下渐渐为众人所知（参阅 Barbrook and Cameron 1995）。约翰·帕里·巴罗（John Perry Barlow）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 Barlow 1996）也是由同样的意识形态形成的。它以杰斐逊的美国独立宣言为基础，同样也抵制网络空间中任何国家的干涉——即使没有明确提及对该市场的一种自由主义的理解。^②

这里提及的几乎所有文章都要求减少垄断，但考虑到英特尔和微软在当今计算机市场中发挥的作用，这一观点似乎又十分荒谬。微软创始人及前任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反对信息高速公路的隐喻，因为“高速公路隐喻的真正问题在于强调基础设施而非应用”（Gates 1996, 6）。然而，提及应用表明，可能盖茨反对该隐喻的主要原因是它不够商业化。盖茨所写的显示了一种只能被冠以乌托邦的见解：“交互的网络将成为终极市场。”（Gates 1996, 6）他进一

^①正如，举个例子，在诸如泰普斯科特（Tapscott 1996）宣传的伪未来学著作中提到的那样。

^②除了在网络空间里的“我们市场的财富”所指的，这看起来是将因特网理解为一个市场。

步解释道：

如果每个买家知道卖家的价格并且卖家也知道买家的心理价位，那么“市场”上的每个人都会做出充分知情的决定，社会资源也会被均匀分配。迄今我们还没有斯密的理想，因为潜在的买家和卖家都几乎无法掌握充分的信息。^① [……] 因特网将会扩张为电子市场，成为终极中介，全球中间商。[……] 它将成为购物者的天堂。(Gates 1996, 80—181)

也就是说，因特网使得买家和卖家间的普遍沟通成为可能，家庭个人电脑提供的各种商品的普遍接入将防止市场参与者只有“不完全、有限的信息”（Gates 1996, 180）。普遍沟通和接入导致“广泛、有效的竞争”（Gates 1996, 205；关于“普遍沟通”和“普遍接入”的幻想史，参见 Schröter 2004a）。这就是市场最终如何能够完全发展（盖茨的现实模式就是作为“健康的电子市场”的存储市场——似乎那里不存在崩溃）。这样普遍的竞争包括几个部分：因此盖茨反复提及一件产品必须能够控制因特网上潜在顾客的注意（Gates 1996, 197, 211, 216, 224 etc.）。接着盖茨强调了完全个性化的广告和由网络开辟的生产的可能性：除（略显矛盾的）个人报纸之外，似乎是个人的服饰裁剪特别吸引他。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电子化地“显示（他们的）尺寸（Gates 1996, 189）”，那么通过因特网的量身定制将成为可能。他将顾客的天堂定义得更清晰：

在越来越多的 [李维斯品牌] 的专营店，客户额外支

^①盖茨在此指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市场经济的策划者之一。

付约 10 美元便可买到按照他们的精确规格制成的牛仔
裤——8448 种臀围、腰围、内接缝，门襟尺寸和风格的任
意组合。（Gates 1996，89）

这是一种关于“自由”的奇怪想法，包含了一个在 8448 种相同
选项中做出的选择，却不清楚一个针对如此大量选择的概览是如何
实现的（Schröter 2004b）。这种概念非常“适合”万维网，其主要
问题恰恰在于它缺乏链接目录和压缩机制，向用户提供大量可能的
信息，这个数量被作为其观念多元和信息丰富的证明而经常得到赞
美。然而，“一次提供 12000 个结果的搜索所带来的却并非财富，而
是白噪声（white noise）”（Winkler 1997，176）。众所周知，搜索引
擎对该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解决方案（Haigh 2008，参见 Mager
2011 关于搜索引擎的资本主义建设的分析）。

此外，盖茨的文章揭示了一个尴尬的转变。主要焦点不再是用户
如何接触到以市场为基础的信息，而是广告和产品是如何轮到它们
来接近顾客的。顾客不仅被期望电子化地登记他们的尺寸，盖茨
规划了长期目标是“软件中介”商也能够利用潜意识来牟利：

这个问卷可能包括各种意向去努力绘制你的敏感反应。
代理商通过比较你和其他人给你反馈，从而将这个过程变
得有乐趣。（Gates 1996，191）

这种极权主义的订购，包括使人明白“你如何与他人比较”，即
什么才算是标准——使得消费效率大幅提升；个人电脑充当了一台
效率机，不仅在阿尔·戈尔的工作中，而且在购买方面——确实，
将消费者还不知道自身需要的产品推荐给他们看来是有可能的。

“技术末世论”（techno-eschatology）将“无穷扩张的自由市场

愿景与对技术的持久信任”连接起来（Dery 1996，8，10）。我们可以列举无数的进一步类似的网络宣言：因此，德图佐斯（Dertouzos 1997，9）也写道：“对我而言看起来这是自然和无可避免的，未来的计算机和网络世界会和雅典的跳蚤市场一样——只是取代了实体产品，商品会是信息商品。”

这里讨论到的所有文章中，屏障被打破，（市场的）全球化扩张是可预测且永无止境的，普遍的竞争与并发的、无限制的使用因特网不仅是需求，而且或多或少是命令——以一种匿名的“我们”的名义提出的命令。这似乎与万维网的结构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因特网协议使几乎无限的扩张成为可能，因此缓解了资本累积与扩张的压力。”（Altvater 1998，60；Schiller 1999）

因此在1999年前后，一个大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创造的全新、充满魔力的新词汇开始流传：“新经济”（New Economy）。作为一种新资本主义媒介的因特网，其持续的魔力似乎已经实现了它的目标。好像不知来自何方，网络公司启动的股份一飞冲天，而因特网似乎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赚钱机器。然而，众所周知，不久这个泡沫就在一声巨响中破灭了。

三、因特网的生产力与生产条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讨论（其中只有极少的例子）显示了编程机的程序以及他们被联网的方式。它们将服务于资本主义向世界每个角落的完全扩张，包括了个体的内在自我。随着易趣网（eBay）的出现，每间公寓都成了全球市场的一部分，每个人主页都创造了一个自我营销的商店橱窗。保罗·特雷纳（Paul Treanor）在很久之前就评论了20世纪90年代因特网的扩张具有极权主义特征：

该逻辑实际上是这么说的：“无人能自由身处自由市场之外” [……] 网络主义不需要选择：它需要网络，一个网络，一个全球网络，一个无所不在的网络，一个全世界的网络空间，没有别的。似乎伴随着自由市场观念（总体上随着自由主义），与网络共存是不可能了。（Treanor 1996）

但是就像多次被提议的那样，有理由去怀疑——继马克思后——因特网的再贡献与再调整实际上是否真的是无摩擦的。新经济泡沫的爆发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看起来似乎数字媒体的兴起，即“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与资本主义相冲突的——正如司法和警察部门关于像纳普斯特这样的文件分享网站和其他诸如刻录 CD 和非法分享电影等的辩论中所启示的那样。^① 这种暗示已经可以在今天数字媒体文化的根源之一中被发现。在其 1948 年关于控制论的书中，诺伯特·维纳提到了“超高速计算机”出现的可能性：

没有人作为主体的自动化工厂和装配线离我们仅咫尺之遥，只是受我们的意愿限制，我们不愿投入像以往花费一样多的精力来对它们进行设计，例如，二战中开发雷达技术。[……] 对人类而言，有这种机器很可能是一件好事，有了它可以摆脱对卑贱和令人不快的任务的需要，但

^①参阅 Hartmut Winkler，他写道：“人们近乎被提醒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力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技术再生产的技术潜能和它的社会构成——版权——之间是直接对立的（Winkler 2004，29）。”同样参阅 Kurz（2007）关于一个争辩的，但详细的讨论，如果数字产品破坏了商品的形式。

或许又不是（一件好事）[……]就开放市场而言的评估，对这些新的潜能不是好事。[……]不存在一种付给美国锄头和铲子工人维持生计的报酬率，低到能够与作为挖掘机的蒸汽铲干的活相竞争。类似地，现代工业革命必定会使人脑贬值，至少在一些更简单和常规的决策方面。[……]拿第二次工业革命取得的成就而言，拥有中等或更少成就的普通人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任何人花钱去买的东西。（Wiener 1961, 26—28）

在他1964年的媒介理论经典著作《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中，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抱怨了“关于失业警报的愚蠢”（McLuhan 2003, 464）。16年前，维纳（Wiener）显然已经意识到了第三次（他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由于削减成本的竞争，会导致大规模的工作场所的合理化——麦克卢汉称其为“强度和竞争”（McLuhan 2003, 136）。在麦克卢汉之前100年，马克思也意识到了这点：因为当一个人仅作为“一个生产过程的看守人和调整者”来行事时，那么（至少对大部分来说）劳动[……]才停下来并成为财富的伟大源头。生产依靠“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而非“科学的一般状态与技术进步”越少，“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就会发生更多的“故障”（Marx 2005, 705）。以工业机器人为例，从汽车工厂到高度自动化的录影带租赁店，它们已经使数百万的工人失业，尽管实际工资不断缩水，失业还在发展，导致了国内市场的萧条，是一个直接的后果。即使是被认为即将出现的“服务型社会”、“信息社会”或者“知识社会”也不能成为解决办法，因为尤其在这一部门中——在这里我们回到因特网——数字技术可以将工作变得过剩：一个人可以在线购买火车票和飞机票、书、唱片、衣服、壁纸、衣柜等（比如易趣网）；他也可以处理银行业务，

在大量档案卷宗中搜索，甚至以更低的价格获得一瓶在附近某家店
里试过的葡萄酒。^① 无数销售人员和咨询顾问因此变得多余：

正如生产工作因工业机器人而减少或被完全废除，如
今办公室工作和服务也因因特网而正在减少或被废除。比
起资本主义的剥削过程通过降低产品成本能够重新吸收和
市场扩张因此变为可能，微电子革命的第一波或阶段已经
导致了更多的劳动力过剩。如果在早先 [工业革命的] 生
产力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代偿机制在微电子革命的第一阶
段不再起作用，那么在它的第二即因特网决定阶段更不会
起作用了。结果只会是更进一步的、重大的结构性大规模
失业率的生长：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失业人数将达到 800
万到 1000 万人，而非 400 万。（Kurz 2000）

如今，当无线射频识别芯片（the RFID chips）被赞誉为超市及
各大商店中最新的、获得巨大成就的网络产品的时候，那么大多数
大商店和超市员工将流落街头（而这个，并非数据保护，才是新芯
片面临的真正问题）。^② 2005 年前后，全球最大的两百家企业完成了

^①马克思早已知道，科学技术使得“一般的社会知识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Marx 2005，706）”——然而，这一辩论恰恰在经济学手稿中出现过，相关章节谈论的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基础（以价值为标志）与其发展之间的矛盾、机器等等”（Marx 2005，704）。

^②参阅作为最丰富的信息来源的在线的无线电射频识别期刊：<http://www.rfidjournal.com>，检索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对该技术及其提供的可能性的最好介绍详见以下链接中的文章：<http://www.rfidjournal.com/article/articleview/1339/1/129/>，检索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文章明确写道：“一些自动识别技术，如条形码系统，通常要求人们手动地扫描商标或标签来获得数据。无线电射频识别技术的开发是为了使人们获得商标上的数据并将其传输至计算机系统——而无需任何人介入。”又失去了一份工作！

超过 25% 的全球经济活动，但是却只能够雇佣 0.75% 的人力资源 (Kurz 2005, 81)。即使模拟、自动化和网络化导致了生产力潜能的骤升，越来越多的人却似乎被排除在网络工作之外——赚钱——消费，最终使商品经济的整个结构陷入危机之中。^① 那些不工作的人将不消费不付税，这也意味着生产出的产品将卖不出去（导致国内市场的危机），国家也就不能够为市场的法律、教育—政治等框架的继续运作负责——许多欧洲国家将面临更严重的债务。^② 那些失去了工作或者只能做些短工的消费者只能靠信贷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准。同时企业为了赶上越来越快的生产力的飞跃而被迫陷入债务中。消

①这一观点饱受非议。所谓的“生产力悖论”曾引发过一场大讨论（例如 Brynjolfsson 1992）：看起来似乎日益增长的计算机使用率并没有提高生产力，也没有减少工作（对此观点的评论，1999 年维尔考科斯和莱斯特 (Wilcocks and Lester) 以及 2001 年特兰克 (Trenkle) 文章有部分贡献)。但即便是一些该观点最热情的拥护者，像埃里克·布吕诺尔夫松 (Erik Brynjolfsson) 也不得不在他最近出版的有着引人注目的标题的著作《与机器比赛》(Brynjolfsson and McAfee 2011) 中承认，数字技术正在削减工作，也因此导致了一些严重的经济再生产问题。当然，像布吕诺尔夫松这样乐观的作者们不可能触及该问题的实质，资本主义和数字技术可能不能相容——并且可笑的是他和他的合著者居然十分骄傲地称数字技术可能削减工作是他们的新发现（参见 Brokaw 2011 中的引文：“然而关于技术飞速发展的作用却鲜被提及”），就好像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讨论，至少是杰里米·里夫金 (Jeremy Rifkin) (1995) 的作品从未存在过。

②更不用提跨国贸易由于疯狂的定位竞争被赋予的减税 (Kurz 2005, 135—144)。当谈论全球经济时，有一点必须明确：那就是本文的一位审稿者问道的：“维纳和马克思书中的结论怎样适用于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问题是针对中国的发展的，没有中国的发展，世界经济危机会更糟糕。这也意味着中国证明了资本主义依然有效，至少在世界的部分地区。那么中国的发展速度能不能算是证明呢？这个问题很有趣，但由于篇幅问题，此处不便详作回答（尤其是因为这不是本文的中心论题）。但可以简单回答一下：中国表面上的“成功”无论如何都不能用来推翻资本主义（可能是终极）危机的诊断书 (Kurz 2005, 180—186；见 Kurz 2010 中关于中国的简短评述)。正相反，中国的发展完全依赖于美国信贷（主要的）形成的虚构资本。中国经济完全指向对外（大部分为美国）出口。一旦美国信贷链中断，中国的发展就会止步——更不用说随之而来的社会分裂问题。我们将在几年后目睹中国发展的停止、他们经济的收缩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问题。它的首发症状已经可见。

费者、国家和企业都需要信贷。数字技术的传播、结构性大规模失业的增长和（以信用为基础的）金融市场的通胀三者的并行肯定不是巧合——相反，这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与数字化的或网络化的生产力两者冲突的一个确切的信号。

不幸的是，一个明显的用来反驳的论点，即新技术创造了新产业及新工作（如果只为那些人们运送在易趣网上订购的商品），却说不通。如今，与被削减的工作相比，被创造出来的新工作少得多（就算真的被创造出来了，它们也常常只是危险的、低报酬的工作）。

因此，数字技术无论如何也不会导致“无摩擦的资本主义”和“终极市场”（Bill Gates）；相反，它们使得当前被认为是我们唯一选择的市场经济的功效越来越低 [Kurz 对此特别坚持的立场（Kurz 1999, 602—780）；同见奥特布利（Ortlieb 2008）；豪格（Haug 2003, 293），在当提到“和计算机相伴的高科技作为其领导生产力已经将（资本主义）推向了其极限时，显得稍微谨慎一些”；也请参阅 Rifkin 1995]。因此，这将引向一场 [……] “在生产的物质发展与它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Marx 2006, 1024）。这表明马克思既未谈及技术决定论也未谈及社会决定论——反而，他关注的是技术生产力与社会形式两者的关系：^①

在一个它们发展的特定阶段，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 [……] 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这些关系转变为它们的羁绊。随即而来的是社会革命阶段。

^①即使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偶尔听起来如此，例如当他写道：“社会关系与生产力是紧密相关的。在获得新的生产力时，人类会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通过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他们谋生的方式，他们改变所有的社会条件。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Marx 2009, 48—49）

(Marx 1904, 12)^①

这是“数字革命”这一口号的真正涵义，而这通常不为人所知。控制论方面的顶尖思想家诺布特·维纳似乎早已预见到了这点：“答案当然是拥有一个以人类价值而非买卖为基础的社会。”（Wiener 1961, 28）

令人感到吃惊的是，维纳预见到的计算机技术的潜力与再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在现今关于媒介研究控制论的辩论中未曾出现过（Bergermann 2004）——尽管该冲突是与控制论科学相连接的可编程技术的关键影响。看起来好像重读马克思将使媒体与传播分析大受裨益（Mosco 2009）。比如，克劳斯·贝爱思（Claus Pias）写道：

由于——绝对是有疑问的——非确定性的目的论理论（theory of non-deterministic teleology）携带大量政治含义，不仅冲击这样的理念，即一个设置了控制论技术的社会如何能够或多或少独立地将其带入一种渴望的形式（虽然采用何种方式尚不明确）并使自己稳定在那种形式

^①在卡斯特瑞阿迪斯（Castoriadis）关于马克思的精彩论述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特定方面的分析似乎是被曲解了。卡斯特瑞阿迪斯指出，马克思指责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放慢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实际上在早些时候，它以无法想象的比例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Castoriadis 1998, 15）当那些东欧集团的逾期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鞭策者们断言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解放了生产力发展的时候，马克思的观点——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是资本主义令生产力发展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而这恰恰又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个发展剥夺了价值积累所依赖的工作。《共产党宣言》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连同它的生产关系、交换和财产，一个用魔法召唤这些庞大的生产和交换方式的社会，就像那个巫师一样，不能再继续控制他用咒语召唤地狱的力量（Marx and Engels 2009, 10）。”这似乎不是生产条件降低了生产力的发展，恰恰相反，是后者把前者推入了一个困境。

中。[……]控制论的组成能够捕获每次脱离正轨并为了它们的目的提供异常的、动荡的生产。控制论是一个通过干扰和持久危机成长的管理，因为这就是它如何自我稳定的。(Pias 2004, 323, 325)

控制论的组成、它们的知识及与之相连的数字媒介实际上会动摇贝爱思关于“社会”的欠定概念的基于市场的形式，以上这种可能性未加考虑，这点与利奥塔在1981年提出的宏大叙事 (*grand récit*) 类似。^① 与维纳相矛盾，“乌托邦的冗余” (Pias, 2004, 325) 只有当一个人在未受到这种不稳定影响时才可诊断。2008年后，我们似乎比以往更加明显地经历这一切。

四、简短的小结

很有趣，2000年之后我们目睹了一些历史的重复。上世纪90年代末盖茨乐观地提出了“无摩擦的资本主义”的观点，却遭到随后的网络泡沫破灭的嘲笑。在2008年开始的这场危机之前，也出现过类似乐观的论述，这一次是关于“网络2.0”时代（见 Leister and Röhle 2011 对关于脸书网的乐观论述的批判性分析）。又一次，新的因特网的应用，“社会媒体”，看起来好像能够成为新的工作、价值观和财富的源头。但这并不见效——尽管社会媒体被用来当作控制、惩戒和无意识商业化的新技术 (Fuchs 2010a; 2010b; 2011)。也许这再次显示数字媒体和资本主义并不相容且没有方法使它们相容。也许它们仅仅是——用马克思的话——与生产关系冲突的生产力。

^①然而，贝爱思 (Pias) 确实承认，控制论可能“绝对有问题”。皮尔葛尔 (Pircher) 只提到“在西方市场经济中自动化被视为一种威胁 (2004, 93)”——即使它不仅仅被“看作”如此，但实际上过去和现在对许多工作是一种威胁。

这当然不会自动导致一个新的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但是似乎强化了必须做些什么的意识。

参考文献:

- Abbate, Janet. 1999. *Inventing the Interne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Altwater, Elmar 1998. Kehrseiten der Globalisierung. *Telepolis. Die Zeitschrift der Netzkultur* 4(5): 54 – 61.
- Alzouma, Gado. 2011. Young People, Computers and the Internet in Niger. *Journal of African Media Studies* 3(2): 277 – 292.
- Bangemann, Martin *et al.* 1994. Europe and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Retrieved November 5, 2011, from http://www.umic.pt/images/stories/publicacoes/200801/raport_Bangemanna_1994.pdf
- Barbrook, Richard and Andy Cameron. 1995.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Retrieved November 8, 2011 from <http://www.hrc.wmin.ac.uk/theory-californianideology-main.html>
- Barlow, John Perry 1996. 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 Retrieved November 8, 2011 from <https://projects.eff.org/~barlow/Declaration-Final.html>
- Bergemann, Ulrike. 2004. Von Schiffen und Schotten: Der Auftritt der Kybernetik in der Medienwissenschaft. *Medienwis-senschaft Rezensionen* 1: 28 – 40.
- Brokaw, Leslie. 2011. How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s Affecting Employment. Retrieved March 6, 2012 from <http://sloanreview.mit.edu/improvisations/2011/10/26/brynjolfsson-and-mcafee-book-looks-at-digital-revolution-and-its-transformation-of-employment/#.TlImVpi9Zd0>
- Brynjolfsson, Erik. 1992. The Productivity Paradox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iew and Assessment. Retrieved March 6, 2012 from <http://ccs.mit.edu/papers/CCSWP130/ccswp130.html>
- Brynjolfsson, Erik and Andrew McAfee. 2011. *Race Against The Machine: How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s Accelerating Innovation, Driving Productivity, and Irreversibly*

Transforming Employment and the Economy(Kindle-Book) .

Castoriadis, Cornelius. 1998.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Dertouzos, Michael. 1997. *What Will Be. How the New World of Information Will Change our Lives*. New York: Harper.

Dery, Mark. 1996. *Escape Velocity: Cybercultur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New York: Grove.

Dyer-Witheford, Nick. 1999.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 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Dyson, Esther *et al.* 1994. A Magna Charta for the Knowledge Age.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11(4) : 26 – 37.

Engels, Friedrich and Karl Marx. 2009.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eddington: Echo.

Flichy, Patrice. 2007. *The Internet Imaginai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Fuchs, Christian. 2010a.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6(3) : 179 – 196.

Fuchs, Christian. 2010b. Facebook, Web 2.0 und. konomische überwachung. *Datenschutz und Datensicherheit* 7: 453 – 458.

Fuchs, Christian. 2011.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ide Web. Social Medium of New Space of Accumulatio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es of Media.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Media Industries*, edited by Dwayne Winseck and Dal Yong Jin, 201 – 220. London: Bloomsbury.

Gates, Bill. 1996. *The Road Ahead*. Rev. ed. London: Penguin.

Gore, Al. 1994. Building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Retrieved November 8, 2011 from <http://s93894098.onlinehome.us/Mine/WilliamGibson/Source/gorespeech.html>

Haigh, Thomas. 2008. The Web's Missing Links: Search Engines and Portals. In *The Internet and American Business*, edited by William Aspray and Paul E. Ceruzzi, 159 – 199.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aug, Wolfgang Fritz. 2003. *High-Tech-Kapitalismus. Analysen zu Produktionsweise*,

Arbeit, Sexualität, Krieg und Hegemonie. Hamburg: Argument.

Kellner, Douglas. 2004. *Marxism and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Retrieved November 8, 2011 from <http://www.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essays/marxisminformationsuperhighway.pdf>

Kurz, Robert. 1999. *Schwarzbuch Kapitalismus: Ein Abgesang auf die Marktwirt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Eichborn.

Kurz, Robert. 2000. *Euphorie um die New Economy: Das Internet als Traumfabrik des neuen Marktes*. Retrieved November 8, 2011 from <http://www.exitonline.org/html/link.php?tab=schwerpunkte&kat=Kritik+%40+Krise+des+Werts+und+des+Geldes&ktxt=Euphorie+um+die+New+Economy>

Kurz, Robert. 2005. *Das Weltkapital. Globalisierung und innere Schranken des modernen warenproduzierenden Systems*. Berlin: Bittermann.

Kurz, Robert. 2007. *Der Unwert des Unwissens. Verkürzte“Wertkritik“als Legitimationsideologie eines digitalen Neo-Kleinbürgertums*. Retrieved March 6, 2012, from <http://www.exit-online.org/link.php?tabelle=aktuelles&posnr=264>

Kurz, Robert. 2010. Interview, conducted by Peter Jellen. *Telepolis*. Retrieved March 6, 2012, from: <http://www.exit-online.org/link.php?tabelle=schwerpunkte&posnr=204>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le Mouffe.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Leistert, Oliver and Theo R. hle, 2011. *Generation Facebook. über das Leben im Social Net*. Bielefeld: Transcript.

Liotard, Jean-Fran. ois. 1986. *Rules and Paradoxes and Svelte Appendix. Cultural Critique*, 5, 209 – 219.

Mager, Astrid. 2011. *Algorithmic Ideology. How Capitalist Society Shapes Search Engines*. Retrieved November 8, 2011 from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926244

Marx, Karl. 1904.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International Library Publishers.

Marx, Karl. 1992. *Capital* (Vol. 1).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2005.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2006.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2009.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Retrieved November 9, 2011, from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download/pdf/Poverty-Philosophy.pdf>

McLuhan, Marshall. 2003. *Understanding Media*. Berkeley: Gingko.

Mosco, Vincent.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osco, Vincent.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2nd Edition.

Ortlieb, Claus Peter. 2008. Ein Widerspruch von Stoff und Form. Zur Bedeutung der Produktion des relativen Mehrwerts für die finale Krisendynamik. Retrieved March 6, 2012, from <http://www.math.uni-hamburg.de/home/ortlieb/WiderspruchStoffForm-Preprint.pdf>

Pias, Claus. 2004. Unruhe und Steuerung. Zum utopischen Potential der Kybernetik. In *Die Unruhe der Kultur. Potentiale des Utopischen*, edited by J. m Rösen, 301 – 325. Weilerswist: Velbrück.

Pircher, Wolfgang. 2004. Markt oder Plan? Zum Verh. Itnis von Kybernetik und. konomie. In *Cybernetics-Kybernetik. The Macy Conferences 1946 – 1953, Vol. 2, Essays und Dokumente*, edited by Claus Pias, 81 – 96. Berlin: diaphanes.

Rifkin, Jeremy 1995. *The End of Work*. New York: Putnam.

Schiller, Dan. 1999.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Schröter, Jens. 2004a. *Das Netz und die Virtuelle Realit. t. Zur Selbstprogrammierung der Gesellschaft durch die universel-le Maschine*. Bielefeld: transcript.

Schröter, Jens. 2004b. 8448 verschiedene Jeans. Zu Wahl und Selektion im Internet. In *Paradoxien der Entscheidung*, edited by Friedrich Balke, Gregor Schwering and Urs St. heli, 117 – 138. Bielefeld: transcript.

Schröter, Jens. 2005. World Brain-Electronic Brain-Global Brain. Pl. doyer für De-Sedimentierung statt Organizismus. *Paragrana.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Anthropologie* 14 (2): 283 – 303.

Tapscott, Don. 1996. *The Digital Economy*. New York: McGraw-Hill.

Treanor, Paul. 1996. Internet as Hyper-Liberalism. Retrieved November 8, 2011 from <http://web.inter.nl.net/users/Paul.Treanor/net.hyperliberal.html>

Trenkle, Norbert. 2011. Massenausfall. Wie der Kapitalismus an seiner eigenen Produktivität erstickt. Retrieved March 6, 2012 from <http://www.streifzuege.org/2011/massenausfall/print/>

Wiener, Norbert. 1961.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Willcocks, Leslie P. and Stephanie Lester, eds. 1999. *Beyond the IT Productivity Paradox*. Chichester: Wiley.

Winkler, Hartmut. 1997. *Docuverse. Zur Medientheorie der Computer*. München: Boer.

Winkler, Hartmut. 2004. *Diskurs. Konomie. Versuch über die innere. Konomie der Medi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安德烈亚斯·维特尔 (Andreas Wittel)^①

数字马克思： 面向分布式传媒的政治经济学

王蔚 (译)，伍静、吴畅畅 (校)

[摘要] 本文认为，在大众传媒时代，传媒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是相当有限的。在数字传媒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而且应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应用于该领域的研究中。本文将通过两个步骤为这种观点提供合理依据。第一步，证明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相当有限，同时，解释这种有限背后的逻辑。第二步，也是这篇论文的核心目标，即探究在面对非市场生产 (non-market production)、大众生产 (peer production)、数字公地 (the digital commons) 等现象，面对自由文化、知识产权、自由劳动等讨论时，诸如劳动、价值、所有制和斗争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概念的紧要性与相关性。

[关键词] 马克思，劳动，价值，产权，斗争，传媒政治经济学，数字，分布式传媒，大众传媒，互联网，网络。

^①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高级讲师，近期关注数字传媒和批判理论的相互影响。andreas.wittel@gmail.com. <http://www.ntu.ac.uk/apps/Profiles/70220-2-2/Dr.Andreas.Wittel.aspx>.

一、导 论

本文认为：在大众传媒时代，传媒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相当有限。在数字传媒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而且应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应用于该领域的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言，这一发展值得欢呼，因为他的概念将有更广泛的包容性和应用性。本文将通过两个步骤为这种观点提供合理依据。

第一步，证明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相当有限。同时，解释这种有限背后的逻辑，解释为什么数字传媒——或者换一种更好的说法：数字事物——打开了崭新的有着光明前途的可能性，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概念纳入更广泛的范围，以有利于在信息时代分析（特别的）数字传媒和（更为一般性的）资本主义。

第二步，也是这篇论文的核心目标，即探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概念，如劳动、价值、产权和斗争等，并对这些概念与数字传媒或数字事物的批评分析的相关性做一简要概括。这些概念特别与深入理解以下现象密切相关，如非市场生产（non-market production）、大众生产（peer production）、数字公地（the digital commons），也与涉及自由文化（free culture）、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自由劳动（free labour）的讨论尤其相关。

文章部分章节重点审视了自由劳动概念，这一概念在阐释社会网络的新发展时非常有效，但其分析严谨性尚嫌不够，并将有较大差异的实践混为一谈。由于在雇佣关系的劳动和其他形式的商品化劳动之外，还有些人类活动非常繁荣兴旺，因而数字资本主义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需要反思劳动概念。为了推进对自由劳动的讨论，我认为我们需要先讨论劳动。为了思考劳动，我们还需要思考所有

制、价值和劳动价值理论 (the value theory of labour)。

我在文章中得出的许多结论，只能通过斗争来获取。关于斗争的短评指向了数字传媒和社会运动间的关系。在数字时代，随着对直接行动及其不同调解形式的审视，传媒政治经济学能够占据新的领地。

二、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

在大众传媒时代，传媒政治经济学已经形成一个学术领域，其特点为：线性形式与单向流动的传播，少数生产者向大量接受者提供内容。

仅用几个段落来概括学术领域的关键议题、疑问、讨论和研究结果，是一项艰巨任务。这将导致过度简单化的结论和存疑的概括，同时，要求叙述的连贯性会牺牲观点的细腻性。在媒体与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也同样如此。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关于这个领域的内容是什么，仍然存在相当广泛的共识。比较对这一领域的许多介绍（如 Mosco 1996; Devereux 2003; McQuail 2005; Durham and Kellner 2006; Laughey 2009; Burton 2010）可以明显看出，关于已经出版的媒体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议题、疑问和研究结果，并不存在太多分歧。

相关研究起始于这样一个观察：传媒机构越来越多地私有化并转变为企业。问题在于，传媒产业并没有被看作是一般的产业。要理解传媒行业与众不同的特性，就必须剖析传媒内容生产的两重性：既是商品同时又是公共物品。传媒内容是一种私有物品，是一种商品，因为传媒产业用这种产品积累利润。同时，传媒内容又是公共物品，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公共领域。这样，一方面传媒机构有社会、文化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它们也被经济利益所驱动。

正是这种传媒内容的两重性，使得这一假设相当可疑：假设传媒是一支独立力量，自然地维护民主和公共利益。同样值得怀疑的另一个假设是，大众传媒仅仅是舆论的镜子。

传媒政治经济学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传媒是强大的，它们能够影响公共舆论，塑造公共话语。因而，在一个较为宽泛的政治和经济语境中，关注传媒内容生产至关重要。正是这种对物质性的关注，对传媒内容生产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的关注，将传媒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术领域中区别开来。如文化研究和受众研究中存在更多肯定成分，这些研究一般不把权力与控制研究定位于传媒机构中，而是落脚在积极的受众上，认为受众是真正的意义制造者。^① 和媒体与传播分析相比，传媒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分析同样很多。

传媒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以下议题：第一是了解传媒市场。传媒公司如何产生收入并形成利润？第二是审视传媒组织（包括公共的、商业的和私有非营利机构）所有制问题，分析涉及传媒产品（显然这里尤其与新闻生产相关）的所有权结构的含义。第三，关注传媒部门的变革动力，特别是传媒部门的发展，如传媒产业的国际化，传媒机构的集中化和集团化，传媒产品的多样化等。这些关注引发了关于文化帝国主义和传媒帝国主义的争论。第四个议题关于传媒规制、传媒政策和传媒管理。这个问题最初只是在国内层面，但越来越具有全球视角。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对这些领域的探究是密切关联的，事实上，其中有相当多的重叠部分。

为了用最简短的方式介绍传媒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观点：我将参照丹尼斯·麦奎尔（McQuail 2005，100）的摘要框。他认为这些都是核心的研究成果：

^①关于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张力的分析，可见凯尔纳（Kellner 1995）和维特尔（Wittel 2004）的论述。关于传媒政治经济学和积极的受众研究之间的分歧的分析，可见席勒的论述（Schiller 1989，135—157）。

- 经济控制与逻辑是决定因素
- 传媒结构趋向集中
- 传媒发展全球一体化
- 内容和受众的商品化
- 多样性减少
- 反对和不同声音被边缘化
- 传播中的公共利益屈从于私人利益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通常不会被认为是传媒政治经济学内部圈子的成员，而实际上，他最早提出了这一研究路径。在一篇关于英国报纸行业增长的论文中，他以这一观察开篇：“新闻出版业的历史与经济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协调普遍失灵，这必须得到必要的解释。”（Williams 1961, 194）他着手开拓这一视角，对跨越170年的历史做了经验研究，得到了具有高度怀疑性的发现：

这些数据并不支持以下观点：新闻出版业发展稳定而缓慢，但越来越好。市场正在稳步专业化，直接关系到广告收入，同时，面向各类读者的流行杂志正在稳步发力。这样看上去，好像不存在一个接受过民主教育的发展中的新闻界，反而像是存在一个越来越有组织的传播市场，这个市场将“大众”准则作为主导的社会原则，并且新闻界的形形色色的功能越来越局限于搜索“卖点”。（Williams 1961, 234）

如果我们将这段话的主要观点和麦奎尔的摘要框对比，即可清晰地看到，威廉斯预示的多项主题和结论，将在其后50年被传媒政治经济学领域探讨。这段被我们引用的概括，就像是这一领域的缩影。

三、马克思和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

传媒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源——至少他们的批判传统（这正是我所关注的）——通常落脚在马克思主义。毕竟，或者说，顾名思义，传媒研究中的这个领域，是从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究传播。那么在这个学术领域内，我们从马克思那里获取了多少养料？答案很简短：有一些，但非常有限。为证明这个观点，我将梳理一些通常被认为具有重要贡献的文献。^①

第一个且令人相当惊讶的发现是，有相当数量的著作（如 Herman and Chomsky 1988；Schiller 1989；Curran 1991；McChesney 1997；Curran and Seaton 1997；Grossberg *et al.* 1998；Curran 2000；Nicols and McChesney 2006）根本没有或者极少提及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极少提及的情况中，提及的作用通常是作为标签（例如将马克思主义者与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传统区分开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做更深入探究。

尽管如此，他们都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特殊部分。他们都与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the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model）有直接联系。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物质基础，一个是上层建筑。物质基础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上层建筑则指的是非物质领域（the non-material realm），如文化、宗教、观念、价值和规范等。物质基础与

^①为保持分析的纯粹，我将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开始阶段，忽略德国马克思主义传媒理论（布莱希特（Brecht），克拉考尔（Kraukauer），本雅明（Benjamin），阿多诺（Adorno），恩岑斯伯格（Enzensberger）），其思路——也许是错误地——通常没被纳入传媒政治经济学领域。我甄选的文本肯定不那么广泛，也不具备任何方式的代表性，但这些文本对传媒政治经济学领域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的确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线索。

上层建筑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然而最终，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模式已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许多著作中得以发展，或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arx 1977）的序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Marx and Engels 1974）。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Marx 1977）^①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Marx and Engels 1974, 64f.）^②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以下类似处只注简要信息。——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551页。——译者注

上述文献直接或间接地将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应用于传媒产业。和其他产业部门不同，传媒产业有助于上层建筑的生产。然而，这些文献以不同的方式应用这个模式。同时，对于以线性的、辩证的和简化的视角将这个模式视为确定性模式，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

达勒姆和凯尔纳观察到，美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往往倾向于强调经济层面，聚焦于所有权、公司化和消费。与此同时，英国则聚焦于政治维度，强调公共广播（public sector broadcasting），强调国家资助且监管传播的重要性，以及强调广播的政治性（Durham and Kellner 2006, 197）。我想把这一观察再推进一步：美国的传媒政治经济学著作一般更符合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而英国的研究对物质和经济简化论则相对持谨慎态度。我还认为，这些不同的定位与两个国家的传媒景观有关，美国是自由市场传媒景观，英国则是仍然依靠强有力的公共广播的代表。宣传模式（Herman and Chomsky 1988）在美国发展并非巧合，同时也不奇怪，正是美国的关于伊拉克战争报道的研究断定，批判新闻业是一种完全的系统性的失败。该研究认为，美国传媒带来了“民主的破坏”，“高度集中的利益驱动的传媒系统，顺理成章地摧毁了新闻业，同时使提供自由社会极度需要的内容这一理想变得荒谬。”（Nichols and McChesney 2005, ix）英国研究中找不到相似的观点，因其对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持强烈批判态度。例如，柯伦观察到，“这一领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本上是“驳斥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论式解释框架”。（Curran 1990, 157f）

到目前为止，我提到这些文献要么根本没有引用马克思主义，或者仅仅做了极少的通常用来作为标签的引用。然而，这些文献都与马克思相关，尤其是以一种更加深刻的方式与其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相关。莫斯可（Mosco 1996）提供了或许是关于该领域文

献的最为详尽的分析，他在其著作的开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默多克（Murdock 1982）特别关注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并将这一模式与更以实践为导向的观点相比较。威廉斯（Williams 1958，265—284）详细叙述了这种模式，并且认为，这种模式比一般公认的更为复杂。（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是相互影响的，而不是单向度的）“基本的问题已经提出，就是经济因素是否真的具有决定性。我跟踪了这方面的争议，但在我看来，这终究是个无解的问题。”（Williams 1958，280）和威廉斯一样，尼古拉斯·加汉姆（Garnham 1990）也反击了经济化约论的指责。他坚持认为，马克思的模式对理解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充分的基础。但他不认为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决定关系，他更倾向于立足于相互影响和辩证关系的模式。

我们的结论是：除了一些罕见的例外——最显著的是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在后面我们会讨论到他——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理论的应用非常有限。这个学术领域主要（直接或间接地）参考了马克思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用以研究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所有权的集中，传媒集团化）和传媒内容、意识形态、控制、权力、民主等问题之间的关系。

不要误解，这并不是对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批评。我没有将有限的应用马克思主义概念视为这一学术领域的失败。我的观点正好相反：这种有限应用在大众传媒时代完全合情合理。它背后有一套自身的逻辑，关键在于传媒技术。在后面的章节我们还会详细讨论。应该注意到，在以大众传媒转变为分布式传媒为标志的过去十年，政治经济学家已经重新发现了马克思，这和我观点是一致的。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被以多种方式重新发现，这并不仅仅是

在重复关于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讨论。^①

四、数字技术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有限地应用背后，究竟存在怎样的逻辑？有人可能指出——再次引出对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争论——马克思显然对物质基础更感兴趣，而忽视了对上层建筑的分析。马克思对媒体与传播也没有太多可说的。毋庸置疑，这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观点。然而，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数字传媒时代，传媒政治经济学家可以而且应该在更为宽泛得多的意义上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如果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传媒技术，或许可以更为接近答案。大众传媒时代，这些技术——生产资料——非常昂贵。拥有平面媒体或电子媒体所必需的资产，大多数人负担不起。这就导致传播给数量庞大的消费者或受众的媒体内容，只是由少数传媒机构生产制作的。因此，大众传媒的特点就在于，少数内容生产者和庞大的受众。对那些认为自己是自由民主的社会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成问题的出发点。生产资料所有权、传媒集中化过程、传媒技术和传媒机构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传媒大亨”手中，事实上，这些现象比大众传媒的其他现象更成为问题。在大众媒体时代有限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一种非常具体的历史现实，也产生于大众传

^①或许第一次全面地将马克思的概念应用于分布式传媒是戴尔-威瑟福特（Nick Dyer-Witheford 1999）。他分析了信息时代何以“非但没有超越资本及其劳动主体之间的历史矛盾，反而构成了两者遭遇后的最新战场”。（Nick Dyer-Witheford 1999, 2）此后，其他明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互联网理论化研究的著作不断涌现，例如，Wayne 2003；Huws and Leys 2003；Stallabrass 2003；Wark 2004；Terranova 2004；Artz, Macek and Cloud 2006；Jhally 2006；Fuchs 2008；Mosco, McKercher and Huws 2010；Kleiner 2010；Fuchs 2011；Fuchs *et al.* 2012。

媒技术所引发的历史性的空前关注。

数字技术带来了一个从根本上不同的传媒景观，大众传媒不再是城市中唯一的表演。大众传媒开始有了分布式传媒做伴，同时它们似乎逐渐地被这个新成员所代替。分布式传媒的运转有着非常不同的组织逻辑。大众传媒是分等级的，线性的，配备控制中心，媒体内容从少数生产者单向流动到大量受众。反之，分布式传媒是网络化的，非线性的，媒体内容从许多生产者向许多消费者多向度地相互流动。

分布式传媒和数字传媒这两个术语近似，但不完全一致。我使用分布式传媒这个术语，是用来强调媒体的社会组织（尽管这个词也指互联网技术），数字传媒这个术语则只与技术相关。然而，强调社会永远不能够完全离开技术非常重要。每一个介质都同时既是技术的又是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技术结构和关系是内在交错及相互建构的。

数字技术的品质和性能深刻地塑造了分布式传媒的逻辑。与大众传媒技术（指的是印刷出版）相比，数字技术的优势在于更便宜和更有效。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可以将文本、声音、图像和动态图像等老的传媒形式制作为数字代码，以重新中介化；（2）可以将信息、传播媒介（纸质信件、电话）、大众媒体（广播、电视、报纸）和传播予以一体化；（3）数字内容可以以最小成本无穷尽复制；（4）没有任何重量，能够以光速扩散。

我想提出，这些数字技术的现象学的品质大部分基于比特和原子的区别，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首先，传媒生产者的数量在数字时代急剧增加。当下，可以使用移动电话或笔记本电脑的每个人，可以访问网络的每个人，都是潜在的传媒内容生产者。其次，数字技术催生了新的传媒生产和发布的社会形态，例如大规模的传媒内

容的“分享”^①, 大规模的合作形式和类似于开源代码这类大众产品。第三, 随着传媒生产者数量的增加, 传媒本身正变得无处不在, 这表现在, 从全球的、公共的到现实生活最私密的层面, 全方位的社会领域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变得媒介化了 (Livingstone 2009)。第四, 也许是最重要的, 数字技术不仅仅是传媒技术, 他们已经嵌入所有的生产性流程中 (Castells 1996)。数字经济现在不再只是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的经济, 它简直是为经济画上句号。因而这一进程的结果是, 数字不仅与传媒领域相关, 也与基于信息与通信技术 (ICT) 的新生产形式相关, 可能也与新的生产方式相关 (这一点要看未来斗争是否成功), 与“以公地为基础的大众生产” (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 相关 (Benkler 2006)。为此, 数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 实际上就是数字事物的政治经济学。正是由于传媒由少数专业人士向更多业余人士开放, 从国家、市场向非市场开放, 正是由于传媒产业和其他产业部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才提出了一种可能性, 使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更加广泛。实际上在数字时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所有方面都的确变得与批判的传媒理论相关。

快速评论一下技术决定论。在我看来, 这种对数字事物及其影响的现象学分析, 并不是一个技术决定论的范例。我不主张所有的解释力都在于技术, 人只是对技术做出反应的旁观者。然而, 我也不赞同反面的观点, 这种观点把能动性的所有方面都定位于人。社会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同样危险。我与马克思的思想大体一致, 我认为技术为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技术不能以任何方式决定资本主义的未来, 未来一定只由受压迫者的斗争塑造。

或许由于对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技术决定论的强烈反对, 评论家们对大众传媒和分布式传媒之间深刻区别的认识有些迟钝。

^①关于数字时代分享的批判性分析, 可参见 Wittel 2011。

人们采取不同的回应方式和策略，结果证明，这个新事物（意为所谓的数字革命）的价值被高估了。第一种类型的回应是（例如 Murdock 2004）拒绝任何重新评价，认为数字时代和大众传媒时代没有重大区别，历史的连续性比那些区别更为重要。政治经济学家与其迷恋“数字可能性”，更应该研究“市场现实性”。信息社会只不过是一个“假设”，它并不真正存在（Murdock and Golding 2001）。第二种类型的回应则更为谨慎，这是一种骑墙观望的方法（sitting-on-the fence approach）（例如，Curran and Seaton 2003，235—293）。对于数字技术的改变，这种回应在态度和观点上都踟躇不前。第三种类型的回应（例如 Mosco 2004）包含着对这种话语的解构，特别是对互联网爱好者（Internet-philiacs）观点的解构。

确实，忽视连续性是幼稚的。然而，认为一切照旧的观点同样危险。我举例解释一下。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很大程度上主导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话语，这个问题在分布式传媒时代也将不会失去任何相关性。正相反，当新的关注点显露出来，它也将会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主题。然而，这个问题需要以两种重要的方式被重新概念化。首先，大众传媒时代，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仅仅与传媒内容有关。分布式传媒时代，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既与传媒内容有关，也与连通性（connectivity）有关。这不再只是关乎意识形态和信息控制（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也关乎基础设施的所有权以及让用户进行社交、沟通和合作的网络和平台的所有权。这不只是关于意义和再现，也关于对人们在线互动的控制，最终关于给予某些社会性和主观性形式以特权。重新概念化的第二个理由，在于“生产资料”的观念。分布式传媒时代，生产资料已经变得更为民主。用户（已经超过 10 亿）能够使用电脑和访问互联网，并掌握一些基本的电脑技能，就具备了生产传媒内容的必要手段。然而，他们并不具备的是分布的方法和在线存储传媒内容的方法。分布和存储的方法由少

数传媒集团掌握。他们控制了信息的流动。他们属于沃克所描述的那种高科技阶级（vectoral class）。“高科技阶级将世界推到灾难的边缘，然而为了克服自身的毁灭趋势，他们开放了资源的世界。”（Wark 2004，25）对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之间斗争分析，提出了互联网的未來架构的主题，这种分析也是戴尔·威瑟福特的主要目标（Dyer-Witheford 1999）。对这一段的总结：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具有历史连续性，但也有一些显著变化。

德米特里·克莱纳（Dmytri Kleiner）的著作一开篇就令人震惊：“在信息时代中，可能的事情和允许的事情之间存在直接冲突……互联网这样的大众网络使非等级的关系成为可能，但是这种非等级关系与资本主义关于圈地和控制的需求是矛盾的。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我们所熟知的互联网和资本主义，其中一个必须滚蛋。”（Kleiner 2010，7）

这当然是一个略有夸张的观点。不仅只发生了战争，我们也能看到二者之间也在发展新的合作形式、新的模式与布局。尽管如此，我非常喜欢这段话，因为它尖锐而浓缩地概括了政治经济学在数字传媒与分布式网络时代的责任所在。开辟新的生产力的技术既已存在，但带有根深蒂固的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制度也依然存在。

想要维护现存生产关系的人，和试图改变这一关系的人之间，存在一场斗争。同时，还存在一个关于如何创造更好的世界的暗示。互联网以其更加不受控制的形式，能够教导我们如何思考整个社会吗？

我们已经走入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中央。接下来的章节里我想探讨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如何与数字时代的传媒分析相关。我将重点关注四个中心词，劳动、价值、所有制和斗争，其中劳动的概念会探讨得更为详细。

五、劳动

在西半球，将劳动仅作为雇佣劳动来分析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除了极少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如安德烈·高兹（Gorz 1999），替代雇佣劳动的其他选项几乎没有进入公共话语。一个普遍的感受是，不存在对雇佣劳动的替代选项。显然，这种理论取向是一种对经济现实的反映，而这种经济现实的主要特点就是雇佣劳动为主要生产形式。大众传媒时代的传媒生产也是这样组织的，不管传媒机构是公共机构还是私人企业，都有雇佣员工，发放工资作为报酬。

当代传媒生态系统已大相径庭。现在的传媒内容不仅来自公司雇员的生产，也来自自由劳动。自由劳动者从事大众生产（散布内容）和“以公地为基础的大众生产”（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以公地为基础的大众生产”由约凯·本科勒（Benkler 2002）创造，用来描述一种社会经济生产新模式，即大规模群体为了共同目标而一起从事毫无经济报酬的工作。现在传媒内容不仅仅为市场和付费的受众而生产，同时还存在一个相当有价值的非市场向度的传媒生产。这是个新局面。实际上，传媒和创意产业在当下成为唯一面临着自由劳动和非市场生产（non-market production）竞争的产业部门。

伴随着开放源代码运动，非市场生产始见于 20 世纪 80 年代。而在过去十年，伴随着社会网络的发展，非市场生产以惊人的规模加速发展，并从软件和代码的大众生产延伸至文本、声音、图像和动态图像的大众生产。这些数字公地包括软件公地、新闻公地、信息公地、知识公地、教育公地、艺术公地和文化公地。

无可否认，数字旋风已经对创意产业造成严重破坏。报纸新闻

业正在下滑，并努力寻找新的商业模式。在美国，一批题目冠以新闻业衰败的文章，表明了这种衰败发展的严重性，如“最后的记者请关灯”（McChesney and Pickard 2011）。音乐、电影和出版行业也受到沉重打击，正在越来越多地对侵犯版权诉诸法律，并为收紧互联网管制进行政治游说（例如，ACTA^①、SOPA^②、PIPA^③）。

然而，这种新的传媒生态系统的许多影响还毫不明朗。企业劳动和自由劳动在数字公地中的并立现象，只存在于传媒产业和创意产业，还是也会蔓延到其他产业部门？传媒和创意产业与数字公地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处于“无形内战”（immaterial civil war）之中吗（Pasquinelli 2007）？或者说，由于双方有许多合作（例如企业为开源软件生产提供资金），所以这样一种视角是不是太单维化？这对传媒产业的劳动力市场有什么长期影响？传媒和文化生产对数字技术应用的合理化，很有可能会导致市场萎缩。但如果的是这样，市场会有多大程度的萎缩呢？最后，这对于传媒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意味着什么？资本要从自由劳动的剥削中获取利润吗？或者，这个新事物带来的竞争会导致传媒产业生产率的下降吗？

为了更好地理解新的传媒生态，我们需要关注自由劳动概念。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术语近来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用，但马克思自己并没有使用它。马克思区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ur），他部分地接受了18和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部分地发展了对这一传统的批判。这些术语都不是中立的，它们取决于阶级定位，同时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形态（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等等）和特定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

①ACTA: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反假冒贸易协定。——译者注

②SOPA: Stop Online Piracy Act, 禁止网络盗版法案。——译者注

③PIPA: Preventing Real Online Threats to Economic Creativity and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ct of 2011, 保护知识产权法案。——译者注

性劳动是为资本而生产的劳动，它生产商品、交换价值和利润（剩余价值）。非生产性劳动不生产剩余价值。举个例子，私人家庭雇佣的从事烹饪和清洁工作的人，就不生产商品。虽然他/她的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售，但这种劳动能力生产出来的产品本身却不是商品。所以这就是非生产性劳动。然而，作为雇工的厨师在饭店中工作就会生产商品，因为他/她生产餐点卖给消费者。所以这就是生产性劳动。因此，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并不在于人们干什么活儿（在两个例子中都是烹饪），而在于他们与资本和商品形态的关系。如果将数字平民的自由劳动套用到这个概念上，很显然，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劳动是非生产性的。20世纪80年代，这个概念受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很多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人声称，通常由女性来承担的家务劳动事实上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因为这种安排可能会减少那些不从事家务劳动的人们的工资。我认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观点，甚至于它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构成了真正的挑战。

马克思对劳动和劳动过程（labour-process）的区分，同样与自由劳动概念相关。我们先从劳动谈起。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Capital* Vol. 1, 177）^①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7—208页。——译者注

劳动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人类活动。它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普遍范畴，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经济或社会形态。劳动让我们延续生存与发展。它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劳动可以等同于活动与实践。劳动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

与劳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的劳动过程概念是指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和特定的历史的社会和经济。他使用这种历史方法想要证明，在劳动过程中，具体的工作组织并非是必然的。现存的劳动过程总是可以克服的。马克思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之间的差异特别感兴趣。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过程建立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建立在工人将其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给资本家事实上。对比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过程与封建社会的劳动过程，马克思强调以下两点：

首先，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进行监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也就是使劳动工具的损坏只限于在劳动中它被使用时损耗的必要程度。其次，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资本家例如支付劳动力一天的价值。于是，在这一天内，劳动力就像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马）一样，归资本家使用。……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Capital* Vol. 1, 184f.）^①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6—217页。——译者注

马克思在这里已经确定，异化的两种形式在封建制度中并不存在，在资本主义之前的任何生产方式中也都不存在。第一种形式的异化，是指工人虽然生产产品，自己却没有能力用于自己的生计。第二种形式的异化，是指生产过程掌控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手中，工人没有能力组织工作过程。在马克思所做的劳动和劳动过程的区别中，让我们再次应用一下自由劳动概念。自由劳动在马克思一般意义的概念中常常指的是劳动。然而这个术语并不是指具体的历史的劳动过程。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如果自由劳动能够成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如果自由劳动能够取代雇佣劳动，就像雇佣劳动取代封建制度的农奴和封建制度之前的奴隶那样，自由劳动的概念才有意义。我们将更为细致地再次探讨这个问题。

对自由劳动的讨论，最初主要由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autonomist Marxists）发起，其与意大利工人主义学派（the Italian operaismo school）关系紧密。它与毛里奇奥·拉扎拉托、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关于非物质劳动的著作相关，而这些著作产生的背景则是向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向以及相关进程，比如工作组织（劳动过程的组织）的变革、工作环境中主观性和社会联系的生产，以及认为资本最终将控制生命的生物政治的资本主义。这意味着，非物质劳动，既是智力劳动又是情感劳动，涉及到许多活动，不再被看作是福特主义工作环境中的工作。

不仅仅只是智力劳动已经渐渐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规范。现在的情况是，一种新的“大众智能”（mass intellectuality）已经形成，它从一种资本主义生产的需求和与工作作斗争所产生的“自我实现”（self-valorization）的形式两者所形成的联合中生发出来。（Lazzarato 1998）

非物质劳动的概念是受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几页纸的启发提出来的，在该著中，马克思提到，财富创造和价值生产越来越独立于劳动。

财富的创造越来越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劳动数量……而是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体现不再那么鲜明了；人更像成为生产过程自身的守门人和管理者。他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不是生产过程的首领。在这一转变中，既不是人自己实施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他的工作时间，而是对他自己一般生产力的占用，以及他凭借着作为社会主体的身份而获得的对自然的认识和精通——一言以蔽之，正是社会个体的发展，才是财富生产的巨大的奠基石。（Marx 1973）

正像高兹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语言不太稳定，在许多术语间摇摆。将要取代劳动的事物是不固定的，有“一般智力”，“科学和技术的一般水平”，“一般社会知识”，“社会个体”，和“领导的一般权力”（Gorz 2010, 2）。然而，马克思提出的核心观点是很清楚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个阶段，知识、技术和一般智力首先变得与劳动无关，其次将取代劳动成为价值创造的来源。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几页书稿对于非物质劳动概念如此重要。然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这些言论和《资本论》第一卷中的马克思并不协调，在后者中马克思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并明确认为，劳动是创造交换价值的唯一来源。

提吉安娜·泰拉诺瓦（Terranova 2004）也许是充分使用自由劳动概念的第一位理论家。在一篇文章中（此文初版于2000年，当时社交网络尚未面世，维基百科和社交媒体平台也尚未出现），她将自

由劳动概念化：“许多活动使互联网成为一个蓬勃且极度活跃的媒介。”（Terranova 2004，73）这些活动包括“建设网站、完善软件包、阅读和应用邮件组，以及创建虚拟空间”（Terranova 2004，74）。与关于非物质劳动的工人主义话语一致，她也将自由劳动的出现置于后福特主义中。“自由劳动是这样一个时刻，文化的知识性消费被转换为过度的生产活动，这些生产活动被愉快地接受，同时也常常被可耻地剥削。”（Terranova 2004，78）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得出了自由劳动的三种特征，这三种特征也得到了参与本次讨论的多数评论者的认同。首先，自由劳动是免费劳动，与免费啤酒是同一个意思，是义务的付出。其次，与自主同义。与雇佣劳动相比，自由劳动享有更大的自主性，而异化程度较弱。自由劳动没有工厂，只有一个游乐场，因此，自由劳动可以被享受。第三，自由劳动是被资本剥削的。

然而，这种自主与剥削的辩证法，体现在大多数对自由劳动的描述中，只是对这种张力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泰拉诺瓦非常小心地避免强烈的判断，而只是提“复杂劳动关系”（Terranova 2004，73）。马克·安德烈耶维奇（Mark Andrejevic）已经在关于真人秀（Andrejevic 2008）、YouTube（Andrejevic 2009）和 Facebook（Andrejevic 2011）等许多研究中探究过自由劳动的概念。他的这些研究对象都是商品化的空间，每一个案例的核心论点都是对传媒研究中的某些论述的批评，这些论述大赞用户参与和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是民主化进程并向用户赋权的标志。与此相反，他认为，投入到商品化空间中的这些自由劳动正在受资本剥削。在他的研究中，自由的、赋权的以及解放的潜能，显然被货币化社会的消极层面夺去光彩。马迪奥·帕斯昆内里（Pasquinelli 2008）又推进了一步，他批判了自由劳动和公地（the commons）。很明显，公地并没有被资本俘虏或者圈占，否则，他将不再是一个公地。各

种各样的数字公地都不是商品化空间。但帕斯昆内里并不认为数字公地有任何积极性，因为它们都被资本剥削利用，都是劣质和黑暗的空间。这是一种极度不对称的关系（asymmetrical relationship）。他借用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概念化的寄生虫形象和乔治·巴塔耶（George Bataille）的有关“过度”（excess）的观点，提出了“公地寓言”（bestiary of the commons），意为，资本行为就像吸血鬼，吸干了自由劳动者所有剩余精力的鲜血，对此自由劳动者们并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太过幼稚。

我前面提到过的达拉斯·斯迈思，是加拿大传媒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极少数不仅研究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概念，也研究马克思理论其他方面的理论家之一。事实上，他使用了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斯迈思认为，传媒受众是一种商品，由传媒生产商一手打造的商品。看电视的行为将观众和广告商连接起来，这样，传媒观众就贡献了他们的劳动。尽管斯迈思没有使用自由劳动这个术语，他仍然可以被视为自由劳动观点的奠基人。就像安德烈耶维奇一样，斯迈思在商品化背景中研究传媒受众。对斯迈思而言，这是一出由三个演员参演的悲剧：传媒生产商和广告商是坏人，受众是受害者。传媒生产商生产了受众，也把时间卖给广告商，因而也将受众卖给了广告商。他提出，受众付出劳动的原因如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空余时间无不是工作时间。资本主义制造了一个“自由和闲暇的假象”（Smythe 1977, 47）。他阐述了这种观点如何与马克思劳动力理论相联系（劳动力有关工作的能力）。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成为私人财产。似乎人们可以自由支配它。如果人们在某个岗位上工作，你就出卖了你的劳动力。离开了这个岗位，似乎你就不能出卖你的工作。但是在这一点上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在工作岗位上，

人们所出卖的劳动时间并没有获得全部的报酬（否则的话，利息、利润、管理层的薪水就没法支付了）。离开工作岗位，（通过受众商品化）人们的劳动时间依然被售卖，尽管不是主动售卖的。获得报酬的工作岗位上生产的是商品，离开工作岗位所生产的是人们为了明天和后代的劳动力：即工作和生存的能力。（Smythe 1977，48）

这当然是一个创新的论点。这种研究传媒受众的不同寻常的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为斯迈思赢得很多信誉。然而，有两个问题令他的观点存在相当大的疑问。首先，他将人类生活中的所有时间都通通计算为资本主义制度工作的时间，只不过有时候获得报酬（上班时），有时候没有报酬（下班后）。这意味着所有的再生产时间（一天24小时）都花在了工作上。这个观点比受众劳动（audience labour）的观点更重大。对斯迈思来说，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单一的行为都变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作。这是最大限度的异化，而且没有出路。第二个问题在于，这个观点建立在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曲解之上。马克思的区分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区分了用于生产的劳动和劳动力（工作能力），且这里仅指雇佣劳动。用劳动力概念来分析再生产活动（reproductive activities）没有太大的意义。劳动力概念只在可被工人售卖的语境中才有意义。这正好是资本主义和（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等）其他经济制度的区别。斯迈思努力回避这个问题，他宣称，“离开工作岗位后，你的工作时间被卖掉了……尽管你没有主动卖它。”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是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演绎”，实际上违背了马克思劳动力理论基本原理。

最近，大卫·赫斯蒙德霍（David Hesmondhalgh）对自由劳动概念提出批判。他指出两个问题。首先，他批判地质问“将这个术语与剥削概念频繁地捆绑在一起”，既不足以令人信服，且前后矛盾

(Hesmondhalgh 2010, 276)。有时剥削与异化相关，有时与意识形态和控制相关，另外一些情况下，与自由劳动被资本的俘获和利用相关。然而，这些情况没有任何一种真正涉及剥削本身。我完全支持这种批评，此外我会添加一个观点：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论述，对自由劳动的剥削是不可能成立的。剥削是指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这是利润和资本积累的基础。就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而言，在雇佣关系之外可以创造剩余价值这一观点是无稽之谈。

其次，赫斯蒙德霍质问，对自由劳动的批判能够产生怎样的政治诉求。他指出，无偿劳动一直存在，例如家务劳动和社区义务劳动（如教足球），他强调优先秩序的重要性。他质问，在什么条件以及什么背景下，我们可能反对这种无偿劳动？哪种形式的劳动是特别不公平的？他也提出，历史上大多数文化生产都是无偿的。最后，他指出这一事实：那些无偿数字劳动的承担者们，可能获得了其他的回报，例如工作成就感和来自同侪的认可。

对自由劳动的出现以某种方式与后福特主义相连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无偿劳动的存在贯穿了资本主义历史，这着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无偿劳动在维持生计的工作（或者家务劳动）中存在，以非货币化行为的形式存在，例如，社区义务工作和邻居之间相互做临时保姆。然而，赫斯蒙德霍是将社区志愿足球教练的无偿劳动和（利益驱动型）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劳动混为一谈。前一种无偿劳动是非商业性的，处于非营利性环境中。后一种劳动处于商业环境中，将虚拟的或非物质的空间售卖给广告商。这一区别非常重要。有趣的是，这一区别在关于自由劳动的探讨中一直相当朦胧。让我们回到我前面提到的三位作者。对于泰拉诺瓦而言，自由劳动是指“建设网站，修改软件包，阅读和参加邮件组以及打造虚拟空间”；她没有在商业与非商业，资本和公地之间做出区别（Terranova 2004，

74)。安德烈耶维奇仅仅写到了与广告空间和利润生产有关的自由劳动。帕斯昆内里仅仅提到了与公地、非营利性的数字网站等相关的自由劳动和对自由劳动的剥削。

这是相当混乱的，和斯迈思的矛盾立场一样混乱。一方面，他声称是每天 24 小时都发生着剥削，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存在不被资本剥削的时间。另一方面，他又仅指那些工作之余的时间和空间，即广告时间和空间。所有这些不仅仅是混乱，关于剥削、利润和剩余价值的探讨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简言之，关于价值问题的探讨都高度令人不满。显然，价值既可以源自有偿劳动，也可以源自无偿劳动。然而，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来源一点也不清楚，甚至于马克思也给出了不同的信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剩余价值只能源自雇佣劳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又提出，技术劳动和一般脑力劳动也能够被资本剥削。我发现，关于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也难以形成一个明确立场。在接下来的关于价值的小节中，我将论证，有价值的事物和一些事物有价值的原因，往往是一种主观范畴。因此，那些客体化的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究竟来自何处是不可能作出明确判断的。

赫斯蒙德霍还提及了可能在雇佣劳动与自由劳动并存的时代出现的政治诉求问题。这再一次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然而，我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作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和他的一般劳动（意味着：有别于历史上具体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区分。马克思将一般意义的劳动看作是“人与自然共同参与的过程”，看作是同时改变了环境和人本身的事物，看作是不仅具有经济属性同时具有人类属性的活动。劳动在这些意义上，可以宽泛地等同于实践和活动。这似乎是一种非常现代的劳动定义。马克思关于劳动的一般定义，和拉扎拉托、哈特（Hardt）、奈格里（Negri）以及其他与工人主义学派（operaismo

school) 相关的学者们的观点非常一致。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将实践这个术语换成生活。在生命政治资本主义里，工作就是生活，工作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关系和我们的主体性。将工作与休闲、传播、创造、游戏等方面区别开来的做法越来越徒劳无益。

从政治上看这意味着什么？在数字时代，自由劳动和雇佣劳动共存。这要么可能被视为一种可以广泛接受的状况，要么，可能像我的看法一样，意识到其绝对有失公平，最终令人难以忍受。这里开辟了两条批判的途径。第一条途径是，对于自由劳动和政治诉求进行批判，这种批判，就像是赫斯蒙德霍指出的那样，可能会招致将自由劳动整合进雇佣劳动体制的呼声。然而，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因为它会引向一个甚至更加商品化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每一个个体的人类活动都用交换价值来测量。将雇佣劳动体制及其疯狂的价值测量发展得更加壮大不该成为一种政治议题。第二条批判路径将转向对立的方向，将变为对雇佣劳动经济本身的批判。最近，对雇佣劳动替代品的势头有所增强。给每一个公民发放最低工资要求，可能成为正在探讨中的最突出的替代雇佣劳动的模式。在对“超越雇佣社会”的工作 (work beyond the wage-based society) 的概述方面，安德烈·高兹的著作或许作出了最成熟的贡献。(Gorz 1999) 这当然是一种激进的方法，甚至是乌托邦式的，实现的希望不大。从另一方面而言，这个时代可能需要更多关于我们如何工作、联系、创造和生活的激进的反思。

毫无疑问，自由劳动概念对于阐明社交网络领域的新发展已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在数字资本主义中，雇佣关系之外的人类活动繁荣兴旺，反思这些人类活动中的劳动就成为重要挑战之一。然而，“自由劳动”中的劳动的概念，严重缺乏分析的严谨性，它将许多相当不同的实践活动混为一谈。下载一首歌曲和在社交网络平台中与

朋友聊天是可以比较的吗？这两种活动又可以和阅读邮件组的邮件或生产维基百科条目相提并论吗？所有这些活动贴上了自由劳动标签，但是它们肯定是不同的事物。在私营频道看电视连续剧，和在不播放广告的公共频道看电视连续剧是一样的吗？商业网站（如推特、Google +、脸书）的自由劳动和开源网站（如 Diaspora）的用户之间存在区别吗？为什么我们谈论自由劳动时，涉及到邮件组的邮件，却没有涉及我们邮寄给朋友的那些装在信封里的、贴着邮票的实体信件呢？我们在电话中的交流行为，是提供给电信公司的自由劳动吗？要知道电信公司和社交媒体平台（如脸书和推特）之间唯一的区别，只是在于商业模式略有不同。电信公司没有使用广告商，因此他们需要向用户收取服务费用。反之，社交媒体平台运营商从广告获得收入，因此能够提供免费服务。

或许更成问题的是，有些活动实际上并非真的首要基于自由劳动，却使用了自由劳动概念。常有这样一种假设：自由劳动是没有经济报酬的劳动。然而事实却更加复杂。数字公地是通过与经济报酬相关的多样劳动形式创造而成的。让我们看一看开源代码产品。企业对开源项目的资助处于增长趋势。此外，开源软件的开发者，当其在闲暇时间生产代码的时候，通常还不是公司老板，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开源程序设计员中的绝大多数是被雇佣的程序员，他们为软件公司工作。通常任何形式生产的开源代码都会向开源社区开放（Weber 2004）。所以，这种从事开源软件开发的劳动通常不是直接获得报酬。针对知识公地的生产，也可以提出一个相似的论点。一个维基条目，例如“现代性”，可能是由一位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如一个哲学家）撰写的，也可能是由受雇于某个大学的人撰写的。

这就是为什么数字公地中的一些领域以令人兴奋的速度发展，反之，其他大部分领域的发展停滞不前的原因。开源公地和知识公地是数字公地中的先锋，一个很好的原因在于，这些公地的建设者

们，常常确实是有收入的。其他领域，例如教育公地^①和艺术公地，与开源公地和知识公地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公地发展严重滞后，因为在这里的劳动投入并没有得到其他各方的报酬。这些公地的发展确仅仅只依赖无偿劳动，他们靠的是那些作出贡献和投入其中却没有任何经济报酬的人们的激情、爱和狂热。

附言：对自由劳动的批判是重要的，对自由劳动批判的批判同样重要。不过，我们也不必对此钻牛角尖。如果劳动就是生活，劳动就是实践，那么，要发展一个比劳动概念本身更为清晰的自由劳动的概念就很难了。这将会被证明是一个虚无的事业，成为一个终将失败的计划。讨论自由劳动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不仅是概念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是二者的结合。只有当雇佣劳动和自由劳动再次成为单纯的劳动本身时，这一社会问题才不复存在，而这只能看阶级斗争的结果如何了。

六、价 值

为了理解劳动的全部复杂性，我们不得不转向讨论价值。和劳动一样，价值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研究领域。它是一个存在多种含义和观点的术语，一个引发大量讨论，易于分散注意并忽视最紧要之处的术语。那么，第一个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是，讨论价值这个概念对于传媒政治经济学来说有什么价值呢？第二个问题关乎马克思，关乎他的价值概念对于更好地理解我们当代传媒和传播生态系统的

^①我已在别处（Wittel 2012）写到过当前创立独立自主的大学和独立自主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各种尝试，这些尝试源自并回应了新自由主义对公立大学的摧毁。为了这次分析的需要，我对知识公地（比如维基百科网站）和教育公地作了概念化的区分。这种区分很多程度上与劳动和自由劳动有关。知识公地随着知识的累积而成长。它的成长是自然而然的，只是需要上传到网络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育公地需要付出没有经济支持的额外的劳动（真实的义务劳动）。

价值。

经济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Graeber 2001）划分了三种关于价值的思想脉络。第一种是社会学意义中的价值，其概念包括从根本上而言，什么是人类生活中美好的、正当的或者理想的（good, proper, or desirable）。第二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这种价值是指物品达到预期的程度以及预期如何用定量方法测量。第三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价值，这要追溯到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价值被视为有意义的差别。这是一个将语言（或者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关联的概念，一些事物的价值只有在与其他事物的对照或比较中才会建立起来。

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中，价值的概念和劳动概念获得的关注同样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由于劳动和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那些对于劳动感兴趣的文献对价值也同样感兴趣。^①人们只能推测，为什么对价值的探究被大大忽视了。我自己对这一忽视的解释是非常简单的：一般认为，或者说，看待此问题的出发点是，大众传媒被认为与公共物品享有同样的价值，被理解为是保卫民主的一股独立力量。然而，考虑到大众传媒机构的日益私有化及其所有者的经济收益不断增长，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物品的价值不断受到威胁。如此一来，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关注大众传媒的潜在价值，而是只关注其对立面，关注经济利益和政治管制给民主社会带来的威胁。这一视角具有完美的意义。毕竟，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立足于批判理论的传统。这样，赞美传媒集团和传

^①纳入了劳动和价值概念的文献，常常与广告有关，这并不是一个巧合。正是广告启发斯迈思（Smythe 1977）提出了受众商品概念。最突出的一点是，斯迈思（Smythe 1977）声称，电视受众为广告商和传媒生产者提供了免费劳动，这个观点触发了所谓的“盲点”的争论（Murdock 1978；Smythe 1978；Livant 1979）中有关价值的争论。价值对于苏塔·杰哈利（Jhally 1990）的著作也至关重要，因为他关于广告业、传媒受众的劳动的论点与斯迈思非常相似。

媒大亨们对公共领域的大放光彩作出了贡献的确会显得古怪。

如果我们将格雷伯关于价值的类型学应用于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我们得到的结果非常近似于方才做出的观点，但也有一些细微差别。可以肯定地说，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从未关注过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因为从未出现过用定量方法测量传媒产品或传媒机构的价值的尝试。可以同样肯定地说，社会学维度的价值还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得到探究。这原本意味着一场与媒体与传播的社会理想价值的争斗。原本应该有一场关于媒体和传播乌托邦的层面的争论：媒体应当怎样组织，应该怎样运作，应该是什么样子。然而，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对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意义上的价值，对于传媒生产和传媒组织的类似形态之间有意义的区别，特别是对于公共和私营传媒组织之间的区别，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还是有几分发言权的。在没有明确提及价值概念本身的情况下，英国传统的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确实对比了公共传媒机构和商业传媒机构，而比较的结果是，给予 BBC 等国有传媒机构以积极的评价。

这些思想脉络对于分布式传媒时代还有意义吗？至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经济意义上的价值正在成为热烈讨论的问题。确实，对传媒政治经济学家而言，用可计算的和量化的单位来测量价值，往往首先会成为相当可疑的目标。随着非物质劳动重要性的上升，这将不仅仅是可疑的目标——更成为疯狂而徒劳无功的项目。因为日益明显的是，智力和情感事物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然而，从价值经典理论主导的时代开始，关于从经济秩序角度发展的价值理论的可能性，以及将价值视为具体劳动的一种量度的可能性，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Negri 1999, 77f）奈格里于是反过来提出，可将来自上层的价值理论，转变为“来自底层，来自生活的基础”的价值理论（Negri 1999, 78）。奈格里吸收了斯宾诺莎（Spinoza）的观点，将价值视为能够促使行动的权力。这样，我们可以为格雷

伯关于价值的类型划分添加第四种思考方式：价值是推动人们行动的事物。

我认为，在分布式传媒的时代，对社会学意义上的价值的讨论将如雨后春笋。这些讨论关于数字公地，关于自由劳动和自由文化，关于开放、贡献和分享，关于注意力，关于稀缺性和丰富性，关于礼物经济（gift economy），关于所有制和接近权，关于合作与协作而非竞争，关于匿名言论和匿名行动，关于监管、隐私和透明度，关于专家和业余爱好者的价值，关于互联网和民主，关于人和技术，关于传媒和政治行动，关于资本主义和退出战略（exit strategies）。这些都在试图判断，什么才是美好的和理想的事物。

我相信我的论断可以包括这些观点：在大众传媒时代，传媒保卫民主的价值受到威胁。在分布式传媒时代，这一价值仍然受到威胁。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终点。现在，除了权力、意识形态和控制（这些问题当然高度相关）的问题，又补充了关于代理、赋权、权势和可能性等新的问题。在大众传媒时代，关于生活最重要事物的探究和传媒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太多讨论。在分布式传媒时代，这些讨论则如火如荼。

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可以对这些讨论有所贡献吗？让我们迅速回顾一下：在（《资本论》第一卷概括的）劳动价值理论中，马克思驳斥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商品的价值应当由市场决定，由用货币交换商品的人来决定。然而，价值是商品内在固有的，还是由顾客购买商品的欲望决定的，自由主义观点的立场在这二者间摇摆不定。马克思指出，价值由投入到商品的生产中的劳动数量（和劳动时间的数量）产生。货币和商品的交换掩盖的事实是：正是商品的生产赋予了商品价值。马克思认为，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商品中的具体化。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提出了他的剩余价值概念。剩余价值则是指劳动力的成本（工资）

和商品中凝结的劳动价值之间的差额。剩余价值或者利润就是工人的创造和工人获得的回报之间的差额。这样，如果价值是通过劳动创造，那么剩余价值则通过剥削劳动而产生。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中，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理论也一直饱受争议。对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而言，劳动价值理论“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理论中最薄弱的环节”（Žižek 2011, 205）。受到莫伊舍·波斯通（Moishe Postone）观点的启示，齐泽克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不是一种超越历史的理论，而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理论。这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当代的传媒生态系统，一部分属于资本家，一部分属于公营，一部分属于数字公地，那么马克思的理论何以有现实意义呢？在时而被称为“礼物经济”（Barbrook 1999）有时称为“捐赠经济”（Siefkes 2007）的环境中应用马克思的理论有意义吗？如果有意义，那么何以可能呢？让我们思考礼物经济这个案例。在礼物经济中，以把物品作为礼物交换的人们之间的人际关系为代价，将具体物品的价值来源定位于这些物品的生产中是否真的有效呢？这种方法没有太大意义。对这种仅仅专用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价值理论来说，有必要拓宽其界限。而要找到灵感，最明显之处就在关于价值的人类学文献。

格雷伯发表过对关于价值的人类学文献的杰出评论。他一直在寻找能克服将礼物和商品二分的概念，在关于价值的莫斯（Mauss）路径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之间搭建桥梁。他尤其对南希·芒恩（Nancy Munn）的价值概念印象深刻，南希·芒恩在美拉尼西亚（Melanesia）完成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对芒恩而言，价值是在行动中显现的。它是一个人的行动能力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过程。价值最终与创造社会关系的权力有关。

人们现在可以将对物的渴望和人类关系的重要性视为

同一事物的折射，而不是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商品必须被生产（没错，他们不得不流通、交换、消费……），社会关系必须被创造和维持；所有这些都需人投入时间、精力、智力、关心……这种架构事物的方式当然令人想起马克思的幽灵……沿着劳动价值理论这条线，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处理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能更宽泛地定义“劳动”就更好了。（Graeber 2001，45）

有人可能会补充说，这种劳动的概念和马克思作为实践的劳动的一般定义几乎完全相同。同时，它也与奈格里和斯宾诺莎将劳动描述为促使行动的权力的概念几乎相同。

所有这些理论可能都很难提出一个依据，来解释为什么传媒政治经济学首先需要处理价值理论问题。实际上，这并不是我想提出的观点。然而我实际思考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这个术语的宽泛意义上理解劳动）会开辟一条实证研究的新途径。如果将价值视为促使行动的权力，以及将价值视为创造社会关系的权力是站得住脚的话，如果价值关乎的是人们如何为他们的行为赋予意义，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分布式传媒政治经济学将作为一个绝佳的立场，用以重新定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建立奈格里（Negri 1999）所声称的那种源自底层的政治经济学。这将对价值的研究，研究重点不在于结构，而在于主体性和他们创造、连接、沟通、分享、共事以及赋予所有这些事物意义的渴望。

七、产 权

在大众传媒时代，产权总是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存在重要关联。但是，传媒内容中对所有制问题引发的关注却相当有限。罗兰德·

贝蒂格（Bettig 1996）也许是过度谨慎地表明，尤其是知识产权和版权领域“相对来说较少得到研究”。他是为数不多的研究传媒内容所有制的政治经济学家之一。有趣的是，这是一项数字转向刚刚起步时的研究。

贝蒂格非常关注知识产权规范性原则和现存体系之间的差异。知识产权核心的规范正当性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知识和艺术性工作的创造者需要创新的激励。版权意在给予创作者开发自己作品的专属权，这些权利反过来能为作者提供收入，激励作者创作新作品。然而，实际的版权系统没有按照这个理想来操作。大多数艺术和知识性工作都依赖于生产、再生产和发行的过程，而这些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昂贵的技术。在贝蒂格看来，“版权所有权越来越取决于资本家，这些资本家拥有机器和资本进行生产和发行”（Bettig 1996，8）作品。

正是由于资本家阶级拥有传播资料，就能榨取传媒信息的实际作者的艺术和智力劳动。为了能够获得“出版”，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实际创作者必须将他们作品的所有权转让给拥有发行手段的人。（Bettig 1996，35）

这是对大众传媒时代非常正确的分析，没有留下太多希望的空间。不仅如此，他还令人称奇地预见到：“智力和艺术公地的圈地并非不可避免的，并非必然如此，虽然对资本逻辑的强调令其看上去好像非这样不可。”（Bettig 1996，5）贝蒂格一定已经感觉到了他们正在改变的时代。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他的著作出版之时，共享文化（sharing cultures）和数字公地很大程度仍局限于开源运动。当时还没有 Napster 这样的文件共享软件，还没有创意公地（Creative Commons）这样的版权法律实验，也没有社交网络。大众

传媒时代，资本的扩张逻辑没有给智力和艺术公地留下太多空间。传媒内容的绝大部分不是公共资产，而是被资本夺取了。在这个层面上，贝蒂格的观点有一些预言性质。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智力和艺术公地的圈占根本不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这是一场克莱纳指出的“你死我活的战斗”（battle to the death），战场的一边是艺术和智力劳动，以及那些想要营救数字公地的人，另一边则是资本以及那些意在圈地的人们。

贝蒂格提出了一个有诸多实证数据支持的令人信服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版权管理——在理想的规范意义上是合法的——没有真正支持智力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却支持了那些控制传播流的人。随着数字化转向，这一相当成问题的版权管理变得更加糟糕。当所有数字物品都可以被无穷尽地复制，并以最小的附加成本进行分发传播时，它们就被当作非排他性的共享物品（non-rival goods）。实际上，大多数知识产权是非排他性的，意味着他们被一个人使用时并不妨碍其他人使用同一物品。然而，数字物品不仅仅是非排他性的，而且天生就储量丰富。如此一来，从有意制造稀缺假象的意义来看，通过数字权利来拯救版权的所有努力都是荒谬的。他们将储量丰富的物品转变成合法的稀缺商品。讽刺的是，在数字时代，只有有意制造稀缺假象才能满足资本家的积累。正是由于数字事物不仅是非排他性的，而且储量丰富，知识产权问题才从一个次要问题走上中心舞台。

用短短几行来总结对自由文化的讨论是不可能的。但我仍然想发表几句评论，只是为了将几个关键立场与马克思联系起来。首先要指出的是，在批判政治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之间，如约凯·本克勒（Benkler 2006）和劳伦斯·莱斯格（Lessig 2004）之间，有一条相对明了的分界线。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不放弃知识产权的合法性的前提下，是拥护自由文化的。他们只是提出了

完善版权法的建议。他们将数字公地视为一种进步发展并为此鼓掌欢呼，但并不过分关注参与了数字公地建设的自由劳动。本克勒 (Benkler 2006, 3) 认为，以公地为基础的大众生产 (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加强了个体自由度和自主权。正是在此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家们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他们认为自由劳动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批判政治经济学家阵营中，关于数字传媒的争论并没那么清晰。同时存在两种立场：一边是对自由文化的热烈辩护（例如，Cory Doctorow 2008 或者 Kevin Carson 2011），一边是对自由劳动和资本对自由劳动剥削的热烈关注（Pasquinelli 2008；Kleiner 2010）。我们发现，大部分描述中普遍承认这种困境，而这种困境很难被打破，许多评论家还在持观望态度。自由文化困境的一个出路，就是引起寻找新的模式来保证艺术和智力工作者有一定的收入 [例如，彼得·桑德 (Peter Sunde) 的“支付平台” (Flattr) 或者德米特里·克莱纳 (Dmytri Kleiner) 的“版权极左” (copyfarleft) 和“冒险共产主义” (venture communism) 的建议]。

然而，除了一些罕见的例外情况（特别是 Wark 2004 和 Kleiner 2010），这些探讨都规避了讨论所有权本身。即使那些自由文化的热情捍卫者，也以相当实用主义的观点来支持他们的立场，例如有观点认为，自由文化最终会刺激创意生产和改革，然而版权会导致创意和改革成果的减少。尽管这些论述非常重要，但我非常惊奇地发现，一种对知识产权本身的根本性批判至今没有摆上台面。巴迪乌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反问：我们为什么要“为了确保当权者的生存而固守所有权的全部形式？” (Badiou 2010, 5)

这当然正是马克思迟早有用之处。首先我们可以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是，所有权不是一种自然权利。它是一种历史产物。所有制关系受具体的历史条件所支配。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个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Communist Manifesto*: 68）^①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关于产权的观点是标新立异的，与自由政治理论家存在明显区别。这一区别在于，自由政治理论家没有关注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反之，马克思将所有制概括为一种关系，即人们通过商品所建立的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样，所有制关系从根本上而言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有制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关系为基础，也以生产资料拥有者一方的利润积累为基础。

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②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Capital Vol. 1*: 762—763）

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对物品的所有权关系不太大，但却关系着排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3页。——译者注

除他人使用物品的权利。为了解构这一广泛传播的神话，即私有制是由那些勤奋而愿意刻苦工作的人们公平挣来的，同时其他人则是“懒惰的无赖”，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关于所有制起源的替代性解释。

每天向我们说教如此乏味的儿童故事，是为了保护私有制……在真实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Capital Vol. 1: 713—714*）^①

为什么这句话在资本主义面临其第一次全球危机之时获得如此大的共鸣？第三点，且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是更加重要的观察是，马克思对私有制和个人所有制（private and personal property）的区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私有制是丑恶的，它不仅是异化劳动（雇佣劳动）的结果，更糟糕的是，它也首先是异化劳动实现的手段，并且是维持资本和劳动不公平关系的手段。私有制是生产性的所有制，它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至关重要的所有制，是一种能够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所有制。也许我的判断有些简单化，但大体上马克思确实将私有制等同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私有制与个人产权或者用于消费（用于再生产、用于生存）的产权是非常不同的，产权是不会社会化的，因为也没有社会化的必要。毕竟，非生产性的产权或者基于需求的产权是没有一点危害性的。

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雇佣劳动的平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1页。——译者注

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Communist Manifesto*, 68f）^①

毫无疑问，知识产权不是个人（personal）的产权而是私有（private）产权。毫无疑问，它们都是生产性商品，它们生产剩余价值，也为未来的商品奠定基础，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信息生产更多的信息，新闻生产更多的新闻，知识生产更多的知识，艺术生产更多的艺术。因此，知识产权这种发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并不保护这些非物质物品的作者，相反，它却有助于资本主义的积累。贝蒂格用丰富而详细的经验性证据对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撑。

在我看来，支持自由文化的人和关注自由劳动剥削本质的人之间的争论陷入了困境。两种立场都应获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支持。他们彼此相互反驳，但是他们与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之间又如此完美地协调。此外，新的商业模式的发展，对于智力与艺术工作者来说，看上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前途。这些都归结为一个简单的事实，资本家不愿意出于利他原因支持自由劳动，而那些被剥削者挣的钱只够维持自己的生存。

这种困境的唯一出路讨论私有制本身的合法性。私有制关系反应了社会关系。现在，我们可以结束这个话题了。它将带我们重新回到价值，回到社会学意义上的（我们从生活中所享受到的）价值，带回到建立在斯宾诺莎情感理论上的第四种方式的价值，带回到作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译者注

为促进行动的权力的价值。它也将会带我们重新回到劳动。如果自由文化对社会是有益的（这是一个从未被认真辩驳过的观点），那么社会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来支持他们的无偿贡献，他们带给人类的礼物。就这么简单。全球性的基本收入或许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可能的方法，但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自由—劳动—自由—文化—困境（free-labour-free-culture-dilemma）应该触发一个相关的讨论，那就是劳动分工。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画家，充其量只有一些人在从事其他事情的同时，也会画画”（*Literature and Art*, 76）。

如果人们使用他们促进行动的权力来反对资本主义所有制，他们将会投入斗争：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Capital* Vol. 1: 764）^①

马克思对这场斗争或许有点过于乐观。不过，这种乐观及其带来的希望又是非常需要的。

八、斗 争

没错，这是一场关于阶级的战争。但战争是由我所在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875页。——译者注

的富人阶级发动的，并且我们将是赢家。（Buffett 2011）

在大众传媒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是相当有限的。在数字和分布式媒体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能够更广泛地应用马克思的概念，这也是我的主要观点。我已经应用了他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关键概念——特别是劳动、价值和财产权概念，这些概念都存在内在联系——来表明它们对于分析我们当前的传媒生态是有现实意义的。当代传媒生态包括一个关于国家、市场和公地三者形成的有趣的混合体构成。另一个概念阶级斗争，显然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处于核心地位。数字和分布式传媒已经打开了新的可能性，用以抵抗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用以建设资本主义的替代制度。但如果受压迫者没有通过斗争推动更多的根本性改变，就没有任何一种可能性能够实现。

跟劳动、价值和产权一样，阶级斗争的概念也是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的特色概念，但仅处于边缘位置（例如，Mattelart and Siegelau 1979）。它还从未成为一个核心概念。此外，戴尔-威瑟福特的声明是对的：“尽管已有一些研究站在阶级斗争立场，关注工人阶级围绕数字机器和电子传媒所进行的战斗，这些研究往往没有提出任何超越了新卢德主义（neo-Luddism）的理论视角。”（Dyer-Witthford 1999, 64）

分布式传媒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传媒和斗争的理论化。既然有太多的实践与阶级斗争相联系，我们怎样才能能在21世纪将阶级斗争概念化呢？这些实践指的是在价值链的每个环节上抵制剥削的工人的行动力，近来已被政治经济学家们详细地探讨过（Huws and Leys 2003；Qui 2009；Mosco, McKercher and Huws 2010）。斗争在这个信息时代也与黑客行动主义（hacktivism）有关，与像“匿名者”（Anonymous）那样相互松散联系的网络“团

体”采取的抵抗形式有关。第三, 斗争与所有投入数字公地和建设替代商品和结构的精力有关。最后, 它与社会运动有关。2011 年爆发了首次全球起义。虽然社交媒体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具体关系确实有待更细致的研究, 但我们仍能放心地声称, 社交媒体能够为社会运动和政治活跃分子赋权。在数字时代, 传媒和斗争之间的联系是复杂而又强烈的。分布式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家正在扩展他们的研究, 不仅仅只关注传媒机构或者传媒产业。他们也在研究, 网络空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以及在真实的街头和广场发生了什么。

马克思的确已经回来了, 这次是个人化的 (personal)。

参考文献:

Andrejevic, Mark. 2008. Watching Television Without Pity. *Television & New Media* 9(1): 24 - 46.

Andrejevic, Mark. 2011. Facebook als Neue Produktionsweise. In *Generation Facebook: Über das Leben im Social Net*, edited by Oliver Leistert and Theo Röhle, 31 - 50.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Andrejevic, Mark. Exploiting YouTube: Contradictions of User-generated Labour. In *The YouTube Reader*, edited by Pelle Snickars and Patrick Vonderau, Stockholm: National Library of Sweden. Artz, Lee, Steve Macek, and Dana Cloud(eds). 2006. *Marxism and Communications Studie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New York: Peter Lang.

Badiou, Alain. 2010.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London: Verso.

Barbrook, Richard. 1999. The High-Tech Gift Economy. In *Readme! Filtered by Nettime: ASCII Culture and the Revenge of Knowledge*, edited by Josephine Bosma, Pauline van Mourik Broekman, Ted Byfield Matthew Fuller, Geert Lovink, Diana McCarty, Pit Schultz Felix Stalder, McKenzie Wark, and Faith Wilding, 132 - 138. New York: Autonomedia.

Benkler, Yochai. 2002. Coase's Penguin, or, Linux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The Yale Law Journal* 112(3): 369 - 446.

Benkler, Yochai. 2006.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ettig, Ronald V. 1996. *Copyrighting Cultu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xford: Westview.

Burton, Graeme. 2010. *Media and Society: Critical Perspectives*.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Carson, Kevin. 2011. How “Intellectual Property” Imedes Competition. In *Markets Not Capitalism: Individualist Anarchism Against Bosses, Inequality, Corporate Power, and Structural Poverty*, edited by Gary Chartier & Charles W. Johnson, 325 – 334. London, New York: Minor Compositions and Autonomedia.

Castells, Manuel.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ldan, MA and Oxford: Blackwell.

Curran, James. 1990. The New Revisionism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Reappraisal.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 135 – 164.

Curran, James. 2000. *Media Organisations in Society*. London: Arnold.

Curran, James. 2010.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Curran, James and Jean Seaton. 1997.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ss and Broadcasting i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Curran, James. 2003.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ss, Broadcasting and New Media i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Devereux, Eoin. 2003. *Understanding the Media*. London: Sage.

Doctorow, Cory. 2008. *Content*. San Francisco: Tachyon Books.

Durham, Meenakshi Gigi and Douglas Kellner. 2006.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Oxford: Blackwell.

Dyer-Witheford, Nick. 1999.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Fuchs, Christian. 2008. *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ternet Age*. London: Routledge.

Fuchs, Christian. 2011.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Fuchs, Christian, Kees Boersma, Anders Albrechtslund, and Marisol Sandoval (eds.). 2012. *Internet and Surveillance: The Challenges of Web 2.0 and Social 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Garnham, Nicholas. 1986. Contribution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A Critical Reader*, edited by Richard E. Collins, James Curran, Nicholas Garnham, Paddy Scannell, Philip Schlesinger, and Colin Sparks, 9 – 32. London: Sage.

Garnham, Nicholas. 1990.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Sage.

Garnham, Nicholas. 2000. *Emancipati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rguments About the Media and Soci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olding, Peter, Graham Murdock, and Philip Schlesinger. 1986. *Communicating Politics: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Goetz, André. 1999. *Reclaiming Work: Beyond the Wage-based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Goetz, André. 2010. *The Immaterial*. Calcutta: Seagull Books.

Graeber, David. 2001. *Toward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The False Coin of Our Own Dreams*. New York: Palgrave.

Grossberg, Lawrence, Ellen Wartella, and Charles Whitney. 1998. *Mediamaking: Mass Media in a Popular Culture*. Thousand Oaks, CA: Sage.

Hardy, Jonathan. 2010. The Contribution of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In *Media and Society*, edited by James Curran, 186 – 209. London: Bloomsbury.

Herman, Edward and Noam Chomsky.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London: Vintage.

Herman, Edward and Robert McChesney. 1997. *The Global Media: The New Missionaries of Corporate Capitalism*. London: Vintage.

Cassell, Hesmondhalgh, David. 2010. User-generated Content, Free Labour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Ephemera* 10(3/4): 267 – 284.

Huws, Ursula and Colin Leys. 2003.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Jhally, Sut. 1990. *The Codes of Advertising: Fetish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aning*. New York: Routledge.

Jhally, Sut. 2006. *The Spectacle of Accumulation: Essays in Culture, Media, & Politics*. New York: Peter Lang.

Kellner, Douglas. 1995. Media Communications vs. Cultural Studies: Overcoming the Divide. *Communication Theory* 5(2): 162 – 177.

Kleiner, Dmytri. 2010. *The Telekommunist Manifesto*. Amsterdam: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Laughey, Dan. 2009. *Media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Harpenden: Kamera.

Lazzarato, Maurizio. 1998. Immaterial Labor. Accessed February 29, 2012. <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c/fcimmateriallabour3.htm>

Lessig, Lawrence. 2004. *Free Culture: The Nature and Future of Creativit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ivant, William. 1979. The Audience Commodity: On the “Blindspot” Debat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3(1): 91 – 106.

Livingstone, Sonia. 2009. On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9(1): 1 – 18.

Marx, Karl. 1973.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Books.

Marx, Karl. 1977.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arx, Karl. 198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edited by Frederic Bender, New York: W. W. Norton.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74. *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96.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5: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Literature and Ar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ttelart, Armand and Seth Siegelaub. 1979.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An Anthology in 2 Volumes*. New York: Bagnolet.

McChesney, Robert and Victor Pickard, eds. 2011. *Will the Last Reporter Please Turn Out the Lights: The Collapse of Journalism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Fix It*.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New Press.

McQuail, Denis. 2005. *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Mosco, Vincent.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 London: Sage.

Mosco, Vincent.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osco, Vincent, Catherine McKercher, and Ursula Huws. 2010. *Getting the Message: Communications Worke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LTD.

Murdock, Graham. 1982.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Control of the 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 In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edited by Michael Gurevitch, 118 – 150. London: Methuen.

Murdock, Graham. 1978. Blindspots About Western Marxism: A Reply to Dallas Sm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2): 109 – 119.

Murdock, Graham. 2004. Past the Posts: Rethinking Change, Retrieving Critiqu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1): 19 – 38.

Murdock, Graham and Peter Golding. 2001. Digital Possibilities, Market Realities: The Contradictions of Communications Convergence. In *Socialist Register 2002: A World of Contradictions*, edited by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111 – 129. London: Merlin Press.

Negri, Antonio. 1999. "Value and Affect." *Boundary 2* 26(2): 77 – 88.

Nichols, John and Robert McChesney. 2006. *Tragedy and Farce: How the American*

Media Sell Wars, Spin Elections and Destroy Democracy. New York: New Press.

Pasquinelli, Matteo. 2007. ICW-Immaterial Civil War: Prototypes of Conflict Within Cognitive Capitalism. In *My Creativity Reader: A Critique of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Geert Lovink and Ned Rossiter, 69 – 80. Amsterdam: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Pasquinelli, Matteo. 2008. *Animal Spirits: A Bestiary of the Commons*. Amsterdam: NAI Publishers and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Qui, Jack Linchuan. 2009.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MA) : MIT Press.

Schiller, Herbert. 1989. *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 N. Y. : Oxford U. P.

Siefkes, Christian. 2007. *From Exchange to Contributions: Generalizing Peer Production into the Physical World*. Berlin: Edition C. Siefkes.

Smythe, Dallas. 1977.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Ablex.

Smythe, Dallas. 1978. Rejoinder to Graham Murdock.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2) : 120 – 127.

Stallabrass, Julian. 2003. *Internet Art: The Online Clash of Culture and Commerce*. London: Tate Publishing.

Terranova, Tiziana. 2004.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Pluto Press.

Wark, McKenzie. 2004. *A Hacker Manifest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yne, Mike. 2003. *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 Key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London: Pluto.

Weber, Steven. 2004. *The Success of Open Sourc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aymond.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 – 1950*. London: Chatto & Windus.

Williams, Raymond. 1961.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Wittel, Andreas. 2004. Culture, Labour and Subjectivity: For a Political Economy from Below. *Capital & Class* 84(Special Issue): 11 – 30.

Wittel, Andreas. 2011. Qualities of Sharing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Ethics* 15.

Wittel, Andreas. Forthcoming 2012. Hochschulbildung als Gut: Vom öffentlichen Gut zur Ware zum Gemeingut? In *Wissensarbeit Und Arbeitswissen. Zur Ethnographie Des Kognitiven Kapitalismus*, edited by Gertraud Koch and Bernd Juergen Warneke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Žižek, Slavoj 2011.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London, New York: Verso.

第二篇

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



帕巴罗·卡斯塔尼奥 (Pablo Castagno)^①

批判转型中的马克思理论： 阿根廷传媒民主化，新自由主义之后

萧肇君（译），吴畅畅（校）

【摘要】本文认为，若要推进社会主义的解放志业，就得深入调查党政干部队伍（political cadres）究竟怎么隐匿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灾难效应，并将公民与劳动者的诸般需求，纳入其调控规约，或甚至是其移花接木的算计之中。若要研究国家意识形态的生产，很重要的一个要件就是，我们必须分析政治及媒体的相互构成关系。为理解阿根廷总体政策意识形态变迁，作者以“媒介立法”为切入点，对于军人集团独裁统治时期（1976—1983）下新媒体法的公告施行、民主及新自由政府任内（1989—1999）对新媒体法的修正，还有，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政府（2007— ）在2009年针对媒体民主化（media democratization）所批准的新法，分别分析。透过将政策予以脉络化，他并进一步指出——推翻威权，并不代表媒体与社会改革已尽全功，而当代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对抗，

^①阿根廷拉马坦萨国立大学法律和政治科学系教授。他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阿根廷的国家危机：全球幻想与国家围堵”，而他在文化与媒体方面的出版，包括了在 *Mediation* 23 (2) Spring 2008 发表的专文“从地方电视到国家电视：新西班牙的名人文化及集体认可”。他目前进行的比较研究，关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下南欧及南美的政治示威。pcastagno@unlam.edu.ar.

如果未能正视国家霸权及资本主义仍在跨国资本全球部署的基础上持续再生产，其进步性有待检证。从此角度视之，吾人在个别社会中所面对的难题，其实有其人类共同命运的性质，并足见，以世界为范畴、透过非主流理论视角搜集暨评析相关经验资料，有其益处。至于，如何将这些体会转化为对政策与环境的思索与实践，仍有待有识有志之士，一同努力了。

[关键词] 批判政治经济学，全球危机，霸权，媒体政策，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populism）^①，基什内尔路线（Kirchnerismo）。

一、导言

以阿根廷为个案进行检视，我的目的是，探求国家与党政干部队伍如何努力压制源于国家根本冲突的社会张力，并将之作为诉求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机制，值此同时，再制出跨国阶级的统治，并在其上成就全球资本主义。^②我特别主张，媒体是构成国家意识形态调控及政治斗争的关键场域。在此，说到意识形态（ideology），我指的是，统治政治团体及统治阶级有目的地将其想法散布于全社会，使其想法位居尊位（Marx and Engels 1998/1846），并与文化及政治领导过程的社会形构相调和（Gramsci 2000，200—210）；借由

^①平民主义（populism）在他处或可见译为“民粹主义”，并带有反智的贬义。然而在南美，该词所指涉的范围甚广，凡宣称从人民角度出发、欲与人民位居同列者，则不论左右或参与阶级，似均可类归此畴。然而，作者在阿根廷提及 Kirchnerismo 对于平民主义的自我宣称，所指的，却是本欲持人民立场而与新自由主义断裂，但终究不能不尝试在人民立场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求协调的政策思维。当然，这也许也暗示——在阿根廷传媒政策辩论与资本主义再生产方面，围绕着这个词的阵地战还将持续下去。——译者注

^②承延 Manuel Castells 的著述，当我谈及全球资本主义，我指的是一经济体制，其主要组成要件能实时在全世界的尺度上运作（2000，105）。

吸纳暨结合其他团体及阶级的论述，消解（统治者）与其他群体间可能的冲突对立（Laclau 1979, 187—189）。据我了解，这些符号实践，实实在在地隐藏了社会那冲突对立的本质（Marx and Engels 1998/1848；Marx 1978/1867, 319—328；Horkheimer 1989/1932, 55）。而我使用“调控”（regulation）一词，所指的亦是见诸于法律工具、国家政策、论述实践等形态的“意识形态的制度化”（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deologies）。

以此形式将意识形态调控予以概念化，我仍愿维持马克思及后续马克思媒体研究所持之见解，即媒体作为不具本质性的客体（unfixed object），实乃整合在总体的政治经济过程里。此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结构对立因而展现、再制、相互竞夺与转型（Murdock and Golding 1973；Garnham 1979；Wayne 2003；Artz, Macek and Cloud 2006；McChesney 2007；Mosco 2010；Fuchs 2011）。这些著作共有的，是批判的理论及方法，以此为凭，对于媒体的研究，方可置于那特定历史时刻下社会关系的总体性当中（totality of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具体而言，我的任务是要探查党政干部队伍如何响应企业亟欲增加利润的压力、如何将国家机器合法化，还有，如何在资本危机及政治风暴的脉络中处理公民及劳动者的民主需求。^① 追随马克思，我了解，资本危机即以商品交换实现利润此一过程中任何可能的断裂（Marx 1978, 433—465）。这些危机，包含了不同的事件，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然而，这些事件却都是以统治阶级亟欲确保资本家获利为特征。

在实证层次，阿根廷所以成为分析上有趣且相关的政治场域，可以归因于2001至2002年间资本主义那影响深远的衰退、阿根廷

^①承延 Nicos Poulantzas (1969, 72) 的著述，我所了解的党政干部队伍，乃由一社会类属所构成，而非指单一阶级。其功能，是要将国家再生产出来，而这个队伍对于宰制的经济阶级及整体资本主义而言，可称是至关重要。

先前的几次危机，还有国家意识形态（state ideologies）的周期性变动。依我之见，阿根廷媒体转型的当代史可以依三个重要的政治事件来区分：军人集团（military junta）独裁统治时期（1976—1983）下新媒体法的公告施行（Law 1980, 22, 285）^①、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 1989—1999）民主及新自由政府任内对新媒体法的修正，还有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政府（Ch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 2007—）^②在2009年针对媒体民主化（media democratization）所批准的新法。就政治倾向而言，目前的政府可以视为是内斯特·基什内尔（Nestor Kirchner）时期（2003—2007）的延续。内斯特·基什内尔总统，在2001—2002年新自由主义政策那场毁灭性的财政崩盘后上任。那场危机，使得阿根廷总人口4成陷入失业或低度的就业状态、过半的总人口在贫穷线下生活（Oficina de la CEPAL 2010；Lozano 2005, 4）^③，国家的正当性可谓因之深切动摇。梅内姆与基什内尔均属于 Partido Peronista，之前是个在1940年代兴起的全国性民粹主义政党。然而梅内姆任内，所推动的却是使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联结的新自由主义改革（Castagno 2010, 119—176），这使得所谓的基什内尔路线（Kirchnerismo）^④，本身即构成了一个国家存续及改变的复杂个案。

要考察这段当代史，我的中心问题是——1970年代中期、1980年晚期，和2001—2002年间，媒体政策到底如何与那些亟欲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响应劳工与公民需求的政策相联结。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危机理论及马克思方法取径，我欲以历史取径回答前述研究问

①行政权可统领陆军、海军及空军统帅。

②其人即前任总统 Nestor Kirchner 夫人，并于2011年大选之后续任总统。——译者注

③低度就业（sub-employment）所指的，乃是劳工虽然愿意更长时间地工作，但每周工时却仍低于35小时的劳动情状。

④泛指2003年后阿根廷的政策取向。——译者注

题，并希望能解释国家、媒体与公民之间的矛盾关系。我的一般目标，是要界定并解释不同政权及政府媒体政策的意识形态变化，乃至较特定的目标，则是要分析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政府的阶级改革及其与视听媒体系统内意识形态的关系。在此研究中，我将采用质性方法来检视同列为政府整体政治经济政策之一的广电及视听服务媒体立法。在此，我将“媒体立法”（media legislation）定义为一个权力的场域，在此场域中，公民、党政干部队伍及统治的经济阶级奋力建立国家介入的标尺。依此标尺，媒体资源从由分配、公共传播的范畴也因而划定^①。而此场域，包含、反映并构成了它自己也浸淫其中的社会整体。我主要的论点是，基什内尔路线已然发动了促进资本主义跨国化的资产阶级国家政策（Bourgeois state project），该政策先是由军事独裁政权于1955年至1983年间推动，接着，又再由梅内姆政府承继（Portantiero 1974/1977；Castagno 2010），乃至近来旧事重演，基什内尔路线所仰赖的媒体意识形态调控，还仰赖于国家民粹主义（state populist），而这与先前的国民威权（national-authoritarian）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调控尚有不同。聚焦于媒体政策，我希望能批判性地指出社会现实与国家声明之间的罅隙。

二、将媒体放在脉络之中：资本主义危机及国家转型

要现实地思考国家与资本主义系统，马克思的著作非常关键。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或政治经济学的观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方法（historical-material method）分析了资本主义下由矛盾及阶级斗争

^①我分析的主题议题，爰有国家对于媒体所有权的管制、对于广电业者的监督、媒体部门的资本积累，以及媒体的民主化。

构成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展示的，正是资本及薪资劳动者之间的根本对立、社会经济动力及社会的政治生活间的根本对立，形塑了现代历史。对马克思来说，了解并呈现这样的具体现实，自当是革命实践以肇建平等及自由社会的一部分（Lukács 2000/1923，3）。他的研究方法建立在批判理论取径上，其目标，一方面是要抓住社会现实与当前社会价值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则是要辩证地克服社会研究以及批判实践行动之间的差距（Marx 1998/1845，572—574）。

马克思观察到，资本主义乃是以资本积累及危机的周期出现为特征。如前述，所谓危机，马克思所指，乃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中断（Marx 1978，446）。而如其人所示，再生产乃是建立在企业对薪资劳动者的剥削上，也就是说，为了使所生产的商品（交换价值）可以因为市场交易而获得货币，资本家只愿意付给劳动阶级仅堪其再生产之需的社会必要金额，并从中夺取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是剥削了以商品为形式的劳动力。依马克思之见，资本乃是交换价值的积累，它需要资本流通及商品流通的持续进行（Marx 1978/1867，302—336）。是以，对于亟欲劫取利润的企业而言，要确保生产规模扩张、于生产中采用更多科技、增进每单位时间劳动的相对剥削、为市场上增加更多更便宜的竞争商品，资本积累实属必要。马克思解释，资本主义因而需要在资本投入与消费数据（means of consumption）或消费商品之间求取平衡（Marx 1992/1885）。他强调，危机之所以发生，是资本主义系统的内在倾向使然，也就是，“剥削最大量的劳动，却不去考虑市场实际的界线，也就是由可支付能力所支撑的需求的界线；而这又是透过持续再生产或积累扩张达成，而利润亦因之持续地转化为资本”（Marx 1978，465）。同时他也提醒，要解决危机，资产阶级——也就是统治的经济阶级——乃是朝着强制破坏大量生产能力、追逐新市场，以及更进一步剥削旧市场等方向而去（Marx and Engles 1978/1848，478）。

运用此一理论视野，我们可以分辨出当代资本主义的两个重要转折点。其一乃发生于1970年代早期。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及其他作者所示，从彼时起，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的资本主义积累周期开始在美国及世界的其他地方遭遇到严重的困难（Harvey 1991, 140—147）。为了响应资本主义的获利能力危机，各国党政干部队伍及跨国资产阶级无不以移除国家经济干预主义及建立新自由主义议程的方式因应（Smith 1997; Duménil and Lévy 2004）。于是，我们看到，为了解决企业获利的危机问题，党政干部队伍随即将国有公司私有化、消解劳动权利，将商品生产部署于生产成本较低的地区、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消除那些针对资本集中化及中心化发展所设下的限制，保障金融资本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以及强化金融商品生产——举例而言，将国民的退休金系统予以私有化；至于刺激新媒介、旅游、休闲及运动商品等方式扩展文化的商品化，更非例外。^① 时至今日，很明显的是，这样的新自由政策又再遭遇障碍，而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此刻正在发展当中。这可见之于欧盟诸国及美国过去五年停滞不前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然而，远在北方国家的危机兴起之前，新自由主义政策早已毁灭了许多南方国家。

我的论点是，媒体研究必须置放在历史过程之中。以葛兰西（Gramsci）的话来说，我们既要研究经济结构的张力如何反映在政治及文化的转型上（Gramsci 2000, 427），同时也要检视政治及文化实践如何转变了经济结构——亦即，辩证而主动的文化、政治及经济过程如何相互构成并改变彼此。举例来说，马克思对革命及反革命过程如何改变国家及私有财产的研究启发了葛兰西，而后者还运用了“有机危机”（organic crisis）的架构解释了商品交换及国家形

^①依马克思的词汇，商品化，也就是将使用价值转换成能交易的商品（Mosco 2010, 127）。

构所遭受的周期性不稳定。对葛兰西而言，有机危机的主要征兆之一，正是统治的经济阶级不再认为传统的政治图像（political representation）仍属恰当，而该图像同时也受到来自其他从属阶级的抵抗（Gramsci 2000，217—221）。在此历史情境下，从属阶级转为政治主动的状态，而统治阶级的霸权亦再不具合法性，其统治遂只能以强制来维系，与此同时，经济瘫痪，国家的整体危机也于焉浮现（Gramsci 2000，218）。

在此意义下，我主张，媒体乃是国家场域之一，其中，政治团体及阶级乃打造了新的意识形态论述、觅得了新的盟友，并建立起霸权来处理有机危机。以葛兰西的话来说，霸权指的是那些获得公民及劳动者同意的政治、文化及道德指令（Gramsci 2000，194）。正值有机危机侵蚀了制度性行动者（政府、工会、商业协会）之间的契约，公民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也遭破坏，媒体功能的重要性即同步增加。进一步而言，媒体是使商品化及资本积累一般过程得以平顺进行的主要媒介（Mosco 2010，130；Fuchs 2009/2011，135—160），则媒体场域作为一重要的空间，一旦资本崩坏，统治经济阶级还可利用此空间强化商品交易。简言之，从马克思的角度思考媒介，我意图检视的，乃是将资本积累及国家正当性再生产出来的阶级及政治斗争，也是创建另类媒介、政治及经济体系的阶级及政治斗争。这样的探查有其必要，并有助我们用辩证眼光将国家视为一不稳定的形构：一方面它要再生产出跨国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它又要聆听公民的声音。换句话说，媒体的政策分析允许我们用两种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待国家（Held 1991，144）：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器官（Marx and Engels 1978/1848，475）；国家是具有部分相对自主性的机制，虽然它也再生产了统治阶级的利益（Marx 1978/1852；Poulantzas 1969）。当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倾向强调媒体在资本主义再生产方面作为意识形态控制机制的角色（Althusser 2001/1970，95），捕

捉国家在再生产与霸权之间的不平衡，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三、阿根廷媒体政策中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性

环绕在 2001—2002 年间新自由主义大崩坏的进步性政治辩论，晚近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所推动的媒体改革，正可作为当中一部分的代表。崩坏彼时，正是阿根廷拒绝履行政府公债，甚且在连续 3 年的经济衰退之后，猛烈地将货币贬值之际。然而本节的讨论，还聚焦于卡洛斯·梅内姆（1989—1999）新自由政府及最近一次军事独裁（1976—1983）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性质。对于过往的政策取向，当前基什内尔路线拥护者的论点是，先前政策所以“向新自由主义转”，系由该军人政权所为，嗣后并由梅内姆深化。这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诠释。目前的党政干部队伍遂可以此诉求公民，都是因为独裁体制，结构性的资本主义调整计划才因而推动，并压迫了劳动者及公民。军人干政时期，为了消除公民对国家的异见，动用了国家恐怖主义及经济政策使劳工屈从。这个由军人控制的政权绑架、谋杀劳工、学生及政治行动者，使得数以千计的他们“被迫消失”（CONADEP^① 2003，296）；薪资调降；为企业引进技术并推动贸易自由化，以提振所谓的劳工生产力及增加进口；以北方国家的金融资本将国家经济体紧紧缠绕—提高国债，也吸收了企业的债务。^②

然而，基什内尔路线的论述忽略的是，打自胡安·多明戈·庇

^①即失踪者国家委员会，由劳尔·阿方辛（Raul Alfonsin）的民主政府（1983—1989）所建立。

^②至于那些非马克思的取径是如何看待这些事实材料，可参见 Calcagno（1989）及 Rapoport（2003）。当前官方说法，基本上倾向强调军政府造成公民失踪，而其腐败并使国家负债。换句话说，并没有将这些罪行置放在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前提下（按：将结构问题予以泛道德的个案处理）。

隆 (Juan Domingo Peron) 的民选政府在 1995 年遭军事政变 (coup d'etat) 推翻了之后, 庇隆的民族资本主义路线 (national capitalism), 就已经变了调, 并由镇压劳工、确保阿根廷与北方资本主义联结的政策取而代之 (Portantiero 1974/1977; Castagno 2010)。^① 前后两次军事独裁 (1955—1958; 1966—1973) 期间, 军人专政强化了国家强制及与北方资本主义的相互依赖。对此, 劳工虽然曾透过工作现场的劳动团结、新工会、总罢工与政治动员等方式强力的国家与资本霸权对抗, 然对抗未久, 很快又迎来了下一波的镇压 (Werner and Augirre 2009, 167—260)。而此一国家当局的有机危机, 碰巧与深化的经济衰退, 以及 1975 年的超级通胀危机一同发生。^② 此外, 与之相伴的, 还有来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也就是我说的北方资本主义——在崭新地理区位上的资本部署 (Harvey 1991, 185)。

我的见解是, 如采用较长的历史视角, 适足以显示, 在阿根廷国家与北方资本主义的环环相扣中, 改变的是调控的架构、强制的机制, 还有意识形态的形式。透过意识形态的形式, 国家和党政干部队伍要求公民顺从于国家与资本, 但国家采取有助资本跨国发展

^① 举例而言, 1957 年, 百大企业中, 有 64 个是国有企业, 至于其他, 则都是北方国家的公司。到了 1971 年, 百大企业中, 有 72 个是外国的跨国公司, 至于其他的, 才是国有企业, 而通常也都与北方国家的公司有所牵连 (Sourrouille 1985, 51)。如 Juan Carlos Portantiero 批判所指出的, “(在 1950 年代中期) 有两个基本替代方案可供选择。其中之一, 是强力推动庇隆主义 (Peronism), 使发展得以建立在国家与民族资本坚强的联合上。另一个方案, 则是创造使资本主义发展得以发展的条件, 也就是强调依赖, 并保证关键经济部门得受控制的政策取向 (Portantiero 1974, 102)”。至于非马克思取径是如何看待 60 年代的资本主义跨国化, 请见 Juan Vital Sourrouille (1985) 及 Guillermo O'Donnell (1988) 的著作。

^② 1975 年, 资本主义危机的症状, 在阿根廷的个案中显而易见: 通货膨胀率攀升至 444%, 国内生产毛额 (GDP) 及投资则缓步不前, 财政赤字飞升至 16%, 外债走扬, 国际贸易恶化, 而工会在 1975 年最终拒绝了剧烈的货币贬值及薪资冻涨 (Rapoport 2003, 651—694)。

的策略却始终如一，这可见诸于吹捧外资、坚持出口导向经济、为多国公司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以利其输出资本，以及定期的调节制度使所谓的劳动生产力向国际标准看齐等作为。而借由观察独裁及民主政权、见证阿根廷党政干部队伍先后吸纳了中左思潮、平民民主，及 Peronistas^① 等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窥见国家如何以不同的调控及意识形态技术来支持大同小异的政策取向。意识形态技术方面，军人独裁系透过压迫性民族主义（repressive nationalism）来与劳工、工会、庇隆主义政党（Partido Peronista）及全国左翼政党的需求相抗衡。抗衡的结果，参与反抗的庇隆主义劳工、庇隆主义政党的全国左翼部门，以及全国左翼武装团体，莫不被控以煽动、贪腐，以及受国际社会主义影响的国际恐怖主义罪名。而别号国家安全条例、由军人集团对广电制订的 22, 285 法，正可以作为此一时期的例证。

举例来说，军人集团在行政权控制（军人集团的总司令）下设立了广电调控制度，包括在阿根廷的媒体调控单位（Comite Federal de radiodifusion, COMFER）^② 中创设了三军代表，并由他们与公共信息部长、传播部长，以及另外两位来自私有媒体组织的代表一起来主管媒体业务。此外，22, 285 法也要求媒体内容必不得违背“民意”、国家传统及基督教道德规范。法令要求广电业者“散布讯息、[与行政机关] 合作，以满足国家安全方面的要求”。^③ 国有广电与商业广电被要求应避免播送那些削弱爱国主义的内容，此外，法令并要求广电业者应消除那些鼓吹与国家道德、社会及政治规范相冲突的生活与意识形态的内容（见第 5 条及 286/81 规定）。此一

①Peronism 一词，系由阿根廷前总统 Juan Peron 的名字演变而来。Juan Peron 曾三度当选阿根廷总统（1946—1952，1952—1955，1973—1974），标榜 Peronism 的政党，光谱亦十分广泛。——译者注

②联邦广电委员会。

③第 7 条。

意识形态的强制，当然也包含禁止非营利媒体的存在在内。^① 是以，说是广电立法，事实上还是国家威权主义及商业媒体利益的凝结。然而，透过压迫式民族主义来促使资本主义成长，却实在是充满矛盾。

国家威权主义虽然借压迫劳工及文化异议分子的方式来支持资本主义，但与此同时，它也为资本的流通与积累设立了障碍。举例来说，除了限制国籍^②，借由对广电内容建立道德限制的方式，媒体立法也限制了媒体商品的生产。它要求广电业者禁止传送“凄惨、腐败或压迫性的新闻”、“淫秽姿势”、“邪竟胜正”或“公共骚动”的讯息。^③ 22, 285 法要求媒体公司主要只能播送本国内容，且只能以西班牙文播送，更要求媒体调控单位 COMFER 认证那些透过 FM 收音机流通的讯息，并禁止私有广播网络的设立。^④ 此外，它也禁止播送电视游戏节目、禁止媒体收视率，广电内容中亦不可以出现扣应节目。^⑤ 这些调控手段限制了资本积累，不是因为企业不能将国籍或道德产品商品化，而是因为即便企业可以使之商品化，政策上仍然要对其使用价值的范围，有所限制。

透过限制资本中心化、集中化及商业化^⑥，这样的立法同时也限制了资本积累。22, 285 法规定商业广电不能拥有平面报纸公司、管

①第45条。

②应指广电业重要人事如发起人、董监事、管理人的国籍限制。——译者注

③第22, 285号法案(第18条)及286/81号施行令(第1条)。有关独裁政体压迫文化生活之情状，请见Guillermo O'Donnell(1984)。

④第15、19、58、68条。第286/81号施行令。广电内容总量中40%应为本地内容。

⑤第24, 25条；扣应节目，即允许观众致电电台，与节目中人互动的节目形态。——译者注

⑥依马克思的说法，集中化所指的乃是资本积累与劳动过程的对决（资本将所有生产工具集中于许多企业之中），至于中心化，所指的乃是一企业或资本在不同经济部门或不同次部门的命令控制及所有权控制（Shaikh 1991, 76—77）。

理公共媒体服务，或者，管理超过4张以上的广电执照。^① 它也禁止广电业者成为国外公司的分公司、出售执照，或在营运5年之内让股份可以公开交易（commercializing shares）。^② 在广告方面——也就是在阅听众及广告主的关系方面（Mosco 2010, 132）——22, 285法禁止节目中有广告、限制只能播送国有企业的广告，以及限制那些可能“对于家庭及基督教道德”有所冒犯的广告。^③ 简言之，当军人集团亟欲解决70年代的有机危机，并企图加强稳固跨国资本主义之际，至少在媒体市场里，它还是以它所允许的道德强制及文化控制方式限制了资本积累。在此意义上，非常清楚的是，独裁政权控制了国有的电视频道，并且抢先在将政权交给劳尔·阿方辛的民主政府手中之前^④，先将 Canal 9 及 Canal 12 两个电视频道给私有化。^⑤

鉴于阿方辛政府任内，无论是统治的经济阶级或是劳动阶级，均无法解决长久以来的经济停滞的僵局，卡洛斯·梅内姆的民主政府（1989—1999）于是还将独裁时期对媒体市场的限制予以移除。梅内姆承诺劳工，他将会终结这场危机并且增进社会平等，然而，他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却是更偏向资本的一方。在媒体场域，梅内姆去除了先前的道德律令，并允许广电业者播送益智节目、其他非以母语播送的节目，此外，节目间也允许播送广告，扣应节目^⑥及商品型录（brands' catalogues）^⑦亦自此解禁。他的新媒体立法首

①第43条。

②第45、46条。

③第23条。

④其人在总统任内计达7年（1983—1989）。——译者注

⑤独裁政体将那些电视频道还给了原本的所有者。在1974年，Peron政府将之国有化。

⑥1990年代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Hola Susana）是个益智节目，观众则必须打电话才能参加。

⑦施行令1062/98, 1005/99, 1065/99。

度允许国有电视频道播送广告，并增加广告播送时间^①，此外，他也允许广电业者进行收视率统计——这个做法所传递的想法是，在社会内有特别的一群人乃是广告商想要吸引的对象。^② 这些调控上的变革使媒体内容的商品化或商业化与日俱增，先前无从想象的节目纷纷出笼，像是：脱口秀、政治丑闻、犯罪新闻，主持人亦可为电池品牌打广告的廉价幽默节目，此外，还有有线电视上各式各样的益智节目及色情频道。简言之，梅内姆的媒体政策一如马克思所强调：资本主义对于商品的实际内容漠不关心。依马克思的话来说，“如果商品能为他们自己说话，他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能使人感兴趣。但使用价值，并不是我们（按，即商品）作为客观之物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能成为客观之物，正是我们的价值使然。我们作为商品的自然交易证实了这点。在交易双方的眼中，我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交换价值。”（Marx 1978/1867，328）^③

梅内姆政府同样以改变媒介所有权规范的方式来滋育资本主义。它将国有的 Canal 13 与 Canal 11 频道予以私有化、允许报业与电话公司拥有自己的电视及有线电视频道^④，此外，并将媒体集团可以管理的执照张数从 4 张提升至 24 张^⑤、移除出售媒体公司股份的期间限制^⑥、允许新广播电视网的筹建，以及移除执照移转的限制。^⑦ 梅

①施行令 1652/96，1005/99。

②施行令 1062/98。阅听众的组成对于商品话过程来说最为根本。如 Dallas Smythe 所观察（1977），资本主义媒体需要为广告主生产出阅听众来。批判的回顾，请见 Vincent Mosco（2010，136—138）。

③译者所译。——译者注

④第 23，696/89 号法案（第 65 条）。第 26，053/99 号法案（第 1 条）禁止公共服务公司管理广电执照，不过，透过立法允许那些来自于同样允可阿根廷资本经营广电业务的国家的外来资本，该限制后来业已移除。请见后文。

⑤第 23，696/89 号法案（第 65 条）。

⑥施行令 1062/98。

⑦施行令 1071/91 及施行令 1005/99。

内姆对外资的立法也认可了资本在媒体市场的进出。而 21, 382 (1993) 法以及其他 53 项对外资的新协议^①——较之本国法的效力为高——并要求国家应平等对待外资及本资。是以, 受核准的国际投资客遂得进而将利润及资本跨越国境而汇回母国。梅内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促进了媒体的集中发展, 而这同样也建立在跨国化发展的基础之上。举例而言, 报业公司号角集团 (Group Clarin) 因而成为最大的媒介集团:^② 特别是, 它旗下的公司 Cablevision 可谓买遍了该国的有线电视网络、持有大约 260 张的有线电视执照。^③ 值此同时, 新全球资本也因而流入市场: 举例而言, Telefonica International——这家同样历经私有化过程的西班牙电话公司——取得了 Canal 11, 并同时管理了另外 9 张电视执照, 此外, 自由媒体公司 (Liberty Media Corporation) 买了 Cablevision 四分之一的股份之际, 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也持有了号角集团 18% 的股份 (CEPAL 2002, 97)。

因此, 我们看到梅内姆的媒体政策, 其实是整合在他的新自由国家机器里。在此政策取向下, 梅内姆同样推动了倾向资本主义的劳动立法、自由化贸易, 将所有国有企业予以私有化, 将先前政权所积欠的外债与全球政府债券交换, 将国家退休金系统部分私有化, 推动跨国资本投资, 并建立了新的货币体制, 使阿根廷披索币与美

①国家宪法 (第 75 条)。

②依 La Nacion 在 2011 年 12 月 20 日的报道 (2012 年 2 月 5 日在线阅), 2011 年, 号角集团控制有 47% 的有线电视市场、9 个电视频道 (直接持有或可指派代表)、5 个有线电视频道, 在最常收听名列第二的收音机电台 (Radio Mitre), 以及许多张收音机广播执照、最多人阅读的报纸 (Clarín), 以及其他 10 家报纸及杂志、掌控了 37% 的报纸广告, 以及顶级视听公司的股份。请见号角集团的网站 (2012 年 2 月 15 日在线阅)。

③例子可见诸 Perfil 报在 2009 年 4 月 5 日的报道 (2012 年 1 月 5 日在线阅)。

金间可以等额自动转换（Castagno 2010，119—176）。^① 概括而言，依梅内姆的管理，市场将可以使各式各样政府认为无法由国家流通的物质及符号商品进行流通，尽管如此，实际的成效却是，新自由主义剧烈地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一如比阿特丽斯·沙莉欧（Beatriz Sarlo）在1990年初期所描述的，只要梅内姆掌权，“阿根廷即生存在一个‘后现代’的文化氛围。在此架构下，国家分崩离析且贫困。空有50个电视频道、每日20小时的播送时间及公共教育系统，当中竟没有任何的符号或物质资源”（Sarlo 1994，7）。这样系统性的社会不平等贯穿了1990年代，致使国家在政治上也无法承受这样的局面了。到了90年代晚期，失业率攀升至18%，而贫穷率也高达了30%（Lozano 2005，4）。

在此不平等的脉络下，商业媒体所流通的讯息无不在驱使消费者加入所谓的第一世界（比如，美国迈阿密的购物中心、欧洲的体育活动），值此同时，回避了结构而运用道德或个人主义式修辞，则将贪腐政客视为是阿根廷新自由经济的敌人（Castagno 2010，226—231）。这些问题到了1999年早期开始恶化，起因于作为阿根廷最大贸易伙伴的巴西开始推动货币贬值。在此情况下，阿根廷人于是选出了中间偏右的政治联盟ALIANZA。^② 该联盟承诺将起诉政治贪腐。此举与国有企业私有化密切相关（Verbitsky 1990）。然而除了这项承诺，这个政府却仍然只奋力保全新自由主义总体的经济架构，确保

^①梅内姆政府建立了一个特殊的“欧元”：当欧元在欧洲取代了先前各国的货币，阿根廷美元（也就是说，该货币成为马克思所称的普遍货币等价物）则成为了国家管控经济的工具，并在全球经济体中压迫劳工适应以美元计价的竞争力。

^②教育、健康及就业联盟（Alianza para la Educacion, la Salud y el Empleo）乃是由传统政党（UDR）及其中左联盟（FREPASO）所创。

公债得偿付之际，却使劳工处境日益艰难。^① 这样的打击，与公民期待相违。工人与公民于是起身抗拒这波新自由主义的搏节政策（neoliberal austerity）。举例而言，两大工会联盟共实行了 8 次的总罢工，而失业劳工的社会运动也有了新的动力。在关键选区中，废票竟然赢得了 2001 年的国会选举。^② 到了 2001 年年末，主要城市的公民更塞满了公共广场要求该联盟的佛南度·德·拉·鲁阿（Fernando de la Rúa）总统下台。在“他们必须全数离开！”这句口号的号召下，公民们向现任总统和主要的几个政党说不（Solanas 2004；Pousadela 2008）。但尽管有这些游行示威，传统政党却仍然屹立不摇，并以国会条款的方式选出了新总统。以国家为名，继任的爱德华多·杜阿尔德（Eduardo Duhalde）总统还将此衰退转化为资本家的新出路：他的政府剧烈地将货币贬值，并且调低工资^③，以公民的储蓄为大公司清偿银行负债，并打压抗议的失业劳工（Castagno 2010, 317—338）。而这场国家统治的危机，最终还以 2003 年总统内斯特·基什内尔的胜出画下句点。

^①该联盟（ALIANZA）通过的劳动法取消了团体协约；降低国内劳动薪资；意图将工会健保基金私有化；而交换来的政府垃圾债券也被推给国内及全球的退休金请领者（Castagno 2010, 287—289）。

^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Buenos Aires）及圣达菲（Santa Fe）等城市，最后是空白票及废票赢得了大选（按：甚至比有效票更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Buenos Aires），空白票及毁损票则得到了第二高票，在科尔多瓦（Cordoba），废票则得到了第三高票。阿根廷属总统制，政府有行政权，至由参议院及众议院（Congreso Nacional）组成的两院（bicameral）持有立法权，此外，尚有司法权。我在此使用国会一词，所指的即前述具有立法权的两院。

^③货币贬值意味着即使在危机 4 年之后，平均薪资较之于 2001 年的水平，仍然低了 4 个百分点（Grana and Kennedy 2008, 65）。贬值改变了整个经济的相对价格。随着（以美元计）商品出口的增量，（以本国币值计的）工资水平却持续恶化。

四、后自由主义国家与媒体

“只有当（阶级）关系发展到一定高度，而利害冲突非常紧张厉害的时期，一般人才能看穿表象、明白实情为何，此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才方始浮上水面为我们所充分认识。”

——Max Horkheimer, *Notes on Science and the Crisis*
(1989/1932, 55)

尽管新政权的支持者明确地表达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不满，并清楚表达他们国家人民的政治取向，基什内尔路线仍然企图延续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下推动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并强制使不平等的阶级结构得以运作。首先，在商品生产部门，货币贬值及全球商品价格走扬（农产品、能源、矿业）双双结合，强化了阿根廷在经济政策上亟欲征服新市场的出口导向：2003 到 2010 年间，出口金额从美金 299 亿上升到美金 680 亿。出口的增加主要来自于将车辆出口至巴西、将黄豆出口至亚洲，以及将矿产品输出至全球市场。北方资本仍然控制着资本主义在生产方面的骨干（Chudnovsky 2001, 96）。^①其次，内斯特·基什内尔政府，以及继任的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政府也持续减少外债占 GDP 之比率，并将私有化的退休金系统重新国有化。尽管如此，目前外债所占 GDP 比例却已逼近

^①1990 年新自由改革的结果，多国公司持续控制了总汽车出口的 99%、总矿业出口的 99%，以及总农业出口的 62.4%——蔬菜、油及谷物（Chudnovsky 2001, 96）。

前次衰退水平。值此同时，新的国家退休基金在其投资组合^①里依然买入了大量的政府公债。换句话说，基什内尔路线同样将国债重担移转给退休金投保者承担，并拒绝给付给退休者薪资所得替代率82%的退休金。第三，基什内尔路线固然重新建立了团体协约制，然而在正常劳动市场之外（也就是团体协约制之外）的劳工比率并无变化，依最少估计值计算，大概都还有34%的总劳动人口属之。^②从由视之，在解释GDP中的薪资何以在1970年来即趋于停滞（Greene and Kennedy 2008, 4），资本主义攻击的不断加强，可称得上是重要因素。接着，基什内尔路线固然声称贫穷人口已降至一成，但此数据却是基于过时的统计标准而得——它认为一户四口之家每月的维生总额仅需1423匹索（合当美金326元）。^③简言之，过去4年内，阿根廷所以能出口700亿至北方国家金融资本中心，适足以证明基什内尔路线仍然将不平等的跨国阶级结构持续地再生产出来（Damill and Frenkek 2009, 22; Cano 2011）。

固然，基什内尔路线对于国家形塑运动中人民民主的累积并非毫无贡献，如梅内姆赦免前军事首领罪责的政府命令被宣告无效了。同样地，扶助失业家庭养育孩童的最低补助编列了。此外，同性婚姻也批准了。还有，媒体民主化也部分地推动了。这些政策某种程

^①当前外债约占GDP的46.3%（Ministerio de Economía 2011）。2001年，私人退休金系统中76%的劳工退休金持有的是政府债券，但由于政府无力赎回致使公债违约，最后只得由信用违约互换出售者承接。（Castagno 2010, 159—176）。10年后，国家退休金基金的57.8%系投资于政府债券（ANSES 2011）。超过35%的债券以披索计价，然而非官方的通胀率却是官方的3倍。这是说，未来的退休金持续地贬值。确实，政府并没有为了提高劳工退休金而操作国有退休基金，使私人退休金体系得利，若真的这么做和盗用劳工基金无异了。

^②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s Censos（国家统计及普查局，INDEC）于2011年6月发布的报告（2012年1月15日在线阅）。

^③如同La Nación Informa报2011年11月8日的报道（2012年2月3日在线阅），在大Buenos Aires都会区，保守天主教教会的财产乃4倍多于官方统计所示。

度上都算是响应了公民及劳工的需求。一如某位积极参与 La Posta 小区广播的行动者在就媒体改革进行讨论时于国会所言，“我们相信，要回答我国民主何以在当前及 2001—2002 年危机之后备受挑战，其解答必当往更广泛的角度去寻，即社会部门参与公共政策的管理、控制及执行的整体情况”（Farco 2009，42）。^①在此，我的任务，还是去评估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的媒体改革（Law 26，522）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捕捉并响应了人民民主在参与公共政策管理、控制及执行方面的需求。

第一眼看来，这些媒体改革似乎很深刻地抓住了一般民众对于参与的需求。而新的法律（还有其他那些基什内尔路线进步的公共政策），也得到媒体进步分子、非营利媒体组织、人权团体、工会及学院中人的肯定（Baranchuk and Use 2011；Busso and Jaimes 2011）。这些公民社会的行动者为民主广电联盟（Coalicion paea una Radiodifusion Democratica）发展出进步性的纲领，并将这些不同的部门团结在一起，敦促采取基什内尔路线的政府必须要修改媒体立法。^②这个联盟推动的社会运动，与国际媒体运动者同调，目的是为了要将媒介定义为是公共利益的组织，并企图将传播视作是基本人权，并将媒介民主化（Internaitonal Commisison 1980；Hackett and Zhao 2005）。在此，姑且先不论这个视角能否与资本主义系统相调和，此倡议确实有助于改变政治认知、为民主解放建立法律工具，并可作为松动商业媒体的骨牌。也就是说，奋力建立新的公共领域，对葛兰西所称、关系到长期在文化及政治解放上进行的“阵地战”有所帮助（Gramsci 2000，225—228）。亦如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

^①阿根廷小区收音机论坛（FARCO），它代表了 80 家小区收音机电台，并倡议社会团结、民主、公开透明、多样性及多元。

^②该联盟重新组织了超过 300 个来自于公民社会的团体（例如：小区媒体、估会、人权组织及公立大学）。

所论证的，一个有效运用公共领域概念的方法，就是去将它定义为“一组能实践民主、政治、社会及文化决策的社会过程”（2010，152）。而我要说，此联盟所取得的成果，必须要策略地解读成：媒体改革为民主及社会主义者解放开创了新的视野。

因此，视听传播服务法的进步与否，应当视视听服务能否为公共利益喉舌、促进人们的传播权而定。^① 确实，该法要求国家应当保障人们信息、参与及言论自由等权利。它强调，视听服务的目的在于鼓吹多样性、普及服务与参与。在自愿的视野上，该法保障了非营利媒体进入媒体场域的权利。更特定地说来，它要求国家在平等基础上就国有媒体、商营媒体及非营利媒体发出无线广播电视、有线电视及数字平台的执照，而非营利媒体正是要提供媒体服务给特定社群的公民社会组织（基金会、公民团体、教堂及工会）。进一步而言，法律自动许可公共大学、天主教教堂，还有原住民社群管理自己的视听执照。^②

然而，就发展媒体民主的议程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按：针对商业视听服务的）新法也将受联邦政府控制的公共媒介及国有媒介机制给合并进来。特别是，即便将那些参与相关立法改革及新调控机构讨论的国会政治部门、工会代表、公立大学代表、原住民社群、人群团体都给算进来吧，在阿根廷的个案中，仍然是行政权透过调控机关 AFSCA（Autoridad Federal de Servicios de Comunicación

①该法逾越了它的范畴。它声称与信息社会的发展有关，但根本上却涉及广电业、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因为它以节目表为基础定义了视听传播服务（第4条）。它既不调控因特网，也不调控电信，虽然在某一情况下，它将广播电视为“行动接收者”（第4条）。相似地，它并未给予作为国家政策的数字电视平台（Television Digital Abierta, Open Digital Television）任何特殊考虑。简单地说，数字平台既经建立，调控措施、普及近用，以及民众参与爱应受到重视。这部法案实际上也太好高骛远（overcharged），竟然还详载了北方国家的种种立法呢。

②截至目前为止，评估这些措施是否对媒介场域带来实质影响尚且言之过早。

Audiovisual, 视听传播服务的联邦机关) 执行法律。^① 行政权及主要的全国性政团提名 AFSCA 的大多数委员: 7 席中的 3 席。另外 4 席, 其中 2 名代表, 则由省级政府代表选举产生——但在阿根廷, 正常情况是, 赢得全国总统大选的政党通常也会赢得大多省级选举, 并在国会中占居多数 (见表 1)。同样地, 法律并没有建立起任何机制, 使国有媒体得以独立于国家运作, 特别是, 防止任何来自联邦政府的干预。^② 国营的广播电台 RTA S. E. (Radio y Television Argentina Sociedad del Estado) 管理了所有的国有媒体, 然而, 该媒体却大半还是由行政权及主要的全国性政党所控制。^③

表 1 管制机构 (第 12—16, 19, 32 条)

- AFSCA 是个国家负责执行立法、研发技术规范及控制垄断行为的组织。
- 行政权任命 AFSCA 的 2 位官员; 国会委员会则任命 3 位分别隶属于国会最大三个政治部门的官员; 而 Consejo Federal de Comunicacion Audiovisual (CFCA, 视听传播服务的联邦单位) 则任命 2 名官员 (一位必须来自于提供传播学位的公立大学)
- 关于 CFCA 的组成: 两位代表由 23 个省级政府及 Buenos Aires 市所推选; 3 位代表由非营利媒体工作者协会产生; 1 位代表由公立大学广播电台产生; 3 位代表由媒体部门的公会代表所产生; 1 位代表由人权团体所产生; 还有 1 位由原民团体所产生。
- CFCA 向 AFSCA 提供政策建议。
- 行政权可以在居民超过 50 万人的城市径以前述评选作业发出广电执照。
- 为民服务办公室 (The Defence of the Public Office) 受理市民申诉。

另一个讨论的关键, 是执照调控。如我所说, 新立法基本上限制了先前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所采取的是将频率平等分配给商业媒体、国家及非营利媒体。它将原本单一广电业者可以持有 24 张执照的上限减为 10 张, 也禁止视听服务提供商转让其执照。至于有线电视公司, 最多可以持有 24 张执照, 并且禁止有线电视持有广电执照 (见表 2)。此外, 法律强制规定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公司应播送拉

①第 7 条。

②相对地, 在其提案中, *the Coalicion por una Radiodifusion Democratica* 也谈到, 国家媒体必须为公共 (2011, 157)。

③RTA S. E. 负责人任命的制度性机制与 AFSCA 的架构类似 (第 119、132 条)。

丁美洲、国家、省级及地方的频道。^①

表 2 执照调控 (第 2, 25, 29, 37, 38, 41 条)

- 视听频率资源平均分配给国家、商业及非营利视听提供者 (每一类属的视听频率, 均应平均分配予 3 个不同部门的服务提供商)。
- 执照不得转让。
- 卫星视听服务提供商 (1 张执照涵盖全国) 不能持有其他视听媒体的执照。单一视听服务提供商不可以持有超过 10 张以上的 (无线) 广播电视执照。运用有线电视网络提供付费视听服务的提供者不可管理超过 24 张的执照。
- 任何的视听服务不能有超过 35% 的全国观众触达率。
- 任何单一区域, 一家视听服务者不可以管理超过一家 AM 电台、两家 FM 电台及一家无线电视或有线电视执照。
- 有线电视公司不能传送超过一个为自己所有的有线电视讯号。
- 所有国立公共大学都会有一张收音机和 (无线) 电视执照。
- 所有国家机构和天主教堂也都有权利作为持照人。
- 每一原住民团体在其所在区域都有权利取得一张收音机及一张电视执照。
- 所有城市或州都有权利取得一张 FM 收音机执照。每个省份及首都 Buenos Aires 市均有权接收一张 AM 收音机广播执照、一张 FM 收音机执照, 以及一张 (无线) 电视执照。

基什内尔路线也因而声称, 新法严格限制了媒介垄断, 并且增加了多样性。然而, 真正的灾难是, 对抗媒体集中化的官方论述可能是一场徒劳 (beating a dead horse)。换句话说, 从马克思的观点视之, 有必要强调媒体集中化乃是资本主义竞争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结果。马克思对此的解释是, 当企业就生产引进更多科技去生产更多、更便宜的商品在市场上竞争^②, 则就单一商品及商品总体而言, 就使用了较少的人工。^③ 因此, 利润倾向于下降。马克思对于剩余价值及收益的论说是, 此系直接剥削劳动者的成果。接下来的反

^①举例而言, 在 26, 522 法案后, 有线电视公司必须要播送委内瑞拉电视频道 Telesur、国家电影频道 Incaa TV (阿根廷电影), 以及儿童频道 Paka Paka, 而这些频道的上架均使媒体多元性增加。

^②如^①注所示, 这增加了资本的中心化及集中化。

^③剩余价值率, 所指的乃是那些转移给资产阶级的无偿劳动除以必要劳动时间, 后者即劳工花费以再生产其需求而最后以工资偿付的必要劳动时间——可变资本 (Marx 1990/1867, 320—329)。利润率也就是剩余价值与总体资本 (可变资本及不变资本) 在资本再生产循环中的关系 (Marx 1991, 132—140)。

趋势就是，企业需要将不变资本（固定资本、科技）的使用予以优化、强化对于劳动者的剥削，还有创造新的联合生产（Marx 1991/1894, 317—375）。简言之，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而言，“纯”竞争乃是集中的反命题，但马克思展现了何以资本集中与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两者乃是辩证地相关（Shaikn 1991, 76; Fuchs 2009, 381）。

因此，如果媒介调控并未妥为建立，必将无法限制“集中”，这是因为媒体公司有累积资本的需求。在此意义上，法令实在令人困惑：它一再提及要限制垄断，但是它同样明文要求 AFSCA 需要促进竞争与投资。^①立法者并未考虑媒体竞争与媒体集中之间的张力，因为他们无意改变媒体资本主义的基础：对于集中的调控只是将人民民主需求加诸于既有体系论述及制度方案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新法仍然维持有线电视服务提供商只能拥有 24 张执照的规定，并授权卫星电视公司（目前为美洲多国的直播卫星电视）以 1 张执照提供服务给全国，此外，且允许报业与电子媒体公司间的跨媒介所有权，限制电话公司进入媒体市场之际，却允许有线电视公司（比如 Telecentro）提供电话服务^②，而最终甚至允许任何资本主义公司在阿根廷签署的国际投资条约的基础上运作——即使同样的法令明文禁止外资取得阿根廷媒介公司的所有权^③，原因如前所述，阿根廷所签署的国际条约较于国内法有着较高的效力。

前述有线电视执照的例子值得仔细思考。新法允许有线电视公司在不同区域持有 24 张执照；然而，它并未界定究竟是哪些区域。^④

^①第 12 条。

^②Kirchnerismo 原本的方案乃是将允许电话公司进入有线电视市场。政府将该条文删除，是否是为了吸引中左阵营立法者的支持，抑或是考虑到目前控制有 9 成阿根廷电话市场的公司 Telefonica international 的权力因素，目前尚不明朗。

^③外国资本不得控制超过任何视听公司股份的三成（第 29 条），但此限制在国际投资条约的情况下可不适用。

^④管制机关可以决定持照者的地理及人口分配（第 45 条 c 项）。

也因此，有线电视公司可以运用政治压力依照他们的利益去界定这些地区。在此意义上，到底 Daniel Vila 可以透过他旗下全国第二大有线电视公司欧诺集团（Grupo Uno）掌控多少张有线电视执照？尚可从这位所有人发出的平面声明中略见端倪（de Santis 2012）。拒斥该公司掌管的执照多于法定数量，Vila 认为，新的媒介调控制度已然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些调控将门多萨市（Mendoza）周边地区、所有由该集团依执照进行管理的有线电视市场并计为一区。结果是，26, 522 号法律出台后，该集团目前反而以较少张执照就能许可与过去相同的视听服务范围。接着，新法还在行政及司法方面为公司开了大门。这同样可见于第 161 条规定，该规定给予公司 1 年的缓冲期依新法进行调整或于必要时减资。然而号角集团却拒绝此一立法，目前并借由法律手段停止该法之施行。

因此，可能的情况是，媒体集中化的未来，还是得看行政权及司法权是否仍将偏好特定的媒介集团却牺牲其他人的情况而定。此理甚明，我们也可从号角集团的例子得知。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政府刻正要求该集团进行减资，然而该集团在新法施行前，却是基什内尔政府核可其取得 Multicanal 这家有线电视公司，并使该集团得以触及 47% 的有线电视观众（Laboratorio de Industrias Culturales 2011）。总结而言，与媒介部分民主化一致，基什内尔路线的精神乃是要建立国家—商业媒体联合，这可以见诸于公共政策第 153 条规定，依该条规定，行政权“必须采取能促进国家视听联合形塑在所有类型及平台均得以形塑及发展的政策，并使所有经济行动者、公共机构、私人组织及学院机构在有利竞争的情况下^①进行

^①调节媒体多样性及商业的需求当然不仅见于阿根廷。即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多样性声明也是暧昧模糊（2002）。它说，文化财——具有认同、价值及意义的向度，必不能只被当成是商品或消费财（第 8 条）。易言之，文化财仍然被视作是有商品的成分。

对话、合作及商业组织”。然而，此一国家与资本家的汇流，却持续为非营利媒体行动者及生产者所拒。举例而言，AFSCA 近期已对授予新国家数字平台执照一事实行竞标程序。然而，非营利媒体组织却也断言，他们既无法负担参与竞标所需的费用，也无力支付国家要求在该平台上播送所需的上架费（Faro TV *et al.* 2011）。他们声称，新的媒体政策实际上“强化了国家而非小区”：而唯一能从新数字平台获利的非营利媒体组织，乃是那些隶属于那些与国家牵扯不清而较为有力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媒体组织（比如，部分保守的工会）（CoorDeCCAP 2011）。^①

五、重返民粹主义（populism）

劳工与资方之间没有冲突、国家与外资之间也没有冲突。（National Deputy, A24 Television, 2011）

就马克思取径而言，从基什内尔路线及其媒体政策中提取理论意义有其重要性。我的论点是，基什内尔路线就既有的国家形成加添了人民民主的元素，其做法是去论述人权、媒体民主化、团体协约及社会安全的需求。这包含了对公民进行部分的民粹主义动员。如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所述，民粹主义是种政治建构的形式，此形式并以论述及动员平民需求以对抗漠视这些需求的制度化组织为特色。这些需求固然相异，但他们对于建置化的合法现状有着共同的不满。如拉克劳所说，当被剥夺的大众（Plebs）要求要成为整体社群（populus）中的一分子，属于人民的民粹主义抬

^①Coordinadora en Defensa de la Comunicación Comunitaria, Alternative y Popular（保护小区、另类及人民传播组织）。CoorDeCCAP 集结了大约六成的非营利媒体组织。

头，而这在政治场域形成一堵共同战线来对抗那些人民之敌。而当政治主体集体化（collectivizing）或“霸权化”（hegemonizing）那些异质却与平等相关的人民需求，整体社群于是产生质变（2009，150—151）。更重要的是，整体社群不再是一个事先存在的社会群体，而是重新任命领导人的行动结果。只有当某位领导人能够将人民的需求给凝结在一起，并且动员整体社群去挑战那状似不可或缺之现状，质变才有可能发生（Laclau 2009，128—130）。^① 举例而言，在阿根廷，基什内尔乃是以对抗新自由主义及独裁残余痕迹、代表响应人民需求的领导者之姿出线。然而，一如基什内尔所承认的，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建构的形式，可以不同政治运动的样貌出现（Laclau 2009，29）。基什内尔晚期对于民粹主义的著作倾向不再强调阶级论述，但我要说，从马克思主义者视角发展民粹主义的理论，考虑阶级仍有其必要。

在此意义上，我认为，观察基什内尔路线如何在其阶级政策中论述其民粹主义的逻辑，有其重要性。换句话说，基什内尔路线需要解决民粹主义建构及资本主义再生产角色之间的张力。该政策的支持者固然可能会透过在修辞上夸大该政策与现状间差异的方式寻求解套。举例而言，基什内尔路线在为其媒体立法辩护时，所持理由是该立法消解了独裁时期的媒体立法及消解集团的垄断。然而，要以修辞化解结构上的断裂已证明是不可能的。因此，基什内尔路线必须要寻求制度—意识形态的安排，祈使民粹主义的论述与资本主义的目标，得以相结合。举例而言，一如前述，新媒体立法鼓吹国家—商业的联合。它同时要求视听服务提供商播送一定比例的阿根廷内容，其目标既在于强化一国媒体产业实力，并在增加视听领域内的就业（见表3）：

^①举例而言，Peron 将其人民主义及现有的国家资本主义方案相联结。

表3 视听内容（第65，67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在收音机广播总播送音乐及内容方面，所有电台音乐应该要播送30%的本国音乐，而所有音乐与内容广播中必须有70%是本国内容。本国音乐当中，其半数所有权人必须是阿根廷音乐家，他们可以将其音乐商业化。 • 在电视频道总播送节目方面，频道必须播送60%在阿根廷产制的节目。在那些最大的城市，所谓的独立生产者（不具备频道所有权的内容生产者），必须产制总电视频道节目的30%。 • 电视频道及收音机广播必须自制播送总节目的30%及50%。 •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必须要传送那些属于国家、公立大学还有各省及 Buenos Aires 的地方政府频道。 • 主要电视频道（指那些超过人口20%的频道）每年必须要播送8部新制的本国电影或3部新制的本国电视电影。
--

为促进本地媒体产业，基什内尔路线还可以在意识形态上将民粹主义修辞与国家既有的资本主义目标相调适。^①当然，在将本地内容视作是对抗或至少平衡北美或欧洲商业媒体扩张的文化意义上，这些制度设计仍有其进步性。^②然而同一时间，它也将国家媒体生产者、非营利媒体及小型商业生产者的内容统合进资本主义媒体工业里。透过这种方式，本国文化产业的政策也透过增添商业媒介使用价值的方式而再生产出资本主义，这乃是当代文化非常普遍的过程（Crawford 1992，15）。相对地，这样的议程对务实的社会主义者而言应属可欲，也就是善加利用国家推动本地内容的良机，去敦促国家推动真正的公共有线电视频道或公共数字平台，使在其上的文化产品得以民主地发展。

但如果这并没有发生，基什内尔路线的威胁还会在于，当誓言要推动民粹主义，自己所吊诡地推动的，还会类似于马克思观察到

^①不言而喻的是，本国内容与军人政府时代的国家一压制性文化工业不同。举例而言，新国家电视 Encuentro 频道或 Incaa 频道还会播送那些挑战既有社会的社会抗争纪录片或电影。

^②关于美国及欧洲媒体的全球扩张，可参见，例如 Herbert I. Schiller（1992/1969）、Armand Matterlart 和 Seth Siegelau（1979），还有 Lee Artx 和 Yahya R. Kamalipour（2003）。

的、路易波拿巴之例（Bonapartist）——私有财产及劳工阶级需求间的结构性对立，出口竟在威权主义。^①依马克思所记，路易·波拿巴的前车之鉴，正好是威权政权想要同时保全国家及私有财产，使二者不受社会主义革命之席卷，为此，国家也就消减了资产阶级的权利。当然，这与基什内尔路线不能模拟——举例而言，2011年，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获取了50%的选票而胜选——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人权团体谴责这个政府一意孤行走上歧路^②。然而，每当思及国家所做的、复杂而令人困惑的种种安排，即便改变了私有财产契约，却无不在允许国家持续再生产出国家霸权及资本主义发展，都让我确实想用这个词来模拟。这种波拿巴式的扬汤止沸（fuite en avant），于是创造出我所说的、资本主义及国家威权的灰色地带。而这个灰色地带，正是在公民的民主控制之外。

一个发生在媒体场域的个案是——“人人足球”（Futbol Para Todos）这个电视节目；足球是阿根廷最受欢迎的运动，并且是国家认同的象征。2009年，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政府突然与阿根廷足协（AFA）达成共识，以巨额税收支付播送足球比赛。阿根廷足协于是打破先前与TyC Cablevision（TV Publica）的协议，足球赛事的电视转播也因而转至国家的调控下。目前，公共电视频道（TV Publica）业将足球媒体赛事免费向国民转播，而这些比赛，原先仅提供TyC Cablevision的订户付费收看。“人人足球”可以视为是基什内尔路线向人民民主迈进的重要一步，是将先前为私营媒体

①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观察到，波拿巴（Bonaparte）在行政部门累积的权力，乃是以公民社会及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制为代价，然而，这却保障了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请见David Held（1991，147—150）。

②最受争议的，乃是政府近来对恐怖主义所引进的立法。依据CORREPI（Coordinadora Contra La Represion Policial e Institucional，反抗警察级制度性压迫组织），国家可以运用该新立法压迫社会抗争及劳工罢工（CORREPI，2011）。

“绑架”的“失分”给追回——这是暗示军人集团先前犯行的双关语。然而，在由国有电视频道转播该节目之后，却是由一间亟欲进入全球媒体市场、竞逐资本的媒体公司（La Corte）担纲制作^①。这种国家—商业的模糊联盟在其他场域也可看见。比如，政府对于官方通胀统计的操弄，对于政府发行公债的财务固然有利，但这却是以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当政府支持北方国家那些从开放矿坑撷取自然资源的矿业公司，那些矿业却招致在地小区及生态运动的抗议（Svampa and Antonelli 2009）。此外，这样的模糊地带，亦可见于国家为某些输出资本的公司所提供的设备里、在国家对无效率铁路系统的补贴里、在政府运用国有退休金基金以资助资本并平衡财政收支的挪移里、在政府将国家广告挹注于与官方政治立场相近的媒体集团里，或者，在那些将基础建设售予国家的私人公司所组成的新兴的新媒体集团里。^②

六、结 论

一如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在他对列宁（Lenin）和丹尼尔·班萨义德（Daniel Bensaid）（Lenin 1965；Bensaid 2004）的解读中所观察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政治领域的特性在于它乃是权利样态递嬗转变的竞技场，竞技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对抗、矛盾与斗争，都被偷换为新的语言，在如簧之舌间被

^①可见，例如，El Cronista 在 2012 年 1 月 13 日的媒体报道（2012 年 2 月 1 日在线阅）。

^②关于政府对国家统计数字的操控，可见由一群心思缜密的公立大学经济学家组成的 PlanFenix（Plan Fenix 2012）对信息权所发的声明。有关铁路公司补助增加，可见 Mario Damill 及 Robert Frenkel（2009，64）。有关政府广告在不同媒体间的不均分配，举例而言，可见于相关报章报道（2012 年 1 月 15 日在线阅）。这份报道乃以公开信息为基础。而参与媒体场域的国家基础建设提供者，则是企业 Electroingenieria。

错置、压缩或不经意泄露 (Callimicos 2012)。马克思对国家权力之不信任,使他在谈到政治领域的行动时,总是嘲笑政客惯于装模作样、自我欺骗,并对于自身行动的局限性视而不见 (Marx 1978/1852, 598)。阿根廷也不例外:国家政治领域内的行动者来来去去,但在这舞台上扮演的剧目似乎只是那几套在周期性地更替:爱国威权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我的论点是,这些意识形态的形式,注定是要隐藏国家真正重要的结构,也就是它必须是代表一般大众及国民作为公民之利益的机构,然而它也同时再生产出跨国资本主义的过程——也就是以北方国家为中心之际,却使这个国家的不幸增加,因而,也就引发了公民及劳工对于国家及资本的抵抗。这一切在葛兰西所说的有机危机时期,还再明显不过了。而在阿根廷的例子中,则发生在约莫是 1970 年代及 2000 年代早期。在此意义上,截至目前,基什内尔路线在处理 2001—2002 年间国家统治合法性崩溃的危机上尚称成功。本文以辩证的理解进路看待国家政治,因此考虑到党政干部队伍能主动地与经济上的统治阶级结合 (Miliband, 1969),并且也注意到国家在构建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上扮演的结构性角色,这对既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可起互补作用——而这,正是我在本文所采取的视角。

更进一步而言,考虑前述之国家意识形态,我认为,媒体场域乃是个根本的场域,国家通过操作媒体以遮蔽内部的核心矛盾。这个领域乃是个政治斗争的场域,但当独裁政权完全以强制作为代替霸权时,另当别论。而我在此欲强调的,还是阿根廷政府及政权用不同方式所欲否认、隐瞒或错置的,也就是 1970 年代与 1990 年代晚期与资本主义危机及政治动荡有关的社会对立。如我所示,由军事独裁政权所建立的国民威权媒体管制、梅内姆政府所建立的新自由主义媒体调控,还有基什内尔路线的平民—资本家政策 (populist-capitalist project),在管制及意识形态上各有其特色(按,但都同样

有其遮掩作用)。而我相信,通过这个取径,我们对于阶级统治、政治生活及媒体转型之关系的看法,就不会流于机械化:独裁政权限制了媒体中的资本力量,然而它也镇压不同意见而独厚资本家利益;梅内姆政权尽管大开言论空间广纳大众不满,但它鼓吹市场带来的财富并没有转移给工人的日常生活享用;而如果基什内尔路线所局部诉求的人民民主需求,不再能超越媒体改革的意义、不再能调控劳动者与跨国资本的冲突、不再能在商业活动与国家威权之间那启人疑窦的灰色地带找到迂回空间,其支持者可能将亲眼目睹其调控的成果化为乌有。

参考文献:

Althusser, Louis. 2001/1970.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Notes for an Investigation.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edited by Louis Althusser, 85 – 126.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ANSES. 2011. *Fondo de Garantía de Sustentabilidad del Sistema Integrado Previsional Argentino, Informe Mensual Octubre*. Buenos Aires: ANSES. Accessed February 10, 2012. http://www.anses.gob.ar/FGS/politicastransparencia/archivos/informes/Boletin_FGS_11_2011.pdf

Artz, Lee and Yahya R. Kamalipour, eds. 2003. *The Globalization of Corporate Media Hegemon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rtz, Lee, Macek, Steve, and Dana L. Cloud, eds. 2006. *Marx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New York: Peter Lang.

Baranchuk, Mariana, and Javier Rodríguez Usé, eds. 2011. *Ley 26. 522: Hacia un Nuevo Paradigma en Comunicación Audiovisual*. Buenos Aires: AFSCA and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Lomas de Zamora.

Bensaïd, Daniel. 2004. *Une Lente Impatience*. Paris: Stock.

Busso, Néstor, and Diego Jaimes, eds. 2011. *La Cocina de la Ley: El Proceso de Incidencia en la Elaboración de la Ley de Servicios de Comunicación Audiovisual en Argenti-*

na. Buenos Aires: FARCO.

Calcagno, Alfredo Eric. 1988. *La Perversa Deuda*. Buenos Aires: Legasa.

Callinicos, Alex. 2012. The Crisis Wears 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A Quarterly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133). Accessed February 1, 2012. <http://www.isj.org.uk/index.php?id=773&issue=133>

Cano, Fernando. 2011. Dudas Argentinas. *El País*, October 30. Accessed February 27, 2012. http://elpais.com/diario/2011/10/30/negocio/1319979149_850215.html

Castagno, Pablo Andrés. 2010. "The State Crisis in Argentina: Global Fantasies and National Containment." PhD diss.,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Castells, Manuel. 200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CEPAL. 2002. *La Inversión Extranjera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Santiago de Chile: Naciones Unidas.

Chudnovsky, Daniel, and Andrés López. 2001. *La Transnacionalización de la Economí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EUDE-BA/CENIT.

Coalición por una Radiodifusión Democrática. 2011. 21 Puntos Básicos por el Derecho a la Comunicación. In *La Cocina de la Ley: El Proceso de Incidencia en la Elaboración de la Ley de Servicios de Comunicación Audiovisual en Argentina*, edited by Néstor Busso and Diego Jaimes, 155 – 161. Buenos Aires: FARCO.

CONADEp. 2003. *Nunca Más: Informe de la Comisión Nacional sobre la Desaparición de Personas*. Buenos Aires: CONA-DEP.

COORDECAAp. 2011. Comunicado de Prensa? Qué Está Concursando AFSCA? *Buenos Aires: CoordDeCAAP*. Accessed January 15, 2012. <http://argentina.indymedia.org/news/2011/11/799065.php>

CORREPI. 2011. Comunicado de Prensa: Leyes Antiterroristas. *Buenos Aires: CORREPI*. Accessed January 15, 2012. <http://correpi.lahaine.org/?p=1103>

Crawford, Margaret. 1992. The World in a Shopping Mall. In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The New American City and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edited by Michael Sorkin, 3 – 30. New York: Hill and Wang.

Damill, Mario and Roberto Frenkel. 2009. Las Políticas Macroeconómicas en la

Evolución Reciente de la Economía Argentina. Seminarios de Economía No. 112. Banco Central 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Accessed February 28, 2012. http://www.bera.gov.ar/pdfs/investigaciones/PaperFrenkel_Damill.pdf

de Santis, Juan Pablo. 2012. Daniel Vila: Los Medios Mensajeros de la Ideología Tienen Una Pauta Importante. *La Nación*, February 2. Accessed February 7, 2012. <http://www.lanacion.com.ar/1444898-daniel-vila-queremos-un-desguace-de-cablevision-y-multicanal>

Duménil, Gérard, and Dominique Lévy. 2004. *Capital Resurgent: Roots of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ARCO. 2009. Nueva Ley de Medios Audiovisuales: Desafíos Para los Medios Comunitarios y Populares. Buenos Aires: FARCO.

Faro TV *et al.* 2011. Carta a AFSCA: Televisión Digital? Para quién es la democratización? Accessed February 10, 2012. <http://argentina.indymedia.org/news/2011/07/788002.php>

Fuchs, Christian. 2009. Som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Studies: Karl Marx and the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 369 – 402.

Fuchs, Christian. 2011.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Garnham, Nicholas. 1979. Contribution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2): 122 – 146.

Gramsci, Antonio. 2000. *The Antonio Gramsci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1916 – 1935*.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Graña, Juan M. , and Damián Kennedy. 2008. Salario Real. Costo Laboral y Productividad, Argentina 1947 – 2006. *Documentos de Trabajo* 12. Buenos Aires: Centro de Estudios sobre Población, Empleo y Desarrollo. Accessed January 10, 2012. <http://www.econ.uba.ar/www/institutos/economia/Ceped/publicaciones/dts/DT%2012%20-%20Grana%20Kennedy.pdf>

Hackett, Robert A. and Yuezhi Zhao, eds. 2005. *Democratizing Global Media: One World, Many Struggle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Harvey, David. 1991.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Held, David. 1991. *Modelos de Democracia*.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 1980. *Many Voices, One World: Towards a New More Just and More Efficient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London: Kogan Page.

Horkheimer, Max. 1989/1932. Notes on Science and the Crisis. In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A Reader*, edited by Stephen E. Bronner and Douglas M. Kellner, 52 – 57. New York: Routledge.

Laboratorio de Industrias Culturales. 2011. Una Aproximación a las Industrias Culturales. Buenos Aires: Secretaría de Cultura. Accessed January 15, 2012. <http://lic.cultura.gov.ar/investigaciones/industrias/index.php>

Laclau, Ernesto. 1978. *Política e Ideología en la Teoría Marxista: Capitalismo, Fascismo, Populismo*. Madrid: Siglo XXI Editores. English version: Laclau, Ernesto. 1977/2012.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Capitalism, Fascism, Populism*. London: Verso.

Laclau, Ernesto. 2009. *La Razón Populista*. Buenos Aires: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English version: Laclau, Ernesto. 2005.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Lenin, Vladimir I. 1965. *Collected Works*, Volume 32.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Lozano, Claudio. 2005. *Los Problemas de la Distribución del Ingreso y el Crecimiento en la Argentina Actual*. Buenos Aires: Instituto de Estudios y Formación de la Central de Trabajadores Argentinos.

Lukács, Georg. 2000/1923.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Marx, Karl. 1978/1852.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594 – 617.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Marx, Karl. 1978/1867. *Capital*, Volume 1.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294 – 438.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Marx, Karl. 1978. Crisis Theory.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443 – 465.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Marx, Karl. 1990/1867.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

Marx, Karl. 1991/1894. *Capital Volume 3*. London: Penguin Books.

Marx, Karl. 1992/1885. *Capital Volume 2*. London: Penguin Books.

Marx, Karl. 1998/1845. Theses on Feuerbach. In *The German Ideology*, edited by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572 – 574. Amherst: Prometheus.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78/1848.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469 – 500.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98/1846. *The German Ideology*. Amherst: Prometheus.

Mattelart, Armand and Seth Siegelaub, eds. 1979.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Vol. I: *Capitalism, Imper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McChesney, Robert W. 2007.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Critical Junctures and the Future of Media*. New York: The New Press.

Miliband, Ralph. 1969.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Ministerio de Economía. 2011. *Deuda Pública del Estado Argentino*. Buenos Aires: MECON. Accessed February 24, 2012. http://www.mecon.gov.ar/finanzas/sfinan/documentos/informe_deuda_publica_31-03-11_espanol.pdf

Mosco, Vincent. 201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Murdock, Graham and Peter Golding. 1973. 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0: 205 – 234.

O'Donnell, Guillermo. 1984. Democracia en la Argentina Micro y Macro. In *Proceso, Crisis y Transición Democrática*, edited by Oscar Oszlack, 13 – 30. Buenos Aires: Centro Editor de América Latina.

O'Donnell, Guillermo. 1988.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Argentina, 1966 - 1973*,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ficina de la CEPAL en Buenos Aires. 2010. Evolución de la Desocupación en Algunas Áreas Urbanas. *Buenos Aires: CEPAL*. Accessed January 21, 2012. <http://www.cepala.org/cgi-bin/getprod.asp?xml=/argentina/noticias/paginas/9/9839/P9839.xml&xsl=/argentina/tpl/p18f.xsl&base=/argentina/tpl/top-bottom.xsl>

Plan Fénix. 2012. Derecho a la Información. Página/12, February 14. Accessed February 14, 2012. <http://www.pagina12.com.ar/diario/economia/2-187536-2012-02-14.html>

Portantiero, Juan Carlos. 1974. *Dominant Classes and Political Crisis in Argentina Today*.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1(3): 93 - 120.

Portantiero, Juan Carlos. 1977. Economía y Política en la Crisis Argentina: 1958 - 1973.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39(2): 531 - 565.

Poulantzas, Nicos. 1969. 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New Left Review*(58): 67 - 78.

Poulantzas, Nicos. 1973.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Pousadela, Inés M. 2008. Participation Vs. Representati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Neighborhood Assemblies of Buenos Aires. In *Democratic Innovation in the South: Particip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edited by Ciska Raventós, 71 - 122. Buenos Aires: Consejo Latinoamericano de Ciencias Sociales.

Rapoport, Mario. 2003. *Historia Económica, Política, y Social de Argentina*. Buenos Aires: Ediciones Macchi.

Sarlo, Beatriz. 1994. *Escenas de la Vida Postmoderna: Intelectuales, Arte, y Videocultura en l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Ariel.

Schiller, Herbert I. 1992/1969. *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 Boston: Beacon Press.

Shaikh, Anwar. 1991. Centralization and Concentration of Capital. In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edited by Tom Bot-tomore. 76 - 77.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Smith, Paul. 1997. *Millennial Dreams: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Capital in the North*. London: Verso.

Smythe, Dallas W.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3): 1 –27.

Solanas, Fernando. 2004. *Memoria del Saqueo*. Directed by Fernando Solanas. Buenos Aires: Cinesur S. A. , ADR Productions, Thelma Film AG.

Sourrouille, Juan Vital et al. 1985. *Transnacionalización y Política Económica en l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CET.

Svampa, Maristella, and Mirta A. Antonelli, eds. 2009. *Minería Transnacional, Narrativas del Desarrollo Resistencias Sociales*. Buenos Aires: Biblos.

UNESCO. 2002. *Declaration Universelle de L'unesco sur la Diversite Culturelle*. Paris: UNESCO.

Wayne, Mike. 2003. *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 Key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London: Pluto Press.

艾尔番·埃尔多甘 (Irfan Erdogan)^①

失踪的马克思：马克思在当前传播研究中的 位置及传播在马克思著作中的位置^②

冯若谷 (译), 朱清河、范松楠 (校)

[导读] 本文采取量化研究方法, 对主流社会科学研究对“马克思”一词的使用状况进行抽样分析, 研究发现, 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正有意或者无意地避开马克思所关心的关键议题, 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扭曲, 甚至彻底违背了马克思对于传播问题的主要观点。此外, 本文做了大量扎实、细密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多部著作的详实梳理, 分析了马克思对于传播问题的相关论述。这些真知灼见虽然散落在不同的著作和章节之中, 但其对于传播历史、现状和本质的理解和判断, 不仅仅是传播史研究的重要参考, 更包含了对于当下传播世界的深刻洞见。可以说, 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对于“马克思并不关注传播”的有力回击, 更是一次对于马

^①土耳其加辛大学(安卡拉)传播系教授, 其著作设计打造传播的理论、方法、意识形态、文化与政治经济。近来其著述主要集中于当下媒介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导向, 以及一本关于电视节目本质的研究著作。erdogan. irfan@gmail.com, <http://www.irfanerdogan.com>.

^②本文是正在进行中的一项研究的一部分, 这项研究关注当前大众传播理论和研究导向。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资助了该项目的数据收集工作。另外, 作者感谢 Secil Kentel 和 Hakan Ugurlu 对本文的校正工作。

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重新发现。

[摘要] 本文的研究目的为：(1) 通过调查学术出版物中学术研究的特点来检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导思想的理论主张论述；(2) 通过再现和评估马克思有关传播方面的著作以证明马克思不关心传播这一论断的错误。本文结合了质化和量化两种研究方法，收集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包括两部分研究总体并采用多重抽样。其一，传播学期刊收录的论文。这些期刊均被汤姆森路透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引用。其二，马克思关于传播的所有论述。研究发现表明(1) 这些论文大都是对于统治阶级利益有助益的；(2) 它们大都排除了马克思以及很多重要议题，这些议题关乎统治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模式以及在传播和社会中的交往关系；(3) 大多数另类的研究方案都是被控制的路径选择，这些方案明显地或隐秘地违背了马克思的方法和解释在马克思对传播的兴趣问题上，与那些认为他对传播没有或很少有感兴趣的判断不同，马克思提供了关于传播的非常宝贵的解释。因此，如果想要了解传播在社会和社会变迁中的本质和功能，传播学者应当对马克思的相关论述给予密切的关注。

[关键词] 传播研究，传播理论，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传播学期刊。

一、引言：研究主题与基本原理

纵观人类历史，控制思想以及精神产品的生产、分配与使用始终都是统治力量的核心关注和实践范畴之一。随着不平等、压迫和权力与财富的不公正分配日益深化，组织化生活也日趋复杂，对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在广度和深度上已经扩展至生活的各个方面。在 21 世纪，这种控制已经成为一个持续的噩梦，以至于对思考、感受、信任和行动的内容、原因和方式等的管控，已扩展到了不分年龄的

所有人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从第一个远古帝国到封建时代的没落，精神思想的生产、分配与使用一直被神学的和政治的权力中心所控制，这些权力中心不仅占有大众的身体和灵魂，还占据着物质财富。之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由”时代到来了，全奴隶和半奴隶发现他（她）自己从拥有者或主人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了，他们被放逐在大街上，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谋生，他（她）的自由到头来变成了奴隶主不必养活奴隶的自由。他（她）的自由成为了一种新型奴役，旧的奴役被工资奴隶所取代。他（她）再也无法得到食品、衣物和房屋的保障。在教堂和城堡之内或之外，为神学和政治权力的利益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们要更幸运一些，因为新的机会越来越多，不断地出现在传统精神生产的范围之外，比如数量稳步上升的学院、大学，以及大众媒介。在知识生产方面，有两个领域快速扩张且变得重要起来：（1）公司的研究部门和公司的研究机构；（2）公立和私立大学。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权力开始逐渐感受到，全面控制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是很有必要的。在同封建主义斗争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宣扬并十分强调思考和表达的自由。而一旦人们在资本主义系统中要求自由、平等和正义，它就马上成了对自由的限制。特别是当新自由主义政策出现之后，这种控制机制在全世界得到了强化。这种强化主要来自于以下措施：（1）学校的私有化；（2）大众教育的边缘化；（3）对于课程和教育政策的修订；（4）为符合公司的需要，将大学教育降低到职业教育的层次；（5）建设诸如博洛尼亚协议的项目，以符合服务于特殊利益的区域或全球标准；（6）把学术研究与以人类发展为目的的批判研究剥离开来，并使其倾向于制度利益和公司利益；（7）通过由制度的、地区的、国家的以及区域和跨国组织提供的物质资金奖励，来诱导学者们趋向于功能性导向的研究；（8）通过一些奖励和惩罚机制，也借助于垄断性控制学术成果的生产、分配和提升，包括限制那些已

受控制的另类方案的传播和广泛分配，某些理论和方法的路径被视为主导而其他的理论和方法路径则被边缘化。无论如何，当下主流的传播学术导向至少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目标：（1）攀登学术阶梯；（2）在大学环境中，维护个人利益和自我实现的现行主流系统；（3）得到由大学、国家组织、本地/区域/国家或跨国基金会、大众媒介和公司构成的利益关系网络的接受、承认和支持。当前的主流结构及其被控制的路径选择是一个历史的状态，充满了控制与反抗。它构成了结构、结构化的交往关系以及知识生产的制度中不断强化的政治、经济和知识危机的背景。当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事实呈现的量化研究取向都始终坚持为工业利益服务时，新出现的以“后”作为其名称前缀的研究路径通过对相对性和特殊性（他们通过微原子化对此进行解释）的极端强调，通过忽略或拒绝社会关系规律及其结构、变化和历史特点的完整性，对主流工业生产模式和关系给予合理化、合法化与神秘化。

有不少实用主义的研究也支持大学与工业结构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对这个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的研究正在增多（如 Schiller 1974; Gans 1975; Gorz 1980; Berube 1995; Martin 1998; Chouliaraki and Fair-clough 1999; Cerwonka 2009; Domenech 2009）。

所有的这些阐释都在表明：对于精神生产的控制是存在的，这种控制依靠将个人利益和统治利益结合起来的众多机制来实现。而且，这种控制覆盖了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不仅通过专业实践和专业意识形态来实现，而且通过使用者的选择来实现，这些选择深受生产、分配和使用特点的影响。这些历史性的结构化关系模式恰符合马克思（Karl Marx）的理论解释。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

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Marx 1969, 39）^①

通过使用“一般地”（generally speaking）、“统治”（ruling）和“统治、支配”（dominance）这样的词语，马克思清晰地排除了那种通过全面控制将个人和阶级斗争的可能性排除在外的单向因果关系。如果存在此种单一方向的决定方式从而能够全面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那么，不仅斗争的思想是无效的，而且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也无法实现。如果资产阶级无意于控制精神生产的方式和内容，那么也就不会有对于思想和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制；土耳其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也不会监狱中等待判罚长达四年之久；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后现代的公民专政”时也不会沉默和冷漠；媒体也不会对世界各地的压迫行动和社会不公采取默许的态度；大众也不会这样安静和顺从；媒体人、知识分子和学者也不会大谈“参与式民主”，却在决定自己薪水方面毫无影响力；他们也不会与社会统治力量结成同盟。同样，也不会有广告和公关这样的行业出现。广告商、诸如中央情报局般的机构或者类似于洛克菲勒、福特这样的基金会也不会为操控思想而花费上亿美元的资金。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页。——译者注

通过上面的理论推理和论断可知，控制与支配在精神产品的生产、传播和使用的本质中得以呈现。在那些期刊文章中，控制与支配的形成与持续，不仅强调包括特定理论导向在内的议题，充分支持功能结构主义，而且着重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的真正结构进行排除、边缘化和扭曲。本文指出的是，通过控制生产和分配过程来控制传播，它所蕴含的不是完全控制人民的思想，而是体现出存在着控制与斗争。社会中所有的思想不是也不可能全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更进一步来说，每个人在不同的层面都有着支配性的、冲突性的或者敌对性的思想。也不是任何一点支配性的或者敌对性的思想都是正确或者错误的。在此，要点是，控制与斗争的思想之间具有联系这一本质。它要探讨的是（1）那些期刊文章研究的支配性理论和主题的导向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具有功能性的；（2）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议题在传播领域大都被排除了；（3）大部分的替代理论都不指向对资本主义的替代，相反，它们彼此反对而又受控于、服务于资本主义，并且特别反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而且（4）马克思的思想以一种错误的或伪造的形式出现，或者被贬低，声称马克思对于传播没有或几乎没有贡献。^①

本文有三个基本目标。第一是检验这样一个假设，即在《媒介与传播研究》中的学术文章，哪怕是大量的定量研究中，都有特定的、支配性的理论和主题导向。这种导向的存在恰恰意味着有一种支配性的主体间性，它为特定的物质和非物质的利益服务。即使每个人都说地球是平的，地球也不可能是平的，而这种论断只能为功能合理性发挥辩解作用。

第二个目标是阐明《媒介和传播研究》中，马克思和马克思主

^①福克斯（Fuchs 2010a）对这种站不住脚的论断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答案，他分析了马克思对于传播的论述并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介生产、流通和消费/接受的聚焦将其系统地呈现了出来。

义研究路径的议题大都被排除了，即使有文章提到了马克思，他也会遭遇各种原因的批评或负面评价，被全面地或部分地无效化处理了。排除和边缘化马克思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理论路径是错误的、没有价值的或者没有贡献的；相反，这只能意味着在错误论断的帮助下，马克思的路径因此被成功地忽略和排除了。这种排除和边缘化也表明和证明马克思对于统治思想总体特征分析的正确性。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马克思是错误的，而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议题不符合另一种关于物质和非物质的利益、相互关系和思想观念的结构。它们会威胁支配性的活动。这不禁令人想起《纽约时报》的信条：“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

第三个目标是展示出那些对排除马克思起到辩解作用的虚假的论断：“对于传播，马克思什么都没说。”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检验（1）研究课题的统计基础，（2）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被分析文章中的呈现，这些文章刊登在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引用的传播学期刊中。

本文的第二部分呈现并探讨马克思的传播思想。以此来表明，与普遍的论断相反，马克思对于传播有相当多的论述。

笔者在题目中使用“失踪的马克思”是为了表明：（1）马克思在“声名卓著”和广泛发行的期刊中被忽略了；而且（2）传播学领域怀念（missing）（需要）马克思。这是因为（1）马克思研究路径的价值；（2）特定产业导向的主流研究路径忽略了并扭曲了重要的社会和学术问题；（3）人们思维理解能力有限或者因为懒惰而不愿花费时间阅读能够驱动人们思考的东西，从而使“超市读物”蔚然成风；另外（4）舆论领袖在传播学院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不幸的是，“学术风尚来去匆匆，学院在这种随波逐流中形成同谋，新的领袖出现又隐没”（Tomaselli and Shepperson 2010, 52），但他们的遗产与劣质作品却留了下来。由“肢体语言”、“神经语言程序”、“对去

语境化和去历史化的后结构主义、后学科的毫无怀疑的采用”等形成的神秘化正在日益蚕食传播学领域。^①

二、本次研究的理论基础

像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W. Smythe）、阿里埃尔·多夫曼（Ariel Dorfman）、乔治·默多克（George Murdock）、彼特·戈尔丁（Peter Golding）、尼古拉斯·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和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等这些在20世纪60年代及后来几十年间正派而受人尊重的学者，以及近些年来如丹·席勒（Dan Schiller）、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麦克切斯尼（McChesney）、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斯图亚特·艾温（Stuart Ewen）、李·亚茨（Lee Artz）、尼克·戴尔-威瑟福特（Dyer-Witheford）、理查德·麦克斯韦（Richard Maxwell）等这样的学者，都表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死去，而且与传播紧密相关。

马克思的论著和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生产和散播也是为更好的世界而奋斗的一部分。根据马克思对传播的兴趣，费彻尔（Fetscher 1969）和帕多瓦尔（Padover 1974）出版了一本马克思论述出版自由和审查制度的文集。国际大众媒介研究中心的两本关于传播和阶级

^①至1975年，我已经在普度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学习了传播学、政治学和研究方法的课程（自1971年起）。但我从未在传播学课程和书本中听过马克思的名字。搜索后我发现了达拉斯·斯迈思的名字，我写信给他告诉他我所在的学校的传播学课程中马克思是不存在的，并请求他帮我找到马克思在传播方面的论著。他给我打电话并告诉我赫伯特·席勒的名字。于我而言，这是“马克思失踪”的终结，因为这二位推荐给我的正是我一直寻找的。受普遍支配性的敏感和利益影响，我们把马克思、切·格瓦拉、斯迈思、席勒以及其他所有致力于人类的解放和尊严斗争的人的“心灵与智慧”都忘却了。

斗争的著作，以及一本马克思论述传播方法的著作都是这方面的杰出成果。这些书仅仅存在于像我这种人的私人图书馆中，而不是在书店或者图书馆里。这个现象并非巧合。

本研究依据的理论框架完全来自于马克思，所以它并不是什么古典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自治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或者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本文采用一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试图阐明，在顶尖的传播学刊物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支配性传统和对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导向研究的故意边缘化。本文通过呈现马克思就传播的各个方面和/或者各个类型的论述来探讨马克思对于传播的研究路径。这种呈现将表明马克思和他的研究路径在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性，并且证明很多当代论断在意识形态和宣传本质上的无效、荒谬和可笑。这些论断包括意识形态终结假说、意识形态无意义性，或者马克思的分析是建立在经济还原论，物质生产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划一关系，以及上层建筑或经济基础的优越性之上的，等等。

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看到的，马克思透彻地指出，人类创造他们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这种创造存在于人类组织起来的历史社会之中。通过反映人类对于物质条件的思考以及思想、感受、价值观和信仰，人类创造自己的生活条件。通过对这些条件的实践活动，人类维持或者改变他们的物质和（或）非物质的条件。这一理论推理可以带出很多结论。这其中与本次研究有关的结论有：

(1) 关于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很多论断都是错误的阐释，因为如果我们的思想都仅仅是对于我们物质生活的反映的话，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建立、发展和改变生活，创造历史并参与到解放事业的斗争中。马克思探讨的是生产方式、交往关系的支配性模式，并且提醒我们旧有物质关系特别是非物质关系残余的持续存在。一个很好的例证是，当今统治世界的资本主义也会支持那些依靠宗教和非理

性信仰来实现权力的神学政党组织的政府。马克思反驳道：“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 [……] 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Marx 1969, 39）。^① “如果 [……] 我们将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区分开来，并且将它们归因于独立的存在，如果我们把自己禁锢在只是声称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这些或者那些思想是支配性的，而不去关注生产条件和思想的生产者，如果我们因此而忽略了个人和作为这些思想来源的世界的条件的话”（Marx 1964, 79）[我们会陷入困惑]。

（2）经济决定论、简单还原论和技术决定论的思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不常见。举例来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假设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的上层存在着一种简单机械的联系”（Grossberg 1997, 22），这样的论述是荒谬的，也是一种经典的冷战式意识形态宣传。这种宣传的目的是对不清醒的读者、学生和学者进行思想控制。这种论述有意或无意地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结构。马克思曾评论他的论著仅仅是试图描述从封建主义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人们不应该将“他的有关西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转变为一种由各国命运所注定的、普适的发展模式的历史哲学理论，却不管他们所处的具体适合自己发展的历史环境。[这种观点] 对于我来说，既太荣幸，也太侮辱”（Padover 1979, 321）。对于同样的问题，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在 1890 年给布洛赫（Bloch）的信中给出了清晰的解释：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52 页。——译者注

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①

(3) 对像贝尔 (Daniel Bell)、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等新兴的明星学者而言，技术决定论是他们研究路径中的固有要素，这些学者宣称互联网将带来“信息和知识社会”和“民主化”。与那些要在互联网和所谓的信息与知识社会之间建立因果联系的当下流行的技术决定论观点不同，只有互联网提供给我们一种对于全体利益有助益的“信息和知识”，并且超越将数百万人捕捉和囚禁在监视器前以实现对他们的利益、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只有超越资本主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0页。——译者注

义企业和机构销售的物质和精神终端产品，只有人们使用互联网来做出明智的选择来满足日常的理性需求，这个社会才能成为知识社会。民主化不仅仅需要公共讨论的参与，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需对政治经济决策过程产生影响。简而言之，正如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丹·席勒（Dan Schiller）、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莫斯可（Vincent Mosco）、戈尔丁（Peter Golding）、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和戴尔-威瑟福特（Dyer-Witheford）等学者所生动描述的，互联网代表着一个新的领域，代表着正在持续着的统治和斗争的一种延伸。在任何情况下，所谓的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或者服务社会都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互联网实现“民主化”的声称承认了资本主义社会还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而是要等待互联网将资本主义从这样的重负中拯救出来。

（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其他著作的阐释中，马克思从未忽略也从未贬低意识形态，也并未给予意识形态以决定性的或者依附性的地位。

（5）那些认为我们已经抵达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宏大叙事/理论之终结”的论断都是意识形态的，而且这些论断是对诸多政策起着合法化作用的工具。这些政策包括“反恐战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助于逃避和忽略在车间和工业政策中持续不断的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主要表达两层意思：观念/思想的结构和对于观念的研究（如同社会学是对于“社会”的研究一样）。“无意识形态”或者“意识形态终结”则仅仅意味着“没有观念”、“没有思想”、“思考的终结”或者“观念的终结”。但是，如果没有观念/思考/思想和观念的结构，人类和有组织的人类生活是不会存在的。“意识形态终结”（或者历史的终结，那些间断性的论断，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现代主义的延续）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建立了功能性的忽视，形成一种知识。通过在宏大理论、苏维埃系统

崩溃论、现代主义纪元或者其他的理论之间建立联系而实现的合法化不过是伪造的虚构故事。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使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方法这一概念在这里仅指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过程。对于经验主义的数据和统计方法的使用并不会让这次研究成为一个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研究。一个主流学者会将研究设计建立在某个特定的理论推理上，收集并分析经验数据，再提出建议，例如，建立一个污水处理厂来清洁被污染的河流是有必要的。而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则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作为基础来设计研究，使用相同的经验性过程来收集数据甚至以统计学的方式来分析数据，并且提出改变生产关系和过程是必要的建议，只有这样河流才不会被污染，而且河流的任意一处都会变得清洁。我们可以准备一份调查问卷来分析工人们态度、意见和评价，以此对公司的政策有所助益，或支持哪些正确的做法。马克思自己也做过批判性、经验性的研究，在 1880 年他做过一次问卷调查。这份问卷发放给 25000 位法国工人来确定他们的工作条件，并提出工人们关心的工作条件的问题，这些议题都呈现在问卷中（Bodemann 1979；Babbie 2004，243；Dei and Johal 2005）。

（一）本次研究的范围

本研究的范围覆盖了刊登在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引用的传播学期刊中，关于马克思的文章以及马克思关于传播的思想。

研究传播学研究导向的本质需要分析已经出版的期刊文章、书籍、硕士和博士论文以及机构、产业研究报告。这项任务会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智力劳动。这一严峻的事实要求我们压缩研究所

需的期刊文章。

偶尔刊登过至少一篇有关传播议题的文章的刊物，大约超过1000种。但是，目前的研究将总体限制在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引用的期刊。这些期刊被认为是“核心期刊”、“学科的神经”、“学术关注的实质性焦点和研究方法的晴雨表”，它们对于传播学研究领域来说是最重要的（Potter and Riddle 2007），也是世界各个大学对于学术研究的衡量依据。有一些刊物采取的是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取向，但我们在支配性的生产和分配渠道的控制中心里，几乎无法找到这些刊物。现存的刊物要么采取功能性—批判性的或者准批判性的导向，要么代表着被控制的路径选择。这些选择被用来对普遍的支配性实践进行合法化，或者对以马克思研究路径为基础的真正可选择的资源进行去合法化。显然，我们找到它们的概率很低，正如赫伯特·席勒曾经指出的（Schiller and Pool 1981）“在十辆卡车的垃圾中寻找珍珠”。然而，这恰恰能够支持马克思的观点，而并不能证明诸如表达自由、机会均等的存在。

（二）关键数据和信息来源

本研究的第一部分旨在探究对马克思之使用的本质。这需要分析已经出版的期刊文章、书籍、硕士和博士论文以及机构、产业研究报告。这项任务会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智力劳动。这也是为什么本次研究选取文章时要考虑到，期刊文章为正在讨论的问题给我们提供最新知识这一事实。

在2011年，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Complete Database Coverage List（EBSCO出版）^①、Proquest^②和SSCI中一共有多于800

^①<http://www.ebscohost.com/academic/communication-mass-media-complete>; <http://www.ebscohost.com/titleLists/ufh-coverage.htm>.

^②<http://www.proquest.com/en-US/catalogs/databases/detail/commabs-set-c.shtml>.

种期刊。但是，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①中，仅有 85 种期刊被列入传播学的范畴。6 种非英文的和另外两种刊物被排除在本次研究之外（Circulo de Linguistica Aplicada A La Comunicacion, Comunicacion Y Sociedad, Comunicar, Estudios Sobre El Mensaje, Javnost-The Public, Tijdschrift Voor Communicatiewetenschap, Journal of the SMPTE, and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因此，共有 77 种刊物被选进了本研究的范围。

通过质疑那些认为马克思对于传播问题毫无作为，或者言之甚少，或者认为马克思的著作对于探讨传播问题毫无价值的观点，本次研究的第二部分聚焦在分析马克思在传播学领域的关联性。为了显示马克思提供了有意义的阐释，他的所有相关论述都被用来发现并评估马克思关于传播问题的论断。

（三）总体、样本、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本研究的总体包括从 2007 年 2 月到 2011 年 6 月期间，发表在这 77 种刊物上的文章。（表 1）

在数据收集中，采取了多种方法：

（1）为了找到这些文章的正文是否提了马克思的名字和马克思主义，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用于总体（10104 篇文章）上。

（2）为了分析“马克思”使用的本质，那些在全文当中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文章被过滤出来。（在总体 10104 篇文章共有 210 篇这样的文章）

（3）为了确定被研究期刊的总体概貌，本次研究将每一年的第一个议题中的第一篇文章选中。因此，在 77 种刊物中共有 385 篇文章被编码和分析。

^①<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st/jlresults.cgi?PC=J>

(4) 为了分析研究的议题，每个议题的第一篇文章被选中，共 1386 篇文章。

只有学术文章本身被用于这次研究。社论、编辑的报告/评论、书评、被冠以“研究简述”或者类似命名的文章或类似的文章被排除出本次研究。

表 1 本研究包括的期刊

<i>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i>	<i>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Disorders</i>
<i>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i>	<i>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i>
<i>Communication Monographs</i>	<i>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i>
<i>Communications Research</i>	<i>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i>
<i>Communication Theory</i>	<i>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i>
<i>Continuum</i>	<i>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i>
<i>Crime Media Culture</i>	<i>Journal of PR Research</i>
<i>Critical arts</i>	<i>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i>
<i>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s</i>	<i>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i>
<i>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i>	<i>Journalism Studies</i>
<i>Cultural Studies</i>	<i>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i>
<i>Discourse Studies</i>	<i>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i>
<i>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i>	<i>Language and Speech</i>
<i>Discourse and Society</i>	<i>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i>
<i>Ecquid Novi: African Journalism Studies</i>	<i>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i>
<i>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i>	<i>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i>
<i>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i>	<i>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i>
<i>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i>	<i>Media Psychology</i>
<i>Health Communication</i>	<i>Multilingua</i>
<i>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i>	<i>Narrative Inquiry</i>
<i>IEEE Transactions on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i>	<i>New Media and Society</i>
<i>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i>	<i>Political Communication</i>
<i>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i>	<i>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i>
<i>Interaction Studies</i>	<i>Public Culture</i>
<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i>	<i>PR Review</i>
<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i>	<i>PO Quarterly</i>
<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i>	<i>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i>
<i>Disorders</i>	<i>Personal Relationships</i>
<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i>	<i>Research on Language & Social Interaction</i>

续表

<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Communication</i>	<i>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i>
<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i>	<i>Science Communication</i>
<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i>	<i>Screen</i>
<i>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i>	<i>Technical Communication</i>
<i>Journal of Advertising</i>	<i>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i>
<i>Journal of African Media Studies</i>	<i>Text and Talk</i>
<i>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i>	<i>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i>
<i>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i>	<i>Television and New Media</i>
<i>Journal of Business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i>	<i>Visual Communication</i>
<i>Journal of Communication</i>	<i>Written Communication</i>

指标变量是临时分配的，新的指标会在数据收集和编码的过程中继续增加。

基本导向：基本导向包括出版商、传播的基本类型（是否为技术型媒介）、研究目标、基本的方法论结构和研究的等级。

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使用：（1）包含 10104 篇文章的所有期刊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使用的分布状况和（2）这些文章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著作使用的本质。

理论导向：包括对于文章理论导向的分布和本质的定位和分析。

研究的议题：分析聚焦在被探讨的议题上。

本研究综合使用了定量研究和定性的内容分析。定量研究部分呈现和探讨数据分布的特点。数据的分布特点是由频率分析和方差分析确定的，其目的是检验马克思的论断对于下面的表述是否有效，即在理论、议题和内容导向的本质中存在对于思想、信念和情感的控制。定性研究部分则用来合理评估定量材料和从马克思发表的材料中搜集的定性材料。

四、发现与评估

（一）基本导向

1. 出版商

这 77 种刊物共有 25 个出版商。最主要的是劳特利奇集团 (Routledge) (泰勒和弗朗西斯) (29.9%) 和赛捷集团 (Sage) (28.6%)。其余部分远逊于前两者,从 5.2% 到 1.3%。这一发现反映劳特利奇和赛捷支配着国际出版行业的事实。劳特利奇出版超过 2878 种刊物 (<http://www.tandfonline.com>), 控制着全世界的期刊 (以及书籍) 出版市场。赛捷是世界第五大期刊出版商, 其出版物超过 645 种期刊, 内容涵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和医药等领域。赛捷为 225 个学术协会和机构出版了超过 280 种期刊 (<http://www.sagepub.com/journals.nav>)。在传播学领域中, 科学生产与分布的意识形态管控方面, 出版商所扮演的角色达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调查。有一种观点认为, 世界范围内的图书出版, 如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报刊四种理论》和近年来的“批判性”和“另类”的书籍, 主要不是受意识形态驱动才刊行的。基本观点认为, 出版商并不关心意识形态的内容。他们最主要的动机是物质利益, 因此, 他们出售所有能够带来利益出版物, 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 历史经验表明, 当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面临生死存亡之际,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利益 (包括情感、信仰以及对“敌”战争) 就成为主导关切。为了保护资本家在本国、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统治地位的持续发展, 他们投资 (或捐助) 了大笔资金。

2. 传播的形式 (是否为技术型媒介)

在 1386 项研究中, 超过半数 (59.4%) 都与技术型中介传播有关, 而 17% 的研究聚焦于非技术型的传播 (主要是自我传播和人际

传播)。23.6%的研究并未涉及传播的类型,但涉及到了概念、方法、理论、议题和过程。在聚焦于技术型传播的范围当中,传统的大众传播依然占据着半数(49.9%)的文章(表2),关于计算机传播媒介的文章远远落后于前者(13.6%)。

表2 技术型中介传播的分布

传播媒介	数量	百分比
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播	184	22.4
报纸/新闻	62	7.5
广播	10	1.2
电视	82	10.0
电影	53	6.4
期刊	4	0.5
书籍、小说	4	0.5
音乐	6	0.7
广告和营销传播	54	6.6
公共关系	21	2.6
通过媒体的政治传播	7	0.9
计算机媒介传播	112	13.6
移动传播	22	2.7
电信通讯	11	1.3
人一机传播	7	0.9
其他(技术型媒介):例如自我、个人传播,人际、群体、组织、技术、科技、专业传播	184	22.4
总计	823	100.0

3. 研究目标

进入分析范围的文章有各种各样的目标。但是,超过半数的文章并未提出它们的目标。而且,15.6%的文章对目标的阐述并非真正的目标,而是对于方法的阐释或再阐释。因此,本研究显示,只

有 28.6% 的文章的目标是有效的。大多数的目标与效果和个人/接受有关。极少数的“另类”研究将质疑工业结构作为目标，而其中的大多数的目标聚焦于各种身份认同议题（除了阶级认同），并强调阶级分析的无效性和马克思研究路径的欧洲中心主义。

4. 方法论结构

研究发现显示，65.2% 的研究采取了主流的研究导向（23.5% 采取的是行政研究，15.5% 主要采取学术型研究，但服务于工业或制度的利益）。也有质疑支配性结构和关系的研究（例如媒介再现、身份认同、认同政治），以及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另外一类（后现代、后实证、后建构、后殖民、后结构、自由多元主义等类似风格）在所有研究中占到了四分之一偏多的比重（27.5%）。使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研究（不包括后马克思主义）仅仅占到了 7.3%。

各种各样的定性研究设计占据着最大的比重（61.0%），随后是实证—经验主义的定量研究设计（39.0%）。

大约四分之三（73.5%）的定量研究是准实验性的单一调查研究。准实验性的实验室/临床研究设计占到了 25.9%。真正的实验性设计仅仅占到了 0.6%。在大众传播研究中，没有真正的实验性设计（实验室或临床）。定性的大众传播研究大多数是参数化的或者非参数化的调查设计。一个新趋势是发展测量装置并检验这些装置。但是，这个趋向还处在一种边缘化的水平，因为大多数研究采用的依然是李克特式的测量方法。

大多数的定量研究还处在探究、描述、评估的层次上（39.0%），排在其后的是因果/推理式的研究设计（32.2%）和双变量相关性的研究设计（23.2%）。

几乎所有的描述性研究都打破了一个基本的科学规律：这一级别的研究设计需要在这一研究主题当中，在现有研究水平的情况下，

没有或缺知识积累，或者需要对现有的知识提出质疑。总的来讲，双变量研究有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问题：它们仅仅比较了变量，阐述了变量间的关系，却没有一个需要相互关系假设的相关性设计。推理/因果研究使用多变量分析或者因素分析，但其中的大部分并没有需要多变量分析或者因素分析的假设。

事实上，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于指向营销目的的受众/消费者分析。除此之外，上文提到的的确是严重的方法论层面的问题。

（二）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使用

正如在引言部分阐述的，在所分析的文章中，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使用被推测处于边缘化水平，而对它们的使用在本质上是负面的。下面的研究发现支持这一假设。

1. 对“马克思”的名字的使用

在这些期刊中，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占据着非常边缘化的位置。在2007年到2011年中段出版的10104篇文章中，只有210（2.1%）篇包含了马克思的名字，有450（4.5%）篇在正文中至少一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或“马克思主义”这个词。

在正文中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有39种期刊和210篇文章。这210篇文章中的大部分只使用了一次马克思的名字（57.6%），使用了两次的有14.8%，使用了3到5次的有14.8%。在10104篇文章中，虽然有2.1%提到了马克思，但其中的大部分对马克思名字的使用也只是作为其叙述的一部分。

在210篇文章中，*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出版了其中四分之一以上的文章（26.7%），之后分别是 *Cultural Studies*（11.0%），*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6.7%），*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3.8%），*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3.3%），*Communication Theory*（3.3%），*Continuum*（3.3%），以及 *Public Culture*（2.9%）。

只有 15 篇文章完全或大部分是在探讨马克思，在其中，有 8 篇来自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有 2 篇来自 *Cultural Studies*。

下面的图清楚地显示出 210 篇文章对于马克思名字使用的高度偏斜分布（10104 篇中的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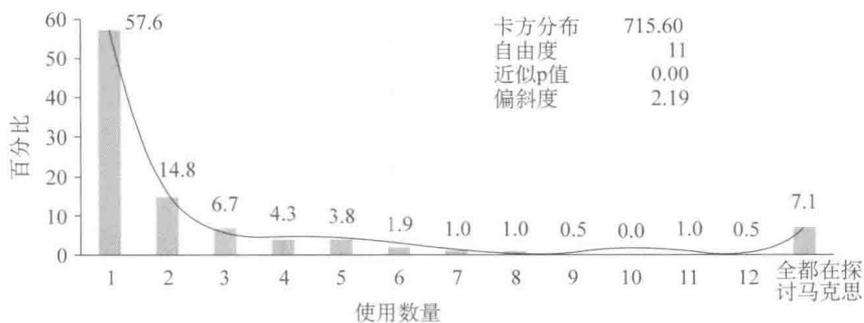


图 1 马克思的名字在正文中被使用的次数

上文的发现以及上图显示的高度偏斜分布指明，这些文章很少使用甚至只是提到马克思。然而，意想不到的是，马克思的名字在那些以刊登“批判性文章”为特色的期刊中竟只处于边缘位置。表 3 显示，在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的 247 篇文章中，马克思在其中的 56 篇文章中至少出现一次（22.7%），大多数（56 篇中的 47 篇）仅仅是提到马克思的名字 1 到 3 次。这一比率在 *Cultural Studies* 中减少到 13.5%，在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中为 10.0%，在 *Intersia Cultural Studies* 中为 9.7%，在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中为 4.6%，在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中为 3.3%。

使用量

表 3 文章中在正文使用马克思名字的分布情况

Journals	1	2	3.5	6-12	a	b	c	d	e	f	g	h	i	Row total	Row %	N of articles analyzed	% use Marx
Asian J of Communication	2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1.4	104	2.9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5	104	1.0
Communication Theory	2	3	1	1	0	0	0	0	0	0	0	0	0	7	3.3	96	7.3
Continuum	3	3	1	0	0	0	0	0	0	0	0	0	0	7	3.3	247	2.8
Cnme Media Culture	2	0	2	1	0	0	0	0	0	0	0	0	0	5	2.4	65	7.7
Critical arts	1	2	0	1	0	0	0	0	0	0	1	0	0	5	2.4	81	6.2
Critical Studies Media Communications	3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5	2.4	110	4.6
Cultural Studies	9	3	4	5	0	0	0	0	0	0	0	1	1	23	11.0	171	13.5
Discourse studies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5	150	0.7
Discourse and Society	3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4	1.9	124	3.2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5	80	13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2	1.0	90	2.2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2.4	114	4.4
Transactions on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0	116	1.7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2.9	195	3.1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9	1	2	1	1	0	0	0	0	0	0	0	0	14	6.7	144	9.7
Intem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0	88	2.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5	110	0.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5	71	1.4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0	163	1.2
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5	184	0.5

续表

Journals	1	2	3.5	6-12	a	b	c	d	e	f	g	h	i	Row total	Row %	N of articles analyzed	% use Marx
J of Mass Media ethics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0	82	2.4
Journalism Studies	4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6	2.9	219	2.7
Language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2	1.0	88	2.3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1.9	76	5.3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5	107	0.9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	1	1	0	0	0	1	0	0	0	0	0	0	7	3.3	210	3.3
New Media and Society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1.4	231	1.3
Public culture	3	2	1	0	0	0	0	0	0	0	0	0	0	6	2.9	123	4.9
PR review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0	150	1.3
Quarterly J of Speech	1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3	1.4	85	3.5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5	1	2	0	0	0	0	0	0	0	0	0	0	8	3.8	80	10.0
Science Communication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5	92	1.1
Screen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0	74	2.7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0	258	0.8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9	9	9	1	1	2	0	1	3	1	0	0	0	56	26.7	247	22.7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2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3	1.4	100	3.7
Visual Communication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0	82	2.4
Written Communication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2	1.0	68	2.9
Total	121	31	31	12	3	2	2	1	3	1	1	1	1	210	100.0	4979	
%	57.6	14.8	14.8	5.7	1.4	1.0	1.0	0.5	1.4	0.5	0.5	0.5	0.5	100.0			

a. 使用马克思的观点进行讨论

b. 整篇文章专注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或者是对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 c. 运用马克思来对阶级、剥削、媒体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 d. 整篇文章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话题分析
- e. 整篇文章专注于探讨某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 f. 整篇文章是关于自主性的马克思主义；其不足或者替代经典马克思主义
- g. 整篇文章以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贯穿全文来探讨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
- h. 整篇文章用马克思的思想来探讨作者（Grossberg）关于并发分析的理论改进
- i. 整篇文章是一个去殖民主义的无价值的探讨，在没有对马克思进行认真研读的情况下，对马克思进行指责

2. 对马克思著作的使用

在至少提到一次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 450 篇文章中，有 85.1% 在它们的参考文献中并未使用任何马克思的著作，而 4.0% 使用了《资本论》，1.5% 使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1% 使用了《共产党宣言》。只有 7 篇文章使用了两种，3 篇文章使用了 3 种，2 篇文章使用了多于 3 种马克思著作的资料。

这样的发现表明，对于马克思的研读兴趣是极低的。同时也显示出那些讨论马克思的作者并没有采用马克思的原著，而是要么使用一些支持其立场的二手材料，要么只是他们对马克思言论的一些个人观点，这意味着传播学者对于马克思的著作的知识是低质量的和/或错误的。

在搜寻材料的过程中，我还发现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尤其是从 1992 年开始），这些期刊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使用出现了剧烈下降。

3. 使用马克思名字的本质

使用马克思名字的本质，从非常强烈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到运

用马克思主义对一个话题进行分析，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在使用马克思名字的 210 篇文章中，有超过半数（50.9%）对马克思名字的使用仅仅是作为说明的一部分而没有评价性的或规范性的阐述。大部分文章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尤其是从 1992 年开始），这些期刊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使用出现了剧烈下降。其余的文章对马克思则表现出多重的导向（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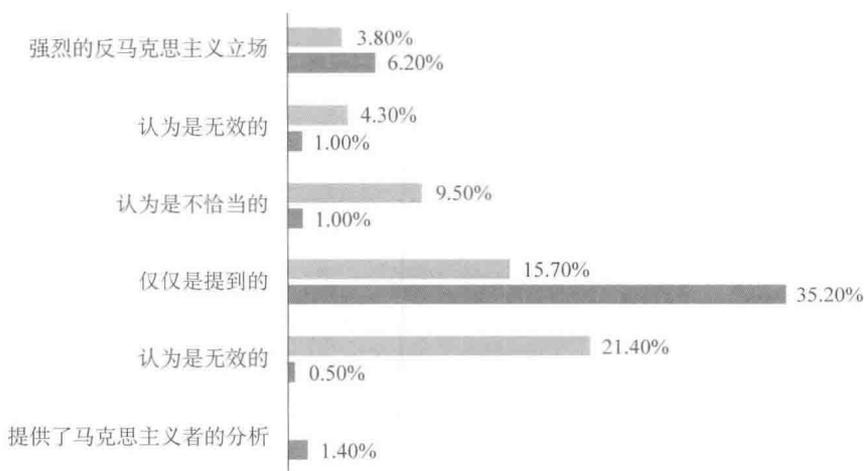


图 2 被分析的文章中对马克思的评估的分布

消极立场（25.80%）：

- 3.80% 的文章提供了反马克思的阐述或者负面的评价（例如极权主义的、民主的敌人、粗糙的分析、欧洲中心主义的、乌托邦的、伪科学的）。

- 10.5% 提供了负面的评价并且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是无效的（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阶级斗争/冲突、统治阶级和统治思想、公共领域、价值理论、革命变革、劳动的概念、意识形态、商品拜物教、抵抗等诸多观点）。

- 1.00% 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是部分无效的。

- 10.5% 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无力的、不恰当的。

积极的立场/评价 (23.3%)

- 21.40% 使用一个或多个马克思的概念或者理论路径用于解释和分析 (例如, 人类创造历史, 目的不只是理解, 更是改变社会、符号与物质力量之间的互动、创造、人道主义、劳动、神话、意识形态、奴隶、技术、虚假意识、进步、无产阶级、小亚细亚生产模式、形式的政治平等、商品、商品生产、拜物教、乌托邦、劳动、阶级与剥削、资本主义危机、阶级斗争、压迫、自由、作为文化研究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流通与消费、原始积累)。

- 1.40% 提供了几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因特网、一个议题、一种历史解释)。

这些发现是很有趣的, 因为大部分负面的评价和认为其无效的观点并没有采用主流导向作为背景。

(三) 理论导向

在总共 10104 篇文章中, 用于分析传播学期刊的理论导向的分析样本选取了其中的 385 篇。研究发现, 这 385 篇文章采取了 150 种理论路径。这一发现也支持了传播学者抱怨的一个常态: 传播学中有太多理论路径。诚然, 传播学研究中有太多的理论路径, 但是其中的大部分, 包括以社会学为基础的、定性分析的、结构功能主义的, 都是基于社会心理学的。

所有这些研究中, 60.8% 的研究设计根本没有理论推理、原理或者探讨 (表 4)。同样的, 波特尔等人 (Potter, Cooper and Dupagne 1993) 发现, 这些分析文章中 91.9% 没有理论基础。波特尔和里德尔 (Potter and Riddle 2007) 的另一项研究发现这一比例是 57.1%。在莱福 (Riffe and Freitag 1997) 的研究结果中这一比例同样很高: 72.4%。坎哈维和韦弗 (Kamhawi and Weaver 2003) 在他们的研究样本中发现 69.5% 的文章是没有理论的。

表 4 理论结构存在的分布状态

理论性内容	数量	百分比
提出很少的理论/模型，但没有为研究建立理论框架	7	1.8
没有理论，完全没有提出理论推理、原理和探讨	219	56.9
采用已有的理论路径，但没有为研究的问题和假设建立理论框架	8	2.1
一个理论结构被不同层次地使用	151	39.2
总计：	385	100.0

具有不同程度的适合的理论建构的理论框架的研究仅仅占 39.2%。事实上，在研究中使用理论框架，提出理论假设或精确的研究问题、猜想，并在综合研究发现、理论推理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构建研究结论的这种研究只是很有限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结果都显示：研究者在他们的设计中没有使用理论推理，在为控制目标提供信息之外，媒介和传播研究在认识论上缺乏有效支撑，这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趋势。尽管本研究中的大部分文章没有特别的理论框架，但我发现所有文章中 56% 采用的是主流的研究路径。这些研究路径大部分基于社会心理学，其次 9.8% 的文章使用了新自由主义多元论，9.9% 的文章聚焦于不同种类的批判取向，8.6% 的文章使用了后结构主义。4.7% 的文章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导向，3.9% 的文章是建构主义的，2.6% 的文章是后现代的，2.6% 的文章根本没有理论结构（它们强调作为工具、程序或应用的功能性），0.5% 是后殖民主义的，0.3% 是后实证主义的，0.8% 是新马克思主义的，0.5% 是政治经济批判的。

宏观层面的权力关系问题，组织化的权力结构中的物质和非物质利益中的问题，在几乎所有的理论路径和研究设计中都未能呈现。权力和权力关系在以下三个方面被典型地概念化了：（1）个人选择的自由的角度（根据主流的研究路径）；（2）面对根据其个人自由意志来解构和再建构所有事物的被赋权的个体受众时，“作者之死”

(生产和传播工业结构的无力)的观点;或者(3)与阶级认同、生产模式和生产关系这些焦点处于对立面的普遍政治认同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似乎是一个被诅咒的词:我没有见到任何文章使用这个词。然而,那些将“后”作为前缀的研究路径显示出它们对交替使用政治经济和经济决定论的兴趣。他们主张政治经济、阶级和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并提出所有这些内容属于过去时。政治经济或者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只在很少的一些论文中被使用。

(四) 研究主题

在总共 10104 篇文章中,有 1386 篇文章成为对于传播主题的分析样本。

在分析中,这些主题被分为下列三个种类:与技术型中介传播相关的主题(823; 59.4%),非技术型中介传播的传播(236; 17.0%),所有前两组之外的其他主题(327; 23.6%)。

与传播媒介相关的研究有很多种类,但其中 49.8% 文章聚焦于与大众传播相关的主题(表 5)。

表 5 技术型中介传播中主题的分布状态

主 题	数量	百分比
使用权	10	1.2
责任	2	0.2
准确性	1	0.1
广告、营销	24	2.9
媒体人的态度、感知和行为	8	1.0
受众接受、互文性、阐释、评价、建构	6	0.7
内容:媒介产品分析	31	3.8
对话(技术型媒介);公平对待	1	0.1
文化、传媒多元文化主义、文化间关系、文化冲突	7	0.9
发展/历史:媒介、传播教育	23	2.8
话语(技术型媒介)	17	2.1

续表

主 题	数量	百分比
效果：个人的态度、感知、行为、动机、认同、选择、信念、参与、信仰、感情和个性	66	8.0
一般意义上的效果	135	16.4
有效性	11	1.3
环境	3	0.4
伦理	8	1.0
媒介分析	21	2.6
身份与身份政治	14	1.7
媒介互动（类社会和人机）	16	1.9
互联网、网络、在线游戏、社交媒体使用	29	3.5
语言运用	4	0.5
政策、政治、法律、规制、传播的控制和自由、审查	57	6.9
媒介建构/意义	14	1.7
媒体报道/描写/框架、再现	77	9.4
媒介教育、传播教育	1	0.1
传媒经济、工业、工业关系	20	2.4
方法：模型、测量、数据分析	35	4.3
生产模式/关系（传媒、音乐工业）	2	0.2
产品设计	2	0.2
职业文化、价值、实践、生产	34	4.1
研究/调查	15	1.8
角色/媒介功能	44	5.3
空间，受众阅听空间	5	0.6
监测	3	0.4
信源可信度	1	0.1
媒体的系统/结构（主流）	5	0.6
技术	9	1.1
理论（包括组织传播、媒介、公共关系、广告和文化研究）	47	5.7
媒介使用（使用的性质/特点）	15	1.8
总计：	823	100.0

经典的大众传播效果分析依然统治着其他研究并且已经扩展到了新媒介（特别是计算机媒介传播）。对于效果的关注以及对于媒介效果不断扩展的兴趣已经在很多研究中得以体现，比如，肖等人的研究，他们准确评价了传播学研究中的理论和对效果（以及其他）的兴趣，并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后大众媒介时代，但对于大众媒介的效果研究仍然是我们最强大的研究传统”（Shaw, Ham and Knott 2000, 72）。

在研究主题中，最普遍的类型是有关于处理个人的态度、感知、行为、动机、认同、选择、信念、参与、信仰、感情和个性与媒介的效果研究（24.4%）。聚焦于媒介内容、描写和再现的研究占到了14.9%。只有3.5%的研究聚焦于与互联网相关的主题（网络、在线游戏、社交媒体使用）。

与此相反，研究与工业生产、分配、生产关系以及工作条件和工作场所内的关系相关的批评性议题的兴趣却是微乎其微的。在效果类主题之外，多半自由主义多元论者和那些使用“后……”理论的学者都对媒介描写和再现感兴趣。在823篇文章中，只有2.4%研究工业（传媒经济、工业、工业关系）的一个或更多方面。然而，其中只有3篇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2篇是批判政治经济的，1篇是新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派）。这些发现显示，极少的学者对传播工业的结构或本质的研究主题感兴趣。

非技术型中介传播的研究关系到不同种类的无中介传播。然而，其中超过三分之一（36.9%）处理的是有关于人际传播或非技术型媒介的演讲/口语传播（对话、口语中的词）这样的主题。随后是组织传播占到了15.5%。各种关于自我传播主题的研究占到了10.2%（表6）。而那些与经济、文化和政治组织中人的条件在个体和/或人际层面上呈现相关的议题，却没有研究给予调查。它们大都把兴趣放在（a）个人的认知心理学的和行为/选择的特征，（b）个人开

始、保持私人关系、解决冲突和结束关系的方式，以及（c）在自我剥削的工作中能够增加员工的动机、涉入和参与的方式与手段。

表 6 非技术型中介传播中主题分布状态

主 题	数量	百分比
个人的态度、感知、行为、动机、认同、选择、信念、参与、信仰、感情和个性	37	15.7
冲突解决/调停、传播策略、危机的减小	3	1.3
对话、行动、轮替	3	1.3
文化	2	0.8
做出决定	3	1.3
话语	5	2.1
教育	1	0.4
效果	28	11.9
有效性	8	3.4
面子管理、关系维系、自我表露	7	3.0
身份和身份政治	18	7.6
个人的思考、记忆、框架思考、表达、演讲以及理解能力	7	3.0
交互：能动性、对话、倾听、技巧、自然发生	18	7.6
为儿童进行的对家庭环境的介入	1	0.4
语言	7	3.0
语言学习	2	0.8
语言使用	11	4.7
方法：模式、测量、数据分析	12	5.1
叙述：讲述、个人、生活故事、难民营	10	4.2
政策、政治、法律、规制、传播的控制和自由、审查	1	0.4
产品（列表、说明书）	1	0.4
专业主义、专业实践	4	1.7
种族主义、种族对话	2	0.8
读者的评估	1	0.4
调查/研究	4	1.7
修辞	3	1.3

续表

主 题	数量	百分比
传播、谈话和领导的角色	4	1.7
个人行为 and 演讲的情景的和心理的因素	1	0.4
演讲	1	0.4
监测	1	0.4
技术（协助的、科学、语言装置）	1	0.4
理论	28	11.9
本土科学知识	1	0.4
总计：	236	100.0

其他主题的研究集中在很多方面（表7）。同样地，这里大部分的主题与效果、个人的性格和行为有关。在一个主题中，运用批判性的议题或者展开批判性的分析，都处在一个最低的级别上。

表7 其他主题的分布状态

主 题	数量	百分比
个人的态度、感知、行为、动机、认同、选择、信念、参与、信仰、感情和个性	32	9.8
听觉系统	1	0.3
合作和创造、民主、多样性	1	0.3
皈依：信仰	1	0.3
文化、跨文化能力、跨文化读写能力、艺术	12	3.7
做出决定	1	0.3
学科发展	1	0.3
话语	1	0.3
解决争议、组织	9	2.8
经济、人类资本（在人体上的药物测试）	1	0.3
效果	26	8.0
有效性	5	1.5
环境：保护	1	0.3
伦理	2	0.6

续表

主 题	数量	百分比
健康：日晒和皮肤癌	1	0.3
历史：内战、酒的生产	2	0.6
身份和身份政治	19	5.8
意识形态、人工意识形态	2	0.6
个人对生活环境的适应	1	0.3
个人的知识、记忆、框架思考和表达	7	2.1
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1	0.3
交互：合作、认知过程、社会关系	19	5.8
为儿童进行的对家庭环境的介入	1	0.3
语言学习、损害	9	2.8
语言使用、阅读、学习	5	1.5
语言、类型、语义学、历史、发展、结构、使用	15	4.6
领导力、多元文化	1	0.3
方法：学习、写作、训练	7	2.1
方法：书籍设计、治疗说明	2	0.6
方法：模式、测量	22	6.7
叙述：跨文化叙述、贸易、治疗	3	0.9
民族主义：种族化、性别主义、武器销售	4	1.5
组织管理、权威、合作、知识建构、变革	4	1.5
政策、政治、酷刑、参与、生物政治学、人权、隐私	30	9.1
假装游戏：社会组织的分层形式制定	1	0.3
科学的公众理解	1	0.3
调查/研究	14	4.3
修辞：种族划分、总统的	2	0.6
自然的模仿：动物园	1	0.3
空间和时间：全球空间、区域化	3	0.9
演讲的问题、症状、处理、治疗、损害、咬字吐字	12	3.7
监测、监视	1	0.3

续表

主 题	数量	百分比
技术和技术运用：成像工具、装置、网络应用	6	1.8
理论（恐怖主义、殖民主义、现代性、现实）	34	10.4
暴力：酸暴力	1	0.3
投票	1	0.3
总计：	327	100.0

不仅仅是本研究，几乎所有相关的研究都发现，主题、理论路径和方法是非常多样的。根据波特尔和里德尔（Potter and Riddle 2007, 8）的观点，研究工作中宽泛的效果和方法，彼此之间极少的交集让学者之间的分享变得困难。这些分享包括关键术语的定义、对于整体领域“宏大图景”的理解。波特尔的关切应该是有意义的，如果学者的首要兴趣和关切是理解整个学科的全景的话。

所有的发现清晰地表明，在传播学研究的学术兴趣中，支配性的导向是基于工业和工业结构的需要，这种需要希望对于个人和媒介效果的评估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这一导向的显著含义证实了马克思关于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和思想之间关系的论断是有效的。在这种普遍的学术兴趣和引导并供养着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要素之下，提出以下问题就变得荒谬、不正常、不合常理，这些问题包括：（1）为什么学者们都不去研究属于统治阶级的态度、认知、价值观、感觉、心理健康、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和个人话语，（2）为什么学者们不去分析他们在生产和分配的本质、工作状态、最低薪水政策、悲惨的人和环境状况等方面的心理倾向的效果，以及（3）为什么学者们不在研究的结尾提出建议，让统治阶级和他们的高级别教育水平的管理干部去接受教育，去通过敏感和移情训练，以及去感受被剥夺权力、被利用、被虐待、被滥用的感觉。

过去的60年中理论和研究主题上的支配性力量依旧发挥着统治

性的作用。先前的一些边缘性主题（特别是诠释学、符号学、建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现在则是补充性的、时髦的选择。它们成为受青睐的理论路径不是因为他们有着更好的解释力或者认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有效性，而是因为它们被整合进了全球市场和商业利益当中，也是因为它们对于思想和行动管理是极端有功效的。总之，它们服务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统治利益。

大多数涉及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文章对经典的、经济还原论的、简化论的、机械论的或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简单论述，并且就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历史相对论、欧洲中心主义、原教旨主义、阶级偏见、超稳论、宏大叙事等类似内容做出了陈腐的判断。

五、马克思在理解传播中的位置

一条信息、一个词、交谈、对话、一次交际行为或者收发信息都不是传播。我们不能将工具、手段、表达、再现、语言或非语言的行为或者传播的内容与传播混淆在一起。传播是人类生物地和社会地存在的必要状态之一：如果我们不能传播的话，我们就无法在身体上、心理上、社会上、经济上或者在其他任何方式上生产和再生产我们自身。不能传播意味着没有生命的人、没有生命的社会和世界。没有传播，人几乎什么都不能做。传播、传播方式、语言、符号等同类事物不可能单独存在，我们通过物质和精神生产的方式和方法，通过社会关系，在彼此之间和我们自己的关系中，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

在理解传播的重要性、本质和研究等方面，马克思占据着一个核心的位置，因为他提供给我们理解与传播相关的所有事情的最有意义的方式。在所有的研究方案和自由民主主义的传播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论导向在其中各种各样的影响。

最重要的、持久的传播学文本是以一些研究路径为基础的，这些路径都受到马克思对于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理解的影响。马克思并不是统治利益、结构和关系进行再生产的支配性方式的支持性机制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在传播学研究中，在对马克思进行忽略、排除、责骂和贬低的控制体系中的反常的再生产模式中，马克思却是其中正常的一部分。然而，马克思总是能够在让神话祛魅的实践中，在对不公正的和压迫性的生产关系和模式，包括传播中的知识的、职业的关系和实践的斗争分析实践中，找到他在传播中的位置。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兴趣、理论和方法是有意义的传播学持续探究过程的起点。不管怎样，我们知道，马克思提供了关于传播的解释。

在一个特定组织化时间和组织化空间以及（或者）组织化关系当中的发现，在另一个时间、空间或者关系当中可能有效，也可能失效，因为理论推理和建构的条件是变化的。这种条件的变化并不构成一个理论的修正或者失效的必要或充足的条件。一个理论或者其中的一部分理论只有在学术探究的方法论结构和（或）理论推理不能为新的、不同的和变化的条件提供有效的解释的时候，才会失去它的有效性。马克思的理论不是为任何组织化的结构和关系起到维护、协调、均衡和合法化作用的理论。它是把对形成、维持和变化的研究和解释作为基础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解传播的过程当中应该占据一个核心的位置，因为理解传播需要理解人类，理解组织化的生活，而不是为其发现和伪造合法化的理由。

马克思在传播中的研究路径主要集中在：（1）对于传播（结构本身和传播产品的再生产以及人的状态的再生产的组织和实践）的物质生产（物质模式和关系）本质的研究，（2）对传播（思想、感觉、敏感性、信念、信息、知识、作为知识的无知的生产、散播和使用）的非物质生产（非物质的模式和关系）的研究，和（3）传播的物质与非物质生产之间及内部的相互关系，但并不涉及再造那

些宣传者的无知，他们对马克思无知的质疑包括（1）谁先出现（鸡或者蛋；经济基础或者上层建筑），（2）多元决定论，（3）生产者之死，以及（4）那些根据他们的自由意志来解构和重建意义并且在电视机前面和/或网络空间的虚拟世界中发起斗争的被赋权的个人。

（一）马克思关于传播的研究

1. 传播的概念：对于马克思来说，传播是什么

我们被教育必须知道定义，比如传播的定义。我们无法用一句话来定义传播。传播（哪怕是一个苹果）不能被一个或者几个共同特性来准确定义。而且，传播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是来自于五个选项和一个正确的答案。一个科学的定义需要一种详细的解释，这种解释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传播的特性和指标，一种具体的历史语境可以让我们了解传播是什么，还要给出一种排他性的解释，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不是传播。有很多种传播的定义，但没有一种能解释什么是传播，因为这些定义都聚焦于解码和编码的机制/过程，可观测到的互动，例如发送和接受信息、交换观点、要素、功能、角色、目的和结构等。在传播中，没有人会把发送和接收一条信息或者创造、建构、消费或结构意义当作目的。交际行为、信息、写或者说什么、读一本书或者看电视，这些都不构成传播。口头表达或者任何种类的精神的或者相互关系的表达也都不是“传播”。

马克思并没有定义传播，但是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发现了关于传播的非常重要的解释。下列各项关于马克思对传播的理解的陈述使得以下论断失去意义，这些论断有（1）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涉及过传播，（2）一些评价认为马克思仅仅探讨过传播手段以及（3）认为马克思将传播简化为“传输”（transportation）。

我选取了马克思著述中的一些语句并作简要的解释：

● “廉价而便利的传播” (Marx 1846)^①: 传播性质两种指标的存在。

● “《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 随着印刷机的出现, 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 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 (Marx 1857a)^②: 传播和传播生产的历史的积累性和决定性本质。

● “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 (Marx 1857a)^③: 这些是正文的标题。这些标题表明马克思对于传播的条件、传播与政治结构、认知之间的关系是感兴趣的。

● “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 (Marx 1857a)^④: 这个自我探究式的语句表明了传播条件在影响可生产性的权力中的重要性。

● “有一些独立的产业部门, 那里的生产过程的产品不是新的物质的产品, 不是商品。在这些产业部门中, 经济上重要的, 只有交通工业, 它或者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 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快递” (Marx 1885, Ch. 1, 17)^⑤: 传播工业的重要性。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第87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第49页。——译者注

③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第47页。——译者注

④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第47页。——译者注

⑤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 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二卷, 上海三联书店, 2011年, 第64页。——译者注

• “袭扰英国人通往卡尔纳耳和米拉特的交通线” (Marx 1857)^①：传播的控制。

• “英国人在阿格拉与德里之间的交通线” (Marx 1857)^②：殖民地的传播网络。

• “《纪事晨报》在上星期五的第四号上刊登了一则电讯” (Marx 1853)^③：通过电报传送电讯的传播。

• “商业的不发达、各城市之间联系的不密切” (Marx 1846)^④：传播规模及其结果。

• “同附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这种可能之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 (Marx 1846)^⑤：承认多种传播形式的存在，例如商业传播；意味着传播的实现依靠传播手段；强调传播手段的决定性作用。

• “ [……] 一切形式的坦率而公开的言论——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是没有经过书报检查而刊行的，还是经过书报检查而刊行的。 [……] 地方报刊” (Marx 1843g)^⑥：传播的不同形式。

• “传播的确定手段” (Marx 1846)：传播的确定手段的作用。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0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2页。——译者注

③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2页。——译者注

④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9页。——译者注

⑤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9页。——译者注

⑥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5页。——译者注

• “传播手段的影响” (Marx 1857a): 传播的影响和后果。

• “路易·拿破仑也向参议院和 Corps Législatif (立法团) 发出了类似的文告” (Marx 1854)^①: 传播信息。

• “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愈来愈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 (Marx 1848a)^②: 传播的垄断; 传播的政治经济。

• “世界市场引起了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工具的大规模的发展” (Marx 1848a)^③: 传播的发展以及市场对它的影响。

• “资产阶级既然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 并且使交通工具极其便利, 于是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 (Marx 1848a)^④: 传播手段在发展中的作用。

• “促进这种团结的, 是由大工业所造成的愈益发达的传播工具” (Marx 1848a)^⑤: 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

• “机器的组织系统, 动作从中央控制机器出发, 通过发射机的传播, 施加到这个机器的组织系统” (Marx 1867, Ch. 15, 3)^⑥: 技术、组织化的传播; 机器—机器传播。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第178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第368页。——译者注

③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第467页。——译者注

④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第470页。——译者注

⑤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第475页。——译者注

⑥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 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一卷, 上海三联书店, 2011年, 第416页。——译者注

• “对于制造业时代的生产需要来说，传播和运输的手段如此的、完全的不能胜任”（Marx 1867）^①：传播状态在生产中的影响。

• “传播和运输手段渐渐变得与机械工业的生产模式相适应”（Marx 1867）^②：传播的政治经济；工业关系，技术控制。

“改善的运输和传播手段为占领国外市场提供了武器”（Marx 1867）^③：传播在殖民中的作用；传播的国际政治经济；战争传播。

• “远洋航行以及传播手段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季节性劳动的固有的技术基础”（Marx 1867）^④：传播在工业发展、工业关系、工作力和贸易中的作用。

• “在现有的技术和传播手段的发展阶段，对于有黄金和白银的新领土的发现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Marx 1859）：传播在发展、殖民中的作用。

• “很明显，整个社会生产的进步，一方面，由于它创造了地方市场，并且通过采用交通运输工具而使位置变得便利，所以对形成级差地租的位置，会发生拉平的作用”（Marx 1863—1883）^⑤：传播设施的作用；传播的政治经济。

①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421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421页。——译者注

③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494页。——译者注

④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526页。——译者注

⑤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33页。——译者注

• “大陆上的政治家，总以为伦敦的报刊可以作为英国人民情绪的温度计，因而他们目前就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错误的结论”（Marx 1861）^①：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将焦点集中在政治传播、媒体、政治家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战争中出版社的作用、上层媒体人和统治力量之间紧密的物质关系、政治家和公司结构对于出版社的控制、出版社的所有权、伦敦出版社维护的利益等方面。

上面这些简短的例子也表明，马克思在这些简短的语句中所说的要比下面的这些研究有意义得多，例如（1）成千上万的“效果分析”，这些分析除了提供一些服务于市场和/或政治控制利益的分配性的相关性的信息之外，什么都没有，以及（2）一些接受分析的确探讨接受本质，如，没有使用功能主义术语也没有分析接受者/个人的积极受众理论。

总之，马克思对此说了很多。

2. 传播在社会及社会发展中的位置、功能和作用

马克思认为，传播贯穿于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过程的始终。马克思对思想、报刊、写作以及传播的手段和功能的解释阐明：对于马克思而言，传播是社会生产各个阶段（包括分配、流通和消费）存在的必不可少的要素。除本文其他章节对该观点的阐述以外，下列马克思的解释不仅阐明了传播的关系和作用，同时说明传播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必需性：

一旦麻布与别的商品即上衣交换时，商品价值的分析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4页。——译者注

向我们说明的一切，现在就由麻布自己说出来了。不过它只能用它自己通晓的语言即商品语言来表达它的思想。为了说明劳动在人类劳动的抽象属性上形成它自己的价值，它就说，上衣只要与它相等，从而是价值，就和麻布一样是由同一劳动构成的。为了说明它高尚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它的僵硬的物体，它就说，价值看起来像上衣，因此它自己作为价值物，就同上衣相像，正如两个鸡蛋相像一样。顺便指出，除希伯来语以外，商品语言中也还有其他许多确切程度不同的方言。……例如，要表达商品 B 同商品 A 相等，是商品 A 自己的价值表现（Marx 1867, Ch. 1, 11）。^①……商品的价格或货币形式……因而只是观念的或想象的形式。铁、麻布、小麦等等的价值虽看不见，但存在于这些物的本身；它们的价值通过它们同金相等，同金发生一种可以说只是在它们头脑中作祟的关系而表现出来。因此，商品监护人必须把自己的舌头塞进它们的脑袋里，或者给它们挂上一张纸条，以便向外界表明它们的价格。（Marx 1867, Ch. 3, 1）^②

马克思在很多作品中表达了他对传播作用的观点，这些作品涉及社会中报刊的作用以及传播手段在社会变更过程中的功能。他的报章是政治传播不会屈从于政治运动、国会议程或是选民的态度与偏好的最好例证。他评估了世界上每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并说明了传播在新闻报道、政治和公众倾向方面的作用。

^①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67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113页。——译者注

对于马克思而言，科技并不意味着工具的集合，而是社会发展有一定水平的标志。在此，各种传播手段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部分，在从封建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起到了诸如维持、变革等等重要的作用。传播手段被运用以支持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的意义、范围和潜能。

马克思不认为传播手段仅仅是一种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工具：

房屋可以用于生产和消费；就像所有的交通工具，例如轮船和马车，可以用于旅游和运输；就像道路可以用于生产的适度交换和用于散步。（Marx 1859）

马克思给出了对于传播的解释，给出了传播手段与包括社会生产、分配和消费、社会结构的维护和控制等因素的诸多方面之间关系。他的解释并不仅仅局限于流通领域，也不仅限于某种技术手段。与此同时，期望马克思会把传播定位为生活生产的中心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或是认为传播技术的发展在社会和社会发展中居于首要地位的观点都是非常错误的。^①

传播手段的发展和阶级统治

所有文明的进程，或者换句话说每次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中的劳动本身作为科技、发明、劳动力的分割和整合的结果，改善了传播手段，世界市场和机器等等的产生，与其说是发展了工人，不如说是发展了资本；因此这再次放大了对劳动力的控制，而这力量只增加资本的生产力。（Marx 1857d, 8）

^①参见哈罗德·因尼斯传播技术的在社会存续和发展中的强大作用的观点，杰哈利（Sut Jhally）关于技术决定论的评论，以及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在人类知觉器官和世界向地球村转变过程中，传播技术的影响的观点。

传播设施，生产供给的重要性

必须有一定量的要用在生产上的生产资料处于或大或小的储备状态，以便逐渐进入生产过程，在这样的阐述中，马克思确立了影响传播设施的因果关系：这种生产储备的大小，取决于它在更新时困难的大小，取决于供应市场的相对距离，取决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等等。^①（Marx 1885，Ch. 13，5）

传播手段的发展和商品运输的成本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交通工具和传播工具的发展以及运输积聚（规模扩大），使得单个商品的运输费用减少。^②（Marx 1885，Ch. 6，13）

传播设施和保障生产持续的速度与时间

马克思给出了煤炭供应的例子以说明煤炭供给阐释其间的关系：“一个过程的生产加工中的产品能够以什么样的速度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个过程，取决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Marx 1885，Ch. 6，8）^③

传播工具的进步状态与社会劳动分工的密度和条件

人口较少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比人口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1861年以来，由于棉花需要量大增，东印度某些人口稠密的地区，靠缩小稻米的生产来扩大棉花的生产。结果部分地区发生了饥荒，因为运输手段的先天匮乏，难以承担起稻米产量不足之地从其他地

^①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二卷（第十三章），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73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二卷（第六章），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169页。——译者注

^③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二卷（第六章），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159页。——译者注

方进口粮食的重担。(Marx 1867, Ch. 14, 9)^①

传播手段的发展与季节性劳动

远洋航行和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基本上摧毁了季节性劳动的固有的技术根基。(Marx 1867, Ch. 15, 30)^②

传播与市场控制

机器加工产品的廉价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为海外市场的开拓提供了利器。(Marx 1867, Ch. 15, 22)^③

传播与商品流通时间及生产地点的变更

马克思阐释了传播手段在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增加社会财富、社会关系和诸如旧生产中心的衰落与生产中心兴起的社会变迁等方面的作用。

如果从一方面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会缩短一定量商品的流通时间,那么反过来说,这种进步以及由于交通运输工具发展而提供的可能性,又引起了开拓越来越远的市场,简言之,开拓世界市场的必要性。运输中的并且是运往远地的商品会大大增长,因而,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处在商品资本阶段、处在流通时间内的那部分社会资本,也会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与此同时,不是直接用作生产资料而是投在交通运输工具及为其运转所需而投向固定资产与流动资本上的那部分社会财富,

①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391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526页。——译者注

③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494页。——译者注

也会增加。(Marx 1885, Ch. 14, 2)^①

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良，会绝对缩短商品的流通周期，但源于各自不同商品资本或面向不同的市场移动的同—商品资本的不同部分，它们在流通时间上存在的相对差别，不会因此消失。例如，改良的帆船和轮船，缩短了商品的移动时间，从而也就缩短了商品到达远近港口的时间。相对的差别仍然存在，虽然往往是缩小了。不过，由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这种相对差别会以一种与自然距离不相适应的方式发生变化。例如，一条从生产地点通往内地—个人口聚集的主要中心的铁路，可以使内地的一个不通铁路的较近地点，比这个自然距离较远的地点，绝对地或相对地变远。同样，这种情况还会使生产地点到较大的销售市场的相对距离发生变化，由此可以说明，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变化，旧的生产中心衰落了，新的生产中心兴起了。(此外还应指出，远距离运输比近距离运输相对地说要便宜得多。)随着运输工具的发展，不仅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空间距离在时间上也缩短了。不仅交通工具的数量增多了，比如说，许多条船同时驶向同一个港口，好几辆列车在相同的两地之间同时沿着不同的铁路线行驶，而且例如货船在一周内，按不同的日期，依次由利物浦开往纽约，或者，货车在一天内按不同的钟点由曼彻斯特开往伦敦。(Marx 1885, Ch. 14, 1)^②

^①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二卷（第十四章），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79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二卷（第十四章），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78页。——译者注

3. 人类生活生产：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

物质生活的生产

任何物质生产的特质与变化，包括传播的物质手段在内，都取决于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历史性的生产方式。

对于传播产业的生产研究主要包括：对本地、国内、国际范围内有组织生产方式、普遍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的定位与分析，对传媒产业的历史与发展以及在生产、分配及消费领域当今通用的做法和适用条件的学科调研。

举例来说，通过将传媒生产实践和人的条件作为支配性实践的最终产品进行研究，马克思给出了英国印刷业令人震惊的事例：

过去在英国的印刷业中，同旧的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制度相适应，学徒工是从比较简单的活过渡到比较复杂的活。他们经过一段学习时期，最终会成为熟练的印刷工人。凡从事这门子工业的人，都必须能读会写。随着印刷机的出现，一切都变了。印刷机使用两种工人一种是成年工人，他们看管机器；另一种是少年，大多从11岁到17岁，他们的工作只是把纸铺开送到机器上，或者从机器上把印好的纸取下来。他们（特别是在伦敦）在一星期中有好几天要连续不断地从事这种苦工达14、15、16小时，甚至往往一连劳动36小时，而中间只有两小时吃饭和睡觉的休息时间！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识字，他们通常都是非常粗野的、反常的人。……当他们长大到不适于从事儿童劳动时，也就是最迟到17岁时，就被印刷厂解雇。（Marx 1867, Ch. 15, 31）^①

^①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531页。——译者注

对生产方式变革与传播手段适用条件二者之间认真思考后，马克思指出：

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促使社会生产活动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工具的变革成为一种历史必然以及以具有家庭副业的小农业和城市手工业为“枢纽”（傅立叶的用语）的社会它所拥有的交通运输工具，完全不能再满足拥有扩大的社会分工、集中的劳动资料和工人以及殖民地市场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生产需要，因而事实上这种状况也被彻底改观。同样地，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交通运输工具，很快又成为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经常把大量资本和工人由一个生产领域投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并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场联系的大工业所不能忍受的桎梏，因此，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同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但是，现在锻冶、锻接、切削、穿凿和铸造巨量的铁，又需要有庞大的机器，制造这样的机器是工场手工业时期制造业所不能胜任的。（Marx 1967, Ch. 15, 4）^①

精神世界的生产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精神产品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应当免于任何人为抑制因素的束缚。马克思并不把物质产品生产和精神产品看作是分别独立的两个领域。对他而言，举例来说，新闻报刊业是

^①中文摘自〔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421页。——译者注

生产和销售一种叫做报纸的物品的行业，但与此同时，新闻报刊业也生产了有关社会问题的精神产品。对马克思而言，精神产生并依附于所在生活条件与环境：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发展水平（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Marx 1969, 15）^①

与唯心主义及其冠以“后”类之理论变种相比，马克思主义有其理论的唯一性与方法论的独特性，下面陈述就揭示了这种根本区别之所在：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仅仅生存个体的自我体验。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全体生存个体本身出发，把意识考虑为纯粹集体的共同认知。（Marx 1969, 15）^②

（二）马克思论大众传媒

马克思论述了关于印刷业的方方面面，主要刊载于他的报载文章和私人信件中。他对于传媒业的关注一直持续至他去世。新闻报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页。——译者注

刊是他进行政治斗争的物质手段之一，也是资本主义维持统治的方式之一。

马克思可以被认为是具有革命性的政治新闻工作者，他时刻把工人的解放事牢记在心。在他的一些报载文章和给报刊编辑的信中，马克思表达了他对于大众传媒的兴趣和他对于传播、舆论、公共传播、报刊、自由、报刊自由，以及报刊与执权力体系（审查机构、专业人士参与、审查的正当性以及反审查斗争及其参与的报刊）之间关系的特点的见解。

19世纪40年代早期，马克思的论著主要是哲学与报刊文章，它们展示了马克思对于通信自由和对于发挥新闻业在反对报刊审查、反对社会不公、反对政府迫害、反对政府和商业腐败等方面作用的兴趣。他寻求真相，关注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真实情况；他为新闻工作者辩护，不畏强权，捍卫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作品中，马克思维护思想自由和新闻自由，积极参与反抗封建制度及其惯例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斗争。然而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马克思认为新闻自由是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而对法律体系、新闻法和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不再抱持正面评价。他参与了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与自由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例如，《新莱茵报》的最后一期全部是用红色印刷的并刊载了编辑的社论，感谢科隆工人的参与，布告以口号“工人阶级的胜利”为结语。1843年的文章大多是对时事问题、对其他报纸和政府的限制与制裁措施的态度。在1848和1849年间，他对德国报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849年移居英格兰后，1852至1862年间他担任《纽约每日先驱报》驻伦敦记者，主要以政治、战争、国际关系和政府政策为报道内容。

马克思认为新闻界是一台编造神话的机器，他对于当今所有的主流媒体的评价比此前任何观点更为准确。

直到现在，人们仍认为基督教神话是在罗马帝国时期产生的这一推断可能成立，但这仅仅是因为印刷术在那之前没有被发明出来。但事实恰恰相反。现在每天的报纸和电报交流，能够在瞬间将捏造的信息传播到地球的每个角落，这样，仅仅在一天之内，（由于资产阶级那伙人信以为真并进一步传播）杜撰出的谎言比过去一个世纪产生的谎言还要多。（Marx 1871）

1. 传媒的结构

马克思没有对传媒的结构进行详细的分析，然而他的文章（例如 Marx 1861a, 1861b）显示出他的研究已经触及传播所有权、政治活动和传播实践等；他所做的远远超过对于所有权做出的简单解释。他在物质利益、传媒生产和内容方面的本质间建立了多样的联系，并解释了如此多样联系的意义和结果。他提供关于所有权的知识，解释所有权与政策间的关系，阐明顶级传媒专业人士、政界人士及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并将它们应用于专业实践，用以宣传和私人利益与政治利益，并阐明其中的大众位置。以下仅做部分指导性摘录（Marx, 1861）：

大陆上的政治家，总以为在伦敦的报刊上他们可以找到英国人民情绪的温度计，但在现阶段他们却只能得出虚假的结论。“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传来之初，英国的民族自尊心曾勃然兴起，差不多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都响起了对美国作战的呼声。因此，一开始，伦敦报刊与人们的好战热情相比显得平静与温和得多。然而，不久以后，由于王室律师找出了与美国开战的技术性措辞，报刊与人们之间的关系开始走向另一面。报刊的战争狂热情绪也同人们

好战情绪一样高涨起来。相反的，伦敦的报刊却显得特别审慎，甚至《泰晤士报》也怀疑究竟是否存在 casusbelli [宣战的理由]。这种现象应当怎样解释呢？是因为帕麦斯顿对于王室法官们是否能找出合法的战争借口没有把握。情况是这样：在“拉普拉塔号”到达南安普顿之前一个星期，南部同盟的代理人已经从利物浦向英国政府密告美国巡洋舰企图从英国港口驶出在公海上捕捉梅森先生、斯莱德耳先生等人，并且要求英国政府加以干涉。政府根据王室法官的意见拒绝了请求。因此，伦敦报界起初的时候才唱着平静温和的调子，与人民不耐烦的主战情绪成对比。可是，一当王室法官——首席检察官和副首席检察官，他们两人都是内阁成员——发掘出一个向美国闹事的技术性的借口的时候，人民和报刊的态度就倒过来了。战争狂热在报刊上不断增强，而在人民中则不断减退。现在，对美战争在英国所有社会阶层的人民中——除了和棉花有利害关系的人以及土贵族以外——是不得人心的，而报刊上的好战叫嚣则震耳欲聋。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伦敦的报刊吧。这里为首的是《泰晤士报》，它的主编是鲍勃·娄是英国内阁的一个二等阁员，即教育大臣之流，不过是帕麦斯顿首相一个走卒。“笨拙”的主编之一由帕麦斯顿在 Board of Health（卫生部）里安插了一个位置，年薪 1000 英镑。

《晨邮报》一部分是帕麦斯顿的私产。这个奇特的报纸的另一部分卖给了法国大使馆。剩下来的部分则属于 hautevolée（“上流社会”），给宫廷的阿谀之徒和贵妇人的裁缝提供最细致的消息。因此，《晨邮报》在英国人民的心目中是报界的詹金斯（一个通常用来指奴才的典型）。

《晨报》是具有经营许可证的食品供应商们的公共财产，也即公共房产，啤酒与烈酒兼营。此外，它还是英国国教的虔诚派教徒以及那些靠赛马、赌博、拳斗等等赚钱的报纸。这家报纸的编辑格兰特先生一度受雇于各报馆做速记员，没有什么写作修养，但却有过参加帕麦斯顿的私人宴会的荣幸。从那时起，他就对这位“truly Englishminister”（真正英国大臣）对俄战争（克里木战争。——编者注）之初曾经被他斥为“俄国奸细”的人满怀热诚。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家酒店报的忠诚赞助商都聚首在沙夫茨伯利伯爵麾下听候调遣，而舍夫茨别利则是帕麦斯顿的女婿。舍夫茨别利是那些一心想把圣灵掺和到诚实的“晨报”的罪恶酒精^①中去的 lowchurchmen 的教皇。

《纪事晨报》！*Quantummutatesabillo!*（他变化多么大呀！）^② 这家辉格党的大报曾经相当成功地同《泰晤士报》竞争了几乎半世纪之久。但是在辉格党的战争之后，它的熠熠星光就开始暗淡起来了。它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形之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便士报，以“煽情新闻”为生，例如为毒药杀人犯帕麦尔辩护。后来，它把自己出卖给法国大使馆，但后者不久就懊悔白花了钱。于是它又投身于反波拿巴主义，但仍然没有什么成绩。最后，它才找到了它期待已久的买主——南部同盟在伦敦的代理人杨西和曼。

《每日电讯》是一个名叫勒维的人的私产。他的这个报纸甚至伦敦报界都斥之为帕麦斯顿的 mobpaper（打手报）。它勉强担任这个充满自重和自制精神的角色，感到很不自

①双关语：原文 Spiritus 有“酒精”和“神灵”两个意思。——译者注

②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译者注

惯，所以在那以后曾刊登了半打文章来谈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所表现的自重和自制精神。而变换方向的命令一到，它就努力来补偿自己此前所受的约束，用狂叫战争的声音来压倒它的所有同行。

《地球报》是政府的晚报，它从所有辉格党阁员那里得到官方的津贴。

托利党的《先驱晨报》和《旗帜晚报》属于同一个老板，它们的立场受着两个动机的支配：一个是对于“背叛英国的殖民地”的传统仇恨，另一个是钱袋的长期渐渐变扁。它们知道，同美国作战一定会使现在的联合内阁垮台，为托利党内阁铺平道路；而托利党内阁一成立，对《先驱报》和《旗帜报》的官方津贴也将随之而恢复。因此，这些报纸才比看到猎物的饿狼叫得还凶，因为它们预见到随着对美战争而来的还有大量金钱！

在其余的伦敦的日报当中，值得一提的只有《每日新闻》和《晨星报》，这两家报纸都反对战争鼓吹者。《每日新闻》因为与约翰·罗素勋爵有联系而行动受限制；《晨星报》（布莱特与科布顿的报纸）的影响则由于它享有“不惜任何代价求和平的报纸”的声名而减弱。

伦敦的周刊大多数仅仅是日报的回声，所以绝大部分都主张战争。《观察家报》是靠政府生活的。《星期六评论》极力追求“才智”（esprit），以为自己凭借影响高于“人道主义”偏见之上的愤世嫉邪程度就已经掌握了这个本领。为了显示“才智”，为这家报纸撰稿的被收买的律师、牧师和学校教师们从美国内战爆发以来就对许可“南方蓄奴制度”窃喜不已。自然，这些人随后就跟着《泰晤士报》吹起了战争的号角。他们已经在草拟对美作战计划；

这些计划表现出惊人的无知。

《旁观者》、《观察家》，特别是《麦克米伦杂志》，则应该多少作为可敬的例外提出来。

由此可见，整个说来，伦敦的报刊——地方报纸除棉织业巨头的报纸以外则同伦敦报刊形成一个可嘉的对照——无非就是帕麦斯顿加帕麦斯顿。帕麦斯顿要战争，英国人民不要战争。即将发生事变就会表明，在这一场决斗中谁是胜利者，是帕麦斯顿还是人民。归根到底，帕麦斯顿是在玩一场比1859年初路易·波拿巴所赌的更为危险的游戏。^①

2. 自由和媒体

在马克思的理论主张和各种著作中，人类的自由这一问题都是他关心的核心问题。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体现出他对于把个人从各种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有着相当深刻的感受。

在马克思看来，“无论自由是体现在打印机的油墨中，在财产中，在道德感中。或者在一个政治大会中，自由就是自由”。(Marx 1842g)

自由不仅包括什么是我的生活，也同样包括我怎样生活，不仅包括我做什么自由的，还包括我也可以自由地做。否则建筑师和海狸之间除了海狸是没有皮毛的建筑师和建筑师是没有皮毛的海狸又有什么区别呢。(Marx 1842f)

“自由确是人的最大本质，即使不同意这一点的人在攻击自由本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4页。——译者注

质时也要利用自由；他们试图在用他们拒绝使用的人的这一本质装饰来装饰自己呢。”（Marx 1842e）对于批评那些只承认自己的自由拒绝他人所享有的自由的人，马克思对他们的批评非常直言不讳的。

因为这些先生们不愿把自由看作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予的自然礼物，而想把自由看作是一群特别有利的星团带来的超自然礼物，因为他们认为自由仅仅是某些人物和等级集团的个人财产，所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结论说，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思想，是“逻辑建构体系”的幻想。为了拯救特权者的特殊自由，他们就禁止人类本质的普遍自由。但是，19世纪的相互积怨和被本世纪所染化的现代骑士意识，无法理解那种本身就不可理解的东西。因为其中缺乏想法，也即证明内在的、本质的、一般的规定怎样通过外界的、偶然的、特殊的稀奇事物而同某些个人相联系；同时却不同人的本质，不同一般理性相联系，因而对所有个体而言，他们共同的行动就是：由此求助于奇迹与神力。其次，由于这些先生在现代国家中的现实地位远不符合于他们想象中的地位，因为他们生活在处于现实世界彼岸的世界里，因为他们用想象力来代替头脑和心脏，所以他们就不满意实践，就必然求助于理论，不过这种理论对其他世界的人来说却是地地道道的宗教。然而，他们这种宗教具有浸透着政治倾向的论战性的辛辣色彩，并且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为十足世俗而又极其虚幻的欲望披上圣洁的外衣。（Marx 1842d）^①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译者注

在马克思看来：

“所有关于限制自由的说法都是事实，无可争辩的证据显示出任何时期当权者都相信自由应该被限制，这种信念对其后观点成为一个指导原则。”（Marx 1842c）

自由的一种形式被拒绝，那自由在多数情况下都被拒绝，因而此后自由也仅只能徒具外表，因此缺乏自由的情况成为主导将只能是纯粹的偶然。缺乏自由是常规的，自由就成了例外的、偶然的意外事件。（Marx 1842g）

3. 新闻业：新闻审查和新闻自由，好新闻与坏新闻

最初，马克思的兴趣在于传播的控制，这主要是因为他朝新闻方面努力是在 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他在 1842 年 5 月，在 6 篇文章中提供了丰富而引人注目的、关于新闻自由与审查制度的讨论。不过，我在这篇文章里也将提及其他的文章。

马克思把新闻看作大众传播的工具和追求真理与解放的工具。对于他来说，“新闻出版是个人表达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式。它不知道尊重个人，它只知道尊重理智”（Marx 1842g）。^①他提出问题：“你们要以官方的方式用特殊的外在的标志来确定精神的表达能力吗？”并且解释道：

对别人我不可能是什么样的人，对自己我就不是而且也不可能就是这样的人。如果对别人我没授权为精神力量，那么，对自己我也就没有权利成为精神力量；难道你们想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96 页。——译者注

把成为精神力量的特权只赋予个别人吗？每个人都在学习写作和阅读，同样，每个人也应当有权利写作和阅读。
(Marx 1842g)^①

他将报刊分为两个基本的类别：那些官方报刊与自由报刊（群众报刊）。然后，他比较了两者的特征：

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无刻不在的、警惕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通讯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天然物质形式转变为价值理想形态的一种文化表征。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保留的自我坦承，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自由报刊是公益精神，它可以传递到每一间茅屋，比煤气还便宜。它形式多样，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自由报刊是精神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思想精神，流回现实世界。(Marx 1842f)^②

受检查的报刊即使生产出好的产品，也仍然是坏报刊，因为这些产品只是它们在受检查的报刊内部表现了自由报刊时候，只是按它们的特点来讲它们并不是受报刊检查的时候，才是好的。而新闻自由即使生产出坏的商品，也仍然是好的，因为这些商品正是违反新闻自由本性的现象。新闻自由的本质，是自由所具有的卓越、理性和道德。受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6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9页。——译者注

检查的报刊的特性，是无自由的平庸巨怪，这种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Marx 1842e)^①

马克思关于审查新闻的以下描述使我们想起了今天主流大众媒体的一些基本原则：

起败坏道德作用的是受检查的报刊。最大的恶行——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从它这一根本恶行派生出它的其他一切没有丝毫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丑陋的（就是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这样）恶行——消极性。报刊不断撒谎，还得拒绝承认撒谎，就必须抛弃羞耻感。恶意的幸灾乐祸式报道，只选取各民族生活中那些搬弄是非与人身攻击的内容，忽视基于史实的历史理性，只向公众提供历史丑闻；由于缺乏事实判断力，报刊只会抓住社会现象与人物个体的某个方面，妄自尊大地追逐神秘事件，最终将导致公共生活的每个污点仍然被掩盖起来，因此，人民也就有一部分陷入政治迷信，另一部分陷入政治上的不信任，或者说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顾个人的庸人。(Marx 1842f)^②

如果报刊接受了审查，马克思不认为这些报刊还有好坏之分。

如果要谈报刊的两种类型，那么它们的差别就应当根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3页。——译者注

据报刊的本质本身，而不是根据报刊之外因素的考虑。受检查的报刊或自由的报刊，其中之一必然是好的或坏的。其实争论的也正是：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也就是说，符合报刊的本质的是自由的存在，还是不自由的存在。让坏报刊驳斥好报刊，实际上就是在维持这一状态：自由报刊坏，受检查的报刊好，而这一点正是需要证明的。基本心智结构、个人阴谋与声名狼藉在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中都可能出现。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会生产出这种或那种产品，因而这一点并不能构成它们的类的区别。泥沼上也会长出鲜花。这里所谈的是本质，是区别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的那种内在特性。……那种坏的自由报刊是不符合它的本质的特点的。而受检查的报刊的伪善平庸、娘娘腔和像狗似的尾巴摇摆不定，只不过实现了其本质属性的内在状态。（Marx 1842e）^①

4. 新闻自由，审查与反审查

为了能谈论自由、控制和斗争，为处理这些特定关系，必须存在有组织的实体机构，而这样的两个机构就是新闻业和有组织的审查机构。后拿破仑时代的德国承诺依宪法成立一系列省级议会。1823年，普鲁士形成了八个省议会（社会各阶层委员会）。他们由皇亲国戚、骑士、贵族、城乡社区等各阶层代表组成。这其实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冲击下的一种封建议会制度。马克思在当时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者，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他也部分地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者。马克思为自由和尊严而战，反对当局控制新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0页。——译者注

闻界、肆意捏造事实的行为。马克思认为报刊实践活动就是言论自由权的兑现，这种言论自由规定着报界与公私机构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文章是1841年12月普鲁士当局报刊审查条例的颁布实施促成的，也在普鲁士的莱茵兰省引发了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随后，一系列“临时联邦法案新闻检查令”于1819年9月20日在德国各地生效。

马克思认为新闻自由与审查机构（的对立）是历史事实。在他看来，“严格审查下的文学时期确凿地证明了审查机构毋庸置疑对于德国精神产生了灾难性的、极不负责任的影响”（Marx 1842c）。

第一篇确实关于新闻自由、审查机构和作者的文章，标题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它写于1842年1月15日至1842年2月10日，1843年发表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Marx 1942a）。

马克思为了将自己与那些在普鲁士审查法令出台前就宣称要“小心希腊人的礼物”（小心特洛伊木马）的人区分开来，他解释说，报刊检查

“就是官方批评，其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因此，就很难把这种标准同批评分割开来，因为它们是在同一个基础上的。”而书报检察官“也就是原告、辩护人和法官三位一体的人。书报检察官被委任去控制思想，然而这样是不负责任的”（Marx 1842a）^①。

他继续说：

书报检查制度是为政府所垄断的批评。但是，当批评不是公开的而是秘密的，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的时候，当它不是为超党派利益服务而只是仅关心自身一党之私利的时候，当它不是带着理智的利刃而是带着任性的钝剪出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译者注

现的时候，当它只想进行批评而不想受到批评的时候，当它实现了自身目的却又不愿承担为此承担责任的时候，最后，当它如此缺乏批判能力，以致错误地把个人当作普遍智慧的化身，把专横的命令当作理性的声明，把墨水污点当作阳光耀斑，把检察官的恶意删剪当作精确构建，把粗鲁强迫当作果敢争辩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批评不是已失掉它的合乎理性的性质了吗？（Marx 1842e）^①

谈到该法令的性质，马克思提醒我们“审查制度同时保护统治阶级可以拒绝不合意的交流与批评；禁止媒体成为一种可以监控官员的个体阶层而存在”（Marx 1842a）。马克思宣称审查法令并不是法律：“是警察手段，并且还是拙劣的警察手段，因为它所希望的它达不到，而它达到的又不是它所希望的。”（Marx 1842f）^②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马克思驳斥了国会所给出的力图证明审查制度合理的证据（比如人的不完善、新闻良莠不齐以及人性有恶的部分等等）。比如马克思认为：

如果人类不成熟成为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神秘论据，那么，无论如何，书报检查制度就是反对人类成熟的一种最明智的办法了。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究其本质而言永远不会完善。……发言者所发表的言论是不完善的，政府是不完善的，省议会是不完善的，报刊自由是不完善的，只要有人存在的任何领域都是不完美的。因此，如果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译者注

任何一个领域因为其不完善完美而不被允许存在，那么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是应当存在的，换言之，人类根本没有生存的权利。在这么多的不完善中，为什么偏偏只有报刊自由必须得是完善的？为什么一个不完善的等级议会要求报刊自由必须完美？设若按其本质来说，人类的一切按其存在来说都是不完善的，难道我们因此就应该混淆一切，对善和恶、真与伪一律表示尊重吗？（Marx 1842d）^①

为了说明此类论点的荒谬，马克思继续说：

要真正为书报检查制度辩护，辩论人就应当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是新闻出版自由的之一。而他不来证明这一点，却去证明自由不是人的本质。他为了保存一个良种而抛弃了整个类，因为难道自由不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因而也就是新闻出版的类本质吗？为了消除产生恶的可能性，他消除了产生善的可能性而实现了恶，因为对人说来，只有是自由的实现的东西，才是好的。因此，在没有人向我们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是由新闻出版自由的本质本身中产生的以前，我们就一直要把受检查的报刊看作坏报刊。（Marx 1842d）^②

马克思也同样强调报刊自由有不同的特质：

从观念的角度看来，不言而喻，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译者注

制度的辩护理由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新闻出版自由本身就是观念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就是积极的善；而书报检查制度是不自由的体现，是一种表象反对本质的世界观论战，它只具有积极性。(Marx 1842e)^①

马克思说明了在 22 年（从 1819 年底审查法生效起算）中德国新闻界备受压抑的情况：

保护公民的最高利益即他们的精神的主管机关，一直在进行非法的活动，这一机关的权力简直比罗马的书报检察官还要大，因为它不仅管理个别公民的行为，而且甚至管理公众精神的行为。

对于那些应对这一问题的无效手段（抱怨检察官、个人、法律漏洞或是机构漏洞、法律的特质、报刊记者或是公众），马克思给出了精彩的述评：

对事物本身的憎恨就会变成对某些人的憎恨。有些人以为人一变换，事物本身也就会起变化。……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制度却比人更有强制力量。(Marx 1842a)^②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66 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34 页。——译者注

对于马克思而言，“只有斗争才能说服政府和人民，也包括新闻界本身，新闻界的生存权利是真实且必需的。只有斗争才能展现这种生存权到底是退让或是必须，是错觉还是事实”（Marx 1843）。“书报检查制度没有消灭斗争，它使斗争片面化，把公开的斗争变为隐蔽的斗争，把原则的斗争变为无力量的原则与无原则的力量之间的斗争。”（Marx 1842a）^①

5. 新闻法与审查法的区别

马克思认为审查法是作为警察部门反对自由的一项预防措施。他在1842年把它和报刊出版法进行了比较：

在出版法中，自由是惩罚者。在书报检查法中，自由却是被惩罚者。书报检查法是对自由质疑的法律。新闻出版法却是自由对自己投的信任票。新闻出版法惩罚的是滥用自由。书报检查法却把自由看成一种滥用而加以惩罚。它把自由当作罪犯；对任何一个领域来说，难道处于警察监视之下不是一种可耻的惩罚吗？……新闻出版法才是真正的法律。新闻出版法才是真正的法律，因为它是自由的积极存在。它认为自由是报刊出版业的正常状态，新闻出版是自由的存在方式；因此，新闻出版法只是同那些作为例外情况的新闻出版界的违法行为发生冲突，这种例外情况有自身行为准则，因而也就毁灭了自己。新闻出版自由是在反对对自身的侵犯即新闻出版界的违法行为中以出版法的面目示人的。新闻出版法宣称，自由是罪犯的内在本性。因此，罪犯在侵害自由时也就是在侵害他自己，这种自戕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2页。——译者注

对出版法来说就是一种伤害，而在这种伤害中，出版自由却看到了自身被认可的身影。……因此，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它构建了正义，因为它是自由的肯定存在。所以，即使它完全没有被采用，它也必须存在。(Marx 1842d)^①

马克思关于法律的积极看法在几年时间里有所改变。例如，在1848年，他认为普鲁士新闻法案是“拿破仑新闻专制的经典衣钵”(Padover 1974, 121)。在1849年，他宣称布鲁士专制主义比拿破仑专制主义更糟糕：

普鲁士的专制主义另一方面以一种高级圣物相伴的官员形式直面于我。他的公务性质之于品格如同献祭之于天主教父，不可或缺。……侮辱这样一个神父，即使是一个现在不再起作用也不再是神父而回归到私生活的人，仍是亵渎宗教、亵渎神圣的行为。(Marx 1849b)

马克思不承认法律的预防性特征。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法律是不能预防人的行为的，因为它是人的行为本身的内在的生活规律，是现实生活和精神反映。因此，法律在人的生活即自由的生活面前是隐在的，而且只有当人的行为展现出人不再服从自然规律时，自然规律作为国家法律才强迫人成为自由的人；同样，只是在人的生命不再恪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5页。——译者注

守这些生理规律，即患病的时候，规约生命的物理法则才作为异己的力量对抗我。可见，预防性法律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矛盾。(Marx 1842d)

因此，任何预防性法律实际上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悖论。所以，预防性法律本身并不包含标准性的、合乎理性的准则，因为合乎理性的准则只能从事物的本性即自由实践中取得。(Marx 1842e)^①

6. 出版和贸易自由

人类生产和再生产了他们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关于新闻，马克思下面的句子中清楚地阐释了它在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关系中的所扮演的角色和性质：

使报刊能成为了提高人们文化水平和智力教育最有力的杠杆的是这样的事实：他把物质斗争转化为意识形态的斗争，把血肉之躯的斗争转化为思想斗争，这种需要、欲望、经验主义上的斗争就转化为理论、原因、形式上的斗争。(Marx 1842j)

这解释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但也显示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是经济还原论并且是建立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错误的因果联系之上的”这一论断的浅薄和无理。

马克思区分了报刊自由（记者的表达自由）和贸易自由（商业权利）：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7页。——译者注

如果把新闻出版仅仅看成一种贸易，那么，它作为头脑经营的贸易，应当比手脚经营的享受有更多的自由。正是由于头脑的解放，手脚的解放对人才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大家知道，手脚只是由于它们所服务的对象——头脑——才成为人的手脚。(Marx 1842g)^①

马克思不接受新闻自由是贸易自由一部分的观点：

行业自由、财产自由、道德自由、出版自由、审判自由，这一切都是同一个类即没有特定名称的一般自由的不同种。但为求团结一致而忘了差异，以至把一定的种所具有的评价尺度、标准、领域用作衡量其他一切种的尺度、标准、领域，那岂不是完全错了。对一种自由之种而言，让其只准备好容忍别的种的存在，而这些所谓的别的种又自暴自弃甘愿被其奴役，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贸易自由只是行业自由，而不是其他什么自由，因为在这种自由中，贸易的本性是按其内在生存法则不受阻碍地发展起来的。自由的每个具体领域就是这一领域的具体自由，就像每个具体生活方式就是其本性具体化的生活方式一样。如果法院遵循它自己固有的法规而不遵循其他领域（如宗教）的规律的话，审判自由就是审判自由。自由的每一特定领域就是特定领域的自由，同样，每一特定的生活方式就是特定自然的生活方式。要狮子遵循水螅的生命规律，这难道不是反常的要求吗？(Marx 1842g)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译者注

把出版自由视同为各种贸易自由来经营，无异于本想保护它却反过来扼杀它的无益之举。当一种品质的自由应该按照其他不同品质的自由方式样子去自由，难道我不是在废除这种品质的自由吗？新闻出版向贸易说道：你的自由并不就是我的自由。你愿服从你的领域的规律，同样，我也愿意服从我的领域的规律。按你的方式之自由，对我来说就等于不自由；因为如果木匠要求他的行业自由，而人们把哲学家的自由作为等价物给了他，他是很难感到满意的。（Marx 1842g）^①

马克思承认：

新闻出版也作为一种贸易而存在，不过那已不是作者的事，而是出版商和书商的事了。但是，这里所谈的不是出版商和书商的行业自由，而是新闻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首要自由不存在于交易行为中。（Marx 1842g）^②

7. 公权与自由

马克思在反对统治力量干涉新闻自由的同时，也为公权和自由辩护，马克思表示：

违背人民心境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公民所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惩治社会人心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0—191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3页。——译者注

取向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而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有些人可以做另一些人所不可以做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后者缺乏什么客观品质（像小孩子不会缔结条约那样），不，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他们的善良意图，他们的心境状态遭到了怀疑。即使公民起来反对国家机构，反对政府，道德的国家还是认为他们具有本国的思想趋向。可是，在一个某个机关自诩为国家理性和国家道德的唯一占有者的社会中，在一个原则上反对因而认为自己那一套反国家的思想就是普遍而标准的思想的政府中，一小撮良知破坏者臆造了一套逆社会趋势的法律、报复的法律、反对民众心境的法律，实际上这些法律填塞的只是政府成员一家之利的法律是以建立在矗立于不道德国家物质观之上的不合道义的执政者心境基础之上的。（Marx 1842a）^①

8. 作者、专业实践与专业观念

作者方面

记者（也包括学者）在他们的专业实践中主要面临这样二选一的抉择：要么甘冒各种艰难险阻，成为事实真相的热情追随者；要么追名逐利，成为社会现状忠实信徒与支持者。在事实上国内也有争论，其判定结论多半由记者所能承受的风险程度决定的。

马克思选择了前者。对他来说，新闻工作是发掘真相的工具，是谋求解放的斗争工具。对马克思而言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译者注

真理无处不在，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拥有我，而不是我拥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性的形式。真理不仅包括结论的真理性，而且更包括达此结论的过程的真理性。对真理的探讨本身应当是真实的，真实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要素在终极结果中是融合在一起的。^①（Marx 1842a）

他鄙视任何规定形式、精神个体发展方向的惯例与法令；他也鄙视那些据此惯例与法律按图索骥式的专业实践。

第二类记者就如那审查马克思的文章的“愚钝的官僚”一样，是不值得尊敬的专业人士。此类记者对同样的物质及非物质环境进行再加工，但他/她是故意地、有意识地、有预谋地歪曲事实、编造谎言、捏造真相的，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他/她是知道事实真相的。然而，他/她与那些愚钝的官员或者那些像伯尼斯（Edward Bernays）笔下的雇工司机笨杰克（Ewen 1996）一样的小人物不在同样的物质和精神状态下。名叫多里沙尔（Lauenz Dolleschall）^② 愚钝的官员是不会让任何人“从天赐的事物中获得乐趣”的，因此他对于所有看起来可疑的内容都进行了删改，并且（就如马克思所总结的那样）说：“现在这是事关我生计的事，现在我删除所有的东西”（节选自 Padover 1974, Vol. 8）。然而这些记者的决定不是基于他们无根据的、无逻辑的观念，而是他/她对相关利益的计算：他/她会进行编辑，然后删掉那些不符合他/她的兴趣和不符合他/她的雇主的兴趣的所有内容。

在 1849 年对他的审讯中，马克思在辩护演说中表述了新闻和记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13 页。——译者注

^②检查《莱茵报》的书报检察官。——译者注

者的责任：

我宁肯去研究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宁肯去分析历史的进程，也不愿意同当地的要人、宪兵和检察机关打交道。尽管这些先生们以为自己很伟大，但在现代的巨大斗争中他们却算不了什么，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我们决定同这样的敌手交锋，我认为我们必将做出真正的牺牲。但是首先，报刊的职责在于为最近四邻的受压迫者站出来讲话。此外，诸位先生，直接同个人、鲜活个体的私生活发生接触的下级政权机关和社会权力机关是奴隶制度这一建筑的主要支柱。所以，只是一般地同现存关系、同最高权力机关斗争是不够的。报刊必须反对某一具体的宪兵、某一具体的检察官、某一具体的行政长官。为什么三月革命会失败呢？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Marx 1849b）^①

以上陈述说明马克思认为新闻和记者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对他来说，“新闻通常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因此，哪里有新闻，哪里就应当有新闻自由”。对马克思而言，新闻自由的问题并不在于

新闻出版自由是否应当存在，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向来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7页。——译者注

是存在的。问题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个别人物的特权呢，还是人类精神的特权。问题在于一方面的有权是否应当成为另一方面的无权。问题在于“精神的自由”是否比“反对精神的自由”享有更多的权利。(Marx 1842e)^①

他在关于思想自由、传播自由和记者尊严的探讨、解释与辩护，对于一些每天恬不知耻地屈从于私人利益和国家权力来赚钱的专业媒体人（和学者）是很重要的一课，而另一些记者（和学者），未经正当的审判，因尝试和计划颠覆政府而入狱超过五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土耳其，全球资本主义中全球本地化的公民独裁在这个国家得到了验证。土耳其被囚的记者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都多。大约有 100 名记者在押。大约有 700 至 1000 起在审案件可能判处共计 3000 年的监禁^②，穆斯塔法·巴尔贝（Mustafa Balbay，著名记者，最近被选举为议会成员）和阿伯拉尔（Mehmet Haberal，世界著名医学博士，巴斯肯特大学校长，最近被选举为议会成员）都因为计划政变推翻政府统治而被判三年以上监禁。所有为这一情况发表文章或言论的人都被指控犯有“试图影响公正审判”的罪名并被投入监狱。^③ 近来传媒界（以及学界）的主流职业所为就是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批判过的可鄙的专业精神。

马克思同样通过对作者/记者与商人进行区分，确立了媒介专业人士基本专业标准：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7页。——译者注

②数据来源：<http://europe.ifj.org/en/articles?search=Turkey>。

③http://www.dha.com.tr/chp-leaders-immunity-in-danger-accused-of-attempting-to-influence-fair-trial-son-dakika-haberi_255874.html。

作者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的目的就是其本身；作品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其他人而言都是手段，因此在必要时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把新闻贬低为单纯物质手段的作者应当遭受外部不自由即书报检查制度对他这种内部不自由的惩罚，更确切地说，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对他的惩罚了。(Marx 1842g)^①

在分析授权的记者与无权的记者的划分时，马克思发问：“那么，对于有资格的记者与无资格的作者的划分是为了谁呢？”他给出了答案并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当然不是为了那些真正有资格的作者，因为他们脱离这一划分也可以施加影响。那么因此这就是为了那些想要保护他们自己、想要用外部特权来影响他人的“无资格”的作者的吧。(Marx 1842g)^②

他补充道：

德国人只要回顾一下自己的历史，就会知道造成本国政治发展缓慢以及在莱辛以前文学界贫弱境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够资格的作者”的存在。我国的文学界是由那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2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6页。——译者注

些不够资格的作者创建的。你们把戈特舍德和莱辛两人在“够资格的”和“不够资格的”作者中加以抉择吧！……你们从你们的同伙中招募一帮官方作者是肯定无法实现新闻自由的。够资格的作者都是官方的作者，书报检查制度同新闻自由之间的斗争就变成了够资格的作者同不够资格的作者之间的斗争。(Marx 1842g)^①

专业实践方面

马克思，在写给编辑的文章和信件中，发表了有关报刊的许多普遍的和日常的实践操作的观点（比如 Marx 1842h；1842i；1842k；1843；1843b；1843c；1848；1849；1860；1861）。这些观点可以归纳为：

- 有关探讨政府强加禁令迫害报刊的内容：马克思质疑这些迫害的合法性和报刊所处环境的本质。

- 议论其他报纸和作者对政府压迫某一报纸的反应：马克思批评那些不公平、不公正地对待报刊的人。

- 对其他的记者关于一个问题、宣告、主张、或批评的文章的评论、回应、估计和批评：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的主张可谓从赞同到强烈的辩论和谴责无所不包。

- 报刊中对策略的和/或者文体的使用的评价。

- 对一些报刊报道的评价，这些报道包括了政策、报刊与政治家的关系、报刊与群众的关系，还有报刊对战争的态度。

- 一般的新闻评论。

观察新闻对官方使用镇压和检查措施的态度，马克思强烈地批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6页。——译者注

评了德国的报刊（媒体）。

德国的日报是阳光下松松垮垮、最昏昏欲睡、唯唯诺诺的机构！它最不可饶恕的罪行可以在它眼前犯下，甚至是将矛头对准它自己，同时它会保持沉默并掩盖一切。如果事实不是偶然被获知，那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在有些地方三月里绚丽的紫罗兰如何在救世主恩典下生长起来。（Marx 1849）

对于马克思来说，报纸要保护个人，但不是所有人。

报刊必须对情况进行揭露，但我认为它不应该对个人采取告密行动，除非一种社会弊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消除，或者除非公开性已经在整个政治生活中普遍实现，因而德文中的告密一词已经不复存在了。（Marx 1843d）^①

马克思把报刊定位于社会中并认为，在公众和统治势力之间，报刊起调节作用。与此同时，他意识到报纸是表达民众需求和不满的声音的不可替代的手段。

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就是说，它不是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也是市民的因素，但同时又不直接同私人利益及其迫切需要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在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60页。——译者注

报刊这个领域内，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不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而是在平等的公民权利范围内进行这种批评。“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它也制造社会舆论，唯有它才能使一种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唯有它才能使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成为祖国普遍关注和普遍同情的对象，唯有它才能使大家都来分担体验这种贫苦感受，从而减轻这种贫困。(Marx 1843f)^①

对于马克思而言，自由报刊的语言就是人类状态的语言，而不是人类生活或人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他强调了语言的作用和它与生活条件和官方报告之间的关系：

报刊对待人民生活状况的态度取决于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影响；因此，报刊的语言不仅是超脱各种关系的明智的评论性语言，而且也是反映这些关系本身的充满热情的语言，是官方的发言中所不可能有而且也不应该苛求的语言。最后，自由报刊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原本本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反映到御座之前，反映给这样一个当权者，在这个当权者面前，没有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的差别，而只有不分亲疏的公民。(Marx 1843f)^②

作者及其职业实践的特性反映了他/她的专业意识。举例来说，

①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8页。——译者注

②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8页。——译者注

在上文提到的马克思的辩护词中表明了，马克思派给记者和报刊的任务是展示自我高度认可的职业的世界观。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于某些作家和报界的批评表现出了依附与不依附主流的模式和关系的人在专业意识形态方面的区别。

六、结 论

理论通常是对诸如有组织的人类实践之系统而融贯的解释。这种解释应该符合被解释的事物，否则理论本身或者理论的解释就会失去有效性和可靠性。然而，这种有效性和可靠性是可以通过生成与理论相适应的实践或是实践性质的概念来完成的，或者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有效的解释，尽管他们是不相关的，前后不一致的或者矛盾的，但他们来自大量的生产、流通和合法化的实践。合法化必须通过至少两种作用机制来取得：首先，通过以客观性，甚至普遍性的合理化要求为基础的主体间性，建立其主导地位。其次，则是与该主体间性联姻的权力运作。换句话说，这种主导地位是通过一定社会中权力与私人利益间组织化的相互关系获得并维持下去的，在这个社会中，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借助于人的能动实践来实现，主体从物质与非物质生活中塑造意识，同时根据物质与非物质条件反映思想与意识。因此拥有这种力量和控制手段的那些主体在决定生产什么、怎么生产、在哪里生产及其分配物质与非物质产品和服务方面处在有利地位。学术界和学术产品的本质成为了这种主体间主导关系的一部分。当下的研究发现表明，当今学术期刊在议题遴选、问题规划、研究目标、理论与方法运用等方面，其定位的流行特征无不承载着这种主导地位的具象表达。发表在《媒体与传播研究》期刊的大多数研究是各种主流方法的表现；都把兴趣点集中于对个人的态度、兴趣、偏好和行为以及如何推进功能、企业利益和

制度结构。其余的研究也主要为如何实现控制与功能替代服务，很少有例外。各种功能主义的主流传播学研究已经被不同的研究者讨论过。例如，哈特（Hardt 1997）指出占主导地位的传播研究的实用主义的角度，这一观点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以日益增长的媒体行业内的商业投资的实际需求为问题的出发点。他还表明，美国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取向是由自由多元的思想决定的，他们支持工商业利益，而这主导了决定媒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统治阶级以各种积极手段和权力结构吸引学者参与和塑造精神产品和关系的情况并不新鲜。在传播领域有许多例子：心理学家和冷战鼓吹者 [拉斯韦尔（Lasswell）、希尔斯（Shills）、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坎特里尔（Cantril）、德威特（Dewitt）、盖洛普（Gallop）、李克特（Likert）、勒纳（Lerner）、贝雷尔森（Berelson）、施拉姆（Schramm）、普尔（Pool）等人] 因为参与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分配收到了军方、情报组织和基金会（如：联邦调查局、中情局、洛克菲勒、福特和卡内基基金会、兰德公司）给予的数百万美元。知识分子的这种形式的参与仍然是可持续的统治的实践的一部分。关于知识分子和国家结构和不同基金会之间的密切联系有十分有价值的研究（如 Doob 1947; Schiller 1974; Simpson 1994; Gary 1996; Glander 2000; Solovey 2001; Maxwell 2003; Pooley 2008; Summers 2008; Jonas 2010）。

目前，心理战的活动和研究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整个民用领域，包括众多合法化和合理的一个国家的多个政党之间的关系，甚至达到国际水平。早期的研究及其资金盟友帮助形塑了传播的概念，和传播领域在美国以及全世界的研究的方向。最近的研究不仅在政治场，同时也在经济领域里持续再现着正在持续着的冲突，这是为了通过思想、利益和行为管理以维持可持续发展。

当前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参与到有利可图的关系网去，

增加从不同资源中获取财政补贴的可能性、获得在大学院系中正式认同和成功的可能性、在主流学术圈中赢得受人尊敬的地位的可能性、在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著述的可能性、从官方机构获得资金的可能性，资金主体和专业协会对学术立场的需求是：（1）完全忽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2）表明公开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3）采用基于文化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实证主义等等理论的一种安全的、有益的方法试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无效，（4）给出最为错误和歪曲的解释，比如宣布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意识形态的终结、民主化、知识社会、互相依赖、非殖民化、身份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等等。

对支持统治权力结构的理论导向的维护

本次研究发现，应用于《媒体与传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建立在发现效果和改进对个体世界观和行为的控制机制的基础上。主流的效果研究大都开始于一个以直接的、无中介的效果为特征的有关说服和传播的简单模型，特别是，此模型的基础是劝服和用可观测的行为模型化的受众。对效果的兴趣演变为受众动机和积极受众选择理论的分析结构，包括详尽可能性模型，归因理论，认知一致论与选择性接触，以及使用与满足理论。如两级和多级传播，社会扩散理论，知识沟和社交网络的取用等理论在给个体心理赋予上下文语境和/或转移至宏观解释的同时，实现了新的研究设计技术，尤其在于量化方式，交互影响和历史数据分析方面。20世纪70年代，在传播的政治、经济和制度背景下转移到宏观层面的设计与分析后，教养理论等理论通过强调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媒体逐渐累增的作用，采用了自由民主的批判性方法。为了缓和媒体带给观众的作用，如议题设置理论和媒介依赖论等理论逐渐出现了。不久，议程合并、启动效应和框架理论成为了新的取向。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氛围下，如接受理论，对各种自由多元文化的研究和

划一论等各种理论等渐渐出现，并且在主流中不断扩大影响并促进了传统理论的发展。如接收，解构，重构和阐释等概念可以成为一个循环过程：解释性的转向到积极的、原子的个体。最近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被取样的学术期刊中，这些范式并未收到多少收益。此类方法的增长和持续只发生在当前研究实践的主导范式的边缘。然而，克拉珀（Klapper）对 20 世纪 60 年代大众传播研究的概括和建议似乎仍是传播领域大多数研究的纲领性文件：

（1）主流取向关注的是受众各种不同的心理状态；

（2）文化主义者，社会互动论者，自由主义多元论者和社会心理学家们对于信息接受中的特定的社会语境比社会人口统计更感兴趣；

（3）一些后结构主义者聚焦于观众群体成员的信仰结构，而不只是他们的信仰导向是否和以前一致；

（4）受众信息接受分析在非常精巧的报道中重新提出了积极观众话题，以参与到让企业免于社会责任的过程中。

克拉珀的建议、当前假性批判和功能性的研究方案的取向都很重要，因为他们都是细致的关于“知人”的知识，从而可以做到“制人”。

对理论主导权的维持是通过功能性的替代路径的创造与提升来实现的。这些维持和推进在学术关系和生产中是十分明显的。现有研究发现，那些试图全部或部分否定马克思，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在衰落的、不充分的、种族中心的，认为马克思除了对于阶级身份外，对其他身份十分迟钝的研究，并不是主流，也不是自由民主理论支配下的研究。主流研究忽视了马克思，而自由民主主义者逐渐借鉴马克思。而研究结果表明，马克思不是被热情的实践者与促进者（Artz 2006, 6）而是被各种各样的所谓“批评性”或“替代性”的范式所争辩、修改、曲解、频繁曲解、夸大与滥用。现有的

研究并未在文章中发现任何狂热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推动者，只找到那些所谓的“替代者们”就是“马克思的替代者”，最具“批评性”的范式实际上就是那些“瞄准马克思的批评”。

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让我们谈一下“策略”，这来自于60年代末的一波流行趋势，一些学者[例如，福柯(Michel Foucault)、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莫菲(Chantal Mouffe)以及他们的追随者]都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起步，而随着马克思被认为无效、衰落、不充分而停止使用它。这种趋势非常流行且是有成效的，这种精神产品是思想控制和管理的绝佳工具，因为他们自称这是当前有效的替代声音(或直接或间接地指向马克思)。

理论上和方法上局限的重复

本研究还发现，大多数的研究，特别是经验主义和伪经验主义(调查)的研究，严重缺乏设计过程中的理论推理、假设构建和结论展现。同样地，以前的一些研究中发现了在《媒介和传播研究》中存在低层次理论的使用(Potter and Riddle 2007; Kamhawi and Weaver 1999)。此外，对于研究目标的陈述是基于满足工业需求的利益，这种利益是为了了解和控制客户/消费者和媒体/知识工作者的。

上述发现支持了这样的理论推理：某些学者唯一关心的是和个人以及私营组织有关的问题，而非建立与之相关的充分的基本原理来解释现象之本质。这样的趋向进一步表明，学术界是一个资本主义工业结构中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大部分的定性研究声称他们正在做的“话语分析”，但是这些分析中的思想阐述并不一致，甚至有所冲突，未能提供或者未能提供适当的信息去解释他们的分析。提供这样不一致的理论陈述和解释，并使用被高度限制的符码，并不减少或消除任何不确定性，而是增加了这些不确定。

绝大部分使用多变量统计分析的定性分析没有这样的假设，即需要多变量统计检验。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假设是基于二元变量关系的假设，因此需要二元变量分析。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只提供一些问题，但不提取任何假设，但做统计分析（包括一些没有提供因果假设的要素分析，或者没有提供因果假设却去测验因果关系）。所有这一切表明，经验实证主义的研究设计，数据分析和研究发现存在严重有效性问题。

有价值的可替代方案的边缘化、降格或者排除，控制性的和功能性的选择路径被提升

主导地位的存在意味着被主导者的存在，这使得主导与反主导的解放斗争始终在持续的动态当中。这种斗争并非铁板一块，相反，它是多种形式，多个层面的，它不仅是彼此之间的相互关联，但也与主导实践的具体表现相互关联。本研究发现，有的文章拥有“批判性的和高度批判性的内容”，但很少有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有意义的另类方案，这种另类方案根基于，譬如，社会变革意味着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理念之上。几乎所有的“批判性文章”或明或暗地，彻底地或普遍地反马克思主义者，它们是涂尔干 (Emile Durkheim)，胡塞尔 (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伽达默尔 (Hans Georg Gadamer)，拉康 (Lacan Jaqueo)，德勒兹 (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瓜塔里 (Félix Guattari)，福柯，鲍德里亚，萨义德 (Edward Waefie Said)，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拉克劳和莫菲的衍生品。

“批评”并不能使一个理论研究具有批判性。“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是指，如果它不是基于马克思的路径，则它是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思索。许多理论方法把他们的前提基于这样的情况，例如，在国会成员的性别组成的变化，受工资奴役或取得同性恋婚姻法律认可的劳动人口中民族构成的改变——这些并不是“可替代的取向”

或“批判性取向”，因为他们要承认并重新整合进入他们批判的主导结构中。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成为一个人性化的系统，即使资本主义的议会是由100%的女性、自由派、左派甚至是共产主义者组成。此外，从阶级分析到目前的当前各种身份政治的转向，都是转变的全球政策和“分而治之”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文化研究中抛弃利益而聚焦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人表达，在组织关系中回避人性而只关注文本的结构功能或其他散漫无章的展示及类似这样的研究，都不能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批判的”和/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我认为，作为最后的分析，受支配的和/或功能性替代范式支持着当下的资本主义模式和关系。

传媒领域是由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建立的。它发展成为一门社会科学。传播站在每一个社会科学领域（所有其他科学领域）的交叉点。然而，它并非不受待见或一块学术上的殖民地，任由那些对传播学几乎无所了解的学者们研究、书写。我一直批评土耳其这样的一种现状，在那里传播研究领域仍是一片“殖民地”，它被那些连传播学中最基础的文本都不读的人控制着，这些人大多是在自己的领域都不成功，却在殖民地（传播学领域）中找到了栖身之所。近年来，传播研究领域正在被一群最差的门外汉统治着。他们不仅仅破坏性地改变着传播学，也改变着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他们主要是来自文学、符号学、诠释学。传播学中缺乏文学、符号学或者文化背景的学者越来越多的状况让这种情况变得更糟，这些学者通过进行文化研究或者话语分析进入这支花车乐队之中。新的殖民者将大众传播的研究从一个领域推向另一个领域，即，从处理在组织化权力结构与利害关系下那真实的人类关系，转换到对支离文本的解释以及无意义的言谈。相应地，本次研究的结果表明，定性的传播研究远离了现实的人的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转向终端产品的分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产品、流程或文本互动（如语

言、诠释、解构或话语)被称作“决定性的主体/因素”。

物质上的、非物质上的富有与贫穷的产生^①

在学术关系中统治和争斗的本质,也同样在新闻界、论文、出版界中,它依赖于在一定的时空中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历史决定条件。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和“学科思想的交流”,与主体间的主导关系的建立、维护/保持以及扩展深刻相关,这种主导关系有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它们聚集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研究传统周围,提供着安全的工作保障、地位和资金投入。这种相互利益系统中的主导关系包含着对功能性知识的生产和分配的控制,这种知识对该这一利益系统是有益的。在21世纪,学术研究群体中的权力关系和竞争形式已经以这样的方式形成:它直指“科研中的个人利益”要旨,通过向出价更高者服务而实现,这其中的出价包括金钱、声望与地位。

在学术刊物中的主导情况是:定量研究占大多数,定性研究很匮乏,标准的研究呈现异常。在这一框架内,研究结果提供支持的事实,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至少有三个相互关联的非物质生产的主导关系(生产的意识形态、思想、意识、信仰、感情、情绪、同情、敏感和一切非物质的方面)。

第一种知识生产,是建立在以促进资本主义结构与关系为要旨的科研上。这样的知识生产很少产生于大学,但主要是在控制性的环境中,如R&D公司的部门,私人研究公司和政府机构。这种知识是很少为公众和市场生产(不是作为一种商品),这样的知识是一个不公开的、机密的和被高度保护的产品。只有当先进的知识被生产出来和先进的控制机制建立起来时,这样的产品才能面世。这些知

^①参看对于知识和知识生产的有价值的讨论: Marx 1971a; Marx 1973; Marx and Engels 1969; Carchedi 2005; Fuchs, 2010; Mosco and McKercher 2008; Mosco 2008; Schiller 1974 and 1987; Schiller 2007; Weiler 2006; Thompson 1997。

识使工业生产、推进和控制成为可能。我们不可能在学术刊物上看到这样的知识，除非它被认为对于建立控制机制和提升市场霸权必不可少。我们没法接近它们。

第二种是为思想和行为管理所生产的知识。我们可以把这种知识生产分成几个子类别：

(1) 关于人的知识：这类知识为工业和制度决策、政策制定、执行、审订、监控、订正提供有用的信息，在这一视野下的人是消费者、顾客和选民等。营销、广告和实证经验主义的传播学研究在这一领域发挥着作用。

(2) 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表现的知识：这种知识的目的是合法化工业结构和实践、劳动关系、工资政策和工作条件，以及为了去处理思维方式和行为倾向，使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从抽象的思想、感情、认同在工作中得到满足。学校中的考试和等级系统，让学生做好准备，愿意接受工业系统中的结构性不平等。组织化的传播研究，着重关注传播审计，灵敏度培训，换位思考，有效沟通，工作人员的态度、行为、工作绩效和在工作中的关系，类似的这些是专为工人操纵所设计，以便在不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情况下有更好的性能。组织内的公共关系活动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3) 控制人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为了保持一定层次和类型的意识、感情和敏感性，它们为现实中主流生活方式与关系提供辩护，并且使人们适应恶劣的条件，准备接受统治力量所强派的个人或集体屠杀 [杰伊·古尔德 (Stephen Jay Gould) 的臭名昭著的主张“我可以雇佣一半的工人阶级杀掉另一半”已经过时了，统治者不必雇佣他们了，因为他们已经被雇佣与使用]。这样的知识中的某些部分 (如情感、宗教和迷信价值观的产生和运用)，是统治阶层在人类历史上成功使用的策略的延续。这以前的统治知识在一个国家被重塑、复制，并且以同样或全球化的形式散播到全世界，被其他国家的其

他统治阶级所使用。这是资本主义方式全球一体化的基本环节之一。这种知识的内容和意义并不在于其普遍有效性，而是在于对统治者利益与实践的极大促进作用。例如，宗教思想和情感，让人民在 20 世纪 60 年代拒绝看电视，在清真寺使用收音机和扬声器也被认为是一种罪，直到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才被撤销。这就是所谓的整合，将原有的功能性思想、结构和实践整合到新的利益和统治方式、统治关系当中。这都是真实的，不仅仅是对于那些关于人的知识来说，同时也对于在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的知识来说，这种真实也是因为他们：在本研究中的 77 个期刊的大多数文章来源于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其他部分的知识属于阶级统治的现有模式。无论它是否拥有穿越历史的特征，这方面的知识是用来维持对人进行控制的所有可能统治方式。此外，控制人的知识对于创造“炫耀性消费”和消费社会，以及建立一种特定利益、参与、敌意和意愿的政治气氛是有功用的。这种知识的目的是在早期青少年阶段僵化人民的心智和兴趣。这种“知识”（将无知视为有知的再生产）是由大众媒体、文化和政治组织，向不同阶级接受正规教育的人提供的。

（4）为专业人士提供的知识以及由专业人士提供的知识：这是一种受情景条件限定的知识，为适应从事一定功能的职业活动的学者们的注意力、兴趣、研究和教育的关注点而生产的，这些学者一般指向特定的功能性、专业性的活动。这些日常性的、组织化、常规化的活动以这些知识为基础，并再生产了组织化的生活。大多数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例如电视情景剧的生产者，会对这种产品生产有错误的总体认识。然而，这种可能性在报纸编辑、传媒人和学者那里会低一些。一个学者会对自己所选择的理论和方法有着清醒的认识。这是一个经过精确计算的和事先定好的选择。我们讨论的这种知识和知识生产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这种专业性研究成果的数量和事实上由组织化的决策者使用的产品的数量都处在一个极低的水平